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砸爛舊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

卜偉華 著

「把當代中國驚心動魄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也是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總序·金觀濤)

-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總約六百萬字，是目前最具規模的大型中國當代史研究著述
- 十餘位功力深厚的中國當代史家，歷時七年，合力撰述
- 全景式歷史紀錄，通史與專題結合；注重國際與國內重大歷史事件關聯，揭示中央決策與地方、基層之間的互動
- 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

第六卷

「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

卜偉華 著

從1965年底批判《海瑞罷官》至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由毛澤東親自發動漸致高潮，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從奪權到天下大亂，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造反派分裂、武鬥升級，再到1969年4月召開九大，中國發生的各類事件千頭萬緒，令人眼花繚亂。在各級黨政機關被衝垮的情況下，中國政治權力又是怎樣運作的？作者依據大量史料、回憶錄，清晰地勾勒出文化大革命頭三年的全景圖像與過程。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

「砸爛舊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

(1966-1968)

卜偉華 著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

「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 (1966-1968)

卜偉華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88-17274-6-6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全球發行及總代理：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箱：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6

"Smashing the Old World": Havo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in Chinese)

By Bu Weihua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SBN: 978-988-17274-6-6

Publisher: 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g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序：世紀視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金觀濤

經過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終於分批出版、與讀者見面了。對我來說，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我一直把能否出版一套忠於史實、觀點開放的中國當代史視為對中國歷史學家的考驗。

把當代中國人經歷的驚心動魄歲月轉化為歷史著作，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願望。我們這一代人和人民一起經歷了苦難，又見證了啟蒙時期思想的風雨雷霆，這一切理應成為不可磨滅的歷史。然而我深知這一工作又是多麼困難。

首先，作者必須掌握盡可能完備的史料，特別是檔案文獻。近年來，出版了大量回憶錄和口述歷史資料，但是很多重大事件以及與中共高層決策有關的檔案至今尚未完全開放，為寫作帶來困難。在歷史學家的寫作中，除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外，更為複雜和重要的，是對史料的辨偽和確定其在決策過程中起過的作用，只有少數長期關注該領域的專家才具備這種能力。十分幸運的是，本套書的撰寫正是依靠了這批有深厚檔案功底、又長期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專家。他們足跡遍及全國各省及市縣檔案資料館，搜集整理檔案並對史料辨偽。史料之豐富、辨析之充分，正是本套書的重要特色。

歷史研究者的目標是追求歷史的真實，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搜集史料、整理檔案只是第一步。歷史學家在研究和寫作中都會有這樣一種體會：如果不能做到對歷史場景的同情了解，不能在內心

重演歷史事件展開過程以及理會當時支配事件展開的普遍觀念，就無法接近歷史的真實。本套書以1949年至1981年中國大陸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論述主線，這二十餘年正是毛澤東思想支配中國的時期，發生了世界歷史上獨特的令人很難理解的現象，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由於本套書的作者都是中國近幾十年巨變的親歷者，完全了解這些事件發生時的社會氛圍，這就使他們具備了某種比西方史家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優勢。當然，作者要發揮這種優勢，僅僅停留在感性階段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從某一種意識形態中走出來，盡可能價值中立地審視過去，達到反思的高度，以獲得超越的視野。開始注意到支配社會行動的普遍觀念與重大社會事件的互動，特別是這些事件是如何從中央決策到地方、再到基層展開的，是本套書的另一特色。由於各卷作者是獨立寫作，分批出版，雖然現在對全套書作出整體評價尚為時過早，但是，我可以不無自豪地說，中國人終於開始為不尋常的二十世紀中國撰寫大型歷史著作了。

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設主編，以便各位作者在寫作時有更大的自由，並表達多元的價值。由此帶來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統一風格，使十卷著作組成連續的整體。我們的解決辦法是在動筆之前充分討論各卷內容，每年舉行一到兩次工作會議，切磋寫作中碰到的問題。至今，我仍不能忘懷一次又一次的國史寫作討論會。窗外是北國的寒冬，大家聚集在不大的會議室中不分晝夜地討論，最後形成會議紀要。這一場景使我想起1970年代末青年時代和朋友的徹夜長談。很多時候，大家就某一觀點、細節甚至是提法，進行無休止的辯論。使我十分感動的是，無論在討論中發生多大的爭論，甚至是立場和價值上的分歧，最後都能在忠於歷史事實之上得到統一。根據時段，本書大約以兩三年為一卷，每卷由一位或兩位作者撰寫，而其他作者都把自己對該時段的見解和史料提供給該卷作者，整個寫作過程中表現出一種今日中國學術界罕見的真誠合作精神。在此意義上講，這套書是整個團隊共同努力的成果。

組織編寫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我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這套書

的出版，首先要感謝沈志華和李丹慧夫婦，從確定撰寫計劃到尋找適當的作者以及整體工作的協調，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組織者。其次，我要感謝青峰和先後在《二十一世紀》編輯室工作的同事黎耀強先生、林立偉先生、張志偉先生、朱敏翎小姐和張素芬小姐。他們在青峰的帶領下，以巨大的熱忱和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投入編輯出版工作，否則，如此繁重而浩大的編輯出版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我還要感謝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本書作者提供的支持和熱情周到的服務。最後，我要感謝方正兄，該書從醞釀到出版，一直得到他在精神上和各方面的支持。他雖已退休數年，但仍念念不忘這套書的出版，認為它對香港中文大學有着重要性。在這些中大同事身上，我仍可以感受到高錕教授任中大校長時期那種注重中國研究在當今世界意義的「中大精神」。

這套書出版之時，我也到達退休年齡，將開始人生的新階段。我想指出的是，由於可以看到的檔案和其他種種限制，這套書只寫到1981年。如果不談此後發生的波瀾壯闊的80年代啟蒙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1989年震驚世界的事件，我們仍無法理解今日中國和世界。在這一意義上，僅僅由前十卷組成的二十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不完備的，寫史的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從來就有忠於事實和敢言的歷史傳統，但很少有史家為當代寫史，故這套書的出版是一種新現象。它說明中國歷史學家已走出僅僅用春秋筆法褒貶益損，並展示了一種可能性，這就是歷史反思意識已經產生，並開始指向新的深度。我期待着後繼者。

2007年12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序言：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

王年一

卜偉華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在《「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一書完稿之後，即交我閱讀。拜讀之下，我驚喜地發現，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這是中國第一部詳盡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和浩劫的好書，也是中國第一部真實反映文化大革命本來面目的好書。中國目前尚無這樣的著作。我寫過《大動亂的年代》一書，與卜著比較起來，我以為差之甚遠。這不是過譽之詞，而是我的真切認識。我對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了解，有一些研究，但現在拜讀此書，仍常常感到觸目驚心，痛心疾首。

偉華兄寫作此書是下了很大功夫，付出很多心血的。他在著書之前，潛心分析研究了已有的文革論著的優劣，清醒地客觀地認識到了文革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見本書「後記」）。他說：「文革過去已近三十年，但國內記敘、研究文革的論著卻還是寥寥無幾。在並不太多的關於文革的著作、論文中，又有不少以論代史，從宏觀上發議論多而從事實的基礎上進行研究的少。……我覺得大多過於簡練，過於空洞。……許多歷史的謎團還是找不到答案。」這一番言論，很有見地。文革的研究，真真實實就是如此。偉華兄有了這樣的認識，他在其著作中則反其道而行之，針對這些問題來寫，這成了本書的最大特色。

首先，卜偉華將文化大革命界定為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這三年，認為這是狹義的文革（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則是廣義的文革）。他認為不把廣、狹二義的文革混為一談，才可以充分揭露文革的「動亂」和「浩劫」。他一反眾說，很有眼光。1969年4月至1976年10月，不過

是前三年的必然延伸和發展罷了。世界上最孚眾望的中國問題觀察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著作《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一書中說：「『文化大革命』持續了三年半，即從1965年年末到1969年4月。」(劉尊祺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378)偉華當面請教過文革研究專家麥克法夸爾先生(Roderick MacFarquhar)，麥克法夸爾先生也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三年(見本書「後記」)。不要認為這是無關緊要的小問題。只有依歷史的本來面目將文革界定為三年，才不致淡化文革的特點。正是在三年中，文革的特點暴露無遺。

針對若干研究者「為尊者諱」的問題，卜偉華秉筆直書，尊重歷史，決不苟且。文革中的許多重大事件乃至整個文革，沒有毛澤東的首肯或者決定，是無法進行的，是不可能出現的。毛澤東一再承認乃至強調，文革是他發動和領導的。如果為毛澤東諱，只能是歪曲歷史。尊重、敬愛毛澤東是一回事，依照歷史本來面目反映歷史則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同。有人創造出「林彪、江青一夥的干擾、破壞」這個公式，壞事都推到林、江身上。偉華在其著作中堅決摒棄這一公式，不讓林、江代毛受過。此書中的許多筆墨，正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癥結在毛。即使是上海奪權，也緣於毛的支持，張春橋不過是在前台表演罷了。書中也公正地、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葉劍英的錯誤。

針對若干文革論著中「對文化大革命的殘酷性反映的不夠」的問題，卜偉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濃墨重彩反映了文革的殘酷性。他在「後記」中說：「據我估計，文革時期，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當以百萬計。一個雲南趙健民特務假案，審查了138萬多人，其中立案審查17萬多人，打死逼死17269人，打傷致殘的61000多人。一個『內人黨』的錯案就有34萬多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我認為文革中這些最黑暗、最醜惡的部分，不應該被掩蓋起來，應該作為深刻的教訓留給後人。」「在廣西，出現了大規模的殺害人民群眾和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現象，堪稱文革中最為醜惡的典型事例。」在許多章節中，本書擺事實，痛快淋漓地揭示文革的醜惡。聽說有人在網上發表言論，說甚麼恨不得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讀過此書，必不會有人再說如此昏話。「浩劫」還能再來一次嗎？（至於對種種腐敗現象的痛恨，則是我們所能理解的。）

針對某些研究者「從宏觀上發議論多而從事實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少」、「過於簡練、過於空洞」的問題，本書則十分注重提供豐富的史實。卜偉華以多年的努力，廣為搜集各方史料。此書中到處可見人所不知、人所少知的史料，大開人們的眼界。讀者諸君從本書「附錄」的「參考文獻」中所列的上百種圖書就可以知道著者用功之勤。沒有多年的孜孜以求，沒有長期的積累，也就沒有本書。資料豐富，成了本書獨具的特色。不必爭論，一切讓事實講話。

在敘事上，本書又有周詳、豐滿、全面、完備、細緻等優點，常常補他人之漏，糾他人之誤，辯他人材料之偽。在夾敘夾議中，言論精闢，由表及裏，發人之所未發。講一個事件，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讓讀者留下疑團。議論中，要言不煩，一語中的。偉華兄能做到這一步，離不開他研究的深透。

針對過去國內關於文革的研究「多重於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的問題，卜偉華有意識地注重定量分析。如1967年頻頻發生的奪權事件，本書講清了全國各地到底出現了多少事件，各省、區奪權情況如何。又如搶槍事件，他一列出各地的重大搶槍事件，講出總共搶了多少槍。這樣，使人對奪權和搶槍事件有完整的認識和深刻的印象。

針對某些文革著作和論文「粗疏」、「大而化之」的缺點，本書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織成文革的全景圖。它不迴避，不省略，不跳過，以時間為線索，娓娓道來，處處使人看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使人有完整的印象。事物的本身總有前因後果，本書如實寫來，使人一目了然。哪怕只是一個事件，本書總是力求說得完備、全面、周到。書中議論不多，但畫龍點睛之筆頗為不少，值得深思和玩味。著者以他的眼力、功夫加上一句兩句評語，起到了點撥的作用，往往使讀者會心地一笑。我請讀者諸君不要忽視本書的註釋。本書的註釋不僅註明出處，往往有獨具慧眼的糾誤，也有風趣的議論。即使是毛澤東的言論，著者也大無畏地加上「不確」的評語，接着寫出論據。

本書我先睹為快，很感謝偉華兄給了我一個學習的機會。

偉華兄寫出這部佳著，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他多年來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二部（研究社會主義時期中共黨史的部門）做研究工作，可以接觸到中共中央的檔案（他遵守紀律，在本書中並未使用這些檔案，但豐富的檔案材料無疑可以幫助他形成正確的認識）——這是「天時」。所謂「地利」，指他可以看到全國各地的地方誌書。很多省、市出版了當地的文革史（名稱不一定就叫「文革史」），反映了各地的情況，使卜偉華對各地的情況瞭如指掌。「人和」者，偉華兄為人謙和，對人尊重，樂於助人，因而人際關係極好，容易得到各方面的信息，這大有助於他的研究工作。「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怎能不寫出佳著呢？

文化大革命才過去了近三十年，許多大學生已不知道「牛棚」為何物（以為是養牛的棚子），許多解放軍戰士已不知道林彪是何人。不是他們得了健忘症，環境使然。我們一些人常常恥笑某國忘記了二戰歷史而推崇德國，殊不知我們自己也忘卻了文革的血淚史，或者對歷史上的醜惡不敢正視。我們中華民族為文革付出了太多太多，應該從自身的錯誤中學習（恩格斯說過這是最好的學習）。歷史的教訓不可忘記。本書要告訴人們的，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歷史的教訓不可忘記，要努力剷除可以滋生文革的條件。

南京大學高華教授用十年時間寫成《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此書的特點是不用官方檔案材料（這是不可能得到的，也不允許使用），而用公開出版物上的材料。高先生以愚公移山、滴水石穿、鐵杵成針的驚人毅力，寫成一部傳世之作。贊成這部著作或者反對這部著作的觀點的人，都不能無視它的存在。卜偉華用同樣的方法，鍥而不捨地蒐求公開出版物上的材料，決不忽視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小資料（資料本無大小之分，只有有用和無用之別），不忽視唾手可得的材料，把複雜的問題講得清清楚楚。在方法論上，高、卜二位是不是也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示？看不到檔案材料，也可以做中共黨史的研究，高、卜二位就是榜樣。

2005年2月10日（大年初二）

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第二幹休所

目錄

| | |
|------------------|---------|
| 總序 | 金觀濤 xv |
| 序言 | 王年一 xix |
| 第一章 導火索 | 1 |
| 一 背景 | 1 |
| 二 批《海瑞罷官》 | 7 |
| 1 《海》劇的由來 | 8 |
| 2 姚文的出籠 | 10 |
| 3 引蛇出洞 | 14 |
| 4 要害是「罷官」 | 18 |
| 三 批羅瑞卿 | 21 |
| 1 林、羅齟齬 | 22 |
| 2 上海會議 | 28 |
| 3 突出政治的升級 | 30 |
| 4 三月京西賓館會議 | 36 |
| 四 批「文藝黑線」 | 39 |
| 1 「文藝哨兵」 | 40 |
| 2 〈紀要〉的產生 | 43 |

| | | |
|------------|---------------------------|------------|
| 3 | 〈紀要〉的批發 | 47 |
| 4 | 〈紀要〉的推行 | 50 |
| 五 | 批〈二月提綱〉 | 52 |
| 1 | 五人小組 | 53 |
| 2 | 棘手的難題 | 54 |
| 3 | 〈二月提綱〉 | 58 |
| 4 | 剝筍政策 | 62 |
| 第二章 | 發動 | 73 |
| 一 | 政治局擴大會議 | 74 |
| 1 | 「介紹情況的座談會」 | 74 |
| 2 | 〈五一六通知〉 | 79 |
| 3 | 林彪的「五一八講話」 | 82 |
| 4 | 檢查和批判 | 87 |
| 5 | 處理決定 | 91 |
| 二 | 會外的情況 | 93 |
| 1 | 運動初期各地都整了哪些人？ | 97 |
| 2 | 前門飯店會議 | 102 |
| 3 | 「五七指示」 | 106 |
| 4 | 鄧拓、田家英之死 | 108 |
| 5 | 首都工作組 | 113 |
| 6 | 中央文革小組 | 116 |
| 7 | 軍隊的動蕩 | 120 |
| 三 | 「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 125 |
| 四 | 大大小小的「三家村」 | 130 |
| 1 | 西北「三家村」 | 132 |
| 2 | 武漢大學「三家村」 | 137 |

| | |
|------------------------|------------|
| 3 「三家村」雲南分店 | 139 |
| 五 紅衛兵 | 140 |
| 1 文革前的學校教育 | 141 |
| 2 紅衛兵的成立 | 144 |
| 六 工作組 | 149 |
| 1 派出工作組 | 150 |
| 2 北大「六一八」事件 | 158 |
| 3 「反干擾」 | 160 |
| 4 工作組與紅衛兵 | 167 |
| 5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 | 172 |
| 6 撤銷工作組 | 174 |
| | |
| 第三章 再發動 | 185 |
| | |
| 一 八屆十一中全會 | 186 |
| 1 會議的召開 | 186 |
| 2 炮打司令部 | 190 |
| 3 〈十六條〉 | 196 |
| 4 改組中央機構 | 199 |
| | |
| 二 紅衛兵運動 | 204 |
| 1 毛澤東給紅衛兵的信 | 204 |
| 2 八一八大會 | 206 |
| 3 關於對聯的辯論 | 209 |
| 4 緊急呼籲書 | 217 |
| 5 造反派紅衛兵 | 220 |
| 6 紅衛兵司令部 | 223 |
| | |
| 三 「破四舊」運動 | 229 |
| 1 「向舊世界宣戰」 | 230 |

| | |
|-----------------------------|-----|
| 2 「紅色恐怖」 | 240 |
| 3 「破四舊」運動何以盛行一時？ | 248 |
| 四 大串連 | 255 |
| 1 大串連之始 | 256 |
| 2 北京紅衛兵在全國各地 | 259 |
| 3 紅衛兵「朝聖」 | 261 |
| 4 欲罷不能 | 265 |
| 第四章 新口號 | 271 |
| 一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271 |
| 1 大專院校座談會 | 271 |
| 2 「三種提法」 | 277 |
| 3 〈緊急指示〉 | 279 |
| 4 中央工作會議 | 281 |
| 5 火上澆油 | 288 |
| 6 省市癱瘓 | 292 |
| 二 大火向廠礦農村蔓延 | 298 |
| 1 「抓革命，促生產」 | 299 |
| 2 「工農反學生」 | 302 |
| 3 安亭事件與上海《解放日報》事件 | 309 |
| 4 「全紅總」 | 314 |
| 5 工交座談會 | 320 |
| 三 「黑風」 | 328 |
| 1 「紅海洋」 | 329 |
| 2 元帥的聲音 | 332 |
| 3 炮打中央文革 | 337 |
| 4 「聯動」事件 | 342 |
| 5 「12·25」大行動 | 348 |

| | |
|-------------------------|-----|
| 第五章 奪權 | 353 |
| 一 「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 | 357 |
| 1 毛澤東的生日宴 | 357 |
| 2 打倒陶鑄 | 361 |
| 3 寒冷的冬天 | 367 |
| 二 「一月革命」 | 369 |
| 1 康平路事件 | 370 |
| 2 兩報奪權 | 372 |
| 3 打倒市委大會 | 375 |
| 4 炮打張春橋事件 | 377 |
| 5 上海人民公社 | 380 |
| 三 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的奪權 | 383 |
| 1 最早奪權的省份是山西 | 383 |
| 2 從青島到濟南 | 386 |
| 3 「西南的春雷」 | 388 |
| 4 「東北的新曙光」 | 390 |
| 四 北京的奪權 | 392 |
| 1 各行其是的奪權 | 392 |
| 2 毛澤東干預北京奪權 | 397 |
| 五 全面奪權 | 400 |
| 1 國務院系統的奪權 | 400 |
| 2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奪權 | 402 |
| 3 「三支兩軍」 | 428 |
| 六 「二月逆流」 | 433 |
| 1 北京軍區事件 | 434 |
| 2 《解放軍報》的奪權 | 440 |

| | |
|---------------------------------|------------|
| 3 兩個「大鬧」和〈軍委八條命令〉 | 442 |
| 4 反擊「二月逆流」 | 451 |
| 5 二月「鎮反」 | 456 |
| 6 〈軍委十條命令〉 | 463 |
| 第六章 大批判 | 467 |
| 一 打倒劉少奇 | 468 |
| 1 劉少奇問題的升級 | 470 |
| 2 「革命大批判」 | 473 |
| 3 「五一團結」 | 478 |
| 二 「揪叛徒」 | 480 |
| 1 「六十一人案件」 | 481 |
| 2 「伍豪事件」 | 486 |
| 三 造反派的分裂 | 489 |
| 1 北京的兩大派 | 490 |
| 2 「五一三」事件 | 500 |
| 3 五一六兵團 | 504 |
| 4 教育改革 | 510 |
| 四 難產的革委會 | 514 |
| 1 內蒙古的抵抗 | 516 |
| 2 「天下未亂蜀先亂」 | 519 |
| 第七章 天下大亂 | 525 |
| 一 「七二〇」事件與「揪軍內一小撮」 | 528 |
| 1 毛澤東為甚麼要到武漢去游長江？ | 528 |
| 2 王力捅了馬蜂窩 | 531 |
| 3 「揪軍內一小撮」 | 535 |

| | | |
|---|----------------------------|-----|
| 二 | 「揪劉火線」 | 545 |
| | 1 劉少奇與建工學院 | 545 |
| | 2 「揪劉火線」的迅速擴大 | 548 |
| | 3 推波助瀾 | 551 |
| | 4 「揪劉火線」的撤銷 | 555 |
| 三 | 「三砸一燒」 | 558 |
| | 1 多事之秋 | 561 |
| | 2 「王八七講話」 | 567 |
| | 3 火燒英國代辦處 | 572 |
| 四 | 奪槍問題 | 576 |
| | 1 關於奪槍的一些典型案例 | 577 |
| | 2 毛澤東為甚麼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 | 590 |
| 五 | 「群眾專政」 | 596 |
| | 1 〈公安六條〉與「砸爛公、檢、法」 | 597 |
| | 2 湖南道縣事件 | 600 |
| | 第八章 理還亂 | 607 |
| 一 | 王力、關鋒的垮台 | 608 |
| | 1 「運去英雄不自由」 | 609 |
| | 2 北師大「九七事件」 | 613 |
| 二 | 「鬥私批修」 | 617 |
| | 1 毛澤東的南巡講話 | 620 |
| | 2 復課鬧革命 | 626 |
| | 3 籌備九大 | 634 |
| 三 | 動亂在繼續 | 638 |
| | 1 安徽：倒過來解決問題 | 639 |
| | 2 「晉東南辦法」 | 641 |

| | |
|----------------------------|------------|
| 3 雲南「滇挺」事件 | 643 |
| 4 內蒙古挖「內人黨」運動 | 644 |
| 第九章 波瀾再起 | 653 |
| 一 「反擊右傾翻案風」 | 653 |
| 1 北京高校學習班和「炮打謝富治」事件 | 655 |
| 2 「耿黃反黨集團」與九十一人大字報 | 665 |
| 3 「楊余傅事件」 | 668 |
| 二 「清理階級隊伍」 | 671 |
| 1 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 | 673 |
| 2 部分省市「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 | 676 |
| 三 新的派性鬥爭高潮 | 682 |
| 1 「四三派」與「四四派」 | 685 |
| 2 校園武鬥 | 689 |
| 3 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 | 698 |
| 4 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 | 701 |
| 四 廣西事件 | 706 |
| 1 「七三」布告 | 707 |
| 2 廣西南寧鎮壓「四二二」的戰鬥 | 715 |
| 3 「颶十二級颱風」 | 719 |
| 第十章 「全國一片紅」 | 725 |
| 一 革命委員會 | 725 |
| 1 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 726 |
| 2 革委會的機構設置 | 734 |
| 二 八屆十二中全會 | 737 |
| 1 會議概況 | 738 |

| | |
|------------------------------|------------|
| 2 批「二月逆流」 | 741 |
| 3 關於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 | 746 |
| 三 幹部下放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 751 |
| 1 「五七」幹校 | 751 |
| 2 上山下鄉 | 752 |
| 3 珍寶島事件 | 756 |
| 四 九大 | 759 |
| 1 政治報告的起草 | 759 |
| 2 會議經過 | 762 |
| 3 九屆一中全會 | 771 |
| 五 九大之後 | 773 |
| 1 徐州是全國的一個縮影 | 774 |
| 2 「反復舊」 | 779 |
| 3 局部動亂，綿延不絕 | 782 |
| 後記 | 791 |
| 附錄 | |
| 大事記 | 803 |
| 參考文獻 | 809 |
| 索引 | 827 |

第一章

導火索

一 背景

經過從1961年到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國又開始顯現出一些欣欣向榮的景象。與遭受「大躍進」災難之前的1957年相比，1965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增長59%，農業增長10%，工業增長98%。¹國家財政收支基本平衡，市場穩定，人民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中國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狠抓以研製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為核心（簡稱「兩彈一星」）的國防尖端科學技術，並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說過：「脫了褲子當當，也要把它們攜上去。否則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子就不硬。」1964年10月16日，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自行設計和研製的中近程導彈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陳毅元帥挺直了腰桿，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氣勢逼人的講話。²

1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頁613。

2 陳毅說：「我們等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大陸，我們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打敗它。……打敗了美帝以後，在全世界真正結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時代就會到來。」參見《人民日報》，1965年9月30日。

實際上，當時的中國還只是處於一個消費品不足、就業壓力大、資金匱乏的工業化初期水平。農業上糧食還沒有過關，副業尚未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沒有被調動起來，城鄉經濟的「二元化」趨於嚴重。在人民生活方面，雖然比「困難時期」好了許多，但是生活消費品依然嚴重短缺，人均生活消費品還沒有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在對外關係方面，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過高地估計了戰爭和革命的可能性而過低地估計了世界和平發展的可能性，過高地估計了美蘇合作的可能性而過低地估計了美蘇之間的矛盾，致使中國的對外政策日趨激進。中蘇論戰已經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公開分裂，1962年中國和印度發生邊境磨擦和武裝衝突，1964年美國擴大對越南北方的轟炸使越南戰爭升級，中國對這些外部壓力的反應愈來愈激烈，最終形成了中國要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相對抗的既定格局。受此影響，中國的經濟建設不得不將「備戰」問題放在首要位置，另一方面，中國為打破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勉為其難地擴大了對一些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這種援助的數額甚至影響了國內的建設和人民的生活。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把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的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1959年廬山會議把中共黨內最敢講話的彭德懷元帥打成了「反黨集團」的頭子。此後，中共黨內、黨外的言路都被牢牢地堵死了。60年代以後，中蘇兩黨圍繞着「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展開了大論戰，使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觀點更加系統化和理論化了，而且日益深入全黨全民的思想教育之中。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從國際上的反修聯繫到國內，更增加了反修防修的緊迫感。³ 席宣、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簡史》中指出：「這場以中蘇兩黨大論戰為焦點的所謂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確實是一付強烈的催化劑，成為有力地推動中國共產黨內『左』傾

3 在1963年2月2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講到，要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在軍隊的組織上，防止出修正主義。毛澤東說：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從十中全會後，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然後團結上中農，這就可以挖修正主義的根子。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271。

思潮急劇膨脹的重要因素，並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了直接的思想理論準備。」⁴

中共黨內的政治批判更加嚴厲了。毛澤東在1963年、1964年的一些談話中，點名批判了原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以及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鄧子恢關於農村工作的主張被概括為「三自一包」（即主張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王稼祥在1962年春向中央提出的爭取對外關係相對緩和的一系列建議，被概括為「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李維漢關於統戰工作的許多主張，被說成是「不講階級鬥爭」，「向資產階級投降」。1964年底，李維漢被撤銷了中央統戰部部長的職務；1965年，鄧子恢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被免去；1966年3月，王稼祥被免去中聯部部長職務。

在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展了一系列嚴厲的、日益加劇的批判。1963年11月，毛澤東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⁵

這一批示實際上是對整個文藝界作了基本否定的結論，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文藝界的整風，不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及所屬各協會進行，而且擴展到文化部及其直屬單位。文藝界的一些

4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56。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1。

主要負責人齊燕銘、夏衍、陳荒煤、田漢、陽翰笙、邵荃麟等都遭到批判。一大批電影、小說、戲劇、美術、音樂作品被扣上「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毒草」之類的大帽子進行批判。這種蠻橫的批判很快又擴展到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在經濟學界，批判了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的「利潤掛帥」；在哲學界，批判了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還對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哲學家馮定寫的〈共產主義人生觀〉、〈平凡的真理〉進行了批判；在歷史學界，對北京大學副校長、歷史學家翦伯贊和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羅爾綱等人的史學觀點進行了批判。

關於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的問題，鄧小平曾有過這樣的論述：「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⁶ 實際情況可能比鄧小平講的還要嚴重。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風氣的喪失和家長制現象的滋長並不是在1958年以後才出現的，早在1943年中央就曾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⁷，給了毛澤東個人獨斷專行的條件。在民主革命時期和解放初期，毛澤東這方面的問題還不明顯，因為那時他還比較謹慎，在重大問題上與中央領導集體尚未產生嚴重分歧，因此也不需要獨斷專行。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大批「反冒進」，逼迫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先後檢討。從此，反「左」傾、反冒進成為禁

6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90。

7 〈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1943年3月20日）中說：「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會期不固定，得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七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頁345。

區，「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思潮更加發展，緊接着發生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毛澤東仍然堅持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在關於黨的大政方針上固執己見、獨斷專行的現象愈來愈明顯，愈來愈嚴重。

從1962年開始，中共中央第一線⁸領導人同毛澤東的分歧日益明顯。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造成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對「三面紅旗」問題，劉少奇說：「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⁹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過火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也明確提出過不同意見。1965年3月，為糾正文藝批判過火的錯誤，劉少奇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文藝整風問題，想把文藝界的整風批判運動停下來。鄧小平在會上指出：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戲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麼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着別人的肩膀上台。¹⁰會議紀要明確指出，1964年以來的批判運動過火了，阻礙了創作繁榮，要趕緊剎車。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社教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嚴重分歧。劉少奇不同意毛澤東提出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堅持認為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很複雜，還是有甚麼矛盾解決甚麼矛盾。¹¹

8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在八大後分第一線、第二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在第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實際上，毛澤東始終沒有真正退居第二線。

9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442。

1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90.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70。

11 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66—137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965—967。

毛澤東愈來愈強烈地感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在1963年、1964年同外賓的談話中，他多次表露出這種看法。他說：「修正主義者中國有，不多，大概百分之四五左右。彭德懷，還有一些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當中，有十幾個修正主義分子。」他還認為黨內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路線」，他說：「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些，對反動派（尼赫魯）和氣一些，對修正主義和氣一些，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援助少一些，這就是修正主義路線。又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間有中央委員，省委書記，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1964年12月，他指責在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一個是以李富春為首的國家計委。¹²

毛澤東認為，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根本問題上，主持中央工作的第一線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等與他存在着分歧。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着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¹³

當毛澤東繼續推行錯誤的方針而不可能按照正常民主程序獲得多數人支持時，就不能不依靠個人的權威，他開始感到「需要一點個人崇拜」。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名存實亡，毛澤東個人逐步凌駕於政

12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90.12)》，頁269。

13 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89-1390。

治局之上，毛澤東同政治局之間，實際上成了上下級關係。毛澤東經常不參加政治局會議，往往是他在會前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討論，會後向他匯報，經他同意的意見才能實施。否則，或者是重議，或者是直接按他的意見辦。

階級鬥爭擴大化，甚至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使得全國上下人際關係緊張，矛盾重重。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在頻繁的政治批判中感到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歷年來各種政治運動遺留下來的數不清的冤、假、錯案和後遺症也都給未來埋伏了巨大的隱患。

當時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火藥桶，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在1965年11月10日點燃了。從批《海瑞罷官》開始，緊接着的是批羅瑞卿、批文藝黑線、批《二月提綱》。隨着這一連串的巨響過後，文化大革命的帷幕豁然拉開。

二 批《海瑞罷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開始嘶嘶作響地點燃了，但當時大多數人並未在意這一篇好像是研究歷史問題的文章。姚文把寫成於1960年的《海瑞罷官》劇中「退田」、「平冤獄」等情節，牽強附會地和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批判的「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說「『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斷定《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姚文是奉命寫成的，文字激烈，上綱很高，雖然沒有多高的學術價值，但它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卻不可小視。姚文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央其他一些領導人之間前些年在「三面紅旗」等重大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組織這篇文章的真實目的，是要以重新高度評價「三面紅旗」和充分肯定對彭德懷的批判，作為清算劉少奇等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突破口」。

1 《海》劇的由來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毛澤東針對當時「大躍進」以來黨內很多人謹小慎微、隨波逐流，不敢講真話的現象，號召大家學習海瑞，要有像海瑞批評嘉靖皇帝那樣的勇氣，堅持真理，不要連封建時代的人物都不如。毛還表揚了陳雲，稱讚他對指標問題表示了正確意見，說真理有時不在多數人手裏，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¹⁴毛澤東在觀看湘劇《生死牌》時，對戲中出現的南包公海瑞無私無畏地為民除害大為讚賞，認為儘管海瑞罵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毛說，我們的歷史學家們，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海瑞。他號召大家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不怕丟官、不怕坐牢的精神。會後，毛澤東的秘書、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喬木找到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請他根據毛澤東的意思給《人民日報》寫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吳晗欣然接受。

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吳晗用「劉勉之」為筆名寫的〈海瑞罵皇帝〉一文，獲得史學界的好評。從9月17日開始，吳晗在《人民日報》上又陸續發表了〈論海瑞〉等五篇文章。他是把胡喬木交給他的宣傳海瑞精神當作一件大事認真地去做了。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提出要區分左派海瑞與右派海瑞，彭德懷表現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有鑑於此，吳晗為了避嫌，他在〈論海瑞〉一文中一再不點名地批判彭德懷，還在文末特意寫了一段批判所謂「假冒海瑞、歪曲海瑞」的話。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約請吳晗為北京京劇團寫一齣海瑞戲。吳晗從1959年底到1960年11月，用了近一年的時

14 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決議〉要求1959年實現比1958年「更大的躍進」。會後陳雲曾向毛澤東表示，1959年鋼、煤、糧、棉指標難以完成。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對上年的計劃指標作了調整，將鋼的指標由2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煤的指標由4億噸降為3.8億噸。八屆七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又根據陳雲和中央財經小組的意見，進一步將鋼的指標降為1300萬噸；將煤的指標降為3.4億噸。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頁446—447；《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39—140。

間，七易其稿，寫成劇本《海瑞罷官》¹⁵。該劇主要描寫海瑞任應天巡撫時「除霸」、「退田」的事跡。《海瑞罷官》劇本在1961年《北京文藝》1月號全文刊載。

此劇1961年1月開始在北京工人俱樂部正式上演。京劇名家馬連良、裘盛戎扮演劇中主要正、反面人物，他們的演技精湛，好評如潮。毛澤東曾將馬連良召進中南海，親自聆聽馬的演唱，並留馬共進晚餐。席間毛澤東還稱讚這個戲演得好，說「海瑞是個好人，劇本也寫得好」，「應該提倡學習海瑞這樣的人」。¹⁶

《海瑞罷官》的演出在文藝界、史學界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61年2月26日，繁星（即廖沫沙）在《北京晚報》發表了〈「史」和「戲」〉一文，對吳晗「破門而出」，作為歷史學家「卻來寫戲」表示祝賀，並提出三個問題來討論：一是歷史的「真實」和戲劇的「真實」該不該有區別，如何區別？二是寫歷史書中的人物和寫歷史戲中的人物，如何區別又如何統一？三是寫歷史和寫戲，都得研究發展過程，不但情節，人物也得有發展過程。吳晗是怎樣來寫這兩種過程的？2月28日，吳晗在《北京晚報》發表〈關於歷史劇的一些問題〉，回答繁星的提問。後來在《北京晚報》上還有多篇文章參與這一討論。1961年《北京文藝》3月號發表曲六乙的文章〈羞為甘草劑，敢做南包公〉和鄧允健的文章〈評《海瑞罷官》〉。曲六乙說：《海》劇符合歷史真實，也有必需的藝術虛構。吳晗立意寫海瑞剛直不阿，不為強暴所屈，不為失敗所嚇倒，失敗了再幹的堅強意志，而不苛求於海瑞，不著重寫海瑞的缺點和不足，從劇作角度看，應該是被允許的。6月23日，《北京晚報》發表馬連良的文章〈從海瑞談到「清官」戲〉，對封建社會的官員進行了分析。文章說，封建社會的官，給皇帝辦事就很難為老百姓「分憂」、「服務」，這是一個方面；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封建社會的官員和最高統治者之間、封建官僚之間也會產生一定的矛盾和衝突，而有的

15 劇本原名《海瑞》，後吳晗採納朋友建議，在1960年底彩排後，將劇名改為《海瑞罷官》。

16 楊勝群、田松年：〈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前因後果〉，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頁1929。

時候這些封建官僚對老百姓又不是絕對不能理解或同情。因此，有的官員也可能辦出一些符合老百姓利益的事情來。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所謂的清官。當談到戲劇裏表揚「清官」時，文章指出，「很可能有微言大義存焉，是在教育當時做官的，起着『大字報』的作用」。

總之，在一段時間裏，文藝界、史學界出現了一片活躍的氣氛。以歷史劇創作為主題的學術討論在全國各報刊紛紛展開，歷史題材的小說、戲曲、電影創作呈現出繁榮景象。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電影《燎原》、《怒潮》，戲劇《李慧娘》、《謝瑤環》等等，一個接一個地同讀者和觀眾見了面。學術界也廣泛展開了對清官問題、讓步政策問題、農民戰爭問題、道德繼承問題、美學與教育問題等問題的討論。

2 姚文的出籠

對《海瑞罷官》這齣戲，說好的人多，說不好的人也有。毛澤東的妻子，同時又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江青在1962年觀看了《海瑞罷官》後，一口咬定這齣戲有問題，應該批判。她曾對中央宣傳部、文化部的負責人陸定一、周揚、齊燕銘、林默涵等提出，《海瑞罷官》存在嚴重政治錯誤，應該停止演出，進行批判，但遭到婉拒。1964年6月至7月，文化部在北京舉行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會演期間，江青找到《人民日報》社文藝評論家李希凡，要他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在李希凡還是一個「小人物」時，就敢於向「紅學」專家俞平伯挑戰，而且還受到過江青的支持和幫助。但這次李希凡對江青的要求表示不能接受。

1965年2月，江青前往上海，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下，組織當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的姚文元執筆，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此後，上海市委書記兼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頻繁來往於京滬之間，名為「搞戲」、「修改音樂」，實則在江青與姚文元之間牽線搭橋。從3月初開始動手到11月發表，整個寫作活動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除毛澤東和柯慶施（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1965年4月9日病逝於成都）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江青後來說：

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當時彭真拼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卻也在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¹⁷

據陳丕顯回憶，江青等人開始搞批《海瑞罷官》的文章，「除了柯慶施、張春橋外，對上海市委其他領導也嚴格保密」。柯慶施病死成都後，江青才將此事的一些情況告訴了陳丕顯等人。¹⁸

在一些比較權威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中，流行着這樣一種說法：對於批判《海瑞罷官》，毛澤東開始時不同意，但後來被江青說服了。¹⁹也就是說，在批判《海瑞罷官》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被動的。這一說法很可懷疑。

毫無疑問，毛澤東在對待《海瑞罷官》這齣戲的態度上肯定是有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即從肯定、欣賞到否定、批判的過程。戲剛上演時毛顯然是讚賞的，而且至少到1964年9月，毛還堅持對吳晗不要點名批評。²⁰但此後，毛的態度顯然是發生了變化。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組織姚文元等人寫批判文章，江說是「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但根據她的這句話，並不一定能得出「毛澤東開始時不同

17 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399。

18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27。

19 例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90.12）》，頁27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頁75。

20 陸定一在1966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說過，1964年9月，他和彭真向毛澤東匯報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問題時，毛澤東明確表示，吳晗不要指名批評。劉仁也說過，1964年夏，北京寫了批判吳晗的「道德繼承」論的文章，彭真不予同意，他說中央決定保護吳晗。

意，但後來被江青說服了」的判斷。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時，在談到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時，他說：

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²¹

毛的這個講話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即他是在明知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會遭到其他中央領導人反對的情況下批准組織這篇文章的。但他所說的「開頭寫我也不知道」的話是不能當真的。江青已經說了，沒有毛的允許，她是不敢動手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引述了毛澤東的一段話：

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滸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就在這個紅色城市（指北京——薄注）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為如果「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²²

請注意，毛澤東這裏說的是「我建議江青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很明顯，毛澤東是主動的。

21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97。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1233。文革期間流傳的「首長講話」中也有毛的這個講話，與薄所引用的文字大致相同。

1967年1月14日，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說：「吳晗罷官，是文化革命的一個影子。主席要點名，彭真當耳邊風，主席到上海組織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這樣出來的。」²³ 請注意，是「主席要點名」，是「主席到上海組織力量」。

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說：「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主席親自在那裏領導的嘛。」²⁴

王力在回憶錄中寫道：

寫海瑞罷官文章，有人說毛主席不知道，是江青勾結張春橋、姚文元弄的，這不符合事實。最初要寫這篇文章就是毛主席要寫的。毛主席在北京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各大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毛主席提出要寫文章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毛主席後來很生氣，就是因為「我說了北京沒有人寫」。怎麼能說毛主席不知道呢？北京沒有人寫，毛主席才叫上海寫。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寫的。²⁵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在點名批吳晗的《海瑞罷官》這件事上，毛澤東是主動的，江青不過是毛的一個「卒子」。

另外，我們從毛澤東的性格特點上來看，毛常自詡，他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如果他認為不應該點名批判吳晗，那他也不會輕易地被人「說服」。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江青前往上海開始組織這篇批判文章的時間，正是毛澤東下決心「搞掉」劉少奇之後不久。²⁶ 這或

23 周恩來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時的講話(1967年1月14日)，載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第一句語意不清，據另一版本的這一講話，第一句為：「批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文化革命的一個引子。」較為可信。

24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13。

2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755—756。

26 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與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497。

許也可以有助於加深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理解。從以後文化大革命無數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江青的言行有很多是可以反映毛澤東的思想脈搏的，儘管有的時候反映得極為誇張，甚至是歪曲了毛的原意。

為幫助對明史並不精通的姚文元批《海瑞罷官》，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講師朱永嘉被調來當姚的助手，專門為他查閱史料。中共上海市委也參與了姚文的寫作與修改。江青1966年8月6日在北京天橋劇場紅衛兵辯論會上的講話中說到：「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那篇文章寫出之後，上海書記處又改過十幾次。」²⁷

在姚文發表前，由張春橋出面，曾召集上海的一些歷史學教授、專家及文藝界知名人士舉行座談會，徵求意見。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教授尖銳地指出：「這樣把學術問題硬跟政治問題扯在一起，豈不是陷人於罪？」座談會上所有批駁姚文的意見都未被採納。²⁸

3 引蛇出洞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在知識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全國各地、各報刊、各學術單位對之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北京市文聯、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單位分別召開了不同形式的座談會、討論會，就《海瑞罷官》問題進行爭辯和討論。各報刊也紛紛組織文章、開闢欄目開展討論。由於對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那樣的「陽謀」印象太深，大多數知識分子未敢輕舉妄動。

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以贊成姚文觀點的居多。有的文章認為，《海瑞

27 張春橋於1966年12月23日下午，在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談話時，談到寫作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的經過：「姚文元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無關。從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和姚文元兩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給市委。當時主要是為了搞好市委內部關係……其實，《評《海瑞罷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體的是江青同志指導我們搞的。」

28 張春橋1966年5月6日說，姚文發表前三天，曾請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幾個人提意見。他們對後一部分（關於政治問題部分）統統反對。

《海瑞罷官》在客觀上的確是當時「社會上歪風的反映」，姚文「對提高認識有好處」，姚文「寫得好，寫得尖銳」，而且「觀點正確，有說服力」。它「用階級觀點對史料作了分析」，「抓住了《海瑞罷官》的要害」，「富有戰鬥性，理由充分，批評有力，擊中要害」。他們對姚文「表示同意」、「基本同意」。²⁹

在肯定姚文的同時，許多人對《海瑞罷官》和吳晗做了激烈的抨擊。他們認為：不管《海瑞罷官》的作者有意還是無意，這個劇本「在客觀上起了反社會主義的作用」，《海瑞罷官》是為反動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是直接反對當前現實生活的」，就這一點來說，比陳翔鶴的《廣陵散》、《陶淵明之死》還要壞³⁰。哲學研究所的一個人說：《海瑞罷官》宣揚「退田」、「平冤獄」，「這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反映」，「吳晗主張繼承封建道德中的忠、孝、義，這是對共產主義道德的攻擊，也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文學研究所的一個人說：歌頌海瑞，比歌頌謝瑤環更嚴重了³¹，「因此可以說，吳晗的問題比田漢更嚴重」。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的一個人說：「吳晗以講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名，宣揚了一套資產階級歷史觀點。由於人們以為他在政治上還好，所以受了迷惑。加以他抓了不少普及歷史知識的工作（指主編《歷史小叢書》），在工人、農民和戰士中也有影響，對吳晗的學術觀點作一次系統的批判和清算，很有必要，很有意義。」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有人說：「《海瑞罷官》以階級調和代替了階級鬥爭，以祈求恩賜代替了人民革命。從這個劇本中看不到人民群眾的作用，推動歷史的只是一、二個統治者。特別是吳晗鄭重其事地在《論海瑞》一文中提出要向海瑞學習，說海瑞處處為勞動人

29 張占斌、孫建軍：《「三家村」沉冤》（湖南：三環出版社，1992），頁84—85。

30 陳翔鶴（1901—1969），四川重慶人。建國後任四川省文聯副主席。1954年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古典文學部副部長兼《光明日報》專刊《文學遺產》主編。他創作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挽歌》和《廣陵散》發表後影響廣泛。作品自1964年起受到嚴厲批判，作者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31 1961年田漢根據地方戲碗碗腔《女巡按》改寫為京劇《謝瑤環》，講述唐武則天稱帝時，女官謝瑤環為民請命被奸臣迫害的故事。因劇中有「為民請命」、「載舟覆舟」等詞句，文革中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批判，田漢於1968年冤死獄中。

民着想，這是不能容忍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的一個人認為，吳晗把當前的社會與歷史上的社會等量齊觀，這是歪曲歷史事實，是大錯特錯。復旦大學的一位教師還聯繫吳晗的歷史認為：吳晗頭腦中舊東西原封未動，沒有破舊立新，儘管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裝飾自己的外表，到了一定的時候，資產階級思想意識還是要暴露出來，他寫《海瑞罷官》就是明證。³² 這些贊同姚文元文章的觀點，公開聲討、批判《海瑞罷官》及吳晗的人，有些是本身深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或許還有一些人是出於政治投機心理而參與的，但大多數人還是在政治形勢的壓迫下，違心地跟着喊的。隨着運動不斷向縱深發展，附和姚文元觀點的人成為主流，批判《海瑞罷官》成為瀰漫整個社會的聲音。

為達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文匯報》於11月30日發表了上海敬業中學高二學生馬以鑫(發表時用的是筆名馬捷)批駁姚文元的文章〈也談《海瑞罷官》〉一文，並發表編者按說：「我們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為了開展百家爭鳴，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弄清楚，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昌盛。我們熱烈地歡迎廣大讀者繼續來稿來信，各抒己見，參加討論。」12月10日，張春橋要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出面召開一個關於《海》劇的座談會。會前，張春橋對楊說，我們現在要「放」，如果別人不敢提相反意見，你可以先表個態，就說姚文元文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可能是小部分正確，大部分不正確……你帶頭一講，人家就敢講了。張春橋也在這個會上發了言。他說：「《海瑞罷官》提出來的，不只是一齣戲的問題，而是一系列原則問題，涉及到海瑞、清官、道德繼承、歷史主義、讓步政策、歷史劇、歷史人物，等等。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有根本分歧。」「這些分歧，是我們同……歷史界、戲劇界、哲學界許多資產階級學者之間的分歧，是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中階級鬥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要有步驟地搞，首先是要給這齣戲是不是毒草定案。然後一個題目一個題目地搞。」「方法是百家爭鳴，大鳴大放辯論……。」「《文匯報》如能在一年中解決了這幾個問題，中

32 張占斌、孫建軍：《「三家村」沉冤》，頁85—86。

國思想史上就要寫上一筆……。」12月31日，張春橋讓《文匯報》出面召開上海史學界、文藝界部分人士座談《海》劇，會前宣布是內部討論，不登報，不發表，暢所欲言。會上，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紛紛發言，不同意姚文元強詞奪理地上綱。會議結束時，主持人突然宣布要把討論整理成文，公開發表，學者們大嘩，驚呼「上當」。³³

不同意姚文觀點的也大有人在。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齊思和說：「吳晗是左派進步人士，又是副市長，我看他絕沒有反黨的動機。」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張芝聯說：「很難設想吳晗會犯姚文元所指責的那種政治錯誤」。詩人臧克家也對攻擊吳晗和右派一樣罵「鄉願」是罵黨、「平冤獄」是為資產階級翻案表示懷疑，並肯定「吳晗是老左派」。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尚鉞指責姚文元「把學術問題同政治問題混同起來，硬要把人家往右派方面推」，「姚文元的大棒，不禁使人聯想起1960年那種一棍子打死人的做法。」「這種做法對革命不利，對團結同志有害。」「可以說，姚文元的文章是無理、無利、無節。」

民族研究所所長翁獨健對姚文元也異常氣憤，他說：說吳晗學術觀點有問題，階級觀點不清楚，那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照姚文元「那樣引伸，那樣推測，豈不成了文字獄，誰還敢寫文章」。翁以明初有人因為寫文章用了「光天化日之下」（有隱刺明太祖朱元璋當皇帝前當過和尚之意），就被朱元璋殺頭事為例，責問說：「像姚文元那樣搞法，和這有甚麼區別？」「這樣一搞，會把學術界搞亂的。」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認為：姚文「不利於百家爭鳴，不利於社會主義學術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他說：「學術批評不是為了一棍子打死人，讓別人翻不過身來」，「寧左毋右，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得好的，就是會扣帽子，沒有甚麼真本事，罵人最簡單。」他還指出：「弓弦拉緊了，都變成驚弓之鳥，對於我們共產黨不利。」「如果整吳晗，所有

33 鄭謙：〈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兼駁《文化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黨史通訊》，1984年第6期，頁18。

進步知識分子都會寒心。」他認為：「現在學術界顧慮並未完全解除。」
「姚的文章亂來一通，不使人害怕嗎？是嚇人的。」³⁴

4 要害是「罷官」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對上海突然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極不正常。他氣憤地說：批判一個副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他們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在《人民日報》和北京市委向《文匯報》詢問姚文的背景以確定是否轉載時，張春橋下令上海方面不得作出明確答覆。因此，在姚文發表後的十多天內，除華東地區的七家報紙予以轉載外，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報刊都未作轉載。這種狀況激怒了毛澤東，他提出由上海出小冊子。在徵求訂數時，北京新華書店訂購數很少。這更加深了毛澤東對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懷疑和不滿。他認為北京市委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11月下旬，周恩來到上海後，知道了姚文的背景，他便打電話告訴了彭真。羅瑞卿在上海陪同毛澤東接見柬埔寨首相朗諾時，也曾向毛澤東談起過姚文，羅瑞卿從毛澤東的笑容裏得知，毛是看過姚文的。他在電話裏和彭真說：「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時，主席笑了。估計毛主席是看了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軍報》轉載，請你也考慮。」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書記處指示北京的報紙予以轉載。

11月29日，《北京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姚文。《北京日報》的編者按是彭真口授的，其中引用了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話，並說：「為了便於大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決問題，我們準備在本報就《海瑞罷官》及其他問題展開討論。」編者按對姚文元的文章未置一詞，但這本身也是一種表態。《解放軍報》的編者按則稱《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海瑞罷官》這個戲的出現，正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反映」。《解放軍報》為此受到彭真的批評。

34 張占彬、孫建軍：《「三家村」沉冤》，頁87—88。

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第五版「學術研究」專刊上轉載了姚文。經周恩來、彭真審定的編者按也是把討論的問題作為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來處理，強調「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

12月8日，《紅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不指名地批判了以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反動的歷史觀」。

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鄧拓以「向陽生」為筆名的〈從《海瑞罷官》談道德繼承論〉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根據彭真指示寫的，由彭真親自修改，經北京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文章的主旨是：不要把對吳晗的批判，和關於封建道德繼承的學術問題，生硬地和政治問題相聯繫。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關鋒等人談論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哲學問題和教育問題時說：

一些知識分子，甚麼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³⁵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³⁶

從上面這段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為甚麼支持姚文，毛澤東就是要點出吳晗的名字，就是要引起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的震動。毛的這段話，把《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罷彭德懷的官聯繫起來，使問題更加嚴重了。

毛澤東對彭德懷耿耿於懷。戰爭年代，彭是毛的得力戰將，深得毛的器重。彭是一個個性極強的人，是中共黨內屈指可數的敢對毛講不同意見的人之一。但在毛看來，彭德懷卻是個腦後長着反骨的魏延式的人物。1965年美國侵越戰爭升級，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9月中央工作

35 指戚本禹：〈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紅旗》，1965年第12期，頁14—22。

36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01。

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考慮到戰備形勢，彭德懷、黃克誠、習仲勳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議把他們掛職下放，分配到外地去。9月23日，為了說服彭德懷赴四川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毛澤東親自與彭談了話。³⁷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審閱姚文時，對姚文緊緊抓住《海瑞罷官》中的「退田」、「平冤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當時就是緊緊圍繞上述兩個大問題給吳晗上綱上線的。在姚文發表後的最初一段時間裏，毛澤東也沒有發表過甚麼意見。在一個多月後，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接受了康生曾經向他提出過的要害是罷官的觀點。³⁸

12月22日，毛澤東又向專程來杭州的彭真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彭真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對毛說：根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關係。毛澤東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之後再作結論。他還說，吳晗當市長不行，也許下去當個縣長好一些。意思就是對吳晗也要罷官。此後，彭真提出讓吳晗寫個自我批評，以爭取主動。

12月27日，吳晗在《北京日報》發表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一文，就有關《海瑞罷官》中涉及的若干學術問題進行了說明和解釋，承認自己「忘記了階級鬥爭」，「用的是形式主義的方法，片面地、絕對地、主觀地來描述海瑞和農民群眾，這是思想問題，也是階級立場問題，錯誤是嚴重的」，「效果是十分惡劣的」。為了糾正姚文關於影射的說法，吳晗還特意把1959年、1960年兩年中研究海瑞的情況開列

37 據一些有關彭德懷生平的書中稱，談話中毛澤東有「也許真理在你那邊」的話。但根據毛要彭離京的初衷，以及當時他正在組織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等情況看，毛不大可能說這種話。據關鋒1980年1月24日交代：「1966年6月間，在上海開會，江青對我和戚本禹說，分配彭德懷到三線任副總指揮，不是毛主席的意見，毛主席並不同意。但在中央佔少數，只好同意他去。」黃克誠被下放到山西省當副省長，習仲勳被下放到河南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參見林蘊暉：〈毛澤東為甚麼派彭德懷去三線〉，載《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頁1922-1925。

38 毛澤東在1966年2月8日曾談到「要害」的發明權是康生。康生後來也多次標榜自己的發明權。1966年6月3日，康生同胡志明談話時也提到：「我曾向毛主席講過，《海瑞罷官》與彭德懷有聯繫，因為它提出退田分給貧民的口號，彭德懷也提出要恢復單幹。」

了時間表，以表明自己研究海瑞並非影射廬山會議。吳晗決不承認自己會反黨反社會主義，他說：自己「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黨的教育、培養、關懷下，政治上的階級立場是站穩了的」。實際上，吳晗對姚文打棍子式的批判是不服氣的。他說，《海瑞罷官》是胡喬木要他寫的，喬木說毛主席稱他是明史專家，希望他寫這個題材，政治術語都是喬木加上的。現在卻叫他檢查，吳晗對此當然不服氣。³⁹當時他還對他的——個學生說：「姚文元根本不懂歷史還要裝懂，不顧起碼的史實，捕風捉影，胡亂聯繫，無限上綱，那能說服了誰呢？」⁴⁰

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要害」的談話逐漸傳開以後，一些批判文章的調門隨之升高，受到點名批判的人和作品不斷增多，批判的範圍迅速擴大。許多學者、作家心情緊張，惶惶不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則感到大受鼓舞。

三 批羅瑞卿

11月10日，在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當天，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調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⁴¹此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央內部又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即開始了對羅瑞卿的批判。

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共中央軍委的工作。根據林彪的提議，羅瑞卿副總理兼任總參謀長，同時兼任國防部副部長和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羅是林的老部下。長征時，林彪任紅一軍

39 參見李莉：〈李琪在「文革」發動前後的日子裏〉，《百年潮》，2003年第8期，頁15。

40 張海瀛：〈憶吳晗師〉，載北京市歷史學會編：《吳晗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頁134。

41 1965年11月，楊尚昆被加上「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別人抄錄」等罪名。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為楊尚昆平反，指出：錄音工作和抄錄檔案，是在經過嚴格審查和批准後，對領導人重要講話的記錄和對檔案資料的積累，並不存在所謂「竊聽」、「私錄」和「洩密」問題。

團軍團長，羅瑞卿先後任紅一軍團和紅一方面軍保衛局長。在延安時期，林彪任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副校長。林彪對羅瑞卿的精力、魄力和才幹非常賞識，羅瑞卿對林彪也是非常尊重和佩服。起初，林、羅之間關係還算正常，但不久就出現了裂痕。

1 林、羅齟齬

1965年秋天，林彪曾對人說：「1960年，羅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從1961年起，便開始疏遠我、封鎖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對我了。」

1961年，林彪與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對如何學習毛主席著作發生分歧，羅榮桓主張堅持學習立場、觀點、方法，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帶着問題學」。林彪懷疑羅瑞卿站在羅榮桓一邊而遷怒於羅瑞卿。

1962年秋，林彪的妻子、林辦主任葉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揮部隊入閩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澤東決定，在林彪養病期間，由賀龍元帥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毛澤東還多次向羅瑞卿提出，要多向賀請示工作。林彪也讓人給羅瑞卿打電話，說林彪身體一直不好，不能過問軍委的事，讓第一線的人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總部擋，較大的事辦公會議討論，再大的事軍委常委討論，更大的事情直接報告主席、中央」。而當羅瑞卿真的這樣做了的時候，卻遭到林的忌恨，林還嫌羅與賀龍接觸多，向他請示少。有一次，林彪從外地回京，立即要見羅瑞卿，羅正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回電話說：會散了就去。林一聽火冒三丈，拍了桌子，隨即在當時作備忘錄用的紙條上寫道：「大捧別人，大跟別人，回京後根本不來見面。……讓他做絕。當作又一彭黃也——」

1963年12月27日，葉劍英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發電報，推薦南京軍區第12軍100團二連連長郭興福的教學法，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⁴²，掀起軍事訓練高潮。1964年1月3日，中央軍委轉發了葉劍

42 1960年以來，解放軍南京軍區某部二連副連長郭興福，在群眾練兵的基礎上總結了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得到了南京軍區領導的肯定和推廣。這套教學方法被稱作「郭興福教學法」。

英的報告，總政治部發出了〈關於宣傳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指示〉。隨後，全軍各部隊掀起了學習的熱潮。1月下旬，羅瑞卿將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負責人都請到南京，參加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的現場會。之後，羅瑞卿又寫報告，建議搞一次全軍比武活動，得到毛、林和其他軍委副主席的同意。1964年6月15日、16日，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檢閱了北京部隊和濟南部隊的比武表演。毛澤東對比武給予了高度評價，並指示要在全軍普及「尖子」經驗。6、7、8月間，全軍分為十八個區舉行了「比武大會」，參加表演的部隊和民兵13700餘人。

8月間，毛澤東吩咐賀龍、羅瑞卿到北戴河向他匯報軍隊高級幹部減薪問題。匯報中，毛澤東決定：取消軍銜制。羅瑞卿回京後立即向正在蘭州養病的林彪匯報了，但林彪還是對此大為不滿，他對取消軍銜制並無異議，他氣憤的是：賀、羅「越位」去見毛澤東，做出如此重大決定時，竟然將他林彪撇在了一邊。

8、9月間，中央軍委擴大的辦公會議和全軍訓練工作會議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進行總結時，都提到了少數單位在軍訓中有拼湊尖子、弄虛作假、形式主義的傾向。林彪以此怪罪於羅瑞卿，給羅倡導的大比武扣上單純軍事觀點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帽子。11月下旬，林彪派葉群參加總政工作組在第一二七師三七九團的調查研究，實際上是在準備攻擊羅瑞卿的「炮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她連續整理了〈關於一連單純軍事觀點的報告〉、〈關於四連資產階級思想泛濫的報告〉、〈關於七連錦標主義、弄虛作假的報告〉和〈關於團黨委把四個第一變成了四個第二的報告〉等文件。

12月24日，葉群帶着這四份報告，到廣州與林彪會合。12月28日，林彪聽取了總政工作組的匯報後說：「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衝垮了。明年要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單純技術觀點、反對單純生產觀點。比武擠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復比武前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總政工作組將林彪的指示打電話傳達給羅瑞卿，羅聽後表示：「我理解林總的指示是局部的情況，不是指全體。如果那樣，那就是路線錯誤。」

12月29日，林彪親自審定了由總政工作組整理的林彪〈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軍事訓練、生產等和政治工作發生了矛盾，要給政治工作讓路」。「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上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軍事訓練、生產等可佔用一定時間，但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

羅瑞卿在組織紀律允許的範圍內，按照自己對「突出政治」的理解，將林彪的這一指示做了修改，在修改時，每動一處，羅瑞卿都要打電話給葉群，再由葉請示林彪，林同意後才落筆。重要修改有以下三處：

一、在「軍事訓練、生產等可佔用一定時間，但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後面加上：「當然，這裏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亂衝擊一氣。」

二、在提出1965年任務時，羅瑞卿加了一句：「一定要發揚成績，克服缺點，氣可鼓，不可泄。」

三、在軍訓時間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實控制軍事訓練的時間」改為「一定要給軍事訓練必要的時間，但是，又要切實加以控制。」

經羅修改後，林彪的這一指示「左」的程度有所限制，羅完全是一番好意，也是真心實意維護林的威信。林彪當時同意了這些修改。

1965年5月2日，羅瑞卿赴上海向林彪匯報工作時，林彪拿出了毛選和黨章，在向羅宣讀了有關加強組織紀律性的章節後，對羅規定：「1、加強通氣，遵守組織原則；2、林在北京時，×日通氣一次；3、林不在北京時，×日通氣一次；4、重大問題，立即通氣；5、去林處，不要事先通知。」1964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曾拿着黨章和憲法，當面敲打劉少奇和鄧小平，林彪對羅瑞卿也如法炮製。

5月下旬，在軍委作戰會議上，與會人員建議由羅瑞卿作總結發言，這一信息登在會議簡報上。5月25日，林彪看到會議簡報後，發出指示：「作戰會議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會議多數人的意見和會議文件作為結論，不准任何個人以總結的名義講話。元帥、總長和副總長都可以發言，會議上不能散布個人做結論的空氣。如果散布了，要當眾宣布收回。在甚麼範圍散布的，就在甚麼範圍收回。六十三號簡

報，關於羅總長做總結發言的提法不對。明天要在各小組宣讀。」當天深夜，葉群將羅瑞卿召至她家中，在其女兒林豆豆的陪同下與羅談話，說林的「指示」已全部收回，又表示要調解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

在領教了林彪的幾次教訓後，羅瑞卿在處理同林彪的關係上更加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羅瑞卿的女兒點點寫道：

這以後的一段時間，父親的日子就更難過了。最難的就是甚麼時候，以甚麼方式去向林彪匯報工作。原來規定的五條好像很明確，但實際上完全是一團亂麻。你若事前不打電話，車子開到門口，就說身體不好，不見。事前打電話，就說，不是說了嗎？匯報用不着事前聯繫，要來就來。真的去了，又說，總是搞突然襲擊，沒有思想準備，搞得一個病人心驚肉跳滿身大汗。那麼下次就再打電話。又說打了電話頭天就睡不着覺，一晚上都失眠。匯報時間短了，就說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時間長了就說故意搞疲勞戰，想把人累死。1965年「八一」建軍節後，父親從北戴河給在大連的林彪打電話，要去匯報工作。林彪處回電話說：來吧。父親不敢怠慢，那天天氣很不好，大連方面大雨滂沱，但父親堅持起飛，冒着大雨趕到了林彪處，連汽車幾點幾分開到門口都是事先聯繫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見了父親。但事後硬說父親的汽車開到門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襲擊。總之，每次去匯報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實質內容發表甚麼實質性的意見，就是在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上糾纏不清，蠻不講理。⁴³

羅瑞卿在大連向林彪匯報以後，林彪即稱有病，要羅在兩個月內不要再來通氣。9月初，林彪轉移到蘇州，路過北京時，仍拒絕接見羅瑞卿。羅無奈，只好用書面向林通氣。在這期間，林彪、葉群已經開始在搜集羅的「罪證」。他們在一些人中間散布謠言，說羅瑞卿「有野心」，「有事不跟林彪商量」，「不向林彪請示」，「正在組織班子，又是提級又是提職」，要求「注意羅長子」，對他要「提高警惕」。

43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頁193—194。

最早向林彪報送整羅瑞卿材料的是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不久，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給林彪寫信，告羅瑞卿的狀。信中說：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從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對他(按：指羅瑞卿)產生了懷疑，感到他的一些做法不對頭，甚至他對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悅誠服，特別是你提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贊成的，實際上是帶頭抵制的，只是採取了兩面手法，搞了些偽裝。……直到今年7、8月，在參加寫〈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和修改羅總長9月3日講演稿時，我才大吃一驚，才發現他是一個居心叵測的人。他不僅驕傲懶散，根本瞧不起軍委常委的其他同志，而且對你有反感，竟然還想在文中造成和你並駕齊驅，甚至超過你的形勢。

林彪還要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等人寫一個「關於近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並且提出四個方面的問題，要求寫明在每個問題上羅瑞卿的表現。李作鵬於是和王宏坤(海軍副司令員)、張秀川合作，於11月27日寫了一份七千多字的材料，說羅瑞卿對海軍「懷有巨大的陰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材料的矛頭既對着羅瑞卿，也對着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和海軍政治委員蘇振華。

11月26日，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會見了柬埔寨首相朗諾。這是他最後一次見到他終生愛戴和追隨的毛澤東。羅瑞卿準備離開上海時，對毛說，他要到蘇州去看林彪。毛說：「去看看好，要他好好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作三個鐘頭的報告。」在蘇州，林彪不動聲色地接見了羅瑞卿，整個談話使羅瑞卿沒有感到林彪對他有甚麼不滿意和不高興，反而覺得這次和林彪的談話顯得比往日輕鬆些。

但此時林彪已經開始對羅瑞卿發難了。在林彪的授意下，中央軍委直屬機關於11月下旬開始批判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⁴⁴。在對蕭向榮的揭發批判中，有人提出羅瑞卿是蕭向榮的後台。

44 蕭向榮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廳主任、國防部辦公廳主任等職。1965年批判蕭向榮的詳情現尚不清楚。

11月30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信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在聯繫才知道的楊尚昆的情況（葉劍英講的），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在派葉群呈送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此致

敬禮

林彪

11月30日

當天，葉群攜帶了林的信和十一份揭發羅瑞卿的材料到杭州見毛澤東，向毛澤東做了六七個小時的匯報。

12月2日，毛澤東對林彪11月18日的來信及所附蘭州軍區的材料⁴⁵作了批覆，表示完全同意林彪的看法，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⁴⁶毛的這一批示明白無誤地表明，他已經在林彪和羅瑞卿之間選擇了林彪。他欣賞林彪對他的忠誠，他也需要借助於林彪的力量來實現他醞釀之中的宏偉計劃。對羅瑞卿，毛澤東也不會輕易相信林彪、葉群的那些揭發材料，但在進行了政治權衡之後，毛毅然放棄了羅瑞卿。另外，羅瑞卿長期從事公安保衛工作，和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一樣，了解大量中央高層各種機密，可能也是他們獲罪的原因之一。

45 1965年11月18日，林彪向毛澤東報送了中共蘭州軍區委員會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林彪在這個報告上寫道：「主席：從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戰爭爆發，其他部隊情況可能是與這個部隊近似。」中共蘭州軍區委員會的報告中匯報了五十五師在戰備和演習中貫徹林彪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較落實的方面和暴露出的主要問題。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487—488。

4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486。

2 上海會議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⁴⁷ 中央各有關部門負責人及解放軍高級將領共六十一人出席會議(其中高級將領三十四人)。會議開得突然而又神秘。事前，除毛澤東、林彪外，其他的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被擴大進來的與會者，都不知道會議的內容。⁴⁸ 與會人員被分批召到上海，到開會時才知道這是一個專門整羅瑞卿的會。林彪的信和呈送給毛澤東的十一份材料均作為會議文件印發。會議氣氛緊張，規定不准做記錄，會議文件連秘書都不能看。

毛澤東在會上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羅把林彪同志實際上當作敵人看待」，「羅是野心家」。毛澤東點名要葉群從蘇州趕到上海開會，並且點名要葉群發言。

葉群作了三次合計達十個小時的發言。她說：

羅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有事，損失太大。羅的個人主義已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的位置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又會要求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1964年後，羅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國慶節後，羅到家裏來見林彪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大好，沒聽完就讓他走了。他在走廊裏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甚麼事！病號不能干擾，讓賢！讓賢！」出門後又大聲喊：「不要擋路！」林彪同志氣的昏迷過去。我家裏的人從走廊上路過，聽到了羅講的這些話。

47 據李雪峰回憶：「會議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沒有參加。」參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595。實際上，整個會議是由毛澤東主持的(但他只出席常委會而沒有出席擴大會)。

48 有人說周恩來事先也知會議內容，但據王仲方在〈回憶羅瑞卿挨整前後〉一文中說：「(1965年)12月6日，謝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問他開甚麼會？他說清晨周總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開中央會議，至於討論甚麼問題，連周都不知道。」

她拿出最要害的「證據」是劉亞樓（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空軍司令員，1965年5月病逝）生前轉告她的「四條意見」，希望她轉告林彪。這四條意見是：

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出也要出，林總將來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

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甚麼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去管了；

四、一切交給羅去管，對羅多尊重，要放手讓他們去管。

葉群還說：「劉亞樓對我說，『你如果辦好了這些事，羅總長決不會虧待你的。』……這時林彪同志才說：『羅長子是個野心家！』」

對葉群的揭發，與會的大多數人都未敢輕信。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都出言謹慎。劉少奇會前聽了葉群的匯報，隨口說了一句「難以置信」。陸定一聽了葉群的發言後說：「這真是奇聞！」鄧小平在上海會議結束前說：「請軍隊與地方的負責同志來，不是來人作一個決議，而是審查夠不夠，對不對，有出入的都可以提。」談到羅瑞卿伸手要權問題時，鄧小平說：「林彪同志說有，羅瑞卿說沒有，劉亞樓已死，死無對證嘛。」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在私下說：「定羅瑞卿總長為反黨分子，我實在想不通，羅瑞卿會有甚麼問題呢？還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狀，說羅總長有意奪他的權。」⁴⁹

一些經林彪、葉群打了招呼的人，在會上對羅瑞卿進行了揭發和批判。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在發言中說，羅瑞卿對劉亞樓說的那四條意見，劉亞樓也對他說過。吳法憲的發言稿長達一萬多字。康生把葉群發言中對羅的揭發稱為「羅瑞卿對林彪的『三氣周瑜』」。

49 《王尚榮將軍》編寫組：《王尚榮將軍》（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523。另外，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也講過類似的話，見姜鋒等：《楊勇將軍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頁400—401。

上海會議召開之際，羅瑞卿正在雲南視察部隊工作。12月10日，羅瑞卿接中央電話通知去上海開會。11日，羅一到上海即被軟禁。周恩來、鄧小平代表中央與羅談話，向他說明了會議的一些情況及葉群對他的揭發。這對羅瑞卿來說，不啻為晴天霹靂，他感到痛苦和冤枉，當即要求去見毛和林，把問題說清楚。周恩來說：「你怎麼這樣天真，這樣幼稚？」明確告訴他既不能見毛，也不能見林。

上海會議是所謂「背靠背」地揭發批判羅瑞卿，並不給羅任何自我辯護的機會。但會議沒有對羅瑞卿的問題做結論。會後，周恩來、鄧小平再次找羅瑞卿談話，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話：「如果沒有這三條（按：指反對林彪、伸手、反對突出政治），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有甚麼就檢討甚麼。」

上海會議結束之際，林彪主持召集了一個軍委常委會議，罷免了羅瑞卿在軍隊的一切職務，同時也不讓賀龍繼續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了。

上海會議後，羅瑞卿請求辭去軍隊內的一切職務及與軍事有關的職務，如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並向縣以上黨委通報。隨後成立了一個「中央工作小組」，對羅進行審查。

林彪、葉群回京後繼續搜集整羅瑞卿的材料。他們為羅加了一個新的罪名，叫做「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證據是，在修改為林彪起草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時，羅反對林彪關於「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羅瑞卿曾組織高級幹部學習馬列主義三十本經典著作也作為他反對學習毛著的「罪證」。他們還從農場找到一個曾在羅身邊工作過的人，此人曾當過羅的公務員，因調戲保姆而被調離。他寫的材料說，羅每天要他請安，說羅全家的衣服都由他洗，把他的手都搓爛了，等等。

3 突出政治的升級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來，提出了一系列「左」的口號和名詞，包括「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運

動]⁵⁰等等，不但贏得了全軍內外許多人的讚譽，而且受到毛澤東的多次誇獎。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給林彪、賀龍、聶榮臻、羅瑞卿、蕭華的信中，肯定了「國家工業各個部門」，「從上至下（即從部到廠礦）都學解放軍，都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實行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的意見。毛說：「看來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幹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因而更便於工業部門採用和學習了。」⁵¹1964年，毛澤東曾說過：「希望林彪多活二十年，因為林彪有馬列主義。」1965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接見部隊系統兩個會議代表時說：「四個第一好，我們以前也未想到甚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現。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毛澤東對林彪和他的「創造」的賞識，溢於言表。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曾談到：在那一段時間裏，中央領導同志，除林彪外，都先後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兩相比較，差別是很大的。

1963年以後，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開展學習人民解放軍的活動，把林彪在軍隊建設中推行的「左」傾的那一套東西變成全國城鄉、各條戰線普遍學習的榜樣，造成的影響則更為廣泛、深遠。

1965年11月18日，林彪對1966年全軍工作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

第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

50 「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風」即：毛澤東在延安時提出的三句話、八個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四好連隊運動」的「四好」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454—455。

第二、堅持四個第一，特別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領導幹部要深入基層，狠抓四好連隊運動，切實搞好基層，同時要切實搞好幹部的領導作風。

第四、大膽地提拔真正優秀的指戰員到關鍵性的負責崗位上。

第五、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

這五條並非一無是處，但它的核心是「突出政治」。林彪說：「突出政治不是一項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這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違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這些言論，超出了關於軍隊建設問題的範圍，實際上是提出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11月20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五項原則」。⁵²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央軍委11月25日作出決定：「把這五項原則作為1966年全軍工作的方針，望全軍遵照執行。」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全面貫徹林彪關於「突出政治」的意見。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在會議上的報告說：「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階級鬥爭的問題，就是堅持革命還是不堅持革命的問題，就是關係到我們社會前進還是倒退的問題。」毛澤東批准了這個文件，以中共中央文件發出。

《解放軍報》從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陸續發表七篇鼓吹「突出政治」的社論，這七篇社論的題目分別是：〈永遠突出政治〉、〈提倡一個「公」字——再論突出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戰備——三論突出政治〉、〈政治統帥軍事、政治統帥一切——四論突出政治〉、〈把毛主席的書當作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五論突出政治〉、〈提倡唯物論，抓好活思想——六論突出政治〉、〈關鍵在於黨委的領導——七論突出政治〉。這七篇社論根據林彪的意圖，突出階級鬥爭，突出「反修

5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頁480。

防修」，突出個人崇拜，突出社會主義建設上的「左」傾主張，否定「政治和經濟的統一」的正確原則。

《人民日報》緊跟《解放軍報》，於1966年4月6日、14日、22日，也發表了三篇論突出政治的社論。這三篇社論總的來說也都有「左」傾錯誤，但在其中4月14日的社論〈政治統帥業務——二論突出政治〉中指出：「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密切結合。這是因為，如果政治不落實到業務上，不同業務相結合，那麼，政治就會落空，政治目的就不能實現。」這樣的大實話，也是符合毛澤東說過的「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可是這時卻成為大逆不道的「謬論」。5月17日，《解放軍報》在編者按中反駁道：「能不能單純強調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呢？不能！甚麼『政治必須通過業務來實現』呀，甚麼『沒有無業務的政治』呀，甚麼『突出政治歸根到底是為了搞好業務』呀，等等說法，統統是謬論。」《解放軍報》與《人民日報》公開唱對台戲，軍報公開批判黨報，引人注目。⁵³

突出政治的旋風愈颯愈猛烈，從軍隊到地方，從北京到邊疆，林彪所提倡的「突出政治」迅速被人們所接受，所使用，並且還有所發展。

196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南局、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關於加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三個文件。其中，中南局於1966年1月16日作出的〈關於深入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決定〉中說：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是戰勝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實現世界革命，最後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旗幟。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是時代對我們的要求。毛主席的話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幹一輩子革命，讀一輩子毛主席的書，終生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是所有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的天職。

53 1966年4月初，《人民日報》送審有關突出政治社論時，康生指示：以後《人民日報》的社論，要送《解放軍報》總編輯唐平铸審閱修改，以免出錯。參見余煥椿：〈「文革」前夕的《人民日報》〉，《百年潮》，2004年第5期，頁4—12。

中共北京市委於1966年1月13日作出的〈關於1966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安排的通知〉中提出，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以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作為一切工作的綱」。中共上海市委1966年1月6日〈關於加強幹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領導的決定〉中說：「毛主席的書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廣大幹部和群眾，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各級黨組織的根本任務，也是各級領導的首要責任。」上海市委還特別提出，要「聯繫當前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如批判《海瑞罷官》）進行學習」。

學習毛澤東著作被作為一場運動來搞，有些地方採取了辦脫產學習班輪訓幹部的辦法，有的地方在工作時間中規定出專門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時間。如上海市委規定：市、區、縣機關幹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時至9時，學習一個小時毛主席著作，星期六上午學習四個小時。

全國各地區都不願在這場運動中落後，紛紛召開會議，作出決定，並向中央作出報告。中共中央辦公廳後來又陸續轉發了中共甘肅省委〈關於縣以上領導幹部必須認真學好毛主席著作的決定〉、中共湖南省委〈關於貫徹執行中南局《關於深入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決定》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關於領導幹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情況報告〉、〈中共中央華東局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會議討論紀要〉、中共中央華北局〈關於進一步加強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領導的決定〉、中共浙江省委〈關於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決定〉。這些文件都毫無例外地採用了林彪關於突出政治、關於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說法。許多地區都開展了關於政治與業務關係問題的討論，這種討論「實際上是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大動員」⁵⁴。中共中央華北局〈關於進一步加強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領導的決定〉中說：

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過程中，圍繞着政治和業務的關係問題，一場群眾性的大鳴大放、大辯論，看來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各級幹

54 中共甘肅省委：〈關於縣以上領導幹部必須認真學好毛主席著作的決定〉（1966年2月10日）。

部中展開大辯論是完全必要的。辯論的內容，必然充滿着無產階級思想對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嚴肅批判，辯論的結果，必將增強人們對於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和實踐的高度自覺性，進一步認識到一切工作必須以政治為統帥，以毛澤東思想為統帥。……通過大辯論，我們要大興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要大立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大破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思想，特別是要使每個人都能夠樹立起明確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思想，認識到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學說，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重大發展。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不只是長期的、複雜的、曲折的，而且是貫穿各方面的。

在中央轉發的文件中，把一些不同意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的人，以及批評搞個人崇拜的人說成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抱有敵對立場，對毛澤東思想抱有敵視情緒，是我們幹部隊伍中的修正主義分子，有的可能是混進來的四類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⁵⁵。

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編輯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說：「目前，全國廣大幹部和工農兵群眾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熱潮空前高漲」，「編輯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解放以後，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著作，已經成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為此，中央決定立即着手把毛澤東同志1958年以來的文章、講話和其他手稿逐篇整理出來，先作為黨內文件印發給黨員幹部閱讀，並成立由康生、陳伯達、胡喬木、蕭華、王任重、吳冷西、姚溱、王力、胡繩、田家英、許立群、范若愚等人組成的整理小組具體負責這項工作。整理小組還負責將1960年編出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49—1957年）初稿進行進一步的整理。

在全國各種宣傳媒體上充斥了謳歌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毛澤東的話為「最高指示」，「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內容。一些反對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和對學習毛澤東著作中的形式主義有所批評的人遭到

55 中共中央中南局：〈關於在幹部中深入討論中南局第十次委員會議決定的指示〉（1966年3月17日）。

了批判，突出政治的言論甚囂塵上。《毛主席語錄》開始大量印刷和發行，在任何場合、任何情況下都引用《毛主席語錄》成為時髦的風氣。全黨、全軍、全民都在不同程度地大搞形式主義、實用主義、教條主義。割裂原文、斷章取義、曲解本義，自此成為屢見不鮮的極為普遍的惡習。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造成的最大的危害在於，以毛澤東個人的是非為全黨全民的是非，毛澤東的話成為統治一切的「最高指示」。這自然極有利於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4 三月京西賓館會議

作為上海會議的繼續，經毛澤東同意，1966年3月4日在北京召開了討論羅瑞卿問題的會議(簡稱三月京西賓館會議)，軍隊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以及公安系統的四十二名負責幹部出席了會議。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主持會議。⁵⁶

會議由「背靠背」改為「面對面」，羅瑞卿到會接受批判。令羅瑞卿想不到的是，許多過去關係密切的戰友和同志頃刻間成為路人和仇敵。他們或是自願或是被迫，都同羅瑞卿劃清了界線。對羅的批判比上海會議又大為升級。發言者給羅瑞卿扣上了許多大帽子，如「陰謀家」、「野心家」、「假黨員」、「偽君子」、「農奴主」、「定時炸彈」、「帝、修、反的代理人」等等。除了說羅瑞卿反林彪、伸手、反對突出政治外，又給他加上反毛澤東、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這是羅瑞卿絕對不能接受的。上海會議期間，周恩來、鄧小平曾向他傳達過毛澤東的話，毛澤東在會前對林彪說過：「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他反對我游泳，那也是好意。」羅在會上作了申訴。他說：關於伸手，「就我所知道的，這次揭發的是兩件材料，一件是說我反林副主席，說老病的要讓賢。我說過沒有？如果說過，是在甚麼時候，甚麼情況下，指甚麼說的？我完全記不得了。不過，可以保證，我決沒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讓賢之意，我沒有這樣壞，這樣狂妄，這樣

⁵⁶ 鄧小平只在會議開始時出席了一次會議後即赴三線考察，再未與會。

愚蠢呀！一件是劉亞樓說了四條。這個我完全不知道，是這次我才聽說」。

3月12日，羅瑞卿為了過關，在會上作了檢查，承認自己反對突出政治，不尊重幾位老師、驕傲自滿，等等。但他否認對他所謂「野心家」之類的指控，他說：「至於野心家、陰謀家，要篡軍、篡黨、篡國，同志們這樣說是有理由的，但請黨嚴格審查。我堅決相信毛主席和黨中央會做出公正結論的。」這又招來了更猛烈的批判，當即就有十九人作了反駁性發言。

3月12日至16日，相繼有三十五人發言。這些發言比此前更為嚴厲，有許多是誇大其詞，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對羅瑞卿進行人身攻擊，將羅說成是反黨、反毛澤東的野心家、陰謀家，他的問題已上升為敵我矛盾，京西賓館會議開成了批鬥會。

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擴大會議範圍，要求中央、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大區中央局及一些軍區、兵種、學院派人參加。會議人數由四十二人增至九十五人。

3月18日，有口難辯、萬念俱灰的羅瑞卿在給妻子郝治平寫下一封遺書⁵⁷後，從自家的三樓平台縱身跳下，自殺未遂，摔斷了左腿⁵⁸。羅瑞卿摔傷後，立即被送進醫院，住院達九個月。羅的自殺招來更嚴厲的批判，他的問題隨之升級，被稱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京西賓館會議在更大的範圍內接着開下去，只不過開會的形式從「面對面」又改回到「背靠背」。

作為會議領導小組成員的彭真，不同意對羅瑞卿的問題進行無限上綱，他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對羅進行了一些保護。當時，他自己

57 羅瑞卿在遺書中寫道：「治平：會議的事沒告訴你，為了要遵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58 正在杭州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毛澤東聽到羅跳樓的消息後說了一句：「真沒出息！」參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下冊，頁599。葉劍英則吟詩一首：「將軍一跳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這是套用辛棄疾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為「一跳」。

因為《海瑞罷官》問題已經遭致毛澤東的嚴重不滿，自身處於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仍能對羅瑞卿的問題仗義執言，堪稱難能可貴。⁵⁹

彭真要求與會人員，只講站住腳的材料，凡是站不住腳的，無把握的材料，都不要講。他說，決不使人感到講過頭了，有一條是一條，是三分不講成十分。

彭真試圖抑制會議表現出來的過激情緒，他指出：現在憤慨的人，將來冷靜下來後會後悔的。人在火頭上的時候和冷靜下來的時候不一樣。他在討論工作小組就羅瑞卿問題向中央寫報告時，尖銳地提出質疑：「這些結論，合乎不合乎事實，事實的根據夠不夠？」此後不久，彭真也遭到批判，他的以上表現，成為他的「罪狀」之一。

京西賓館會議於4月8日結束。4月12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致信毛澤東：「關於羅瑞卿同志的問題，4月8日已經結束小組會議，工作小組起草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徵求了會議各同志的意見，沒有採取會議通過的方式。現將這個報告和中央批語草稿送上，請你看看是否可以。我們已在會議上宣布，這個報告須經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審閱後定稿。」

4月24日，葉劍英、龔華、楊成武、劉志堅四人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央報告，揭發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

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組向中央寫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定稿，上送中央。〈報告〉中為羅瑞卿列舉的罪名有五條：第一，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報告〉中寫道：

羅瑞卿同志極端敵視毛澤東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羅瑞卿同志卻胡說：這「不符合我們國家的體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

59 據彭真的兒子傅洋回憶：「1965年底羅瑞卿同志挨整。開始是父親負責他的專案。有的專案人員跑去調查，過去誰去過羅家，誰和羅通過電話等等。父親知道後堅持予以制止。他後來多次說：我當時發了火。康生在蘇聯學了『格伯烏』即後來『克格勃』的那一套，在延安就那麼搞。聽窗戶根兒，沒有意思。我們絕不能那麼幹。在黨內搞偵查，弄得人人自危，離心離德。」參見傅洋：〈父親彭真〉，《美洲文匯周刊》，第180期。

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羅瑞卿同志卻胡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的嗎？最活，難道還有次活的嗎？」「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羅瑞卿同志卻胡說：「這句話也不要這樣說，對外國人影響不好。」羅瑞卿同志還不准說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包含有「個人天才」的因素，說甚麼「現在沒人敢用個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羅瑞卿同志卻反對向外國宣傳和介紹這四句話。林彪同志指示《解放軍報》要經常刊載毛主席語錄，羅瑞卿同志卻嫌搞多了。

第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澤東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第三，目無組織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第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報告〉稱羅是「妄圖奪取兵權，達到他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打着紅旗造反」的「埋在我們黨內軍內的『定時炸彈』」。⁶⁰

四 批「文藝黑線」

1966年2月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其會議紀要⁶¹，提出了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使原本在意識形態領域已經相當嚴重的「左」傾

60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1966年5月1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1 詳情參見劉志堅：〈《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1-44；葛恆軍：〈1966年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其會議紀要考析〉，載《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頁1936-1943。

錯誤進一步發展，為全盤否定建國後十七年的文藝工作，進而否定中央第一線領導人提供了理論依據。

1 「文藝哨兵」

毛澤東在1973年12月21日曾作自我批評，說他聽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辭，錯整了羅瑞卿。⁶²這不過是掩飾之詞。以毛澤東的智商，不可能相信林彪、葉群對羅瑞卿的那些離奇指責。毛之所以同意整羅瑞卿，是他在下定決心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林彪的堅決支持的情況下做出的政治抉擇。他的這個抉擇很快就得到了回報。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和總政宣傳部長李曼村、文化部長謝鏜忠、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參加了座談會。去上海之前，林彪對參加座談會的幾個人作了如下的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甚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名曰座談，其實是江青個人談她對一大批中外文藝作品和文藝界形勢的看法。據劉志堅說，「整個座談會的準備和開會都是由江青一人決定，從不徵求總政的意見，也不同參加座談的同志商量。」座談會期間，江青先後同劉志堅個別談話八次，集體座談四次，集體看電影

62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90.12)》，頁307。

十三次，看戲三次，江青指定看電影二十一部。江青還看了《南海長城》的樣片，同導演、攝影及一部分演員談話三次。

江青故作神秘，宣布「不准記錄，不准張揚，特別不准讓北京知道」，還問在場的人是否帶了竊聽器。因此，除陳亞丁有個簡單的追記和以後根據追記整理了一個〈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談話紀要〉之外，沒有其他的文字記錄。

根據劉志堅、李曼村後來的回憶和陳亞丁的交代材料以及他當時的「追記」和整理的〈紀要〉，我們可以了解江青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

江青說：「這幾年主席讓我當『文藝哨兵』」。介紹她如何親自作調查研究，不僅買票看戲，還戴着大口罩，坐在後排，去吉祥戲院最多，「所看的戲全是亂七八糟」，於是她「發現牛鬼蛇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我們的舞台」，「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到處是牛鬼蛇神，一場糊塗」；說她把這些情況報告了主席，「主席才有了兩個批示」。江青還說：「我對我們文藝工作的現狀很不滿意，想找部隊方面來幾位同志談談，我報告了主席，主席說，你在軍隊中沒有職務，要找部隊的同志談問題，最好先通過林彪同志。」「春節期間去蘇州向林總談了我的意見，我要請尊神，請解放軍這個尊神支持我。林總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同意我找你們幾位談一談。我不敢隨便找呀，我是得到林總批准才找你們的。」

江青的這些話裏當然有吹噓自己的成分，但也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她這個「文藝哨兵」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在執行毛澤東所交給的任務。江青原來並沒有想通過林彪，是毛澤東讓她去找林彪的。至於是她去文藝界後才發現了「很多問題」，還是毛澤東發現文藝界有「很多問題」才派她去，則需要進一步研究。筆者更傾向於是後者。

江青說：

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子，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着舞台，毛主席多次批評，他們就是不聽，我的意見就更沒有人聽了，……為甚麼會這樣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這是在文藝

方面，有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文藝黑線專了我們十七年的政，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一定要搞掉這條黑線。在這場鬥爭中，解放軍要起帶頭作用。

江青的這段話，為整個座談會定下了基調，後來的〈紀要〉也是按這個基調寫的。陳亞丁回憶，座談會期間，張春橋也對他說過這樣的話：「這個問題（按：指「文藝黑線專政」問題）我和江青醞釀很久了，搞了許多調查，但一直找不到一個時機來解決，現在時機成熟了，是應該解決的時候了。」有人據此得出結論說：江青、張春橋是「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最初炮製者。此話雖無大錯，但還是不夠準確。要炮製一個能將整個中國搞得天翻地覆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江、張的資格還稍嫌不夠。

江青的談話無所顧忌，誰都敢罵，對周恩來她也敢公然指責：

前年根據主席的指示，我開了一次音樂座談會。在會上，我提出了……樂隊要中西合璧，有人說這是非驢非馬。是個騾子也好嘛！這次會是毛主席贊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鎖起來，不向下傳達。周總理另外又開了民族音樂座談會，又講了要先分後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純粹的民族樂隊，不許混雜。這是錯誤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應該作檢討的。

江青指責北京市委不支持文藝改革，不給她好劇團、好演員，專了她的政。說他們「連主席的話都不聽」。還指責周揚、林默涵、夏衍等文藝界的領導人，她說：「文藝界基本上不聽主席的，聽周揚、林默涵、夏衍這些人的。」說這些人「有的原來就是特務，有的叛變了，有的爛掉了，有的掉隊了」。「夏衍這班傢伙主張『離經叛道』，我認為他們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戰爭之道，完全是反對毛主席的。」

在座談會期間，江青指責和否定了一大批電影和文學作品，對周恩來親自抓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也進行了批評。對八一電影

製片廠拍攝的電影，她只肯定了半部《海鷹》，說這部影片的上半部「是我們的」。江青批評建國以來的大量文藝作品，有的是不寫正確路線，專寫錯誤路線的；有的是美化敵人，歌頌叛徒的；有的是醜化勞動人民和軍隊的；有的是頌揚戰爭苦難；有的是宣傳和平主義；有的是寫談情說愛，低級趣味；有的不寫英雄人物，專寫中間人物；有的寫英雄人物，寫一個死一個；有的是為活着的人樹碑立傳，等等。

2 〈紀要〉的產生

座談會結束時，劉志堅與謝、李、陳等商議，需要搞一個提綱性的材料，以便回去向黨委匯報和傳達。於是他們根據江青多次談話的精神和每次談話後的追記，逐段逐句討論，由隨行的《星火燎原》編輯黎明記錄，陳亞丁修改，於2月20日晚整理成約三千字的題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匯報提綱。

這份〈紀要〉的初稿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寫座談會概況。先寫了林彪吹捧江青的話，還有蕭華（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成武（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關於這次座談的指示。⁶³在這一部分的結尾寫了這樣一段話：「江青同志對主席思想領會很深，又作了長時間的、充分的調查研究，親自種試驗田，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次她帶病工作，熱情、誠懇地幫助我們，給我們很大啓發、教育和鼓舞。大家一致認為等於進了一次短期訓練班。」

第二部分寫的是對江青「許多極為重要的意見」的「領會」。把江青幾次講話的精神基本上都概括在其中了。

63 〈紀要〉初稿中寫道：「我們來的頭一天，蕭華同志亦特別囑咐我們說：江青同志同主席一起生活、工作、學習幾十年，她的意見具體體現着主席的思想，你們應當虛心聽取她的意見，多聽取她的意見，並要認真貫徹執行。座談會期間，楊代總長路過上海，也對我們說：江青同志在政治上、藝術上都很強，她怎麼指示，我們就怎麼辦，堅決執行。江青同志抓部隊文藝工作，機會是難得的。以後要隨叫隨到，召之即來。」

第三部分是關於部隊文藝工作的今後措施。其中寫道：「我們認為江青同志這些意見都是非常正確的，符合軍隊情況。同時是對我們部隊的信任、鼓舞和鞭策。我們一定要認真學好主席思想，深入生活，鼓足幹勁，在這一場興無滅資的文化革命鬥爭中起好帶頭作用。為了使這些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工作上落實，我們準備採取以下措施。」措施有八條，即：預定4月份召開全軍創作會議；組織三大戰役創作隊伍；拍好《南海長城》；清理電影、戲劇和作品；整頓八一電影製片廠；文藝作品的審查要走群眾路線；組織文藝評論班子；總政黨委加強對文藝工作的領導。

江青看到這個〈紀要〉後，感到很不滿意。她讓秘書打電話給劉志堅，說這個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給她闖了大禍」。還說「她本來打算議一議就算了，沒有想到要搞個甚麼文字的東西。你們既然搞了，那就要搞好，搞準確，搞完整，現在的這個不行，不要傳達，不要下發」。江青要求劉志堅派人去上海，她幫助修改。她還說，她已告訴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來參加修改。

2月26日至28日，陳伯達、江青、張春橋、陳亞丁一起在上海對〈紀要〉稿進行修改。

陳伯達提出兩條意見，一是要把三十年代寫上。他說：「要講清楚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黨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繼續」，「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才能更好地認清解放後十七年的文藝黑線，這條黑線是從那個時期就開始了」。二是「要講一段文藝方面的成績」，「江青親自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紅色娘子軍》芭蕾舞、交響音樂《沙家浜》等，這些，真正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東西」，「這些都要寫一下，這樣，破甚麼立甚麼就清楚了」。陳的這兩條受到江青的稱讚，說「老夫子真厲害，一下子抓住了要害」。

幾經改動，〈紀要〉擴充至5500多字，加進了許多座談時沒有談過的東西。但整個結構未作變動，題目也未變。

陳亞丁於3月1日攜經江青認可的修改稿返回北京，向劉志堅等匯

報了修改經過，劉等都認為改得好，說寫了三十年代文藝問題，對文藝黑線的認識更清楚了，並決定按照修改稿向下傳達。

江青在未徵求劉志堅等意見的情況下，把修改稿鉛印了送毛澤東審閱。毛「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⁶⁴。

毛澤東在審閱時，修改共十一處。毛將原標題加上了「林彪同志委託」六個字，這一加，將座談會的首倡者由一個「哨兵」變為「副帥」，大大地加重了座談會的份量。毛還加寫了一些段落，如：在「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之後，加了「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策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⁶⁵

毛澤東在修改中，將一些過分吹捧自己的話刪去或進行改寫，如將「(毛的幾篇著作) 夠我們無產階級用幾百年了」一句，改為「夠我們無產階級用上一個長時期了」；在「毛澤東思想」一詞前，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幾個字；將〈紀要〉中講到近三年來出現了許多「歌頌我們偉大的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的文藝作品」，改為「歌頌我們偉大的黨、黨的領袖和其他同志們英明領導的文藝作品」。

毛澤東在修改後，又指示「請伯達同志參加，再作充實和修改」。

此後，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又對稿子進行了充實和修改。後又將劉志堅、陳亞丁召至上海，參加修改，至14日修改完畢。這次修改補充的內容較多，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

64 江青1966年3月19日給林彪的信。轉引自劉志堅：〈《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輯，頁25。

65 據周揚回憶，有一次他去和毛澤東談到文化工作，說這方面問題很多。毛說：「也怪我沒有抓。」周說毛主席抓得很多了，主要是我們工作沒有做好。毛說：「我只是抓了一件一件的事，沒有全面抓。」最後又說：「我要抓！」「寧可搞錯了再糾正。」不久，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就出來了。參見龔育之：〈幾番風雨憶周揚〉，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248。

江青把第二次修改後的稿子再送毛澤東審閱。毛又作了十來處小的修改，如刪去「大家一致認為等於進了一次短期訓練班」一句；把「文化革命解放軍要起帶頭作用」改為「文化革命解放軍要起重要作用」；把一處「毛主席」改為「黨中央」；刪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一句；在〈紀要〉最後加上「以上整個座談記錄所說內容，僅供領導同志們參考」一句；等等。3月17日，毛澤東對〈紀要〉修改稿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

江青拿到毛澤東的批示後，又把劉、李、謝、陳四人召到上海，和張春橋一起討論〈紀要〉定稿問題。劉志堅提出「重新組織文藝隊伍」的提法，涉及到對整個文藝隊伍的估計，起碼部隊文藝工作方向是對的，隊伍也是好的，建議把「組織」二字改成「整頓」。江青不同意，說毛主席已經同意，不能改了。

3月19日，江青致信林彪，請他審批〈紀要〉。林彪鄭重其事地給軍委幾位副主席寫信，高度評價了〈紀要〉。信的全文如下：

賀龍、茶臻、陳毅、伯承、向前、劍英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

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中央審批。

此致

敬禮！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⁶⁶

林彪信中寫明，要「報中央審批」。這就意味着〈紀要〉將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發向全國。

3 〈紀要〉的批發

3月30日，在幾位軍委副主席都對〈紀要〉劃了圈後，劉志堅便主持起草了以軍委名義向中央和毛澤東的請示信。當日，即將請示信、〈紀要〉和江青3月19日給林彪的信、林彪給軍委幾位副主席的信，一起上報中央。因當時總書記鄧小平到三線視察未在北京，於是便報給了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第二天，彭真辦公室通知，要總政替中央起草一個轉發〈紀要〉的批語。劉志堅找來李、謝、陳一起商量起草了一個批語，立即送彭真。批語文字簡潔，對座談會的評價相當高。批語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抓住了當前文藝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紀要對文藝戰線上階級鬥爭形勢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則、方針、政策，不僅適合於軍隊，也適合於地方，適合於整個文藝戰線。各級黨委應當聯繫本地區、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研究，貫徹執行。⁶⁷

66 林彪給中央軍委常委的信（1966年3月2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7 劉志堅：〈〈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輯，頁34。

彭真收到批語後，於4月1日分送毛、朱、周、鄧等中央領導人(當時劉少奇出訪，未在國內)核閱，同時另送陳伯達和康生。毛澤東於當日批示：「已閱，同意，退彭真同志。」

劉志堅等人將批語送出後，又感到批語太一般化，於4月3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個批語，「增加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重視文化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毛澤東文藝思想是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內容。新的批語於4月4日送給彭真，被他壓下沒有採用。」⁶⁸

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66)211號文件，將〈紀要〉批轉下達到縣團級黨委。

4月16日，周恩來赴杭州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路經上海時，找到當時在上海的劉志堅和陳亞丁。周恩來拿着4月10日中央批轉〈紀要〉的文件對他們說：「這個批語是請你們代中央起草的吧，我們覺得對紀要的評價講得還不夠，需要重寫。你們不要怕是自己參加了的，不好講，這是中央的批語嘛。」隨後，周親自口授了修改的幾個要點。周指示批語改好後送江青看看，待杭州會議開完後回來時交給他。劉志堅、陳亞丁遵囑將重新寫的批語送江青看，江看後又找張春橋、劉志堅、陳亞丁研究了一次，未作甚麼修改。4月30日，周恩來返京途經上海時，劉志堅將新的批語交周。

5月2日，中央辦公廳以中發(66)254號文件發出〈關於收回第211號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說：「中央批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批語上中央有新的補充，現將已經印發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級黨委(黨組)辦公廳(室)負責，如數收齊，退回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新的文件將於5月10日前發出。」

隨後，中央發出了有新批語的文件。奇怪的是，新批語並未用新的文號，還是以中發(66)211號文件發出，批語落款時間還是4月10日。

68 劉志堅：《風雨征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頁240。

新批語文字擴充了近三倍，在對座談會作出更高評價的同時，特別強調指出〈紀要〉「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新批語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文學藝術領域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的一條極其重要的戰線。在我國，堅持還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區別社會主義文藝還是資本主義文藝的分水嶺。社會主義的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服務。修正主義的文藝，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文藝，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地富反壞右服務，為復辟資本主義準備精神條件。這是一場很尖銳的階級鬥爭。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文藝戰線的階級鬥爭。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評劇院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是我國和各國革命思想運動的歷史經驗的最新總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和文藝理論的新發展，為我們的文藝工作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全國解放以後，文藝戰線上的多次重大鬥爭，和近三年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但是，中央有關部門和絕大多數黨委，對文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卻一直認識很不夠，抓得很不夠，沒有認真地貫徹執行毛澤東文藝思想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這種嚴重的情況必須迅速地切實地加以改變。

這次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座談會。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的座談會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階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很

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這個文件。它不僅適合於軍隊，也適合於地方，適合於整個文藝戰線。各級黨委應當聯繫本地區、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討論，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此件軍隊發至團黨委，地方發至縣委和文化機關黨委，傳達範圍，由各級黨委酌情決定，文藝工作者可以適當放寬。

中共中央

1966年4月10日⁶⁹

4 〈紀要〉的推行

4月8日至6月11日，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全軍創作工作會議」。會上，仿照江青在上海的辦法，「看電影，找黑線」，對《抓壯丁》、《兵臨城下》、《紅日》、《逆風千里》、《怒潮》等六十四部影片進行了批判，給這些影片扣上了「美化階級敵人」、「渲染戰爭苦難」、「專寫錯誤路線」等帽子。會議期間，對懷疑和抵制〈紀要〉，或僅是提出某些不同意見和疑問的人，進行了批判。⁷⁰在大會上，重點批判了六個人，在中、小會上對其他五十六人進行了批判。這次會議，成了在全黨、全軍、全國推行「文藝黑線專政」論，迫害文藝工作者的突破口。會議以後，軍隊各大單位均按照這次會議的規定，相繼召開了類似的會議，批判和鬥爭了一大批文藝工作者，使更多的人受到了打擊迫害，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軍隊的文藝工作者成了〈紀要〉的第一批受害者，也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最早的一批受害者。

69 劉志堅：〈《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輯，頁36—37。

70 全軍創作工作會議期間，陳其通、所雲平、馮毅夫等人在聽了〈紀要〉傳達後提出了許多問題，發表了一些感慨：這麼重要的會，為甚麼不由中宣部召開，而由江青個人召開？江青既不是中央領導同志，在軍隊中又沒有職務，為甚麼她來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學習〈紀要〉，感到十條路堵死了九條，只剩下一條獨木橋。5月16日，會議辦公室以不編號不下發的簡報上報林彪，林彪批示：「這是反毛主席的，要組織反擊。」根據林彪的批示，會議組織批判了有關人員，這些人後來在文革中都遭受迫害。

〈紀要〉正式發出後，《解放軍報》當時的負責人唐平鑄、胡痴就提議把〈紀要〉改寫成社論發表。劉志堅批准了這一建議，並指定陳亞丁負責起草。社論寫好後，經劉志堅審改，蕭華審閱批准，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為題，於4月18日作為《解放軍報》社論發表。這篇社論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文藝黑線專政」，但是講了十七年來文藝界「存在着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社論相當全面地反映了〈紀要〉的精神，若干重要的語句直接抄自〈紀要〉。4月1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全文轉載了這篇社論。《紅旗》雜誌第四期也作了轉載。

〈紀要〉反映了毛澤東對文化領域階級鬥爭過分嚴重的估計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紀要〉的產生，是在前幾年不斷開展文藝批判的基礎上，在毛澤東親自把握下，借助於林彪、借助於解放軍總政治部，由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人完成的。〈紀要〉極力抹煞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成績，武斷地判定文藝界在建國以來，基本上沒有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紀要〉全盤否定三十年代以來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進步文藝運動，聲稱有一條「文藝黑線」，從三十年代一直貫徹到建國以後，說：「當時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絕大多數還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主義者。」在這些論斷的基礎上，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而且強調「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紀要〉為即將到來的文化大革命做了重要的輿論準備。

〈紀要〉的出現，是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順理成章的結果。在它的產生過程中，沒有遇到任何真正的抵制和反對。它是毛澤東親自把握的一個項目。1966年初，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正迅速地在全國蔓延。任何人都必須對毛澤東必恭必敬，從中共中央副主席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從思想上來說，彭真是不會同意這個〈紀要〉的，如果他能認同這個〈紀要〉的內容，就不會有〈二月提綱〉了。但

是，在〈紀要〉以軍委名義報到他那裏時，他沒有說半個不字。〈紀要〉傳到幾位軍委副主席處時，他們無一例外地劃圈表示同意。他們知道這個〈紀要〉已經毛澤東親自數次修改，焉能再說三道四？朱德、鄧小平未表示異議。周恩來則表現了很大的熱情；這可以從他親自出馬主持改寫中央批語得到證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被〈紀要〉的炮製者們視為批判對象的人，也能夠接受〈紀要〉。1966年4月7日，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在全國創作會議上作報告，即「搶先」宣傳介紹了〈紀要〉中的部分觀點。⁷¹

在談到〈紀要〉時，許多人都稱這是林、江勾結的結果，這幾乎已經成為定論。⁷²實際上，當時江青的步入政壇，僅僅是剛開始，林彪雖然近年來聲譽日隆，毛澤東「接班人」的形象呼之欲出，但也還沒有正式出山，說是他們勾結的結果，非常勉強。江青不過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還遠未形成自己的勢力。無視起決定作用的毛澤東的存在，只提江青、林彪，迴避毛澤東，雖然出於一些人維護毛澤東的良苦用心，但卻是違反歷史真實的，因而也只能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五 批〈二月提綱〉

與批《海瑞罷官》、批羅瑞卿、批「文藝黑線」相比，批〈二月提綱〉對中國政局所引起的震動要巨大和深遠得多。批〈二月提綱〉，是以彭

71 《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中稱：林默涵「在全國創作會議上作報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前，全面地剽竊了〈紀要〉的內容，並且作了嚴重的歪曲，為所謂三十年代的錯誤的文藝路線辯護」。參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1。

7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90.12)》中寫道：「這個〈紀要〉的炮製，標誌着林彪和江青勾結起來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開始。」(頁275)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說：「這個〈紀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結的開始。」(頁487)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中說：「制定〈紀要〉的經過，透露了林彪同江青互相勾結，進行篡黨奪權的野心。」(頁80)

真為靶子，但實際上矛頭指向的是中央第一線領導集體。在批〈二月提綱〉的過程中，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論逐步形成。

1 五人小組

1964年7月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在決定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的同時，決定成立一個五人小組來領導這一工作。小組的成員有：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和吳冷西。毛原來要陸定一當組長，陸推辭，遂定彭真為組長。彭真在7月7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成立五人小組的意見。當時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負責領導各有關方面，貫徹執行中央和主席關於文化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指示。」五人小組後來又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根據現有的材料看，這個小組從成立到解散並未做出多少具體事情，直到1966年1月，只開過兩三次會。

小組成員中的康生作用特殊，他是中央理論小組的組長，從1964年到1966年全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諸多批判，大都與他有關。1964年7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由康生親自修改定稿的文章〈就「合二而一」問題和楊獻珍同志商榷〉。該文把楊獻珍關於「合二而一」的含義歪曲定調為「階級調和論」，並為從政治上羅織楊獻珍的罪名提供了依據。⁷³ 當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高級黨校的報告，撤銷了楊獻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黨委副書記的職務。1964年8月14日，根據康生的要求，中宣部向中央書記處報送了〈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毛澤東閱後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

73 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的吧！」毛澤東的說法也是受到康生的影響。當年6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根據康生的意見撰寫、署名「項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一文，文章說：「『一分為二』同『合二而一』是對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調和矛盾」。康生通過江青把文章送給毛看，毛表示贊同。參見楊勝群、田松年：〈「文革」前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批判運動真相〉，載《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頁1886。

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別的，都需要批判。」⁷⁴此後，大批電影、戲劇、文學作品被當作毒草加以批判。還有對於經濟學家孫冶方的批判和對哲學家馮定的批判，也都與康生密不可分。

1965年上半年，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政治批判氣氛愈來愈緊張的情況下，周揚曾在傳達五人小組指示的報告中，明確地指出：學術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點名要經過中央宣傳部，批判要以中央報刊為準。

2 棘手的難題

毛澤東關於「要害是罷官」的談話內容傳出後，對吳晗的批判進一步升級。1966年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王若水用「思彤」為筆名的文章〈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第一次在報紙上公開提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提到廬山會議。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周揚為了緊跟當時的形勢，指示中宣部科學處組織寫批評吳晗的文章，周揚親自參加議定了組織三篇文章：一是由中宣部科學處的龔育之等寫一篇批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二是由戚本禹（《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寫一篇批評吳晗歷史觀的文章；三是由關鋒（《紅旗》雜誌編委）寫一篇批評吳晗道德繼承論的文章。

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甚麼社會思潮？〉。在這篇由中宣部直接組織寫作，經周揚

74 吳冷西在〈從學術討論到「文化大革命」〉一文（載《回首「文革」》，上冊，頁272）中說：1964年底，江青約中宣部五位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姚溱、吳冷西座談，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國報刊批判《不夜城》、《林家鋪子》等十部影片。幾位副部長都沒有同意江青的要求，認為需要慎重考慮。江青後來到上海去活動，上海報紙就陸續批判這些影片，全國其他地方也相繼仿效。「在這樣的壓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報》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但是當年8月中宣部即寫過關於公開放映所謂「毒草」影片的報告，毛澤東也批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幾位副部長根本不可能還不同意批判那幾部影片。吳的說法很可懷疑。

指點並審定的文章中給吳晗上網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其中將〈論海瑞〉、《海瑞罷官》稱為「是假冒海瑞而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寫照和頌歌」。由於文章中也稍帶批評了田漢和孟超，周揚在與龔育之、林甘泉、邢賁思、戴逸等執筆者談話時說，當他少年的時候，田漢在他心目中還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聯時代的人物。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多麼深刻，這些同志跟不上啊。其實，周揚自己又何嘗跟得上呢？周揚在得知毛澤東關於「要害是罷官」的談話後，又要龔育之等以「方求」名義寫了一篇評吳晗自我批評的文章，題目就叫〈不能迴避要害問題〉，周揚還是想努力跟上毛澤東的步伐。

1966年1月，周揚因發現肺癌住院治療，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接替周揚主管學術批判工作。當時彭真要求中宣部把北京報刊的學術批判統一管起來。

1月17日，許立群召集了一個在京的六大報刊（《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前線》雜誌、《新建設》雜誌）負責人座談會，會上各自講了關於《海瑞罷官》討論的情況和問題，都表示要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但又提出許多執行中的問題，如：發表揭露吳晗政治性錯誤的文章，如何掌握為好？今後一段時間內，從政治上批評「要害」的文章，提到甚麼程度？發多少？怎麼發？甚麼時候發？批判的人牽涉的愈來愈多怎麼辦？這些問題都是許立群難於解決的，他讓人整理出會議簡報，又親自對簡報進行了仔細修改，然後用六個報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組提出了自己想要請示的問題。

與此同時，戚本禹寫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關鋒寫的批評道德繼承問題的文章和另一篇與林杰合寫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共三篇文章送到中宣部。許立群不敢貿然將這些講要害問題的文章一下子都發出去，他讓人將三篇講要害的文章（方求一篇、戚本禹一篇、關鋒和林杰一篇）和關鋒寫的關於批評道德繼承問題的文章作出摘要，送五人小組請示。

關鋒在批評道德繼承的文章中，把吳晗講道德繼承，比之於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中宣部建議他把這些文字刪掉，關鋒堅持一字不

改。於是有人找出關鋒過去在《光明日報》上以「何明」為筆名寫的雜文〈從陳賈說起〉，也是講道德繼承的。中宣部把關鋒的這篇雜文也作為附件上送。許立群給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寫了一封信，請他們審閱這些摘錄，請示對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應當如何掌握，這些文章在何時發表為宜。

許立群上報五人小組的材料中，還有一份〈關於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匯報〉。郭沫若在寫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的信中說，自己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包括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中宣部專門整理了一份〈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瀾等同志〉的材料作為附件隨郭的信一併上報。

許立群上報的材料還有〈關鋒同志在1962年寫的幾篇雜文、鄧拓同志在1962年寫的一篇雜文〉、〈關於《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纖》的材料〉、〈報刊發表參加演出《海瑞罷官》的演員的檢討文章〉。這些材料想說明：學術批判中的左派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上海批判北京的《海瑞罷官》很起勁，而對上海搞的《海瑞上疏》卻只是一筆帶過；參加《海瑞罷官》演出的演員檢討太多了。

1月31日，許立群在將材料匯總送彭真的時候寫了一封長信⁷⁵，信中認為，《海瑞罷官》批判展開以來已收到很大的效果。批判正在繼續向深處和廣處發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信的主要內容是講在批判過程中提出的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例如：

第一，對吳晗同志的批判，指出這不只是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並揭露吳晗思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報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錯誤，分寸如何掌握為好？自從彭真同志傳達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吳晗問題的要害在「罷官」以來，使大家的認識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已

⁷⁵ 許立群信的內容轉引自龔育之：〈《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載《回首「文革」》，上冊，頁286—287。

各發表了一二篇揭露這個「要害」問題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繼續修改。關鋒、戚本禹同志寫的三篇尚未發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廬山會議反對彭德懷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寫得十分明顯；有的把文章重點，集中地放在論證吳晗同彭德懷是一夥；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蔣介石論道德的話同吳晗的話對比。上述這些內容，在報刊上公開，好不好？

第二，據收集到的反映，有許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瀾等同志拉出來公開批判。這些人，有吳晗和贊同吳晗同志觀點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象；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別有用心的。現在，我們已經告訴各報刊，不登批評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學術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對此議論頗多。據有些同志反映，現在寫文章批判吳晗錯誤的同志，有的（如關鋒、鄧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報刊上發表過用影射方法罵中央的雜文，文章的「質量」頗高（《宣教動態》1962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兩篇）。這些問題，如果只批評別人，不在適當時機，採取適當方式，在黨內清理一下自己當時的錯誤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動。此事如何處理為好，請指示。

附此，還有兩個問題。一、新編有關海瑞的歷史戲，除《海瑞罷官》外，還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劇院集體創作，1959年）和《海瑞背纖》（瀋陽京劇院，1959年）。這兩個劇本，問題也是很嚴重的，現在還很少有文章批評。二、京戲演員，參加演海瑞戲，是否可以不在報刊上公開檢討了？最近，《戲劇報》、《文匯報》刊載了京劇演員譚元壽檢查自己參加排演《海瑞罷官》和其他壞戲的文章，《文匯報》不久前重登了馬連良過去稱讚《海瑞罷官》的文章。如果繼續發表演員檢討的文章，是否好？因為，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難要求他們負太多的責任。

第三，報刊上發表的討論文章，已有一定數量，今後的正面文章，似乎應當注意講求質量。對於質量差的正面文章，編輯部要幫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辦事？

無論對於許立群來說，還是對於彭真來說，在他們面前的都是一堆棘手的難題：眼見得毛澤東要在文藝界大動干戈，他們必須緊跟，

但又不知如何跟；對於當前面臨的許多實際問題，他們有自己的看法，但又唯恐與毛澤東的思想不合拍，惹出麻煩來。

3 〈二月提綱〉

2月1日，彭真將許立群的信連同七份材料送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彭真還寫了一個註：「擬於後日召開五人小組會討論後向中央提出意見」。2月5日，毛澤東批給江青：「這批材料閱後，暫存你處。」

2月3日，五人小組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在彭真主持下，會議着重討論了當前學術批判中的問題。彭真指出，已經查明吳晗與彭德懷沒有聯繫，《海瑞罷官》與彭德懷也沒有聯繫，並強調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他還否定了關鋒等對鄧拓的指控，並讓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和北京市委書記鄭天翔作為證明人。彭真提出，左派也要整風，不要當「學閥」。

陸定一結合他個人的體會，講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教訓，說，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會有反覆。康生在會上並未表示不同意見。⁷⁶

會議討論的結果，由許立群、姚溱整理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匯報提綱，彭真修改定稿，題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本身是一個很「左」的文件。它認為，當時開展的學術批判運動「使思想界活躍起來了，蓋子揭開了，成績很大」。提出：「這

76 〈五一六通知〉所附〈大事記〉中說：「會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意見」。但聯繫到後來2月5日在五人小組向中央常委匯報和2月8日向毛澤東匯報時，康生對〈二月提綱〉都未提不同意見來看，〈大事記〉的說法顯然是誇大其詞了。當事人陸定一、吳冷西、胡繩、范若愚在1979年都寫過書面的證明材料，證實康生當時並未發表不同意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人民日報》記者紀希晨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一書中都說：「康生發表了同彭真完全相反的意見」，似乎是被〈大事記〉所誤導。

場大辯論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鬥爭，是我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且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後，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鬥爭，是興無滅資的鬥爭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場大辯論勢必擴展到其他學術領域中去。」

〈二月提綱〉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通過這場鬥爭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農兵學毛主席著作、工農兵學哲學等），不僅要進一步打破舊知識分子，實際是剝削階級對學術文化的壟斷地位，而且要從此進入一個廣大工農兵群眾直接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和科學文化的新的歷史時期。

這裏實際上是作出了一個整體判斷：即在整個學術文化界，是由舊知識分子佔據壟斷地位，而舊知識分子就是剝削階級的代表。這個整體判斷與〈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提出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都來源於毛澤東對形勢的嚴重錯誤估計。

彭真、許立群等人試圖對學術批判運動中已經出現的簡單粗暴、不講政策等現象加以限制，提出「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要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關批准。」⁷⁷〈二月提綱〉最後提出設立學術批判辦公室，由許立群、胡繩、吳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組成，許立群為主任，胡繩負責主持學術方面的工作。

2月5日，劉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彭真提交的〈二月提綱〉，並決定由彭真等人去武漢向毛澤東當面匯報情況。

77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說，〈二月提綱〉是要把學術批判運動「置於學術討論的範圍內」（頁486），不確。〈二月提綱〉中只說「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意為既要討論政治問題，也要討論學術問題。

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田家英等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當時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只是連問了兩次：「吳晗能不能算是反社會主義？」彭真回答說：吳晗當然有政治錯誤，但據調查，他和彭德懷是沒有牽連的。毛澤東說：吳晗不罷官了，還照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於形成緊張局勢，就可以「放」了吧。在談到左派也要整風時，毛澤東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當許立群談到關鋒的雜文時，毛澤東說：寫點雜文有甚麼關係，何明（即關鋒）的文章我早就看過，還不錯。

對於〈二月提綱〉，毛澤東只提出兩點意見：一是關於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毛說，兩個月以後也做不了結論；一是關於不要批評郭沫若和范文瀾，毛說，他們兩個還要在學術界工作，表示一點主動，做一點自我批評好。

毛澤東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二月提綱〉，被彭真等人誤以為那就是同意了。其實毛澤東當時只是礙於常委已經討論通過這個事實，沒有貿然行使自己的否決權。幾天以後，大約在2月12日左右，毛澤東在小範圍內表明態度：要批判〈二月提綱〉。這個情況是周恩來後來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透露出來的。周恩來說：

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上了台怎麼辦？地方可以造反。主席是有預見的，是天才的預見，主席早就有感覺，早有材料，感覺是正確的，2月7日那個提綱，五天之內就抓住了。主席抓得準，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過去。「四大家族」⁷⁸已經奪了我們許多陣地，主席說過這是黨內正常現象。去年工作會議就問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造反不造反？提綱出來後，主席說：你們攻不攻？不攻，我就發動地方攻，叫地方造反。⁷⁹

78 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

79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所載此次講話中沒有這段話，這裏的引文是根據文化大革命中流傳的另一版本的這一講話材料。

2月12日，〈二月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黨，要求各級黨委「照此執行」。當天，彭真就向上海打招呼：〈二月提綱〉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問題解決了。13日，彭真又讓胡繩告訴張春橋：不要講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要聯繫廬山會議。此後，全國學術批判的形勢有所緩和。⁸⁰ 根據〈二月提綱〉的精神，中宣部沒有同意發表關鋒、戚本禹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2月18日，許立群和胡繩召集北京學術界和各報刊負責人開會，組織傳達和貫徹〈二月提綱〉。

一些左派並不服氣。關鋒在一次北京學術界貫徹〈二月提綱〉的座談會上仍然要求發表他批《海瑞罷官》的文章，他向學術批判辦公室提出質問：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問題？政治批判還讓不讓搞？能不能聯繫廬山會議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⁸¹ 3月1日，許立群說：肯定不能聯繫廬山會議，這是主席當面點頭同意了。胡繩說：關鋒應該好好想一想，為甚麼主席上一次談話說吳晗要罷官，這一次談話，重新考慮，又說吳晗不罷官了？主席這樣站得高。關鋒這個同志，思想太褊狹了。胡繩是親自聽到毛澤東兩次談話的人。⁸² 3月8日，關鋒找中宣部林潤青談話，再次要求發表他的文章。關鋒強調，他的文章是根據毛澤東的南方談話（按：指杭州談話）寫的。林潤青報告許立群，許立群說：他有一個「南方談話」，我也有一個「南方談話」（按：指武漢談話）！我那個「南方談話」還在他那個「南方談話」的後頭！

彭真等人真的以為毛澤東同意了〈二月提綱〉，因此說話也是底氣十足。3月11日晚，許立群向彭真請示如何回答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受張春橋派遣到北京「摸底」）提出的問題。

80 1966年5月，張春橋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說：「（〈二月提綱〉）不動聲色地束縛了我們的手腳，硬把運動拉向右轉，弄得很多文章不能發表。姚文元、關鋒寫好了的講要害的文章都壓下了。」

81 當年1月下旬，關鋒曾專程赴滬接受江青的接見，江青向他交底說：「批《海瑞罷官》不單是學術問題，而是反擊彭德懷的翻案。」關鋒自以為「通天」，說話口氣強硬。

82 詳情見龔育之：〈〈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載《回首「文革」》，上冊，頁305。

許立群：楊永直問，學問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

彭真：學問沒有具體指是甚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瘡疤就是誰。

許立群：楊永直問，上海要批判一批壞影片，包括《女跳水隊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

彭真：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游過泳沒有？

許立群：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

彭真：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

許立群連夜將彭真的答覆電話告訴了楊永直，楊即趕回上海匯報。張春橋得知彭真的答覆後說：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張春橋在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所謂學問，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所謂武斷，還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罷官》同政治問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說要害是罷官；所謂『以勢壓人』，還不是說毛主席以勢壓人，上海市委以勢壓人……」張春橋的這番話未必只是他個人的推斷，很可能也就是毛澤東的想法。非如此，則不足以說明毛澤東為甚麼此後不久即下決心打倒彭真這樣一個重要人物。林默涵回憶說：「在1966年5月通過〈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會議上，康生講話時說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狀，說彭真壓制她，欺負她。主席回答江青說：彭真算甚麼，我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說，他當時在場。康生還說，主席曾對他說：告訴江青、張春橋不要着急，沒有甚麼了不起。」⁸³

4 剝筍政策

1966年3月8日晨5時29分，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強烈地震，震級為6.8級，震中烈度為9度左右。邢台地區有30多個公社、350個生產大

83 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載《回首「文革」》，上冊，頁265—266。

隊，人、畜、房屋遭受嚴重損失。儘管事先作了預報，但還是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死8000人，傷40000人，受災人口達到560萬，受災地區八成的房屋倒塌。一場更為巨大的政治地震已近在眼前，它所造成的災難要比自然界的地震強大很多倍。

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七個常委中毛、劉、周、林⁸⁴四人與會。鄧小平尚在三線視察，請假未到會。朱、陳二人早已脫離中央領導核心。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六大區書記、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還有甚麼其他問題也可以談談。

會議沒有正式報告，開得很隨便，主要是聽毛澤東講話。

毛澤東先講了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他說：蘇聯二十三大我們不參加了。蘇聯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開這個會。我們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帶水。二十三大不去參加，無非是兵臨城下，不打，就是筆墨官司。不參加可以寫一封信。蘇聯反華好嘛，一反我們，我們就有文章可作。（有人問：這次我們沒有參加，將來修正主義開會，我們還發不發賀電？）發還發，發是向蘇聯人民發。

毛澤東還講了工業體制問題，他說：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只管虛，不管實，或是少管實。中央收上來的廠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們出中央，到地方上去，連人帶馬都出去。現在是南糧北調，北煤南運，這樣不行。

毛澤東講得最多的還是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他們

84 參加此次會議的李雪峰在回憶中說：「林彪似到場」，參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下冊，頁599。列席會議的吳冷西則說：「到會的常委除主席外只有少奇同志和周總理，沒有過半數」，參見吳冷西：〈從學術討論到「文化大革命」〉，載《回首「文革」》，上冊，頁274。現綜合其他各種資料，判定林彪到會。

就愈抵抗，就愈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還有那個北京的刊物《前線》，是吳晗、翦伯贊的前線。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甚麼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要保幾個人，如郭老、范老（按即郭沫若、范文瀾），其他的人不要保了。發動年輕人向他們挑戰，要指名道姓。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冒出來。戚本禹批判羅爾網，戚本禹是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羅爾網是教授。好的壞的都不要壓，赫魯曉夫我們還要為他出全集呢！把新生力量，如學生、助教、講師、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來。剩下一部分死不轉變的老教授孤立起來。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緊。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毛澤東警告說：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以鄧子恢為部長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於1962年撤銷）。

毛澤東在講話中明顯地表現出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不滿，只不過還沒有點出彭真的名字。

會上，毛澤東侃侃而談，劉、周、林有一些少量的插話，整個會議的氣氛比較緊張。李雪峰回憶說：「大家聽着，啞口無聲，誰也不能表態。陶鑄是勇敢的，敢講話，這次也很謹慎。參加會議的人相互之間也不敢多說話，又都想試探一下，了解情況，但是誰也不主動，也不敢主動。」⁸⁵

當時，北京正在召開批判羅瑞卿的京西賓館會議，其間，羅自殺未遂，引起群情激憤。在杭州的常委擴大會議上也對羅進行了揭發批判，與會人員呈現一邊倒的態勢，沒有任何人為羅瑞卿說一句好話。會議還點了楊尚昆、陸定一的事。楊尚昆已於1965年11月被貶到廣東當省委書記處書記，其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把大量的機密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別人抄錄」等。陸定一則是受到其患精神病的妻子嚴慰冰牽連。嚴慰冰寫匿名信罵林彪、葉群的「反革命案件」在此前不

⁸⁵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下冊，頁599。

久破獲。扣壓左派稿件是陸挨整的重要原因，但會上主要是說他與嚴案有關。⁸⁶

毛澤東捂住自己的底牌不亮，說話留有餘地，有時在關鍵的地方閃爍其詞，語焉不詳，有時又採取旁敲側擊的手法，常常令他的戰友或曰對手們摸不着頭腦，不知如何措手足。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他批評吳冷西：《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我過去批評你們不搞理論，從報紙創辦時起就批評，批評過多次。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甚麼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我看你是半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麼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不犯錯誤的報紙是沒有的。《人民日報》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可能以後還會犯錯誤，說從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報》還是有進步，現在比過去好，我經常看。但要不斷前進。

吳冷西不知就裏，有些恐慌。會後他對周恩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周恩來對吳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吳選對彭真談了此事，彭真也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⁸⁷ 政治經驗老道的周恩來、彭真當然能夠聽出毛澤東的弦外之音。

杭州會議之後，在北京的幾個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討論了對蘇共二十三大的方針問題。⁸⁸ 劉少奇認為，這是蘇共自己召開的會，不同

86 嚴慰冰匿名信事發後，中央責成彭真負責審查陸定一是否與此有牽連。彭真審查的結果是：陸定一確實不知道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情。

87 吳冷西：〈從學術討論到「文化大革命」〉，載《回首「文革」》，上冊，頁275。

88 第一次杭州會議上毛澤東已明確表態說蘇共二十三大「我們不去了」，據此，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覆信蘇共中央，通知蘇共中央，中方「不能派代表團去參加你們這一次的大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京常委再次討論去不去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甚不合情理，箇中原由尚待研究。

於兄弟黨國際會議，去不去都不是大事，只是禮節性的問題。會上康生不同意參加，彭真則主張去參加。在給毛澤東的請示電報中說，傾向於參加。當年3月，以宮本顯治為首的日本共產黨代表團來訪，中日雙方對於聯合公報中是否公開點蘇共名的問題，發生分歧，在京常委認為應當照顧日本的困難，在公報中只提聯合反對修正主義。為這兩件事，決定派康生到上海去向毛澤東匯報。

3月28日，康生在上海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對兩件外事工作的處理意見都投了否決票。他聽康生講到在京常委們同意派代表團去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大時說：他們同意，我不同意！並針對劉少奇說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的話，批評說：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毛澤東看了同日共會談公報的草稿，批評公報草稿是「無頭告示」，不指名批評蘇修，怕鬼，旗幟不鮮明，不痛不癢。他親自在公報草稿上作了修改，點了蘇共的名，強調反對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任務。這樣的修改當然不會被日共接受，聯合公報夭折了。

康生向毛澤東談到彭真通過許立群給上海宣傳部楊永直打電話，責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甚麼不同中宣部打招呼，黨性到哪裏去了。康生說：「這是整到主席頭上了。」毛澤東說：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他還對康生講了許多極為嚴厲的話。根據康生1966年5月5日、6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介紹情況座談會上的講話，要點如下：一、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匯報提綱」是錯誤的，不分是非的。當時我沒有明顯指出，因為我以為是常委討論過的。只說了對關鋒、戚本禹的批評三年之後再說，還說過何明（按即關鋒）的文章很好，寫點雜文有甚麼關係。二、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壞人就要解散。三、為甚麼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不能聯繫廬山會議呢？吳晗的文章不是自己聯繫到廬山會議嗎？吳晗自己說是執行廬山會議的決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有人說我說不要聯繫，奇怪，我不是幾次說過要害是罷官問題嗎？四、北京市委再不要包庇壞人了，鄧拓是叛徒，翦伯贊要點名批判。翦伯贊掌握北大歷史系，陸平（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不能領導北大。五、中宣部、北

京市委如果再不作公開的自我批評，我就要公開批評，發動各地的黨公開批評。六、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時，不敢告訴中宣部。中宣部是個閻王殿，告訴他就壓下來了。七、告訴彭真，再不准包庇壞人了。許立群打電話向上海楊永直，講了兩條是很錯誤的，要向上海道歉，彭真要打電話向上海道歉。八、學術批判要走群眾路線。要發揚1958年精神，去掉1958年缺點。要試點。不要像1958年那樣否定一切。毛還要康找華東局、上海市的魏文伯、張春橋、楊永直等談談話，問問他們對彭真的意見。

3月30日下午，毛澤東又與康生、江青、趙毅敏、魏文伯、張春橋五人談話。毛澤東說，為甚麼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告訴中宣部？一定要向彭真打招呼？中央十中全會不是有決定嗎？吳晗寫了那麼多海瑞文章，許多鬼戲文章，宣傳部為甚麼不要請示呢？而偏偏姚文元的文章必須打招呼呢？難道階級鬥爭還要告訴中宣部和北京市，中央決議不算數？甚麼叫學閥？那些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就是學閥，不讀書又包庇壞人的學閥。包庇吳晗、翦伯贊這些學閥的人就是大學閥。你是閻王，人家是小鬼，人家怕同你聯繫。現在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央出修正主義」的「中央」所指不僅北京市、中宣部，凡是不做事、包庇壞人的機關都應解散。五人小組也要解散。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有些人怕孫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怕字當頭，非垮台不可。我們要站在孫悟空方面，我們要保護戚本禹、關鋒、尹達、穆欣、姚文元、孫達人等左派。解放後，我們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包下來，當時是對的。但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他們就愈抵觸，愈暴露他們反社會主義、反共的面目。很多人並不想真正改造，他們還掌握着文、史、哲、藝術、戲劇、出版、電影的實權。對這些人的辦法是：第一駁倒；第二給飯吃，有職無權。我也保護過吳晗，我們不知道他的底，誰曉得他同胡適等等的關係。對郭老、范老要保護，郭老是好人，功大於過。對資產階級的批判也要講策略，一個學校兩三個，不可過多。要建立我們的新的文化學術隊伍。現在必須進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義。我們都老了，下一代是否能頂住

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恐怕我們這一輩完不成，這個革命必須進行到底。告訴恩來、彭真同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不接觸，但是我們不摸他們的底，要警惕。

毛澤東的談話可謂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他把幾個月來意識形態領域激烈鬥爭的道道難題——一點破，因對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不滿而引起的鬱悶心情在這時得到了極大的宣泄。值得注意的是，內容如此重要的談話，他不向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提出，而向康生、江青等人談出。筆者揣測，儘管毛澤東魄力很大，但在此時要在幾位常委面前撕破臉皮講話，他還是會感到底氣不足的。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彭真傳達了毛澤東在上海的談話內容。當時正值河北邢台發生第二次強烈地震，強度甚至超過了3月8日的地震。周恩來聽完康生的傳達後，當晚即飛赴地震災區。4月2日，周恩來在邯鄲給毛澤東寫信，打算集中精力在河北抓抗旱和救災工作，「擬每隔十天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當由彭真同志告我趕回。」由此可見，周恩來當時還不認為毛澤東真的是要打倒彭真。周恩來在信中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也向毛澤東做了表態。據〈五一六通知〉所附〈大事記〉說：「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簡單空洞的表示，沒有任何具體內容，只說『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錯誤和缺點』。」實際上，彭真的態度是很認真的，3月31日當天，彭真便要北京市委書記處成立由劉仁、鄭天翔、萬里組成的三人小組，組織黨內對鄧拓的批判。

經康生批准，4月2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4月5日，《紅旗》雜誌發表了關鋒、林杰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文末都署為1月寫作，顯示文章被扣押了三個月。

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在北京開會。康生傳達了毛澤東3月底的談話。彭真表態說，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康生對彭真在學術批判中的表現進行了系統的批判，陳伯達則從民主革命

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對彭真進行了批判。最後，周恩來和鄧小平在講話中都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撤銷、批判〈二月提綱〉的黨內通知；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會後，陳伯達讓王力起草了一個通知，就是簡單的一句話：某月某日中央發出的某某文件，現予撤銷。毛澤東不滿意，說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政治性的。他要求康生、陳伯達及其他起草小組人員立即去上海，同在上海的江青、張春橋等人起草通知稿。文件起草小組的組長為陳伯達，小組成員共十人，有：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

起草小組在上海寫出一稿，即送杭州毛澤東處，毛親自修改，改畢再反饋回上海。從4月14日到月底，毛親自修改共達七次之多。

彭真急欲擺脫被動局面，從4月10日到15日，連續召集北京市委常委開會。彭真傳達了毛澤東對〈二月提綱〉和對北京市委的批評。彭真說，毛澤東說的「包庇壞人」的「壞人」中就包括「三家村」。彭要求北京各級黨組織開展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批判。

4月16日，《北京日報》大張旗鼓地以三個版面的篇幅發表了〈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材料和由彭真定稿的《前線》、《北京日報》編者按。編者按嚴厲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言辭一點也不比戚本禹、關鋒稍軟。如稱吳晗「在這個時期反動思想的核心是『罷官』、『罷帥』」，「不止一次地借這個題目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稱廖沫沙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稱鄧拓「頌古非今，借古諷今，大量地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編者按主動檢討說：「本刊、本報過去發表了這些文章又沒有及時地批判，這是錯誤的。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頭腦中又有資產階級、封建階級思想的影響，以致在這一場嚴重的鬥爭中喪失立場或者喪失警惕」，「放鬆了文化學術戰線上的階級鬥爭」。

彭真的努力為時已晚。

4月16日晚，新華社通知各地撤銷所發關於《北京日報》、《前線》雜

誌編者按的通稿。4月19日，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北京日報》發表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種製造混亂的措施。

與此同時，毛澤東召集了第二次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是一次「揭開彭真的蓋子」，徹底清算彭真的會。

當彭真接到去杭州參加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的通知時，便知道自己已是在劫難逃了。他在上飛機時對葉劍英說：「現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這個事，當然不是好事，不是小事。

彭真到杭州後即要求和毛澤東見面談話。他對毛的秘書徐業夫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講二十分鐘。」毛未予理睬。

4月19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外交部長陳毅剛剛結束對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的訪問回到昆明，就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長途電話，通知他們趕赴杭州開會。4月20日劉少奇趕到杭州，主持會議。因為他半個多月不在國內，不了解情況，會議實際上由周恩來主持。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我不願意在那裏住，願到上海來。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裏有人」，中央有，各區、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場鬥爭涉及的面很廣，不僅批判吳晗、翦伯贊，各個學校、各個地方都要批判幾個代表人物。文化方面我們沒有人，唱戲、畫畫、出版、大中小學都沒有，寫小說的人也很少。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有些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就暴露出來了。歷來講不破不立，先破了才能立。要徹底地破，立也就在其中了。〈通知〉（按即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可以討論，讓大家公開討論，究竟哪一個是正確的，哪一個是錯誤的。還可以認為原來的〈提綱〉是對的，這個〈通知〉是不對的。完全可以推翻這個〈通知〉，允許再回到彭真同志的那個文件。

毛澤東再次對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嚴厲的指責。

4月21日，毛澤東派人將一批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批判彭真的簡報

送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親收，示意劉仁站出來，反戈一擊，揭發彭真。劉仁不為所動。他於4月22日召開市委全會，傳達毛澤東送來的材料。劉仁在會上說：「這是幹甚麼，我不懂。」「主席把七個文件批給市委委員閱，用意是甚麼？我沒有領會清楚。」他還意味深長地說：「如果有人由於軟弱失去了自信，那麼，至少不要再失去誠實。」並說：「彭真同志在北京的工作中犯多大錯誤，我就犯多大錯誤。」⁸⁹ 劉仁後來被撤職、批鬥，關進秦城監獄近六年後，於1973年被摧殘迫害致死。

彭真遭難，大家也都緊張。大區書記們飯後散步，沒有一個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李雪峰是彭真的老部下，見面也只能講些「天熱了」之類的廢話，誰也不敢講正題。

杭州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4月24日，會議基本通過了〈通知〉修改稿。彭真被停止工作，並失去自由。⁹⁰

4月28日和29日，毛澤東又與康生等人談了兩次話，內容大意是：北京市針也插不進去，彭真想把黨的工作按照他的思想來改造，事物走向反面，他自己為自己垮台創造條件。我說過，凡是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黨起來進攻，要孫悟空大鬧天宮。共產黨裏也有保護玉皇大帝的保皇黨。彭真以為我說的這些話，不過是說說而已。許多同志包括伯達同志，都告訴我北京市針插不進。歷史教訓，有些人並不引以為戒。彭真並不引以為戒，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對彭真的錯誤要攻到底。但是彭真這種人肚子裏沒有甚麼東西，一攻，他的章法就亂了，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撥倒。你們告訴上海的同志，不必要無窮憂慮。這種人用小指頭一撥就倒。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的。彭的本質隱蔽了三十年。

89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521—522。

90 會議結束後，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窮兩人與彭真一道乘飛機回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參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下冊，頁602。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期間，曾把打倒羅瑞卿、彭真等人比作剝筍，說我們實行的是剝筍政策⁹¹。他比喻說，一隻筍，有點爛了，只要把外面的幾片葉子剝去，就還是一隻好筍。話說得風趣幽默，但許多人聽後卻感到不寒而慄。毛澤東說：對各級領導幹部要一層層地剝，一批批地剝，一次次地剝。毛澤東的話透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肅殺之氣。

⁹¹ 關於剝筍政策，可參見1966年5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以謝胡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談話。在那次談話中，毛澤東說：有兩種可能：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第二個可能就是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地剝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壞的剝掉。從1921年到1966年四十五年了，我們就初步地剝了一遍，剝掉了不少反動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國燾、張聞天、高尚、饒漱石、彭德懷、羅瑞卿、彭真等等，前後幾十個中央委員，還有睡在我們身邊沒有發現的。

第二章

發 動

在毛澤東的親自主持下，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為導火索引發的政治批判之火愈燒愈旺，逐漸遍及全國。許多作家、學者和報紙、刊物被點名批判，意識形態領域一片混亂。但普通老百姓和非意識形態領域的大多數幹部、職工，此時尚未意識到這一場亂哄哄的批判運動與自己有何關係，工農業生產和正常的社會生活還在原有的軌道上運行。羅瑞卿、楊尚昆、陸定一、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陸續被揭發批判，並且牽連一批黨政軍高級幹部，在黨內高層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但還處在嚴格保密階段，絕大多數黨員幹部對此一無所知。

毛澤東對開展文化大革命有一種緊迫感。1966年5月5日，他在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的談話中說：

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後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着。你曉得哪一天

修正主義佔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

鑑於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着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¹

毛澤東想要發動一場「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運動，他要動員全國億萬群眾投入運動，就需要中共中央通過正式的文件，發出公開的號召。他要證明自己的正確性、合法性，也需要召開中共中央的正式會議。

一 政治局擴大會議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是按照毛澤東主持的第二次杭州會議的部署和毛澤東在會前的一些安排進行的。毛澤東決定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賦予文化大革命以合法的地位，為它確立一個指導方針，以便使全黨接受並照此執行。會前，毛澤東對於會議的議題、文件都一一作了具體指示和安排。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卻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匯報請示。參加會議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有關部門負責人和「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成員。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基本上都沒有參加會議。

1 「介紹情況的座談會」

會議的前三天召開了「介紹情況的座談會」，主要是由康生、張春橋、陳伯達講話。

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10。

康生於5月5日下午和5月6日上午在座談會上作了長達八個小時的講話。他傳達了毛澤東在1962年9月以來，特別是1965年11月以來關於批判彭真、陸定一，要解散中央宣傳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號召向中央進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紹了這次會議要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起草經過，談了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下面是康生講話中若干段落的記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涉及到彭真在文化戰線上用他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路線長期對抗毛主席的馬列主義路線，涉及到毛主席的路線反對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路線，涉及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文藝領域內反黨、反社會主義，向黨和人民進攻，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鑽進黨內來，……不僅是吳晗《海瑞罷官》這麼一篇文章的問題，而是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這樣根本性的大問題。林彪同志說這個文件是黨的歷史上一個重要文件，是解放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文件。

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尖銳地提出了在文化戰線、在意識形態上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在十中全會以後，有兩個鮮明的對照，一個是上海，柯慶施領導的上海市委，從1962年起就抓文化、戲劇、電影、曲藝的革命，堅決實行主席的指示；另一個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對主席的指示按兵不動，實際上是對抗。據張春橋說，1963年春中宣部開的一個會²，實際上就是對抗主席思想的。正因為北京市委採取這樣的態度，主席在1963年12月12日給彭真、劉仁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的後面又加了一個批註：「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彭真在1965年9月文化廳局長會上四次講到第一位負責的是主席。

2 按指1963年4月中宣部在新僑飯店召開的文藝工作會議。1963年1月1日，柯慶施在上海部分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提出「寫十三年」的口號。新僑會議就「寫十三年」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在發言中都指出「寫十三年」這個口號有片面性。張春橋進行辯解，講了所謂「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市委執行主席的指示，發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為甚麼後來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因為上海市委把這件事告訴了周總理，周總理從上海向北京打了電話，才同意轉載。

11月10日到12月20日，是鬥爭的第一階段，彭真是硬頂硬反。從12月20日以後，特別是22日、23日以後，情況發生變化。彭真積極領導，抓，把運動納入他的正軌，即〈通知〉上所說，「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因為這時主席說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

整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談話中，關鋒等人主張把「罷官」問題、廬山會議問題、彭德懷問題整理上去，田家英、胡繩反對，所以記錄就有兩個整理法。……彭真發給中央同志的是沒有提「罷官」的那份。

12月23日，彭真同毛主席單獨談。回來後說法就變了。彭真說毛主席說吳晗問題要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現在要放。他摸到這個底態度就變了，變為積極地抓了，整左派。

彭真要許立群搞匯報提綱，大家以為是他個人要匯報，沒想到是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更沒想到要作為黨的文件發到全國。

2月6日，彭真把匯報提綱先發給毛主席。2月7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田家英等一道去毛主席處。匯報時，王任重也參加了。2月7日到2月10日，共談了四天。談了毛選，談到卡斯特羅反華、印尼問題，主要是彭真匯報文化問題。……會上毛主席兩次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當時毛主席有困難，以為匯報提綱是常委通過的，他不好多說話。提綱下發後，張春橋等覺得好像是糾偏的，又講學問，又講要整風，整左派，沒有傳達。

因為許立群3月11日給楊永直的電話，又挑起了問題，我知道這個問題到了快要爆發的時候了。……3月28日我去上海前，與總理談了一夜。3月28日，我到上海，毛主席對我說，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五人小組。在上海，毛主席同我談了三次話，主要談的是彭真的錯誤。第一次談話，趙毅敏參加。第二次毛主席與我單獨談。談話要點：一、中宣部、北京市包庇壞人，「提綱」是錯誤的，不分是非的，當時我沒有明顯指出，以為是常委討論過的，只是說了對關鋒、戚本禹的批評三年以後再說。……

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穿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麼辦？現在已經出了，羅瑞卿是一個，彭真是一個，楊獻珍是一個，楊尚昆是一個，田家英、鄧拓、廖沫沙也是。

3月31日，康生返京。當日即把此紀要給周總理、彭真看了，又向周總理、彭真匯報了四個鐘頭。

4月2日，康生打電話到西安，叫小平速回。4月4日，小平回京。4月6日，周恩來也回來（到邯鄲去的）。決定4月9日書記處開會，關起門來統一思想。4月9日、11日、1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彭真要求首先發言，講他從來不反主席，沒有包庇吳晗，只包庇了鄧拓，錯誤就是主張「放」。第二天（按：似應為第三天），康生發言批判彭真，從1965年9月一直到1966年3月，主席說北京市連針都插不進。第三天（按：似應為第四天），陳伯達談彭真在歷史上的問題。

4月22日，在主席處開會。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談了兩次話。

林總說，〈通知〉的後一段，「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是驚心動魄的一段。

中央〈通知〉，不僅關係到文化革命問題，而且關係到粉碎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篡黨奪權問題。

這個文件的通過，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運動的開始。

毛主席告訴我們，對這場鬥爭，一方面要認識到是正常現象，……另一方面可不要放鬆警惕、麻痹大意，以為中央通過了文件，就會完全一致。

5月6日下午，張春橋介紹情況，講了六個問題。在第一個問題「十中全會以後」裏說：1963年4月，中宣部開了一次文藝工作會議，一大批人反對「寫十三年」，攻柯老，即反對十中全會指示。陸定一主持會議，周揚、林默涵的講話印了簡報，不批駁。大會最後一天，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發言，提出反對「題材決定論」，反對「寫十三年」的口

號。為此，上海有人起而反駁。周揚總結，說只是「起一點小風波」。毛主席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對文化大革命起了偉大的動員作用。大好的形勢嚇壞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到了1965年初，彭真同志剎四清的車。文化大革命他也要剎車，而且剎下來了。彭真同志等人對抗文化革命路線，不是從批判吳晗開始的。

在第二部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的情況」裏說：1962年江青在戲院看了《海瑞罷官》，以後就提出了批評。北京市委是知道的。1965年春，林默涵到上海，我問過這方面的情況，他說，批評這齣戲很難。宣傳海瑞之多之廣，僅上海，作品目錄有七頁之多，一切宣傳工具都用上了，因此，非批評不可。批評哪一個？應從階級鬥爭的全局考慮。當時，想得比較簡單，覺得姚文發表，吳晗答辯，再寫幾篇文章，爭論一陣，就可以轉到其他問題去了。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當時對批判吳晗的意義是理解得太膚淺了。

在第三部分「姚文發表以後」裏說：姚文發表前三天，先請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幾個人提意見。他們對最後一部分（關於政治問題），統統反對。這時我們估計到，鬥爭將是激烈的。文章發表後，反應強烈。除西藏外，全國各地來稿來信達到一萬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范瑾、沙英問背景；二、北京各報都不登，這是誰向誰專政？三、20日決定印小冊子，24日印出，北京新華書店不表態。總之，封鎖得嚴嚴的，姚文進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統一布置，又有誰有這麼大的權力，可以這樣布置？我們實在氣憤極了。1965年11月25日或26日，羅瑞卿到上海，下飛機後從警衛人員中聽了點消息，知道了對北京的意見。陳丕顯先和羅談了，羅打電話告訴彭真。陳又告訴了總理。文章在總理的督促下，拖到11月29日（十九天以後），北京各報才開始轉載。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一次到上海」裏說：1965年12月26日，彭真到上海。他硬要把批判拉向右轉。說姚文也要一分為二。說上海各報轉載北京各報關於姚文的編者按，不該把《解放軍報》的編者按放在第一篇，妨礙放。

在第五部分「彭真同志第二次到上海」裏說：今年2月12日，彭真同志到了上海。「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已經出來了，他以為他的主張合法

了，得勢了。一到上海，就跟市委的同志講，這個提綱常委討論過，主席同意了，你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在第六部分「許立群同志的電話」裏說：所謂「學閥」問題，實際上不只是指姚文元，也不限於上海市委，而是針對毛主席的。所謂「武斷」，還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罷官》同政治問題、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說要害問題是「罷官」。許立群的這個電話，是彭真這個黨閥的本質的暴露。4月1日深夜，彭真同志給曹荻秋同志打電話，……4月2日，市委書記處開會，認為這個電話根本不是道歉的，而是把他說過的話統統賴掉了。我們覺悟到，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了。

在5月7日上午的會上，由陳伯達介紹情況。他採用「新賬老賬一齊算」的辦法，着重揭發彭真歷史上的問題。這種辦法早已成為黨內鬥爭中常用的一種手段，是一種把人搞臭的有效辦法。

5月7日下午，蕭華發言批判彭真。發言共分四個部分：一、關於彭真在東北問題上的錯誤；二、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表現；三、關於文化革命問題；第四、彭真和羅瑞卿究竟是甚麼關係。蕭華說：「我認為是一個反黨聯盟，是一窩子，幾個案子實際上是一個案子。」在蕭華發言過程中，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插話批判彭真。

連續三天的情況介紹使與會者受到強烈震動。康生傳達的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為會議定下了基調。當時整個中國共產黨內已經瀰漫着濃厚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空氣，對毛澤東的指示，只能是努力去領會，容不得半點懷疑。彭真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因執行不力或稍有抵制，就受到如此嚴厲的懲罰，哪個還敢輕舉妄動。

5月8日、9日，閱讀文件。5月10日至14日，開小組會。與會者在小組會上，紛紛揭發、批判彭真和陸定一，有的人還作了自我批評。

2 〈五一六通知〉

5月16日上午，劉少奇主持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經過毛澤東七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段落均由他親筆加寫，反映了他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估

計。³絕大多數與會者是在沒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迫於形勢舉手通過這個〈通知〉的，從理智上來說，他們不可能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這一點毛澤東看得明白，他在1967年5月同外賓的談話中就說過：「我在中央主持制定了5月16日通知，……當時大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儘管大多數人實際上不同意，還是通過了。」

〈五一六通知〉對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的批判，說〈二月提綱〉「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通知〉批判〈二月提綱〉掩蓋了這場學術批判的政治性質，是一個「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的修正主義綱領。〈通知〉中說：「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認為：「我國正面臨着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這個〈通知〉還提出：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⁴

3 毛澤東所加寫的文字在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時曾用黑體字排印。

4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1—4。

〈通知〉中的這些論斷，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據。〈通知〉以彭真為批判的靶子，實際上又絕不僅僅是批判彭真。毛澤東的真正目標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第一線，在時機尚未成熟時，毛澤東使用了「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種說法。毛、劉有分歧，在黨內高層不少人都有覺察，但對毛要「搞掉」劉，卻是絕大多數人所想不到的。⁵

在1966年5月，華北局在北京召開了華北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作會議，傳達中央〈五一六通知〉等文件。當時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承先，在反覆認真地閱讀〈五一六通知〉後感到大吃一驚，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讀到（〈五一六通知〉中的）這些段落，真使我大吃一驚，心裏想情況有這麼嚴重嗎？出於對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崇高威望，我又不能不相信，也不敢懷疑。當時只是考慮自己覺悟不高，認識不清，要努力學習提高自己覺悟，跟上毛主席的重大戰略部署。同時認真對照檢查我在河北主管的文教工作，考慮在這方面工作中有無問題，想來想去也沒感到多大問題。⁶

張承先的感受在當時的黨內高級幹部中極具代表性。

在會議討論〈五一六通知〉時，與會者知道這是經毛澤東多次修改過的文件，都只能表示擁護。有幾個人提出文件中有幾處標點和用語

5 〈通知〉通過後的第三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時，都認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出來了。可見，對毛澤東的意圖，中央領導核心的這些成員仍全然沒有覺察。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83。張春橋1967年5月19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說：「運動開始時，……對『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沒完全想到劉少奇。」戚本禹1967年4月30日在中直禮堂作報告時說：「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被培養為接班人，我們很不理解。」說明毛澤東所親信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人對毛的真實意圖也不清楚。

6 張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組〉，載季羨林主編：《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84。

欠妥，也被陳伯達、康生一一予以否定。對此，劉少奇不無遺憾地說：「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好，不如原來的好。」⁷

〈五一六通知〉被會議一致通過，說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理論，正式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加上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的高級幹部，誰也無法改變毛澤東的既定方針，……

5月17日下午，幾個常委在會上講話，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評。他們說自己的認識不夠，還都說自己受了剝削階級影響。劉少奇說，他過去填表時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寫農，後來到花明樓看看，應該是地主。周恩來也在講話中說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響，對階級鬥爭認識不夠，對北京的問題事先沒有覺察。鄧小平也作了檢查，說書記處發生這麼大的問題我都不知道（彭、羅、陸、楊都是中央書記處的書記或候補書記）。林彪也不得不跟着講了幾句，他說：常委同志都檢討了，我沒有準備，我的家庭也是地主，問題也看得不那麼清楚。

中國共產黨歷來都講階級路線，而且隨着「以階級鬥爭為綱」左傾理論大行其道，對階級路線的強調也愈來愈厲害。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中央常委都不得不在會上檢查自己家庭影響，由此可以看出文革開始後不久出現的狂熱的「血統論」，絕不僅僅是年青幼稚的中學生的一時衝動所致。

3 林彪的「五一八講話」

5月18日上午，林彪在會上作長篇講話。這個講話名震一時，被稱為「五一八講話」，因為講話中講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變事例，後來又被人稱為「政變經」。

7 劉少奇1966年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參見黃輝：《劉少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155。

△ 其實關於政變問題，並不是林彪而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早在1964年，毛澤東就提出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的問題。⁸在1965年底到1966年春，毛澤東認為在北京有可能出現反革命政變。據蕭華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後，主席又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⁹

林彪在這次講話中說：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林彪所說並非虛妄之言。據毛澤東的衛士陳長江回憶：「有一次我們很緊張，主席無論如何睡不着覺，走到門口問我：『你們哨兵帶槍和子彈沒有？有壞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訴主席：『不僅帶了手槍，衝鋒槍和機槍，子彈也帶很多。我帶幾十個人，能對付一二百敵人。』主席點頭表示滿意。」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卡博、巴盧庫等人時說：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的時候，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

林彪在講話中說：

這次是政治局擴大會。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擴大會，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這一次繼續解決這個問題。羅瑞卿的問

8 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中央怎麼辦？各省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又說：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

9 轉引自王年一：〈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形勢的估計〉，《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4期，頁10。

題，原來已經解決了。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是查地下活動揭出來的，醞釀了很久，現在一起解決。四個人的問題，是有聯繫的，有共同點。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他們幾個人問題的揭發、解決，是全黨的大事，是保證革命繼續發展的大事，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的大事。這是使中國前進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的英明果斷的決策。這裏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難道沒有事情，無緣無故這樣搞？……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¹⁰

林彪的講話，實際上是反映了毛澤東當時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下決心要搞文化大革命，要與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徹底攤牌，要「從政治上搞掉」劉少奇。但毛澤東深知，劉少奇在黨內外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是公認的毛澤東的接班人，現在又是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掌握了黨和國家的很大權力，遠非高崗、饒漱石和彭德懷等人可比。毛澤東要從政治上徹底打倒劉少奇，絕非易事，能否在黨內取得多數人的支持還是未知數，因此，毛澤東要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冒了很大的風險的，正如後來他在給江青的信中所說：「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林彪說的毛澤東「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的一系列舉措，實際上是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的準備工作。

林彪講話的另一主要內容是吹捧毛澤東，大講毛澤東個人的「天才」。他說：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

¹⁰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6-17。

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林彪話中有話地說：「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顯然，他的話鋒所指，是對着黨內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林彪在後面還說到：「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嚴格要求自己認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這個大形勢，打個人小算盤，必然會犯大錯誤，甚至會參加卑鄙無恥的陰謀反黨集團。」

林彪說：「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¹¹ 這些話，在今天看來是赤裸裸地宣揚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但在1966年5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會場上，七八十位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聽了，並不覺得刺耳，大多數人能夠接受他的這種說法，不少人還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 周恩來在5月21日的講話中說：「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講得很好。」他在講話中也主要講了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他說：

看起來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¹²

陳伯達在5月24日的講話中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講話。」他還對林彪於1965年9月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

1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2—23。

12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載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文作了高度評價：「〈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很重要，闡述了主席思想，要很好地、認真地讀，多宣傳。今後世界革命走我們的道路更普遍了，有普遍意義，包括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武裝，在農村容易存在。這篇文章很重要。」¹³ 〈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在闡述和發揮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同時，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近乎空想的世界範圍內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設想。文章中說：「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¹⁴ 林彪的這篇文章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批准，顯然不應該僅看作是林彪個人的創造。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上，將這篇文章與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九篇評論文章、〈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等稱為是「對當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分析，是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此文的主要觀點在當時為全黨全國人民所接受而幾乎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這種在全世界範圍內搞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是造成文革中外交上極左思潮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

林彪的講話會後不久就在黨內傳達，並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了這篇講話。196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林彪講話。〈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全軍認真學習討論認真領會運用林彪同志講話的指示〉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路線鬥爭的嚴重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

13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4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人民日報》，1965年9月3日。

團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覆，做了系統的精確的闡述。林彪同志尖銳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還可能喪失政權的問題，他提出無論怎樣千條萬緒的事，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觀點，那就是糊塗，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樣掉的。林彪同志把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最好。在這篇講話中，他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他指示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以毛主席為中心來團結，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來團結。他號召在全國人民中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他指示這是保證我國防止修正主義，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根本的關鍵問題。林彪同志說：「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永遠的普遍真理，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林彪同志這個講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全黨全軍都應認真學習，認真討論，認真領會，把它運用到文化大革命和一切行動中去。¹⁵

4 檢查和批判

在5月19日上午的大會上，先由彭真作檢查。彭真承認自己有錯誤，認識不夠，但對那些過火的批判絕不接受。他說：「至於搞政變、顛覆中央、裏通外國等罪惡活動，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至於我同羅瑞卿、同陸定一有沒有反黨的聯繫，請中央審查。」彭真的檢查只用了五分鐘。

與會者對彭真的檢查很不滿意，認為不深刻，沒抓住要害，還是對抗的態度。會場上出現了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康生說，彭真的檢查就是反對〈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上說：「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這段話是毛主席特別加

15 〈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林彪講話的通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25。

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內容。林總昨天特別發揮了主席這個思想。你怎麼回答呢？你尖銳地同黨、同主席、同林總對立。

林彪說：「其實是做夢也沒有忘掉。」「你到處封官許願，包庇壞人，實際上是招兵買馬，招降納叛，擴大隊伍，組織政變的力量。」

陳伯達說：「在我們黨裏面的一個地下的『四大家族』，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叫『彭、羅、陸、楊四大家族』。他們走的是高、饒的老路，對林總，對少奇同志，對恩來同志，他們現在的目的地就是要搞掉這三個人，千方百計地攻擊他們。」

賀龍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出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你就沒有承認赫魯曉夫，你是一個大黨閥也不講。」

張鼎臣說：彭真「做幾十年壞事」，是「偽君子、野心家」，「要篡黨、篡軍、篡政」。

楊成武說：「五人小組的提綱就是搞政變，如果不成，就用槍桿子搞政變。林總昨天講的，一個筆桿子，一個槍桿子，兩種形式都可以搞政變，也可以聯合起來搞政變。沒有冤枉他。」

李先念說：吳晗的要害是罷官，彭真的要害是政變。

陳毅說：彭、羅、陸、楊要害問題就是搞政變，被發現了，抓住了大量的事實。主席大半年的工夫抓了這件事。

薄一波、劉少奇、廖漢生、聶榮臻、蔡暢、余秋里、錢瑛、周榮鑫、楊勇也先後發言，批判彭真，或提出一些問題要彭真考慮。

陸定一在19日下午的大會上作了檢查。會前，散發了林彪手書的一紙證明，全文如下：

我證明

(一) 葉群在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

(二) 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戀過愛；

(三) 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

(四) 嚴懋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係造謠。

林彪 1966年5月14日

陸定一的檢查也很簡短。1966年4月18日，他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寫信，聲明他不知道嚴慰冰寫匿名信一事。陸定一說：我是高級幹部，四十年黨齡。我手裏只有筆桿。我年已六十一，身體不好，眼睛不好，我會搞政變麼？似乎不會。接着，他又對自己是不是「埋在黨中央內的一顆定時炸彈」做了一番令人哭笑不得的說明：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時機一到，自己不想復辟，資產階級會擁戴你復辟。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黎元洪怕得要死，鑽在床底下，被當時的起義者拖了出來，當了領袖。袁世凱做壽，說自己別無所求了，可是，發表了這一通宣言後不久，他就做了洪憲皇帝。陸定一說：我有許多資產階級思想，說我是定時炸彈一點也不冤枉。把我這個定時炸彈挖去，對黨對人民都是一次大勝利。所以，我對這次鬥爭，抱着歡迎的態度。

談到匿名信問題時，陸定一再三聲明與自己無關。他說：我同嚴慰冰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她寫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這對於我，是有口難辯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確實不知道她寫匿名信。在莊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不能說假話。現在嚴慰冰在公安部，請審問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寫匿名信，哪怕只是一封，請把我當作反革命的主謀犯或同謀犯，加重對我的刑罰。

林彪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質問陸定一：你為甚麼害我？！我這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甚麼幹這麼壞的事，用意何在？陸定一說：「我確實不知道。」林彪拍着桌子破口大罵：你們兩口子天天在床上口口，能不知道嗎？¹⁶ 政治批判形同無聊鬧劇。文革烈火燒起來後，中國到處都有批判會，有萬人大會，也有幾十人的小會，一樣都是亂打亂鬥，不講道理。中央政治局這個級別的批判會其實比老百姓的批判會也高明不了多少。

朱德不同意這次會議的做法，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且因為他曾反對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等問題，被責令於5月23日在大會上作檢討。朱、毛共事一生，但毛始終對朱防範有

16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593。

加，長期以來將朱定位於「跑龍套」。高、饒事發，朱德即被責令檢討；彭德懷挨批，朱德又被迫檢討。這次也不例外。

朱德的檢討，離不開他早年的錯誤，即二十年代在井岡山時期和紅四軍黨的七大時同毛澤東的分歧。朱德說：幾十年跟着毛主席，我的最大的錯誤就是那兩次。

陳毅就朱德的歷史問題作了言辭激烈的批判發言。

林彪在發言中說：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上就是指彭德懷和朱德。廬山會議時曾考慮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到主席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要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是彭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你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按：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陳毅問朱德：你是不是想搞政變？

朱德回答：搞政變我沒這個力量，也沒這個膽量。

陳毅說：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野心非常大。¹⁷

朱德說：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這個時候能為朱老總說話的只有周恩來了。儘管周恩來也說了不

17 儘管陳毅在這次會上對朱德的批判相當嚴厲，但他後來在公開場合還是維護朱德的。如1967年2月16日，他對歸國留學生說：「朱老總今年八十一歲了，歷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現在說朱老總是軍閥，要打倒，人家不罵共產黨過河拆橋呀？」2月18日對外事口造反派代表說：「甚麼『打倒大軍閥朱德』，朱德同志怎麼成了大軍閥？這不是給我們黨臉上抹黑嗎？」參見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86—1187。

少批朱德的話，如說朱是常委中的一個定時炸彈，是不可靠，不能信任的等等，但周恩來用檢討自己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為朱德解脫。周恩來說：反對毛主席的事，我都領導過。他舉了寧都會議¹⁸的例子，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受到批評，周恩來取代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周恩來還舉了南昌起義的例子，說：南昌起義，我有錯誤，……城市觀點嘛！¹⁹

5 處理決定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批語指出：

中央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鑑於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極端嚴重，中央決定停止羅瑞卿同志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以後再提請中央全會決定。²⁰

5月23日，會議一致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全文如下：

(一)停止彭真同志、陸定一同志、羅瑞卿同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同志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

☆ 18 寧都會議，是指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的中央局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是為了貫徹臨時中央的「左」領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並討論如何應敵的問題。會議批評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消極怠工」，是「純粹防禦路線」。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回後方。會後，毛澤東被調去專做政府工作，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由周恩來兼任。

19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朱德紀要，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0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3。

(二) 撤銷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撤銷陸定一同志的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

(三) 調陶鑄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並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按：此前中央於1966年1月8日決定：增加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他們的書記處書記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

(四) 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²¹。

(五) 上述決定，地方通知到縣委以上，軍隊通知到團級以上。²²

會議選就處理彭、陸、楊、田(家英)問題作出部署，成立了由周恩來任組長的專案組，下面又分別成立了針對上述四人的小組，彭組由周恩來負責，陸組由陳伯達負責，楊組由康生負責，田組由安子文負責。

5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

關於陸定一，首先是說他與「現行反革命分子」嚴慰冰的匿名信案件「有密切牽連」。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說明中提到林彪時，已經開始使用「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這樣的頌詞了。〈說明〉中說：

這幾年來，陸定一一有機會就猖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把活學活用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罵成是「實用主義」、「庸俗化」、「簡單化」，這純粹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污蔑口吻。他還到處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謂「教條主義」，在許多問題上，同黨中央和毛主席唱對台戲。……在文化革命的問題上，陸定一的立場和觀點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陸定一壟斷中央宣傳部的工作，打擊左派，包庇右派，替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

21 李雪峰在5月7日即接到中央正式通知，去北京市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工作。參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603。

22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4。

關於楊尚昆，〈說明〉中只有非常空洞的幾句話：

(1) 他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2) 他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秘密。

(3) 他同羅瑞卿等人的關係極不正常，積極參加了反黨活動。

(4) 他還有其他的嚴重錯誤。²³

對彭、陸、羅、楊這些在黨、政、軍各方面身負重任的高級幹部如此輕率地強加罪名予以嚴厲處理，造成了嚴重的惡果。一方面證明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義，使毛澤東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使全黨產生了嚴重的錯覺。另一方面，這些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打倒，並得到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正式認可，更堅定了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心。毛澤東更有信心了，他果真是只需動一動他的小手指頭，就能將看起來是龐然大物的對手搞掉。毛澤東要把那看起來很糟糕的爛筍好好剝一剝了。

5月26日上午，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他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對彭真進行了批判。他還對陳雲在1962年提出分田到戶進行了批評。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他說：社教運動中，「對幹部錯誤的嚴重估計也有些過頭」。他還說到：主席從揭露嚴懋冰匿名信時就講政變，問少奇等會不會發生政變。七千人大會時，對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講多了，講過頭了，後來出現的歪風邪氣同這有關。田家英也是贊成包產到戶的。

二 會外的情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時，江青、康生等人已將會議的部分內容散布到社會上，報刊上的批判文章的調子愈來愈高，批

23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4—25。

判的人物也愈來愈多。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同日，《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化名「何明」寫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這兩篇重頭文章氣勢洶洶地把矛頭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指責鄧拓、吳晗、廖沫沙把《前線》、《北京日報》作為反黨的工具，「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兩篇文章實際上是在宣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號召人們參加文化大革命。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文章斷定：「《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都是緊接着《海瑞罷官》開場的。它是『三家村』中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

5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派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代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5月11日，又派李雪峰為組長、池必卿為副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委。5月12日，公安部派出以李釗為首的44人（後增至313人）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5月23日至6月27日，改組後的北京市委在北京飯店召開擴大會議，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委員、候補委員、市委各部正副部長、市人委正副局長以上幹部，各區、縣委書記，各大企業、文化團體、各大專院校的黨委書記，重點中學的支部書記等共六百多人參加了會議。會上宣布中共中央對彭真、劉仁等十八名領導幹部給予撤職或停職反省的處理決定。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彭真、劉仁反黨集團」。6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任市委第二書記。6月7日，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公安幹警大會上宣布，原北京市公安局長馮基平、副局長邢相生等五人是「反革命大特務集團」，撤銷他們的一切職務，並進行「隔離審查」（實為逮捕）。²⁴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紅

24 十二年後，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平反大會。還是由同一個吳德，在大會上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關於為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務集團」冤案平反的決定〉。

旗》雜誌第九期發表社論：〈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社論集中反映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的主要內容。文中說：

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領導，貫穿着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這條黑線的主要點，就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實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三，拋棄階級鬥爭的觀點，企圖和平演變。第四，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第五，為復辟資本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第六，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針。實行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教育方針。第七，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第九，對中央實行嚴密封鎖。第十，打着紅旗反紅旗。

北京市委擴大會議一方面批判彭真、劉仁等前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幹部，另一方面，在參加會議的各級領導幹部中間也進行了揭發、批判以至圍攻、鬥爭。在會議召開期間，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火已經普遍地燒起來了，許多單位要求將與會者召回去進行批判、鬥爭，會議只得於6月27日宣布「暫時休會」。許多幹部對來勢洶洶的運動充滿恐懼，不敢回原單位。李雪峰說：「暫時回不去的，自己要求留下的都可以留下。」於是有一百多人留在北京飯店，繼續「學習、看文件」。但此後不久，留下的幹部即被各單位群眾陸續揪走。

毛澤東還親自對各地負責幹部進行動員和發動。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在運動初期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很不理解，他「首先搞不清楚的是，甚麼叫『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誰的『命』？」由揪鬥「黑幫」而掀起的「懷疑一切」、「橫掃一切」的惡浪達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在江蘇南京地區最先亂起來的南京大學，有人提出要將校長匡亞明戴高帽子遊街，還要轟走剛進駐學校的工作隊，搬掉「絆腳石」。江渭清覺得這無異於要擺脫黨對運動的領導，他對這樣的運動想不通，而且抵觸情

緒愈來愈大。就在這時，毛澤東要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打電話給江渭清，說：不要怕群眾起來「革命」，要進一步放手發動群眾，並指示他起草一個報告到大會上去講。江渭清回憶說：「我奉命組織人馬趕寫，然後送給魏文伯同志修改。魏老德高望重，我們都很敬重他，請他幫助把關，理所當然。但是，那時大會小會都在喊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誰能真的知道『底』究竟在哪裏呢？就像《紅樓夢》講的，『不知底裏』。毛主席當然也不會把『底』交給魏老。所以，魏老也不敢改定，只好送到北京，最後由毛主席親自審閱定稿。」7月7日，江渭清在南京五台山體育場召開的號稱有五萬人參加（包括收聽）的幹部群眾大會上作了題為〈高舉毛主席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廣闊、更加深入地開展起來〉的報告。報告除了宣講文化大革命是「最活最好的階級鬥爭的大學校」，「規模是這樣廣闊，聲勢是這樣雄壯，威力是這樣強大，發展是這樣迅猛，這是古今中外從來沒有的」，「世界革命人民特別是亞非拉人民，都在歡呼我國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之類所謂大好形勢之外，還講了「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批判舊世界」，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特點」。他要求各級領導同志「在革命群眾運動中不能怕亂」，要敢於打破「資產階級的秩序」。號召全省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幹部，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更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武器，「在階級鬥爭的大風浪中經風雨、見世面」，「把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一切資產階級霸佔的陣地統統奪回來」；「全省各級黨組織，堅決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放手發動群眾，站到運動的前面，站在群眾之中，積極地、大膽地領導運動」。²⁵筆者估計，經毛澤東親自做工作出來領導運動的地方負責幹部，決不止江渭清一人。

南京五台山大會以後，江蘇省的運動很快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據當時統計，省級機關65個單位有57個開展運動，貼出了40萬張大字報，包括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在內的一些部、廳級幹部被打成「資產階

²⁵ 詳情參見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517—519。

級代表人物」；許多科研單位的科技人員，被作為「反動權威」或「隱藏在機關內部的牛鬼蛇神」，進行批判。全省32所高等院校全部奪了權，648所高級中學和中等技校，都停課「造反」，其中僅南京的19所高等院校，被重點批鬥的就有404人。一些地、市黨政機關，也開始揭批當地的「黑幫分子」。全省正在進行「四清」的13個縣、280多個公社和650多個工交財貿單位，都轉搞文化大革命。²⁶

1 運動初期各地都整了哪些人？

在〈五一六通知〉之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按照〈通知〉精神，在當地開展了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各種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運動，許多人被點名批判。被批判的省級第一把手除了北京的彭真外，還有內蒙古自治區的烏蘭夫、河北省的林鐵。以下將運動初期各地省、市、自治區黨委決定點名批判一些領導幹部的情況列出。需要說明的是，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後來隨着形勢的發展，被批判的幹部名單要比以下所列長得多。僅以吉林省為例，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8月底，據統計，吉林省共批判、鬥爭2261人（省管幹部171人）。其中，停職反省175人（省管幹部38人），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92人（省管幹部24人）。²⁷

6月下旬，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平心、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總編輯李俊民、華東局前宣傳部長夏徵農等人被定為資產階級學者、專家，受到點名批判。

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工作會議期間，天津組即對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胡昭衡進行了揭發批判。8月初，天津市委決定：「因鎮壓十六中學生」，撤銷了市委組織部長馬瑞華的職務。

26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頁520-521。

27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吉林省委活動大事記（1966-1987）》（長春：內部出版，1990），頁19。

5月中旬，京劇《海瑞背纖》的作者徐菊華和電影《兵臨城下》的作者之一遼寧省文化廳副廳長、著名劇作家洛汀被扣上「文藝黑線在遼寧省的代表人物」的帽子，受到點名批判。6月，中共遼寧省委三屆五次全會揭發批判了以省委書記周桓為首的「遼寧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認定周桓是遼寧文藝界裏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一個主要代表。

7月5日，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擴大會議決定對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西藏日報》總編輯金沙在報紙上公開點名批判。10月4日，區黨委決定將何祖蔭、侯杰、金沙、智澤民、高立業、羅石生、張民魂、彭哲、楊殿甲等九人定為「走資派」，交群眾批鬥。從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經區黨委決定停職、批判的領導幹部有王其梅(自治區委書記)、郭錫蘭(自治區委常委)、惠毅然(自治區委常委)等。

6月15日，《新疆日報》發表經自治區黨委審查批准的署名「文先鋒」的文章，說《新疆文學》雜誌是「牛鬼蛇神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工具」，劉肖蕪、王玉胡、王谷林、鐵衣甫江、克里木·霍加等定為自治區文聯「反黨黑幫」。8月8日，《新疆日報》公布了經自治區黨委批准的把自治區文聯黨組書記劉肖蕪定為「反黨分子」，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對省委第一書記林鐵、省委候補書記裴仰山、省委常委胡開明等一批領導幹部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形成修正主義集團等罪名進行揭發批判。

中共河南省委撤銷了鄭州大學黨委書記、代理校長王培育黨內外一切職務，改組了鄭州大學黨委。《河南日報》點名批判了省社聯主席、鄭州大學副校長郭曉棠，將其打成「三反」分子。到10月上旬，包括省委書記處書記趙文甫、楊蔚萍，副省長邵文杰、彭笑千、張柏園，省委常委劉鴻文、劉晏春、宋玉璽、任雷遠在內的廳局長以上幹部129人被批判鬥爭，其中63人被罷官，11人被停職反省。²⁸

28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下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182。

中共吉林省委二屆十七次擴大會議(6月14日至26日召開)把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定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決定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在全省範圍內進行揭發批判。8月3日，省委常委會議決定撤銷吉林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的黨內外一切職務。9月，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省委書記處書記富振聲的問題。25日，省委機關召開幹部大會，對富振聲進行揭發批判。

6月上旬，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白、錢靜人，省文化局局長周村，副局長吳白甸，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孫叔平等陸續在報紙上遭到點名批判。省教育廳長吳天石及夫人李敬宜(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遭到殘酷批判，被迫害致死。

6月7日，《南方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全面系統地反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株大毒草——評秦牧《藝海拾貝》〉，批判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6月18日，《江西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以「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等罪名，對江西省政協副主席、省教育廳副廳長、江西大學副校長谷霽光公開點名批判。江西省文化局局長石凌鶴，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黨組書記、主席李定坤也被《江西日報》公開批判。谷、石、李三人先後被撤銷職務。

中共安徽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對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李凡夫進行批判，撤銷其省委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職務。

中共山東省委在擴大的二屆五次會議上，揭發批判了省委委員、副省長余修，將其定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省委還以「鎮壓革命群眾」、「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撤銷了山東師範學院主持黨委工作的副書記劉砥石和副院長劉明礪的職務。省委常委會議上決定撤銷省委宣傳部長王眾音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職務，對其進行審查。此後，王眾音受到批判。《大眾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了省文聯副主席劉知俠。

湖北省除了把李達、朱劭天、何定華打成武漢大學「三家村」外，還揭發出湖北省公安廳「三家村」，把省委常委、副省長陳一新，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曾惇，省委委員、省政協副主席劉濟蓀以及湖北省和

武漢市文化部門的一些領導人，作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報紙上點名批判、聲討。

6月15日，《廣西日報》上開始點名批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將他當作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人物和周揚在廣西的代理人。6月28日，《廣西日報》公布自治區黨委〈關於撤銷陸地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自治區黨委還將《廣西日報》總編輯鍾林定為廣西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的代表人物進行批判。

中共貴州省委二屆七次擴大會議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省委還將貴州省文教辦公室主任秦天真定為叛徒，進行公開批判和隔離審查，由此還株連了省委書記處書記徐健生的所謂「叛變自首」問題。

中共雲南省委在省委工作會議上決定，開展對《雲南日報》社總編輯李孟北和《雲南日報》副刊《滇雲漫譚》的公開批判；指責省委書記處書記高治國和省委宣傳部印發的〈關於學術討論的一些情況的意見〉有原則錯誤。6月2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批覆同意雲南省委並上報中央：同意雲南省委決定，夏雨（《雲南日報》副總編輯）、周鍾德（《雲南日報》副總編輯）停職交代。給李孟北、夏雨、周鍾德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帽子，並在報紙上對他們進行公開點名批判。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中共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李啓明等即在黨內受到批判和鬥爭，給他們強加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對民主革命補課」、「招降納叛，重用壞人」等罪名。省委常委馮基平（原北京公安局長）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被揪回北京，遭到殘酷迫害。省委常委劉子義於7月7日含冤去世。

中共甘肅省委對前省委常委阮迪民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堅等以「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罪名開展了點名批判。

中共浙江省委決定撤銷「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浙江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兼副校長劉丹的職務，並於6月24日在全省公開點名批判。同時，根據省委部署，在杭州大學開展批判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黨組書記、杭州大學前副校長林淡秋和著名宋詞學家、教授夏承燾等。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二次會議上，主要揭發、批判了原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吳生秀，原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劉震寰，原自治區黨委委員、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文教廳廳長楊辛。

7月25日，中共山西省委決定在《山西日報》上公開批判副省長王中青，此後《山西日報》多次批判王中青，給他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漏網大右派」等帽子。在省委指示下，8月5日，《山西日報》點名批判了山西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劉梅和山西大學秘書長宋華菁，指責他們犯了「壓制民主，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錯誤。8月6日，省委決定在《山西日報》上公開批判著名作家趙樹理。經省委同意，《山西日報》還點名批判了山西省文聯黨組書記、省文聯主席李束為，說他是「周揚黑幫的忠實走卒」、「不折不扣的修正主義分子」。

6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擴大會決定公開點名批判綿陽地委副書記（原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聯黨組書記李亞群、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四川省文聯負責人沙汀、《四川日報》總編輯李半黎、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部長程子健、作家戈壁舟等近三十人。

《重慶日報》刊登批判重慶市「繭、李、廖反黨集團」的文章，文章說：「《重慶日報》的《巴山漫話》，不是張黎群一人搞的，而是市委前組織部長繭澤寬、前副秘書長李止舟、前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廖伯康等人共同出謀劃策，合夥經營的。」中共重慶市委決定：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停職檢查，鄭的罪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8月2日鄭自殺身亡，8月3日，重慶市委宣布鄭是自絕於黨和人民，將其開除黨籍。7月6日，《重慶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第九期上穆欣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該文在註釋中公開點名批判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任白戈是周揚攻擊魯迅的「追隨者」和「國防文學」的「鼓吹者」，在重慶市引起了強烈反響。不久，任白戈以「請假檢查」名義離開了工作崗位。8月27日，重慶市委召開大專院校師生代表會議，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在講話中宣布罷了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的官。

6月11日，中共青海省委決定撤銷《青海日報》總編輯程光遠的職務，責令他深刻檢討。7月1日，青海省委批轉省委宣傳部〈對黃靜濤²⁹反黨活動及反動詩詞文章批判的安排意見〉。此後，《青海日報》發表文章批判黃靜濤的詩詞、文章。青海省委宣傳部、青海省文聯和青海人民出版社分別集會，揭發批判黃靜濤。8月15日，青海省委宣布撤銷青海大學黨委副書記任琛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6月8日，湖南省長沙市文化教育界開始揭發批判著名作家康濯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6月9日，東區區委召開大會，聲討康濯的「反黨」罪行。8月27日，經中南局批准，湖南省委宣布改組中共長沙市委，認為長沙市委在「8·19」事件中犯了鎮壓學生運動的「嚴重錯誤」，市委書記孔安民、王群伍、韓曙光，秘書長張惠民等被撤銷一切職務。

文革初期各地最先受到衝擊的大多為宣傳、教育、文藝等部門的領導人和專家、學者、學術權威。各地黨委在進行本地區文革運動部署的時候，都選擇了一批供群眾批判的對象。但運動開展起來以後，很快就突破了各地黨委原有的部署，各地黨委普遍被指責為「丟卒保車」、「捨車保帥」。運動中批判的範圍愈來愈大，被批判的人愈來愈多，「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一度成為最時髦的口號。

2 前門飯店會議

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尚未結束的時候，華北局即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了華北局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整華北局第二書記、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烏蘭夫。此前一個月，華北局就曾通知內蒙古自治區，說5月份召開工作會議。為給這次會議作準備，當時的華北局常務書記解學恭帶領幾位部長、主任到呼和浩特，找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的書記、常委們徵求意見，同許多人個別談話，了解情況，收集烏蘭夫的材料。這實際上是為5月前門飯店會議整烏蘭夫等人做了準備。

29 黃靜濤當時任中共青海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共青海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組書記。

前門飯店會議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主持，當時烏蘭夫正在北京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於是直接從會上趕來參加會議。內蒙古自治區來京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奎璧、王鐸、王再天、高錦明、權星桓、劉景平，常委吉雅泰、雷代夫、克力更，還有自治區有關部門、部分盟市、旗縣和「四清」工作團幹部等共143人³⁰。

李雪峰向會議傳達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5月18日關於防止政變問題的講話，使會議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會議期間，李雪峰兩次參加內蒙古組的全體會議並講了話。按照華北局布置的精神，內蒙古組的任務就是集中火力批判烏蘭夫。發難的依據是：早在1964年「四清」運動時期，曾在全區範圍內印發了〈對內蒙古人民的宣言〉。這個〈宣言〉是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以毛澤東的名義於1935年12月20日發出的，簡稱〈三五宣言〉。〈宣言〉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蓄謀已久的「滿蒙政策」，揭露國民黨政府在內蒙古地區設省置縣，搶佔蒙古民族的土地牧場，以消滅蒙古民族的罪行。〈宣言〉中闡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工農紅軍「要為解放其他弱小民族而鬥爭，首先就是要幫助解決蒙古民族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宣言〉主張內蒙古實行民族自治。前門飯店會議抓住「四清」運動中重印〈宣言〉這件事不放，給烏蘭夫上綱到搞「民族分裂」、「反黨叛國」的高度。

於是，烏蘭夫就成為前門飯店會議集中批判的對象。甚至連他在民主革命時期對牧區實行的一些正確的政策，也受到猛烈的攻擊和錯誤的批判。同時有人提出：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³¹，烏蘭夫當年為何不按反動黨團處理？這也為以後挖「新內人黨」埋下了伏筆。

30 這裏引用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六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中提供的數字（頁175），任亞平主編的《內蒙古自治區志·共產黨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一書中引用的數字是146人（頁222）。

31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原名為內蒙古國民革命黨，1925年10月成立，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是接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雙重領導的一個革命政黨。1947年5月，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後，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不再存在。

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代表中央與烏蘭夫談話，嚴厲批評了烏蘭夫。一是說他搞地方民族主義，二是說他不搞階級鬥爭。剛解放時，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是「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的政策，但對以後劃不劃階級，直到1965年國家民委還是有兩種意見，而烏蘭夫是不主張劃階級的，他的理由是：「（內蒙）不劃階級也發展了生產。」鄧小平說：「老黨員烏蘭夫變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劉、鄧指出：烏蘭夫「長期思想是右傾，站在李維漢一邊」。他們還指責烏蘭夫玩小名堂，耍手腕，搞兩面派，「積累那麼一大堆問題，相當惡劣了」。³²

前門飯店會議上，烏蘭夫被迫一次次地做檢查，到1966年7月13日已經做了四次檢查。從6月7日到7月20日用了四十三天的時間揭發批判烏蘭夫，除了小組會外，中間先後開了八次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常委會，六次有各盟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型會議，十六次全體會議。前門飯店會議後，內蒙古軍區開展了對司令員兼政委烏蘭夫的揭發批判，以後又「揪鬥」了軍區第一副政委吳濤、軍區副司令員孔飛、副政委廷懋、副參謀長塔拉和政治部副主任鮑蔭扎布。

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銷了烏蘭夫華北局第二書記、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職務，任命解學恭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從此，名義上還保留着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職務的烏蘭夫就被監護在北京，不准返回呼和浩特。華北局在給中央的〈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中，給烏蘭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三頂大帽子，劃入了敵我矛盾的範圍。隨之，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處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奎璧，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區黨委統戰部部長吉雅泰，書記處書記畢力格巴圖爾，還有一大批蒙古族幹部受到牽連，被打成了「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成員。

在前門飯店會議上，還對華北局第三書記、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進行了批判，指責河北省委對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動」，「妥協情況很濃厚，蓋子揭不開」，並取消了林鐵領導河北組會議的資格。劉少奇、鄧小平在會議期間與林鐵進行了個別談話，對林鐵進行了批評。

32 劉少奇鄧小平同烏蘭夫的談話記錄（1966年7月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月24日至7月15日，由華北局主持召開中共河北省常委擴大會議，河北省地、市、縣黨委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對省委第一書記林鐵、省委候補書記裴仰山、省委常委胡開明等一批領導幹部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形成「修正主義集團」等罪名進行揭發批判。中共河北省委就林鐵所謂錯誤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8月25日，中共中央華北局通知：中共中央8月16日批准，撤銷林鐵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華北局第三書記職務，劉子厚接任省委第一書記兼任河北省省長、河北省軍區政委。

在前門飯店會議上，天津市委書記、市長胡昭衡和山西省委書記袁振也都受到了批判。

李雪峰晚年曾就前門飯店會議寫過如下一段文字：

華北會議從1966年5月23日召開，到7月20日結束。自傳達〈五一六通知〉後，按地區分的各省（市、區）會議，在當時大環境的影響下，就都鬧起來了。除北京早就在批判彭真、劉仁同志外，內蒙古批判烏蘭夫同志，河北批判林鐵同志，山西批判袁振同志，天津批判胡昭衡同志。各省搞得焦頭爛額。會議是華北局召開的，是華北局領導的，會議發生的錯誤，華北局都負有領導責任。當然，發生錯誤也都與文化大革命這種大環境有關。這個會議中央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了。華北局在會議期間不斷向中央匯報了情況，中央兩位主要負責同志一起先後找被批判的烏蘭夫、林鐵同志個別談話，指出「問題」，批評了「錯誤」。

華北會議開完後之後，以華北局名義，由各省起草，給中央寫了報告。報告中對一些省市區負責同志的「錯誤」，難以實事求是，對他們的批評過頭。當時，我對一些問題也看得重了一些，傷了一些同志，我深感歉意。會議後來鬧得有些失控。說到底，這次會的錯誤是華北局領導的失誤，我要負責。但是，說我奪了華北地區五省市區的權，沒甚麼道理。我作為中央任命的華北局第一書記，中央已給了我這個領導權，我還奪甚麼？我們處在「皇城腳下」，我也很難辦。可是最後同志們都不諒解，我也只好自

省、自責，深表遺憾了。而我自己呢？被整的程度在一些方面比這些同志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又能怨誰呢？³³

3 「五七指示」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開會後的第三天，毛澤東看了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

總後勤部的報告說，從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這本來只是一份誇大部隊農副業生產成績的普通報告，毛澤東看了卻很高興，他借題發揮，用給林彪寫信的形式，描繪了自己心中理想社會的藍圖，他要以此告訴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批判和砸爛「舊世界」之後，建設一個甚麼樣的「新世界」。³⁴

毛澤東在信中說：

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

33 李丹林：〈非常歲月中的父親李雪峰〉，《中華兒女》，2002年第7期，頁42。

34 毛澤東在1967年「五一」節前夕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黨在1949年、1950年、1951年這三年當中，群眾是擁護我們的，是尊重我們的。因為當時是艱苦樸素的，吃小米，住帳篷。當時剛打完仗，還有飽滿的革命熱情，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1952年以後，情況就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我們的幹部在群眾當中開始受冷落。當時，在幹部當中實行了薪金制，軍隊住了營房，機關蓋了高樓大廈，過去和群眾在一起吃、穿、住，現在有些脫離群眾了。為甚麼會這樣？就是沒有聽我的話。劉少奇、高崗、彭德懷學習了蘇聯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贊成的。學習蘇聯那一套我也是不贊成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變過來。

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

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³⁵

毛澤東心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的、在分配上大體平均的社會，是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小而全的、封閉式的社會，是一種打着毛澤東印記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1958年提出「三面紅旗」以來，毛澤東一直嚮往、憧憬、執著地追求這個「新世界」。毛澤東一生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他的理想社會也是以馬克思的話為根據的。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中的一切是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前提的，毛澤東恰恰忽視了這個最重要的前提。於是，就只能回到沒有分工、沒有商品的自然經濟和沒有差別的平均主義相結合的道路上去了。

5月14日，毛澤東就此信批示林彪：「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發中央軍委以及此次會議，讓他們帶回去，加以討論，如無意見，即可執行。印時，要請中央加個批語。請你酌辦。」第二天，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和總後勤部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批語說：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3—54。

中央認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這一思想，不僅對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可能的進攻，加強國防、貫徹人民戰爭思想方面，具有偉大的戰備意義。³⁶

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過的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並加以闡發。社論說：1966-39 = 1927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促進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按照毛澤東同志說的去做，就可以實現全民皆兵，……按照毛澤東同志說的去做，我國七億人民就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他們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就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4 鄧拓、田家英之死

5月18日凌晨，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在家中服安眠藥自殺。

鄧拓當《人民日報》社總編輯時，曾因發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等幾件事而引起毛澤東的不滿，被毛澤東說成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鄧拓被調離《人民日報》社。³⁷

³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5—56。

³⁷ 鄧拓有一枚圖章，上面刻着「書生習氣不可無」，後來被批判為「抗拒毛主席的批評」。

5月1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5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文中宣稱：「鄧拓是一個甚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混進黨內，他偽裝積極，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擔任了《人民日報》的重要職務。」此文一出，原存在鄧拓心中能為自己討還清白的一線希望破滅了。在鄧拓眼中，黨報此舉無異於給自己下達了最後的政治結論。

在此前後，市委派人到他家收走了供黨內高級幹部閱讀的《參考資料》。在全國上下都在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的形勢下，鄧拓把這本《參考資料》當成一種象徵，一種黨仍然把他當成自己人的象徵。現在這個象徵也不復存在了。

5月17日深夜，鄧拓滿懷悲憤地給彭真、劉仁寫信，表明心跡。他寫道：

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鄧拓用了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的背景與不足，竭力表白自己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例如，他解釋道，〈說大話的故事〉原是聽到當時有些農村又有買賣婚姻和謊報產量的現象，不是反對大躍進，攻擊總路線；〈一個雞蛋的家當〉原是有感於當時有些社隊又在搞投機買賣和剝削行為而寫的批評，不是「要糾集牛鬼蛇神起來推翻我們的黨」。鄧拓說：「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171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甚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進入5月以來，報刊上批判鄧拓的文章鋪天蓋地，但都不能令他服氣，對於有關批判文章中的不實之處，鄧拓要求予以澄清。他寫道：

這幾天報上刊登的我在《北京日報》座談會上的談話，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半工半讀開學儀式上的講話等等，有一些重要地方與原話有出入。比如，我不只在《北京日報》座談會上，而且在別的會上講話中，都一再地說，聽黨的話，我從來認為就是要聽毛主席的話，聽中央的話，不是我們這些人或者別的甚麼人可以把自已的話當做黨的話，要大家聽，而是要大家把我們說的話，和毛主席、黨中央的話對照一下，哪些地方我們說錯了，不符合毛主席和黨中央的精神，大家就要提出批評。因此，我希望那樣記錄應該好好地查對一下。

鄧拓最後向組織上解釋了自己為甚麼要去死：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我在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對於鄧拓的死，李洪林指出：「曾經寫出『莫謂畜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鄧拓，應該不是軟弱之輩。再從他在《燕山夜話》中表現的清醒頭腦和深刻見解看，他也決不會愚忠到如此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遺書中他竟充滿激情地高呼『萬歲』，實在使人感到悲哀。」³⁸ 此話雖然不錯，但稍嫌刻薄。李洪林也是過來人，應該知道鄧拓這些話大半是為了妻子兒女少受牽連而不得不說的。

鄧拓在給妻子丁一嵐的遺書中寫道：

38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頁191。

你和孩子們離開我是對的，同樣，我不能讓你們再跟在一起了。盼望你們永遠做黨的好兒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革命到底，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奮鬥到底。我因為趕寫一封長信給市委，來不及給你們寫信。此刻，心臟跳得很不規律，腸疾又在糾纏，不多寫了。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永別了，親愛的。

這封遺書用了十三年的時間才到達丁一嵐的手中，那已經是在1979年中共中央為鄧拓平反之後的事了。

5月18日早晨，丁一嵐發現丈夫去世後，首先想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懼。丁一嵐回憶：

我當時也不敢失聲痛哭，家裏還住着警衛員呢。鄧拓臨死之前，放在桌上一個信封，裏面裝的好像稿紙，上面寫着讓我立即給這個東西銷毀。我看見這個信封，讓我馬上銷毀，哎呀，那時候我都想不出該怎麼辦，又怕驚動了警衛員。那時，鄧拓的姐姐在我們家裏，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她叫起來。我說，現在有這麼個東西，要馬上銷毀，然後，我們倆就噉哩喀喳地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廁所，還有澡盆裏，拿水沖掉了。當時不敢燒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沒看看銷毀的是甚麼，是稿紙，那麼一疊，字都朝裏，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衛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所以，我後來一直不知道銷毀了甚麼東西，我想來想去，我幫他銷毀的這個東西可能是他遺書的底稿。你說我怎麼就那麼馬虎，沒有看一眼就銷毀了呢？我一直為這件事責備自己。³⁹

39 任捷：〈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對鄧拓夫人丁一嵐的訪談〉，《南方周末》，1999年6月25日。

鄧拓死後，市委又來人抄家，說按黨的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鄧拓之死被要求絕對保密，丁一嵐告訴子女，他們的父親因病住院了。一直到兩年以後，子女們從社會上得知鄧拓已死的消息，找母親來證實。丁一嵐在請示了北京市委之後，才敢向子女們說出真相。

5月23日上午，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在毛澤東的書房內的屏風後面懸樑自盡。在田家英的口袋裏，發現了用紅色鉛筆寫的遺書，文字並不太多。現在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⁴⁰

就在前一天下午，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為組長，王力、戚本禹為成員的中央三人小組來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安子文說：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現在宣布，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田家英與楊尚昆關係不正常，要做檢查，中央認為田家英思想一貫右傾，決定田家英停職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辦秘書室（即後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的工作由戚本禹負責。田家英問：關於編輯毛選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說，統統交。

接着就開始清點田家英處的文件，然後全部帶走。田家英憤恨地對妻子董邊說：「我的問題是陳伯達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業業十八年，落得如此下場！」

田家英是一個書生氣很濃的才子。從1948年開始給毛澤東當秘書，前後共十八年時間，有一個從被毛信任、重用到不信任、「搞掉」的過程，轉折點在1962年的「包產到戶」問題。1965年底，在整理毛澤東談話記錄時，田家英反對將《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的話寫進記錄，被江青等人加上「篡改毛主席談話記錄」的罪名。1966年5月9日，陳伯達即急急忙忙地跑到馬列主義研究院去點火，鼓動揭發田家英。田家英對毛澤東態度前後也有變化，從敬佩、崇拜到逐漸產生疑問。1959年廬山會議時，田家英就對李銳等人說過，如果允許他離開中南海時，想給毛提三條意見，最後一條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

40 王凡：〈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的最後歲月〉，《新聞自由導報》，2004年，第204期。

1963年以後，田家英曾多次對逢先知說過這樣的話：「我對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這樣搞下去，總有一天要分手。」⁴¹ 據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田家英是黨內極個別的敢於當面批評毛澤東的人。

5月23日上午8時許，田家英與在中央辦公廳上班的好友何鈞還有一次最後的談話，何鈞清楚地記得田家英當時說的一句話：「士可殺不可辱。」

田家英的妻子董邊也是位老幹部，當時任《中國婦女》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受田家英的牽連，她也遭到了迫害。1966年8月25日，毛澤東為《中國婦女》雜誌題寫刊名，《人民日報》於頭版發了消息，文中點了董邊的名：「揪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分子董邊，罷了她的官，奪回了這個宣傳陣地。」

5 首都工作組

毛澤東在1966年5月中旬，也就是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期間，提出了加強首都警衛工作、保衛首都安全的問題。毛澤東在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並非毫無顧忌，他對打倒彭真後的北京市的情況很不放心，甚至不敢輕易從外地回北京。據吳德回憶，當年5月下旬他從吉林調北京工作後，葉劍英對他說：「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⁴² 周恩來在1967年初的一次談話中也說到：「羅瑞卿的問題被林副統帥揭發出來，後來彭真的問題也揭發出來了，首都安全問題也被提出來了。主席上半年沒回來，就是因為不安全。」⁴³

5月15日，遵照毛澤東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來、葉劍英聯名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問題寫報告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

41 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載董邊、譚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84。

42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5。

43 周恩來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談話紀要（1967年1月2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組成以葉劍英(中央軍委副主席、軍委秘書長)為組長，楊成武(代總參謀長)、謝富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為副組長，劉志堅(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李雪峰(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汪東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鄭維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傅崇碧(北京軍區副司令員)、萬里(北京市副市長)、蘇謙益(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參加的首都工作組⁴⁴，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主任由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擔任，副主任由雷英夫(總參作戰部副部長)、史進前(總政保衛部部長)、于桑(公安部副部長)擔任。

首都工作組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強中南海的安全工作。周恩來說：「步驟是首先從中南海開始，楊尚昆在中南海搞了廿多年的警衛，中南海首先是不安全的，我們用了兩個月時間，先把中南海的問題解決了。」⁴⁵

5月18日，周恩來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進行部隊調動事，與楊成武和北京軍區協商，並書面報告毛澤東，提出：擬調六十三軍駐石家莊的一八九師和六十五軍駐張家口的一九三師來北京擔任衛戍任務，衛戍司令由傅崇碧擔任。部隊到後，將對在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保衛任務重新調整。毛澤東閱後批：照辦。⁴⁶

5月26日，葉劍英主持召開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出席。會議研究和決定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當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周恩來在會上宣布傅崇碧為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他在講話中說：首都衛戍工作，既要抓緊，又要走穩，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頭腦要清醒，不能急，

44 周恩來說：「根據主席指示，林總提議成立一個北京工作組。」參見周恩來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談話紀要(1967年1月2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5 周恩來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談話紀要(1967年1月2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1—32。但實際上，後來一九三師並未調入北京，二十四軍的機械化師七十師調入北京。

一急就容易被壞分子鑽空子。首都衛戍工作牽連全局，必須把形勢觀察好。反革命畢竟是少數，我們掌握着大權，有槍桿子，軍隊是可靠的。會議決定：如遇有緊急情況需調動衛戍部隊，周恩來不在時可報鄧小平。31日，周恩來將會議情況及有關部署報告毛澤東。⁴⁷

6月3日，首都工作組和北京軍區在京西賓館召開了有總理、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院校以及北京軍區負責幹部參加的衛戍區部隊營以上幹部會議，周恩來主持了會議。會上宣布了中央軍委關於北京衛戍區擴編的命令。葉劍英在會上講話指出：為了保衛首都的安全，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加強首都衛戍部隊，在原來部隊的基礎上，增加到三個師另一個團。這幾個部隊各有特長，有的熟悉警衛勤務，有的善於野戰。為了把任務完成得更好，你們應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同時，還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要向全體同志講清楚，這種調整是必要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保衛首都的任務。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在會上講話說：衛戍部隊的任務按總理和首都工作組以及葉帥的指示辦。

當時決定把二十四軍最強的機械化師七十師調北京，成立警衛第三師；把六十三軍的一八九師調來，成立警衛第四師。擴編完成後的北京衛戍區共有四個師另一個團，每師六個團，加上一個獨立團，一個軍樂團，一個幹部大隊，級別為兵團級。據傅崇碧回憶：「中央開會，大軍區司令、政委、省委書記一級的人參加，衛戍區司令政委也都參加。那時候發到衛戍區的文件比軍區的還要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衛戍區人數達到十萬多人。後來根據葉劍英的指示，在高碑店的一一二師、在天津的一九六師、在宣化的一九三師，必要時也可以由北京衛戍區直接調動。

北京衛戍區擴編後，第一件事是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清理整頓首都治安，以保證黨中央的安全。衛戍區重新制定了首都安全方案，清除不安全的隱患。首都工作組提出了對衛戍區部隊的部署調整和整編安排：

4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3。

- 一、6月10日前完成保衛重要目標的衛戍部隊的部署調整；
-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師、團幹部及擔負保衛重要目標的連隊的幹部調配；

三、6月中旬大體完成所有衛戍部隊的調整。

6月3日，周恩來對首都工作組上報的首都警衛部隊部署調整方案批示：「同意這一報告中所提的警衛部隊的部署調整方案，請即組織實施。望在四天內將部隊部署和調整具體落實，並將營連的駐地和機動兵力駐地繪圖送閱。其他三事均同意。」⁴⁸

6月5日，周恩來就中南海、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問題約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汪東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李質忠、童小鵬(兩人均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談話，作具體布置和指示。

6月6日，周恩來就派人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外圍巡邏事批告首都工作組：特別要注意有無外國領事館人員、外國記者帶照相機進入校內，但絕對不要阻攔，由兩校自己勸阻他們進入校內。

為應付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混亂局面；消除可能出現的不安全隱患，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於6月15日聯合發出〈關於在首都進行槍支彈藥登記管理的通知〉。

首都工作組成立於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它做了一些有關首都安全方面的部署工作，開了一兩次會。隨着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形勢的迅速變化，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工作千頭萬緒，毛澤東和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出現的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上。首都工作組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此後首都工作組的工作便再也沒有提到日程上來，以後便不了了之。

6 中央文革小組

〈五一六通知〉規定：「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為了成立這個小組，中央要求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和各中

⁴⁸ 參見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178—180。

央局提出適當人選（主要在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領導幹部中考慮）。中央機關提出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尹達，軍隊系統提出了劉志堅、謝鐘忠⁴⁹，中南局提出了王任重，華東局提出了張春橋、姚文元⁵⁰。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鐘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⁵¹確定後，另行通知。⁵²

〈通知〉下達後，中央文革小組並沒有馬上成立，原因是毛澤東不同意名單中的王力，說他是「彭真的人」⁵³。可是康生、陳伯達認為過去的秀才班子一個不留，不好辦事，從起草文件到印刷整個過程，新來的人都不熟悉，所以他們都主張留一個王力。他們請江青向毛澤東談，說「要留一個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張、姚、關、戚都是響噹噹

49 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一書中說，劉志堅、謝鐘忠是葉劍英提名的（頁24）。王力在《王力反思錄》（下冊）一書中說劉、謝是林彪提名的（頁599）。

50 華東局原來提的是楊永直，後經江青、張春橋力薦，改為姚文元。

51 此後不久，華北局提出了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東北局提出了鄭季翹（中共吉林省委文教書記），西北局提出了楊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西南局提出了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部長）。他們後來參加了幾次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但中共中央並未發通知確認他們四人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52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6。

△ 53 1964年彭真曾向毛澤東建議，讓給中央常委做秘書工作的王力列席中央常委會，並稱王力是優秀幹部。

的左派)」。毛澤東最後同意王力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會是在1966年6月中旬於上海召開的。

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⁵⁴ 8月26日，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宣布，唐平鑄、胡痴、謝富治、汪東興、周榮鑫、曹軼歐列席中央文革小組會。⁵⁵

中央文革小組的出現是一個奇特的現象。一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不是通過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部門和黨所領導的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來組織領導，而是通過這樣一個基本上是由秘書、秀才一類人組成的小組來實施領導，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周恩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產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執行了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對中央文革小組給予了正式的評價：「全會認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戰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個時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講話，都是正確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⁵⁶

1962年以後，毛澤東出於對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日益不滿，愈來愈感到傳統的領導體制不能夠真正貫徹他的意志和要求。文革前幾年他就經常不參加政治局的會議，並多次說北京的空氣不好，說自己不看《人民日報》，指責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他要來一場大變革，以徹底杜絕國家體制的官僚化和整個黨改變顏色的危險。文革之初，毛澤東即說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必須組織、發展無產階級左派

5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07。

55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六卷，頁61。

5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221。

隊伍，並且依靠他們發動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⁵⁷ 中央文革小組就是毛澤東親自組建的最得力的左派隊伍。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從本質上來說，是毛澤東要用自己的秘書班子來對抗傳統的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⁵⁸ 起初是奪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到1967年2月以後，更是逐步全面地奪取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權力。

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用來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工具。它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周恩來所說的，直接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也就是說，中央文革小組是由毛澤東所直接掌握控制、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志行事的特殊機構。小組成員中有不少人原來是默默無聞、地位很低，轉眼之間飛黃騰達，成為口懸天憲、紅極一時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中，自身處境也是跌宕起伏，極不穩定的。到九大召開之時，小組十四名正式人員中有九人被淘汰出局，下場很慘；但所剩五人（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全部進入中央政治局，成為最高領導層的成員。

57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九期發表的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中，在「毛主席教導我們」後面引用了這句話。《人民日報》7月3日轉載了這篇社論。

58 據王毅在〈「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文化基因〉一文中說：「毛澤東通過自己的秘書班子而與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相抗衡並非偶然，早在他熱衷的合作化運動中，由於負責農業的一些領導人被認為是拖運動後腿的「小腳女人」，所以他在〈關於農村合作化問題〉中對之提出嚴厲的批評。『而這篇講話是在他無視某些地位極高的同事們的看法以及黨的農村工作部的計劃的情況下發表的。它越過中央官員，直接向省級領導人發出呼籲，……為了保證省級領導人不受中央農村工作部觀念保守官員的限制，他在1955年夏天將兩名久經考驗的助手安插到該部擔任副部長。這兩個人是他以前的秘書陳伯達和陳正人。』」（《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12月號，頁57）另外，在毛澤東對李富春領導的國家計委感到不滿意的時候，他也採取了將陳伯達安插到計委擔任副主任的辦法。王毅還認為，毛澤東擢用江青、陳伯達、戚本禹等親幸的政治秘書而組建中央文革，並借助他們發動和運行文革的原因，在於他對建國以後中共和國家常規權力體制愈來愈強烈的敵視，在於他愈來愈不能忍受自己的意志經常受到這套體制的制約。因此他不僅需要在這個體制之外，建立一個完全以執行自己意志為目的的政治工具和權力組織，而且需要以此為殺手鐮向與自己為敵的國家權力體制造反。

7 軍隊的動蕩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的大背景下，中國人民解放軍也處在動蕩之中。

首當其衝的是部隊文藝工作者。前面已經說過，在全軍創作工作會議上，即有好幾十位文藝工作者受到了批判。以後全軍各大單位又都相繼召開類似的會議，批判和鬥爭了一大批軍隊的文藝工作者。

5月25日，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執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提出：運動要在全軍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規定軍隊的文化革命限於「五界」（即〈五一六通知〉中所說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提出要「着重抓好宣傳、文化、報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門的文化革命」，規定：對於要點名批判的，包括報刊上公開批判和在內部批判，都應經黨委批准。6月15日，中共中央又轉發了總政治部〈關於部隊開展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運動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報告中繼續肯定「在邊防部隊和師以下的戰鬥部隊中，着重進行正面教育」，強調軍隊「負有保衛文化大革命運動，保衛國家安全，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必須嚴守崗位，保持戒備，統一指揮，防止混亂」。一方面要接受和執行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另一方面又想保持部隊的穩定，而這兩方面又是很矛盾的，軍隊的動蕩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軍隊的動蕩，首先反映在海軍和空軍這兩個軍種。

海軍內部的矛盾由來已久，自1962年4月，深受林彪賞識的李作鵬、張秀川調到海軍工作開始，他們與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政治委員蘇振華之間的爭鬥就沒有停止過。1966年5月27日，海軍黨委三屆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李作鵬等人控制了會議，他們將矛頭對準蕭勁光和蘇振華，批判他們在海軍執行了「羅瑞卿路線」。蕭勁光拍案大怒，中途退場。⁵⁹ 後來，蕭、蘇多次檢討均過不了關。7月2日的會議簡報上反映，「有三個小組提出蕭、蘇是批判重點，要王宏坤（時任海軍副司令員）出來領導會議」。這實際上是公開提出了撤換領導的問

⁵⁹ 詳情可見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256—258。

題。一個副司令員，一個政治部主任，兩人聯手操縱黨委全會，抓住黨委的第一、把手的某些缺點錯誤，往死裏整，甚至想通過會議罷官、奪權，這種做法極不正常。

原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精明強幹，但個性太強，有時對部下過分嚴厲，得罪過不少人⁶⁰。羅瑞卿被打倒後，有些人借機把劉與羅聯繫起來批判。1966年5月，劉亞樓的後任吳法憲在空軍政治部機關副處級以上幹部大會上帶頭揭發劉的「錯誤」，要求空軍各單位「揭蓋消毒」。當時，總政治部下發的批羅文件中也點了劉亞樓、梁必業（總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的名字。6月6日，空軍黨委在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舉行三屆十一次全會。有些人在批劉的同時，把矛頭對準了吳法憲（空軍司令員）和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認為他們在劉生前跟得很緊，無原則地吹捧，負有重要責任。空軍黨委七名常委聯名寫信⁶¹，向軍委告狀，表示對吳、余的不信任。當時，空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張廷發受到揭發批判。⁶²

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反對李作鵬等人在海軍發難整肅、蘇，搞罷官奪權，同樣也反對在空軍對吳、余搞罷官奪權。7月3日，葉劍英打電話給蕭勁光，提議會議休息一天，重新印發毛澤東1963年對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的批示「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煥發精神，努力工作」。當天葉劍英還分別給林彪、鄧小平打電話，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意見。7月4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海、空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問題。周恩來、鄧小平、陶鑄、賀龍、聶榮臻、陳毅、葉劍英參加了會議。以下是鄧小平親自記錄的會議情況：

一、黨絕對不能允許搞地下活動。劉少奇特別指出，犯錯誤，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錯誤，搞地下活動是第一位的錯誤。應

60 劉亞樓於1965年5月7日病逝。

61 當時空軍黨委共有常委十一人，除吳、余外，其餘九人為：王秉璋、成鈞、劉震、曹里懷、譚家述、常乾坤、徐深吉、張廷發、王輝球，沒有參與寫信的兩個人，一人可能是當時正遭批判的張廷發，另一人待查。

62 參見何廷一：〈江青為何點名打倒我〉，《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頁52-56。

該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公開講自己的意見，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二、蕭勁光、蘇振華、吳法憲、余立金四同志，已經進行了自我批評，不夠的，以後還可以再講。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這個機會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黨委全會和黨委擴大會議這種方式撤換領導的做法是錯誤的。⁶³

7月7日，賀龍主持召開軍委常委會議，集中討論解決海軍的問題。葉劍英在會上發言說：「要是按照這種搞法搞下去，就是要把蕭、蘇搞成黑幫分子。是黑幫分子就要罷官。而且包括有人公開提出蕭、蘇是批判的重點，應該由王宏坤同志來領導這個會議，這樣蕭、蘇還能當司令員、政治委員嗎？蕭、蘇罷官這意味着甚麼呢？後來又會怎樣呢？請同志們好好想想吧！」7月8日，葉劍英到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常委會議精神，扭轉了會議的方向。

7月11日，賀龍又主持軍委常委會，集中討論解決空軍問題。會後，還是由葉劍英到空軍黨委全會上去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常委會議精神。葉劍英對空軍寫告狀信的常委進行了批評，並傳達了林彪關於空軍的意見。林彪認為：空軍黨委全會上有些同志「抓死人，整活人」，是「犯了反黨性質的錯誤」，暫不做組織處理，留任原職，以觀後效。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全會結束，宣布張廷發停職審查，其他常委照常工作。就這樣，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常委出面解決海軍、空軍領導層的矛盾，儘管未從根本上解決，總算暫時緩和了下來。

1965年11月15日，軍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蕭向榮被停職審查。蕭向榮停職後，由軍委副秘書長、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兼軍委辦公廳代主任，調國防科委副主任路揚為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在

63 范頌：〈葉劍英「文革」風雲錄（之一）〉，《中華兒女》，2000年第11期，頁12。

1966年3月召開的批判羅瑞卿的京西賓館會議上，蕭華在發言中除了批羅之外，還點名批判了劉亞樓、蕭向榮和梁必業。他說：「我們對劉亞樓同志的看法是一分為二的」，「劉亞樓同志是個極端個人主義者，也有個人野心，當了羅瑞卿同志的工具」。「還有蕭向榮同志，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在羅瑞卿同志的包庇慫恿下，幫助羅瑞卿同志幹了很多壞事」。「梁必業同志和羅瑞卿同志的關係也是很正常的」，「梁必業同志跟羅瑞卿同志跟得很緊，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和羅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

1966年2月，在總政治部黨委擴大會上，對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進行了批判，指責他的罪名是「積極支持羅瑞卿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同羅瑞卿勾結在一起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5月上旬，宣布撤銷梁必業黨內外一切職務。梁被降職分配任南京軍事學院副院長（未到職），半年以後撤銷了南京軍事學院副院長的任命，決定讓梁到總後所屬育南馬場任副場長，由行政六級降為八級。6月2日，總政治部發出通知，將〈關於總政治部整頓機關和梁必業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印發到全軍師以上單位，口頭傳達到團一級黨委。6月17日，總政治部秘書處發出〈關於今年清理銷毀《工作通訊》的通知〉，要求將總政編印的《工作通訊》第191期以前的，凡是由羅瑞卿、梁必業簽發的文件一律銷毀，「文件中提到彭真、羅瑞卿、梁必業名字的，或有他們講話內容的，一律塗掉或剪掉」。⁶⁴

8月下旬，總參機關內發生了「八二五事件」。8月22日上午，總參謀部黨委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由代總長、黨委書記楊成武作了機關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報告以後，下午通信兵部就有人到總參機關所在的旃壇寺大院貼大字報，說楊成武的講話是壓制革命運動。隨後，總參的一些部、局，也貼出一批大字報，其矛頭大部分是對着總參領導的。8月25日，毛澤東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原定由國防部外事局局長潘振武擔任接見時的引見人。後因外事局的一部分人對潘有意見，提出不讓潘當引見人，後根據楊成武的意

64 梁必業：《我在人民軍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頁356—363。

見沒有讓潘當引見人。外事局的這部分人得知潘未參加毛澤東的接見活動後，立即貼出標題為〈特大喜訊〉的大字報，並在大字報上點名批評了楊成武和負責外事局工作的副總長。當天下午，外事局的一些人還集合隊伍到總參黨委開會的地方，質問楊成武，同時向總參黨委提出抗議。他們聲稱毛主席親自支持了外事局革命群眾的要求，同意不讓潘振武參加接見活動，楊成武壓制群眾罪責難逃。解放軍測繪學院院長劉清明等貼出了批判楊成武的大字報。賀龍辦公室工作人員貼出了題為〈炮打總參辦公廳黨委〉的大字報。總參作戰部也貼出了題為〈炮轟楊成武〉的大字報，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在大字報上簽了名。在此之後，總參機關內又陸續出現了一批揭發、批評楊成武的大字報。

周恩來知道總參發生了針對楊成武的事件後，非常生氣，於26日親筆寫了一紙證明寄到總參黨委，為楊成武洗刷罪名。周恩來的證明原文是：

楊成武同志轉告總參謀部各部、局黨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時，楊成武同志向我反映，總參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參加接見。楊成武同志同意這一要求，並向我建議不讓潘振武同志參加接見，我同意他的意見，並於事後報告了主席。可將這一情況轉告有關同志。

周恩來 1966.8.26

另外，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也於8月27日為此事寫了證明材料。總參黨委將周、徐的證明材料公布於眾，許多群眾感到受到欺騙，又將矛頭對準外事局批判楊成武的那些人。⁶⁵

8月30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召開會議，對此事作了指示。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在講話中指出，王尚榮、雷英夫

⁶⁵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黨史博覽》，1999年第9期，頁21—22。

的做法是錯誤的。他說，楊成武有甚麼缺點，你們有甚麼意見可以提，但不允許這麼搞。王、雷二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王尚榮是賀龍的老部下，林彪斷定這是賀龍要篡軍，要奪總參的權，並報告了毛澤東。林彪又召開軍委常委會，以穩定總參機關，保護楊成武在總參的領導地位為由，提出要將王、雷二人撤職。林彪的意見得到了與會人員的認可，會上決定撤銷王、雷總參作戰部正、副部長職務，並令其交代問題。隨後軍委給各大軍區和軍兵種發電，宣布此事，並要求各單位對王、雷進行揭發、批判。

炮兵機關運動剛開始，炮兵政治委員陳仁麒為了保自己，轉移鬥爭目標，就搞小動作，支持炮兵機關一些人貼司令員吳克華、副司令員蘇進、參謀長廖鼎祥和副政治委員歐陽毅等人的大字報，誣陷吳克華「幹反革命」，誣陷蘇進是「老牌三反分子」，誣陷歐陽毅同「反黨分子羅瑞卿關係密切，歷史上是張國燾路線者」，妄圖把火引到這幾個人身上，搞成運動的重點。⁶⁶

三 「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5月25日下午二時，北京大學校園內大飯廳的東牆上貼出由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署名的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大字報。⁶⁷ 大字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黨委副書記彭珮雲，說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義，並說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66 參見歐陽毅：《歐陽毅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361—362。回憶錄中沒有點名，只稱「某負責人」。

67 九年前，即1957年的5月19日，也在這面牆上，貼出了歷史系「一些團員和青年」的大字報。這是北大在開始整風後出現的第一張批評性的大字報，內容是質詢校園委：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團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如果有，代表是如何產生的？

在大字報上署名的七人中，聶元梓是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趙正義是系黨總支副書記；其餘五人都是中共黨員、該系教員（其中的楊克明在此前不久調到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工作）。這些人在北大社教運動後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與校黨委存在着很深的隔閡。 /

1964年夏季到1966年初，北京大學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磐石為首的社教工作隊，從政治上否定了北大黨委的工作，斷言北大黨委的方向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方向，認為北大幹部隊伍嚴重不純，準備在北大搞奪權，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遭到批判。在運動中，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帶頭批判陸平等。不少青年教師響應社教工作隊的號召，積極批判校黨委。北京大學黨委的上級領導機關北京市委不同意社教工作隊的作法，竭力維護北京大學黨委。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會議上批評了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接着，北京市委幫助陸平推翻了社教工作隊的結論。3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也批評了北京大學的社教運動，中央書記處決定撤銷張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隊隊長職務，改組工作隊領導班子，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任工作隊長。此後，張磐石受到批評，離開北大。北京市委又召開北大的幹部和積極分子會議，統一認識。原來追隨工作隊的社教積極分子中不少人也受到了批評。這次會議是在北京飯店舉行，歷時半年左右，被稱為「國際飯店會議」。1966年1月，北京大學的社教試點宣布結束。

5月14日，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論小組派出以曹軼歐（康生的妻子，當時任中央理論小組的辦公室主任）為首的調查組來到北大。⁶⁸關於這個調查組，康生於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講話中說到，派這個調查組，「目的是調查彭真在學校搞了哪些陰謀和發動左派寫文章，……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的促動下寫的。」曹軼歐曾不止一次地找北大校黨委委員、法律系主任陳守一談話，動員他揭發北京大學

68 有的書籍和文章說，以曹軼歐為首的調查組「進駐」了北大，不確。調查組沒有住在北大，而是住在離北大不遠的西頤賓館。

黨委書記陸平和北京市委領導，但被陳拒絕。調查組的成員之一張恩慈，原來是北大哲學系的教員，是社教運動前期的左派，1966年初從北大調到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工作，後又調到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這次隨調查組返回北大。張恩慈於1966年5月5日曾寫過一份〈我對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意見〉，對北大社教工作隊、北大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對北大社教運動的領導，以及北大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尖銳的看法。這份材料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他於5月11日親自批示將其印發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批示印發時，將題目改為〈張恩慈同志對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意見〉。⁶⁹張恩慈在和哲學系的教員交談中，向他們透露了彭真確實已經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報》社、教育部都已經有大字報等信息，而對彭真、北京市委的否定就意味着有可能對北大的社教運動進行重新評價。

哲學系的幾個教員經過多次交談議論，感到北大黨委陸平、彭珮雲不久前傳達的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的報告（實際是傳達中共中央華北局的指示），強調學校黨組織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遵守紀律等，實際是壓制運動，北京大學運動的方向違背了中央的精神。他們決定寫大字報，從宋碩報告入手，批判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參加了這些青年教員的議論，贊同他們的觀點。在大字報醞釀期間，聶元梓曾找調查組組長曹軼歐談話，並且得到了曹的支持。聶元梓問曹軼歐，能不能給北大黨委書記陸平貼大字報？曹軼歐說：能。於是聶元梓便放心大膽地支持本系教員寫大字報。據參與寫大字報的幾個青年教員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沒有人指使，他們當時都不知道聶元梓在醞釀寫大字報期間找過曹軼歐。⁷⁰所以，說這張大字報是由康生和曹軼歐組織、策劃的，或者如康生所說，是在他「愛人的促動下寫的」，並不確切。寫這張大字報，是北大幾個青年教員在當時特定形勢下的自發行動。這個行動正

6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7。

70 印紅標：〈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是怎樣出籠的〉，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頁1949—1956。

合乎康生、曹軼歐等人的需要，因而他們通過聶元梓，對此事給予了推動和支持。⁷¹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北京大學校園內就跟着貼出了一千多張大字報，開始多為支持聶元梓的，後來反對她的大字報逐漸佔了多數。支持和反對的兩派師生在校園中形成對立，在激烈的辯論中，甚至出現了推推搡搡的現象。一些人在聶元梓等貼大字報的地方高呼口號：「同學們，階級鬥爭是複雜的，千萬不要上當，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反黨的覆轍！」

北大留學生工作辦公室宋柏年、高艾軍等十一人的大字報的題目是〈請看聶元梓的罪惡勾當——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反黨的大毒草〉，其中寫道：「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點，黨委擴大會上傳達了黨中央有關文化革命的指示，作為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你是親自聽見了的，你有話為甚麼不在黨的會上說，卻在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內，迫不及待地寫有內部情況的大字報貼在大餐廳？你目無組織，目無中央，你還有一點點黨性嗎？你還有一點點共產黨員的氣味嗎？」法律系學生徐昭文等十八人聯名於5月26日貼出的大字報題為〈你們是赫禿子式的陰謀家〉，大字報說：「你們披着『黨幹部』的外衣，幹的是叛黨

71 1979年7月16日，原調查組副組長劉仰嶠說：「大字報出來後，張恩慈同志告訴我：大字報是在曹軼歐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楊克明商量後楊克明寫的。」1967年7月，楊克明寫給戚本禹和江青的一份專題報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產生經過》中說：「哲學系左派聯繫的中心是張恩慈，在他那裏，保存了一些必要的資料，隨時準備鬥爭。」「就在這關鍵時刻，康生同志、曹軼歐同志通過張恩慈指示我們：可以寫大字報，這樣作影響大，作用大，能解決問題。」參見何洛、孟金：〈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出籠真相〉，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八十三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2），頁113—127。據聶元梓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由來〉（《往事》，2004年11月17日，第四期）一文中說：「這張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就是我們幾個參加寫作和簽名的人知道，我們事先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們向曹軼歐請示，只是從組織原則出發，沒有講具體內容。寫甚麼，怎麼寫，我們都是一邊起草一邊商量的，既不是帶著寫好的底稿去見曹軼歐，更不是受到曹軼歐的指使和授意才寫的。」

的勾當。昨天你們演出了一齣反黨反文化大革命的醜劇，我們認為這決不是偶然的，你們早已懷上了取消黨的領導的鬼胎！」⁷²

在聶元梓等人大字報貼出之前，周恩來曾明確指示：北大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搞運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內外有別。在大字報貼出的當天，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張彥，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當時已決定兼任北京新市委的第一書記）李雪峰先後來到北大，重申中央關於貼大字報要遵守黨和國家的紀律，內外有別，運動要有領導地進行的精神。北大黨委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對聶元梓等貼大字報進行了批評。⁷³ 批評的着眼點是公開張貼大字報違背了「內外有別」的精神，對大字報的內容本身並沒有進行批評或反駁，這是很值得注意的。這說明，大字報中所包含的嚴厲的批判精神是符合當時的潮流的，大多數人對這種批判可能會有某種本能的排斥心理，但又不會或不敢輕易地否定這種批判，包括黨內的高級領導人在內，只能從形式上提出一些異議。

第一張大字報的主要執筆者楊克明，他在大字報貼出後遭受政治壓力的情況下，隨張恩慈去西頭賓館找過曹軼歐。曹表示這張大字報沒有甚麼不對的。楊將大字報的底稿留在了曹處。大字報的底稿很快就飛到了遠在數千里之外的杭州，落在了毛澤東的案頭。但還有比這快的。《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總編室在1966年初即編印了一種內部資料，叫《文化革命簡報》，在1966年5月27日出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上，登載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全文。6月1日中午，毛澤東在這期《簡報》上批示：「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地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

72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字報選》。

73 在北京大學黨委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校黨委第一副書記戈華、常委崔雄昆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5月25日晚北大黨委開常委會時，他們主張堅決支持群眾運動，支持大字報。5月29日，戈華、崔雄昆正式寫報告，反映「陸平鎮壓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華北局派工作組來校領導文化革命。戈、崔二人後被吸收為北大工作組成員並成為工作組領導小組成員。參見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642—643。

開始打破。請酌辦。」⁷⁴ 他還給康生、陳伯達打電話說：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大。當晚八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章說：「為陸平、彭珮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

毛澤東的態度明確、堅定，他毫不猶豫地將北大稱為「反動堡壘」，令人驚訝。在一年多以前，毛澤東還為陸平說過好話。1965年6月29日，彭真向北大社教工作隊和北大黨員幹部作報告時說：「在研究北大問題時，我說，陸平同志是好人犯錯誤，我這是說的錯誤的性質，毛主席馬上說，是好人犯了一些錯誤，毛主席還注意了錯誤的量，我沒有注意那個量。」⁷⁵ 毛澤東的決定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他要天下大亂，要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甩開正常組織機構、制度、紀律的束縛，衝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司令部」、「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解決以往各種形式的運動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出奇才能制勝。毛澤東一直在尋找的這種全新的方式，就是他後來所說的「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給毛澤東以靈感，毛澤東借題發揮，開始書寫文化大革命這篇大文章。

四 大大小小的「三家村」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文化部幾十年來，一直被以周揚為首的又長、又粗、又深、又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

7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62。

75 龔育之：〈彭真同志與北大社教〉，《百年潮》，2002年第7期，頁25。

東思想的黑線專了政。」「把鬥爭的主要鋒芒，對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共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權威』。」「把他們連同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全部清洗掉，來一個『犁庭掃院』。」⁷⁶從這一時期中共中央批轉的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請示報告來看，全國各地到處都在大搞階級鬥爭，揪出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物。中共中央於6月23日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

目前，各地已經揪出了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例如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等。各地的運動正迅速地廣泛深入地向前發展。

中共中央華東局在6月21日〈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報告〉中也點了一大批人的名字。報告中將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平心、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江西大學副校長谷霽光、江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孫叔平、南京大學教授羅爾綱等定為「資產階級『學者』、『專家』」，把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江西原文化局局長石凌鶴等定為30年代文藝的「權威」、「名人」，並點名批判了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總編輯李俊民，還把華東局前宣傳部長夏徵農，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長李凡夫，山東省委委員、副省長余修，江蘇省委候補委員、前宣傳部長陶白，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匡亞明等定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一石激起千層浪。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對吳晗、鄧拓、廖沫沙所組成的「三家村」的批判，引起了連鎖反應。各省市、各部門都在

7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3。

批判北京「三家村」的同時，查找本地區、本部門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由胡耀邦、趙守一、李啓明組成的西北「三家村」，由李達、何定華、朱劭天組成的武漢大學「三家村」，由李孟北、周鍾德、夏雨組成的「三家村」雲南分店，由張黎群、馬識途、沙汀組成的西南「三家村」，由伏家芬(湖南師範學院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林增平(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副主任)、馬積高(湖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師)組成的湖南「三家村」等等，不可勝數。6月18日，《江西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以「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等罪名，對省政協副主席、省教育廳副廳長、江西大學副校長谷霽光公開點名批判。山東省委常委會議認為，副省長余修、省委黨校副校長李景春、《大眾日報》文教部副主任丁秀生等在1960年到1962年期間發表的一些文章、講話問題十分嚴重，認為他們與鄧拓、吳晗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也是有聯繫的，實際是「三家村」黑店在山東的一個分店，性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會議決定對余修等三人進行批判。山西省政協常委、太原工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趙宗復在遭受學生的連日批鬥和侮辱，身心交瘁，於6月21日自殺身亡，年僅五十一歲。趙去世後，被進一步誣衊為是「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在山西的代理人」、「三家村山西分店」的「老闆」，他寫的大量優秀雜文被誣衊為反黨雜文。⁷⁷

1 西北「三家村」

1966年5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在西北局的會議上提出了所謂西北的「三家村」問題。他在講話中有意要把胡耀邦、趙守一(陝西省委第二書記)、李啓明(陝西省委書記、陝西省省長)打成西北「三家村」。⁷⁸

77.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史·當代卷》，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407。

78. 詳情參見秦越人：〈胡耀邦主政陝西的兩百天〉，載張黎群等編：《懷念耀邦》，第四集(香港：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頁125。

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陝西省當過一段時期省委第一書記，也可以說是兼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因為在他當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時，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並未免去。1964年11月16日，由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患病，中共中央決定，在張德生患病期間，由胡耀邦代理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65年3月4日，張德生病逝，5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胡耀邦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

陝西省自1963年11月開始在全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對解決基層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在指導思想上，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大量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被簡單地看成階級鬥爭，出現捕人過多，開除黨籍過多，開除公職過多，奪權打擊面過寬等問題。胡耀邦主持陝西省委工作以後，於1964年12月作出關於奪權暫停、「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暫停、捕人暫停的決定。胡耀邦的糾左行動受到當時思想上很左的一些人反對，後在西北局的干預下，陝西省委不得不於1965年3月29日發出〈關於撤銷幾個「暫停」的通知〉。這樣，陝西省社教運動中「左」的錯誤就沒有能夠得到有效糾正，全省先後錯誤處理黨員、幹部8691名。省委常委、西安市市長劉庚以及部分地縣領導幹部被錯誤處理。⁷⁹

196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霍士廉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免去胡耀邦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職務。1966年3月，陝西省委召開四屆四次全委會議，通過〈關於近幾年工作總結和今後主要任務的意見〉和〈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幾個問題的決議〉。會議決定「要在三年左右把全省城鄉『四清』運動搞完，並在運動中認真解決土改不徹底、鎮反不徹底和組織不純的問題，徹底完成『民主革命補課』的任務」。在「民主革命補課」中，全省六萬多戶勞動人民家庭被錯劃為地主、富農成分。陝西省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直持續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

儘管胡耀邦已經離開西北半年多了，趙守一、李啓明僅僅是陝西省的領導人，在西北地區沒有任何職務，把胡、趙、李打成西北「三家

79 《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五卷，頁770—771。

村」十分荒謬。但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此類事情比比皆是，人們好像也見怪不怪了。

打倒所謂西北「三家村」的鬥爭，在三個場合進行，即：正式會議、「集訓班」和以「隔離審查」為名的秘密監獄。

1966年6月1日到7月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開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後期擴大到西北五省區縣委書記以上的領導幹部。這是西北局成立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氣氛最為緊張的大會。由於胡耀邦屬於中央管的幹部，不歸西北局管轄，西北局無權公開點名批判，會上公開的提法是「揭發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在西北的黑線」，把趙守一、李啓明作為彭、高、習的代理人，又把從未同彭、高、習共事的胡耀邦作為頭目，這樣胡亂拼湊成一個作為「彭、高、習黑線」的西北「三家村」。7月15日到8月17日，中共陝西省委又召開擴大的四屆五次委員會，按照西北局會議的調門，繼續揭批胡、趙、李。

第二條戰線，是所謂「文化大革命座談會」和「集訓班」。6月13日至9月18日，西北局指定陝西省委一位文教書記舉辦「文化大革命座談會」，後來改為「幹部集訓班」，9月21日，又由西安秘密轉移到陝西耀縣田咀的一個山溝裏。長達半年的「座談會」和「集訓班」的任務是揪出和批鬥「胡、趙、李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成員。這個「集訓班」完全限制人身自由，受打擊的幹部有陝西省委秘書長、副秘書長、辦公廳副主任、宣傳部副部長、農工部副部長、地委書記和西北局、西安市委的一批中層幹部以及省委的一般幹部，共四十餘人。

第三條戰線，是以「隔離審查」為名、不斷轉移的秘密監獄，關押了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省長李啓明和支持胡耀邦的文件起草人等三人。

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當時曾經炮製了一個文件：〈關於胡耀邦同志和反黨分子趙守一等相互勾結進行反黨活動的材料〉。其中寫道：

胡耀邦同志於1964年11月底調來陝西工作。他在陝西工作期間，很快同習仲勳反黨集團在陝西安下的釘子、培養的忠實接班

人趙守一和李啓明結成一夥，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西北局，反對中央。……

在省委一月會議上，胡耀邦大肆攻擊社教運動，說死人多了，捕人多了，鬥爭面寬了，傷了貧下中農的感情。對犯錯誤幹部進行集訓是「到處搞隔離，搞得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等等。趙守一則添油加醋。在省委一月會議前後，胡耀邦和趙守一一起，利用職權，提出一系列的暫停，給社教運動大潑冷水。……2月14日，胡耀邦從安康向全省發出〈電話通訊〉，提出了四條與〈二十三條〉相對立的幹部政策，趙守一立即響應，在2月17日給省委書記處的信中，對胡耀邦的〈電話通訊〉大加讚揚，並提出四條補充規定。李啓明於2月22日給省委書記處的信中，也替四不清幹部叫屈。……

在「對西北局決定陽奉陰違，採取不正當手段拉攏群眾，竊取情報，進行翻案活動」這個小標題下面，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地列舉了十六條所謂「反黨罪行」。例如：「(10) 胡耀邦拋出八條翻案的意見，陳元方(陝西省委秘書長)等人以此為基調，起草向中央的報告。(12) 林牧通過田家英寫信給毛主席，控告西北局。(16) 胡耀邦採用惡劣手法盜竊情報。」

材料的最後一部分是：「彭、羅、陸、楊反黨分子支持、干預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動」。

對於這個材料，需要稍加說明。這個材料，對西北局原來看得最為嚴重的所謂胡耀邦反對劉少奇的問題隻字不提，自然是由於劉少奇當時的處境已經不佳了。對於「社教」以外的問題沒有提，是由於文革初期只注意階級鬥爭問題，尚未對所謂修正主義路線進行全面批判。

這份材料把胡耀邦提出八條申辯意見當做「翻案」，當做反黨活動。申辯本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何況中共中央並沒有給胡耀邦定案，有甚麼案可翻？林牧通過田家英給毛主席寫信控告西北局，也是黨員應有的權利，也不是反黨。材料指控胡耀邦「盜竊情報」，是指西北局對胡進行缺席裁判時，不許省委辦公廳給胡送文件，胡耀邦起先直接向省委辦公廳要文件，後來又通過中央辦公廳要

文件。當時胡耀邦是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向省委辦公廳要文件和省委辦公廳給胡送文件，完全合理合法，卻被說成了「盜竊情報」。至於說「彭、羅、陸、楊反黨分子支持、干預了胡耀邦等反西北局的活動」，更是無稽之談。彭真最先批評胡耀邦；楊尚昆只是對鬥爭的兩方起了某些調停作用。羅瑞卿和陸定一同西北的爭論根本不沾邊。

直到「四人幫」覆滅以後，1977年5月，陝西省委召開的揭批「四人幫」的有線廣播大會，還在點名批判胡耀邦的支持者趙守一、李啓明。適逢中央組織部兩個幹部到西安來探望趙、李，趙守一對那兩人說：「起先西北局批判我們『胡、趙、李三家村』是反對劉少奇、反對西北局的反黨集團；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新建立的省委、省革委會又批判我們是劉少奇在陝西的代理人；現在揭批『四人幫』又把我們上掛下聯地進行點名批判。我們也弄不清我們到底是誰的人了。」

由此可見，反胡的鬥爭，在陝西持續進行了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1月，中共陝西省委在西安召開的全省三級幹部會議上，才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具體指示，作出如下決定：

一、胡耀邦同志主持陝西省委工作期間，反對「四清運動」中的形左實右的路線，以及對陝西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正確的。因反對批判胡耀邦而遭受打擊的趙守一、李啓明、陳元方等一批被錯誤批判的同志，都應予以平反。

二、文革期間，以省委名義組織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座談會」以及後來發展成的「集訓班」，把原省委、西北局機關的一批同志打成「黑幫」、「反黨分子」，改名換姓，弄到山區，長期隔離審查，打擊迫害，是極其錯誤的，現予平反。

三、「四清」中，有的同志提出「陝西土改不徹底」、「鎮反不徹底」的口號，在全省範圍內開展「民主革命」補課，錯誤地補劃了大批地主、富農；文化大革命中，又大搞清除擴大化，打擊迫害了大批幹部和群眾，造成嚴重後果。實踐證明：陝西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徹底的，兩個「不徹底」的估計和採取的一系列做法，是完全錯誤的。對於社教運動中，特別是在「反胡」以後「左」上加「左」而進行的社教運動中

打擊和處分的農村、工廠數十萬基層幹部，陝西省委也進行了複查，發現大多是「冤案」、「錯案」，也給予平反昭雪。以陝西省涇陽縣為例，社教運動中受處分的幹部，得到平反的佔84.6%，基本維持原案的只佔15.4%。

2 武漢大學「三家村」

1966年7月7日，湖北省委派駐武漢大學的工作組將李達、何定華、朱劭天打成武漢大學的「三家村」，對他們進行公開點名批判。⁸⁰李達是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元老級人物，1923年退出中共後，仍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1952年起任武漢大學校長，出版過《〈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等書。面對批判，李達態度坦然。他說：「我抱三條，坦白、認錯和申辯。」對強加給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堅決不予承認。他在〈我的坦白〉（原題為〈我的檢查和申辯〉，經勸說改用〈我的坦白和申辯〉，最後改為〈我的坦白〉）中承認他的某些理論觀點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地方，承認他身為校長應對武漢大學辦學方面的錯誤負完全責任，甚至還承認他在任用幹部問題上抵制省委的某些做法是「犯了反黨的錯誤」，但對批判他「否認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之類的問題，他堅決否認，並逐條進行申辯。他寫道：「我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不深不透，只懂得一點皮毛，但我對毛澤東思想是極端信奉的，我早已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全面發展……從經濟、軍事，到意識形態都發展了馬列主義。」李達還寫了〈關於「三家村」問題的申辯〉，斷然否認武漢大學有甚麼李達三家村。

7月中旬，武漢大學工作組又在李達的家庭成分和歷史問題上糾纏，硬要將李達的家庭說成是大惡霸地主。在李達寫出〈關於所謂大惡霸地主問題的申辯〉後，湖南省零陵縣委宣傳部一個副部長到武漢大學

80 武漢大學還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一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個，總務處一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

全校大會上宣布給李達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工作組組織零陵縣的農民和武漢大學的學生闖入李達住宅，對李達進行圍攻。李達反駁說：「我家裏不是地主，是小土地出租者。十二三畝田地，二女一兒，兩夫婦，五人一共十二三畝田是地主？真是怪事！」

7月18日，湖北省委作出將李達開除出黨的決定。同一天，武漢大學工作組組織了對李達的批鬥會。

李達從報紙上看到毛澤東暢游長江的消息，想憑過去同毛的交情向毛求助。他於7月19日下午寫了一封短信：

主席：

請救我一命。我已寫好上交有坦白書，請你向武大工作隊索取閱看。

致

崇高敬禮！

李達

七月十九日

李達的信幾經輾轉，於8月10日送上了毛澤東的案頭。毛澤東批示：「陶鑄同志閱後，轉任重同志酌處。」陶鑄當天接到毛澤東的批語後，立即批示：「即送任重同志。」⁸¹

8月16日，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張體學開完十一中全會回來，在武漢大學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李達問題的兩點指示，大意是：李達是沒有用的了，相信武大革命師生是不會對李達採取過火的行動的。張解釋說：「李達已經搞臭了，這個老不死的傢伙，也沒甚麼門頭了，你們用不着再鬥他了，給他戴上一頂地主分子的帽子就夠了……你們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給我們，保證把官罷到底，只給一碗飯吃。作為一個反面教員，送進博物館去算啦！」

李達當年已77歲，體衰多病，得不到應有的治療，病情日益加

8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98。

重。8月13日，突然跌了一跤，當場吐血，卻不准到醫院治療。直到8月22日，奄奄一息的李達才被送到醫院。8月24日，李達去世。

十幾年後，有人問王任重，當時湖北省委為甚麼要整李達？王任重沒有為自己多作辯解，他只說了一句：「我們怎麼敢？」

3 「三家村」雲南分店

1962年春節期間，鄧拓到過雲南，《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出面接待。《雲南日報》發表過鄧拓在滇的幾首詩作，其中有「海枯石爛情無盡，地久天長恨不泯」，「興邦歷代多謀略，溯遠探源便可知」等句。1962年10月，鄧拓在《燕山夜話》第五集出版時撰寫的〈奉告讀者〉文中說：「《雲南日報》在第三版右上方開闢了這樣的專欄，名為《滇雲漫譚》。我衷心祝願這些報紙的專欄雜文能夠長期堅持下去，並且不斷地改進內容，更好地為讀者服務，同時希望讀者們也能夠從這些報紙的專欄中得到有益的知識。」因為有和鄧拓的這些關係，到了1966年5月，《滇雲漫譚》及其作者成了雲南省的重點批判對象。

1966年5月16日，中共雲南省委派出的工作組進駐《雲南日報》社，發動報社幹部、群眾，揭發報社問題。5月26日，雲南省委召開常委會討論《雲南日報》問題，認為由該報社社長、總編輯李孟北為主要撰稿人的副刊專欄《滇雲漫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應當在報紙上公開批判。5月29日，省委又決定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報批李孟北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在報紙上公開批判。5月30日，西南局批覆同意。6月6日，《雲南日報》二、三兩個版面，以〈橫掃思想領域中的一切牛鬼蛇神，向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為題，公開批判《滇雲漫譚》，稱它是「直接和『三家村』相配合向黨進攻」，是「鄧拓反革命集團開設在雲南的分店」。6月7日，《雲南日報》公開點名批判李孟北。6月21日，中共中央電覆西南局並告雲南省委，同意撤銷李孟北的職務，調薛波任《雲南日報》總編輯。6月22日，雲南省委決定成立《雲南日報》新的編委會。6月28日，西南局批覆雲南省委並上報中央：「同意雲南省委決定。夏雨（《雲南日報》副總編輯）、周鍾德（《雲南日報》副總編

輯)停職交代。給李孟北、夏雨、周鍾德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帽子，並將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在報紙上點名批判。」6月30日，《雲南日報》登出〈李孟北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一批材料。7月3日，開始公開點名批判夏雨、周鍾德，把李、夏、周三人稱為「三家村在雲南的分店」。報社許多幹部、職工也受到牽連，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迫害和侮辱。⁸²

五 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國各地都興起了以在校大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參與其間的青少年學生數以千萬計。⁸³紅衛兵組織最初是由一些青少年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的，它成立的直接動因是為了與被他們認為是「爛掉了」的校領導以及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的工作組作鬥爭。這種少數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的小型組織起初並不被當局所承認，許多組織處於半地下的、秘密的甚至是非法的狀態，這時它對外的影響相當有限，一般局限於一個學校或一個地區的學校內。1966年7月中旬旬，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他發現了紅衛兵，認為這就是他在幾個月前的一次談話時所熱切呼喚的「孫悟空」⁸⁴，他立即表示了對紅衛兵的肯定和堅決支持。

紅衛兵運動在毛澤東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在全國興起。對掃清文化大革命的障礙，打破僵持局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加劇了全國大動亂的局面，對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經濟形勢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紅衛兵運動的興起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個重要特點。

⁸² 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雲南省檔案館：《雲南五十年——中共雲南省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頁125。

⁸³ 據統計，1966年末，全國在校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人數為53.4萬人，在校中等學校學生人數為1296.8萬人。

⁸⁴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與江青、康生、張春橋等的談話中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

1 文革前的學校教育

紅衛兵運動不是憑空產生的，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說到底，它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理論指導下的產物。這種「左」傾觀點不僅日益深入黨內各級組織，而且在社會上迅速蔓延，使廣大青少年學生的思想也受到了深刻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前的學校教育，對參加紅衛兵運動的那一代青少年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那一代青少年學生，都是在新中國的懷抱裏，沐浴着共產黨的陽光雨露成長起來的，他們被稱為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三代人。他們從小受到革命傳統的薰陶和前輩英雄業績的感召，受到革命的理想主義教育，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熱愛祖國、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很多人從小就樹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信念。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以前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和學校教育中存在的種種弊端，也給這一代青少年學生的成長帶來致命的弱點。

學校在進行革命理想教育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嚴重的偏差，我把它稱為片面的理想主義傾向。理想本身並無可厚非。理想應是以客觀現實為依據，因而也是可以實現的。高尚的理想，可以激勵人們為實現理想而努力奮鬥。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理論指導下產生的片面的理想主義，脫離了客觀現實，帶有濃厚的空想性質。這種片面的理想主義追求的是一種純而又純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時時事事以對這種空想的理想社會的描繪為準繩，去衡量社會上的一切事物，凡不符合這種標準的就要受到批判。在50、60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學生，由於環境的封閉和教育的片面，很難了解現代文明和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的全貌，容易以偏概全，把自己接觸到的東西當作是最好的。最典型的一種說法是：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則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對青少年的教育內容上只進行和舊社會的縱向對比，缺乏和發達國家橫向的客觀對比。在教育活動中往往帶有許多虛飾的成分，所樹立的英雄人物都是一幅「高、大、全」的形象。在學校開展的各種活動中摻雜了許多形式主義的東西，如提倡寫雷鋒式的日記和思想匯報等，無形中促使許多學生拔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社會上普遍存在着追求簡單劃一、純而

又純的社會模式。在這樣的氛圍中，青少年學生片面的理想主義傾向不斷得到強化。在這種片面的理想主義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人，思想上有很強的片面性，往往容易走極端，缺乏自己的主體意識。他們純潔而幼稚，自信而盲目，具有熱烈的革命願望而又缺乏政治上辨別是非的能力，崇尚助人為樂的毫不利己精神，但又有否定人道主義的狹隘的階級鬥爭觀念，很多人帶有明顯的盲從的特點。

學校和有關組織所開展的階級教育活動，如訪貧問苦、聽憶苦報告，進行鄉史、村史、廠史和家史教育，參觀階級教育展覽，組織專題討論等，所有這些活動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理論的影響下存在很多問題，普遍過分強調階級鬥爭，把許多不是階級鬥爭的問題當作階級鬥爭的問題去認識和對待，結果是混淆了不同性質的矛盾，混淆了是非。一些地方進行階級教育的方法簡單粗暴，動輒上綱上線，分析階級根源。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不斷強化，致使唯成分論的影響愈來愈大，黨的「重在表現」的政策也就很難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四清」運動開展以後，全國的大學和許多中學都進行了「四清」的實踐，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深深地在青少年學生的頭腦中扎下根來，使他們學到的階級鬥爭理論與「左」傾實踐結合，不但使他們強化了「左」傾理論，而且也學到了「左」傾鬥爭的方式。

紅衛兵運動的興起是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緊密相關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之風早已有之，但在全國範圍內廣泛流行則是在60年代。全國的大中學校和有關組織，在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代氛圍下，對廣大青少年進行了大量的宣傳教育，給廣大青少年灌輸了大量的關於誇大和神化毛澤東個人作用的個人崇拜思想。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思想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

中共八大以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對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愈來愈不滿意，他多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號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他最終選擇了「文化大革命」來徹底改變現狀，即所謂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澤東是中國革命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傑出人物，他富有傳奇色彩的革命人生對年輕一代極具魅力，毛澤東的言論，對當時那一代青少年有巨大的感召力。毛澤東關於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培養接班人的主

張，以及他對正規學校教育的輕視和輕率的否定，也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64年11月，高等教育部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談話紀要〉中提到，毛澤東談到教育問題時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許多大學和中學向部分學生作了傳達。1965年夏天，毛澤東與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的王海容進行過一次談話，其中談到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是「沒出息的」，鼓勵學生違反學校的紀律，造學校的反。這些都給予青年一代以深刻影響。這次談話的內容後來被逐漸透露出來，在北京的一些大中學校裏悄悄地流傳着，使一些正處於「青春反叛期」的青少年學生激動不已。毛澤東在談話中所倡導的那種「造反」精神很快就被一些中學生所接受。⁸⁵

綜上所述，文化大革命前學校教育中存在的片面的理想主義傾向，「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理論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對參加紅衛兵運動的這一代青少年學生世界觀的形成有着深刻影響，由此奠定了一代紅衛兵的思想基礎。

文化大革命前幾年，「左」傾錯誤日益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在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領域中開展了一系列錯誤的、日益加劇的批判。這些在「左」傾思想指導下的、錯誤的、過火的批判，完全顛倒了是非，混淆了不同性質的矛盾，把一些完全可以自由討論的理論觀點，統統當作資產階級的和修正主義的思想加以批判。這些批判大多是亂扣帽子、亂打棍子，強詞奪理，不講道理的。這些批判就是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搞「革命大批判」的生動鮮活的榜樣。

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的許多內容也大多不是紅衛兵所發明的。在「左」的思想影響下，人們在生活中的一些正當要求被認為是受了「資

85 1965年10月28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預651班學生駱小海在本班的板報欄裏貼出了一張題為〈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其中寫道：「造反，造舊事物的反，是歷史的偉大動力。……拿我們學生來說，甚麼教育制度，學習方法，紀律規章，天地六合，都藏有舊的東西，對待它們，只有一種精神：造反！」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半年多以前，清華附中的這些學生就已經在按照自己對毛澤東講話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解，開始以「造反」作為自己的旗幟，並喊出了「造反精神萬歲」的口號。參見卜偉華：〈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輯（1999），頁96—127。

產階級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的影響，許多正常的或無害的東西也被當作剝削階級的東西來批判。文化大革命前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和五反運動中，全國各地就出現過不少過「左」的口號和提法，過激的形式主義的做法，如反對或禁止人們做所謂的「奇裝異服」，不許理「怪髮型」，不准出售有「封資修」色彩的商標的商品等，而且在報刊廣播中大力宣傳這種「左」的東西。⁸⁶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各地方都出現了不少嚴重違反黨的政策和侵犯公民正當權利的現象，為此，中共中央曾專門發文予以糾正。當然這種糾正只能是治標不治本，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依然存在，一旦氣候適宜，必然還會重新出現。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當時極端狂熱的政治氣氛，使這些以前出現過的現象都再次出現，而且是以更加極端的形式再次出現。

2 紅衛兵的成立

紅衛兵最初是怎麼成立的？許多人都不知其詳。在一些外國人眼中看來更是神秘莫測。⁸⁷據說美國的高層決策核心曾因為搞不清楚突然出現的中國紅衛兵是甚麼組織而一度感到相當擔憂。⁸⁸

86 關於批判拍「古裝照」、留怪髮型、奇裝異服、使用香水、不健康的商標圖案、保健藥品的廣告的內容，可參見1963年12月的上海《解放日報》、1964年4月2日的《天津晚報》、1964年6月7日的上海《解放日報》、1964年9月10日的《中國青年報》、1964年10月29日的《陝西日報》、1964年10月18日的上海《解放日報》。

87 久居中國的美國友好人士安娜·露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當年曾寫信告訴自己的朋友：紅衛兵是由「林彪的部隊」負責籌劃組織的。參見韓素音：《再生鳳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5。

88 「中國『文化大革命』興起後，當時，美國的高層決策核心，有相當一段時間鬧不清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特別是對於紅衛兵，他們身著軍裝，進行有組織的狂熱活動，究竟是一種甚麼性質的組織？說不清。在英文中，紅衛兵譯為Red Guard，與美國後備役的National Guard頗有相通之處。因此美軍方相當擔憂：中國若建立這樣一個龐大的準軍事組織，對於正在進行的越戰和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力量均衡，將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呢？當然，這擔憂，不久即隨着紅衛兵真實面貌的公之於世而消失，但『小將們』着實使星花耀眼的美國將軍們嚇了一跳。」參見李向前：《我在美國查檔案》，《百年潮》，1999年第1期，頁70。

北京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1966年5月29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誕生了全國第一支紅衛兵。現將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的經過簡要介紹一下。⁸⁹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此開始，全國範圍內的群眾性批判運動不斷升溫，一大批學者、專家和他們的著作受到批判。同時，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下，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大搞所謂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在這種形勢下，清華附中的一些學生開始把與部分教師和學校領導之間的一些具體的意見分歧，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來認識。這些學生開始主要集中於預651班⁹⁰和預642班，還有一些其他班級的學生也同情和支持這些學生的意見。這些學生中多數是出身於革命幹部家庭，也有一些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早在一兩年前，他們就與學校領導在一系列問題上意見對立，並進行過多次交鋒：

1964年7月，他們曾就「學校裏有沒有階級鬥爭？」「學校裏要不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兩個問題與校方進行辯論。

1965年2月，他們認為學校提出的「興無滅資，團結百分之百」的口號「提得過右，而且在實際中它貫徹得還要更右一些」。

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們兩次向學校提出要求開展「小整風」運動，大搞階級教育（如清明節掃墓）活動、兩憶三查活動⁹¹，均被學校拒絕。學校負責人說：「階級教育在哪裏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兩憶三查不能搞，我們應當堅持正面教育，以表揚為主。」

89 參見卜偉華：〈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的前前後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輯（1999），頁96—127。

90 1964年，高等教育部批准清華大學和南京工學院試辦預科，學制為二年，學生待遇按普通中學學生的標準執行。試辦預科是中央學制問題研究小組（1964年2月成立，組長林楓，副組長蔣南翔）提出的改革學制、提高教學質量的一項重要措施。

91 兩憶三查活動最早是在解放軍中開展的活動，後來全國學習解放軍，很多地方也都提出要搞兩憶三查活動。兩憶三查的具體內容各地有所不同。清華附中這些學生當時提的是：一憶階級苦，憶先輩闖江山的艱苦卓絕，二憶自己的成長過程，憶黨對自己的辛勤培養；一查自己入團來的表現，查自己的覺悟，二查自己的革命鬥志、朝氣，三查自己的工作，找差距，學先進。

1966年5月，預651班的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等人對校長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報告提出意見，認為校領導在報告中沒有強調這場運動的深遠意義，沒有強調突出政治，沒有強調在運動中要自覺革命，沒有強調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認為不強調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還對學校過去不突出政治的問題提出意見。學校領導不同意這些意見，並在不同場合批評了這些意見。

5月10日，駱小海寫了題為〈從我校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看我校是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批判校領導的文章。文章指責學校不把毛主席的書作為最高指示，還批評學校不重視突出政治，突出業務沖淡政治，在體育運動中搞錦標主義等。

5月20日，由預642班的王銘、張曉賓起草了題為〈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黨支部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應當徹底批判〉的給黨中央、毛主席的系統的匯報材料。他們在這份材料中寫道：

我們目前同清華附中黨支部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結果，這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我們堅信，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我們一定要鬥爭下去，一定能取得勝利。我們下定決心，一屆屆、一代代和清華附中黨支部的錯誤方向鬥下去，直到把清華附中徹底搞紅為止，直到把無產階級教育方向在清華附中牢牢確立為止，直到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紅旗在清華附中真正地、驕傲地飄揚為止。

隨着社會上階級鬥爭形勢的不斷升溫，清華附中的亂子也愈鬧愈大，從最初僅有十幾個人與校領導對立，逐步發展擴大，反對校領導的多達幾十人。

5月29日傍晚，在圓明園遺址上，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王銘、張曉賓、張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來個學生在一起開了一個小會。與會者認為，當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為了迎接階級鬥爭暴風雨的來臨，為了更加有力地與校方進行鬥爭，有必要成立自己

的組織，並一致同意將組織命名為紅衛兵。「紅衛兵」是前一階段張承志寫小字報時所用的筆名。⁹²當時，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思潮正迅速在全國蔓延，「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非常流行。紅衛兵這一名稱，簡潔而響亮，能使人不由得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和中國大革命時期的工人赤衛隊。這一天就成為了紅衛兵的誕生日，從此揭開了紅衛兵運動的序幕。

5月31日，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成員鄺桃生、駱小海、卜大華、王慧成、張曉賓、王銘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學校的問題。此信洋洋萬言，列舉了學校的二十種錯誤：一、阻撓毛主席著作的學習；二、說「清華附中沒有階級鬥爭」；三、大力宣傳「政治要落實業務」的謬論；四、大樹「業務好，政治差」的標兵和榜樣；五、不搞並且阻撓「突出政治大討論」；六、不抓階級教育；七、突出方法論，沖淡人的思想革命化；八、對政治思想有嚴重問題的學生不做工作；九、根本不抓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改造；十、政治事故，百出不窮；十一、沒有政治思想工作，一些學生腐化變質；十二、阻撓《海瑞罷官》的討論；十三、階級路線的右傾傾向；十四、團發展工作的錯誤方向；十五、教學改革

92 張承志在《紅衛兵時代》(日文版)(東京：岩波新書，1992)一書中寫道：「清華附中黨支部領導了全校對『三家村』的批判。作為共青團員的我，和其他同學一樣，抱着像紅軍長征、奮起抗戰那樣嚴肅而神聖的心情投入了這場運動。班裏的運動形式是在教室裏貼小字報，凡是共青團員都要負責聯繫一至兩名要求入團的同學，我和我負責聯繫的周向明一起，組成了一個小組。我在我們寫的小字報上的署名就是『紅衛兵』。徵得周向明的同意，我用紅鉛筆把自己發明的這個名字寫在小字報的末尾，並畫了一個騎馬的戰士的圖像。這種小字報和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滿街的大字報是不一樣的。這只不過是按老師的要求製作對教室的一種漂亮的裝飾。在中國的學校裏，過去就有在教室裏以牆報形式貼出學習成績和國家政策的習慣，所以，我最初以『紅衛兵』署名的小字報，不是以後紅衛兵式的東西，也不意味著『造反』。這種小字報當時一共寫了三篇，末尾照例都用紅鉛筆仔細畫上了騎士圖案，寫着『紅衛兵』三個字。『衛』字用的是簡體字。在班裏這種裝飾美觀的小字報，大部分都相當醒目。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這些小字報上的『紅衛兵』這個署名，竟引起了預651班，還有其他班的幾個人的注意，這幾個人後來成為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領導人。另一方面，我也參加了從預651班開始的，以後擴展到全校的大討論，我和同班的哈鴻興、周春曉三人站到了反對校領導的一邊。」(頁39-40)

脫離無產階級政治；十六、業務學習壓倒政治；十七、一支封資凱的教師隊伍；十八、學校對待批評的錯誤態度和錯誤方法；十九、學校培養人的方向是買桂；二十、大搞形式主義，大搞浪費。

6月1日晚，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北大大字報的發表大大地鼓舞了剛剛組織起來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當時學校把教學樓五樓一個曾作為閱覽室的大教室騰出來，專門用作全校師生貼大字報的場所。6月2日下午，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十分醒目地出現在五樓大教室，大字報的題目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其中寫道：「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有一百多人在紅衛兵的署名下簽了名。當時的紅衛兵組織很不嚴密，在紅衛兵大字報上簽了名的也不一定是紅衛兵，而有些人雖然沒有在大字報上簽名，卻也是紅衛兵，關鍵在於觀點是否與紅衛兵一致。

當時學校內的大字報基本上都是兩個內容：一是批判「三家村」，二是表示擁護校領導、黨支部。也有不少大字報對預651班等反對校領導的人進行批評。以個人名義寫大字報對校領導表示懷疑、甚至對校領導進行批判的則極少。6月4日，團中央派了兩個人到清華附中進行調查。在以後的幾天裏，他們分別與包括紅衛兵觀點在內的各派學生代表進行了幾次座談，紅衛兵在與他們的座談中，感覺受到了鼓舞，鬥志更加旺盛。此後，形勢發展很快，紅衛兵逐步從防守轉入進攻。6月5日，紅衛兵在教學樓一樓門廳正面貼出一張題為〈揭穿一個大陰謀〉的大字報，開始公開點名批判校領導。紅衛兵的大字報引起了全校的廣泛關注，也招來了很多反對和批判的大字報，清華附中絕大多數的師生在當時是相信黨支部的，對處於反對派地位的紅衛兵不同程度地持批判態度。紅衛兵在這一天還貼出了一張題為〈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在這張大字報裏，紅衛兵向全校同學發出號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立即行動起來，向近在身旁的反黨反社

會主義的修正主義黑線猛烈開火！我們要做無產階級徹底革命派，決不當資產階級保皇派。」在這裏，紅衛兵已經明確的把清華附中黨支部稱為「近在身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黑線」了。

6月1日以後，北京各大中學校都處於一種極度興奮和忙亂的氣氛之中。大中學生開始走出校門，各學校之間的串連愈來愈頻繁。清華附中紅衛兵一方面積極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北京新市委寫信，反映情況；一方面向北京各有關中學進行串連，尋求支持。

6月8日上午，海淀區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質附中、北航附中等學校以及城區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學校三百多人相約來到清華附中，聲援紅衛兵。學校領導感到來者不善，便以「維持秩序」為名關閉了校門。這些學校的學生在校門外堅持了十個小時後，才被允許進入校園。他們與清華附中紅衛兵一起，在校園裏貼了許多大字報、大標語。為了表示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好幾個學校的學生都在自己寫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上署上了××學校紅衛兵的字樣。此後，紅衛兵的名稱很快就在北京許多學校裏傳開了，以紅衛兵或紅旗等命名的學生自發組織成批出現。大約在6月3日左右，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彭小蒙、宮小吉等人成立了類似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自發性學生組織——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不過，到這時為止，紅衛兵組織在數量上還是比較少的。在已經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的學校裏，紅衛兵在人數上也只佔學生總數的很小一部分。⁹³

六 工作組

從6月初北京開始向《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派工作組，到7月底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組一共只存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

⁹³ 以清華附中為例，在6月8日晚工作組進校時，紅衛兵人數為101人，約佔全校學生總數的8%。參見《清華附中工作組的匯報材料》（1966年7月4日）。

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動機並不了解，他們按照過去傳統的工作方式，想用工作組這種形式來保證局勢的穩定和黨的領導不致中斷。面對前所未有的群眾運動形勢，無論是劉、鄧等人，還是工作組的成員，都缺乏足夠的精神準備，他們犯錯誤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這又給毛澤東提供了進一步整治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口實。

1 派出工作組

1966年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碰頭會研究，決定派剛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率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由原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⁹⁴率工作組去北京大學。商定後，周恩來當即用電話向正在杭州的毛澤東請示，獲得同意。5月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名致信毛澤東，書面請示派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一事。信中說：

兩個月來，《人民日報》的威信大大下降，對黨和國家造成不利影響。由於報社編委會不能改變現在的局面，許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去。我們今天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的直接領導下，到報館掌握報紙每天的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在京工作組人員擬於五月三十一日即進報社工作。報社內部進行整風，學習文件，也可以繼續寫大字報。一部分態度較好、願意積極工作的編輯人員，要集中力量維持每日版面。在報紙版面改觀後，再進一步解決內部問題。

信末附有臨時工作組在京人員名單。他們是穆欣（《光明日報》總編輯，只去了很短的一段時間）、錢抵千（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尚方科（《解放軍報》編委）、朱悅鵬（《解放軍報》）、楊丁（《紅旗》雜誌編輯）。另外還調了上海《解放日報》的魯瑛、邵以華，稍後到京。毛澤東

94 張承先當時正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調任高教部副部長。

在這封信上批示：「同意這樣做。」⁹⁵ 陳伯達等於當晚進駐《人民日報》社。⁹⁶

6月1日下午，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向張承先交代任務說：毛主席決定要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廣播後北京大學可能陷入癱瘓狀態，中央決定任命你為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並由你代行北京大學黨委書記職務，要趕在廣播前進駐北京大學，領導北京大學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當晚召開了華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討論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的工作方針和行動計劃。然後，吳德和華北局負責人蘇謙益、池必卿、黃志剛帶領張承先等趕往北大，召開北京大學黨委會，由華北局負責人宣布：北京大學黨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壓制群眾、打擊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學是一個頑固的資產階級反動堡壘。華北局決定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校，放手發動群眾，堅決支持革命，把北京大學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並向黨委宣布約法三章：不許搞秘密活動、不許搞兩面派、不許陽奉陰違。⁹⁷ 6月2日零點30分，北京大學緊急召開了全校黨團員、幹部、學生幹部大會，宣布華北局決定。張承先在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北京大學的革命運動，放手發動群眾，把北京大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到6月10日，北京大學的工作組共有208人。6月底，又從北大的教職工中吸收了178人參加工作組。在校一級成立了工作組領導小組，張承先為組長，副組長有：曹軼歐、劉仰橋（高教部副部長、原中央理論小組調查組成員）、楊以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彭林（解放軍海軍航空兵政委）、武振聲（中央文辦秘書長）、張德華（共青團中央候補書記）。聶元梓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克明任辦公室副主任。

9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61。

96 6月20日，陳伯達宣布唐平鑣為《人民日報》代理總編輯。三個月後，《人民日報》成立黨委會，唐平鑣任第一書記。參見余煥椿：〈大權旁落：「文革」中人民日報奪權紀實〉，《百年潮》，2004年第12期，頁10。

97 《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頁643。

6月2日，鄧小平召見團中央負責人胡克實，指示「團中央協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6月3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匯報和討論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提出開展運動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准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准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並提出：「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團中央、組織部組織人力幫助。」會議同意了李雪峰的意見。劉少奇在會上說：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6月3日、4日，北京新市委開始向一些學校派出工作組。

6月3日晚，北大工作組進駐學校的消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電訊稿是由周恩來根據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起草的。工作組原來是以華北局名義派出的，電訊稿中改稱「新改組的中共北京市委決定」。毛澤東看了這條電訊稿並表示同意。

自從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的消息在報紙上公布後，北京許多學校的師生成群結隊地湧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北京新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組。各學校的領導機構這時事實上已陷於癱瘓，無法行使領導職能。鑑於無政府狀態急劇蔓延，混亂局面日趨嚴重，從6月5日起，北京新市委加快了派工作組的步伐。

從6月5日至6月中旬，以北京新市委的名義向北京地區的51所高等學校和304所中學先後派出了工作組。大學工作組的成員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部委抽調，中學的由團中央抽調。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團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工作團。團長、副團長分別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惠庶昌擔任，並從全國各地抽調了1800多名共青團幹部，組成了300多個工作隊，分成八個工作隊，進駐北京市八個區的各個中學。各工作隊的隊長均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團中央常委或部長擔任。

派工作組是應付非常局面的緊急措施，一時也想不出甚麼更好的

辦法。中共中央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並沒有作出過普遍派工作組的決定，也沒有發出過這方面的文件，但迫於面臨失控的局勢，全國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紛紛仿效北京市的做法，自動向大專院校和學術界、新聞界、文藝界和出版界的一些單位派出了工作組。⁹⁸如上海市對29所大學和11所半工半讀大學派出了工作組，對中學派出了160多個工作組，對有的學校沒有派工作組的，派去了聯絡員。江蘇省在南京軍區的大力支持下，組織了以部隊幹部為主力的840多人的工作隊，進駐省屬高等院校和省級重點文化單位。同時，江蘇省各地、市、縣委也先後抽調7800多名幹部，進駐1155個單位，其中包括大中專學校、文化單位和其他領導受衝擊而陷於癱瘓狀態的單位。⁹⁹

中共中央書記處於6月6日決定向中共中央宣傳部派出工作組。新調任文化部副部長、黨委書記的蕭望東(原南京軍區第二政委)，經軍委領導同意，向文化部系統各單位派出由軍隊幹部組成的工作組，其中從解放軍總政治部抽調三百名幹部，直接從南京軍區調來五百人。

在京中央常委的所有重大決定都隨時向在外地的毛澤東匯報，派工作組的事毛是了解的。中央文革小組身處北京並且直接參加中央各有關會議，對派工作組的詳細情況也都知道。當時，沒有人對派工作組的做法提出異議。

6月9日至12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康生等前往杭州；向在那裏的毛澤東匯報文化大革命情況，並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問題。劉少奇在討論中提出：學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奪權，有的是批判學術權威，然後就搞教學制度的改革，解決考試和教材等一連串的問題；城市工廠和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運

98 各地各單位派出工作組的時間各不相同，早的有在〈五一六通知〉之前就派出了工作組，如中共雲南省委於1966年5月14日即決定派工作組進駐《雲南日報》社。大部分都是在1966年6月派出，但也有些省市如四川等省是在7月上旬才派出工作組的。參見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290。

99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頁517。

動，是不是同「四清」結合起來搞。討論中對派不派工作組的問題沒有形成明確意見。毛澤東對大批派工作組的辦法不以為然，他在討論中說：「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¹⁰⁰可是這時大批工作組已經派出去了。

原來設想進駐北京各大中學校的工作組有三種形式：一、代替黨委領導；二、和黨委共同領導；三、協助黨委領導。執行的結果，實際上只有第一種形式。工作組是從各單位抽調而來的，成員來自四面八方，倉促上陣，既不熟悉學校和知識分子，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入校後，基本是按照「社教」的方式來領導運動。出於對運動的理解不同和對具體單位的認識不同，有的工作組認為所在學校的黨委或黨支部是「那些被資產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的部門和單位」，肯定學生們的造反行動；有的工作組認為所在學校的黨委或黨支部基本是好的，但「群眾起來，原黨委失去信任」，則肯定黨委或黨支部的基本正確，對學生們的造反進行控制，加強政策教育，組織學習文件和討論；有的工作組認為所在學校的黨委或黨支部是好的，造反學生是鬧事，要加以引導，保護黨委或黨支部。有的大專院校還重新放映了1957年反右派鬥爭時的歷史記錄片。¹⁰¹無論採取甚麼態度，總的來說，作為上級部門派來的工作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維護了學校黨委或黨支部。工作組

100 毛澤東這次關於工作組的談話內容至今未見披露。我們通過其他人後來的一些講話，可以大概知道毛談話的內容。1966年8月1日，陳伯達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說：「主席在杭州的時候給我們說過一句話，主席說，過早地派工作組對於文化革命並不利。」8月8日，趙紫陽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南組會議上說：「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早就指出過，「不要怕亂」，「亂一陣再一分為二」，「不要急於派工作組」。」1968年10月22日，李大章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第四組會議上說：「對大專院校派不派工作組，我在6月12日的杭州會議上，我是親自聽了主席關於不派、少派、遲派的指示的。」江渭清在自己的回憶錄《七十年征程》中說：「我記得中央還曾向我們傳達了毛主席在6月10日、12日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要點，大意是：學校要奪權，重點是大學的運動，中小學也要搞；城鄉「四清」，要搞「文化大革命」；打擊面5%不少了，登報點名要慎重，但各省、市一個不點也不行（有人插話：匡亞明要全國點名）；不要急於派工作組，讓他「混戰一場」，亂幾個月。」（頁515）

101 參見《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2。

雖然也贊成批「反動學術權威」，批「牛鬼蛇神」和「黑幫」，但他們反對亂批亂鬥，要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

在工作組着手控制局勢的同時，《人民日報》連續發表鼓動群眾造反的社論。工作組的所作所為既受到大多數師生員工的歡迎，也遭到一部分人的懷疑和反對。例如，6月2日，北京新市委派遣的工作組三人到達北京工業大學時，很多學生紛紛議論，質問工作組是哪裏來的？派遣機關是新市委還是舊市委？為甚麼不帶個介紹信？當工作組回答要派人回去取介紹信時，有些學生竟登高大呼：「他們想逃跑！」當天，工作組和學校黨委被包圍，學校黨委自認「癱瘓」，甚麼會也召集不成，各系之間失掉聯繫。直到6月6日，學生對工作組的懷疑仍未消除，工作組的一言一行都有人記錄下來，更有甚者，還把工作組的講話錄了音，然後逐字逐句地予以批駁，並且派出代表攜帶錄音到新市委和中央機關告狀。

由於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中央領導層對待運動的認識不一致，注定了工作組必然要犯錯誤。學校師生在如何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分成了兩派。反對工作組的學生們認為，工作組控制運動的做法是保護黑幫，壓制革命群眾，限制運動的深入發展，要求將矛頭對準院校領導。他們以《人民日報》社論為武器，認為自己是按毛澤東思想行事，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而造反的。他們人數雖少，卻自恃真理在握，「心紅膽壯」，和工作組發生激烈的衝突。但大多數人是把擁護工作組和擁護黨聯繫在一起的，對反工作組的人進行激烈的反擊，雙方的爭鬥愈來愈尖銳。一些學校發生趕工作組的現象。

6月7日，北京大學發生了「關門」事件。6月1日以後，北大校園裏人潮如湧，熱鬧非凡。一些人自願去看大字報、串連、看熱鬧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奉命去壯聲勢以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北大的運動難以有秩序地開展。6月7日，北大工作組規定：外校人員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門。北大校門口貼出公告，要求外單位聲援的代表或隊伍，一律在學校門口接待室接待，請不要進入學校內部。校內大字報正在整理，暫不開放。這引起許多激進學生的不滿。後來毛澤東對此作了嚴厲批評。

6月7日，清華大學一些學生貼出大字報反對蔣南翔和校黨委，絕大多數黨員和黨外群眾表示憤慨，與造反者辯論。北大的造反者不顧工作組的勸阻，到清華支持造反者，並揭露蔣南翔在北大歷史系半工半讀班開學典禮上頌揚鄧拓的「罪行」，又引起清華學生與他們辯論。清華派人把北大造反者護送出校，又被說成是「押送」出校。這就是所謂「六七事件」。6月8日晚，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工作組副組長、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周赤萍對劉冰等原清華大學黨委的幾位代理人宣布：「從現在起，學校工作由工作組領導，學校黨委停止工作。……工作組到來之後，你們要幫助工作組，不准許你們搞甚麼活動。」很明顯，工作組是帶着成見進入清華園的。當晚，中央派人召集教育部、高教部兩個部的司、局以上幹部開會，把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作為「黑幫」進行了批判。¹⁰²6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停職反省。清華造反者歡呼雀躍，許多幹部、教師認為自己受了蔣南翔的騙，紛紛起來揭發、批判蔣南翔和校黨委，但也有不少黨員和黨外群眾對此迅速變化的局勢茫然不解。6月11日開始，清華園內出現亂抓「黑幫」戴高帽子遊街的現象。12日，遊街現象愈演愈烈，從早到晚，清華園內到處是自發遊鬥「黑幫」的散亂的人群。工作組多次勸阻不能奏效。直至深夜，工作組還在通過廣播站廣播，勸說同學們回去睡覺。

6月6日，西安交通大學發生了「六六」事件。北大大字報廣播後，西安交大師生貼出大字報萬餘張，聲援北大，批評校黨委，批評省委、高教部、胡耀邦等，大字報矛頭主要是針對校黨委的。6月2日，五十多名交大學生到西北局、陝西省委去，要求領導幫助他們革命。西北局當天下午7時半召開緊急會議，認為交大革命形勢很好，而校黨委不革命，決定向交大派出以陝西省委書記嚴克倫率領的工作組。6月3日，工作組進校，學生們問：校黨委究竟是黑線還是紅線？工作組組長嚴克倫（陝西省委書記）說：大家揭發，是甚麼就是甚麼，現在看至

¹⁰²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頁58—59。

少是不革命的。6月5日上午，工作組根據西北局的指示，通過廣播向全校師生提出：運動的矛頭針對校黨委；校黨委是黑線還是紅線可以討論；試辦文化革命委員會。學生們在揭發校黨委的同時，對這個廣播講話不滿，並懷疑工作組成員有問題，紛紛發電報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到交大來。交大工作組打電話給電報局，查問電報內容，被學生們發現，更激起憤慨。6月6日，交大學生開始哄趕工作組。801—41班學生李世英在大字報中提出了「深挖省委、西北局黑線」的口號。工作組成員一個個被學生所包圍，學生向工作組提出許多質問。工作組組長嚴克倫被六七百名學生包圍，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校園內陸續出現認為省委內有黑幫的大字報，先後有幾十名學生分別到西北局、陝西省委、新華社分社、《陝西日報》社提出省委工作組有黑線，省委有黑線等問題，並到電報大樓貼大字報。西北局辦公廳負責人向學生們明確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機關，陝西省委是西北局領導的，是正確的，省委工作組是革命的。大家要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不要上當。當天晚上，工作組開會，認為漂上來一批「鬧事」的「尖子」，出籠一批牛鬼蛇神，各班都有一點，有的是全班，要組織隊伍追根子。這就是「六六」事件。

事件發生後，劉少奇、陶鑄要《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陳伯達不同意。6月7日、8日、9日三天，西安交大全校各系對「尖子」開了大大小小的各種鬥爭會，並將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遊街。9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¹⁰³ 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6月8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北京第一起趕工作組的事件。造反者因工作組保護院黨委而趕走了進院才四天的工作組。新的工作組進院，不到四天，又要被趕。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筭13日趕到北京郵電學院講話，說明工作組是革命的，造反者給陶魯筭貼出一批大字報。

103 參見《解放軍報》記者宋瓊、張文榮1966年6月21日所寫〈6月2日以來西安交大運動發展的概況〉，這份材料後來被印發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參考文件。

6月14日，清華大學力學系學生王鐵成貼出題為〈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的大字報，劉泉等貼出題為〈現工作組不可信任〉的大字報。此外還有一些向工作組提意見的大字報，但同時也有不少人起來為工作組進行辯護。

6月17日，師大女附中高三(4)班李黎黎等十三名學生貼出一張題為〈工作組站在甚麼立場上〉的向工作組提意見的大字報，說工作組不深入，不發動群眾，質問工作組：「你們是站在哪個立場上？」「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當晚，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辯論」，工作組組織對這些學生進行了批判和鬥爭。

2 北大「六一八」事件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南京大學革命師生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匡亞明〉的消息和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這篇社論給北京大學的學生點了一把火，因為北大學子認為陸平的問題比匡亞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點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鬥爭過。由於陸平等領導被工作組隔離，他們找不到，於是他們就鬥那些能找到的人。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工作組召開全體工作隊員大會。9時左右，在北大校園內發生了亂揪亂鬥事件。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等單位都出現了亂鬥現象。在三十八樓前設立了「打鬼台」，到處揪人來鬥。前後共有六十多名幹部、教師被拉出來批鬥，給他們戴上高帽子，臉上塗墨汁，身上貼大字報，罰跪、揪頭髮、撕衣服、拳打腳踢，拉着遊街，而且還發生了多起污辱婦女的流氓行為。

北大發生的事情其實是所有群眾運動中都會碰到的問題，而工作組把這種情況看得十分嚴重，甚至認為這是「反革命暴亂」，要把它當作反革命事件來進行追查。工作組認為：「這次事件是反革命黑幫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結合，對我們發動的一次突然襲擊，企圖打亂我們的工作部署，破壞運動。」當天中午，召開各系工作組長會，工作組領導說：「今天對我們是一個突然襲擊，牛鬼蛇神大出動，這就給我們

反擊的機會。」這次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暴亂」。工作組於當晚召開了全校師生員工廣播大會，張承先作廣播講話。他說：應該從這次事件中吸取三條教訓，第一是要按毛主席指示，按黨的政策辦事；第二是打破舊秩序後要建立新秩序，要建立糾察隊，維持革命秩序；第三是搞好這場革命要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工作組是支持同學們搞革命的，背着工作組搞秘密串連活動是錯誤的。他要求同學們對當天發生的事件展開連續三天的大討論，來一次大檢查，提高認識、提高政策水平，並查一查搞亂揪鬥的是些甚麼人，他們的目的是甚麼。工作組還作了一些具體規定：鬥爭人要經過工作組討論、批准，等等。

當夜，北大工作組給中央寫了簡報，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簡報報告了事件的經過和他們處理的情況。報告認為：「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並說：「除了這些壞人以外，參加亂鬥的還有兩種人：一種是本身有問題的人，怕火燒到自己身上，乘機表現自己，假裝積極，抓『替死鬼』，亂打亂鬥；另一種人還是單純從個人出氣出發，不聽工作組的勸告，不願黨的政策，不願文化大革命的整體利益。」¹⁰⁴

劉少奇對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表示滿意。6月20日，他將北大工作組關於這次事件處理情況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全國。劉少奇在為中央起草的批語中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¹⁰⁵ 為便於及時了解情況，掌握局面，6月19日，劉少奇要夫人王光美去清華大學，作為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觀察動態，及時反映學校運動的情況，並幫助指導運動。

陳伯達認為，「六一八」事件不簡單，是一個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個「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把這個「地下司令部」挖出來。他還具體

104 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1966年6月20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49—50。

10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642。

提示要按照他創造的天津「小站四清經驗」¹⁰⁶來搞，為此選指派張恩慈到北京大學繪製北大的「反動系統表」。在〈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出後，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決定寫一個正式報告，即〈關於北京大學二十天文化革命情況的報告〉，由工作組副組長兼秘書長張德華負責起草。在這個報告中，在反映「六一八」亂揪亂鬥情況時，作了這樣的表述：「我們抓住這場反革命分子製造混亂，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眾接受教訓。」北大工作組在處理「六一八」亂揪亂鬥事件中，主要整了四個「壞人」。這四個壞人中，一個是庶務科工人劉佳賓，歷史上曾當過國民黨部隊的上尉連長，在運動中幾次帶頭打人；一個是東語系的職工陳應復，此人有流氓習氣，除帶頭打人外，還乘機猥褻婦女；一個是無線電系學生夏林翰，他在參加生物系鬥爭會時，上台扯掉被鬥女性的褲子，後又在台下猥褻女同學。他過去就有過流氓行為，並曾因為在王府井大街商店裏偷東西被抓住受過處分。還有一個人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竊被開除公職，當天在參加批鬥會時帶頭打人，且態度蠻橫。通過追查，工作組並沒有查出與「黑幫」有聯繫的人，也沒有發現甚麼「反革命分子」。

3 「反干擾」

在6月20日前後，北京高等院校中形成了一個反工作組的浪潮。幾天之內，有三十九所高校的部分學生轟趕工作組，其中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林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北京醫學院的工作組都是兩次被趕，北京工業大學工作組更是三次被趕。

¹⁰⁶ 陳伯達曾於1964年在天津市南郊區小站搞「四清」運動試點。在他的指揮下，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有250多人被列為反黨集團成員，說敵人通過打進來、拉出去的方法，組成了一個龐大的聯絡網。他還繪製了三個「反革命集團」的社會關係分布圖，說明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組織系統，並把「反黨集團」的根子追到區委書記、宣傳部長。陳伯達把他發現的嚴重「敵情」和「奪權鬥爭」經驗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1964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他的「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經驗」，發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要求「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鬥爭」。

6月20日，在北京輕工業學院召開的大會上，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到會，宣布撤銷受到該院一些學生強烈反對的原工作組組長張萬合的職務，改派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鄧東哲任工作組組長。

6月20日凌晨，北京地質學院黨委常委李貴和一些幹部、教員，上書中共中央、國務院，指責該校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提出「奪回我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權」的口號。反工作組的學生舉行了支持他們的示威遊行。多數黨員和黨外群眾不以為然，陶魯箴、何長工（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指示工作組「要沉着頂住」。6月21日，何長工、胥光義（地質部副部長）、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到地質學院講話，批評少數人鬧事，圍攻工作組，指出工作組是革命的。擁護黨委和工作組的一派學生也進行了示威遊行。

6月20日晨6時，北京師範大學高樹奎、譚厚蘭等十七人貼出題為〈孫有餘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反對工作組組長孫有餘。還有人貼出大字報〈郭影秋是甚麼人？〉就北京衛戍部隊準備在暑假暫住人民大學一事質問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此舉是否彭真的陰謀？孫有餘作廣播講話，澄清了事實，批評了錯誤意見，認為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新市委，也就是反對黨中央，提出了「反對干擾」的意見。中午，又有人貼出了〈孫有餘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晚上，北京新市委武振聲、袁智平代表新市委接見北師大師生，作了三點指示，即要求「信任工作組、支持工作組、幫助工作組」。6月23日，譚厚蘭貼出〈必須重新評價高樹奎同志的大字報〉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

北師大工作組在6月23日的簡報上指出：「有些同學要欺騙群眾，製造混亂，造謠說彭真要搞政變！」譚厚蘭等少數反工作組的學生受到批評，有的甚至受到批判鬥爭。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組派曹軼歐到北師大調查「六·二〇」等事件。孫有餘澄清所謂彭真要搞政變的話，被康生說成「是在替彭真辯護」，並於7月13日把孫有餘叫到釣魚台批鬥。¹⁰⁷

107 這一情況參見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297—298。

孫有餘是從工交口調出，經文教口派到北師大，從來沒有聽說過，也不知道自己在北師大究竟有甚麼錯誤，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人七嘴八舌鬥得很凶，都是拿些嚇人的大帽子往他頭上扣，並無多少事實。這樣毫無道理地批判一通後，要求他回北師大向全校師生員工檢查。孫有餘拒絕檢查。7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撤銷孫有餘的工作組組長職務。7月21日，北師大簽名要求留下孫有餘的師生達三千多人。

6月20日，北京師大一附中學生陳永康、何方方等貼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說：「6月9日工作組來了以後，我校鬥爭形勢急轉直下，無產階級左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備受壓抑」，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勾當。運動剛剛開始，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勾德元（按：該校工作組組長）之流就颳陰風，造謠言，煽風點火，挑撥分裂，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這件事很快反映到劉少奇那裏，當天下午，劉少奇把駐師大一附中的工作組成員找來，要他們組織師生討論學校裏出現的反工作組的大字報，發動群眾回擊反工作組勢力。他對勾德元說：「開始出現一些問題了，說你是黑幫，給你貼了十幾張大字報。不要緊。大字報出來，證明內部意見不一致嘛，證明他們對運動不滿，學生之間不團結嘛。」「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要把這張大字報討論好，再鬥爭。」¹⁰⁸ 劉少奇的這段話表明，他是準備把1957年反右派的一套做法運用到當前的運動中去。

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組織全校師生對陳永康、何方方等進行批判，於6月24日到6月30日，召開了三次鬥爭會。全校受到批判和打擊的達一百多人。有人宣布陳永康、何方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鬥爭會上還出現了武鬥：工作組7月11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

10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024—1025。

查。第二次辯論會有一個左派學生打陳一個嘴巴。牛德龍(另一名反工作組的學生)這個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團中央負責人還根據師大一附中的情況寫成〈北京師大一附中反擊假左派經驗總結〉，登在《中學文化革命通訊》上，並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作為經驗進行了介紹。

清華大學發生了「六·二一」事件。工程化學系902班學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張大字報上寫下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表示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蒯大富在前幾天就提出要趕走工作組，薄一波6月19日去清華曾與蒯大富談話，蒯大富與薄一波進行了辯論。21日，王光美明確指出：蒯大富要奪權。薄一波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6月24日，清華造反者在工作組召開的聲討會上批判工作組。工作組組長葉林講話，給予批駁，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這是一種反革命行為。6月26日，廣大師生員工在清華園內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口號。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了「反蒯鬥爭」，多次鬥爭蒯大富等造反者，被鬥者有一人(青年教師史明遠)自殺身亡，有一名學生臥軌自殺被軋斷了腿。

6月20日，由陳伯達署名，向劉少奇等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提出書面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兩項建議〉：

(一) 建議全國大中學校、機關單位在適當時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領導文化革命運動。小組成員名單由群眾提出，經過群眾充分醞釀，進行選舉。票選或舉手表決，由群眾決定。

(二) 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時候，可以由上級派工作組。工作組名單必須經過認真審查。應當是無產階級革命派，不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工作組的工作方法，必須認真地走群眾路線，不能包辦代替，獨斷專行。

軍隊按中央批准的辦法辦理。

劉少奇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大會上對此作了說明：

陳伯達書面提出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還是要工作組，我也發言要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¹⁰⁹

對北京出現的反工作組的現象，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感到事態嚴重，認為運動出現了逆流，許多單位不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橫掃一切，是在野右派以極左的面目出現，爭奪運動的領導權。中央決定，堅決支持工作組排除干擾。

6月21日，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提出：「有的學校出現趕工作組、向工作組奪權，要奪檔案、槍支、廣播這些權，不准隨便提出奪權；不好的工作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大部分黨委是好人嘛。」他還提出：要注意反革命分子有的用「左」的面貌出現，有的用右的面貌出現，我們利用大字報，反革命也利用大字報；我們要用〈二十三條〉的精神，禁止打人、污辱人和變相的體罰。¹¹⁰

6月22日，薄一波在給北京地質學院工作組的批示中說：

應該明確答覆學生，李主任（按：指李人林）講的話是對的，工作組是上級黨委派去的，它是代表黨組織工作的。要號召左派起來跟工作組一起進行文化大革命。目前我們不能隨便撤走、撤換工作組。如果院黨委有問題了，派工作組去行使職權，這就等於奪回了黨的領導權。如果有人再非趕工作組不可，那勢必是奪工作組之權，亦即奪黨的領導權，那誰來掌權呢？工作

109 《劉少奇傳》，下冊，頁1033。

110 《劉少奇傳》，下冊，頁1025。

組有缺點錯誤，可以改正，但不能隨便給工作組加甚麼「保皇黨」之名稱。

6月23日，劉少奇在轉發中南局、西北局的報告時指出：「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批示要求：「對大中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對於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6月23日，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在北京飯店作報告，提出：多數反工作組的人是人民內部矛盾，但是確有壞人「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他提到毛澤東講「一個游魚三個浪」的話，並解釋道：「現在形勢大好，各校反動勢力，反動觀點，反動活動出台了。反革命攔腰一截，把我們的運動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沒有甚麼了不起，抓起來不就完了！」「對右派趕工作組一定要清理。在這緊要關頭，共產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¹¹¹就要上台了。」他提出了「反干擾」的要求。此外，李雪峰還提出了恢復黨團組織活動，因為他認為：

北京市的黨員、團員，黨組織、團組織，大多數是好的，是擁護毛主席、擁護黨中央的。有的過去就對前北京市委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進行過抵制和鬥爭；有的雖然一時受了蒙蔽，但是在「三

111 納吉·伊姆雷 (Nagy Imre)，匈牙利前總理。出生於農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加奧匈帝國軍隊，同沙皇俄國作戰時被俘。1918年在俄國加入共產黨，並參加紅軍作戰。1944年末隨蘇軍回匈牙利，任匈牙利臨時政府農業部長等職。1949年因犯「布哈林傾向」錯誤被撤銷政治局委員職務。1951年復職。1953年7月任政府總理，1955年3月因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發生後，他重新出任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府總理。11月4日，蘇軍進入布達佩斯。納吉出走，後被捕。1958年6月16日，被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以「叛國罪」處決。1989年5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全會認為，納吉事件是「捏造的政治事件」。6月，在其忌日舉行重新安葬儀式。

家村]和它的根子被揭露以後，他們立即行動起來，投入了戰鬥；有的雖然犯了錯誤，但是他們在黨和群眾的教育、幫助下，許多人正在同錯誤徹底決裂，放下包袱，輕裝前進。我們的共青團是黨的忠實的得力助手。我們的黨員、團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

6月30日，《北京日報》根據李雪峰講話的精神發表了社論〈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一定站在革命鬥爭最前列〉。

北京各高等院校傳達了李雪峰的報告，先後開展了「反干擾」運動，打擊了部分對工作組有意見的師生，使局勢逐步穩定下來。在「反干擾」時期成立的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革籌委會」，其成員絕大多數是擁護工作組的。工作組在執行新市委關於「反干擾」的指示時，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待所有反對工作組的人，對形勢看得相當嚴重，並採取了嚴厲的壓制措施。許多黨的高級幹部和工作組成員將當時的形勢與1957年反右派相聯繫，並採取了一些與反右派相類似的措施。北京各大中學校反工作組的人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蒯大富被開除了團籍，並被關押了十八天。北京林學院開除了兩名「右派學生」的中共黨籍，取消了兩名中共預備黨員的預備黨員資格。北京市有一百多名學生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統文革大學組根據二十四所高校¹¹²所作的初步排隊統計，在二十四校教職工和學生總數99323人中，有31877人被劃為左派（佔總人數的32%）；57235人被劃為中間派（佔總人數的57.9%）；10211人被劃為右派（佔總人數的10.1%）。在分類排隊中，教師、職員、工人、學生中被劃為左、中、右派的人數和所佔比例如下表：

112 這二十四所院校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北京石油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北京體育學院、北京農業機械學院、北京林業學院、北京鋼鐵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農業勞動大學、北京工商專科學校、河北農業大學園林分校、北京礦業學院、北京戲曲專科學校、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北京外語學院、河北北京師範學院、北京第二醫學院。

| | 總人數 | 左派(%) | 中間派(%) | 右派(%) |
|----|-------|---------------|---------------|-------------|
| 教師 | 16878 | 4923 (29.3%) | 9364 (55.7%) | 2591 (15%) |
| 職員 | 8900 | 2824 (31.6%) | 4852 (51.4%) | 1494 (17%) |
| 工人 | 6542 | 2086 (31.7%) | 3941 (60.3%) | 515 (8%) |
| 學生 | 67003 | 22044 (32.8%) | 39348 (58.5%) | 5611 (8.7%) |

工作組對原各高等院校的黨委和領導幹部的情況一般都估計得比較嚴重，二十四所院校的黨委九成以上都被定為三、四類¹¹³，教研室主任以上幹部六成以上被定為三、四類幹部。詳細數字見下表：

| | 總人數 | 一類(%) | 二類(%) | 三類(%) | 四類(%) |
|---------------|------|------------|-------------|-------------|-------------|
| 院校黨委 | 24 | 0 | 2 (8.3%) | 14 (58.3%) | 8 (33.3%) |
| 系黨總支 | 180 | 8 (4.5%) | 31 (17%) | 98 (54.5%) | 43 (23.9%) |
| 部處 | 124 | 12 (9.6%) | 43 (34.7%) | 51 (41.2%) | 18 (14.5%) |
| 教研室 | 669 | 58 (8.7%) | 246 (36.7%) | 275 (41.1%) | 90 (13.5%) |
| 教研室主任 以上幹部 | 2603 | 243 (9.2%) | 814 (31.3%) | 983 (37.8%) | 563 (21.7%) |

4 工作組與紅衛兵

6月8日晚上，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駐清華附中。工作組組長章建華，組員多是在中央團校學習的各地團幹部，工作組一共十五人。同時，擔任海淀區工作隊副隊長的劉晉（原中央團校哲學系主任）也常駐清華附中，指導工作。

這時候的紅衛兵組織還沒有後來那樣講究出身，在清華附中紅衛兵中幹部子弟佔大多數，但非幹部子弟也大約佔三分之一。紅衛兵人數雖少，但它有組織，有目標，有幹勁，力量正在迅速壯大；相反，

113 在中共中央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中，曾把幹部分為四種：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文革初期工作組大都將幹部按一、二、三、四類（即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進行了排隊。當時一般將四類幹部都看作是敵我矛盾性質的。

學校領導人卻在瞬息萬變的形勢下顯得力不從心，不知所措，只能處於被動應付的局面。工作組一進校，大多數師生就已經認定，校領導肯定是有問題的。

6月9日晚，工作組在學校操場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劉晉在會上旗幟鮮明地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稱紅衛兵是堅定的革命左派。他嚴厲要求以萬邦儒為首的附中黨支部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事後知道，清華附中工作組之所以能夠一進校就明確表態支持紅衛兵，是因為團中央領導人當時已經認定以蔣南翔為首的清華黨委爛掉了。胡克實在對劉晉等人的講話中就說過：「清華大學的領導對文化大革命是採取對抗的態度」，「蔣南翔用他取得的領導權來進行反對文化革命的活動」。他要求清華附中工作組「要進一步挖出清華附中的黑線人物」，「清華附中搞好，是清華的突破口」，「希望從你們附中挖出清華黨委的問題」。¹¹⁴

工作組進校後，校內形勢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絕大多數師生很快就從「擁護黨支部」，批判紅衛兵，轉向「口誅筆伐」萬邦儒等附中的「牛鬼蛇神」。在工作組的主持下，於6月17日、19日和20日，三次召開全校師生聲討批判大會。在6月20日的聲討批判會上，劉晉宣布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停職反省。紅衛兵的隊伍也得到迅速壯大，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人數從101人發展到三百多人。紅衛兵的組織受到「左」的階級路線的影響，發展的新成員大多為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學生，即所謂「紅五類」，但也並不是清一色的，據當年9月的一個統計，清華附中紅衛兵中出身非紅五類的大約佔一成左右。¹¹⁵

清華附中工作組於進校後不久寫的一份匯報材料中介紹了當時的一些情況：

到目前為止，全校師生已貼出二萬多張大字報，揭露了一批嚴重問題，揪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初步開展了批判鬥

¹¹⁴ 〈胡克實、惠激昌在劉晉匯報時的講話記錄〉(1966年6月10日)。

¹¹⁵ 清華附中紅衛兵、革委會：〈關於紅衛兵組織的七個問答〉(1966年9月13日)。

爭，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風。工作組進校時，右派勢力氣焰囂張，左派力量孤單，左派學生僅101人，佔學生總數的8%；左派教師二人，佔教職工總數的1.7%。目前，左派學生已增加兩倍，佔全校學生總數的13.9%。6月8日，外校三百多人來聲援左派，被拒之門外十小時，並調來大學部的打手——校衛隊，請來海澱分局的便衣隊，企圖鎮壓群眾運動。6月4日，團中央派二人來了解情況，被盯梢、偷聽。在工作組進校前，十七名幹部子女自發地組織了紅衛兵。他們的主要特點：一是根子正，出身成分好，大部分是革幹子女；二是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三是敢於革命，鬥爭性強。工作組進校前，儘管他們力量單薄，受到圍攻，但他們堅持革命，勇於向學校提意見，敢於向一切牛鬼蛇神開火。他們不怕開除、不畏失學，堅決頂住了右派的圍攻。事實證明，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年輕一代，聽黨的話，敢於革命，真是可貴得很！可愛得很！……進校二十多天來，基本上沒有發生打人、體罰、破壞公共財物等現象。¹¹⁶

清華附中工作組進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紅衛兵的，但不久即與紅衛兵產生了分歧。6月21日，清華附中召開全校師生代表大會。在選舉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選問題上，紅衛兵與工作組發生了分歧。工作組要求革委會要有廣泛的代表性，應該吸收一些紅衛兵以外的左派參加。紅衛兵認為那是「拉夫」，會使革委會背「包袱」。在紅衛兵的堅持下，清華附中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全部由紅衛兵擔任。「從這一事件中，工作組發現紅衛兵領導核心對工作組的領導和團結大多數的問題上，存在不正確的認識。」¹¹⁷

在此前後，紅衛兵與工作組之間還發生了一些磨擦，一些紅衛兵違背工作組布置的學習、討論內容，自己另搞一套；一些班級不願工

116 〈清華附中工作組的匯報材料〉（1966年7月4日）。

117 清華附中工作組：〈清華附中左派學生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和解決情況〉，載共青團中央：《文革簡訊》，第10期。

作組的勸阻，開了「整」右派學生¹¹⁸的會；有的革委會成員在同學中公開發論與工作組的矛盾。當時社會上也很混亂，有傳言說「團中央有問題，三胡¹¹⁹完蛋了」。

1966年7月14日，劉少奇在對北京師大一附中的指示中提出：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此後，不少中學的紅衛兵組織被當作非法組織看待。地質附中紅衛兵、二十五中東風等組織被強令解散，許多未被解散的中學紅衛兵組織也受到工作組的批評、指責，與工作組處於對立狀態。在清華附中，工作組要求首先集中火力打擊極少數牛鬼蛇神，紅衛兵則提出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舊思想。工作組要求團結95%以上幹部、群眾，紅衛兵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工作組認為黨的領導必須通過工作組來體現，紅衛兵則提出必須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被工作組認為是「不要工作組的領導，搞紅衛兵專政」。

6月23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經鄧小平審閱過的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強調「團結大多數」的問題。清華附中紅衛兵認為這篇社論只講團結不講鬥爭，調子太低，火藥味不濃，是折中主義。

6月24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兩張大字報，一張是與《中國青年報》「六·二三」社論針鋒相對的〈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是徹底鬧革命〉，另一篇是〈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¹²⁰。在後一篇大字報中，紅衛兵根據自己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宣稱：「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

118 從清華附中工作組編的簡報和劉晉向胡克實的匯報記錄中可以看出，在對「右派學生」的認定上，工作組與紅衛兵並無不同，但在對「右派學生」的做法上，工作組更講究政策和策略。

119 指當時團中央的三位負責人：胡耀邦、胡克實、胡啓立。

120 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11期刊登本篇和〈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篇大字報時，將題目分別改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7月4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又貼出〈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文中引用了毛澤東1939年的一段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大字報既是針對《中國青年報》的社論，也是針對工作組的。

6月25日，清華附中個別紅衛兵成員選把大字報抄到清華大學去，表示對反對工作組的蒯大富的支持，引起清華大學擁護工作組的許多學生的憤慨，紛紛到清華附中貼反對紅衛兵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組「逮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紅衛兵」。

清華附中工作組是受團中央領導的，團中央領導人非常重視清華附中的工作，認為這是打開清華大學黨委的重要戰線。胡克實要求在清華附中蹲點的海淀區工作隊副隊長劉晉每天晚上九點鐘給他打電話，他十一點向李富春匯報。工作組承認紅衛兵是左派，但感到紅衛兵獨立性太強，難以駕馭。胡克實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講話精神，提出立即恢復黨團組織，溶化紅衛兵的辦法。¹²¹ 胡克實並具體指示工作組要抓紅衛兵中的壞人。但清華附中工作組不願與紅衛兵公開決裂，力爭主要通過誘導解決紅衛兵的問題，而紅衛兵則力爭工作組的支持，不使關係破裂，雙方都想以策略取勝。因而直到工作組撤出，雖然雙方的爭執、磨擦不斷，卻也始終沒有公開撕破臉面，反目為仇。

同是第一批紅衛兵組織的北大附中紅旗，受到北大工作組派到北大附中的工作組的強大壓力。7月3日，北大工作組副組長張德華在北大附中召開座談會，說紅旗小組有「方針性」錯誤，提出用分化中間，先拉群眾，孤立少數的方法打垮紅旗小組。7月11日，張承先在北大附中召開部分師生座談會，批評紅旗小組是「關門主義」、「宗派主義」。紅旗小組幾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人數由三百多人銳減為一百多人。

應該指出，像清華附中、北大附中這樣的情況，在整個北京市還是屬於少數的現象。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學校內的紅衛兵組織（主要

121 北京師大女附中等學校即恢復了黨團活動，成立了臨時黨支部、臨時團委等組織。

在中學)與工作組的關係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紅衛兵一般是把工作組的領導視為黨的領導，很少發生「頂牛」的現象。

在北京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區的大城市內，也出現了一些學生反對工作組的事件。重慶市委派往重慶大學的工作組因肯定校黨委而遭到一些學生的反對，認為市委和校黨委串通一氣，鎮壓學校的文化大革命。6月18日，學生集會公開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組」、「在黨中央和毛主席沒有派人來之前，自己組織起來鬧革命」等口號。重慶市委被迫調回了原來的工作組，派出新的更大的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6月28日，浙江大學的部分學生起草了給毛澤東、黨中央的電文，聯合了1861人署名。電文指責省委派出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強烈要求撤銷工作組。學生選集隊到省委大院靜坐要求省委轉呈。¹²²

5 毛澤東致江青的信

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給江青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獻。毛澤東在信中說：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按：指林彪「五一八」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

122 參見《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48。

些猴氣，是為次。……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這封信當時是完全保密的。7月11日，周恩來從北京飛到武漢，陪同毛澤東會見尼泊爾王太子比蘭德拉。毛澤東讓周恩來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了此信。周恩來看後建議找林彪談談。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7月14日從上海飛大連與林彪談話，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京後修改5月18日講話。7月15日，周恩來返京後又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原信遵照毛澤東指示銷毀，保留了抄件。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時，將毛澤東的這封信作為會議文件公布。會議簡報刊登了江青對這封信的解釋，說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對毛澤東的這封信，後人議論頗多，但見仁見智，未有定論。有人說，此信是毛澤東的自我解剖，是要反對對他的個人崇拜的宣傳。此說絕對錯誤。信中雖然說他不相信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並說「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但他肯定了林彪的「吹」是為了「打鬼」，儘管「違心」，他還是願意「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實際

上，毛澤東當時是希望搞點個人崇拜的。1970年，他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省的黨權，各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的權，我也管不了，所以那個時候無所謂個人崇拜。」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樂意接受全黨全國對他的個人崇拜的，那麼多的人那麼起勁地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還不是投其所好！還有人說，毛澤東的這封信反映了他對林彪的不放心，認為這封信是毛澤東為選林彪做接班人而寫的一個「備忘錄」。事實上，林彪事件後，中共中央也確實是把這封信作為「備忘錄」公布出來的，旨在證明毛澤東明察秋毫，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當然也是無稽之談。令毛澤東感覺「不安」的，不是林彪關於政變問題的提法（中央轉發林彪「五一八」講話的批示中，對林彪關於政變的主要觀點、講法都作了肯定），也不是林彪要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傾向（毛澤東這時正需要點個人崇拜），而是林彪在吹捧毛澤東時所使用的一些過分的詞句，如把毛澤東吹成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更偉大的人物，說毛澤東「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論者在經過冷靜分析後得出結論，說毛澤東的這封信是他在「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¹²³，是很有見地的。

6 撤銷工作組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他在聽取了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匯報，看了北大、北師大、清華、人大四所大學反工作組的材料後，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勢非常不滿，但他並沒有馬上在工作組問題上明確表態。

7月19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撤銷工作組的意見，說：「工作組不一定比學生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組整

123 劉林元：〈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解讀〉，《南京社會科學：經濟哲學版》，1995年第11期，頁24—31。

學生。」陳伯達的意見得到周恩來、康生、陳毅、陶鑄等的支持，但遭到鄧小平等多數人的反對。鄧小平說：「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留，代理黨委工作。」¹²⁴ 劉少奇支持多數人的意見，說：「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現在是如何幫助他們，教育他們，總結工作經驗；學生中間認識不一致，行動不一致，可以再辯論。」

7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規劃〉。會上對工作組問題又發生爭論。陳伯達再次提出取消工作組，結果還是遭到多數人的反對。鄧小平說：「要教會工作組做工作。有的學校沒有工作隊恐怕不行。」劉少奇說：「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現在工作組還是要的。實在不行的，撤了，撤了還要換，因為沒有其他力量領導。」鄧小平在會上說：「北大沒有個黨委代替，撤工作組我不贊成。」代表軍隊參加會議的葉劍英、劉志堅也明確反對撤工作組。從林彪同意軍隊派人參加地方單位的工作組這一點上看，林彪很可能也是同意派工作組的。

直到7月23日，毛澤東給人們的印象還是同意派工作組的。當天，他在總政治部〈關於抽調軍隊幹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報告上批示「同意」。這個請示報告的第一條意見就是：「採取抽調幹部參加地方四清的辦法組織工作隊，支援地方文化革命。」但實際上，毛澤東另有想法。在此期間，毛澤東說過：「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他還說：「『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

124 此處根據《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1027。另據李雷峰在〈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一文中的回憶，鄧小平在陳伯達講話後，「站起來，叉着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甚麼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裏？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載《回首「文革」》，下冊，頁657。

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

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頤年堂開會。¹²⁵會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提出批評，他說：

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裏，中宣部不在我們手裏，文化部不在我們手裏，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裏，這些東西都不在我們手裏，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你們都要下去，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裏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把工作組一撤，把黑幫停職反省就完了，這樣可以快點。……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只有讓他們自己搞，才能搞好，我們都不行，我也不行。現在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甚麼名堂來的。

7月25日上午，會議繼續進行，與會人員又增加了前來北京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預備會議的各中央局書記。毛澤東嚴厲批評工作組搗了很多亂，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提出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鬧革命。他說：不准包圍報館，不准包圍省委，不准包圍國務院，不准到中央來，都是阻礙群眾革命。天天忙於日常事務，不下去跑，沒有感性知識，怎麼指導運動？當有人談到北京各大學工作組的情況，認為北京大學的情況比較好時，毛澤東說：「我到北京一個星期，前四天傾向於保張承先，後來不贊成了。各單位、各機關的工作組是起阻撓作用。張承先的工作組、清華工作組，都起阻撓作用。」有

¹²⁵ 據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這次會是7月24日午後在釣魚台十二號樓開的。參見穆欣：〈關於工作組存廢問題〉，載《回首「文革」》，下冊，頁638。

人講到：工作組的同志是從全國來的，多數是好的，有從解放軍來的。毛澤東說：「甚麼海軍、空軍、陸軍，甚麼張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當有人談到貼第一張大字報的七人中有四五個人現在不贊成聶元梓時，毛澤東說：「分裂就分裂，不在聶元梓這個人有缺點，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槍。」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江青等於7月22日開始，去北京大學等校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此後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也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北京各高等學校去調查或蹲點）。陳伯達、江青等人在北京大學活動時完全把領導北大運動的工作組甩在一邊，只與聶元梓等少數人接觸，實際上他們在如何對待工作組問題上已經是成竹在胸，他們就是去挑工作組的毛病，鼓動群眾起來反對工作組。7月25日晚，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學召開座談會，隨後又召開了有萬人參加的「辯論大會」。會上的辯論很激烈，一些學生發表了駭厲指責工作組的講話，批判工作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鎮壓了下去，把學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在會上控訴了工作組的「罪行」，當彭小蒙說到「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江青說：「你們是太陽，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這就是「小太陽」一說的來歷。但多數學生在發言中不同意說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六一八」事件的處理是正確的，工作組是「延安」，絕不是「西安」。康生在大會上說：「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說成是黨中央派來的，毛主席派來的，你們別聽那一套！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

7月26日晚，江青等人再次到北大召開萬人「辯論大會」，大會開成了對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的批鬥大會。陳伯達在會上講話說：

對「六一八」事件怎麼看，是革命事件！看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對工作組的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在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問題上辯論得這樣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我贊成大家的意見，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北大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

同學們走上革命道路的壞工作組，一個障礙物，是壓制你們革命的蓋子。有的同學為工作組塗脂抹粉，除了別有用心的人不說，在一些同學中，好像沒有工作組就不能革命了？！要把壓在同學們頭上的蓋子揭掉，讓同學們自己起來革命。建議北京市委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

隨後，李雪峰即代表北京市委宣布撤銷北大的工作組。江青建議北京大學「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文化革命運動的權力機關，自己起來鬧革命」。她還點名要聶元梓來籌建這個委員會。¹²⁶

在這次大會上，江青有一段絕妙的表演。在大會進行中，江青突然情緒激動地說道：「我揭發，張承先是個壞人。他把階級鬥爭搞到我家裏來了，我的女兒李訥在歷史系受到壞人的迫害，這個壞人是張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個叫張少華的騙子，她自稱是我的兒媳婦，根本沒有這回事，我根本不承認。這個騙子也是張承先支持的。」這種十分離譜的「揭發」令全場不少人感到驚愕，會後很多師生議論：真不像話，怎麼把家庭問題也扯進來了。江青的這段講話極大地損害了她剛剛在群眾中樹立起來的毛澤東代言人的形象。

7月26日，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由陶鑄傳達了毛澤東前兩天談話的內容。會議最後決定撤銷工作組。第二天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親自對這個決定作了修改。

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到北師大召開全校群眾大會，康生在大會上信口開河地說：

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建立他們的資產階級專政！策劃在北大、人大每個學校駐上一個營的部隊，這是千真萬確的。……彭真大黑幫要去北大、人大準備政變，要奪取政權，孫有餘(北師大工作組長)

126 張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組〉，載《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頁99—100。

卻說是造謠！你們看孫有餘是甚麼立場！同學們，你們想一想，這樣替彭真黑幫辯護，應該不應該罷他的官呢？¹²⁷

當天，海淀區中學文化革命工作隊在北京展覽館召開革命師生代表大會。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在發言中介紹了江青等人7月25日晚在北大群眾大會上的講話內容，引起與會者的轟動和會場的混亂。會議中間，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來到會場。王力不聽海淀區工作隊隊長周杰匯報情況，當場就向大會宣布「罷海淀區工作隊長周杰的官」，並通知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覽館繼續開會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在7月28日西城區召開的革命師生代表大會上，江青也一樣派人去罷了西城區工作隊隊長胡啓立的官。¹²⁸

7月28日晚，在北京展覽館召開了批判工作組大會，江青等人到會，表示支持學生反工作組。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作了控訴工作組的發言，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駱小海、鄺桃生宣讀了一論、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並請江青把大字報呈送毛澤東。他們在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寫道：有人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反動的，請您老人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反動的大字報。（大意）

在這幾天之內，北京大中學校內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的幾次講話中，大多數人都能清楚地預感到：工作組的末日到了。與工作組僵持多日的清華附中紅衛兵乘勢寫出〈三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

海淀區的許多學校發生了驅趕、毆打工作組人員的現象。打得最

127 1966年8月2日，鄧小平在中國人民大學群眾大會上講話時，有人遞條子問及所謂「二月兵變」問題，他明確作了澄清，說：「剛才紙條上寫的有關『二月兵變』的事，我們查了，沒有這回事。那是因為軍隊要駐在北京，用一些民房，後來軍隊的領導同志考慮到住在學校不方便，軍隊和學生混在一起不好。」關於康生製造、散布「二月兵變」的謠言之事，詳情參見李志堅：〈「二月兵變」之謎——揭露康生對彭真、賀龍等同志的一大誣陷〉，《北京日報》，1980年12月10日；錢鋼：〈「二月兵變」真相〉，《解放軍報》，1980年12月7日。

128 鄭澆：〈「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的歷史公案〉，《青運史研究》，1998年第1期，頁38。

慘的是十九中工作組組長繆子玲。她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肉模糊，血漿凝住了襯衣，襯衣根本脫不下來，只能一條一條地剪下來，在場的醫務人員一邊剪一邊流淚。中央團校副校長馬石江(海澱區六十六所中學的工作組都是由中央團校派出的)組織人員起草了給中央的信，報告了因王力罷周杰的官而引發學生打、攆工作組的情況。馬還讓被打的工作組成員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華北局三處告王力的狀。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陳伯達還向胡耀邦發難，說胡是「謊報軍情」。¹²⁹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發出〈關於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文件全文如下：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為了更好地放手發動群眾，依靠革命師生的高度革命熱情和自覺性，更有利地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反動的學術權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學方針、方法，目前所採取的在大專學校派工作組的辦法，經檢驗證明已經不適應上述的革命要求，因此，決定撤銷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在工作組撤銷之後，大專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師生員工分別選舉、成立各級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負責領導。

各大專學校應當迅速在統一的大會場，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宣布這個決定。根據各校的具體情況，由本校各單位提名，成立臨時委員會或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全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選舉等工作。

宣布上述決定後，上級派到各校的工作組應在該校集中學習，聽取群眾意見，有的因為工作需要，可以離校，文化革命委員會要他們全組或其中成員回校時，可以隨時回校。

這個決定也適用於中等學校。¹³⁰

¹²⁹ 當時有紅衛兵小報稱：毛主席為中央團校教師被紅衛兵毆打事件報告不實，批評鄧小平「謊報軍情」。中央團校教師被打是胡耀邦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向鄧小平報告的，鄧小平告到毛主席那裏，江青派人核對「查無此事」，毛主席才發了脾氣。參見紀念馬石江同志文集編輯組：《用火寫在天空的生命——紀念馬石江同志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74—75。

¹³⁰ 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7月29日，北京市委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宣布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李雪峰在大會上講話說：

新市委曾經請求中央有關單位，國務院有關部門和有些省市支援我們，對各學校派出了工作組。經驗證明，派工作組的辦法是不適合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大多數工作組同志由於倉促派出，市委自己對於領導文化大革命無經驗，我們又沒有向他們交代清楚，他們也不會搞文化大革命，因而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有少數人犯了嚴重的錯誤，群眾起來罷了他們的官。例如北大工作組的張承先，師大工作組的孫友餘，海淀區中學文化革命工作隊隊長周杰等，這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新調來市委主管文教的書記，人大副校長郭影秋也犯了錯誤，決定撤銷他的市委書記職務，回人民大學去作檢查。

鄧小平在講話中說：

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義講幾句話。現在市委宣布從大專學校撤走工作組，必須說明，在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後，以新市委名義向大專學校派工作組是中央同意的。當時舊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員很少，各大中學校革命學生和教師起來鬧革命，紛紛要求新市委派人領導運動，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學校的工作組，一種是新市委直接派的；一種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河北省以及四清工作隊抽調的幹部，臨時集合起來，由新市委派出的；另一種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門，國務院各部門派出的。現在市委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撤銷工作組，這是因為經驗證明，工作組的形式，不適合於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必須加以改變。

周恩來在大會上說：

我們倉促地決定了，迫不及待地到處派工作組。工作組是從另外的機關另外的地方調來，倉促上陣的，他們沒有經驗，特別是從

政府各行政部門調來的工作組更是習慣於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像我們報紙上號召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來做工作，這樣，新的工作組去，開始同學們不論大學、中學都是熱情歡迎，但不久情況就變了，從隔閡走到對立。……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嘛。……儘管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志還是好的，主觀願望是要搞好的，但效果怎麼樣？冷冷清清，或造成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學校和學校的聯繫也隔開了，那勢必就冷冷清清了。這套方法完全不適合這種轟轟烈烈的革命師生的革命運動的要求。

劉少奇在講話中談到了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

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革命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不知道，主要的要靠你們革，要靠各學校廣大革命師生員工在革命實際中間來學會革命。……怎麼革命？只能講一句話，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的群眾，依靠革命的同學們，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團結廣大群眾，放手發動他們進行革命。只能講這個辦法，更具體的辦法你們同學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現在你們知道的比我們多，我們向你們學習。你們現在有飯吃，吃飽了也不上課。中央決定半年不上課。半年又吃飯又不上課幹甚麼呢？幹革命！就是要你們鬧革命！如何鬧，在這半年裏，你們可能取得很大進步，我們也要跟着你們學習一些。131

劉少奇的講話頗耐人尋味：作為國家主席和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副主席，他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樣進行，怎麼個搞法，那麼，就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知道了。

131 李雪峰、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的講話，據《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從後台走出來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響成一片。毛澤東的興奮喜悅之情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沮喪惶惑之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這次大會以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李雪峰的話錄音在全國各大城市播放，北京和全國各地相繼都撤銷了工作組。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進展情況仍不滿意。他認為前一段運動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下走了彎路，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把剛剛興起的文化大革命壓了下去。他決定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以便排除阻力，重新把運動全面發動起來。

第三章

再發動

工作組撤銷之後，文化大革命又面臨着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認為，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來，文化大革命在發動過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幹部。1966年7月，毛澤東回到北京後很快就下令撤銷工作組，對此許多老幹部都表示不理解，陳毅當時就發牢騷說：「這是乾綱獨斷。」¹毛澤東曾於1967年說過：「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²毛澤東利用召開中央全會的辦法，排除一切阻力，堅決將文化大革命搞起來，也就是如林彪所說的「重整旗鼓再進攻」。³

1 據姬鵬飛回憶：「8月初，中央文革小組宣布撤銷工作組以後，那時，我對撤銷工作組也想不通，有一次，我與陳總（毅）兩個閒聊，我問他，工作組怎麼說撤就撤了？他滿臉不高興地說「哎——，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嘍！說怎麼樣搞，就怎麼樣搞，現在我們是乾綱獨斷嘍！」參見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59。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031。

3 林彪於1966年8月8日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說：「運動開始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佔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現在重整旗鼓再進攻，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思想，改變人的靈魂，把舊思想打垮。」據美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一 八屆十一中全會

〈五一六通知〉雖然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但並沒有具體解決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澤東於1966年7月初即要求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一個具體指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當時命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草稿共二十三條，也稱為〈二十三條〉)。毛澤東原來並沒有想召開黨中央全會，他在7月21日對〈二十三條〉的第二十二稿的批示中說：「此件看過，很好。工作組(按：指中央文革小組)開一二次會，然後經政治局會議(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兩市負責同志參加)開兩三天會，討論通過，即可用中央委員會名義公開發表。以在8月1日發表為好。」⁴由此可以判定，當時還沒有召開中央全會的計劃。7月24日，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鄧小平，第一次提出撤銷工作組。與此同時，決定了要召開中央全會。7月25日，有二十六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省委、區黨委負責人到京報到，以後陸續有人到京報到。

1 會議的召開

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41人到會，也就是說，八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70人，加上八大二次會議增選的候補中央委員25人共195人，除了中央委員中黃敬、賴若愚、林伯渠、羅榮桓、柯慶施、陳賡、李克農、劉亞樓8人，候補中央委員中甘泗淇、周保中、張德生等3人共11人逝世外，共有43人未能與會。這43人中包括八大以來被打倒、被批判的一批高級幹部，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習仲勳、賈拓夫、譚政、萬毅、王稼祥、李立三、蕭克、鄧華、楊獻珍、周揚、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劉仁、烏蘭夫、奎璧、林鐵、蔣南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0。

翔等人。中央文革小組中非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成員都參加了會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和首都大中學校「革命師生代表」共47人列席會議。⁵中央常委中陳雲請假未到會。會議開始時林彪請假，8月6日從大連返回北京，參加了會議的後半段。

從7月27日至30日召開的預備會議上，集中傳達、討論了毛澤東於7月24日、25日批評工作組的講話。與會者都表示擁護毛澤東撤銷工作組的意見，贊成「打破舊框框」，「由群眾自己選舉文化革命小組或文化革命委員會來領導運動」。當時不少人認為派工作組僅僅是個工作方法問題，派工作組的願望還是好的。會上也有人提出了撤銷工作組後，怎樣體現黨的領導，廣大黨、團員如何活動等問題。預備會上還討論了〈十六條〉(即原來的〈二十三條〉)，幾經修改，在7月29日作為全會文件印發時，改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內容壓縮為十六條。華東組在討論中提出：「最好把黨組織是領導的核心力量、黨員應當認真實行三大作風的內容也加進去。」西北組提出：「在文件中對黨的領導問題單獨寫一條，說明甚麼是黨的領導和怎樣領導。」

✧ 八大黨章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開，每年至少兩次。」可是八屆十中全會後過了四年才召開十一中全會。

8月1日下午，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開幕。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主持大會，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陳伯達先後講了話。

鄧小平說：「會議的開法剛才主席講了，要開五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開會的第一天，以後開三天小組會，最後一天再議一下，通過文件。」「這次會議主要的工作是：一、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三、全會要搞公報，最後要通過公報。……四、就是法律

5 列席會議的代表有曹軼歐、張承先、葉林、黃中(北京體育學院工作組長)、王豐(北京機械學院工作組長)、李光輝(文化部文革教育分組政委)、聶元梓、楊克明、高盛清(北京大學學生)、譚厚蘭(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王博文(清華大學教師)、賀鵬飛(清華大學學生)、花春榮(清華大學學生)、鄧良寶(北京廣播學院學生)、王柏松(北京郵電學院學生)、陸彩雲(北京工業大學學生)、梁恩澤(北京戲劇學院教師)、孔丹(北京第四中學學生)等。

手續的問題。中央政治局曾經決定撤銷彭、羅、陸、楊中央書記處和政府的職務，決定補充陶鑄同志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葉劍英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按法律手續要在這一次全會上決定。」

劉少奇主要講了兩個問題：一是工作組問題。他敘述了陳伯達提出意見，多數人不同意他的意見的經過，說到：「……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段，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會後請示主席，主席下決心撤出工作組。」他還說到：「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二是簡要地敘述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

毛澤東在劉少奇講工作組問題的過程中頻頻插話，嚴厲地批評工作組，說：工作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他指責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實際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⁶ 劉少奇的講話沒有印成文字稿，劉在講話中表示，他的講話只是個人的講話，這都說明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倉促決定的，沒有進行充分的準備工作。

陳伯達主要講了兩點：一是工作組做了壞事。「陸平他還沒有做到、他還不敢做的事，而我們的工作組敢做。」「這實際上不是進行文化革命，是在想把那些朝氣勃勃的學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積極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工作組大部是好人，但是他們不懂，還是舊的老做法。」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脫離群眾。「我們現在有相當多的老同志是黨的寶貴財富，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危險性存在，就是脫離群眾。」

⁶ 《劉少奇傳》，下冊，頁10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647。

當陳伯達講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時，毛澤東說：「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間的。誰知道聶元梓出那張大字報，一廣播，亂子就出來了。就是一個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眾高明。事實上我們沒有甚麼高明，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比我們高明。只有依靠他們，我們甚麼都不知道。」他最後強調要由中央全會就文化大革命問題正式作出決定。他說：「要決定。要推翻這個決定，也要到下次全會。」⁷

8月2日、3日上午，全會開小組會。與會者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談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檢討了自己跟不上毛主席。有的人還從革命和不革命的角度檢查了自己。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在小組會，沒有人能夠就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提出系統的意見和建議或看法。

8月2日下午，全會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大會。劉少奇主持，李雪峰、薄一波、周恩來等先後發言。

李雪峰在發言中作了自我批評，他說他「說過右派學生對左派學生爭奪領導權」，「說過應該『排除干擾』」，曾經「認為右派學生在裏面搗亂，影響我們對黑幫的鬥爭」，「過早地提出恢復黨團組織」。他承認北京市在一個多月中「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存在着一條違反毛澤東思想，『怕』字當頭，害怕群眾、害怕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⁸

薄一波在發言中講了自己對工作組作用的認識。

周恩來在發言中說：「從十中全會以後到現在，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登《人民日報》的。這一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轟開了。這次決定撤銷工作組，也是毛主席回京後親自決策的。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派工作組問題，常委，特別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任。工作組裏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我們沒有

7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記錄(1966年8月1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26。

8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大事記》(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頁221—222。

很好地給他們交代政策。我們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組負起更多的責任來。」⁹

8月3日下午，全會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大會，由周恩來主持。劉瀾濤、宋任窮、李井泉、魏文伯等四個中央局的負責人先後發言。在劉瀾濤發言後，毛澤東插話說：你們的問題比較徹底。不破不立，不破工作組，不立革命的師生代表大會以及它產生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不破除這個，就不能立那個。不破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不能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派工作組鎮壓學生津津有味，這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把工作組撤掉，讓學生們自己搞，這才算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這才是立。不把那個丟掉怎麼立呀！宋任窮在發言中表示自己對於這樣讓學生鬧革命還有不少顧慮。李井泉發言說：「為甚麼我們毫不勉強地都贊成派工作組？看到報紙上一登北大撤銷陸平校黨委的職務，由工作組代理，就想到了這個問題。我們的觀點也是要派。中央並沒有下命令，我們就這樣幹了。」魏文伯發言說：「6月初，華東局書記處開會的時候，我們作了決定，派不派工作組，甚麼時候派，要看具體情況。但是運動開展不久，這裏黨委爛掉了，那裏黨委癱瘓了，處處告急，紛紛要求派工作組，我們就忍不住了，陸續地派出了許多工作組。7月25日以後，到北京幾個大學學習，參加大會，以及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我們才開始覺悟。」毛澤東插話問：「有些沒有派工作組的學校的運動是怎麼搞的？」魏文伯回答：「由黨委領導，黨委沒有垮。我們派的有兩種情況：一是黨委垮掉了的，派工作組去；一是黨委癱瘓了的。其他的不派。」

2 炮打司令部

8月4日，全會出現了大轉折。原定下午召開大會，與會者到會後改開小組會。下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十分激烈的講話。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5。

毛澤東說：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甚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6月20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甚麼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容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

劉少奇主動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毛澤東不依不饒，接口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他又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甚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劉少奇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¹⁰

10 五條不怕，指的是毛澤東過去提倡的：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劉少奇後來曾對此作了檢討。他在檢討提綱中專門寫道：「上次主席召開的福建廳會議，我的講話不好，特別是講的所謂五條很不好。」參見黃崢：《劉少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173。

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甚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澤東的講話，令人震驚。他如此嚴厲地指責劉少奇等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是與他早已形成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錯誤判斷相關聯的。毛澤東在會上決定，當日不開大會了，各組傳達、討論常委擴大會的內容。全會議程也隨之改變。

當天下午，周恩來、李雪峰在華北組，陳毅、謝富治、魏文伯在華東組，陶鑄在中南組分別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其他組也相繼作了傳達。全會氣氛一下子變得十分緊張。劉少奇、鄧小平參加了中南組4日下午會議，作了發言。劉少奇作了自我批評，否定了對〈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的批轉，否定了中央的八條規定。他說：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決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一起來，我們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決心讓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讓人家革，就非讓你下台不可。

但劉少奇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的觀點 他說：「現在右派鬧事，奪領導權，不要怕，你讓他領導一個時候，不就看得更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鄧小平在發言中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主席講民主集中制問題，主要講民主問題，信任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問題，沒有民主，當官做老爺，就要霸王別姬。無產階級專政的特點是很集中，弄不好，走向反面，就要變成法西斯專政。我們不甚理解，恐怕還是在這個地方。」

8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表示同意陶鑄7月29日給中央、主席

的報告。陶鑄在報告中說：「7月28日上午，中央宣傳部委託熊復、唐平鏞兩同志召集各報負責人，傳達了主席7月25日關於今後不再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的指示。」這份文件在當時的許多言不由衷或言行相背的文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文件發出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無數充滿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色彩的語言文字充斥了廣播、報刊和各種媒體。

8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同日，會議印發《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作為會議文件時，毛澤東在其中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句後面，加括號寫了一段批註：「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¹¹

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的「大字報」是寫在一張6月2日的《北京日報》上，當天的《北京日報》頭版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毛的那段話寫在社論的左邊。原文無標題。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作了謄清。毛澤東在謄清稿上加了標題，並把原稿中「長資產階級的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改為「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在「左」字的前後加上引號。在鉛印件上，毛澤東又作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寫得好啊」改為「寫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裏，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改為「可是在五十多天裏，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加「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加「壓制不同意見」。

在這張大字報印發給全會的前夕，即8月6日晚，毛澤東要徐業夫通知在大連養病的林彪來京參加會議。林彪在吳法憲陪同下，乘專機到京。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93。

8月7日，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附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¹²

毛澤東在8月5日的會上說：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過去兩個月是打我的，我是還擊。他還說：這一時期正確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

從批判《海瑞罷官》到發出〈五一六通知〉，到毛澤東寫出這張大字報，批判的對象不斷升級。這時終於直接點明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頭所向。這張大字報標誌着毛澤東正式與劉少奇的決裂，標誌着毛澤東正式與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決裂。此後，會議轉向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文化大革命開始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所謂「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¹³

康生、江青以及張春橋、戚本禹等人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作了發揮。康生於8月10日下午在華東組會議上說：「從去年9月到現在，整整十個月，接班人出了修正主義。在草擬中央〈通知〉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90。

13 8月5日下午，劉少奇會見贊比亞友好代表團後，周恩來給他打電話，要他不要再接見外賓，不要公開露面。參見黃崢：《劉少奇研究》，頁172—173。

(按：指〈五一六通知〉)的時候，主席加了一段話，說修正主義睡在我們身旁，有的已經發現，有的還沒有發現。當時只想到彭真，沒有想也不敢想到接班人問題。」江青8月9日上午在華北組會議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鎮壓革命的司令部，一個是主席的革命司令部。主席的大字報講得非常清楚，有兩個司令部，另一個司令部就是主席炮打的司令部，已經掌握了一切了，相當長期了。他不向主席匯報，也不請示。嚴重的問題，主席7月18日回來，一直未匯報。在他們主持的匯報會上，據說伯達同志和康生同志參加了四次，他們根本不聽伯達同志和康生同志的意見。怎麼把所有的同志都拉到那個司令部去了！」戚本禹8月9日在華北組會議上說：「炮打司令部，就是打修正主義的司令部，打黨中央領導核心中的保皇派。要造他們的反，奪他們的權。」張春橋8月10日上午在華東組會議上說：「抵抗《海瑞罷官》的批判，不是彭真一個人的問題。彭真一個人不敢這樣狂妄。五人小組的提綱是經過常委會議討論通過的。5月政治局擴大會……在《海瑞罷官》這個問題上，有的同志談得輕描淡寫，好像同自己關係不大。事情果然是這樣嗎？」「從《清宮秘史》到《海瑞罷官》，一頭一尾，情況既然是這樣，中間的幾次大批判，他的態度究竟如何？是站在哪一邊？過去沒有想過，現在應該想一想了。」「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央的這位同志談到1964年對毛主席不尊重。我認為不是不尊重的問題，而是對抗的問題。他講毛主席調查研究的方法不適用了，我在1964年看了記錄，非常吃驚。這是第一個以黨中央領導人身份敢於公開大庭廣眾之中攻擊毛主席的人！毛主席還健在，不只講一次，全國到處講！攻擊調查研究，實際上就是攻擊毛主席思想的基礎。完全是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報告的口吻！我看這個問題太大了！」(康生插話：「他攻擊的不僅僅是一個調查研究，實際上他是攻擊主席的整個思想。」)這些發言，在舉座震驚之際，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謝富治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第一個出來發言批評鄧小平。他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三十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陳伯達重點批鄧，說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並從60年代

起，對鄧舊賬新賬一起算。林彪在發言中說鄧曾經與四野爭功，並稱鄧在歷史上(指紅七軍時期)是逃兵。¹⁴謝富治因此受到江青的賞識，說批得好。同時江青對陶鑄沒有把謝富治的發言印成會議簡報表示不滿，說：陶鑄為甚麼保護鄧小平？¹⁵

3 〈十六條〉

8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大會，周恩來主持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十六條〉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主要由陳伯達、王力起草，經反覆修改(前後共三十一稿)而成的。陶鑄等人與周恩來商量，刪去了「黑幫」、「黑線」的提法和若干內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內容。接受劉志堅的建議，寫上了「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但劉志堅等人建議刪去「革命不能那樣雅緻」等句，未被接受。原稿中抄錄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的幾句：「防止簡單、粗暴的做法，嚴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體罰，防止逼、供、信。」毛澤東把這幾句刪去了，改為「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十六條〉定稿前的一些提法和定稿後有很大的差異。7月8日第十一稿中寫有：「派工作組是黨的領導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一種輔助的形式。」7月8日第十二稿中，增加了兩條：「有許多單位，群眾發動起來了，自動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組，工作得好，群眾擁護，就不用派工作組」；「在上述情況下，如果是特別重要的單位，中央認為必要時，也應該派工作組去幫助。」7月12日的第十七稿第七條是「打擊的主要對

14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2。

1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618。王力關於謝富治批鄧小平的回憶顯然有誤，陳再道當鐵道兵司令員是在文革後的1977年，而撤銷鐵道兵是在1983年。

象」，其中寫道：「集中力量打擊百分之一、二、三的極端反動的右派分子，大力地暴露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最大限度地孤立右派。這樣，就要求抓要害，抓要害的單位，抓要害的人物，首先抓黨內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當權派，並且力求抓得準，揭得透，又打得狠。在運動中要讓群眾徹底揭露那些還沒有暴露，或者沒有充分暴露的右派，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當權派，徹底批判他們。」在同一稿中，第十八條是「時間」：「就當前發動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來說，各地方，各單位，可以分期分批進行。一般地說，以半年左右為一期。」7月16日第二十一稿的第二十二條是「文教單位黨團組織不開秘密會議」。

〈十六條〉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目的、重點、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規定。〈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十六條〉指出：在這場運動中「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十六條〉強調要「『敢』字當頭」，「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不要怕出亂子」。同〈五一六通知〉一樣，〈十六條〉中沒有對「走資派」、「左派」、「右派」這些概念提出明確的判別標準，沒有對如何實現黨的領導作出具體的規定。

〈十六條〉確定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為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稱這些組織形式「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這也反映了毛澤東要用一種新的國家機器代替舊的國家機器的思想，他對馬克思所稱讚的巴黎公社原則心儀已久。對實行全面的選舉制，群眾可以對代表隨時提出批評，對不稱職的代表可以改選、撤

換等也早就津津樂道。但後來的事實表明，毛澤東的這一設想是完全落空了。

〈十六條〉中把幹部分成四類，認為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是大多數；提出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嚴格區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有錯誤的人；提出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要用文鬥，不用武鬥；明確規定「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但這些原則性的規定在後來的運動中並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周恩來、陶鑄、王任重等人曾不遺餘力地企圖利用〈十六條〉中這些內容，將運動納入他們認為正確的軌道，來限制群眾運動中的盲目性和亂打亂鬥現象，但往往是事倍功半，不能奏效。

〈十六條〉公布的當天晚上，北京的工人、農民、學生、幹部，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北京新市委門前，送喜報，送決心書。「人們高舉紅旗，抬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畫像，帶着毛主席語錄牌和標語旗，許多學生還手持花束和花環，載歌載舞，表達他們歡欣鼓舞的心情和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在黨中央所在地的接待站前，鑼鼓聲、爆竹聲、歌聲和口號聲響成一片，震天動地。」¹⁶全國所有的大中城市無一例外地出現了這種火爆的場面，許多縣城裏的群眾也抬着毛澤東的畫像，舉着紅旗，敲鑼打鼓地上街遊行。

8月8日晚，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講話，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他說：

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很不簡單。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靈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經過大震動，像這次是氫彈、原子彈，震動人心。要在運動中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搞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着覺，無

16 《光明日報》，1966年8月10日。

產階級也睡不着覺。大家動腦筋，在靈魂上大震動，徹底打垮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建立無產階級權威。在這種基礎上，再改變一種緩和的形式，進行經常工作。質變的形式和量變的形式，革命的形式和進化的形式，交替進行，相互滲透。

林彪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人進行了表揚和鼓勵：「你們這些同志，這幾個月起了作用，今後還要起更大的作用。」¹⁷ 林彪的講話，在全會上作了傳達。

4 改組中央機構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臨時增加了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議程。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大會，林彪主持。大會有四項內容：一為通過候補中央委員遞補為中央委員的名單；二為通過撤銷和補選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三為選舉；四為通過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

林彪宣布進行第一項，並說明：八屆中央委員九十七人，八大閉幕後到1958年5月中全會期間，黃敬、賴若愚病故，五中全會通過由候補中央委員楊獻珍、王恩茂依次遞補。五中全會到十一中全會期間，林伯渠、陳賡、李克農、羅榮桓、柯慶施、劉亞樓先後病故，缺額應由下列候補中央委員依次遞補：楊得志、韋國清、羅貴波、張經武、謝覺哉、葉飛。全場中央委員舉手通過。

大會進行第二項，通過〈關於撤銷和補選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一)十一中全會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的決定。(二)從已揭發的大量事實證明，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錯誤性質是極端嚴重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因此，全會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

¹⁷ 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的講話(1966年8月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記處書記的職務，撤銷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三)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全場舉手通過。

大會進行第三項，選舉。總監票人李富春，監票人錢瑛、許光達、伍修權、陳郁。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六人：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補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三人：李雪峰、宋任窮、謝富治。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十一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¹⁸補選中央書記處書記二人：謝富治、劉寧一。全會並未重新選舉黨中央副主席，但以後只有林彪被稱為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副主席職務、鄧小平的總書記職務都不再提及。林彪在會上說明：今天選舉不對外公布，不上報紙。

這次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實質，是毛澤東對中央第一線領導人不滿，取消了中央第一線。陶鑄1966年10月在中央、國家機關十七級以上幹部會上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時說：「十一中全會在政治上糾正了劉鄧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在組織上糾正了長期沒有解決的中央領導的分散主義。……把大權集中到主席手裏。這就確保今後正確路線的領導能夠正確執行。」「十一中全會取消了一、二線，把黨的領導大權集中到主席手裏，既解決了錯誤路線，又解決了分散主義。……又恢復到解放戰爭時期，把一切領導權集中到毛主席手中。」毛澤東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現在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¹⁹

18 據王力說，毛澤東原來安排的次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在周恩來拿名單徵求林彪、江青意見時，江青說，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麼還升了？原來是第七位，現在升到第四位，這怎麼行？要把陳伯達排在鄧小平前面。江青又說，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來。這樣就成了陶鑄第四，陳伯達第五，鄧小平第六。毛澤東同意了。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617。

1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43。

毛澤東利用個人權威，通過合法程序奪了堅持八大路線的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權，把大權集中到自己手裏，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次全會後，原來由劉、鄧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體制不復存在。自8月下旬起，由周恩來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碰頭會，研究國內及對外工作的重要事項，向毛澤東、林彪請示決定。

大會進行的第四項是通過公報。康生在大會上宣讀了公報，並且作了說明。林彪在會上宣布：（除了出席會議的代表外）列席的都有表決權。場上全體舉手，一致通過了會議公報。公報指出：「當前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世界形勢的總趨勢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公報還說：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公報經過毛澤東親自審改。他在康生8月5日送審的公報稿上刪去了一句話：「全會熱烈擁護劉少奇同志代表我國發表的聲明²⁰」。這是毛澤東要將劉少奇「搞掉」的一個信號，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就注意到了這個信號。

8月12日全會閉幕後，緊接着於8月13日至17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貫徹全會精神。會議期間，毛澤東找一些人談話，打通思想。

林彪於8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發表講話，他主要講了「文化大革命問題」和「幹部問題」。關於文化大革命，林彪說：「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舊思想，樹立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的頭腦，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業務，帶動經濟建設，帶動各項工作。」「這次文化大革命觸及每個人的靈魂，黨政

20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1966年7月22日發表的有關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援越抗美的聲明。

軍，工農商學兵，三裏五界²¹都是我們鬥爭的領域」，「不要走過場，乾脆大鬧幾個月，弄得人們睡不着覺。」關於幹部問題，林彪說：

我們對幹部，要來個全面考察，全面排隊，全面調整。我們根據主席講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原則，提出三條辦法，主席同意了。第一條，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第二條，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第三條，有沒有革命幹勁。完全沒有幹勁的，罷官。這三條，同主席的五條原則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要按主席的五條和這三條，特別是第一條，作為識別、選拔和使用幹部的標準。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

突然上升到中央常委第二位的林彪，表現出有些誠惶誠恐，他在講話中說到：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但是要力求減少錯誤，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體同志，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兩個方針、兩個司令部，不能以想當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對台戲，要一元化，緊跟主席。主席處理問題，有全盤考慮，高瞻遠矚，還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們是不了解的。我們對主席的指示要堅持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群

21 「三裏」即〈五一六通知〉中「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句中的「黨裏、政府裏、軍隊裏」；「五界」即〈五一六通知〉中「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一句中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

眾的智慧。就是依靠領袖和依靠群眾。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請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辦事。大事不干擾，小事不麻煩。我們就是這樣去做，有時也免不了要犯錯誤，跟不上主席思想。怎麼辦？辦法就是朝犯夕改，不堅持錯誤，隨時修正錯誤。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們同他比較差別很大，錯了趕快改。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²²

8月13日，康生在華東小組會上的發言中對陳雲進行了攻擊：「陳雲同志的思想，也是長期與主席對立的，他以經濟專家自居，自認為他的經濟學在主席之上，看看他1962年的報告，就懂得他的經濟學是甚麼貨色。他只講經濟，不講政治，他講的經濟政策，據我看，只是資本主義的商人經濟而已。」²³

8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對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傳達作出規定：向縣、團以上幹部宣讀毛澤東的兩個講話和一張大字報（8月4日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在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林彪的三個講話（8月8日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時的講話，在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8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宣讀中共中央8月14日關於全會選舉結果的〈通知〉和全會〈關於撤銷和補選書記處書記的決定〉。要求「各地一定要極端認真地把主席和林彪同志的講話傳達好」。但實際上，由於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紅衛兵運動的猛烈興起，各地各級幹部普遍受到衝擊，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的會議大多沒能順利開成。²⁴

22 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85。

23 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358—1359。

24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上次開會回去以後，就沒有開好會，有些地方就根本沒有開，有些地方開了，也不是那麼充分，被紅衛兵一衝就亂了。」

二 紅衛兵運動

文革初期，在大中學校中普遍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各種小型學生組織，這些組織起初只是一些學生聯合寫大字報、批「三家村」時用的名稱。這種組織一般很鬆散，成員也不固定，誰也不會想到後來它會演變成為大規模的紅衛兵運動，並在一段時間內如狂飆般橫掃華夏大地。

1 毛澤東給紅衛兵的信

在1966年7月時，紅衛兵還只是北京中學文革運動中的一種特殊的群眾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的特點在於：它是在毛澤東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號召下自發成立的，既不受校長老師的領導，也不受任何一級黨團組織的領導。它以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論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富於造反精神。不管是校領導還是工作組，只要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言行（當然是按照他們自己的標準），就都不放過，就要起來造反。清華附中紅衛兵是最早成立的紅衛兵組織，也是在富有造反精神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組織。他們寫的論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受到工作組的批評，卻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

8月1日上午，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篇大字報。毛澤東的信全文如下：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

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

1966年8月1日²⁵

8月3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到釣魚台約見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給他們看了毛澤東的信。紅衛兵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驚喜萬分。這封信和8月5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脛而走，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震動，紅衛兵這種組織形式在北京獲得蓬勃發展。紅衛兵不但在中學迅速發展起來，而且在高校、機關也開始有了發展。紅衛兵運動初步形成為有眾多學生參加的政治運動。

毛澤東是紅衛兵運動的始作俑者。無論是在北京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常委，還是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都沒有對大中學校運動中的學生組織給以太大的注意。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他發現了紅衛兵，認為這就是他在幾個月前的談話中所熱切呼喚的「孫悟空」²⁶，他立即表示了對紅衛兵的肯定和堅決支持。周恩來後來多次說過，是毛澤東最先發現和支持了紅衛兵這一新生事物。毛澤東先用一封信，後又連續八次接見全國上千萬的紅衛兵，旗幟鮮明地向世人表明了他對紅衛兵的熱烈支持的態度。

25 根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87—88，可知此信在7月31日即已寫出，8月1日修改後印發全會。

26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與江青、康生、張春橋等的談話中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

2 八一八大會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有首都和全國各地師生參加的百萬人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出席了大會，並意味深長地穿上了綠軍裝。經毛澤東提議，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了天安門。

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駱小海、韓軍、宋柏林在天安門城樓會客室裏見到了毛澤東。他們激動地連聲向毛澤東問好，祝他萬壽無疆。毛澤東幽默地答道：「萬壽也有疆嘛！」當駱小海等人告訴毛澤東，他們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時，毛澤東大聲地對他們說：「我堅決支持你們！」紅衛兵問起毛澤東寫信的事，毛澤東說：「那是草稿，還沒有發給你們哪！」²⁷

毛澤東還與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進行了交談。毛澤東問她是哪裏人，彭說是江蘇人。毛便問為甚麼不是湖南人，還問吃不吃辣椒，彭說吃，毛說那就是半個老鄉。毛澤東說：「我們不行了，只有我們這些娃娃行，小將行。」²⁸毛澤東還接受了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為之佩戴的紅衛兵袖章。聶元梓、彭小蒙等作為革命師生的代表在大會上發了言。

林彪在取代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副手以後第一次公開亮相，他發表了一個堅決支持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講話。他說：

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

27 毛澤東大概想對這封信進行一些斟酌，修改後再正式發出，但隨着形勢的發展，紅衛兵組織很快就產生了分化，所謂「老紅衛兵」的作用和地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信後來始終沒有正式發出。

28 據說毛澤東在與彭小蒙談話時，問及批判北大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教授一事，毛說：「他這種人，書讀了不少，可是越讀越反動。像他這樣的資產階級權威，對人民還是有用的，可以掃掃地、搞搞衛生嘛……」參見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34。

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這次是大戰役，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總攻擊。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舊風俗、舊習慣勢力，展開猛烈的進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²⁹

新華社當天播發了〈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其中突出地報道了紅衛兵的情況：

幾萬個繫着紅袖章的「紅衛兵」們，英姿勃勃，像生龍活虎一樣，在今天的大會上很引人注目。「紅衛兵」是首都大中學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創建的革命群眾組織，他們表示要一輩子當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國共產黨、保衛祖國的紅色尖兵。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城樓兩側的東西觀禮台上，站滿了「紅衛兵」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在天安門廣場上，在天安門廣場兩側的東西長安街上，今天都由雄糾糾的「紅衛兵」維持會場秩序。

在新華社的報道中，中央領導人的排列順序是按照八屆十一屆全會選舉結果排列的，實際上，這也就是向外界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改選的結果。

第二天的各大報紙上，都發表了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的大幅照片。幾天以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對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的建立表示支持。社論中說：「革命的學生們組織『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等等革

29 林彪在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8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88。

命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合法的組織。他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是合法的行動。誰要反對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就直接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違背了黨中央的決定。」³⁰

此後，毛澤東又於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11日、11月25—26日連續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總數約為1100萬人。³¹毛澤東從親自寫信到一次又一次地接見，就是要清楚地告訴人們他對紅衛兵的堅決支持態度。

北京的慶祝大會之後，全國各大城市也都召開了類似的慶祝大會和遊行。

「八一八」大會以後，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城鄉。毛澤東對紅衛兵的堅決支持，對紅衛兵運動走向全國，形成強大的政治運動起了關鍵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大力倡導發展紅衛兵組織。1966年8月21日，陶鑄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中就說：「整個北京市、全國現在都成立了紅衛兵，成立紅衛兵是黨的一個政策。」³²8月25日，陶鑄在接見中南地區學生時說：「紅衛兵是革命的組織，看來紅衛兵有普及全國之勢。……在北京，紅衛兵起了偉大作用。……學校裏有多少人參加紅衛兵，看情況，也許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³³

由於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核心中的特殊地位，又由於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對毛澤東的敬仰和崇拜，使那些原來對紅衛兵表示懷疑、不滿乃至反對的人們迅速轉變了立場。在廣大青年學生中間，紅衛兵成為最響亮的名字。一時間，各種名目的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並日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支重要的突擊力量。

30 《人民日報》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1966年8月23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94。

31 關於接見總人數，有人估計為1200萬人，也有估計1300萬人，這裏使用比較流行的說法。

32 陶鑄在中國人民大學辯論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2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3 張平化主任重陶鑄對中南地區在京同學的講話（1966年8月2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月18日之前，紅衛兵組織已在北京各中學普遍出現，而在大學則比較少。³⁴ 在大專院校裏，大多還是以個人和較小的戰鬥隊的形式進行文化大革命。北京以外的一些大城市在8月18日之前也有少量的紅衛兵組織出現。³⁵

紅衛兵因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而興奮莫名，同時又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行到狂熱的地步。紅衛兵爭相仿效毛澤東的早年革命生涯，把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裏的一些激烈的言論作為造反的指南。毛澤東1927年3月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成為許多紅衛兵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座右銘。毛澤東1919年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說過的一段話：「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³⁶ 鼓舞着無數年輕而盲目的紅衛兵以天下為己任，為創造紅彤彤的新世界而奮鬥。

3 關於對聯的辯論

紅衛兵運動在北京興起的同時，伴隨着關於一幅對聯的辯論。還在工作組時期，北大附中紅旗中就流傳着「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曾遭到工作組的批評。

7月29日，北航附中紅衛兵公開貼出了這幅對聯，並加上「基本如此」的橫批。這幅當時被人稱之為「鬼見愁」的對聯，反映了紅衛兵運動初期普遍存在的「血統論」的思潮。8月1日晚，北航附中紅衛兵把對聯

34 在8月18日以前成立的大學的紅衛兵組織不多，比較有影響的有：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8月1日成立）；北京水電學院紅衛兵（8月3日成立）；清華大學自控系紅衛兵（8月5日成立）；北京輕工業學院紅鷹兵團（8月7日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8月8日成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8月17日成立）。

35 如8月11日，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學生孫月珠、勞元一等六人，成立了上海市第一個以紅衛兵命名的組織「紅衛兵戰鬥組」。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頁390。

貼到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北京主要高等院校，引起了激烈的辯論。

8月2日凌晨，陳伯達接見學生時，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但執著的中學生仍堅持原來的對聯。當天下午，北航附中紅衛兵組織了近千人到清華大學遊行，高呼這副對聯，引發了清華園內關於對聯的大辯論。後來，關於對聯的辯論傳遍了全北京的各大中學校，在辯論對聯的過程中，「血統論」思潮大肆泛濫。對聯強化了紅衛兵作為「紅五類」子女「左派階級隊伍」的意義，只有「紅五類」子女才能加入紅衛兵，幾乎成為各校紅衛兵普遍的組織原則。

在「血統論」的影響下，北大、清華等高校紛紛成立或準備成立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女協會，但很快被中央制止。8月5日凌晨，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說：「聽說你們清華組織了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協會，並起草了章程。上午（按：指8月4日）在中央書記處、文革小組開會談了。黨在學校的政策不是這樣。相信你們這樣想會有一定的考慮，更相信你們會按毛澤東思想，按中央政策辦事，因為這樣才能按黨的要求爭取團結。最後達到團結95%的群眾、幹部。」³⁷

8月6日，北京中學紅衛兵在天橋劇場開大會，辯論對聯問題。江青到會，表示不完全同意對聯。她說：「我覺得不應該在枝節問題上消耗精力，大敵當前，要鬥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她再一次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造反，理應如此」。但在場的絕大多數紅衛兵並不接受她的建議，仍然堅持原來的對聯。康生在會上講話，對團中央進行了攻擊。他說：

團中央有些人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鎮壓革命這一方面。彭小蒙同志在北大控訴了張承先，是完全對的，是有道理的。同志們起來革命，人大的和其他學校

37 李雪峰周恩來陳伯達等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年8月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的紅衛兵提出要改造共青團，我看這一要求是正確的。我贊成今天晚上要開辯論會。今後如何把我們的共青團改造成真正的毛澤東的共青團，我希望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應該成為改造我們共青團的重要骨幹。過去的青年組織渙散，我看有點像「全民團」，就是說有些青年團階級路線不明顯。我希望你們堅持無產階級路線的紅衛兵和紅旗戰鬥小組，應該把你們堅持階級路線的精神徹底貫徹到青年團中間去。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要在文化革命中當先鋒，當前要把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同改造你們青年團的任務相互配合，很好地結合起來。³⁸

「血統論」在紅衛兵運動初期得以盛行的原因，既有傳統觀念的影響，也有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彭真的罪名之一就是「不講階級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部分中學生曾在「四清」、「社教」中就階級路線問題掀起過幾層波瀾。當時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彭真堅持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階級路線，對一些中學生的過激議論和要求進行過溫和的批評。但在實際執行中，隨着「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理論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已經在向「左」的方向不斷傾斜，已經給「血統論」的泛濫奠定了基礎。在紅衛兵運動開展起來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雖然對紅衛兵的一些絕對化的言論和做法進行過勸說和解釋，例如在關於對聯的辯論中所做的那樣，但總的來說，並沒有能夠阻止「血統論」的蔓延和泛濫。

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負責人在當時發表的許多講話中，都強調了紅衛兵要以「紅五類」為主，實際上是支持和鼓勵紅衛兵的做法。在關於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統論」的研究中，有些人只強調了當時的青年學生的一些錯誤言論和做法，卻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紅衛兵的那些言論和做法，實際上是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不同程度地肯定和支持的，而且在一段時期內得到了整個社會的認同。

38 江青王任重康生對北京中學生的講話（1966年8月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強調要「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對於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條件的，應該優先選拔升入高等學校。至於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一定要經過嚴格審查，對於那些在政治上確實表現好的，也允許挑選適當數量的人升入高等學校」。³⁹

8月6日，康生在天橋劇場關於對聯的辯論大會上說：

同志們的一切革命行動，都是為了堅持毛澤東的階級路線。你們的一切辯論，一切爭論，基本的本質的問題是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不是對聯這個字或那個字改不改的問題。為甚麼同志們這樣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是有道理的。過去在彭真、陸定一黑幫統治下實行一條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這條路線是與毛主席的階級路線相對抗的。同志們提出要堅決地戰鬥，為無產階級路線而奮鬥，完全是對的。這就是一個偉大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無論大學教育，中學教育，要不要階級路線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你們到處奔走，到處呼籲，到處串聯，就是為了這條階級路線——毛澤東階級路線而鬥爭。我對你們很欽佩。⁴⁰

8月18日，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說：「組織革命隊伍要以紅五類出身的為基本核心」。出身不好的很革命的也可以吸收，共產黨內還吸收出身不好的呢！對於那些出身不好的，千萬不要看成鐵板一塊。出身不好的你們不要把他們攔在爐子外邊，光烤着他們不行，也可以把他們吸收進去，放在裏邊把他們融化，把他們放在爐子外邊，怎麼能融化他們啊？」⁴¹

39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7—58。

40 江青王任重康生對北京中學生的講話(1966年8月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1 周恩來在接見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衛隊隊員時的談話(1966年8月18日)。

8月25日，陶鑄在接見中南地區學生代表時談到：

甚麼人能參加紅衛兵呢？就是紅五類，應該很好地調查成分，我們要講階級觀點、階級路線，要有階級分析。同學出身比較好的，所以階級成分第一。我們要考慮階級成分，但是我們反對唯成分論。第一要講階級成分，第二不是唯成分論，第三看政治表現。一貫很好就是出發點，我們也讓他們進來。我們這裏也有嘛！你（指張平化同志）是富農出身嗎？（張平化同志答：我是中農。）團結中農嘛！我是破落地主，我自報階級成分，我背叛本階級，跟着共產黨走，改造得馬馬虎虎，當然改造得不夠好。階級成分第一；第二，反對唯成分論，這就是說出身好的都可以參加到紅衛兵裏去；第三，家庭出身不好的，特別表現好的，也可以吸收進來。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階級路線。過去彭真只講重在表現，那是歪曲階級路線，是修正主義的。⁴²

中共中央1967年3月7日發布的〈關於大專院校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草案）〉中規定：「紅衛兵應該以勞動人民家庭（包括工農兵和革命幹部以及其他勞動者）出身的革命學生為主體。」

在辯論對聯的高潮中，北大附中紅旗寫的〈自來紅們站起來了〉、清華附中紅衛兵齊向東寫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等文章被大量翻印，廣為宣傳，對「血統論」思潮的廣泛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血統論」盛行的時候，一部分出身於「紅五類」的學生，打擊、壓迫出身於非「紅五類」的學生，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因為出身問題，許多學生被剝奪了參加紅衛兵以及遊行和慶祝活動的權力，很多人遭到侮辱、打罵，一些人甚至被無情地剝奪了生命。尤其在涉世未深的中學生中間，迫害出身於非「紅五類」的同學時，採取的手段往往更為嚴厲、野蠻和殘忍。

42 張平化王任重陶鑄對中南地區在京同學的講話（1966年8月2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月10日，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座談會上說，首都紅衛兵截住一列進京火車，宣布了「紅五類留下，黑五類滾蛋」的口號，一一查問乘車學生的成分，不是「紅五類」的就趕下火車，火車停止運行達五個小時之久。周恩來耐心地說明這樣做「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⁴³ 但宣揚「血統論」的對聯還是很快傳遍了全國，歧視、壓迫、打擊出身於非「紅五類」家庭學生的現象，在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普遍存在，概莫能外。

8月12日，北京工業大學三系文革小組長，即後來的巴黎公社紅衛兵負責人譚力夫寫了〈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他在必須堅持階級路線的前提下，指出了這幅對聯立論的偏頗，建議補充一幅「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應該如此」的對聯，認為第一幅對聯（指「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描繪了一個基本狀況，是講唯物主義的，第二幅對聯指出了發展前途，是講辯證法的。「基本如此」加上一個「應該如此」就是辯證唯物主義了。⁴⁴ 這種折中的意見，當時為許多青年所接受。8月20日，譚力夫在關於工作組和階級路線的辯論會上發言，他認為：絕大多數老幹部和工農、幹部子弟是好的，即使有一點缺點錯誤，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小革命遇到新問題」，絕不能把他們打成「老反革命」和「小反革命」。他不同意不加分析地衝擊、批鬥、污辱黨的各級幹部，把攻擊工作組和粗暴批鬥黨的幹部說成是「右派翻天」。他不能容忍一些人的幸災樂禍，在辯論中他質問道：「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們高興甚麼？」他公開申明擁護北工大的工作組，說：「老杜（按：即北工大工作組組長杜萬榮，總參防化兵部副政委）進校才一天」，就「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黨的陽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從此照進了工大」；「你就是說得天花亂墜，我也是喜歡杜萬榮」。他公開表明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態度，說：「有人習慣於翻本本，找條條，都等中央指示，還要你『首創』甚麼？」「世界上哪有完美無缺的東西？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正確的東西。就是

43 周恩來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10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4 劉京、譚力夫：〈從對聯談起〉（1966年8月1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毛澤東思想，也還要不斷發展。」⁴⁵ 譚力夫的這一發言，當時流傳極廣，受到許多人的歡迎，也遭到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的反對。譚力夫的觀點，有「血統論」的因素，但最令中央文革小組不能容忍的是：他在講話中，毫不隱諱地為工作組辯護，為工作組說好話。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歪曲譚力夫的觀點，對他嚴加批判。此後，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都在各種不同的場合點名批判了譚力夫。

11月18日，王力在對從蘇聯回國的留學生作報告時說：

8月8日發布〈十六條〉，8月20日就有一個籌委會委員發表了一篇講話——北京工業大學譚力夫的講話。他是一個學生，他可以發表講話，但他代表了一種思潮。他的講話與〈十六條〉是根本對立的。這裏一個〈十六條〉，那裏一篇講話，到處翻印，到處廣播，到處散發，還到處執行，執行譚力夫的。到大學去一看，清華大學就印了二萬份，它只有一萬多學生，卻印了二萬份。再看看工廠，石景山鋼鐵廠也是人手一冊。看看上次由於擁擠受了點傷的同學，到同仁醫院，也有譚力夫的講話。機關也有譚力夫的講話。有一次陳伯達同志與我在這裏接見了陳伯達同志的家鄉——福建省惠安縣的紅衛兵，學生說，他們也有譚力夫的講話，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叫新華書店印的。他是公開反對毛主席的，說毛主席著作已經過時了，同時〈十六條〉批判工作組執行的反動路線，而他就公開地宣傳工作組好。⁴⁶

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下令將譚力夫投入監獄。1967年5月29日譚力夫出獄後，還多次被北工大造反派綁架、監禁、毒打、遊街示

45 譚力夫：〈譚力夫在8·20辯論會上的發言〉（1966年8月2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6 王力接見被蘇聯勒令回國的留學生時的講話（1966年11月1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眾。甚至連存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其父親(原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1961年病逝)的骨灰也被造反派搗毀拋棄。

「左」的階級路線的極端形式「血統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尤其是在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遭到猛烈的批判，大中學校的老紅衛兵⁴⁷因此而一蹶不振，但實際上，「左」的階級路線並沒有實質上的轉變。青年工人遇羅克寫出〈出身論〉一文，對「血統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出身論〉寫於文革之初，正式發表在1967年1月出版的《中學文革報》上。遇羅克勇敢地向「血統論」宣戰，為因為出身問題而受到歧視的人們爭取平等的權利。文章在歷數建國以來一直普遍存在的因出身而遭受歧視的現象後提問道：「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有甚麼區別呢？」⁴⁸此文發表後，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方面，許多因出身問題遭受歧視的人感到是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因而奔走相告，爭相傳抄。另一方面，許多人因文章的尖銳而懷疑作者的立場和動機。1967年4月14日，張春橋、謝富治、戚本禹接見紅衛兵代表時，戚本禹在講話中說：

我看〈出身論〉也不對，有很大錯誤，是大大錯誤的！它的錯誤就是否定階級觀點，否定階級分析，否定階級出身對人的影響。他是用客觀主義偽裝的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結果同血統論走到一起，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說在我國產生了種姓制度。否定階級分析，抹煞階級觀點，企圖從根本上抹煞階級出身。……它否定了階級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個人家庭出身對他本人的影響，否定階級地位。……它實際上就是彭真反黨集團所歪曲的「重在表現」，它煽動不要做外圍，實際上用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

47 一般指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紅五類」為主體的學生組織。與後起的造反派紅衛兵相對應，老紅衛兵一般被認為是保守派。

48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即遇羅克)：〈出身論〉，《中學文革報》(北京)，創刊號(1967年1月18日)。

論，煽動部分青年對黨不滿，向黨進攻。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們不要上當！⁴⁹

1968年1月，週羅克被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1970年3月慘遭殺害。

在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對〈出身論〉表態後，北京大中學校各派紅衛兵組織都開始批判〈出身論〉，不論是過去宣揚過「血統論」的老紅衛兵，還是猛烈批判「血統論」的造反派，都異口同聲地對〈出身論〉進行口誅筆伐。許多「響噹噹」的造反派，在批判「血統論」的同時，也要對外標榜自己組織的「純潔性」。北航《紅旗》曾發表聲明說：「在北京所有學生老左派隊伍中，工人、貧下中農子弟比例最大的是北航紅旗戰鬥隊。這一點保證了北航紅旗比其他左派隊伍在階級意識上要純潔得多，使得北航紅旗戰鬥隊的小資產階級成分比其他戰鬥隊都少得多，因而紅旗戰鬥隊的思想意識和戰鬥作風的特點是：堅強而純樸。這就是為甚麼紅旗戰鬥隊大民主發揚得較好的原因，這就是為甚麼非無產階級的思潮不能操縱和分化紅旗戰鬥隊的原因。」⁵⁰

4 緊急呼籲書

在8月6日的天橋劇場辯論會上，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紅衛兵散發了一份〈緊急呼籲書〉，對一些學校紅衛兵組織違反政策，隨便打人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呼籲書〉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格制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等壞行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一律解散！今後誰還膽敢破壞黨的政策，我們絕不答應。」⁵¹ 康生、江青等人

49 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接見北京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4月14日）。

50 見北航《紅旗》報，1967年2月2日。

5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71。

當場表示支持紅衛兵〈緊急呼籲書〉，康生說：「我很欣賞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按：應為北航附中）紅衛兵的緊急呼籲書，這些呼籲書是甚麼呢？這是毛澤東思想的，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也就是一分為二的思想的。」⁵²這份〈呼籲書〉還被印發給正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但時隔不久，江青等人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又攻擊這個〈呼籲書〉是王任重搞的陰謀，是壓制群眾的，並正式通知收回過去印發的這個〈呼籲書〉。

為甚麼前後會有這麼大的變化？時隔二十多年，當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的回憶自述，揭開了其中的秘密。他在《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一書中寫道：

就在8月6日天橋劇場的會場上，與會的幾個中學的紅衛兵糾察隊（按：當時「西糾」還沒有成立，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也都沒有以糾察隊的名義外出活動，這裏是穆欣記錯了。）散發了油印的〈緊急呼籲書〉，到會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得到一份。會後，分工負責領導北京市運動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仔細閱讀以後，認為〈呼籲書〉切中時弊，寫得很好，當即送給周恩來總理，建議公開印刷，廣泛張貼。總理同意王任重的意見，即將此件送給毛澤東主席和江青。毛澤東圈閱同意之後，送回中央文革小組。江青圈閱同意，又批示在文革小組內傳閱。傳到王任重手上時，他認為小組成員各自均有一份，既然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副組長都已同意，無需再行傳閱，親自送給陳伯達批交辦公室辦理。陳伯達第二次圈了圈兒，批示交給我辦，就叫秘書送來。

這份〈呼籲書〉反對打、砸、搶的意見，是同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的〈八條規定〉相吻合的——〈八條規定〉總的精神就是有領導地、有限制的、有秩序地開展運動。從自己的思想來說，也很贊成〈呼籲書〉的主張。我把經過周恩來寫了批語、

52 江青王任重康生對北京中學生的講話（1966年8月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毛澤東劃圈同意的原件收存起來，另找一份送往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時，曾向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寫了便箋說，此件排出後，請印一批先送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聯合接待站散發。當時，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仍在進行，我想既然決定公開印發、廣泛張貼，分送給全會到會人員看看總是可以的，就像開會期間逐日贈送《光明日報》給與會者看一樣。又在便箋上寫：我不懂得規矩，不知這種公開印發的傳單，可否作為不編號的文件，分發給參加全會的人員，請他酌定。我的毛病在於「過分熱心」，真的不懂規矩，事先未向組長請示就自作主張。〈呼籲書〉鉛印出來後，送一批到釣魚台，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分發外，並即檢出幾份送到王任重為領導北京市運動所設的辦事機構，請他們廣為印發、張貼。

此後，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全都在場的會上，毛澤東曾以肯定語氣饒有興趣地談到這份〈呼籲書〉。可是，當江青加油加醋，別有用心地將十萬人大會批鬥三個中學生的事告訴毛澤東後，在另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舊事重提，批評十萬人大會的事欠妥，突然望着王任重說：「你們那個〈呼籲書〉……」話雖不多，看他神情和語氣，否定的意思是很明顯的。⁵³

江青早已在同王任重和陶鑄「較勁兒」。根據當時印象，自從宣布王任任重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陶鑄任小組顧問（而且擺在康生前面）和中央宣傳部長，江青一夥就心存不滿（而在陶鑄當選政治局常委，排在陳伯達、康生前面，成了黨的第四號人物後，他們一夥的忌恨就更加強烈，務要除之而後快）。對王任重負責領導的北京市的運動，更是百般挑剔，「動輒得咎」，甚至當面說他「背着小組幹了許多壞事」。而今江青有了這個尚方寶劍，回到釣魚台就催促陳伯達開小組會，專就此事對王任重進行批評。召開十萬

53 毛澤東1966年8月2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抓出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團中央改組，原想開會改組，現在看不準，過幾個月再說。急急忙忙作出決定，吃了許多虧，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急急忙忙鬥右派，急急忙忙開十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

人大會鬥三個中學生的事和印發〈呼籲書〉的事都要王任重負責；她對「西糾」也惡言相加，恣意誣蔑。會議連開了多次，直到這次全會閉幕還未了結。本來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事，王任重只是說明有關情況和看法，並不認為有甚麼錯誤。江青故意小題大作，無限上綱，沒完沒了。除在會議上批判，還叫戚本禹「檢驗」王任重。由此開始，屢向王任重挑釁、找岔子，直到他們一夥唆使學生把王任重和陶鑄「打倒」為止。⁵⁴

〈緊急呼籲書〉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人大附中紅衛兵負責人之一的徐浩淵近年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記得那是一個濕熱夏夜，我們坐着吉普車進城去散發傳單。車開到西單口上，突然看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騎車拼命追趕我們，手裏拿着一張傳單。我以為我們的車子掉了甚麼東西。停下車來，那人衝上來握着清華附中卜大華的手，激動地說：『我是工人出身(說話先要報出身)。你們寫得太好了！這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⁵⁵

5 造反派紅衛兵

工作組撤出以後，各大中學校內山頭林立，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多如牛毛。經過幾番排列組合，許多小組組織合併成一個較大的組織，一個較大的組織分裂成兩個或三個相互對立的組織，逐漸形成各個學校中相對穩定的格局。總的來說，可以大致分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兩大部分。

多數派曾經是工作組依靠和信賴的骨幹，他們在鬥爭「黑幫」、「牛鬼蛇神」上很積極，對批判工作組卻比較消極，也不贊成全盤否定工作組；他們贊成批判黨政領導中的個別幹部，而反對普遍衝擊各級領

54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338—339。其中有些不準確的地方，如他提到「西糾」(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其實當時「西糾」還沒有成立。

55 徐浩淵：〈我的反思〉，《世界日報》(美國)，1997年3月31日。

導；他們堅決擁護「左」傾的階級路線，對各種人都能造反十分反感，認為是階級敵人乘機實行階級報復。多數派紅衛兵組織中黨團員、積極分子居多，總人數佔優勢。少數派一般在運動初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制和打擊，反對「血統論」，仇視特權思想和特權階層，沒有衝擊高級領導幹部的思想感情障礙，鬥爭走資派更為堅決，造反行動也更為激烈。多數派與少數派的矛盾不斷擴大，衝突愈來愈激烈。多數派指責少數派成分複雜，是「右派翻天」，經常恫嚇要「秋後算賬」。少數派則背靠中央文革小組，有恃無恐，罵多數派是走資派的「御林軍」、「保皇派」，執行了沒有工作組的工作組路線。少數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明確支持下，迅速發展壯大，逐漸取得了在紅衛兵運動中的主角地位。

1966年8月17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戰鬥隊等組織聯合成立了東方紅公社，共一千餘人。

8月23日，地質「東方紅」全體成員步行到地質部，堅決要求地質部交出曾在地質學院工作組任組長的鄒家尤（地質部副部長），由他們帶回學校批鬥。地質部黨委不同意交出鄒家尤，「東方紅」的學生即靜坐絕食。在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組都出面支持地質「東方紅」的情況下，⁵⁶ 鄒家尤答應第二天返校聽取批判。這就是所謂「一進地質部，炮打何家店⁵⁷」。

9月5日，地質「東方紅」一千多人開進地質部，再揪鄒家尤，鄒家尤已去地質學院，而一些人滯留地質部，為所欲為，包括強行翻閱與取走機密檔案。

9月7日，「西糾」（即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到地質部，要求「東方紅」撤走，「東方紅」拒絕，雙方發生武鬥，「西糾」抓走「東方紅」八人，關了一天後放出。事後雙方都印發了大量傳單，向對方表示抗

56 李富春曾對地質「東方紅」有五條指示：(1)可以到地質部設聯絡站，地質部應接待你們，你們可以在地質部掛牌子。(2)叫周榮鑫把工作組整理的革命師生員工幹部的材料，已銷毀的把清單交出來。鄒家尤留下來進行辯論。(3)「東方紅」不是反革命，要平反，叫何長工向全國宣布。(4)地質部副部長卓雄可以調回來。(5)下次開鬥爭會時何長工、胥光義、趙承豐、鄭伏光、卞國都要參加鬥爭會。引自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689。

57 何指何長工，當時任地質部黨委書記兼副部長。

議。從9月14日起，地質學院食堂工人三天不給「東方紅」在地質部的學生送飯，一些學校的造反派則給「東方紅」送去《毛主席語錄》和食物，以示支持。地質「東方紅」在地質部造反十五天，於9月19日撤離。這就是所謂「二次大鬧地質部」。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在地質學院座談會上講話，點名指責鄒家尤，認為事情「要由工作組負責，由地質部負責，由鄒家尤負責」。⁵⁸ 10月8日，地質「東方紅」三進地質部，在地質部大院召開了「揭發批判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深夜，綁架了何長工。

10月27日，又四進地質部，「擴大戰果」。地質「東方紅」成了全國有名的造反派。

8月20日，北京航空學院成立了紅旗戰鬥隊。北航「紅旗」為了達到揪鬥工作組長趙如璋的目的，在國防科委(北京航空學院的主管機關)折騰了二十八個晝夜。

8月25日，北航「紅旗」學生開始在國防科委門口靜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擔任過工作組長的趙如璋(國防科委的局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報告林彪，說明「趙的健康狀況不好，如果交給學生批鬥，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後又多次向林彪報告情況，請求指示，均得不到答覆。

中央文革小組把北航「紅旗」在國防科委「安營扎寨」、提出要求的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態度鮮明地支持北航「紅旗」學生的要求，他說：不要怕，不要讓學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來，讓學生鬧上三個月。知道了毛澤東對此事的態度後，中央文革小組即以明確的態度公開支持北航「紅旗」的行動。9月21日晚，陳伯達接見北航「紅旗」學生，讚揚他們說：「你們是少數，少數是優秀的，先進的。」22日夜裏，為了迫使國防科委交出趙如璋，陳伯達親筆寫下了「軍令狀」：「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聚談或者同住幾天，科委的幹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璋)，如果被學生殺死或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償。」9月23日，

58 關鋒在北京地質學院同學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國防科委交出了趙如璋，學生撤走。北航「紅旗」一舉成名，成了北京響噓噓的左派。

8月23日，北京師範大學的少數派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下而迅速崛起的造反派紅衛兵，一方面在校內不斷與多數派爭奪更大的地盤和權力，一方面在社會上大造輿論，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旗幟，不斷衝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

9月23日，地質學院「東方紅」在校內造反，查封了院文革辦公室，奪取廣播台，與擁護院文革的工人赤衛隊、鬥批改兵團發生了嚴重的武鬥事件，造成數百人受傷。

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在9月23日成立，24日就在校內發動了奪取廣播台的攻勢。

同一天，北航「紅旗」、外語學院「紅旗大隊」也都在各自的學校與多數派發生了爭奪廣播台的糾紛。10月5日，北航「紅旗」在奪得部分廣播權後，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籌委會的材料組、專案組。

10月8日，農機學院「東方紅」奪了校內的廣播台，並開始到八機部造反。10月10日，北外「紅旗」召開大會批判工作組，並以搜查「黑材料」為名，連夜到外交部造反。

北京造反派紅衛兵的行動對全國有很強的示範作用。通過小報、傳單等的傳播，外地的造反派紅衛兵也紛紛仿效。在重慶，「重大『八一五』的學生如法炮製，在11月19日這天上午10點正，憑藉人數上的優勢，實施突然襲擊，包圍了校長室、電話總機房、廣播站，當然還有印刷廠等等，沒有經過太多爭鬥，很快便奪取成功。」⁵⁹

6 紅衛兵司令部

從1966年8月開始，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的大中學校紅衛兵陸續成立了全市性的或地區性的多校聯合組織，這些組織使用最多的名稱是

59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和我〉，《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第121期至157期連載（2002年2月12日至12月30日）。

「司令部」，也有用「總部」或其他名稱。紅衛兵司令部五花八門，形式各異。隨着運動的發展，各種紅衛兵司令部的命運也各不相同，有的曇花一現，很快即分化瓦解了；有的又進行了新組合，成為影響一方的重要勢力。

1966年8、9月間，北京大專院校的紅衛兵成立了三個司令部。

8月27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成立。北京輕工業學院學生汪延群（汪東興的女兒）任指揮，劉平凡（劉志堅的女兒）、劉克府、朱新民、朱新嘉等為副指揮。參加「一司」的有二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個組織，約六千人。除北師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等幾個組織是少數派，多數是保工作組的多數派。江青、謝富治、楊成武、劉志堅、汪東興等出席了成立大會。江青在大會上說：「我個人參加你們的大會，我相信我們小組也是支持你們的」，「我們建議楊成武、劉志堅成為你們的輔導員。」江青給他們交代了任務：「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護中南海、大會堂、釣魚台等地方。」「一司」創辦了自己的報紙《紅衛兵》，9月1日創刊。

8月28日，北京礦業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沒有參加「一司」的三十八個高校群眾組織發表聲明，認為「一司」的成立是非法的，是分裂主義的，它不能代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當天，康生接見礦業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時說：成立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我們中央、市委事前也不曉得，昨天，事後調查，是他們幾十個學校自己搞的」。礦業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提出三點意見：一、不承認昨天下午成立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二、重新成立總部；三、如不能解決，就向毛主席直接請示。康生說：「沒有加入的，你們重新成立一個。」

9月5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周太安（海軍副司令員周希漢之子）任臨時指揮，喬丹林、伍連之、李延明、朱仲仁、羅開富、曾延麗、周亮等任副指揮。「二司」包括四十八所高校的四十八個組織，共一萬一千多人。其中只有極少數的少數派（如北航「紅旗」、輕工「紅鷹」），多數派佔絕大多數，曾被造反派譏為「保皇司令部」。江青、謝富治、楊成武、劉志堅、汪東興等出席了「二司」的成立大會。江青、劉志堅在大

會上講了話。「二司」的輔導員也是楊成武、劉志堅。「二司」的報紙為《東方紅》，10月1日創刊。

9月6日上午，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成立。它由十七所學校的十九個組織約四千人組成，絕大部分為少數派，其中有地質「東方紅」、清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郵電學院「東方紅」、外語學院「紅旗大隊」、政法學院「政法公社」、農機學院「東方紅」、北工大「東方紅」、農大「東方紅」等。「三司」的召集人為地質學院學生周永璋⁶⁰和清華學生唐晉。劉志堅、周榮鑫、戚本禹出席了成立大會，劉志堅講了話。「三司」的輔導員也是楊成武、劉志堅。「三司」的報紙為《首都紅衛兵》，9月13日創刊。

在這三個司令部以外，北京大專院校還先後成立過一些全市性的組織，如1966年10月16日成立的，當時被稱為「第四司令部」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聯絡委員會」，是由北京工業學院等一些院校的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的，但規模小，人數少，影響不大，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在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三個司令部之間，有着許多矛盾，發生許多爭鬥。後來演變為北京的兩大派——「天派」和「地派」之間無休止的鬥爭。

北京中學紅衛兵的活動大多局限於本校或學校附近的周邊地區，在1967年3月以前，基本上沒有成立甚麼全市性的組織。

1966年8月25日，北京西城區三十一所中學的紅衛兵組織在師大女附中集會，決定成立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之後不久，又有西城區的十九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陸續加入了「西糾」。「西糾」宣布自己的職責和權利是：學習、執行、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資和他們的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有權撤銷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衛兵組織；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保衛重要的國家機關和主要街道。「西糾」成立後，陸續發布了十三個通令，這些通令對保衛中央黨、政機關，保護老幹部，保衛國家機

60 周永璋不久即被開除，由朱成昭取而代之。

密，維護首都社會秩序，反對批鬥、抄家中的武鬥、體罰，以至維護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接待外賓的外事政策等許多方面，都做了具體的、詳盡的規定。「西糾」的成立和活動，為周恩來、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最初也不反對。周恩來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許明指導「西糾」的活動。周恩來曾親自點名要「西糾」派十五名代表在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接見活動，並在國務院親自接見了「西糾」總部的成員，十分具體地向他們布置了維持北京火車站秩序的任務，並當場指示周榮鑫為「西糾」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種活動的便利條件。此後，又通過周榮鑫、許明向「西糾」布置過一些任務，如在民族學院學生批鬥班禪大會保護班禪的安全，保護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程硯秋等的住宅，使他們免受抄家之虞。8月3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葉劍英見到孔丹等「西糾」代表時，稱讚「西糾」的通告寫得好，詳細詢問了「西糾」在宣傳設施方面的困難，當場表示要為「西糾」提供宣傳的便利條件。⁶¹

「西糾」的領導成員多為各級黨政幹部的子女，有較強的「血統論」思想和特權思想。「西糾」在破「四舊」和其他一些活動中經常表現出「老子天下第一」和高人一等的作風，在他們通告反對武鬥和打人的同時，自己卻經常大打出手。因此，「西糾」在大多數北京市民中的印象並不好。「西糾」保護老幹部的行動也與文化大革命的方針相悖，因此，「西糾」不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組所拋棄。比「西糾」稍晚，北京東城區(9月10日)和海淀區相繼成立了「東糾」和「海糾」，但都活動不多，影響遠小於「西糾」。

於1966年9月16日成立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簡稱「首都兵團」)，是由北京二中、五中、二十五中等校的少數派紅衛兵組成的多校聯合組織。「首都兵團」後來發展壯大，成為北京中學造反派紅衛兵最重要的組織之一。

61 孔丹：〈鎮壓「西糾」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反對周總理的險惡陰謀〉，載《人民日報》編印《情況匯報》第1107期(1979年4月3日)。

在北京以外的各大中城市，大多也都在8月中下旬以後陸續成立了一些全市性的群眾組織，在省市黨委控制和支持下開展活動。這些組織後來大多都成為保守派，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左右紛紛瓦解。

8月17日，長沙「紅色政權保衛軍」正式成立，它是長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眾組織。其成員有許多是省委、省軍區幹部的子女。到9月14日，長沙市又成立了以工人為主的「保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和「無產階級專政軍」。9月28日，「紅色政權保衛軍湖南高等院校總指揮部」在省體育館召開成立大會。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萬達等到會祝賀，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被聘為顧問。

8月20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五一廣場舉行十五萬人參加的「歡慶文化大革命大會」，省委、省人委、省軍區、駐晉部隊的負責人參加了大會。會議宣布成立全省紅衛兵組織籌備領導機構，領導全省的紅衛兵運動。省委希望通過這樣的組織實現對紅衛兵運動的領導，避免進一步失控。但是這一願望完全落空。

8月24日，重慶全市各大專院校按黨政領導的布置統一成立了毛澤東思想赤衛軍（簡稱「赤衛軍」）。這個組織最初包括大專院校中的「紅五類」學生及教職工，後來學生大多轉到「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後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赤衛軍」就成為以大專院校教職工為主體的群眾組織。

同日，重慶醫學院一批「紅五類」學生（主要是幹部子女）在黨政領導支持下串連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9月3日，經重慶市委支持下，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召開代表大會，通過成立宣言。市委派來了管弦樂隊和記者。9月8日正式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由市委提議，經成都軍區批准，五十四軍軍長章統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門擔任「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輔導員。9月9日，《重慶日報》以套紅通欄標題顯著報道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成立的消息，並配發社論〈向英雄的紅衛兵致敬〉，稱「這是我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大喜事」。隨即，市委號召各單位發動「紅五類家長」踴躍「送子參軍」（即送子女參加「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重慶日報》進行大肆炒作，全市掀起勞動模範、老工人「送子參軍」熱潮。

8月25日，南寧市「紅衛兵聯合司令部」在紅星劇院召開成立大會。自治區黨委、南寧市委領導人出席大會。大會提出「破四舊、立四新」的倡議。

8月31日，「杭州市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紅一司」)成立，下設紅衛兵糾察隊。「紅一司」大量印發北京「西糾」的一些通令，並在鬧市區設立「糾察」，制止紅衛兵運動中的一些極端做法。

9月3日，廣州市紅衛兵第一次大會在中山紀念堂舉行，中共中央中南局、廣東省委、廣州市委、廣州部隊、廣東省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大會。大會通過了〈紅衛兵宣言〉。

9月7日，新疆自治區黨委向各學校發出籌建烏魯木齊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的通知。9月9日，烏魯木齊地區紅衛兵代表大會召開，自治區黨委和新疆軍區領導人參加了大會。會議宣布成立「烏魯木齊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籌委會」(後改為「紅一司」)。

9月10日，昆明地區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任「紅衛兵總部」的總輔導員，王硯泉(昆明軍區副參謀長)、許志奮(昆明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任輔導員。「紅衛兵總部」後被造反派譏為「保皇總部」。

9月中旬，濟南市一些大中學校紅衛兵組織聯合成立了兩個相互對立的紅衛兵組織——「濟南紅衛兵師」和「紅衛兵濟南指揮部」。「紅衛兵師」多是支持學校領導的學生組成，而「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多為學校中反對校領導的學生組成。10月下旬，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紅衛兵師」及其下屬組織紛紛解體，「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則不斷壯大，形成全省性組織，並改名為「紅衛兵山東指揮部」。

上海市在9月12日成立了「上海市紅衛兵總部」，9月26日成立了「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這些紅衛兵主張在黨委領導下開展運動。隨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興起，這兩個紅衛兵總部被公認為保守組織，11月以後相繼垮台散夥。10月以後，開始出現幾個全市性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影響較大的有：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上三司」)，以及從中分離出的紅衛兵上海第三

司令部(簡稱「紅三司」)。中學跨區紅衛兵組織在全市有影響的有：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上海東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東北」、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西南」、紅衛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員會(簡稱「紅反會」)等。

三 「破四舊」運動

所謂破「四舊」、立「四新」，即「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是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中首先提出來的。〈十六條〉中說：「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但對甚麼是新的、甚麼是舊的，〈十六條〉並沒有做出科學的明確的界定。⁶²實際上，在「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和廣大群眾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認識各行其是的。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綱〉中「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提出：「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這段話是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寫的。當時這段「最高指示」，受到了廣泛的重視和引用，成為開展「革命大批判」的理論依據，也是「破四舊」運動的理論依據。所謂「徹底砸爛舊世界」、「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徹底砸爛公檢法」、「徹底砸爛舊教

62 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舊文化、舊思想的本質是甚麼呢？……最本質的舊，就是舊在一點上，舊在一個私有制上。概括起來，舊在一個字上，舊在『私』字上。那個新東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點上？概括起來說，新在一個『公』字上。」

育制度」，「徹底搞掉文藝黑線」等等諸如此類的口號風行一時，就是「破字當頭」方針在當時的群眾運動中的體現。

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都不是單純依靠暴力、行政命令所能輕易改變的。但承載着中華民族悠久文化的珍貴書畫、文物、古建築卻可以毀於一旦，「破四舊」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是無可挽回的。

「破四舊」運動產生了巨大的社會震蕩，確實對打破舊秩序起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它的實際效果卻是可悲的。不但沒有能樹立起馬克思主義的新思想，反而造成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形而上學、簡單化庸俗化的大泛濫；不但沒有能夠破除掉舊思想、舊文化，反而破壞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的一些好的傳統也被拋棄，造成舊思想文化的沉渣泛起和封建主義回潮。在某些地區和某些方面，大量出現是非顛倒、道德淪喪、人性失衡的種種怪現象。事實證明，試圖採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迅速改變整個社會精神面貌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實際的。

1 「向舊世界宣戰」

紅衛兵運動一經發動起來，立即衝出學校殺向社會，掀起了一場令世人震驚的「破四舊」運動。

8月17日，北京二中紅衛兵在全市街頭貼出傳單〈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其中寫道：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和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不例外。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式各樣的港式衣裙，以及黃色照片、書刊，正在受到嚴重的譴責。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過去十七年來，前北京市委對這些事情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甚至禁止改革。他們走的是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路，我們和他們是兩條路上的人。他們不管，我們要

管，還要管到底。我們一定要堵住一切鑽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我們向理髮、裁縫、照相等行業的革命職工倡議：港式的髮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相不照！黃色的書不賣！……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髮樣，燒毀黃色書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部分，可做補釘。「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跟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⁶³

8月18日，北京一些中學的紅衛兵醞釀要衝故宮，到舊日的皇宮裏去造反。當晚消息傳入周恩來耳中，他當即指示關閉故宮，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第二天，果然有紅衛兵前來故宮，工作人員按周恩來的指示把紅衛兵勸退。⁶⁴

8月19日起，北京市許多中學的紅衛兵紛紛走上街頭「破四舊」。

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的紅衛兵來到全聚德烤鴨店，砸掉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換上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榮寶齋的玻璃櫥窗裏掛上了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紅衛兵送來的大字報，大字報說：「榮寶齋是個黑畫店，幾十年來盤剝勞動人民的血汗，為資產階級小姐、少爺、太太、老爺服務，為封建地主閹老闆少服務，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服務，一句話，就是不為社會主義服務，不為工農兵服務。」「你們這裏已經成了黑幫畫家的交易所了。我們就是要把榮寶齋打個身敗名裂！」

北京許多街道、商店、工廠、學校，都被紅衛兵改了名字。長安街被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也被改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所在的光華路改為援越路。⁶⁵王府井百貨大樓改名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

63 《人民日報》1966年8月26日發表此文時將題目改為〈向舊世界宣戰〉。

6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0。

65 8月31日，《北京日報》報道，市人民委員會根據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倡議，決定組成專門工作組，徹底改革首都街巷名稱。參見《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大事記》，頁225。

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亨得利鐘錶店改為首都鐘錶店，藍天時裝店改為衛東服裝店。這一股改名之風也吹到了中南海裏，周恩來居住的西華廳改名為「向陽廳」。周恩來還在對紅衛兵的講話中說：「獅子(按：指大門前的石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一個最後通牒，連我們這個(按：指新華門前的石獅子)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牒，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⁶⁶

8月20日，女二中高二(三)班紅衛兵在蘇聯大使館對面牆上貼出大字報〈反修路命名宣言〉，要求將蘇聯大使館所在的揚威路改為反修路。大字報寫道：「他媽的，揚誰的威風，我們紅色中國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決不能叫修正主義耍威風。」8月21日，毛澤東主義大學附中又貼出一張〈反修路規定〉：「自1966年8月21日起，在此路行駛的各種外國車輛一律慢速行駛。今後絕不允許修正主義國家的車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的土地上橫衝直撞，無法無天。」通往蘇聯駐華商務參贊處的北順城街也被改為挖修根街。

8月22日，二百多名回族學生到牛街清真寺造反，學生們向阿訇宣布四條命令：一、交出全部古蘭經；二、不許進行迷信活動；三、勞動改造；四、不許穿長袍馬褂。後來更有「消滅伊斯蘭教革命戰鬥隊」提出「徹底消滅伊斯蘭教」的口號，旋即被制止。周恩來於1966年9月15日接見西安學生時說：「北京大字報貼了很多，有的我們是不同意的，例如〈為徹底消滅伊斯蘭教而鬥爭〉的大字報……」。⁶⁷

8月23日，七十八中、五十八中等校紅衛兵到中國佛學院造反。8月24日，十幾所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機關的直接支持下，衝進設在東單三條的瑪利亞方濟格修女會，要求驅逐「披着宗教外衣從事間諜活動的」羅馬修女。8月26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在群眾集會上宣布：取締瑪利亞方濟格修女會，並接管這個修女會所辦的聖心學

66 周恩來接見半工半讀學校部分革命師生時的講話(1966年10月2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恩來年譜(1949—1976)》記載此次接見的時間是10月21日。

67 周恩來接見西安同學時的講話(1966年9月1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校。8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當眾宣布驅逐令，立即執行。當夜，大批群眾組織在修女會院內外開會，控訴並聲討這個修女會的罪行，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反革命外國修女滾蛋！」等口號。8月31日，由公安人員和紅衛兵押送，八名外國修女被趕出中國國境。

8月23日上午，二十五中學生向各民主黨派的民主人士下令：一、定息、股票馬上燒毀或交給國家，一切剝削來的東西全部上交國家；二、薪金上交40%（後增至80%）；三、上下班不許坐汽車，要參加打掃衛生等勞動。8月23日下午和24日下午，機電學校和六十六中紅衛兵分別在全國工商聯召開鬥爭會，鬥爭了榮毅仁、樂松生、胡子昂、胡厥文、孫曉村、孫起孟等十三人，會上大搞武鬥，罰跪、掛牌子、剪頭髮、脖子上掛皮鞋、衣服上寫字，臉上塗黑，用皮帶抽打。

8月23日夜裏，八中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七十二小時內解散並登報聲明。農工民主黨草擬了〈關於停止組織活動的聲明〉，全國工商聯關上了大門，並掛出牌子，宣布：「停止活動，是否解散待上級指示。」8月25日早晨，民盟中央以辦公廳的名義，在機關大門上貼出〈中國民主同盟公告〉，全文如下：「本盟完全接受紅衛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中共中央處理。」當天下午，北京市的一些中學生在民盟中央機關召開批鬥吳晗、章伯鈞大會。

8月27日，在民盟中央舉行了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四個民主黨派向八中紅衛兵交印儀式。八中紅衛兵代表說，這些印由他們暫時保管，以後交給中共中央。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於8月底由北京外語學院附中紅衛兵接管。8月30日，全國政協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活動。在這種突如其來的險惡形勢下，許多民主人士表示要放棄定息，取消高薪。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退出了部分薪金，有些人還交出了銀行存款單。一些有專車的民主人士主動放棄專車，乘公共汽車上班。據統計，各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約有一百多人先後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佔總數的36.5%。

8月29日晚，北京大學經濟系紅衛兵三十餘人，闖入原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章士釗家抄家，抄走了章家保存的大煙槍等物。因看見章家擺放有章士釗與毛澤東的合影，所以並未發生太出格的事

情。事後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了紅衛兵來抄家的粗暴情景，懇求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章士釗早年曾有恩於毛，毛澤東30日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早就對「破四舊」運動可能衝擊許多民主人士而憂心忡忡，有毛此信，周恩來心裏有譜了。他立即對章士釗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當天，周恩來親筆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⁶⁸，並囑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把這份名單轉交給統戰部，要統戰部照名單劃定範圍，把黨外人士的名單開列出來。後又命三〇一醫院準備接受張治中、章士釗、程潛、傅作義等高級民主人士入院，告以這些人士年老多病，政府應負責保護。⁶⁹

8月23日下午，北京半工半讀印刷學校等學校的紅衛兵，將在「破四舊」過程中，集中到市文化局收存的戲裝、道具堆到國子監孔廟大院內縱火燒毀。

同日，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和教職工等共273人，到頤和園佛香閣砸碎了釋迦牟尼大佛像，有兩個小塑像被紅衛兵拖走。

8月25日，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倡議，將圖書館所有有毒書籍統統燒掉。當晚，焚燒了《紅樓夢》、《三國》、《聊齋》、《二十四史》及外國小說等共二千餘冊。

在「破四舊」中，北京許多名勝古蹟和文物遭到破壞。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中，竟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被毀於1966年8、9月間。共有200多間古建築被拆毀。被毀的文物還有白塔寺的山門和鐘鼓樓、恭王府的80間古建築，從東西長安街遷到陶然亭的木牌樓，碧雲寺的明代佛像37尊，西山八大處的明代佛像222尊，北海和團城的明清塑像22尊，潭柘寺、戒台寺的近80尊佛像，古剎上房山兜率寺的數萬卷歷代佛經，54公里的明代長

68 在這份名單中列有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人士和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常委，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部長、副部長，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

6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3—54。

城，豐台區大井寺延壽寺的千手千眼銅佛，建於八百多年前的天寧寺塔，圓明園2290多米長的圍牆。與此同時，一些幾百年、數千年流傳至今的，被一些專家、學者、文物收藏家和愛好者收藏的珍貴文物和古書，也遭到查抄和破壞。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僅從各個煉銅廠就搶救出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就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多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18.5萬件，古舊圖書235.7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8萬件。⁷⁰

8月22日，二十六中紅衛兵到《工人日報》社要求印一個宣言，內容有三項：一、取消資本家的定息；二、所有公私合營企業馬上改為國有；三、房產主的房屋，除本人住的外，其他一律歸公。

8月23日，二十二中紅衛兵和北新橋郵局聯合發出通令，禁止舊官僚、反動軍官、資本家訂閱內部刊物。一中造反者發出〈戒煙戒酒通告〉，要求封閉煙酒店，停止生產、銷售煙酒。

8月25日，九中抗大紅衛兵提出立即廢除高薪制。

8月26日，二十六中東方紅小組發出倡議：廢除舊國歌，創作新國歌。

8月27日，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代表會議上說：「十五中同學要求警察換上解放軍的服裝，這個事好辦，我跟謝富治副總理商量，9月1日就改。」他在9月10日的首都紅衛兵座談會上又說：「改了服裝，現在又出現了問題，陰天、晚上目標不明顯，任何一個建議都不會百分之百正確。我們決定套個白袖套，上班時套，這樣就完善了。」

8月28日，三中紅衛兵貼出大字報，反對十一遊行由東向西行進。半工半讀服務學校學生倡議取消農村所有的自留地。

8月29日，一中紅外圍戰鬥小組貼出大字報，要求修改憲法。

8月30日，八十中紅衛兵貼出大字報，要求廢除芭蕾舞。

9月10日，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座談會上說：「女十五中讓把紅綠燈改一下，我與謝富治同志研究一下，但問了幾個司機，司機說不

70 轉引自趙學勤：〈「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文物遭浩劫〉，載北京日報社《宣傳手冊》編輯部編：《宣傳手冊（專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1985），頁94—95。

行，紅燈目標明顯，改成綠燈，白天甚麼也看不見，容易出事故。給女十五中的同學講了這個道理，她們認為我不是強詞奪理，同意不改了。」

在「破四舊」的高潮中，紅衛兵和許多青年學生真正做到了「敢想、敢說、敢幹、敢造反」，除了對毛澤東的崇拜外，甚麼都可以不管不顧，都可以大造其反，出現了不少極其荒謬、無法無天的言論。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是：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大學貼出了一張署名為「北大東語系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喬兼武杜文革」的〈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提出要「造三個大反」，要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他們要造的第一個大反是：「取締黨團組織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員會」。〈公開信〉列舉了「現行黨團組織形式的罪狀」有八條：一、不利於搞群眾運動；二、實際上沒有發動全民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三、容易產生修正主義，便於反黨黑幫分子搞陰謀；四、疏遠領導與群眾的關係；五、不利於把毛澤東主義作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六、用入黨的方式鑑別人、考驗人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不科學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不能只考驗一年半載，而要鍛煉一輩子，採用入黨的方式鑑別人，容易給投機分子鑽空子的機會），總之，這種組織形式不利於人的思想革命化；七、蘇聯的教訓；八、有些壞的黨組織盜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名義把群眾引入歧途。他們要造的第二個大反是：「全國的黨政合而為革命委員會」。他們要造的第三個大反是：「砸爛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辦公室」。〈公開信〉說：「辦公室制度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工作制度，不是無產階級的工作制度，而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的工作制度，因為它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脫離生產勞動。」⁷¹

北京紅衛兵「破四舊」的消息很快就通過報刊、電台等媒介傳向全國，立即在全國引起連鎖反應，「破四舊」的風暴在全國各地興起。

71 喬兼武原名喬俊禮，杜文革原名杜文忠，都是北大東語系緬二班的學生。喬、杜兩人的大字報貼出後被許多人批判為反革命的大字報，8月31日，北京大學召開全校大會，對二人進行了批判、鬥爭。

8月23日，上海紅衛兵開始在南京路、淮海路等繁華商業街上開展「破四舊」活動。大批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檔商品被禁止出售，如老大昌的高檔麵包、泰山飲食店的「攪奶油」、滄浪亭的蝦仁麵等都停售。咖啡館、彈子房以及珠寶、古玩商店被勒令停業。紅衛兵還對穿着「奇裝異服」的行人採取剪「小褲腳管」、剪「大包頭」、剝「尖頭皮鞋」等粗暴行動。

8月26日，洛陽市白馬寺村村民將著名的白馬寺內收藏的《大藏經》55884卷焚燒，並砸毀元、明兩代所塑佛像九十一尊（其中有印度所贈白玉佛一尊）。當天，洛陽八中學生到龍門石窟⁷²「破四舊」，中共洛陽市委聞訊後，立即指派洛陽農機學院師生前往保護，使這一珍貴文化遺產得以幸存。

8月27日，山東冠縣二中、柳林農中、衛生學校等幾個學校的師生一起砸毀了武訓墓。他們還挖出武訓屍體，抬着屍體遊行。然後到柳林北門外場院召開批判大會，最後將骨殖砸爛焚燒。

在河南焦作市的「破四舊」運動中，發生了停供五類分子糧油供應的情況。焦作市中站區糧食分局停供五類分子（含家屬）9月份糧食。中站區新市場、西採煤街、新建南街沒收五類分子（含家屬）糧油供應本⁷³ 26戶（計119人），停供糧食3104斤。⁷⁴

11月8日至12月6日，以譚厚蘭為首的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指使下，到山東曲阜，聯絡當地一些學校的紅衛兵，衝進孔廟、孔林、孔府，刨古墳、燒古籍、砸石碑、毀文物，並因國務院於1958年將孔廟等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向國務院發出抗議信。他們還挖開孔子第七十六代孫孔令貽墓，破棺暴屍，並對附近的周公廟進行了破壞。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裏，他們共破壞明代

72 2000年11月30日，洛陽龍門石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73 從1953起，全國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城鎮居民吃糧憑證供應。在北京，購買糧食的憑證是「北京市市鎮居民糧油供應證」，簡稱「購糧本」或「糧本」。全國各地的城鎮居民購糧均須憑證，但各地購糧憑證的具體名稱有所不同。

74 中共焦作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焦作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98。

孔像一尊，大幅匾額二塊，挖掘孔墳六座，砸毀石碑四十餘通，泥塑像十七尊，毀壞大量字畫、書籍、家譜等文物。

「破四舊」的高潮在1966年的8、9、10月，但「破四舊」的口號貫穿了整個文化大革命，在以後的幾年中，有許多所謂的「新生事物」都是「破四舊」的結果。1967年1月15日，地質「東方紅」、礦院「東方紅」等組織宣布封閉頤和園，他們貼出的通告說，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使外地革命師生有更多的時間參加文化大革命」。1月16日，地質「東方紅」、輕工「東方紅」、京工「東方紅」等又封閉了動物園，北京房管學校則宣布封閉十三陵。此後幾乎所有的公園都先後被封閉了。1968年1月，北京地質學院的造反派在「廢除高薪制」的口號下，發布一條「戰報」：

為了徹底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為了砸爛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在經濟上的高薪制度，為了徹底打倒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反動學術權威，從政治上、經濟上把他們的威風打下去！我聯絡站決定，堅決處理我黨內走資派及反動學術權威的高薪問題，經報請紅衛兵總部批准，現決定取消他們的高薪，按下列標準供給生活費：

1. 對於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的生活標準，不得超過北京最低生活水平即12.5元。

2. 對其家屬、子女應分別對待，他們的生活標準不得超過北京市中等水平18元。

現將處理結果公布如下：……

砸爛修正主義高薪制度聯絡站 1968年元月8日⁷⁵

在「破四舊」運動中，許多人出於恐懼而將自己的許多珍貴文物、字畫等自行銷毀。還有許多人將可能被認為是「四舊」的物品偷偷扔掉或毀掉，在那段時間裏，北京的掏糞工人從廁所裏掏出了金銀首飾的事情時有耳聞。

75 引自1968年1月出版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

曾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脫黨，解放後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他與中共創始人陳獨秀關係密切，收存有陳獨秀自1920年起先後給他的一百多封信。幾十年來他走南闖北，一直帶在身邊，精心保存。後又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寫了前言，題以〈陳仲甫先生遺墨〉，以圖永久收藏。「破四舊」運動中，他挨了一頓棍棒後，嚇懵了，竟讓子女將那一百多封信全部燒掉了。⁷⁶

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後，於1962年到廣州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長。文革開始後，他首當其衝，慘遭迫害。他於1966年12月自殺身亡之前，將自己畢生珍藏的歷史文物全部燒掉。他一邊燒，一邊放聲大哭：「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⁷⁷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上海著名的書法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作品，以及一批明、清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在菜籃，讓兒子在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了蘇州河。⁷⁸

就是身經百戰的老將軍，也會被來勢洶洶的「破四舊」嚇出一身冷汗來。原南京軍區政治委員唐亮上將（1963年因病被批准離職休息）在「破四舊」中「帶頭將家中的麻將、撲克、唱片、古書、高跟鞋、旗袍等，付之一炬。將軍言，古書中有一部《清宮十三朝》，線裝書，甚為可惜」。⁷⁹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上將在情急之中將自己一捆嶄新的釣魚桿燒了，他的夫人把楊勇出國帶回來的那些字畫都抱到鍋爐房，「燒了好長時間」。⁸⁰

76 葉永烈：《名人沉浮錄》（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頁39。

77 南光編：《毛澤東和他的四大秘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頁207。

78 丁抒：〈破四舊：幾多文物付之一炬〉。原載《多維周刊》（www.chinesenewsweek.com），2000年7月28日。

79 吳東峰：〈開國將軍多軼事〉，《北京青年報》，2002年11月23日。

80 舒雲：〈楊勇和警衛員孫啓增〉，《縱橫》，2000年第7期，頁35。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印發了十幾份參考材料，其中之四是宣揚紅衛兵「破四舊」偉大戰果的〈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這個材料有「把資產階級打得威風掃地」、「挖出了一批潛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掃除宗教迷信，搗毀教堂寺院」、「沒收了一批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等十項內容。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大城市8月23日至10月3日，在抄家中共抄走黃金119.8萬兩，白銀1200萬兩，銀元978.9萬塊，美元355.8萬元，英鎊和其他外幣373.9萬元，現鈔、存款、公債券等4328萬元，金銀首飾等1719萬件，綢緞和布95萬尺，文物約1億件，書刊524萬冊。全國各城市破獲現行反革命案件1788起，從城裏趕走「牛鬼蛇神」39.74萬人。

2 「紅色恐怖」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打人的現象層出不窮。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海淀區中學生代表大會上支持紅衛兵造工作組的反，同時也談到了打人問題，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嘛，以後不打就是嘛！……人的錯誤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風暴中出現打人的事情不是壞事。毛主席說過：『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今後不要再打人了。』」⁸¹ 8月2日，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魯箴在接見北京鐵道學院的師生時，也談到毛澤東對打人問題的態度。陶魯箴說：「『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主席說：『為甚麼不把我的話全面講呢？我後面還有一句話，今後不許打人。』今後要宣傳打人是犯法的。」

工作組從學校撤出後，青年學生在運動中常常出現的過火行為失去了控制。尤其是中學生，他們在鬥爭學校裏的「走資派」和打擊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時行為更為激烈，經常出現暴力和血腥的場面。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出現了紅衛兵將本校副校長卞仲雲(女)毆打致死的惡性事件。

⁸¹ 江青對北京市海淀區中學生的講話(1966年7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月6日，張春橋在接見天津學生時說：「有的同學打了人，思想負擔很重。我們不提倡打人，但已經打了，怎樣？只好解放這些學生。當時兩派學生鬥起來了，其實兩派學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學自己就說嘛，打我們的同學也是為了捍衛黨的利益，是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原來對我們沒有認識清楚，當成了反革命。這是工作組挑唆的，我們要解放兩方面的學生。好人打了壞人活該，好人打了好人是誤會，我們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後不要再打人了。」⁸²

這些講話當時到處流傳，打人之風愈颯愈甚。打人的人總認為是好人打了壞人。謝富治在當時召集的甘肅、陝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長座談會上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8月2日，北京四十七中紅衛兵組織「紅紅紅」的一名學生被幾個「小流氓」用刀刺傷，經北京新市委同意，北京中學紅衛兵於8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十萬人大會，對五名「小流氓」進行鬥爭。會上，一些紅衛兵不顧大會組織者的阻攔，衝過去用皮帶抽打被鬥者。這對以後打人風的盛行起了重要影響。⁸³ 在這次大會上，李富春代表中央宣布

82 張春橋接見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大學來京同學時的談話（1966年8月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張春橋的這段話，在另外的版本中記為：「打人我們是不提倡的，但學生打了學生，我們就要解放他們，毛主席說，『好人打壞人是活該，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戴高帽，我們也不提倡，戴了嘛，就要解除學生包袱。所以我們說，打了也是革命學生。」

83 周恩來在1967年9月20日國慶籌備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嚴厲批評了打人的風氣，他說：「由北京傳出一個壞的風氣，就是打人哪！去年8月份，王任重組織的十萬人大會，公審社會上的幾個青年，他們叫作流氓分子，就是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情，年紀很輕，不到十八歲，用那時公安警察人員把他們拖到會場，彎腰，然後跪在地上，背上還踏上一隻腳，這些青年即使有犯法事情，有流氓行為，你教育嘛，怎麼能夠對這些青少年在十萬人大會上，在群眾之中醜化虐待呢？這樣給我們群眾運動造成一個很不好的影響，以後許多地方這樣做。緊跟着他們那個大會以後，有兩次要開十萬人大會，一個公審反革命報復犯的老婆，另外一個是同學們武鬥當中，有一方面犯了法，我們經過兩天一夜，把兩個十萬人大會都說服了，不開了。」

改組團中央。13日晚到15日，一些中學的紅衛兵到團中央造反，一度佔領團中央機關辦公樓。此後，《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誌相繼停刊，中央團校停辦，團中央的系統領導隨之中斷。

8月19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紅衛兵同市委教育部文化革命小組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批鬥大會。會上將北京市、西城區主管教育工作的領導幹部張文松、孫國梁、李晨、韓作黎、汪家鏐、侯維城、楊榮梅及四中、六中、八中三校的領導幹部押到會場進行批鬥。他們被強迫從噴氣式，用嘴叼着「黑幫」牌子，罰跪，慘遭皮帶毒打。此事也在全市造成了惡劣的影響。8月20至25日，西城區就有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女三中黨支部書記兼校長沙坪、師大二附中黨支部書記姜培良被紅衛兵揪鬥、折磨、毒打致死。⁸⁴

8月21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規定：所有部隊絕對不准動用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更不得向學生開槍，就是向學生放空槍，也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將要受到嚴格的紀律處分。⁸⁵ 8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報告，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⁸⁶

上述講話和文件都在不同程度上縱容和鼓勵了當時普遍出現的打人現象，打人者有恃無恐，更加無法無天。

8月23日，北京大學轉抄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24日凌晨，毛澤東的大字報由北大傳到了清華，清華的造反派馬上貼了一大批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如〈炮轟劉少奇〉、〈劉少奇7月29日講話是一株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等，把當時還是中央機密

84 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組織部、中共北京市西城區黨史辦公室、北京市西城區檔案局：《北京市西城區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1949—1987)》(北京：內部出版，1995)，頁268。

85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90。

8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91。

的內容一下子捅到了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另外還有許多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大字報。中午，這類大字報貼滿了清華園。這種情景，被一些老紅衛兵認為是「右派翻天」。下午2時許，清華大學自控系紅衛兵佔領了廣播台，5時，清華附中等十二所學校的紅衛兵二千餘人在清華大學文革臨籌負責人賀鵬飛的率領下進入清華園，實行戒嚴。他們對大字報進行拍攝、抄錄後，將大字報全部撕去。然後，他們闖入宿舍捉拿「右派」，對原校領導、「黑幫」分子進行毆打和抄家，並勒令一些群眾組織解散。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清華大學「八二四」事件。這一事件迅速影響到其他學校。當晚，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封鎖大字報區，把攻擊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移走，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覆蓋了所有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

「破四舊」中打人現象更為嚴重。北京的民族資本家、「黑幫」、「五類分子」普遍遭到打罵、凌辱和抄家。1966年8、9月，北京市被紅衛兵驅逐回原籍的共有85198人，被抄家的有11.4萬戶。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非法沒收的私房達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上海市的抄家更甚於北京。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8月23日至9月25日，上海全市被抄家的共15.77萬餘戶，佔全市總戶數的6.5%，⁸⁷有的人還被反覆抄家。全市原工商業者幾乎無一幸免被抄了家。天津市被抄家的有12000戶。各種名目的紅衛兵組織都可以自行抓人，進行批鬥、遊街。私設公堂，濫施酷刑，甚至打死人的現象比比皆是。

8月23日下午，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聯（北京市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造反派，聯合北京大學、北京女子第八中學的一些造反的學生批鬥他們那裏的「牛鬼蛇神」。北京市文化局長趙鼎新、著名作家老舍、蕭

87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北京》，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168；《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共上海黨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頁755。另據已正式出版的一些地方志記載：蘇州市有64056戶被抄家；武漢市有21000戶被抄家；雲南昆明市有1749戶被抄家；上海川沙縣有7800多戶被抄家；上海普陀區有5363戶被抄家；浙江嵊縣有8000餘戶被抄家；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有565戶被抄家；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275戶被抄家；江蘇江寧縣祿口公社有308戶被抄家；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有315戶被抄家。

軍、駱賓基、端木蕻良，著名演員荀慧生、侯喜瑞等二三十人被揪出來。他們的脖子上掛着寫有他們名字和罪名的大牌子，在院子裏站成一排。這三十來個「牛鬼蛇神」被押上兩輛大卡車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大院裏。大院中央架起了一個大火堆，正在焚燒抄來的書籍和戲劇服裝。這些人被強迫在火堆前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台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武裝帶，狠狠地抽打他們。據蕭軍說，當他跪在燒書的火堆前，被身後的紅衛兵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毒打，以致頭上鼓起了大包，滿背流血的時候，心中真是憤怒至極。他想過要反抗。蕭軍年輕的時候上過軍事學校，練過武功。他說，那時候他心裏想，如果他動手反抗，憑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幾個人。但是，他看到來自各學校的紅衛兵圍得裏三層外三層，爭相出手，打人打得發瘋了一般。他說，他想最後自己一定寡不敵眾，會被打死，自己死了也就死了，好漢做事好漢當，可是其他被鬥者會怎麼樣？和他一道被鬥爭的還有近三十個人，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邊，臉色煞白，額頭有血流下來。他想，如果他反抗，其他二十八個「牛鬼蛇神」，包括老舍先生，一定會跟他一道統統被打死在現場。他也想到他的家人也會被報復打死。他想了又想，最後調動了心中所有的力量，咬緊牙關，壓下反抗的衝動，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⁸⁸

在「文廟」毒打之後，老舍等人被帶回到機關，繼續接受批鬥。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了8月23日的情景：「在文聯樓門前的台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選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一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⁸⁹ 當晚，老舍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才獲准回家，並

88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頁227。

89 楊沫：《楊沫文集》，下冊（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頁5。另據浩然在《我的人生》（北京：華藝出版社，2000）一書中所說，揭發老舍的人為作家草明。

責令其第二天仍去機關接受「批鬥」。第二天早上他離開家後，卻未去機關。浩然在《我的人生》一書中寫道：「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們這個組織也去了，貼大字報。」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8月28日，家住北京市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二十號的李秀蓉老太太一家飛來橫禍，五人死於非命。事情的起因是：當地派出所民警接到個別人舉報說，這一家人在轉移財產，於是民警召來附近的三十八中紅衛兵前去抄家。抄家過程中，李秀蓉全家人都遭到紅衛兵的毒打，李秀蓉的外孫子黃瑞五、外孫女黃煒班，和在他們家工作了十二年的男傭當天即不治身亡，兩天後，李秀蓉的女兒陳玉潤也死去。八十歲高齡的李秀蓉老人親眼見外孫子、外孫女、女兒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幾天以後也受驚嚇而死。⁹⁰這一類慘劇在「破四舊」運動中頻頻發生。

絕大部分被抄家和被毆打的人只能忍氣吞聲地接受懲罰。但也有極少數被抄被打的對象，不堪忍受虐待鋌而走險進行反抗。8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學初中的紅衛兵到崇文區欖桿市抄家的過程中，發生了「資本家」李文波持菜刀砍傷紅衛兵的事件。李文波被當場打死。事後，紅衛兵以資本家進行階級報復為由，要求召開十萬人的公審大會，公審李文波的妻子。後經周恩來反覆作說服工作，才阻止了大會的召開。⁹¹李文波事件被大肆渲染，又引起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8月底至9月初的幾天，成為北京市打死人最多的日子。⁹²

90 李相：〈北京大紅羅廠南巷20號駭人一幕——五人死於紅衛兵之手〉，《南方周末》，2000年3月31日。

91 周恩來在國慶籌備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67年9月20日）。

92 北京市區打死人現象集中在8月最末一周，城區共打死840人。郊區農村打死人現象集中在8月29日至9月1日，共打死684人。8、9月間，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數共計1772人。參見《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大事記》，頁224。北京市打死人數：8月24日：44人；25日：86人；26日：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2日：39人；3日：24人；4日：21人；5日：13人；6日：8人；7日：7人；8日：5人；9日：4人；10日：2人；11日以後知道日子的20人。其他還有日子不詳的88人。轉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224。

據統計，1966年8、9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是北京市大興縣大規模的打死人事件。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開局委會議，傳達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謝富治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在這之後，有的民警就向紅衛兵介紹了「四類分子」的情況。對紅衛兵的打人現象不但不制止，反而縱容、支持，這就更促使打人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打死人的事情屢見不鮮。還有人造謠說：「這事兒(按：指打死人)公社知道，縣裏知道，市裏知道，連周總理都支持。」從此，亂打亂殺日益嚴重，由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消滅幾十個，發展到亂殺家屬和有一般問題的人。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人家被殺絕。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莊公社最為嚴重，僅8月31日一天就殺死了數十口人，有一個水井都被填滿了死屍。直到市委書記馬力到縣制止，事態才平息。

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為制止城鄉出現的打死人現象，發出〈緊急通知〉。〈通知〉提出：

一、各級黨委、人委黨組，公安部門，均應根據〈十六條〉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精神，表示明確態度，支持群眾的革命熱情，但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

二、過去有少數單位提供所謂流氓分子名單，鼓動群眾去鬥打，這是錯誤的，從現在起一律禁止提供名單，違者要受紀律處分。

三、除現行犯外，五類分子的名單，有關部門也不要向群眾提供。⁹³

93 《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大事記》，頁225。

當時任中共大興縣委農工部幹事的張永和，當年參加了到大興縣東方紅公社馬村大隊制止殺人的工作，他在回憶中描述了他所親眼目睹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五間東廂房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着，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着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賬」⁹⁴，只要是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隨着喝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七十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只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賬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着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着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錘，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三十多歲的小伙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

94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地、富、反、壞、右等「五類分子」都被宣傳為「人還在，心不死」，隨時隨地幻想復辟、變天，很多人都藏有用來向貧下中農反攻倒算的所謂「變天賬」。

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伙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伙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鑽到井裏往外撈……⁹⁵

大興殺人事件被制止後，當時並沒有馬上對殺人凶手進行追究刑事責任，大約是在三四年後，才對一些主要責任人進行了處罰：大辛莊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被處以八年有期徒刑。殺死人最多的黎明大隊(共殺六十多人)書記楊萬杰被判八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八年徒刑。

3 「破四舊」運動何以盛行一時？

「破四舊」運動開始於1966年8月中旬，很快即風行全國。「破四舊」運動的高潮持續了大約兩個多月的時間，在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破四舊」運動漸趨平息，但個別地區的「破四舊」行動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還時有發生。「破四舊」的造反行動嚴重踐踏了法制，造成社會的大動亂。「破四舊」公開地違背了憲法和法律，也明顯地違背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貫的方針政策，但它不但沒有被制止，反而不斷受到讚揚和鼓勵，因而也就得以愈演愈烈，這到底是為甚麼呢？

答案是：「破四舊」的行動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明眼人都清楚，「破四舊」可能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動蕩，毛澤東當然也清楚。但他認為，亂是不可怕的，亂是要達到「天下大治」的必經階段。

95 張連和：〈五進馬村勸停殺〉，載者永平主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上冊(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頁399—403。另據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一文(原載於新語絲電子文庫(www.xys.org) (www.xys2.org))，張永和在接受遇羅文的採訪時說：「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後來也「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扎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陣鐵錘、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

而且，「破四舊」本身也傳達着強烈的滅資興無的價值取向，而這正是毛澤東所想要的。毛澤東下決心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中就含有要讓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這一重要內容。⁹⁶ 筆者想像，毛澤東在得知紅衛兵們衝出校門，殺向社會大破「四舊」的時候，他不會感到恐慌和憂慮，或許他還會「竊喜」，或許他還會自言自語道：「狂飆為我從天落。」8月20日，毛澤東在林彪轉送的反映有關「破四舊」行動的《文化大革命情況簡報》第109號（《解放軍報》總編室編）上批道：「已閱，是大好事，徹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這樣可以打出一條路來，對群眾有利。」⁹⁷ 在「破四舊」的高潮中，有一天毛澤東把吳德找去匯報情況。吳德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⁹⁸

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他說：

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甚麼方針？我的意見是亂他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提倡文鬥，不要武鬥。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凶手捉回來，驚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⁹⁹

96 1966年7月21日，毛澤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即《十六條》的前身）草稿上，將「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為：「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83。

97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38。

98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27。

99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151—152。

毛澤東的這番話值得注意。他是在北京掀起「破四舊」運動的高潮中講這番話的，他是在北京已經出現了大批的非法暴力行為，死人事件頻頻發生的情況下講這番話的。他認為「北京亂得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

8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大字標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首都街道〉，並發表兩篇社論，題目分別為〈好得很〉和〈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在〈好得很〉這篇社論中寫道：

北京解放已經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義的前北京市委長期把持、壓制下，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着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着人們的靈魂。……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着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這是破舊立新的革命行動。閃耀着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新名稱、新風俗、新習慣，為我們偉大的首都，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增添了無限的光彩。

8月2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社論說：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鬼，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這篇社論讚揚了亂揪亂鬥、抄家和掃地出門。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來京師生和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

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上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改變着我國整個社會面貌。」¹⁰⁰

9月15日，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林彪表示了對紅衛兵破『四舊』的充分肯定和讚揚。他說：「紅衛兵戰士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¹⁰¹ 林彪的這兩次講話事先都經毛澤東審閱同意。

9月25日，葉劍英在接見北京十三個藝術院校、藝術團體部分師生代表時說：

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樹立了不朽的功勳。例如，北京市有一萬多黑戶，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誰都沒有進去過，一些壞人就是在裏頭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能抓。有個聖修小學，是外國鬼子在我們中國搞了多少年的，誰也不敢動它。紅衛兵小將管你甚麼法律不法律，一掃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難問題，紅衛兵解決了。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這一回小將們就把他摸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¹⁰²

100 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31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07。

101 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15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16。

102 葉劍英戚本禹謝鐘忠接見藝術院校團體部分師生代表時的講話(1966年9月2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葉的最後一句話：「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代表了許多老幹部的看法，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成為被社會認同的主流看法。

最高當局對「破四舊」迅速表明堅決支持的態度，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幹部也都跟着表態支持。¹⁰³ 這種對「破四舊」的支持態度其實也是不正常的。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正常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會看出所謂「破四舊」活動是違反憲法和法律，違反中國共產黨的一貫的方針政策的。但在1966年8月下旬，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熊熊燃燒的時刻，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突然被打倒，許多幹部對突然變化的形勢不理解，對自身處境感到擔憂，在這樣的情況下，對紅衛兵高喊着革命口號進行的「破四舊」活動跟着表態支持成了他們自我保護的一種方式。

「破四舊」的對象，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各種舊時代的遺蹟和一些不合時宜的生活方式；二是早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名聲愈來愈臭的資本家等革命的對象。前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已經被大多數人所拋棄，後者更是為人們避之唯恐不及。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地、富、反、壞、右及資本家一直成為鬥爭的重點之一。¹⁰⁴ 鬥爭的對象早已聲名狼藉且毫無反抗能力，使人們覺得對他們的鬥爭即使有些過分也不是甚麼太要緊的事，畢竟保住自己是更重要的事情。

103 有些地方的黨委曾在支持紅衛兵「破四舊」的前提下，對「破四舊」作出過一些限制性的規定，據《中共上海黨志》中記載：上海市委於1966年8月24日作出「不要抄家，不要破壞公物，不要搞外僑，不要在馬路上脫鞋子、剪褲子，不要隨便攔汽車，不燒檔案，保護圖書」等十條口頭規定。

104 《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中規定：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參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89。1966年12月28日，毛澤東指示覆電黑龍江省委，同意他們關於街道開展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請示報告。其中規定：街道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黨內(街道辦事處以上的負責幹部)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81。

前面已經說過，「破四舊」的許多內容都不是紅衛兵的發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諸如批判怪髮型、批判奇裝異服、批判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含有封、資、修內容的事物。不過那時候的批判還只是少數人的事，被批判的人大多會（自願或被迫）採取自覺革命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一般不會遭到太粗暴的對待。

「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要求，其中有許多是在中共中央「左」傾的指導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如將公私合營企業全都改為國營企業、取消資本家定息等。196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肯定了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提出的一些要求，決定將公私合營企業改為國營企業，將資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將合作商店有條件有步驟地轉為國營商店，口紅、脂粉、香水等高級化妝品禁止在國內銷售。¹⁰⁵

「破四舊」中採取的一個重大行動，是將大城市中的「五類分子」驅逐回原籍。此事在客觀上符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戰備的要求，因此也得到了肯定。早在1959年9月，毛澤東就提出：考慮到戰備的形勢，彭德懷、黃克誠、習仲勳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議把他們掛職下放，分配到外地去。1966年5月成立首都工作組後，曾將一批四類分子遣送新疆等地，這項工作大約進行到6月中旬左右。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一些造反派在要求平反、抄「黑材料」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有關材料，周恩來在1967年1月的一次講話中，對此進行了解釋：

文化大革命初期，總要把地、富、反、壞弄走。有些不穩當的人也調一調，組織一個工作小組，但又擔心擴大會，有點躊躇，請示主席，主席指示，除個別勞改犯外，其他自己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也不要把矛盾下放，前階段紅衛兵把四類分子趕回農村，後來他們回來參加紅旗軍，過分了就有不好的反映，還是主席講的自己消化對。六月十日我請示過主席，六月十三日回來，

105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26—127。

傳達主席指示，這個工作就停了，當時將一些壞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這個工作和後來的劉、鄧路線將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完全是兩回事。你們抄黑材料也發現了這些。在六月中旬，停止這個工作的指示都傳達下去了，可能有些部門沒有傳達下去，六月份傳達的，以後還搞就不對了。¹⁰⁶

1966年7月16日，根據中共天津市委關於壓縮市區人口的指示精神，天津市公安局提出報告，計劃疏散在市區沒有正當職業、原籍在河北省農村的「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4500多人還鄉，監督改造。¹⁰⁷

北京紅衛兵「破四舊」運動中將八萬多人驅逐出北京，遷回原籍。這一行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頒布〈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的布告，其中寫道：「首都廣大紅衛兵和革命群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社會渣滓遣送回農村監督勞動，這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意義。」¹⁰⁸全國各地大都參照北京的辦法制定出本地的有關文件。

106 周恩來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談話紀要(1967年1月2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7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頁276。

108 該處理辦法規定：「凡被遣送的下列人員，原則上一律不准返回北京，已經回來的應立即返回原遣送地，接受革命群眾監督改造：

- (一) 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
- (二) 查有實據漏劃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 (三) 表現不好的敵偽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
- (四) 表現不好的反動會道門中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
- (五) 表現不好的反動黨團骨幹分子；
- (六) 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
- (七) 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和解除管制後表現不好的分子；

上海市被強行遣送外地的有八千多人。¹⁰⁹

寧夏自治區銀川市將驅逐五類分子等稱為「遷趕」工作，據《中共寧夏黨史大事記》記載：

1966年9月20—30日，區黨委部署「遷趕」工作。被遷趕的對象，主要是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一大批因歷史問題和錯誤處理過的人及他們的家屬和子女。被遷趕的人員，除少數回原籍外，絕大多數被安置在固原、海原、隆德、涇源、鹽池、同心、陶樂等縣。¹¹⁰

四 大串連

隨着紅衛兵運動興起而出現的大串連，是促進全國大動亂的重要因素。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脫離了黨的領導，以直接發動群眾的形式搞起來的，各級領導和廣大群眾對運動如何開展，怎樣「革命」，如何「造反」，都感到茫然，他們都希望從北京得到有關指示和造反經驗。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說過：「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¹¹¹

(八) 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九) 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

(十) 有流氓、盜竊犯罪行為，屢教不改的分子。

原來依靠上述十種人生活的家屬子女，已回北京的，一般也應動員他們返回原遣送地。少數確有正當理由，在京又有親屬撫養的，也可以不回原遣送地。已在遷入地安家落戶的，就不要再回北京。」參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60。

109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在上海8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645。

110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編：《中共寧夏黨史大事記》（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頁357。

11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77。

1 大串連之始

6月初，北京大中學校停課以後，市內學生的串連就已十分活躍。6月上旬，全市各校各單位到北京大學「聲援」、串連的就超過三十萬人。撤銷工作組以後，各大中學校學生之間的串連更加隨意和活躍。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個月當中，到北京大學串連的共達212.4萬多人次，其中僅8月12日一天就達17.96萬人次。

工作組時期，各地反工作組的學生紛紛上京告狀，太原、長沙、西安等地來京告狀和學習的學生接連不斷。8月初，每天都有上千學生，上百批到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外地來的，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大串連。8月13日，四千多名天津大學師生因造反受阻，徒步上京告狀，學習造反經驗。毛澤東得知後，立即指示派車到楊村車站把他們接到北京。北京的師生稱他們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熱情接待。天津大學的造反派後來即以「八一三」作為自己組織的名稱。從8月上旬開始即有少數北京學生到外地串連，到中旬以後人數逐漸增多。

8月16日上午，陳伯達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外地來京學生大會上講話，他根據毛澤東在杭州講話的精神說：「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¹¹² 他的講話，實際上成為了一次關於大串連的動員。

在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就有大批外地赴京串連的學生參加。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我們向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表示熱烈的歡迎！你們辛苦了！」「我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學和各地來的革命同學，要相互學習，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的經驗，加強革命的團結，首都的同學，你們是主人，你們要好好接待客人，發揚無產階級階級友愛的精神，熱情地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有問題要好好商量。」¹¹³

¹¹² 陳伯達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¹¹³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89。

8月19日，周恩來讓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副秘書長許明召集緊急會議，布置各地來京串連師生的接待工作，任命北京新市委的副秘書長呂鴻為國務院接待總站兼「北京市外地革命師生大串連接待委員會」主任。接待機構下轄：接待組、政工組、生活組、交通組、醫療組、財務組、供應組和軍管、軍訓組等等。周恩來在召開關於接待紅衛兵工作會議時，要求對接待任務作出一個比較準確的估計，接待委員會的一位副主任根據當時大中學校師生人數，預估來北京串連的人數最多不會超過四百萬至五百萬。呂鴻認為，大串連這一浪潮來勢很猛，來京串連人次很難控制，將可能遠遠突破五百萬這個數字。周恩來指示：應充分估計，預作準備，周全部署，留有餘地。¹¹⁴

對北京和全國開始出現的學生串連現象，毛澤東是大力支持的。8月28日，他在同唐平鑄（《人民日報》代總編輯）、胡痴（《解放軍報》代總編輯）的談話中說：「現在學生對一鬥二批三改不感興趣，心裏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他們已經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超出了本單位、本市、本地區。」對北京的大中學校學生到全國各地進行大串連，外地學生也有不少到北京來，毛澤東說：「讓他們去嘛，留些人輪流看家就行了。他們要出個介紹信，就統統開，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員會的人要去，也可以讓他們去。有些壞人也會出去。壞人出去無非是放毒，在家裏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樣。」「對外來的學生，要給他們搞伙食。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裏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藉口。」¹¹⁵

8月31日，在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各地師生和紅衛兵大會上，周恩來在講話中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同學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連。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件，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¹¹⁶

114 呂鴻：〈我任紅衛兵接待總站站長的日子〉，《炎黃春秋》，1998年第12期，頁44。

11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38—1439。

11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09。

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通知〉說：

外地高等學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高等學校)革命學生，除了有病的、已經來過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來的以外，都可以組織來北京參觀；高等學校教職工可按每五十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外地中等學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中等專業學校及普通中學)按每十名學生選出革命學生代表一人；教職工按每一百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一人參加。……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來京參觀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職工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開支，……到京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¹¹⁷

國務院接待總站下設立了幾十個分站，分管四千多個接待點(不含郊區)，構成了完整的接待工作網絡。市內交通、飲副食業、醫療衛生和代銷社等部門全力以赴在總站統一領導下，協助各站、點實現「五包」(吃、住、交通、醫療和思想政治工作)。北京還從全國十三個省市調來公共汽車1500餘輛和司機6800餘名，補充北京市公共交通力量的不足。各省市還支援北京各種主副食品達一億五千多萬斤。軍委、總政治部派出解放軍官兵上萬人，參加了紅衛兵的接待工作，他們將來京的紅衛兵按班、排、連、營編組，並和紅衛兵同住同吃同軍訓。¹¹⁸

這種有數百萬人參加的大串連，不僅耗費了國家數以億計的金錢，而且大大加劇了全國大動亂的局面。大串連把最早造反的北京紅衛兵的做法推向全國，北京到各地串連的紅衛兵到處煽風點火，和當地的師生、紅衛兵聯合在一起，破「四舊」、立「四新」，造黨政領導的反，揪鬥「黑幫」，抓「走資派」。

117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12—113。

118 呂鴻：〈我任紅衛兵接待總站站長的日子〉，《炎黃春秋》，1998年第12期，頁44—45。

2 北京紅衛兵在全國各地

1966年8月22日，上午11時半，北京第五十五中學和北京第三十中學的四名紅衛兵從蘭州來到銀川「煽風點火」。晚7時半，他們在自治區黨委門口貼出十幾張大字報，提出「要用毛澤東思想衡量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晚11時許，銀川一中、女中等校學生貼大字報歡迎北京紅衛兵來寧。區黨委第一書記楊靜仁接見了北京紅衛兵。8月23日下午2時，銀川召開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大批師生員工參加了大會。銀川社教工作團負責人在會上作了檢討，學生代表在會上「揭發」、批判了工作團(組)的錯誤。北京紅衛兵在會上作了簡短的講話。楊靜仁在會上檢討了區黨委派工作組等問題，並表示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同廣大革命師生、革命群眾一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同日，寧夏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成立，其他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也陸續成立。8月25日，自治區黨委在銀川舉行了十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北京來寧串連的紅衛兵參加了大會，並在會上發言，「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¹¹⁹

8月26日，到呼和浩特串連的北大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向內蒙古政協提出要求其解散。27日，北大附中和呼和浩特二中的紅衛兵一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十二小時內解決，命令政協文革小組發出解散政協的「喜報」。

9月2日，到廣州串連的北京地質學院附中、一〇一中的十幾個紅衛兵，在廣州八一學校紅衛兵帶領下，衝進廣東粵劇院，拉出著名演員紅線女，剪光了頭髮，在胸前掛上「牛鬼蛇神黑線女」的牌子進行鬥爭。

9月3日，由北京五十四中學、北京帥府園中學、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等學校紅衛兵組成的「北京紅衛兵北上小分隊」，在內蒙古自治區海拉爾市火車站攔截了北京開往莫斯科的一次特快國際列車。他們強行登上列車，在車廂裏張貼毛澤東畫像，散發宣傳文化大革命的傳單和小冊子，在車廂外面用油漆書寫「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等標語口號。北京

119 《中共寧夏黨史大事記》，頁355。

紅衛兵與蘇聯列車員發生衝突，國際列車在該站滯留數小時後才被放行。此事驚動了北京，周恩來派人前往海拉爾對紅衛兵進行勸阻。

在中央9月5日〈通知〉後，北京市委組織的第一批去外地串連的學生共約2700人，分屬北京三十七所高校和一些中學，目的地分別為上海、武漢、成都、蘭州、哈爾濱、烏魯木齊。與此同時，由北京各學校自己組織的，以及不經過任何組織而自己跑出去的串連學生的數目則更大得多，確切數字無法統計。

9月11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向全國各地發出通知：「第一批前往各地的紅衛兵已於9月10日從北京出發，望各地黨委、人委立即組織專門接待小組同他們取得聯繫。由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同志出面介紹當地文化大革命進展情況和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9月15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再次通知各地，第二批北京去各地串連的紅衛兵約1100人已經出發，串連方向分別為桂林—南寧；成都—重慶—貴陽；武漢—長沙；廣州。

據上海市統計，到9月6日，上海共接待串連學生28600人，其中北京紅衛兵10700人。

富於造反精神的北京紅衛兵最先開始衝擊上海市委。8月30日下午，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開歡迎北京紅衛兵大會，北京紅衛兵約三千人參加了大會。會上，北京紅衛兵指責上海市委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提出上海市委犯了路線方向錯誤，必須改組，把上海市委歡迎北京紅衛兵的大會變成了聲討上海市委的大會。31日，北京紅衛兵四五十人，打碎上海市委機關大門玻璃，衝進市委機關院內，有十多名市委機關工作人員被打。9月4日，北京紅衛兵在衝擊上海市委機關時，與前來保衛上海市委的萬餘名工人、學生發生衝突。9月5日下午，北京紅衛兵召開了聲討上海市委的大會。在北京紅衛兵的帶動下，上海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也開始指向各級黨委，揪鬥領導幹部的情況愈來愈頻繁。據不完全統計，9月份衝擊各區委機關即達二百多起，參加者七千多人。¹²⁰ 9月24日，中央得知北京紅衛兵南下支隊決定於

¹²⁰ 《中共上海黨志》，頁756。

9月25日在上海召開群眾大會，並準備強制資本家上街遊行示眾的消息後，立即發電報進行制止，並要求「北京紅衛兵南下支隊和北京其他大中學校的紅衛兵迅速結束在上海的工作，回北京參加北京國慶節，進行組織和維持秩序的工作」。後來，北京造反派紅衛兵又在上海設立了「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北京大學紅衛兵總部駐滬聯絡站」、「清華大學井冈山駐滬聯絡站」等，在更大程度上干預上海的文化大革命。

8月下旬，北京紅衛兵南下串連隊與貴陽市的紅衛兵一起發動了對貴州省委的衝擊。9月5日至7日，北京紅衛兵三天上街大遊行，鼓動炮轟省市委。接着，又幫助建立了貴陽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

9月2日，北京南下紅衛兵及武漢部分學生，在湖北省委文革辦公室門前召開揭發控訴湖北省委大會。4日，又組織遊行，高喊「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張體學」等口號。當晚，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樹成發表廣播講話，向全省群眾介紹部分學生鬧事情況。武漢地區出現和南下的北京紅衛兵的大辯論。湖北省委甚至提出要抓「南下一小撮」，張體學在群眾大會上發言，「代表湖北3200萬人民控訴」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在武漢所幹的壞事。

9月2日至4日，北京紅衛兵二千人，在要求河北省委主要負責人接見被拒絕後，舉行了靜坐絕食抗議。

在廣州、武漢、長沙、瀋陽、成都、杭州、福州、昆明……在全國各大城市，北京紅衛兵都無例外地衝擊了各地的黨政領導機關，對發動造反、搞垮省市委起了重要作用。

3 紅衛兵「朝聖」

1966年8月以後的北京，成為千百萬紅衛兵聚集的聖地。紅衛兵到北京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接受毛澤東的檢閱，親眼看一看自己心中的「紅太陽」。

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安文江在回憶中寫道：

我在北京見了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參加了關鋒的接見。又經人大附中、清華大學幾名高幹子弟疏通登上城樓參加了「九·一五」紅衛兵檢閱。當「東方紅」樂曲驟然響起，毛主席身穿綠軍裝，臂佩紅衛兵袖章，在林彪、總理陪同下向我們步步走近時，我的每根神經都在纖顫，每個細胞都在擴張，眼淚嘩嘩地滾下來，我身後的一個女紅衛兵幸福得昏死過去……接見完已是黃昏，我以百米衝刺的高速衝進電報大樓。樓廳裏正播送「凡拍發毛主席接見內容的電報概不收費」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氣連寫四份，每份電文都長達四百多字。我要讓復旦、定海、媽媽和兄嫂及寶山的貧下中農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後，在四川甘孜地區，我目睹一長串佛門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滿頭鮮血的情狀，我才理解這種「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¹²¹

後來成為作家的東北中學生梁曉聲寫道：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萬歲！」

「我們要見毛主席！」

「我們要見毛主席！」

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喊啊，叫啊，哭啊。那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狂熱場面！

成千上萬紅衛兵匯成的人海，在天安門廣場掙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渦！每個人都像一顆石子，在巨大的漩渦中打轉。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門或面朝天安門，全不由己，只有順着那股漩渦轉。

「東方紅」樂曲又響起來了！

121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五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6），頁307。

天安門城樓上出現了人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兩位男女播音員，以無比激動的語調現場直播道：「紅衛兵小將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休息了片刻，現在，與他最親密的戰友，我們最最敬愛的林副統帥，又並肩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帶微笑，神采奕奕！……」

人海喧嘩了。群情鼎沸。「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在天安門廣場上空迴蕩。¹²²

八十年代曾紅極一時的電影演員劉曉慶當時是從四川到北京串連的一個中學生，她在《我這八年》一書中寫道：

突然，一陣從弱到強的鼓聲響起，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強的鼓聲之後用極大音量播放出《東方紅》的前奏曲，緊接着浩瀚澎湃的東方紅交響樂驚天動地奏響，所有的紅衛兵都從地上跳起來。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覺到它在嘴唇邊、頭上、脖子上一一起跳動，百萬紅衛兵眼巴巴地緊緊盯着天安門城樓。

我們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萬的童音發出了共同的呼喊，我們扔下帽子、挎包、麵包、水壺，拼命地奔向天安門城樓！幾公里的人海不見了，壓縮成一堆綠色的山坡，我們像橄欖球隊員一樣，一個摺一個拼命地喊着：「毛主席萬歲！」參差不齊的口號逐漸變成有節奏的呼喊，千千萬萬的紅衛兵對領袖的熱愛像火山爆發，像岩漿在翻滾，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鋼水在奔騰！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淚不知不覺流下來、流下來。我恨它們不停地擋住我看毛主席的雙眼，我恨我為甚麼是近視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¹²³

有過類似經歷的人非常多。當時全中國十億人，一千多萬人到北京接受過毛澤東的檢閱，佔總人口的1%。據統計，1966年末，全國在校

122 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頁296。

123 劉曉慶：《我這八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頁102。

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人數為53.4萬人，在校中等學校學生人數為1296.8萬人。也就是說，在校大學生和中學生的大部分都串連到過北京。從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這101天中，毛澤東共八次十回檢閱文化革命大軍，平均每十天一回，每回110萬人。

毛澤東當年七十三歲，雖然身體「非常非常健康」，但接見紅衛兵也不是件輕鬆的事情。除有三次是乘坐敞蓬汽車檢閱，時間比較短外，另外七次接見時間多在六小時以上。這位古稀老人的勁頭非同一般。9月10日至12日，毛澤東臥病三天，13日他給林彪等寫信說，15日的大會「我能起床，即去見見群眾，不能起床，則請你主持，我不去了」¹²⁴。15日下午3時15分，毛澤東還是抖擻精神上了天安門。那天的接見活動持續到深夜。

據毛澤東的警衛戰士回憶，毛澤東在經歷幾次接見後，也對這種頻繁的接見活動有些無奈。一次接見前夕，他曾對戰士戲稱：「明天又要去罰站了。」

毛澤東堅持接見紅衛兵的舉動，說明了他的執著。一方面，他要以此明確地告訴世人，他是堅決支持紅衛兵造反的，他要依靠紅衛兵來衝擊、顛覆舊的秩序，建立符合他的理想的新秩序。另一方面，他還想通過這種方式，把他的思想或理想直接傳達給千百萬年輕人，以期達到保證中國的革命事業不會變質，不會半途而廢。據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主席提出：要幾千萬人直接同他見面。要一次又一次接見下去。為甚麼主席非要這麼搞呢？他講，要接受蘇聯的教訓。在蘇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後來把列寧主義丟了，與這個也有點關係。」¹²⁵

毛澤東的邏輯是奇特的。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所以後來把列寧主義丟了。要是能讓千百萬年輕人都來接受他的檢閱，那麼就可以造成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就能讓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永遠不倒。但實際上，毛澤東也是一個凡人，他的接見當然不能普渡眾生，親眼見到過毛澤東的千百萬年輕人也未能得到毛澤東思想的真傳。他們中的

1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33。

12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50。

許多人在不久的將來，通過自身的體驗，就對毛澤東所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產生了懷疑。

成為紅衛兵朝聖的目的地的還有一系列革命聖地：陝西延安、江西井岡山、湖南韶山、貴州遵義、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浙江嘉興南湖、廣州農講所、山西大寨、黑龍江大慶、河南蘭考，等等。地處偏僻山區的井岡山，大串連期間竟吸引了超過一百萬的紅衛兵前去瞻仰、學習。

4 欲罷不能

大串連造成全國各地交通線擁擠不堪。據估計，1966年10月份全國在串連路途中的人數大約為三千萬人，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數舉國遷移。鐵路運輸到年底估計有一千萬噸物資被積壓待運。欠運的物資，主要是煤炭、木材、水泥、鋼鐵、礦山建築材料、食鹽、農副產品等，大部分是江南地區和三線建設需要的。公路運輸普遍緊張。水運、港口物資積壓也十分嚴重。這些都對生產、建設、人民生活帶來了嚴重影響。西南地區由於水泥運不進去，建設中的成(都)昆(明)鐵路有六十三個隧道口停工，攀枝花選礦廠工地有4500工人停工。¹²⁶

為了減輕交通壓力，中央讚揚了大連海運學院紅衛長征隊徒步來到北京的事跡。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大力倡導徒步串連。社論中說：「大連海運學院的革命學生，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連，這又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我們衷心祝賀這些革命學生長征演習的勝利，並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學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¹²⁷

126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頁643—644。

127 大連海運學院紅衛長征隊很可能並不是最早的步行串連者。據一份紅衛兵小報《紅旗通訊》(1968年2月15日)稱：「無錫輕工業學校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六二六兵團的革命小將，在1966年6月26日，為了控訴無錫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對革命造反派的殘酷迫害，六二六的革命小將衝破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白色恐怖，徒步長征到省會南京去造反。這才是徒步串連的真正首創者。」

11月1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大會上通過了〈全國在京革命師生步行串連回本單位倡議書〉。大批紅衛兵響應號召，組成了一個個長征隊，開始進行徒步串連。這種徒步串連已和過去的串連有所不同，過去的串連重在煽風點火，而徒步串連則重在鍛煉體魄。後者對交通的壓力和對社會的影響都要小得多了。但徒步串連比起坐火車汽車串連要艱苦得多，它對學生們的吸引力也就沒有那麼大了。徒步串連大約進行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10月底，從全國各地到北京串連的人數達到二百多萬，而且還以每天二十多萬人的速度源源不斷湧進北京。北京市內到處住滿了外地學生。學校、機關、廠礦、街道、劇場、澡堂，凡是安置串連學生的地方，全都住滿了人。清華大學面積廣大，住的外地學生最多，最多時住過27000人。當時連中南海裏都住了三千名外地學生。按規定，外地學生到京串連可停留四天，但絕大多數都要超過這個規定的時間。道理很簡單，每一個外地學生最重要的節目就是想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見，而這種接見大約要半個月左右才有一次。等着接見成了他們滯留北京的最為正當的共同理由。每天離京的外地學生人數不過兩三萬人。當時正值串連高潮，大批北京學生外出串連，北京各火車站人滿為患，擁擠不堪。

10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連的緊急通知〉，想以此加快外地學生的離京速度，但收效甚微。1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宣布全國大中學校「放假鬧革命」持續到1967年暑假，決定「從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地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革命串連」。同時，〈通知〉安慰那些還沒有串連的人說：「從明年4月起，還有充足的時間，凡是應來而未來北京進行革命串連的大中學生，都會有機會免費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看望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並進行學習和交流革命經驗。」〈通知〉發出後，未能阻止大批外地學生繼續湧向北京和大批北京學生奔赴外地串連。11月17日，周恩來通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從外地紅衛兵來京

趨勢看，要做接待三百萬人的準備。這些人來京之後，即按計劃進行短期軍政訓練。準備從軍隊中抽調十萬至十一萬名班以上幹部和老戰士組織紅衛兵軍訓。¹²⁸

11月25日、26日，毛澤東第八次接見了250萬串連學生和紅衛兵。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補充通知〉，重申11月16日〈通知〉精神，將免費乘車船和在北京吃住的期限定在12月20日。此後，串連人數開始大幅度減少。

但是，這個規定沒有涉及步行串連問題，而步行串連的學生人數也相當多。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帶動下，全國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奪權運動。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月3日發出〈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通知〉提出：「當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展開了奪權鬥爭。外出步行串連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應當回到本地本學校去，參加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決戰。」〈通知〉規定：「長途步行串連，在全國都停止。」¹²⁹

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通知〉說：「目前，各地區、各學校、各機關、各企業事業單位，正在集中力量，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建立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同時，在外地、外單位串連的學生和群眾，剛剛返回本地、本單位，鬥、批、改的任務很繁重。因此，中央決定：繼續停止全國大串連，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後進行串連的計劃。」¹³⁰這一〈通知〉，給那些還準備在春暖花開時重新進行大串連的學生們潑了一盆冷水，有些因種種原因尚未串連過的學生更是懊喪不已。但許多早已習慣於不受任何紀律約束的學生仍然我行我素，照樣跑出去串連。不能免費乘火車，就施展各種本領扒車，客車不行就扒貨車。很多紅衛兵組織都有自己的

12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91。

129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67。

130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61。

活動經費，就是要花錢買票也難不倒他們。此後，北京大中學校外出串連的學生明顯減少，絕大多數串連學生還是按照要求陸續返回學校。

4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國大串連。通知說：「最近，有少數學生和群眾又開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區進行串連，北京的一些學校又派人到外地串連。因此，中央重申停止全國大串連的決定，各地已經外出串連的，應當立即返回。對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問題，應當盡量在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解決，以免影響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運動和生產。」¹³¹

5月14日，經中央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重要通告，要求：「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四月二十日關於停止外出串連的通知，已經外出串連的北京學生和群眾，除經中央特許的以外，應當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來北京串連的學生和群眾，同樣也應立即全部返回本地。」¹³²

1967年夏天，紅衛兵運動惡性發展，在一段時間內達到了嚴重失控的程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進行糾正，希望把紅衛兵運動納入比較正常的軌道。9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在外地串連學生和在京上訪人員立即返回原單位的緊急通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連的北京和各地的學生以及其他人員，立即無條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單位。規定北京和各地接待機構(包括學校、機關、軍隊、工廠、農村人民公社在內)從9月28日起，一律停止招待外來串連的學生和其他人員。所有北京學生和其他人員在外地設立的聯絡機構，以及外地串連學生和上訪人員在北京設立的各種聯絡機構，都應在9月28日前全部撤銷，各有關單位再不負責招待。北京學生和其他人員在北京各部門、各機關、各軍事單位、各工廠和近郊農村人民公社設立的聯絡機構，亦限於9月28日前全部撤銷，各有關單位再不負責招待。¹³³ 同一天，中共中央轉發了

13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445。

132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464。

133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85。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動員在外地串連的學生立即返回原單位的決定〉。¹³⁴

學生的串連活動再一次被控制住了，但少數學生仍能想辦法出去串連。外出串連對於大多數精力旺盛的大中學生都具有很大的誘惑力，只要一有機會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北京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尤其是在全國知名的一些「響噓噓」的造反派組織，更願意到外地去煽風點火，參與各地的運動。不管甚麼地方，一有風吹草動，北京的造反派組織就會蠢蠢欲動，各條鐵路線上就會出現他們的身影。1968年春，全國進行所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此後許多地方出現了新的動亂局面。少數學生的串連活動又再次趨於活躍。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知說：

近來，有些學校又有一些同學到外地和本市外單位進行串連。在目前全國、全市絕大部分地區和單位都已建立革委會的新形勢下，再外出串連，不論對外地、外單位的運動，還是對本單位、本地區的運動，都是有影響的。因此，重新印發市革命委員會去年5月發出的〈關於立即停止外出串連的通知〉，望各院校根據中央、中央文革的多次指示精神，重新加以討論，採取有效措施，立即停止到外地和本市外單位進行串連，以集中力量搞好本單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地區、各廠礦、機關、學校、人民公社，對外來串連的要進行勸阻，可以拒絕接待。去年5月通知中所作的，經中央和北京市革委會特許外出，不受此通知限制的規定，現因情況已變，宣布撤銷。

總之，大串連就像從魔瓶裏放出來的怪物，一旦出世就再難收回。儘管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連，但總有一批批不願受任何紀律約束的學生常年奔波在串連的路途中。

13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84。

第四章

新口號

一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初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個重要事件。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毛澤東為了克服當時黨內外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各種阻力，繼續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而倉促提出的。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從未用過的。按照慣例，路線分歧是指黨內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比較系統的分歧意見，一般是屬於黨內矛盾。它可能是資產階級影響在黨內的反映，也可能並非不同階級意識的表現，而只是無產階級內部對某些問題的不同認識。特別是在聲稱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更不應輕易地把黨內對某些問題的正常意見分歧都同資產階級聯起來。因此，把黨內的路線分歧加上資產階級的帽子是極為錯誤，特別是再加上「反動」二字，就更為荒謬。

大專院校座談會

文化大革命運動表面上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導向和理論，在多數幹部和人民群眾中並沒有真正得到支持。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大中學校師生在對工作組的看法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群眾大會上說：「同學間爭論激烈，隔閡很深，今晚清華的大會就是這種情況的最好表演。一部分同學與另一部分同學對立，北京市普遍地存在這種情況，這種情況應該結束了。」¹

結束對立、消除隔閡，只能是周恩來的良好願望。隨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開展，這種對立與隔閡有增無減，與日俱增。大多數人仍然認為不能全盤否定工作組；真正全盤否定工作組，要造工作組的反的造反派是少數派。少數派雖然有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但在多數學校和單位內還是處於劣勢。這種「左派」處於劣勢的情況若持續下去，必然會影響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開展。多數人肯定或基本肯定工作組的觀點，是與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原中央第一線領導人關於工作組的觀點一致的，這種觀點就是堅持和強調黨的領導，試圖將運動納入比較正常的軌道之內。這顯然與毛澤東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想法背道而馳的。

在各種名目的紅衛兵組織蜂湧而起，炮打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黨政領導幹部的浪潮洶湧澎湃之時，也出現了許多違背運動發起者初衷的現象。

8月27日，在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的支持下，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在肯定紅衛兵運動主流的前提下，嚴厲譴責了「打人」、「對前學校的黨政幹部一律以『黑幫』論處」、「誰家都抄」等行徑，提出「有些重大行動（如取締民主黨派等）應該先動口，讓中央知道，在中央、市委的統一具體領導下再動手，不然會給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動」。²

8月25日，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成立。「西糾」的成立和活動，得到周恩來、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幹部所

1 李雪峰周恩來陳伯達等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年8月5日），載英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2 清華附中紅衛兵：〈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1966年8月2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支持，周恩來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維文濤、許明指導「西糾」的活動。「西糾」成立後，陸續發布了十三個通令，這些通令對保衛中央黨政機關，保護革命幹部，保衛國家機密，維護首都社會秩序，反對批鬥和抄家中的武鬥，以至維護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接待外賓的外事政策等許多方面，都做了具體的、詳盡的規定。8月27日，「西糾」發出的〈第三號通令〉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布戒嚴，「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並規定：「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任何人都不要進行阻止，不要讓壞人乘機搗亂破壞國家財產。」9月3日，「西糾」發出〈第五號通令〉，強調堅持「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原則，並規定：「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和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信。」³「西糾」還受周恩來委託，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的宅第的安全。

清華附中和「西糾」所屬紅衛兵組織中也存在着打人、違反政策的問題，有的甚至還比較突出，但是他們能夠在亂打亂鬥之風盛行的時候看到問題，並首先提出糾正這些問題的辦法，還是難能可貴的。〈緊急呼籲書〉、〈十點估計〉和「西糾」的通令中反對亂打亂鬥的意見，是同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的八條規定相吻合的——八條規定的主旨就是要有領導地、有限制地、有秩序地開展運動。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張春橋主持，王任重、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參加，中央文革小組連續召集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⁴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地質學院、北京政法學院等學

3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指揮部：〈第三號通令〉、〈第五號通令〉，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 據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大專院校的座談會「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召開的」。轉引自王年一：〈關於《紅旗》1966年第13期社論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11期，頁12。

校群眾組織的七八個代表參加了座談會。在會上，張春橋別有用心地說：「林副主席9月15日講的，有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是指同志們。」暗示少數派可以繼續向上造反。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等人在會上攻擊劉少奇、鄧小平，並指責周恩來是「和稀泥」、「折衷主義」，他們批判李先念、薄一波、譚震林等中央領導人，還點了一些部委的負責人，如楊秀峰、何長工、吳德峰、蔣南翔、王觀瀾、吳波等。會後，由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整理，經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審閱，由江青審核印發了〈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記錄之一〉和〈大專院校部分革命師生座談會情況簡報〉。〈簡報〉最後建議：「請中央考慮，領導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會上有人提出，中共十一中全會並沒有領導解決這個問題。從當前運動的實際情況來看，還懷疑暗中是不是還有一個中央在執行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與以毛主席和林彪為首的黨中央對抗，還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已經提出了是否把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在全國廣大革命人民中公開進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討論了座談會記錄和〈簡報〉，張春橋在會上分析這次座談會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勢，有三個問題：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還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條錯誤路線，還沒有在群眾中批判；二、「造反派」還受壓，還沒有佔優勢；三、總理「和稀泥」。張春橋每講一條，江青就予以肯定，如說到「總理和稀泥」時江青就說，「總理就是這樣的」。江青還對陳伯達說：「你把座談會記錄送一份給總理看看。」（陳伯達後來沒有敢送）陳伯達對王力、關鋒說：總理旗幟不鮮明，要寫一篇《紅旗》國慶社論，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⁵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決定將座談會的材料送毛澤東，同時寫一篇《紅旗》雜誌的國慶社論。這期《紅旗》社論是王力、關鋒執筆，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江青、康生、張春橋都參加了審定和討論，陳伯達定稿。

毛澤東時刻關注着運動發展情況，但他了解運動情況的信息渠道主要還是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提供的材料。毛澤東認為，相當長的

5 根據王力於1980年8月7日在獄中寫的一份材料，參見王年一：〈關於《紅旗》1966年第13期社論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11期，頁13。

時間內，就是從8月8日到9月，整個運動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的堅定性和徹底性。⁶這實際上就是認為在周恩來取代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的8、9兩個月，在批劉問題上不堅定、不徹底。毛澤東的這種認識還來自以下幾件事：

8月23日，周恩來審定李富春等根據〈十六條〉精神擬定的國務院八個口（外交、文教、科學三個口除外）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十條意見稿，題為〈關於機關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問題〉。這十條意見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強對運動的領導，提出要保護國家機密；對一部分幹部「燒」到一定程度後要注意保護；既要放手讓群眾敢於革命，又要讓群眾學會善於革命、善於掌握黨的政策；等等。周恩來在一旁批註：這十條意見同樣適用於外事、文教、科學三口，並批告陳伯達：這件很好，我註了幾條意見，如蒙同意，請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閱，並請主席批示，可否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各同志。毛澤東於8月28日批示：「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各同志。此事應當討論一下。」毛澤東實際上是不同意這十條意見的。在8月29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說：一條也不要。何必十條？來一個放任自流。有〈十六條〉嘛，都不聽，讓它去搞。他還說：「全國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準備個別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⁷

8月31日，周恩來審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稿。這是陶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組織人起草的，準備下發到縣團級。鑑於紅衛兵運動來勢洶洶，全國出現混亂局面，通知要求「在運動中，對於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對這些部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加強領導。各級黨組織和有關部門負責人應當主動地向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師生進行教育，使他

6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947。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40。

們自覺協助黨和國家對要害機密部門做好保護工作。通知列出的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有：軍隊，軍事機關，公安機關，外事部門，中央和各省市廣播電台、電視台，新華社，電訊部門和各級黨政機關電台、機要部門，中央和各地檔案部門，航空場站，鐵路樞紐、站段，港務局、碼頭，水電站、大電廠、變電站，尖端企業和尖端科研部門，科學研究機構和科學技術資料部門，中央和各地的銀行、倉庫，外貿機關，城市重要公用事業機關（自來水公司、公共汽車公司等）。周恩來審閱時，又增加了《人民日報》社、《解放軍報》社、《紅旗》雜誌社，並批：提議照發，請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閱，退汪東興辦。9月1日，毛澤東批：此件不發。⁸

9月2日，周恩來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對紅衛兵運動提出十條要求，主要內容是：紅衛兵要大學解放軍，「把紅衛兵建設成為一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戰鬥隊伍」；要「學習和掌握政策」，「分清敵我友，團結大多數」；「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現階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確的」；「對於在國家和統一戰線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只要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活動，應該加以保護」；「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動手打人」；紅衛兵搜捕人，必須與北京市委、北京衛戍區和公安部門商定；紅衛兵串連要保障黨和國家的首腦部門、要害部門和宣傳部門的工作不受影響，安全不遭危害；「要保證交通運輸機構照常運行，不受阻撓」；「要保證黨和國家的對外關係和活動不受影響」，「革命串連不在這些機關內部進行」；「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和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療事業不致中斷」等等。3日凌晨，周恩來對〈意見〉進行了最後修改，囑秘書通知陶鑄、康生、李富春、謝富治、陳毅、楊成武、吳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上午開會討論。會上，陶鑄、陳毅等贊成〈意見〉，康生等人持否定態

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4。

度。結果，〈意見〉沒有發出。⁹另據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吳慶彤回憶：「周總理清楚，康生等人的反對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主席的主張，因此，〈意見〉未送毛主席。」¹⁰

2 「三種提法」

毛澤東要克服運動的阻力，堅持他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初衷，他所採取的辦法是將運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如群眾觀點分歧、派別鬥爭激烈、無政府主義泛濫、生產下降等等，都歸咎於劉、鄧的「錯誤路線」，通過批判這條「錯誤路線」來繼續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這種想法，是通過林彪在國慶節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和《紅旗》雜誌社論體現出來的。

林彪講話的起草人是陳伯達和張春橋，他們原來在講話稿中用了批判「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後來陶鑄提出「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太重了，他向毛澤東建議改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同意，林彪在大會上即照此講了。當天晚上，張春橋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建議還是改回原來的「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毛澤東說：「不要改回來了，以後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據王力說，毛澤東定這個口徑時，周恩來不在他身邊，不知道。¹¹據穆欣回憶，國慶節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的時候，曾在城樓大廳裏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部分成員談話（周恩來不在場）。談定將「批判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提法改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在談論運動的發展情況時，這些成員大都認為中央和地方上許多領導人，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還是「很

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7。

10. 吳慶彤：〈人民的中流砥柱——回憶周總理在「文革」中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在若干重大問題上的鬥爭〉，《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6期，頁52。

11 據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47。另據葉永烈在《王洪文傳》（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一書中說，他曾於1988年3月訪問過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關鋒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說法是他首先提議使用的（頁44）。

不理解，很不得力」。毛澤東也就運動發展的形勢講了不少的話，認為運動的阻力不小，應當徹底批判劉少奇的「錯誤路線」。看來他對這種狀況不很滿意，有點着急。但他表示要不顧一切，硬搞下去。甚至說了「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這樣的話，聽了使人吃驚。他在這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裏就曾說過：「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甚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此刻又這樣講，進一步表明了他的決心。¹²

10月2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第一次公開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概念，社論說：「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採取折衷主義。」社論公開號召：「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¹³

這篇牽動全局的重要社論，沒有經過當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周恩來審查。根據當時周恩來派往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劉西堯回憶：總理起初不贊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他曾對劉西堯說，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開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贊成的，陳伯達沒有經過討論就拋出了這篇社論，幹部思想毫無準備，又要有一大批幹部下不了台了。¹⁴為此，周恩來向毛澤東當面陳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歷來黨內路線問題，都說「左」傾、右傾，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種提法。毛澤東用英文作了解釋，說：原來用的是「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 (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 (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 (反動路線)」好。¹⁵

12 穆欣：〈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來龍去脈——「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場風暴〉，《黨的文獻》，1999年第6期，頁79。

13 《紅旗》雜誌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1966年10月1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130。

14 劉西堯：〈「文革」中我給周恩來當聯絡員〉，《中華兒女》，2002年第2期，頁32。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921。

在這之後，周恩來就按照毛澤東的口徑講話，但實際上他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有保留的。¹⁶

3 〈緊急指示〉

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負責人、陶鑄之女陶斯亮等人向毛澤東和林彪告狀：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第二天，林彪即把軍委幾位副主席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找來，提出：要對軍隊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一律實行平反，要銷毀一切有關他們的「黑材料」，要允許他們搞「四大」，要支持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准許他們去全國各地「大串連」。林彪指令全軍文革小組據此擬一份軍委命令，準備以布告形式張貼出去。全軍文革小組根據林彪指示，草擬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但在具體做法上盡可能作了一些保留，還是要堅持黨委領導。林彪看後不滿意，將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組審改。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對文件草稿進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特別是加進了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的條文。在中央文革小組討論這個文件時，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事先向葉劍英作了匯報，他在會上說：「文件中首次取消黨委領導，這在我軍是史無前例的。」張春橋卻強詞奪理地說：「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就是毛澤東思想領導。」劉志堅反駁說：「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是不錯的，毛主席的領導也是不錯的，但是下面還是要有具體人去執行的啊！」陳伯達、江青等人最後否決了劉志堅的意見。在中央軍委常委會上，雖然被迫討論通過了〈緊急指示〉文稿，但仍作了幾點補充限制規定：除有組織地到地方上參觀、學習和看大字報以外，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些學校，如護士

16 在1967年2月16日的中南海懷仁堂碰頭會上，當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幹部是從《紅旗》雜誌1966年第十三期社論開始時，周恩來當場責問康生、陳伯達：「這麼大的事情，為甚麼不叫我們看看？」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957。

學校等，主要進行正面教育；院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時間，大體上可搞到明年1月份；軍級和省軍區機關的運動，暫不進行，等等。¹⁷

林彪親自拿着〈緊急指示〉文稿當面請示毛澤東，取得了毛的同意。¹⁸

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說：「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以前軍委總政對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個別規定，如關於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關於指揮學校的學員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與連隊相同的規定；關於只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內不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外和地方學校串連的規定等，已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布取消。」中共中央在批語中說：「中央完全同意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¹⁹這實際上是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更助長了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泛濫。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火力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黨政領導幹部受到批鬥，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都陷於停頓。²⁰

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組通過「三司」發起召開了有十萬全國各地師生參加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陶鑄、

17 范頌：〈葉劍英「文革」風雲錄（之一）〉，《中華兒女》，2000年第11期，頁19—20。

18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頁43。

19 中共中央轉發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32。

20 1966年10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關於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各級黨組織中斷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的決定〉，此後，上海市大中學校各級黨組織完全癱瘓。參見中共上海市教育衛生工作委員會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共上海市教育衛生體育系統黨史大事記》（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頁221—222。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了大會，張春橋在會上宣讀了〈緊急指示〉。會上，清華大學「井岡山」頭頭剃大富帶領十萬與會者宣誓：不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批判倒誓不罷休。

4 中央工作會議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次會議是繼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的又一次發動。

會議原來準備開七天，²¹但由於許多與會者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結果開了二十天。

10月16日下午，陳伯達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他把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把廣大幹部對運動的不滿和抵觸，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對紅衛兵的造反行動竭力加以吹捧，說：「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整個社會，而且震動了全世界。紅衛兵運動的戰果輝煌。可以無愧地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歷來幾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都來的更深刻，更洶湧澎湃。這是國際上更高階段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陳伯達指責人們對社會動亂的擔心和防範是怕群眾、怕革命，甚至是鎮壓群眾和反對革命。他在講話中全文引用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他說：「提出錯誤路線的，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即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位同志，他們要負主要責任。」²²陳伯達在

21 毛澤東在周恩來關於會期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會期三天不夠，需要七天。」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47。

22 在這以前，〈炮打司令部〉還被禁止在社會上傳播，而且點名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也被制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8月24日在北京大學的講話和周恩來9月10日在首都紅衛兵座談會上的講話，都明確表示禁止傳抄〈炮打司令部〉。10月中旬，在天安門前觀禮台上和清華大學校園內出現「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時，周恩來立即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董小鵬前去向紅衛兵做勸說工作，要求他們撤下這些標語口號。

講話中對所謂兩條路線作了解釋：「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可是，提出錯誤路線的代表人，他們卻是反對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們在這個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把國民黨的『訓政』搬來了。」陳伯達提出：「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而且還會經過多次的反覆。」陳伯達在講話中還對一度盛行的「血統論」進行了批判。毛澤東讚賞陳伯達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他在陳伯達的講話稿上批示：「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是否在甚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二本。」²³

會議期間，劉少奇、鄧小平被迫按照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口徑作出書面檢討，對所犯「路線錯誤」承擔了責任。劉少奇在10月23日作的檢討發言中說：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志，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志，某些地方的領導同志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匯報的。在這些匯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事實上站到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即使在

23 實際上，後來毛澤東鑑於「縣、團級以上幹部多數」思想不通而改變了主意，陳伯達的講話稿並未大量發行，中央辦公廳於11月9日將修改後的陳伯達講話稿印發縣團級。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41。陳伯達的講話大量傳播主要是通過紅衛兵的小報和傳單等渠道實現的。

這個時候，我還是不覺悟的，不知道這種局勢的造成是極不正常的，是極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極不利於黨的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這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時間雖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種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卻是很大的。這種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能夠肅清，有些地方甚至變本加厲，造成了群眾中嚴重的對立情緒。²⁴

劉少奇還檢討了他在歷史上所犯的錯誤。劉少奇將自己犯錯誤的原因歸納成四條：第一，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第二，錯誤估計當時的形勢。第三，在思想上，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第四，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主席思想。

鄧小平在檢討中說：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二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二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二人不僅在十一中全會以前一階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錯誤，也負有直接的責任。……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志負擔。²⁵

劉、鄧的檢討稿事先都經毛澤東審閱同意。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檢討稿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對鄧小平

24 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年10月2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5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年10月2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的檢討稿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²⁶由此人們可以看出，這時候毛澤東還是把劉、鄧的問題當作黨內問題來處理的。

周恩來也作了自我檢查，他說：「我個人在這五個月中，前五十天中雖兩次外出，但在京時也沒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對工作組只提過改良主義的辦法，沒有及時向伯達同志請教和深入到群眾中學習，這是我的主要錯誤。在十一中全會後，我努力緊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組密切聯繫，有時仍有掉隊之虞。」²⁷

10月25日，林彪、毛澤東先後在全體會上講話。

林彪在講話中談了「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怎麼搞文化革命」兩個問題。他說：

廣大群眾轟轟烈烈，從學校到社會，從文化的領域影響到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各方面，收穫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穫，黨內揪出了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搞臭了很多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還挖出了很多潛藏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破獲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電台、黃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確實是觸及了人們的靈魂。大破舊思想，大立新思想，這是一個深刻的大革命，社會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變化。毛主席的思想在這次運動中得到很大的宣傳，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對整個社會的教育，對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經過這次運動，不少青少年可能培養成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26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48—1449。

27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華東組發言提綱，1966年10月26日，手稿。參見《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922—923。

關於兩條路線的鬥爭，林彪說：

一條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路線，是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當頭的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的對立。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全國照他們的這條路線執行嘛。可是，歸根結底，毛主席的路線總是要勝利的，因為它是真理。……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合理的。儘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²⁸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我也有責任。為甚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去年9、10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甚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

28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43—148。

沒有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發表的。

關於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說：

我鬧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較起來，這個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麼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甚麼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

毛澤東的講話並不激烈，他甚至還說到：「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²⁹

會議的最後一天，周恩來解釋了運動中的若干問題，要求紅衛兵

29 據王力說，毛澤東在會上還講了「第一不要怕群眾亂來，第二不要怕把舊的機器、舊的組織、舊的紀律、舊的秩序打亂，第三不要怕妨害生產。」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63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所載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頁143—148)中沒有上述這段話。

組織只限於學校，其他工礦企業、機關團體不搞紅衛兵。對於紅衛兵搞大民主的行為，要求不准動解放軍，不能代替公檢法等專政機關，不能干擾電台廣播、電視台、報社等宣傳機關的工作。他還提出一系列的具體政策，如紅衛兵不能對幹部搞「罷官」，不能扣人、抄家，不要打人、體罰等。但是，在全國處於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周恩來所提出的這一切根本無法得到貫徹執行。

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使社會上更多的群眾加入了造反派，造反派的隊伍很快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把矛頭集中地對準各級領導機關和負責人，攻擊他們「執行錯誤路線」。此後，種種越軌不法行為在「造反有理」的名義下都可以不受約束，而對那些不法行為的干預都可以給扣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整個社會陷入不斷的動亂之中，從軍隊到地方，領導機關受到「炮打」、衝擊，領導幹部被揪鬥、圍攻的事件層出不窮。

在混亂局面日益加劇的形勢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遭到了廣泛的抵制。這種抵制並不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是反對某些具體的錯誤做法。

周恩來從一開始就不同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而且曾當面向毛澤東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毛澤東堅持用這種提法後，周恩來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見，但在以後的講話中，他反覆強調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並不都是敵我矛盾，要正確對待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廣大幹部。

陶鑄也是不同意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11月2日，他在中央組織部的講話中說：「不能把劉少奇同志叫作敵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贊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他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線錯誤，是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王力1967年1月9日在新華社講話時說：「陶鑄在劉少奇、鄧小平佔統治地位的時候，就忠實地執行劉鄧的反動路線，屁股就是坐在那邊的。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在殘酷打擊革命學生的問題上，在恢復黨團組織活動的問題上，都是執行的劉鄧反動路線。直到劉少奇、鄧小平被揭露了，

靠邊站了，陶鑄仍然繼續執行劉鄧反動路線，千方百計地阻止對劉鄧反動路線的批判，……陶鑄還反對提「反動路線」這個詞呢！」王力1967年3月13日對回國留學生講話時說：「《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一發表，有很多人反對，這不是劉鄧，劉鄧已沒有發言權了，其中就有一位叫陶鑄嘛！（笑聲）他就不贊成，他反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直到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還反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十三期社論一方面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另一方面，那些堅持反動路線的人堅決反對。陶鑄說，這樣提太『倉促』了。其實，毛主席8月份就提出了。這不是兩個字的爭論，他是不許批評工作組，不給打成反革命的同學認真平反。」³⁰

5 火上澆油

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轉發軍委〈緊急指示〉，猶如火上澆油，使原本已經夠亂的形勢更加混亂。

10月18日，毛澤東第四次接見北京和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10月16日，有關部門為此發布了統一的「標語口號」，因有些標語口號太長（如「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群眾運動推向新階段！」「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等原因，10月17日又重新發布，較之16日發布的，刪去了一些口號。「三司」的造反派就此發難，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18日凌晨，「三司」總動員，和北航「紅旗」一起，上街遊行抗議。在首都街頭公開喊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此前，「三司」的負責人朱成召曾揚言要衝會場，為此，周恩來親自找到清華大學的蒯大富，讓他做朱成召的工作，不要衝擊會場，要保證毛主席安全接見。蒯大富當面滿口答應，事後卻和朱成召勾結在一起，親自率眾衝擊會場，並組織六千多人在天安門前示威，叫嚷「必須等江青出來接見才行，總理來不行」。³¹

30 王力對回國留學生的講話（1967年3月1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1 參見《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下冊（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頁162～163。

周恩來聞訊，即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研究當天的接見安排，責成有關人員恢復刪去的口號，並同意增添「三司」提出的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³²

當天的接見形式新穎，150萬串連師生和紅衛兵沿東西長安街兩側席地而坐，毛澤東站在敞蓬汽車上一路開過去。整個接見從中午12:50開始到下午1:50結束，共用了一小時。

同日下午，清華大學出現了大標語「打倒修正主義的頭子劉少奇！」

10月21日，北京化工學院、郵電學院、地質學院、林業學院等校造反派三百多人，到國家經委造反，並在經委機關內設立工交系統院校駐經委聯絡站。

10月27日，北師大「井岡山」到「大慶展覽會」造反，指責展覽會「抬高劉少奇，貶低毛主席，劉少奇的照片比毛主席的照片還大。解說詞中，突出劉的所謂兩種教育制度，更為嚴重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仍繼續放毒」。北師大「井岡山」的行動受到一些群眾的抵制和反對。10月29日，陳伯達親自寫信給北師大「井岡山」表示支持：「同學們發現石油部展覽會布置有政治問題是對的，我贊成你們的意見。」當天，戚本禹在接見北師大代表時說：「大家造石油部展覽會的反，造得很好！」

10月29日，國家經委的一些人貼出題為〈薄一波究竟是甚麼人？陶魯筋為甚麼要包庇他？〉的大字報。11月2日，北京部分高校造反派和工交系統單位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聯合召開了「揭發批判工交黨委以薄一波、陶魯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11月8日，聶元梓、孫蓬一等十一人貼出題為〈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大字報中說：「我國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劉少奇，二號人物就是鄧小平。鄧小平的罪惡活動由

32 當時有的紅衛兵小報上說：「此事驚動了毛澤東。10月18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了『三司』提出的標語口號。」而當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卻認為並無此事，參見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327—328。但根據當時所傳周恩來10月18日晚在工人體育場的講話，其中談到「這個口號單」是當日凌晨「拿到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一起決定的」。

來已久，早在1956年，在他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就……大反所謂個人崇拜。」「他在團中央的一次會上，公開鼓吹在農村恢復單幹，說甚麼『不管黑貓白貓，能逮耗子的就是好貓。』」「在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上，曾對當時的文化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演戲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麼完美的？！」「彭真是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罪魁禍首，……彭真只是一帥，帥上還有一帥，這就是彭真的後台鄧小平。」³³

在北京的軍事領導機關連續遭到衝擊。10月22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一些學生到國防科委揪鬥路陽（國防科委副主任，曾在哈軍工當過工作組長），衝進了國防科委大樓。由葉劍英在西山召開的全軍各大單位領導人匯報會上，各軍兵種、各總部領導人紛紛反映沒法工作，沒有時間看電報，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保證。劉志堅根據葉劍英的指示主持起草了〈關於各總部、國防科委、軍種兵種機關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的通知〉，全文如下：

我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工人農民的軍隊，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工具，擔負着保衛祖國安全和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的光榮任務。當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正在加緊反革命的聯合行動，我軍必須經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各總部、國防科委、各軍種兵種的主要領導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務中擔負着重要的責任。必須保證他們對部隊實施經常的指揮，不能中斷。未經軍委許可，他們不能離開指揮崗位。他們如果離開指揮崗位，發生指揮中斷，那是萬分危險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院校的革命師生，向他們反映情況，要求他們解答問題，對他們提批評意見等，應該和接待機關商量，根據領導同志的工作情況，安排接待時間、地點，每次談話或開會的時間不要太長；對於機關的辦

33 北大聶元梓等十一人：〈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6年11月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公室、通信設施、保密設備要妥為保護，以免影響他們對部隊的指揮和日常工作的進行。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對來訪革命師生要熱情接待，積極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歡迎他們對領導提出批評，耐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正確地宣傳解釋黨的方針政策；如果自己有點錯誤，應該主動進行檢討。

這個通知，應立即向全體革命師生和機關有關人員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軍委 總政

1966年11月6日

這個通知，林彪批給中央文革小組，被陳伯達以「借戰備壓革命」的罪名扣壓下來，不准發出。為控制〈緊急指示〉下達後各地出現的日益混亂的局面，劉志堅根據葉劍英的指示，曾組織全軍文革小組前後起草過五份電報，都被陳伯達扣壓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會上，陳伯達還當面指責說：「你劉志堅思想不對頭，發的幾個電報，都是壓制造反的。我都給扣留了。」³⁴

11月8日，又發生了大規模衝擊國防部大樓的事件。不久前，李天佑、王新亭兩位副總參謀長到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去講過一次話，對這個學院的黨委講了一些正面評價的話。反對這個講話的學生跑到北京來，在國防部辦公大樓前靜坐，要求李、王接見，未達到目的。全軍文革小組曾派謝鏜忠（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李曼村（總政宣傳部長）、辛國治（總政青年部長）等去勸說，無效。8日凌晨，六百多名軍隊院校學生向大樓發起衝擊。警衛大樓的戰士手挽手擋住學生，而學生打破玻璃，搭上木板，一頭搭在門窗上，一頭搭在戰士頭上，踩着木板衝進了大樓。9日上午，葉劍英、蕭華、劉志堅等研究後擬出五條（命令學生立即退出國防部大院等），請示林彪，林說要對學生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抓人。周恩來於下午2時在人民大會堂召集葉、蕭、劉、穆欣等，繼續討論解決辦法。全軍文革小組同時向中央文革小組

34 劉志堅：〈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40—41。

求助。陳伯達派張春橋、謝鏜忠、戚本禹三人，帶着他寫的一張字條去國防部。陳伯達的字條不長，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今天的事不管你們有這樣或者那樣，一千條或一萬條道理，但是比起衝進我們無產階級神聖的國防部來，你們的各種道理就都站不住腳了。你們忘記了大道理，把這樣那樣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這怎麼能夠說是正確的呢？

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有甚麼事情可以一個一個地談清楚，有甚麼委屈可以一個一個地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學們要用大道理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擺事實，講道理。罵人不好，打人也不好，請同學們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這個地方頂了。你們都很年輕，不要以為自己都對，誰也說不得。我說的這些都是好意，都是從大道理出發的。希望你們不要輕聽輕信，要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前進！

再說一句，希望你們立即離開國防部，今天的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後，還可以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

因為身體不好，託張春橋、謝鏜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來見你們，說這一番話，請你們考慮。³⁵

中央文革小組對造反派學生有很強的影響力，衝進國防部大樓的學生當即表示擁護陳伯達的意見，並很快退出了國防部大院。

6 省市癱瘓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很快就在全國各地掀起，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各地黨政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普遍遭到炮轟和衝擊，各地黨政領導機關普遍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

從10月7日起，北大、清華、北師大的造反派開始批判北京新市委的

³⁵ 陳伯達對國防部大樓前軍事院校造反派的書面講話(1966年11月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13日，造反派在北京展覽館召開了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後散發了〈告北京市革命群眾書〉。10月14日，北京及外地師生五萬多人在北師大集會，再次批判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地質「東方紅」、北航「紅旗」、北師大「井岡山」、《北京日報》等單位在大會發言。李雪峰到會代表新市委作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11月15日，北京市委發出〈緊急通知〉，通知說：

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些工業、交通、地建、財貿、文教等企業單位和機關團體的工作隊或者有些單位的領導人，把一些革命群眾打成了「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這是違反〈十六條〉規定的，是十分錯誤的。

為了全面的、徹底的執行〈十六條〉，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同時必須堅決、認真的給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的革命群眾進行平反。為此，市委決定：

(一)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一階段，凡是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等等，都當眾一律平反，公開檢查，賠禮道歉，給他們恢復名譽。

(二)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階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或者因為給工作組領導提意見而被開除的職工都應恢復工作。

(三)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各種整理群眾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規定，認真處理。

(四) 凡是因為把革命職工打成「反革命」而停發、扣發了他們的工資的，都應當予以補發。

本通知要向全體革命群眾宣讀。³⁶

36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給革命群眾平反的緊急通知(1966年11月1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北京新市委雖然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首當其衝，最早受到衝擊和批判，但北京終歸是首都重地，毛澤東、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都多次做過關於維護北京新市委和首都秩序的講話。北京以外的省市自治區就要慘多了，以下我們通過幾個省市的實例可以了解全國的大概情況。

10月12日，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召開「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山東濟南市大中學校師生及部分地市大中專學校師生一萬多人參加了大會。大會猛烈抨擊山東省委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7日，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又在山東省委院內召開「聲討山東省委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人罪行大會」。23日，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再次召開批判省委的「誓死捍衛毛主席誓師大會」。11月3日至27日，山東省委在濟南南郊賓館召開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工作會議，省委常委、各地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省直各部門負責人、省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員共237人出席會議。3日晚，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在南郊賓館門外召開「揭發批判省委錯誤」群眾大會，省委工作會議與會人員參加了大會。會後，學生脅迫省委第一書記譚啓龍到北京辯論。陶鑄代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處理此事。11日，譚啓龍以個人名義向進京學生作了檢查。16日，陶鑄、譚啓龍、譚震林接見山東進京人員，表示支持學生批判省委，但同時指出，山東省委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要求學生與省委合作。17日，譚啓龍回到濟南。省委工作會議向與會人員傳達了譚啓龍到北京的情況和陶鑄、譚震林的講話以及譚啓龍的檢查稿。25日至27日，省委工作會議的與會人員連續三天參加群眾組織批判省委的大會。25日，參加山東大學「紅色敢死隊」召開的「控訴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26日，參加紅衛兵山東聯絡總站批判省委大會；27日，參加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召開的批判省委大會。省委工作會議結束後，山東省委已無法辦公，省委領導人不時被揪鬥，省委對全省的局勢已失去控制。³⁷

37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編著：《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頁509-510。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是比較早地站出來，公開號召炮打省委的省委領導人。他於8月25日在省委機關召開的文化革命動員大會上講話，動員炮打省委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司令部」。9月1日，劉建勳在鄭州大學再次號召師生「炮打省委司令部」。此後，各地、市委也召集會議，號召「炮打司令部」，鬥爭矛頭直接指向各級黨委，黨委領導機關逐步陷於癱瘓。到10月上旬，包括省委書記趙文甫、楊蔚屏，副省長邵文杰、彭笑千、張柏園，省委常委劉鴻文、劉晏春、宋玉璽、任雷遠在內的廳局長以上幹部129人被批判鬥爭；其中63人被罷官，11人被停職反省，受衝擊的幹部有1000餘人。各地委、專署正副書記、專員有18人遭到重點批判。還有一些高級領導幹部被《河南日報》公開點名批判或大會批鬥。9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調劉建勳任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常務書記。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由原省委第二書記文敏生代理。10月31日，河南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要求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阻力。11月5日至12日，省委又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會上，許多幹部公開表示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不理解，想不通，認為運動搞亂了、搞糟了等等。但省委被迫檢查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使廣大幹部陷於極大的困惑不解之中。11月3日至4日，鄭州高等院校學生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和革命造反司令部，聯合在省體育場召開「河南省革命師生員工憤怒控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文敏生被迫代表省委在大會上作檢討。11月12日，「鄭大聯委」和「豫北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二百餘名學生衝擊中州賓館，強迫出席全省三級幹部會議的全體人員參加他們組織的「揭發批判以文敏生為首的河南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14日，鄭州大學學生又把文敏生和正在參加省委三級幹部會議的地、市、縣委書記一百多人強行拉到鄭州火車站廣場批鬥和遊街示眾，造成嚴重影響。11月26日，鄭州市三十所大、中學校的學生組織二千多人到省委造反，在省委院內召開「向以文敏生為首的河南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大會。會後，把文敏生等領導人拉到宣傳車上遊鬥。此後，「踢開黨委鬧革命」的風潮，波及全省城鄉，各級黨委無

法正常工作，基層黨組織被迫停止活動。河南全省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³⁸

10月15日，東北三省造反派在北京舉行了「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20日，吉林省長春市各大專院校造反派在長春市體育館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提出要批判吉林省委和長春市委執行的反動路線。10月28日，吉林師範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等造反派進駐省委機關大院。29日，紅衛兵與省委書記處書記阮泊生進行辯論，要求省委進行檢查。30日，造反派學生衝進省委機關辦公樓，砸了省委文革辦公室，搶走一些材料。吉林省委書記處及其辦事機構常委辦公室在造反派的衝擊下，無法堅持工作，被迫從省委機關大樓轉移到省人委辦公樓檔案室辦公，後又不斷遭受衝擊，先後轉移到團省委、省賓館、康平街二號、省黨校幼兒園等處。省委於11月5日至21日召開了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的三級幹部會議。會議期間，書記處的書記不斷被人揪走批鬥。11月17日，代理第一書記趙林在會上講話時被吉林師範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揪走。當天，造反派以索取「黑材料」為名，衝進省委辦公大樓，強行打開檔案庫房，搶走機要文件278份，造成震動全省的「一一·一七」事件。18日，吉林師大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挾持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林去北京匯報「一一·一七」事件，途經瀋陽時，被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截住留下。11月24日，吉林省委在長春市體育館召開群眾大會。原定由阮泊生代表省委作〈中共吉林省委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因阮泊生在入場時被吉林工業大學的學生揪走，不得不由省委書記處書記蘭幹亭代表阮泊生作檢查。

在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後，遼寧省瀋陽、丹東、旅大、撫順、錦州、鞍山、朝陽、阜新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在瀋陽市人民體育場召開「揭發遼寧省和瀋陽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省

³⁸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下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182—185。

委第一書記黃火青、第二書記黃歐東、書記處書記李荒，瀋陽市委書記處書記宋光、吳鐵鳴以及一些大專院校主要負責人被拉到會場批鬥，一大批領導幹部被撤職罷官。11月3日至9日，省委召開省、市（地）、縣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會議期間，主持會議的省委書記處書記白潛遭到紅衛兵圍攻。至此，省委領導機構已名存實亡，省委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除有病住院的以外，大都被抓、被扣，失去人身自由，省委處於癱瘓狀態。三級幹部會期間，11月4日，紅衛兵查封了《遼寧日報》社；11日，砸了省委檔案室。³⁹

10月13日，浙江省委辦公廳等省級機關的造反派起來揭發「省委內幕」，提供材料，全省掀起了「炮轟省委、火燒江華、打倒陳冰」⁴⁰的高潮。11月6日，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但會議頻頻遭到造反派的衝擊，與會幹部被揪走的事件時有發生，會議多次轉移會址仍無濟於事。11月20日，省委被迫「暫時結束會議」，認為形勢發展已難以控制，便整理出十個方面的問題，向中央反映。11月13日，省級機關造反派召開「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有各地850多個單位三萬餘人參加。省委常委書記李豐平被迫代表省委作了檢討，作出了「撤銷省委文革小組，浙江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常委直接領導」的決定。11月17日，杭州市部分大專院校紅衛兵衝擊省委機關，省委書記處辦公室部分文件、材料被搶。此後，省級機關各黨組織普遍受到衝擊而呈癱瘓半癱瘓狀態。⁴¹

10月28日，造反派學生進駐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31日，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領導人李井泉等被迫貼出〈我們的大字報〉，表示歡迎群眾「炮轟」他們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1月3日，成都部分學生和北京到成都串連的學生數百人包圍出席省委即將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議人員駐地——成都東方紅賓館（原錦江賓館），提出由

39 高峰主編：《中共遼寧黨史大事記》（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頁240—242。

40 江華為浙江省委第一書記，陳冰為省委常委。

41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51—152。

紅衛兵和工農兵代表參加省委三級幹部會議並由他們組織主席團等條件，並要求省委解答有關成都地區文化大革命中若干問題。西南局、四川省委領導人李大章、程子華、喬秀峰、楊萬選等出面與學生協商，遭到學生的批判鬥爭。4日上午，李井泉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也遭到學生的批鬥。李、廖被迫向學生作檢查。11月13日，由紅衛兵成都部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等七個造反派組織主持，在成都召開有二十五萬人參加的「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市委貫徹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李井泉、廖志高在會上作了檢查。11月18日，李井泉經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批准，離開成都到上海養病，但不久即被造反派揪回成都。11月21日，廖志高被工交系統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狀」，於12月返回成都後，被扣留在成都東郊。12月下旬，四川省委書記許夢俠、杜心源又被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狀」；省委書記楊超被工交系統造反派扣留；省委書記趙蒼璧被省公安廳造反派看管。自此，四川省委完全癱瘓。⁴²

二 大火向廠礦農村蔓延

1966年10月以後，由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引發的大規模造反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很快就突破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的規定，擴展到工農業生產領域，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遭到嚴重干擾。

毛澤東原來並沒有要在工農業生產領域大搞文化革命的計劃，所以他在1966年10月曾設想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春節前就可以結束了。但運動大規模展開之後，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毛澤東的想法也在不斷地調整。1966年11月間發生的安亭事件，使毛澤東改變了初衷。毛澤東支持工人造反派造反，一下子將文化大革命的範圍大大地

42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299—302。

擴大了。原來只說「三裏五界」⁴³，現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向廠礦農村蔓延。不久，全國上下，各行各業就都被席捲而入。

1 「抓革命，促生產」

1966年6月30日，劉少奇、鄧小平聯名向毛澤東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稿，他們在致毛澤東的信中提出：

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在展開，中央和省市領導必須用很大力量領導這個方面的運動。如果工礦企業、基本建設等基層單位一齊動起來，領導上顧不過來，容易出差錯。最近工業交通和基本建設的計劃完成得不算好，特別是鋼、鋼材、煤的產量開始下降，質量下降的情況尤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務原計劃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現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討論之後，認為在文化革命運動的部署方面，重點放在文化教育部門、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等基層單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條〉結合文化大革命進行（上海正在進行四清的四十萬職工的企業，決定用以文化大革命運動為中心的方法進行，我們已答覆同意，看看他們的經驗如何，再行推廣）。這是一個重要決定，請主席考慮決定。擬了一個通知稿，請審核。

7月2日，毛澤東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三十給我的信和通知，已經收到看過。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⁴⁴ 當

43 「三裏」即〈五一六通知〉中「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句中的「黨裏、政府裏、軍隊裏」；「五界」即〈五一六通知〉中「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一句中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643—644。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即發出。通知的主要內容如下：

最近時期，一部分產品質量下降，事故增多，設備維修計劃完成得不好，某些產品(如鋼、鋼材、木材和煤炭)的產量開始出現下降的情況，某些基本建設項目的施工進度，也開始出現遲緩的現象，外貿方面開始有所下降。對於這些剛剛露頭的問題，各級黨委必須看得見，抓得起，立即採取措施，加以解決。要大抓生產，特別要注意大抓質量。高溫、雨季已經到來，防洪、防風、防暑工作也急需妥善安排。……

目前，各地黨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領導正在開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運動，同時也應注意到工礦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必須保證完成國家任務的特點。因此，中央認為，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包括設計、施工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按照〈二十三條〉的規定，按照各地原來確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領導地有計劃地進行。不要打無準備、無把握的仗，不要全國所有廠礦企業一哄而起。否則，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會使生產建設遭到損害。⁴⁵

7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了一個〈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進一步將不同單位的情況加以區分，分別提出了要求。

7月2日和22日的兩個通知，限制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範圍，起到了穩定基層、穩定生產建設單位的作用，暫時制約了文化大革命對社會經濟生活的震動和破壞。

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根據周恩來的意圖、由陶鑄主持起草的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號召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應適當分

⁴⁵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1966年7月2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4。

工，搞兩個班子，一個班子抓革命，一個班子抓生產。當天晚上，周恩來到中國科學院辯論會場，親自宣講社論中的觀點，提出：我們不能看着科學院的尖端科學研究和許多重點實驗像現在這樣放在一邊。憑我自己的責任來說，我不能夠看着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不能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當中，使我們最緊急、最重要的業務受到影響。⁴⁶ 周恩來在9月8日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工業六條）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農村五條）。這兩個文件要求：一、工業、農業、交通、財貿等部門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確保生產建設、科研、設計、市場、收購等工作的正常進行；二、各有關單位和行業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外出串連的應迅速返回原單位；三、學生和紅衛兵不要進入那些單位去串連，干預他們的部署，影響他們的生產和工作；四、已經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要把文化大革命放到業餘時間去搞，在這些單位不採取直接罷官的做法，未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可以推遲進行，等等。這兩個文件起草後，周恩來曾請示毛澤東，建議在政治局討論一次，議定政策。由於事情很急，毛澤東指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於是，這兩個文件在9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使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混亂的社會經濟形勢有所緩和。⁴⁷

9月15日，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周恩來在講話中提出：「搞好工農業生產，關係很大。」「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連。那裏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四清』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鬧革命。」⁴⁸

9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總參謀部《關於建議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報告》。由周恩來審定的中央批語指出：根據北京軍區，山東、吉林、

4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9。

47 《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933—934。

48 周恩來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15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17。

陝西等省軍區反映，目前紅衛兵組織已由學校逐漸擴大到農村、工礦企業單位。有的在民兵組織中建立了紅衛兵，並攜帶武器，出現了動武行為，同時也使工農業生產受到影響。根據徐向前同志的提議，建議農村、工礦企業不成立紅衛兵和赤衛隊等組織。農村、工礦企業的民兵要堅守自己的崗位，抓革命、促生產，完成生產任務，搞好三秋工作。⁴⁹

9月25日，周恩來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負責人時說：「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這個講話是經過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尖端項目，不抓怎麼能行？農村『三秋』到了，不抓怎麼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產。到外地串連要停止。」⁵⁰周恩來還說過：「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甚麼？用甚麼？所以，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影響，生產減少了於國於民都不利。」⁵¹

本月，經李富春提議，毛澤東批准，調余秋里、谷牧協助周恩來抓經濟工作，余、谷兩人各分管十個部的工作。

2 「工農反學生」

文化大革命初期，最積極活躍的是學生。他們思想活躍，精力旺盛，又由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他們對毛澤東關於文化

4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7—68。《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所載中央批語為：「中央同意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建議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主要還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見。但是有的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已經建立紅衛兵、赤衛隊等組織的，可暫時保留一個時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動，不要動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進行內外串聯，也不要再發展紅衛兵等組織；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機關、團體，招待外賓的旅館服務單位也可經過紅衛兵等組織群眾的醞釀，自動的取消這些組織。這些組織不論保留與否，都應根據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的〈十六條〉，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三次在天安門接見外地來京學生的講話和最近《人民日報》的有關社論，首先加強這些組織的政治思想工作。」

5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9。

51 周恩來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9月1日)，載《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56。

大革命的理論最能接受。和學生比起來，工人、農民則要顯得保守得多。他們大多數相信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和各級組織，難以理解以至明確反對學生的造反行動。在全國許多地方出現了學生與工人、農民發生衝突的事件。對於各地普遍出現的激進學生與工人、農民發生衝突的問題，中共中央始終明確表態支持學生。1966年8月22日，陶鑄在給中南局的電報（1966年8月22日）中說：

中央最近開了一次會，有個極其重要的指示。從最近各地運動的情況來看，許多情況說明，還是怕字當頭，不敢叫群眾炮打司令部。有的地方學生起來鋒芒對了黨政機關，於是就煽動工農群眾鬥學生，打學生，最厲害的有天津、哈爾濱、西安、蘭州、桂林等地，西安最嚴重。主席對此很生氣，很不滿意。要把這個精神告各省（區）委。總之，不准用任何藉口和方法對付學生，否則一定要犯大錯誤，弄得自己焦頭爛額。下台也會下得很慘。學生是有覺悟的，為甚麼不相信學生群眾？要大破大亂，才能大立。怕亂也還是要被群眾革掉，必然要叫群眾革掉。告訴各省（區），各地，要徹底放手。對學生絕不能用任何形式去壓制，要堅決撐學生的腰。這次運動工農兵是主力軍，學生是先鋒。對軍隊，中央已發出通知，要堅決照辦……不要怕，亂的愈厲害愈好。⁵²

1966年8月底、9月初，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在上海發起衝擊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大院事件時，成千上萬的工人自動趕來保衛上海市委，與北京紅衛兵進行辯論。9月初，北京一些紅衛兵在武漢號召炮打、火燒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武漢市的工人、市民自發起來與北京紅衛兵辯論。其實，在全國各地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當以學生為主體的造反派要炮轟省市及以下各級領導人時，都有大批的群眾自發地或有組織地起來反對學生，保衛當地的黨政領導人。

52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頁48。

1966年8月中旬，青島醫學院一些學生發出〈給全市同志的一封信〉，其中提出「市委有許多嚴重問題，要把本單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須首先搞清市委的問題」。其他院校的學生也貼出大字報，批評市委「怕」字當頭，使「青島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8月25日，青島醫學院部分學生到市委請願，要求罷市立醫院黨總支書記張秀文的官，並在全市散發〈堅決造青島市委的反〉的傳單，宣稱當晚要召開萬人大會，衝擊市委。青島市委面對混亂局面，決定要各單位組織隊伍，連夜上街宣傳〈十六條〉。宣傳隊伍與學生發生了激烈的辯論。這就是青島「八二五」事件。

其實，當時正是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興起的時候，中央接二連三地發布了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學生運動、嚴禁出動警察鎮壓學生運動的規定，青島市委根本就不敢和學生公開對抗。市委於8月26日發出四條指示：一、工農兵要堅決支持學生的革命行動，絕不允許和學生發生衝突，絕不准鬥爭學生，不准到學校參加學生的辯論，在任何情況下，不准學生鬥學生、工人鬥工人；二、幹部工人一律不參加學生的活動；三、所有機關幹部組織起來，到醫學院外，說服工人和街道居民馬上離開，不要在醫學院周圍進行宣傳；四、大型的宣傳一律停下來，主要搞小型，不要到市委駐地附近去宣傳。

青島的造反派學生向全國發出呼籲，請求支援。幾天之內，全國有二十所院校學生赴青島聲援。8月29日晚，山東海洋學院、青島醫學院、山東化工學院及各中學學生聯合來青島串連的外地學生，在青島市第二體育場召開了「革命造反誓師大會」，給青島市委書記張敬熾戴上「鎮壓學生運動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紙帽子，進行批鬥，並宣讀了山東省委責令張敬熾向青醫、海院、化院師生作檢查，聽取批評的電報。

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啓龍親率省委工作組對青島問題進行調查了解後，向中央作了匯報。8月30日，譚啓龍受中央委託，率省委工作組再次到青島，解決青島問題。8月31日晚，譚啓龍在全市大專院校學生代表會上宣布：撤銷張敬熾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青島市市長李元榮代理市委第一書記。大批支持張敬熾的群眾聽後引起強烈不滿，他

們自發成立了「臨時服務小組」，召開大會，向中共中央發出了「要求黨中央、毛主席馬上派人到青島調查「八二五」事件真相，作出正確決定」的急電。9月1日凌晨，譚啓龍向自發大會群眾傳達了中共中央指示：「青島市發生的問題，由全市工農兵學等各界群眾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張敬熾的錯誤問題，由代表大會討論決定」。中央指示傳達後，自發大會作出了建議撤銷對張敬熾撤銷職務的決定，恢復其市委第一書記職務、嚴懲右派學生等〈六項決議〉。1日上午，全市流傳「中央決定恢復張敬熾市委第一書記」的消息和傳單，各單位紛紛到市委向張敬熾送慰問信並形成遊行慶祝活動，即所謂「九一」自發大遊行，人數達十五萬人之多（一說四十萬人）。一些人還到青島醫學院再次就「八二五」事件與學生辯論。當晚，青島市委在人民會堂召開全市各界群眾和高校師生有線廣播大會，譚啓龍就青島形勢和張敬熾並沒有恢復職務問題講話。講話並沒有能緩和大多數群眾的情緒，反而形成了一個有四萬多人參加的「靜坐大會」。大會接連向中共中央發出三封「十萬火急」電報，再次要求中央撤銷對張敬熾撤銷職務的決定並派人來青島調查「八二五」事件。9月2日上午，中央辦公廳覆電稱：「中央領導同志非常關心青島的問題，待研究後一定給你們作答覆。」在市委同意派群眾代表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意見後，群眾才散去。在這段時間裏，由於集會、遊行、靜坐和辯論不斷發生，造成道路阻塞、交通中斷，社會秩序混亂，群眾生活和工作無法正常進行。

9月4日，中央作出對青島問題的三條處理意見：一、中央委託山東省委譚啓龍負責妥善解決青島工人與學生之間的糾紛問題；二、對學生和工人發生的糾紛，要說服雙方，無論如何不能發生衝突，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三、工人與學生發生的問題，可採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領導協商解決。⁵³

也是在9月4日，青島市副市長、市委嶗山縣「四清」工作團副團長王效禹給中央文革小組打了一份「小報告」。王效禹在報告中說：青島

53 中共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青島地方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181。

市委嶗山縣「四清」工作團黨委，「不是號召工農兵堅決支持學生的革命行動」，而是「要工人農民對學生進行教育，說吃着農民的飯，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鬧」；「對學生不是叫他們游泳中去學游泳」，而「是說服教育不准進城」，「這是和中央對立的」。王效禹認為學生批判的方向是對的，「組織工人農民支援」批判對象，「這是方向的錯誤」。毛澤東於9月7日在王效禹報告上批示：

林彪、恩來、陶鑄、伯達、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請一看。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北京就沒有調動工農整學生，除人民大學曾調六百農民入城保郭影秋⁵⁴，其他都沒有，以北京的經驗告地方照辦。

譚啓龍和這個副市長的意見，我看是正確的。

請你們商議一下，酌定政策。

毛澤東

九月七日⁵⁵

在造反的學生和維護市委領導的工人、市民之間，毛澤東明確地表示支持學生造反，而且就如何支持學生作出了具體的部署。9月11日，中共中央將毛澤東的批語和王效禹的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並作出四條決定：（一）不准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二）凡是發生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的地方，必須公開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平

54 郭影秋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文革開始後，當獲悉中國人民大學學生中有人要將郭影秋打成黑幫時，北京海淀區蘇家坨公社（郭曾在此搞過四清）農民曾到人民大學表示支持郭影秋，但毛所說「人民大學曾調六百農民入城保郭影秋」，並無確切證據。

5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24—125。

息工農市民同學生之間的糾紛，絕不允許把責任推給群眾。(三)勸說工人、農民、市民不要干預學生運動，相信學生的大多數是要革命的，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對他們的言論行動有意見，可以向上級機關提出，不要直接同學生辯論，不要同學生發生衝突。(四)各級黨委負責人不要怕學生，不要怕工人、怕農民、怕群眾。要放下架子，站到學生中去，到群眾中去，同他們商量問題。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黨的政策原則，堅持〈十六條〉，沒有甚麼不可以解決的問題。⁵⁶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社論中說：「有些地方，有些單位的負責人，他們找出種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甚至挑動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農民，來反對革命學生，同革命學生對立。」社論提出：「決不允許任何人利用我們工人農民對黨的濃厚的階級感情，播弄是非，製造我們同革命學生的對立，讓他們從中鑽空子。」社論號召：「我們工人農民，應該熱烈歡迎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堅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革命學生在鬥爭中出現一些缺點，是難免的。我們應當相信，絕大多數是要革命的，是會自己教育自己的。」

山東省委和青島市委努力按照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精神，解決工人和學生的矛盾。9月6日，青島市委向全市發出〈關於貫徹執行中央關於青島市委問題處理意見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認真執行中央指示精神。譚啓龍也給青島市的幹部、群眾和學生發出公開信，提出解決「青島問題」分兩步走：首先解決工人與學生之間的糾紛，然後再解決青島市委的領導班子問題。在省委工作組的幫助下，市委分別召開了大專院校師生代表、職工代表和黨員幹部大會，譚啓龍均到會講話。20日，召開了有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大中學校師生和幹部等各方面代表1174人參加的協商會議，譚啓龍在會上講了話。會議通過了譚啓龍的講話和給黨中央、毛澤東的電報。由於各方代表意見分歧很大，協商會議沒有解決實質問題，青島市委基本處於癱瘓狀態。造反的學生仍在不斷發難，青島全市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況下。

56 《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頁507。

青島事件表明：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論是甚麼人，不論是甚麼階級或階層，只要你擁護文化大革命，你的行動對發動和推動文化大革命有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支持你，否則就反對你。在過去的宣傳中總是說，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相結合，學生要接受工人和貧下中農的教育。現在要反過來了。毛澤東後來就說：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⁵⁷

1966年9、10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廠礦農村搞不搞、如何搞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還是游移不定的：一方面想保持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另一方面又不想讓工人農民影響和妨礙學生造反。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在《人民日報》上剛發表了〈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9月7日)，馬上又發表禁止工人農民干預學生造反的社論(9月11日)。

在學生的造反組織蓬勃發展起來之後，各地也都出現了一些工人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大多是在學生的支持和幫助下成立的。有些地區在黨政領導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些後來被稱為「官辦」的工人群眾組織，如重慶工人糾察隊是根據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指示成立的。8月底、9月初的一天，李井泉在重慶找了幾個機關、工廠的領導幹部談話，談話中，有人提出機關、工廠要不要組織紅衛兵的問題，李井泉回答：機關和工廠內不再組織紅衛兵，因為已經有了文化革命組織，工會組織，還有民兵組織。如果工人要求組織，可以依照歷史經驗組織工人糾察隊，擔負保護廠房機器的任務。⁵⁸另據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漢民1967年初所寫材料中稱：「重慶工人糾察隊是李井泉指示後，由重慶市委工交政治部、國防政治部、機械政治部三個部開了會布置，然後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袖章是市總工會統一印發的。」⁵⁹

57 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聽取匯報後發表談話說：「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連，誰也沒料到，連我自己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學生也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們犯了錯誤。……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參見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上的講話，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8 李井泉：〈關於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1967年2月8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宣傳組印，1967年2月10日。

59 燕漢民：〈我的檢查和交待〉，載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B15戰報》第6期(1967年1月14日)。

隨着紅衛兵運動和全國大串連的迅速開展，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組織紛紛成立。「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成立於1966年9月下旬。10月12日，西安地區工礦企業系統最大的造反組織「西安地區工礦企業聯合會」（簡稱「工聯」）成立。⁶⁰ 10月19日，第十三冶金建築工程公司工人楊承效和太原鋼鐵公司郭忠耀等六人發起組織了山西第一個工人造反組織「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⁶¹ 10月下旬，在成都成立了工人革命造反兵團。11月初，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簡稱「杭絲聯」）翁森鶴等赴北京告狀，並在北京成立了「紅色造反兵團」。⁶² 11月23日，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工人大隊搶佔省總工會機關，掛出「濟南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的牌子，翌日，改稱「山東省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並於12月17日召開大會，宣布「山工聯」正式成立。與此同時，「山東革命工人總指揮部」也正式成立。⁶³

3 安亭事件與上海《解放日報》事件

1966年11月6日下午，「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和上海紅衛兵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炮司」）、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上海「紅革會」、上海中學紅衛兵「紅反會」等召集上海十幾家工廠的工人造反派開會。「三司」駐滬聯絡站的包炮、姜濤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上海十七個單位的造反派頭頭共三十餘人。

北京來的紅衛兵說，他們是受中央文革的委託，來了解上海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情況。在北京紅衛兵的鼓動下，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並計劃於11月9日召開批判控訴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60 中共西安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西安歷史大事記》（西安：內部出版，1999），頁138。

61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史·當代卷》，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427—428。

62 《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頁151。

63 《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頁510—511。

宣布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的成立。會議推選出王洪文(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保衛幹事)、潘國平(上海玻璃機械廠工人)、蔣周法(上海鐵路機械廠)、徐美英(上海七四一服裝廠)、葉昌明(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化驗工)、范佐棟(上海保暖瓶二廠)、陳阿大(上海良工閥門廠鉗工)等七人組成成立大會的主席團,由王洪文負責。北京紅衛兵幫助起草了成立宣言,宣言中提出:「我們要奪權,就是要把人民的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裏奪回來,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中!」上海「炮司」為「工總司」提供了活動地點。為召開成立大會,借會場、布置會場、發海報等等籌備工作,都由上海的各紅衛兵組織幫助完成。

當天夜裏,王洪文、陳阿大等十餘人,到協大祥綢布店和上海市紡織品公司第一批發部,強行「借」走紅布、府綢等一百餘米,作為「工總司」袖章之用。很多年以後,潘國平在美國接受採訪時說:「做袖章的紅布是我們到一個布店去搶來的,說是『借』,實際是搶。後來張春橋跟毛澤東說了搶紅布這件事情,毛笑着說:『他們也是沒有辦法,是官逼民反麼。』」⁶⁴

「工總司」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長曹荻秋接見,並提出「三項要求」:一、市委必須承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須參加9日下午大會,接受批判;三、提供宣傳、交通工具。

曹荻秋馬上向中央常委陶鑄電話請示,陶鑄明確答覆:不得成立全國、全市性的工人組織,並說明這是中央的意見。曹荻秋決定對「工總司」的成立採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方針。

9日下午,上萬人參加了「工總司」的成立大會。大會計劃開兩個小時,但由於擁護上海市委的工人的衝擊,會議剛開了半個小時就被衝散了。幾千名「工總司」成員從文化廣場走到市委大樓前請願。後來由於下雨的原因,請願的人聚集到了友誼電影院繼續與市委代表、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談判,仍然得不到結果。此時有輛宣傳車廣播:「周

64 王年一:〈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1期,頁29。

總理來電話說：曹荻秋不接見你們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見！」造反派因此決定上北京告狀，由此引出安亭事件。

10日凌晨，數千名「工總司」成員衝進上海北站，潘國平率一千多人登上了上海進京的紅衛兵列車。列車於上午5時發車（到達南京後，奉命停開）。王洪文率另一部分人強行登上了開往鄭州的六十五次客車，聲稱要去北京向黨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擊鎮壓工人造反派。上午7時火車開出。上海鐵路局根據國務院指示，8時17分命令將列車停靠在上海市郊嘉定縣的安亭車站的岔道上。中午12時左右，王洪文等率眾臥軌攔車，造成滬寧全線中斷三十一小時又三十四分鐘。安亭站東面被迫停下的列車有十二趟，上海站有三十六趟北上的列車不能出發，從安亭到蚌埠，開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貨列車被迫停留在沿線各站，嚴重影響客貨運輸。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

中共上海市委及時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11日上午，市委組織有關局的大批幹部，由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韓哲一帶隊趕到安亭，勸說工人回廠。11日12時，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根據周恩來指示，發來特急電報，勸告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產這是大道理。……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⁶⁵中央文革小組派副組長張春橋到上海會同上海市委處理此事。11日深夜，張春橋乘空軍專機到上海後，未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從機場徑奔安亭，與「工總司」和北京紅衛兵代表談判。張春橋在談判後明確表示：「第一，我堅決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第二，我和你們一起幹革命；第三，不解決問題，我不回北京。」同時「工總司」做出決定，把隊伍撤回上海。

13日上午，上海市委常委會集體討論決定，執行中央文革小組和陶鑄指示精神。下午，張春橋到文化廣場與回上海後一直聚集在那裏不肯回廠的「工總司」談判。張春橋在講話中說：「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如果工廠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

65. 陳伯達給上海安亭火車站的工人的電報（1966年11月1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展，中國還會變顏色。」「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應該創造好的經驗。」「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他違反中央文革小組和陶鑄指示及他本人上午參加並同意的市委常委會的集體決定，簽字同意了「工總司」的五項要求：(1)承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2)承認11月9日大會以及被迫去北京控訴是革命的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派代表)；(3)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4)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5)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⁶⁶

會後，張春橋回到住所，將五條協議電話告訴陳伯達，取得了陳的同意。15日，張春橋又和曹荻秋同赴蘇州，與那裏堅持北上的「工總司二兵團」⁶⁷工人造反派簽定了內容大體相同的五條，這兩個五條統稱「雙五條」。14日，在曹荻秋主持的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大多數與會者不同意張春橋簽字，當面批評了他的兩面派行為。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同意中央文革小組對安亭事件的處理。毛澤東聽取匯報後也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先有工人組織這個事實，再有工人組織這個概念」。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接受這個既成事實，並將「雙五條」印成市委文件下發到基層，引起了上海各級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混亂。

許多工廠的工人打電報給中共中央，抗議安亭事件的處理結果。許多對安亭事件和張春橋簽「雙五條」強烈不滿的工人，於11月26日成

66 據王力說：張春橋去上海時，他帶去的是黨中央、中央文革的口徑，同上海市委的口徑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陳伯達那封信，張春橋用廣播車、高音喇叭向工人廣播了，不同意工人提出的條件。去之前他並沒有同陶鑄的觀點不同，在上海，同華東局也沒有不同。後來，在群眾包圍下他頂不住了，才被迫簽了字。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57。王力此說不確。張春橋在去上海之前，就有在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1966年11月8日，張在同北航「紅旗」代表談話時就說過：「搞工廠是個方向問題。我們打算下一步應該這樣走。」。

67 即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下屬的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二兵團。

立了「上海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委會（簡稱「赤衛隊」），其成員以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老工人和黨團員居多。「赤衛隊」於12月6日召開了三十萬人參加的成立大會。「赤衛隊」成立後發展很快，最多時達到八十多萬人。「赤衛隊」是作為「工總司」的對立面成立的，它成立後即給中央文革小組發電報，說「雙五條」是大毒草，要求張春橋回上海檢討。中央文革小組沒有表態。

11月25日，上海「紅革會」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曹荻秋等市委領導人被迫到會。經毛澤東批准到上海串連的聶元梓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公然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並帶頭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等口號。會後，「紅革會」要求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報道大會消息，遭到拒絕。「紅革會」主辦的《紅衛戰報》第九期成了這次大會的特刊，並刊有題為〈《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的文章。11月27日、29日，「紅革會」先後派代表到上海市郵電局報刊發行處和《解放日報》社，要求將這期《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以便「消毒」。《解放日報》社請示上海市委後，拒絕了「紅革會」的無理要求。於是，「紅革會」四百多人於11月30日凌晨佔領報社，強行阻止《解放日報》發行。

「紅革會」的行動得到《解放日報》社和《文匯報》社造反組織的響應，但遭到全上海市大多數市民的強烈反對。成千上萬的赤衛隊員、工人和市民聚集在《解放日報》社周圍遊行示威，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口號，並同「紅革會」展開辯論，要求他們盡快撤出報社。12月2日，大批「工總司」成員進駐報社，支持「紅革會」，與報社外邊的大批群眾及赤衛隊員對峙，雙方頻頻發生衝突。《解放日報》被迫停刊。

12月3日，華東局書記韓哲一、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和副市長宋季文、李幹城等進入報社對「紅革會」和「工總司」作說服、勸說工作，不但無效，而且遭到造反派的批鬥和迫害。《解放日報》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委請示陶鑄，陶鑄指示：群眾組織的報紙和黨報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報紙，不能夾在一起發行，可以分開發行；如果紅衛兵硬衝，要說服，要頂住，這是個原則問題。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組電

話指示上海市委說：「《解放日報》附帶發行《紅衛戰報》，無非是揭露市委的錯誤，應該歡迎；地方報刊停那麼幾天，沒有甚麼了不起。」於是，上海市委就坡下驢，承認了「紅革會」的〈三項決定〉和「工總司」的〈四項要求〉⁶⁸，並於12月8日發出市委文件，通知各級黨組織執行。「工總司」、「紅革會」相繼撤離報社。

4 「全紅總」

在上海「工總司」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即1966年11月8日，在北京西直門內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樓的一個房間裏，一個全國性的工人造反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成立了。「全紅總」成員絕大多數為臨時工和合同工。「全紅總」成立時選有總指揮（安徽的杜某某，復員軍人，中共黨員，後退出「全紅總」組織，參與組織全國性的復員退伍軍人組織「紅旗軍」）和副總指揮（無錫的季某某，無錫「一零一八兵團」的負責人），但實際上的領導人為「全紅總」的秘書長王振海（國家科委科技情報所的臨時資料員）和副秘書長周牧（貴州的臨時工）。⁶⁹

「全紅總」成立的當天，就派了五十多人到全國總工會會議廳靜坐，要求全國總工會承認「全紅總」，並給予註冊登記。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未予理睬。靜坐持續到11月18日，「全紅總」的聲勢愈來愈大，人數則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多人。經請示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後，

68 「紅革會」的〈三項決定〉是：(1) 《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2) 《解放日報》社常委交出整群眾的黑材料，允許「紅革會」查閱報社內有關文章、底稿等；(3) 《解放日報》社常委就執行資反路線作出檢查和交代。「工總司」的〈四項要求〉是：(1) 支持「紅革會」的要求；(2) 市委要採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眾組織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組織的行動；(3) 《解放日報》事件的後果由市委負責，並作公開檢查；(4) 保證工人革命造反隊員回廠後不受刁難，否則引起的後果由市委負責。

69 本節一些材料引自方圓（即周牧）：〈自由工人運動的先驅——紀念獨立工會「全紅總」成立三十周年〉，連載於美國《北京之春》1997年3月號，頁6—17；4月號，頁75—80；5月號，頁60—67。

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王志傑代表全國總工會口頭承認「全紅總」是合法的群眾組織。11月27日，「全紅總」貴州分部在貴陽正式成立。12月5日，「全紅總」北京分團宣告成立，並於當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近三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之後，「全紅總」的湖南分團、黑龍江分團、吉林分團、廣西分團、廣東分團、江蘇分團、上海分團、河北分團、內蒙古分團、安徽分團、江西分團相繼在各地成立。

從12月1日起，「全紅總」組織各地臨時工、合同工三百多人到全國總工會再次靜坐，要求全國總工會把對「全紅總」的口頭承認落實為合法註冊，刊刻公章和撥給活動經費。12月4日，「全紅總」發表宣言，宣稱：「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造現行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反，徹底剷除這一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同日，全國總工會黨組負責人馬純古向李富春並中共中央上送了〈關於如何解決臨時工、合同工問題的請示報告〉。12月8日，全國總工會經李富春批准，同意為「全紅總」刊刻公章，辦理註冊手續，並和「全紅總」再次達成「會談紀要」，表示支持合同工、臨時工造反；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無故解僱合同工、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報國務院。

12月18日，江青、謝富治、張春橋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北京「一司」、「二司」、「三司」代表。江青在講話中說：

現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劉少奇提倡的，我們不知道，合同工是劉少奇搞的。有人講是主席說要搞的，那只能是他們的主席，不是我們的主席。……他們（指全國總工會主席、書記）不為工人服務，乾脆讓工人進到樓（指全國總工會大樓）裏去住，讓他們滾出去，造他們的反。合同工這個東西像廣播局就有五百多個合同工，他們可以隨時解僱，一解僱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套。我們對於壞分子還給他飯吃，讓他勞動，而合同工一解僱就沒飯吃了，這是培養奴隸主義。⁷⁰

70 江青等接見首都大專院校代表時的座談紀要（1966年12月1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2月25日下午2時，「全紅總」北京分團出動數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然後大隊人馬開往勞動部，並迅速封閉了勞動部的所有辦公室。

12月26日晚至次日凌晨，江青、陳伯達、康生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紅總」的十五名代表。江青說的第一句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全紅總」的代表說，合同工制度是勞動部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制定的。江青說：「甚麼勞動部長，勞動部長不勞動，讓他們當科長去吧！（姚文元插話：『最好讓他們當合同工。』）非造這個反不可！這個制度就像資本主義對待工人一樣！」江青接着說：「這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一套，保留一定數量的僱傭工來減少資本的支付。」「封建主義也不能比這個制度殘酷！……都讓他們（指勞動部部長、全國總工會主席等）當合同工去，你們去僱他們！」「全紅總」的代表說：「我們昨天把勞動部辦公地點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北京勞動部所屬單位也全部查封了，並向全國各地分團發出電報，把勞動調配部門全部查封。並決定明天封全國總工會。」陳伯達說：「封得好嘛！沒有這個部工人照樣工作！」江青說：「好！封得好！我讚揚你們！」「合同工也是無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工人！你們這些大部長是怎樣對待工人的？照這樣下去，工人得甚麼前途？甚麼合同式，簡直是包身工！」「同志們，這次反映的情況對我們是很大的教育。我建議馬上發給他們每人一枚紀念章、一本毛主席語錄。你們把全國勞動力分配部門全部掃掉！你們進京工人，全部住到總工會、勞動部去，讓他們給負責吃飯、住宿。」江青問勞動部的兩位副部長郝占元、李正亭和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王志傑：你們聽到了嗎？郝、李、王答：聽到了。江青又問：能不能做到？郝、李、王答：能！康生說：「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魯曉夫，哪裏是甚麼共產黨員！想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個奪權的大問題。那些不給工人辦事的全部給他們解散！」「訂這個制度，關係到我們國家變不變顏色的大問題，是社會主義工廠變不變為資本主義工廠的大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問題。」⁷¹

⁷¹ 江青陳伯達與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代表的談話(1966年12月2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在接見中，江青當場要「全紅總」代表擬一個以中央文革名義發出的通知。「全紅總」代表所擬通知的文字為：

一、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視。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僱合同工、臨時工，從1966年6月1日以後解僱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回原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

三、1966年6月1日以後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臨時工，應宣布立即平反，賠償損失。

第三條經江青修改，增加了「現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條〉處理」的字樣。

江青還要求「全紅總」辦三件事：一、開一個中型的控訴大會，地點在人民大會堂。二、擬出改革臨時工、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報中央。三、到門頭溝煤礦作一次調查，立即將材料交中央文革。

江青最後對鄒占元、李正亭和王志傑說：「他們都是毛主席的客人，你們要很好地照顧他們。」

第二天，全國總工會派出數輛大小汽車，把「全紅總」的總部委員（當時「全紅總」共有總部委員八十餘人）接至全國總工會大樓。全國總工會陷入癱瘓。

1967年1月2日，「全紅總」迫使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負責人簽發了一個〈聯合通告〉，其內容為：

經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提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商，聯合作出以下緊急決定：

1、為了保障「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一律不得解僱。

2、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僱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僱期間的工資。

3、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⁷²

這一〈聯合通告〉在印出尚未散發時，中央文革曾緊急指示「全紅總」緩發此通告⁷³，但「全紅總」卻抓緊時間，大量翻印，大量散發。這一〈聯合通告〉和江青等人12月26日的講話在全國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直接導致經濟主義風潮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全紅總」與全國總工會、勞動部搞的〈聯合通告〉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大約在1966年秋、冬季節，全國不少地區都出現了類似的現象，例如上海市勞動局於1966年12月2日轉發了一份文件（〔六六〕滬勞企字第一一四號），這份文件是11月22日中共中央華東局代表黃宇齊等簽字同意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六條要求。這六條要求是：一、承認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組織；二、承認我們今天的行動（召集大會）是革命的；三、取消臨時工、外包工等不合理制度（積極支持將群眾意見向中央反映，請中央批示）；四、從今天起不得借任何藉口辭退臨時工、外包工（黑六類除外）；五、召集全市臨時工、外包工大會，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六、文化革命運動中對已辭退的臨時工、外包工兩星期內盡快復工，安排工作。（黑六類除外）。⁷⁴

1967年1月8日，「全紅總」在西苑飯店會議廳召開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一些國家的外交官、駐京記者、外國專家等出席了會議。「全紅總」一些人在會上介紹了全國各地的臨時工、合同工的「悲慘遭遇」，並回答了外國人的提問。

1月16日晚，「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這是江青12月26日講話中提出的「開一個中型的控訴大會」的擴大。

72 在此之前，勞動部於1966年12月29日曾向全國各省市發了一份電報，支持給合同工、臨時工轉正。參見楊易辰：《楊易辰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27。

73 中央文革指示「緩發」的原因，在於「全紅總」的三項要求在中央常委碰頭會上被否決了。

74 李拯：〈文革中發生在上海的「經濟主義風」〉，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606/20060627135806.html>）。

1月20日，周恩來在接見安徽造反派時明確指出：合同工、臨時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放到運動後期。他在講話中還說：至今沒有批准任何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我們不贊成組織全國性的群眾組織。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告，宣布：「所謂全國性組織，中央一律不予承認，所有這些組織應當立即取消。它們的成員應該立即從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單位參加運動。」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針對合同工、臨時工及「全紅總」問題發出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1967年1月2日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據「三團體」的聯合通告所決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廢。

二、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錯誤的。中央正在研究，準備分別情況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決定以前，仍按原來辦法進行。

三、各企業、各單位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和正式的職工、工作人員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有權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對領導上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當平反，因此而被解僱的，應當回到原生產崗位，按原合同辦事，剋扣的工資應當補發。

五、要把混入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中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革命組織名義招搖撞騙者，必須堅決揭露。

六、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參加這個組織的革命群眾，可以參加本企業、本單位、本地方的革命群眾組織。

特此通告全國，並可張貼。⁷⁵

75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1967年2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立即取締「全紅總」等全國性組織，同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和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全紅總」等各組織的頭頭。3月2日，北京幾十個單位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了鬥爭「全紅總」頭頭王振海的大會。之後，「全紅總」在各地的分團也被取締，一些分團的頭頭被逮捕。

5 工交座談會

到1966年11月，從中央到地方，工農業主管部門的領導幹部都被捲入運動，許多領導班子癱瘓，各省、市、自治區廳、局以下生產指揮系統普遍失靈。全國範圍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和紅衛兵的大串連，嚴重地打亂了全國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正常秩序。面對嚴峻的形勢，周恩來、陶鑄等人焦慮萬分，憂心忡忡。11月中旬，周恩來徵得毛澤東同意，讓余秋里抓緊準備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力求把1967年的計劃安排得早些、好些，讓谷牧組織幾個人研究在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11月15日，余秋里正式寫了一個報告給分管計劃工作的副總理李富春，提出擬在全國計劃會議開始的時候，「先用五天時間座談工交企業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當前生產中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當天，李富春指示：「擬予同意。送主席、林總、總理、陶鑄、任重同志。」李富春還指示：「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分別座談，由谷牧、秋里分別負責。」

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王力起草了〈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這個〈十二條〉中寫有「允許工廠成立群眾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條款，它的主旨在於：打破此前中央多次發出的對於工交企業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規定，將文化大革命之火引向更廣闊的領域。周恩來決定將〈十二條〉拿到在京西賓館召開的全國工交座談會上討論，徵求意見。

11月16日，工交企業座談會開始，參加會議的有五部(冶金、化工、水電、鐵道、機械)七市(北京、上海、天津、瀋陽、哈爾濱、武漢、廣州)以及各大區有關負責人。座談會開了近二十天，大大超過了原定的五天。

座談會上，幾個月來被運動搞得焦頭爛額的與會者們紛紛抨擊〈十二條〉，要求保持中央此前的一貫要求，即工交企業不能「停產鬧革命」，運動只能在業餘時間進行，學生不能到工廠串連，等等。中央文革小組派記者參加了座談會，以下是記者在11月19日至26日期間所寫《快報》反映的一些情況：

一、與會者認為，工廠搞大民主、大串連勢必影響生產。國家計委負責人李人俊說：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鋪開，時間集中，問題集中，生產肯定要受到影響，影響的程度很難預料。他說，目前生產已有停頓趨勢，科研、尖端項目、協作項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設也開始受到影響。其他代表就此問題作補充插話，認為當前生產主要靠吃老本，庫存材料已經很少，問題愈來愈多，馬鋼、武鋼都有停產危險。因此，會議認為，開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期分批地進行。

二、一致提出對工交系統要區別對待。西南地區的同志說，工交戰線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形勢還是大好的。要求〈十二條〉對這一點要作出明確的估計。谷牧提出對工交系統的幹部狀況也要估計一下，這樣寫文件時才好提出問題。

三、與會者強調要堅持黨委統一領導，一致認為建國十幾年來工交系統的各級黨委還是好的。東北地區的同志說，工廠裏無論如何要由黨委領導，下邊再分兩攤，不然非受影響不可。大家指出，〈十二條〉只提了統一領導，連黨的領導都沒有提，許多人對此很不理解。

四、工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建立聯合組織。各大區負責人表示，這是他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擔心各種組織中會出現兩派對立的現象。東北地區的同志說，如果各種組織都建立起來，麻煩就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產。還有的說，現在工廠裏組織已經不少了，有工會、職工會、民兵，還有黨、團，還建立那麼多群眾組織幹啥？他們要求對於建立全市性工人聯合造反組織問題不要鬆口。哈爾濱和上海的同志都主張取消已經建立起來的全市性的工人組織。

五、與會者不同意把學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搬進工廠。他們擔心學生進工廠串連會搞包辦代替，搞亂工廠。有的部長非常義憤地說：「現在的問題是學生到工廠去是向工人學習，還是領導工人搞革命？這是問題的實質，問題的核心。」他們要求在文件上寫上「不能讓學生和工人結合起來造反」。

六、關於革命和生產的關係問題是各大區和各部門領導人極為關注的問題。他們氣憤地說，如果允許生產受影響，哪怕是允許有個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鬧革命。水電部長劉濶波說：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產，那麼，我們的方針就得好好研究了。現在弄得人心情不舒暢，人家積極搞生產，說人家是保皇。⁷⁶

以上充分說明，要在工交企業搞文化大革命，阻力極大。這個阻力既來自工交企業的各級領導幹部，也來自工交企業的廣大職工。但是毛澤東這個時候已經下決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擴展到工廠、農村。毛澤東批准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結果就是一個明確的標誌。

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集職工代表會，宣讀了〈十二條〉。王力在會上說：「工人階級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力量和積極的因素。他們對這個文化大革命負有特大責任。工礦企業的工人群眾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勢所趨，好得很！是不能阻擋的。」⁷⁷ 陳伯達說，這個文件你們討論通過後，加上〈十六條〉、軍委總政的〈緊急指示〉等中央文件，就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文件。⁷⁸ 在此之前的11月16日，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五十多名學生去北京第一機床廠串連，遭到廠文革籌委會拒絕。機院「東方紅」翻牆而入，強行進廠，與工人的「捍衛團」組織發生衝突，雙方辯論十幾個小時，一些學生被打。中央文革小組聞訊後馬上表示支持機院「東方紅」。11月18日，陳伯達到第一機床廠講

76 轉引自蘇採育：〈「文革」初期三個回合的鬥爭〉，載張化、蘇採育主編：《回首「文革」》，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750—751。

77 陳伯達王力與北京工礦企業職工少數派代表的座談記錄（1966年11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8 蘇採育：〈「文革」初期三個回合的鬥爭〉，載《回首「文革」》，下冊，頁750。

話，說：「以後學生來，你們要歡迎他們，無論哪一派都要鼓掌歡迎。」⁷⁹ 11月下旬，一百多名機院「東方紅」與北航「紅旗」的學生再次進廠，並支持該廠的造反派同廠籌委會進行鬥爭。11月27日，陳伯達在接見「三司」、北航「紅旗」代表時，又明確表示支持學生到工廠、農村、機關串連。他在講話中說：「你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志願，很多同學有很大的志願，到工廠去革命去，我贊成大家的志願。」⁸⁰ 12月2日，「三司」向所屬組織發出倡議，號召造反派立即有計劃、有組織地到工廠、農村進行革命串連。

谷牧等人把與會者的意見集中起來，搞了一個對〈十二條〉的修改稿。在修改稿中明確寫上了「十七年來，工交戰線基本上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另外增加了三條實質性的內容：一、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不能停產鬧革命，只能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搞；二、工人參加「文革」活動，只能在業餘時間內進行，八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這樣，〈十二條〉變成了〈十五條〉。

11月22日，周恩來、李富春向毛澤東匯報了工交座談會的情況。23日谷牧向與會者傳達了李富春向他講的毛澤東的指示，大意是：工交企業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期分批地搞，在業餘時間鬧革命，要支持工人群眾建立革命組織。關於文件的制定，毛澤東說，〈十五條〉不行，可以另寫，討論出來看看，然後再拿到底下去徵求意見。毛澤東的表態看起來是對陳伯達的〈十二條〉和谷牧的〈十五條〉各有取捨，但基本精神明顯是支持陳伯達的。此後，陳伯達將〈十二條〉修改後搞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簡稱〈工業十條〉），並提交會議討論。

11月24日，周恩來到工交座談會討論會場聽取意見。在周恩來面前，這些積壓了幾個月不滿情緒的領導幹部將心裏的話盡情發泄出

79 陳伯達等和北京第一機床廠各派代表談話紀要（1966年11月1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0 陳伯達與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同志的談話（1966年11月2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來。劉瀾波、呂正操、呂東這些部長們哄堂而起，說到最後都站起來。大家的話題已不僅僅是工交座談會所討論的文件，而是講到國家動蕩不安的形勢，講到廣大幹部群眾的擔憂。周恩來充分理解他的這些部下，但也清楚毛澤東的態度，左右為難的周恩來只能盡力將與會者向妥協的方向引導，他講了這樣一番話：

現在，工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正處在方興未艾、大勢所趨、勢不可擋的形勢下。作為領導幹部，就要在怕革命、怕群眾、怕生產搞壞這方面來認真考慮問題，檢查認識自己。工廠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從內因來找，而找內因尤其要從積極因素來想，要善於因勢利導。我們當年跟敵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犧牲；今天更應該有「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於赴湯蹈火，敢於站到潮流裏面去。只有這樣，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沒，才能處於主動的地位。⁸¹

與會者雖然還有不少保留意見，但還是通過了〈工業十條〉。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聽取谷牧匯報工交座談會的情況，討論通過〈工業十條〉。谷牧、余秋里等事先認真準備了一份匯報提綱。12月4日，谷牧作了口頭匯報，他在匯報中說：「三個特點，工交系統基本上執行了主席的路線；工交隊伍基本上是個好隊伍；工交生產不能中斷生產的連續性。這幾點同學校、文教系統，同高級領導機關、各部委、各省委的情況不一樣。是不是考慮我們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應當有不同。」「從這些特點出發，十條照顧了這些特點，如堅持八小時工作制；文化革命的活動只能利用業餘的時間進行；遵守勞動紀律，完成生產定額，保證產品質量；健全領導生產的班子；工人群眾不能到外地串連等。因此，擁護十條。」谷牧提出：一、從全國來看，工交企業的文化大革命，還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二、對工礦企業的規章制度的破與立，要接受歷史的教訓，把革

81 《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940—941。

命幹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三、群眾起來鬧革命，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想把集體所有制改為全民所有制，臨時工、合同工想改為正式工，前幾年精減下去的人員要求回廠，等等，這涉及到體制，事關全局，請中央統一考慮。他還談到，大家擔心的就是廠礦裏面的派別組織，現在相當多的廠都有兩派以上的組織，比如，「北京絕大多數廠礦、哈爾濱八成的廠礦、上海一千二百多個廠礦、天津三百多個廠礦」。形成這種狀況，有內因，也有外因，外因就是串連的學生。學生到廠裏支持廠裏的少數派。凡有派別組織的，發展結果都很難解決，有的發展成打群架，影響生產，少數得不到支持，就派代表到北京請願告狀。對於運動中犯錯誤的幹部不能全部採取停職，只要不是反黨反中央，不是黑幫黑線，不是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到適當的時候，要做一些工作，保他們一下。工廠裏面黨的組織不能中斷，請中央批准，進一步把抓生產的班子落實一下，各個主管部門從上到下的領導指揮系統要建立起來，不能中斷。

谷牧匯報後即遭到圍攻。12月5日的會上，江青首先攻擊工交戰線的領導人「毫無階級感情，給工人戴上幾百斤重的石頭，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義那一套玩藝兒」。張春橋說：所謂工交戰線基本上執行了主席的路線，工交隊伍基本上是個好隊伍的估計，都是站不住腳的，看不到企業存在的兩條路線鬥爭，反映了一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情緒。康生從理論上分析道：社會主義工業向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它們形式上是「公」，實際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實際上是「舊」，形式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要復辟，工廠企業這一環的問題很大，因為它是經濟基礎。工廠搞不好，也會出修正主義的。上層建築不好，影響經濟基礎，經濟基礎不好，影響上層建築。工廠文化大革命，就這個意義講，比學校重要。現在的工廠也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工廠。我們工廠政治不掛帥，毛澤東思想不掛帥，恐怕比學校還厲害。陳伯達說，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總要有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黨團組織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驗考驗。會上的發言，毫無例外地都對谷牧的匯報和匯報提綱進行了否定和批判。

12月6日的會上，王力對支持谷牧、余秋里的陶鑄發動了攻擊。⁸²王力說：工廠文化大革命已經經歷兩起兩落，前兩次都被壓下去了。這次是第三次起來，又發了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在起草這個社論的過程中，陶鑄就是主張要壓。主要的就是講生產，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勵革命，相反，罵得很厲害，批評得很凶，這些詞句都是陶鑄同志堅持的。陶鑄同志很堅持黨委統一領導工廠的文化大革命，我問陶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個廠能夠統一領導？統一領導就是鎮壓革命。王力說，匯報提綱是集中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會上，谷牧和與會的李先念、陶鑄、徐向前等作了檢討，承擔了「堵」、「壓」群眾運動的責任。陶鑄在發言中說：工業農業文化大革命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堅持老框框。〈工業六條〉、〈農村五條〉還是結合四清來搞，怕亂了生產。寫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兩篇社論。陶鑄還談到他主張不搞全市性工人組織，不贊成工人離廠串連，同意匯報提綱的某些觀點，都是由於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陶鑄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省問題沒有完全解決，中央工作會議也沒有完全解決。各省的抵觸還很大，思想還不通，在許多方面表現還有懷疑情緒。陶鑄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拿我這樣一個例子來批判、來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來在發言中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寫的。我所接觸的那些部長們、省委來的人沒有幾個「通」的，大多數很不理解。現在的實際情況就是勢不可擋，我們要學習因勢利導。有很多事情我們現在還在摸索經驗，不要誠惶誠恐。對生產問題，既不要擔心，也不能掉以輕心，還是要兢兢業業，不能鬆懈一點，鬆懈一點也不許可。

林彪在12月6日的會上給工交座談會作了結論：這次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現在需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單是落在生產上，如果我們完全以生產收

82 王力說，是毛澤東決定在12月6日的會上要批評陶鑄，要陶鑄檢討的。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670。

穫的多少來論文化革命的成敗，那是大錯特錯的。林彪還針對周恩來所說的「勢不可擋」，指責道：我們應該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把這個革命席捲全國，這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刹車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就是要讓它席捲每一個領域，滲透每一個領域。⁸³ 林彪很明顯是代表毛澤東出來講話的。他在講話中還說：把那個匯報提綱裏面三大特點的頭兩點徹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個東西，就無所謂工交戰線上的文化大革命。林彪的講話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又大大地升級了。他說：劉、鄧不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

12月9日，〈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即〈工業十條〉)正式下達全國試行。

〈工業十條〉規定：「由群眾選出能夠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會議，讓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八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除了每周一次討論生產問題以外，都由群眾自己商量安排，進行文化大革命。」「由工人群眾認真討論，健全或者改選領導生產的班子，這個班子，對國家生產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擔負責任。」「工人群眾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各單位工人群眾之間、工人群眾組織之間，可以在業餘時間，在本市革命串連，交流文化革命經驗。」「學生可以有計劃地到廠礦，在工人業餘時間進行革命串連，交流革命經驗，還可以有計劃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勞動，一起學習，一起討論文化革命問題。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學校進行革命串連。」⁸⁴

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簡稱〈農村十條〉)。
〈農村十條〉是毛澤東親自指示搞的，先後三易其稿，最後採用了蕭力(即毛澤東與江青之女李訥)·王力和戚本禹起草的稿子。林彪在會上傳達

83 《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頁942—943。

84 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82。

了毛澤東對這個文件的批示：「請林彪同志主持開會通過，旋即發出。」會議一致通過了〈農村十條〉。⁸⁵

〈農村十條〉規定：「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發展以貧下中農青少年為骨幹的紅衛兵。」「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採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在隊與隊之間，社與社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的空閒時間，進行串連。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連，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農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辦代替。」⁸⁶

從此，在工廠、農村建立群眾組織，開展「四大」，在廠礦、社隊之間進行串連等做法得以合法化，文化大革命全面擴展到工農業生產領域。

三 「黑風」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開展，把紅衛兵運動的造反矛頭進一步引向黨內，引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各級領導人的權威幾乎蕩然無存，普遍受到衝擊。造反派紅衛兵迅速崛起，老紅衛兵日漸衰落和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拋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使紅衛兵運動不斷發生分化和裂變。一些人因為家庭地位發生變化，如父母從革命幹部變成「走資派」或「叛徒」、「特務」，使他們從對文化大革命狂熱擁護到消極抵制。一些人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中，從大串連的見聞中，發現了許多問題，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產生了懷疑。一個最普遍的問題是：文化

85 據王力回憶：在討論時譚震林提出，希望農村文革還是分期分批搞，林彪說不用討論了，主席已經批了。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684。

86 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供討論和試行用）（1966年12月15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89。

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盛行，上至國家主席、黨中央總書記和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至包括許多紅衛兵父母在內的各級黨政領導幹部都受到了批判和衝擊。「難道這些領導都成了黑線人物？」「一個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黨，難道只是由少數幾個好人組成的嗎？」其實，這不僅是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所面臨的問題，一批久經沙場的老幹部、元帥、將軍，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1966年11月，陳毅、葉劍英等在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種種極端做法公開提出了批評。與此同時，一些人將鬥爭的矛頭開始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組，也有人對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為第二號人物的林彪提出了質疑。這些後來都被稱為「十一月黑風」。中央文革小組組織造反派紅衛兵開展了對「十一月黑風」的批判。12月，「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在北京成立，更加大膽地與中央文革小組和首都「三司」、北航「紅旗」等對抗，又被稱為「十二月黑風」。

1 「紅海洋」

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出現了兩大突出景觀：一為造反，一為造神。從1966年6月開始，各種類型的造反接連不斷，參與造反的人群和造反的領域不斷擴大，從大中學校到黨政機關，再到廠礦農村、整個社會。在造反運動不斷擴大和升級的同時，造神運動也在蓬勃興起。

造神運動的內容就是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這個運動實際上早就開始了，從在黨內賦予毛澤東「最後決定之權」⁸⁷時即已開始。到文化大革命時，造神運動全面升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千萬大中學校學生、紅衛兵，朝聖般地湧向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檢閱，親眼目睹毛主席的真容。學習毛澤東著作被作為一場運動來搞，雖然在宣傳報道中都說是群眾自發的，全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愛

87 〈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1943年3月20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究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七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頁345。

毛主席。但實際上，所謂的群眾性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強制性。作為領導幹部，凡是反對搞這種形式主義的、宣揚個人崇拜的學毛著運動的，都會被扣上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群眾中稍有對此運動有不滿的行動或言論，也都會遭到批判。在這種氛圍下，各級黨委都起勁地號召、宣傳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與此相應的是，全國各地都大量出版、印刷毛澤東的著作和毛澤東的畫像。類似「早請示、晚匯報」等形式開始在一些地區出現，並逐漸成為時尚。各種美化、神化領袖的作品大量湧現。

1966年10月5日，葉劍英在全軍軍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是當時造神運動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他說：

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勝利，主席的年紀最少要超過齊白石。我們主席今年七十三歲，還能橫渡長江，一個多鐘頭三十多華里，到九十八歲還有二十五年。我們由井岡山根據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只用了二十二年解放了全中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和世界的形勢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⁸⁸

林彪也是造神運動中被吹捧的對象。葉劍英在同一次講話中說：

最後決定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還應該指出的是毛主席從1928年起經過三十八年的觀察，林彪同志從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上井岡山，以後一直在毛主席身邊，向毛主席學習軍事指揮，理論等方面是最好的。在黨的領導幹部中，特別在軍隊領導幹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澤東思想，而且年紀最輕，身體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歲，是領導中最年輕的。而且身體經醫生多年檢查，從頭腦到

88 葉劍英在全軍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內臟沒有甚麼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經受傷，不會影響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優秀、最健康、最年輕，是最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這有極大的政治意義。⁸⁹

作為造神運動的外在表現，就是到處張貼毛澤東畫像、毛澤東語錄和各種革命口號。因為紅色象徵革命，所以紅色便泛濫成災。1966年10月6日，中共濟源縣（屬河南焦作市）委開始發動群眾並組織專業隊在各種建築物上用紅漆書寫毛澤東語錄和大幅標語，共書寫毛澤東語錄5.8萬條、大幅標語三千餘條。在此前後，焦作市和沁陽、溫縣、孟縣、修武、博愛、武陟等縣也相繼進行這一工作，市、縣城鄉迅速形成語錄世界和紅色海洋。⁹⁰ 1966年11月，王力和戚本禹到北京郊區大興縣搞調查時，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民向他們反映，他們最反感的就是縣委布置搞「紅海洋」，花了很多錢。⁹¹

搞「紅海洋」等活動，和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有衝突：搞了「紅海洋」，到哪裏去貼大字報和大標語呢？於是，主持搞「紅海洋」的各級幹部又被批判為「抗拒大字報，對抗文化大革命」。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制止大搞所謂「紅色海洋」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據各地群眾反映，最近城市中有些黨政機關部門，藉口「寫毛主席語錄」、「美化城市」等等，大搞所謂「紅色海洋」，就是用紅色的油漆把大門和大片大片的牆塗成全紅色，甚至強迫群眾挨家挨戶出錢。有些農村中除了「紅色海洋」外，還搞了大牌坊。還有別有用心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

89 葉劍英在全軍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0 中共焦作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焦作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99。

9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683。

人，想用這個方法使群眾沒有貼大字報的地方，掩蓋自己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他們的這種做法，不但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歷來教導的艱苦樸素的作風，而且是一種抗拒大字報，對抗文化大革命的惡劣行為。中央認為，各級領導機關必須堅決制止這種錯誤的做法。

特此通知。⁹²

「紅海洋」只是造神運動中最膚淺的一種形式。「紅海洋」被制止了，但造神運動在繼續。

2 元帥的聲音

1966年11月，到北京串連的軍隊院校師生已達十多萬人。許多人提出強烈要求軍委首長接見。由總政治部主任鬻華提出建議，經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同意，並報林彪批准後，全軍文革小組於11月13日和29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組織了兩次大會，由周恩來和幾位元帥接見軍隊院校來京師生。在這兩次接見大會上，周恩來每次都準時到場，率領各位元帥和各總部領導人繞場一周，在熱烈的掌聲中同軍事院校來京師生見面，隨即迅速離開會場去處理繁忙的公務。

11月13日的大會由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先後講話。全軍文革小組事前為徐向前、賀龍準備了講話稿，沒有出現甚麼問題。特別是賀龍，因為在同年9月6日，林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向軍委領導人打過招呼，說賀龍有問題。當時賀龍很緊張，葉劍英同意也讓他在大會上講一次話，以緩和一下氣氛。為保證不讓軍隊造反派學生抓到甚麼把柄，全軍文革小組讓賀龍在接見大會上推薦空軍十七航校一些學生提出的「搞好革命大串連的十點建議」，這一設想得到了葉、賀的同意。

92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制止大搞所謂「紅色海洋」的通知(1966年12月30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94。

陳毅當時沒有準備講話稿，他是按自己的歷來習慣，發表即席講話。他說：

我們人民解放軍要講政策，有組織、有紀律。林彪同志指示要破「私」立「公」。要破掉「我」字，立「公」字。……今天我在這裏講話，就不是「我」字當頭。如果「我」字當頭，講了別人就要到外交部把我揪出來。馬上大字報就貼出來了。我不是「我」字當頭，不是「怕」字當頭，如果「怕」字當頭就不講。大家給我這個機會，我還是勇敢地來講。我們解放軍是模範，不要跟他們去鬧。去鬧我是不贊成的。這話有些不好聽，但是我要講。鬧我是不贊成的。我是完全歡迎作路線鬥爭的，十分必要，但是不要亂搞，不要作錯誤鬥爭。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會作路線鬥爭，我完全佩服他，他是我的先生。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也是最會路線鬥爭的一個，是我們的模範。你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作路線鬥爭，最好要學習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搞路線鬥爭，第一要顧全大局。有的學生衝中南海、衝國防部，我是堅決不同意的。我是1927年參軍，當解放軍三十九年了，還沒有見過解放軍打解放軍。要顧大局、識大體。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不要衝國防部，佔領大樓，剪斷電話線，……你們有委屈可以申訴。你們在單位受打擊，到中南海、國防部告狀，毛主席同意這樣做，林彪同志支持，但不能直接行動，可住招待所。派代表到中南海、國防部等待得到答覆。……在鬥爭中，我不贊成現在的逐步升級。不是口號提得愈高愈好。「工作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反革命」，這就是錯誤的，就是逐步升級。搞校黨委不過癮，還要搞部長，現在還要搞副總理。要有多少是多少，實事求是。作路線鬥爭要有一定限度，有好大錯誤，作好大估計，不要一味擴大。本來不錯，超過界限就要犯錯誤。工作組犯了錯誤，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應該進行批判。但調轉過來，我們不能用工作組的辦法來對待工作組。用錯誤的辦法來對待工作組，這樣愈搞錯誤愈大。我

們要用毛澤東思想批判錯誤思想，只有正確的方法才能把錯誤糾正。⁹³

葉劍英準備有講話稿，但在講話中又即興講了不少話。葉劍英在講話中說：

在運動中，有些機關、有些院校沒有搞好，有些領導對這場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犯了打擊群眾、壓制運動的錯誤。這些錯誤10月5日以前軍委進行了抵制。10月5日作了一個〈緊急指示〉，一定要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同志們要掌握黨的政策，使運動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運動初期，同志們堅決反抗、堅決鬥爭，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這種鬥爭精神我們支持。你們頂得住，堅決鬥爭，我們不僅同情，還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跨過了限度就變成了謬誤。越過了一定的量就發生了質變。〈緊急指示〉發出以後，有些領導同志一次、兩次、三次地承認錯誤，挨打挨鬥。有些單位，我們應該指出，如二醫大做得過分了，變成了錯誤。……這些事不少了。今天，我們不點這些人的名了。我們是睜着一個眼睛，閉着一個眼睛，閉着一個眼睛放手，睜着一個眼睛看情況。要准許人家犯錯誤，改正錯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只佔百分之一、二、三。過去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但在轉過來不准人家承認錯誤也不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一種新風氣，開會之前先讀毛主席語錄，促進了我們老傢伙。你們青年人教育了老年人。毛主席說，過去舊戲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們向青年學習。但是我們奉勸院校同志們，我們要按林副主席的指示辦事，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當聖經。……我們軍隊院校中的青年要學習地方院校打破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你們出來是革命的，也有少數人出來表

93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55—156。

現不好，我們是知道的。方便讓給自己，困難留給別人，這不好，坐火車，還沒上完，就把門反鎖起來，圖舒服。紅衛兵把玻璃打破了，從窗子爬進來。紅衛兵批評我們，這個「解放軍」不能學！有的住大旅館，住老鄉家裏。生活稍微不好，就不滿意。這是在敗壞我軍的光榮傳統。……有少數人，有的幹部心臟病都發了，倒下了，還要抓人家門，還不讓人家走。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以後，我們要注意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同志們，不要受壞分子的利用。

在葉劍英講話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有與會的學生對這次大會和四個軍委副主席的講話表示懷疑。葉劍英在講話中說：

同志們，靜一下，宣布一個重要消息。獸醫大學，不是醫人是醫馬的，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的戰士李基才寫條子問蕭華主任：「蕭華主任，我問一個問題，請回答：今天開這個大會，林副主席批准沒有？」同志們，他懷疑我們這個大會是偷偷開的，同學們相信不相信我們？（與會學生：相信軍委！）我代表軍委的全體同志，感謝同志們信任我們，請同志信任我們。他下面還有問題：「你們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們四個人的講話不僅他個人看過，而且是集體討論過的。讓我代表軍委全體同志再次感謝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們對我們的信任！毛主席教育我們，現在是「子教三娘」，多數教育少數。兒子教育老子，子教三娘，你們青年教育我們，大家教育李基才，允許他改正錯誤，允許李基才大膽懷疑。⁹⁴

這次大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幾位元帥的講話在廣大幹部和偏於保守的群眾中得到了極大的共鳴，而中央文革小組及造反派群眾組織

9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59—161。

則大為不滿。在全軍文革小組於11月29日組織的第二次接見大會上，陳毅、葉劍英再次講了話。

陳毅直言，他11月13日的講話是有意識得罪一批人的。他認為，光講好話，不給犯錯誤的同志以幫助，不夠一個共產黨員的資格。陳毅說：「如果光在那裏講恭喜發財，講天氣很好啊，偉大偉大呀，萬歲萬歲呀，沒有幫助。有甚麼幫助啊？那是扯謊！表示陳老總這個人不老實，心裏有話不講出來。」他對文化大革命能否搞好持懷疑態度。他反對把工作中有缺點錯誤的同志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因為文化大革命影響國民經濟生活；反對把打擊面搞得太寬太長，從而否定建國以來各方面取得的成績，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同時，他認為軍隊應該根據自身的特點，採取有別於地方的方法進行文化大革命。並且，軍隊領導機關和院校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也應有所區別。陳毅相信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表示願意出席對他的批判會，「但是，是你把我批倒，還是我把你批倒，這個話還很難說」。

葉劍英在講話中闡述了軍隊院校培養學生的重要意義和特點，指出，不允許軍隊院校學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違背毛澤東思想，違背人民解放軍的向全國人民學習的優良傳統。他說：「衝我們最高統帥部，衝我們國防部，把國防部當成敵人，當成敵人的堡壘來衝，把解放軍戰士當成敵人來打，還有哪一種比這更錯誤的啊……嚴格講起來，這就是反革命。」同時，他希望犯了錯誤的同志迅速改正，表示要苦口婆心地挽救犯了錯誤的青年。葉劍英沒有因為會場中有不少持反對情緒的學生而掩飾自己的憤激之情，他說：「你們這裏有很多標語，貼儘管貼，講我們還是要講。」⁹⁵

陳毅、葉劍英等的講話，是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人們所能聽到的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左」傾方針最系統、最尖銳的公開批評。雖然他們不可能直接反對文化大革命，也沒有直接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表示異議，但他們要求保持軍隊的穩定、團結和集中統一指揮，

⁹⁵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175～180。

要求繼承和發揚人民解放軍長期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堅持文化大革命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據劉志堅回憶：這兩次大會以後，「我在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會上見到江青，她氣急敗壞地指責說：『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關鋒也跳出來狂妄地點名指責陳、葉講話是錯誤的，要到群眾中去檢討，接受群眾教育。他們的這些誣蔑的話很快傳了出去，極「左」派學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立即氣焰囂張，大肆串連，並在街上刷出大標語，指責軍隊「執行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長又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狂妄地宣稱「陳毅、葉劍英講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必須批判」。後來四十多所軍事院校部分來京學生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⁹⁶

3 炮打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小組在對待群眾組織問題上，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對老紅衛兵和許多多數派組織則棄之如敝屣。這種明顯的支一派壓一派的作法，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作風，還有新崛起的造反派仗着中央文革小組的撐腰而有恃無恐、橫行霸道的行徑，引起了老紅衛兵和廣大多數派的不滿和憤恨。

早在1966年8月24日，北京航空學院的老紅衛兵賴銳銳、李明清等人就貼出題為〈炮轟……〉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大字報說：

毛主席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既然運動是他老人家親自發動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張革命的大字報又是經過了長期的籌備，首先又經過他老人家親自審閱過，對於派工作組的問題難道他老人家會不知道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當時在北京的黨中央常委究竟聽誰的？又是怎麼研究決定的，劉主席、周總理、鄧小平總書記等同志都做出了檢查，可是把責任承擔下來了

96 劉志堅：〈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頁50。

後，工作組又該擔負甚麼責任呢？沒有明確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學們對工作組的問題意見分歧很大。我們認為這是某些同志應該負責任的。

大字報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評價是：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不力、不全、有偏心。⁹⁷

11月13日和29日，陳毅、葉劍英等在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講話，批判了當時運動中的過火做法和過激行為，從黨的歷史經驗教訓，自己參加革命的經歷現身說法，指明「左」傾的危害。老師的針砭時弊、切中要害的講話通過傳單、小報很快傳開。雖然這次大會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但這些講話影響很大，許多學生贊同老師們的觀點，對文化大革命的「左」傾理論和做法開始產生懷疑以至抵制。

11月15日，北京農大附中高三(2)班學生劉振忠、張立才以伊林·滌西為筆名，寫了一張大字報〈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在清華大學貼出。〈公開信〉批評了林彪9月18日接見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總政宣傳部負責人時的談話中的兩個觀點：一個是「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另一個是「馬克思、列寧的書太多，讀不完，他們離我們又太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99%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大字報說：「『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錯誤的，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中是有害的。」⁹⁸在全國上下都在爭相吹捧林彪的時候，兩位中學生的膽識令人欽佩。

11月7日，北京「二司」內的少數派北航「紅旗」、輕工「紅鷹」等組織實行「宮廷政變」，造了「二司」的反，奪了「二司」的權，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三司」馬上表示堅決支持這一「革命行動」。11月12日，戚本禹在接見「二司」代表時說：「你們長期以來

97 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李明清、賴銳銳、王曉東、李洪瑞、劉福曾：〈炮轟……〉(1966年8月2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8 北農大附中學生伊林·滌西：〈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1966年11月1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厲害！」「這次宮廷政變，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賞。」戚本禹勸「二司」總部的成員「向真理投降」。⁹⁹ 11月下旬，北京礦業學院首都紅衛兵總部（原屬「二司」）聯合十幾個院校的多數派，成立「批判戚本禹聯絡站」，表示要對戚本禹的講話進行徹底批判。礦院首都紅衛兵「紅色游擊隊」在市內貼出「我們堅決要求和陳伯達辯論」，「戚本禹11月12日的講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等大標語。

11月25日至12月2日，北航紅衛兵八一縱隊連續貼出〈一問中央文革小組〉、〈二問中央文革小組〉、〈三問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質問中央文革小組為甚麼只支持「三司」？為甚麼寵愛北航「紅旗」？為甚麼支持揪着工作組不放？大字報提出質問：「是誰把『少數派』定為『左派』，把『多數派』打成『保皇派』，修正主義的呢？為甚麼允許『少數派』中某些人藉批判資產階級之名去鬥爭『多數派』呢？現階段全國性的群眾鬥群眾的局面不正是由此而引起的嗎？這難道執行的不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嗎？這個責任究竟要誰來負呢？」¹⁰⁰ 北航紅衛兵八一野戰兵團貼出〈也問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縱容少數派壓多數派」，提出反對「中央文革小組中某些同志的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領導」。¹⁰¹

11月27日，北京林業學院紅衛戰鬥兵團的李洪山貼出〈剖析戚本禹同志的講話——評戚本禹同志11月12日的講話〉的大字報，表示「戚本禹的反是造定了」。11月30日，李洪山等貼出「踢開中央文革，自己起來鬧革命」的大標語。12月1日，李洪山在林院辯論會上說：「中央文革產生不符合〈十六條〉」，「欽差大臣滿天飛」，「把譚力夫打成右派」。12月2日，林院紅衛戰鬥兵團及「一二九」、「永向黨」等組織貼出〈看中央文革小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一條甚麼路線？〉、〈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兩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文革小組執行了

99 戚本禹對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代表的講話（1966年11月1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這裏的「第三司令部」應為「第二司令部」。

100 北航紅衛兵八一縱隊：〈三問中央文革小組〉（1966年12月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1 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野戰兵團：〈也問中央文革小組〉（1966年12月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一條「左」傾路線。大字報說：「像這樣的中央文革小組，不踢開哪行呢？不解散哪行呢？」林院選在天安門兩側觀禮台上刷出大標語：「中央文革小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以上種種事實的出現，被造反派稱為「十一月黑風」。所謂「十一月黑風」，其實正是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抵制。

11月27日至30日，北京「三司」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和所屬組織代表會議，討論形勢和任務。會議提出：「兩條路線的鬥爭更激烈、更複雜、更尖銳、更明朗，黨內走資派於垂死之際，要瘋狂地掙扎和反撲，他們孤注一擲，在殘酷鎮壓革命群眾的同時，把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文革小組頭上，企圖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¹⁰² 27日晚，陳伯達、關鋒接見了到會人員及北航「紅旗」的代表，並講了話。12月4日，「三司」發動所屬組織在市內舉行了「一二·四大反擊行動」。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四周貼滿「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打垮階級敵人的新反撲」、「堅決擁護中央文革小組的正確領導」等巨幅標語。「三司」的宣傳車奔馳全市，不斷高呼着「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小組」等口號。當天出版的「三司」《首都紅衛兵報》發表〈打垮新的反撲〉一文。12月6日下午，在工人體育場舉行「全國革命造反派聯合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大會」，北京「三司」、全國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站、北航「紅旗」、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團赴京告狀團等在會上發言。大會通過了〈給毛主席的一封信〉和〈致全國革命造反者書〉。

12月4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紅雷戰鬥隊貼出題為〈中央文革小組的路線性錯誤必須批判〉的大字報。同日，在清華園內和北京市內都出現了大標語「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的資產階級陰謀分子！」

12月5日，林院、清華、人大等二十三個學校的學生一百四十多人集會，林學院紅衛戰鬥兵團的李洪山在這個集會上宣讀了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文章：〈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

102 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2.9—1967.10)〉(1967年9—10月)。

棵大毒草——評陳伯達同志的兩個月來運動的總結》。他的文章從四個方面批判陳伯達：一、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二、把矛頭指向群眾，轉移目標，是方向路線錯誤；三、以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名，行大罵群眾運動之實；四、給運動劃框框、定調子。清華大學學生易振亞在會上發言說：「說黨的領導就是毛主席的領導是錯誤的；林彪也可以懷疑，林彪的經驗沒有劉少奇豐富，劉少奇都會犯錯誤，林彪就肯定不犯錯誤嗎？文化大革命以來是一片黑暗；儘管江青的講話見報了，我們還是要批判。」

12月7日，地院鬥批改兵團的窮棒子造反兵團發表第一號公告，公開指責中央文革小組形「左」實右。

12月9日，清華大學紅衛兵的顏曉東貼出〈給毛主席的一封信〉的大字報，指出「10月3日之後，北京的運動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關鋒把全國說成漆黑一團，把無產階級專政說得搖搖欲墜，散布流言蜚語，企圖鎮壓革命左派，還自以為得意。其實，關鋒等人犯了嚴重的錯誤，是挑動全國性群眾鬥群眾的禍首，他們企圖挑動三司革命師生來保他們。關鋒、戚本禹很可能是野心家、陰謀家」。¹⁰³

12月10日，北京大學「虎山行」貼出大字報〈毛主席的大民主萬歲〉，文中說：「運動陰暗面很大，許多人厭戰情緒上升」，「群眾中對立情緒日趨嚴重」，「又出現了大規模的群眾鬥群眾的事件」，「炮轟中央文革小組，是運動發展到今天的必然，是運動發展的關鍵的關鍵」。大字報質問：「為甚麼中央文革小組就批評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頭！」12月11日，清華「雪蓮」印發傳單〈用毛澤東思想檢驗一切〉，批判陳伯達、江青的講話。李洪山貼出大字報〈江青同志的講話把運動引向何處——評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的講話〉。¹⁰⁴

103 清華大學紅衛兵戰士顏曉東：〈給毛主席的一封信〉（1966年12月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4 毛澤東對江青的這個講話稿有過多次批語和修改，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65。

這些講話、大字報、大標語的矛頭都是對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與領導者，大多數是直接指向中央文革小組的，中央文革小組很快就開始進行反擊。12月14日，陳伯達等人與「三司」、北航「紅旗」代表座談，康生在會上說：「對反革命分子實行嚴厲的鎮壓，這是最大的民主，……李洪山就是反革命小頭目。」「凡是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對中央文革態度的辯論是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江青在會上說：「別忘了咱們是無產階級專政。」¹⁰⁵ 12月中旬，公安機關逮捕了寫大字報、大標語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的人，有人為寫〈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伊林·滌西被捕鳴不平，也被逮捕，有人為「虎山行」的大字報辯護，也被逮捕。這種對反中央文革小組言行的鎮壓，很多是採取由造反派群眾組織扭送而公安機關收審的形式。中央文革小組在這種鎮壓中逐漸樹立起了自己的權威，廣大造反派紅衛兵也認定了要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知道緊跟中央文革小組就是緊跟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組的方向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而對許多老紅衛兵和多數派群眾來說，是壓而不服，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思潮依然存在。

4 「聯動」事件

在所有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力量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北京的「聯動」。「聯動」的全稱是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是由北京市海淀區十幾所中學的老紅衛兵發起的。

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華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學校的老紅衛兵在北大附中集會，商定聯合發起成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它的組織機構採用集體協商的辦法。各校派出一名聯絡員，主持常務工作，由京工附中學生于增壽任總聯絡員，總部設在北大附中，宣傳工作由北大附中負責，組織工作由石油附中負責，並委託北大附中的宮小吉起草「聯動」宣言。

105 中央文革與一司三司北航礦院等代表座談時的講話(1966年12月1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聯動」宣言全文如下：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員會誓死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為了粉碎一切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行為，時刻準備施行必要的行動。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形式乃是對當前運動的最大威脅，它威脅着革命群眾血汗換來的勝利果實，它將使群眾重新回到被專政、被壓迫的地位，它將奪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權利。它將使千百萬人頭落地，它將使歷史車輪倒轉。

它，威脅着我們！只有一條道路：拉起隊伍來，幹！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實需要自己去保衛，自己革命的權利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裏，保衛〈十六條〉，保衛我們的總司令部黨中央，保衛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死保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¹⁰⁶

「聯動」宣言由鋼院附中紅衛兵、礦院附中紅衛兵、師院附中紅衛兵、石油附中紅衛兵、京工附中紅衛兵、外語學院附中紅衛兵、農大附中紅衛兵、清華附中紅衛兵、北航附中紅衛兵、人大附中紅衛兵、地質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人大附中紅旗、八一學校八一革命軍、八一學校紅衛縱隊聯合簽署。

106 《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中所載〈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宣言〉與此基本相同，但在「保衛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處為「保衛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12月5日，「聯動」正式成立。這天夜裏，北京街頭出現了這樣一些標語：「熱烈歡呼聯合行動委員會成立！」「堅決擁護中央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¹⁰⁷「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表現形式！」京工附中鄒建平等人爬上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下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聯動」的組織形式非常鬆散，開始是以海淀區十幾個中學的老紅衛兵的名義發起，後來形成了全市贊成「聯動」觀點的老紅衛兵都自動成為「聯動」成員的局面。「聯動」的活動方式，基本上是人自為戰、校自為戰，而以「聯動」整體名義的活動就是召開了幾次全市性的大會。一些學校的老紅衛兵戴起了紅衛兵運動初創時曾採用過的無字紅袖章，意在喚起老紅衛兵的造反精神，許多「聯動」成員競相仿效。而所謂「聯動」內部以無字袖章的寬度來區別其地位高低的說法則屬訛傳。

12月6日，北大附中「紅旗」的牛皖平等十餘人來到「三司」所屬的一個組織，與他們辯論揪鬥老幹部問題，反對揪鬥老幹部。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宮，由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屆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籌備會上，「三司」代表提出整個活動應由他們獨攬，使會議陷於混亂，「聯動」代表馬曉軍等人和其他紅衛兵組織負責人據理力爭，最後迫使「三司」代表離開了會場。

12月中旬以後，中央文革小組開始嚴厲鎮壓「西糾」和一切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人。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江青提出要對「西糾」毫不留情地堅決鎮壓。她說：「對一小撮殺人犯、打人、破壞革命……這樣一小撮，我們要堅決地實行專政！」她在事先未向周恩來打招呼，當場突然點了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和不在場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和孔原、許明五個人的名字，指責他們為指使「西糾」幹壞事的「後台」，還逼周榮鑫、雍文濤到前台低頭認罪。江青說：「我希望你們對這些青年，犯了錯誤的同學們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幕後的、頑固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

107 指陳毅、葉劍英、賀龍、徐向前1966年11月13日在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的講話。

死不回頭的要鬥倒、鬥臭、鬥垮！」¹⁰⁸ 周恩來對江青的突然襲擊，非常憤怒，但仍盡力克制。他在講話中說：「總結這四個月的經驗，成績是主要的。新生的事物誕生以來不可能沒有毛病，沒有缺點，甚至也可能出現錯誤，乃至於個別的嚴重的錯誤，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你們不必為此驚慌。要曉得，任何一個新事物，一個新生的孩子，剛從胎裏出來毛手毛腳的，生一個瘡呀，長一個疤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總是要成長起來的。」¹⁰⁹ 出於對「西糾」和老紅衛兵的愛護，他在第二天接着召開的「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上，勸告各糾察隊馬上自動解散。他說：「我提議各校紅衛兵取消糾察隊的名字。糾察隊這個名字是你們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們自動取消，取消這個名字，不要我們命令。」¹¹⁰

12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北京「一司」、「二司」造反聯絡站、「三司」、「首都兵團」等造反派代表時，江青說：「北京的這一股歪風一定要鎮壓下去，給全國作個示範。對於那些打人多的、態度不好、年紀大一點的，可以鎮壓，一定要判刑，年輕的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紅衛兵糾察隊不管是甚麼樣的，都要解散。」關鋒也惡狠狠地說道：「把西城區糾察隊的後台揪出來，嚴重的槍斃。」¹¹¹ 12月23日，江青在一次接見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時指責「西糾」「凌駕於紅衛兵之上，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凌駕在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之上」，「對極少數人要專政。如不專政，你們的大民主沒保證，我們也沒保證」。她還說：「對極少數小傢伙專政，是一種教育，有的通過他們的家長，讓他們的子女自己去投案，這些人之中，

108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中學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2月1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9 中央首長在北京市中學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2月1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0 中央首長在全國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動路線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2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1 江青等接見首都大專院校代表時的座談紀要（1966年12月1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可能有將軍之子，元帥之子，國家主席、副主席之子，總理、副總理之子，部長、副部長之子。這些都不在話下。(拍桌子)誰要那樣幹！就得坐社會主義國家的牢。」¹¹²

「西糾」對於來自中央文革小組的強大壓力當然是不服氣的，他們要求與中央文革小組進行辯論。現在保存下來的「西糾」後期負責人藍小兵、駱小峰、王向榮等人給周榮鑫的一張便條上，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西糾」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強烈不滿情緒。這張便條是這樣寫的：「周榮鑫同志：汽車，我們半輛也不退!!!中央文革要我們解散，必須把原因講清楚。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中央文革負責!!!望周同志把這些話轉達給陳伯達同志，並告訴他我們全體西城糾察隊員找他！」之後不久，「西糾」的一些負責人董良翻、粟寒生、孔丹等陸續被投入監獄。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不斷出現「三司」、北航「紅旗」等造反派隨意抓人，把許多「炮打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扭送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事件，激起了「聯動」成員強烈的反抗情緒。

12月18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幾個人到清華大學貼出大標語「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遭到清華「井岡山」的圍攻和批鬥，其中一人被扭送公安部。

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大會，中央文革小組原來答應參加會議後又變卦，使一些「聯動」成員原來存有的「中央不會拋棄老紅衛兵」的幻想破滅。憤怒的「聯動」成員在大會上喊出了「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反對縱容、支持、鼓勵反革軍革幹子弟的行為！」「堅決打倒鎮壓中學運動的劊子手三司！」會後，「聯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發動了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攻勢。

12月28日，北京中學造反派紅衛兵為了表示與「聯動」針鋒相對的立場，由清華附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京工附中「紅旗」、人大附中「紅

¹¹² 中央首長接見首都紅衛兵代表的講話(1966年12月2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旗」、一〇一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北醫附中「東方紅」、地質附中「東方紅」、農大附中八一八紅衛兵等組織在二七劇場成立了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聯合行動委員會。但其影響不大，沒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

為了反對公安部隨意抓人和收審「三司」等造反派扭送的「聯動」成員，「聯動」於12月16日、28日、31日，1967年1月6日、7日、11日，六次衝擊公安部，在公安部的牆上刷上了「公安部執行一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1967年1月1日，「聯動」部分成員在一個通告中提出「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¹¹³

1月8日，清華附中紅衛兵成員以「延征」的筆名貼出了〈致中央文革〉的大字報，其中寫道：

且不說中央文革小組破壞了「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學生鬥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這一條寫到〈十六條〉上的規定，單是擅自動用公安機器鎮壓批評，踐踏〈十六條〉的做法，就是十分錯誤的。鎮壓批評，是國民黨的作風，是「左」傾機會主義的作風。國民黨害怕批評，禁止批評，誰批評他就逮捕誰，迫害誰。中央文革小組比我們熟悉黨史，當時誰批評，誰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中央，就給誰扣上一個「右派」的帽子，「反革命」的帽子，並加以逮捕，甚至槍斃。他們叫作「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中央文革小組今天的作法，同當時「左」傾機會主義的作法，何其相似乃爾！

「聯動」的所作所為逆文化大革命的潮流而動，言辭激烈，行動大膽，實在令中央文革小組不能容忍，因而很快遭到了殘酷的打擊和迫害。

113 這個通告的作者不詳，但通告中所說的組織似不曾存在，陶鐵柱在〈「聯動」與共產主義小組〉（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52—60)描述過有關故事，但情節離奇，不可輕信。

1967年1月17日，謝富治在講話中公開發布：「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¹¹⁴ 2月3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的社論，明確宣布「聯動」是反動組織。中央文革小組指使和鼓動「三司」、北航「紅旗」等造反派組織對「聯動」和與「聯動」類似的老紅衛兵組織進行圍剿。1966年12月下旬和1967年1月，北京多次發生所謂「砸聯動」事件，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公開對「聯動」和與「聯動」類似觀點的組織進行大規模地鎮壓，抄砸這些組織的總部，抓捕這些組織的頭頭。從1966年12月到1967年清明節，共有139人被以「聯動頭目」的罪名逮捕，關押在北京半步橋第一監獄。

為了搞臭「聯動」，在北京八一學校舉辦了「聯動罪行展覽」。在造反派的各種小報上經常刊載「聯動動態」，「聯動」被醜化成無惡不作的凶神惡煞。

由於對運動的不理解，由於包括自己父母在內的大批黨政幹部受到衝擊，一些老紅衛兵在嚴酷的事實面前陷入了深深的苦悶。確有少數人變得頹廢、墮落，打架滋事，但從「聯動」整體來說，在當時它能夠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及其工具「三司」，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5 「12·25」大行動

1966年12月中旬，在江青、張春橋等人的直接推動下，北京市掀起了一股「打倒劉少奇」的浪潮。當時中共中央對劉少奇的政策還是要「背靠背」地批判，而且不同意提「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周恩來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了這一點。

12月18日，江青、謝富治、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接見北京「一司」、「二司」造反聯絡站、「三司」的代表時，江青在講話中也說：「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問題，中央可以解決，現在搞他們不合適，不策

114 謝富治對公安部幹部的講話(1967年1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略。對於他們在黨內黨外的影響，群眾還需要一個認識過程。」但她同時又煽動說：「清華要揪王光美回去作檢討是可以的，我們支持。讓王光美回去作檢查，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來，他哪來的那麼多病呀！她與薄一波合夥搞蒯大富。」¹¹⁵

當天下午，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單獨召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負責人蒯大富。張春橋對蒯大富說：「中央那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¹¹⁶蒯大富受命回校，當晚就向井岡山紅衛兵的頭頭們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等組織作了通報，並以「大聯合」的名義，宣布聯合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隨即以井岡山兵團的名義召開「清華大學革命師生員工堅決鎮壓反革命妖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擊誓師大會」。

井岡山兵團發表決議：一、堅決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堅決要求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華作檢查，「向革命群眾認罪」；二、「對於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一小撮反革命走狗狠狠打擊，堅決鎮壓」。

20日至22日，蒯大富相繼召集井岡山兵團總部的頭頭和井岡山兵團全體人員開會，提出了要在12月24日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推向社會的行動計劃。當時井岡山兵團內部有不少人對此持反對意見。蒯大富煽動說：「這事中央不好講話，我們幹了，中央肯定會支持。」顯示了一種投機政客式的心理狀態。會議最後通過了蒯大富提出的行動計劃，不過把日期從24日推遲到25日。¹¹⁷

12月25日，蒯大富率領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五千餘人上街遊行示威。在天安門廣場，他們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

115 江青等接見首都大專院校代表時的座談紀要(1966年12月1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16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1980年11月2日)，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內部發行)，頁5。

117 參見《歷史的審判》，下冊，頁159。

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然後分頭向王府井大街、西單、北京火車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遊行，並張貼標語，散發傳單。主要口號有：「全國人民起來，徹底打垮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徹底打垮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撲！」清華井岡山兵團的廣播車還廣播了〈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十大罪狀〉和井岡山兵團要求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回清華作檢查的聲明。清華井岡山兵團的這次大行動在全北京市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編印的《快報》和清華井岡山編印的小報《井岡山》，分別向中央、向社會報道了這次行動的情況。蒯大富的直接目的，用他自己在1980年7月14日的親筆供詞中的話來說，就是「喚起全市人民和我們一起，打倒劉少奇」。¹¹⁸ 這一行動顯然是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的一個重大步驟。此後，「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在全國迅速傳播蔓延。

「12·25」大行動不應看作僅僅是江青、張春橋等人教唆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1966年12月，毛澤東有一系列關於批判劉少奇的言論：

「要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要進行全國性的大批判。」¹¹⁹

「單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會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¹²⁰

「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銳、更加集中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它是長期存在的東西。」¹²¹

「現在看起來，對劉少奇問題不能像過去那樣內外有別了，現在不公開批判不行了，要公開批判。」¹²²

118 參見《歷史的審判》，下冊，頁159。

119 張春橋與華東局造反派座談時的談話(1967年2月25日)，轉引自王年一：〈對上海「一月革命」的幾點看法〉，《黨史通訊》，1986年第2期，頁21。

120 轉引自席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載《回首「文革」》，上冊，頁100—101。

121 康生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22 轉引自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75。

「12·25」大行動後沒幾天，清華井岡山內部就出現了裂痕。總部成員唐偉、朱德明、許勝利等人宣布「自我罷官」，表示與蒯大富為首的總部決裂，自行成立毛澤東思想縱隊，實際上是對「12·25」大行動的抗議，也為日後清華園內兩大派的形成埋下了伏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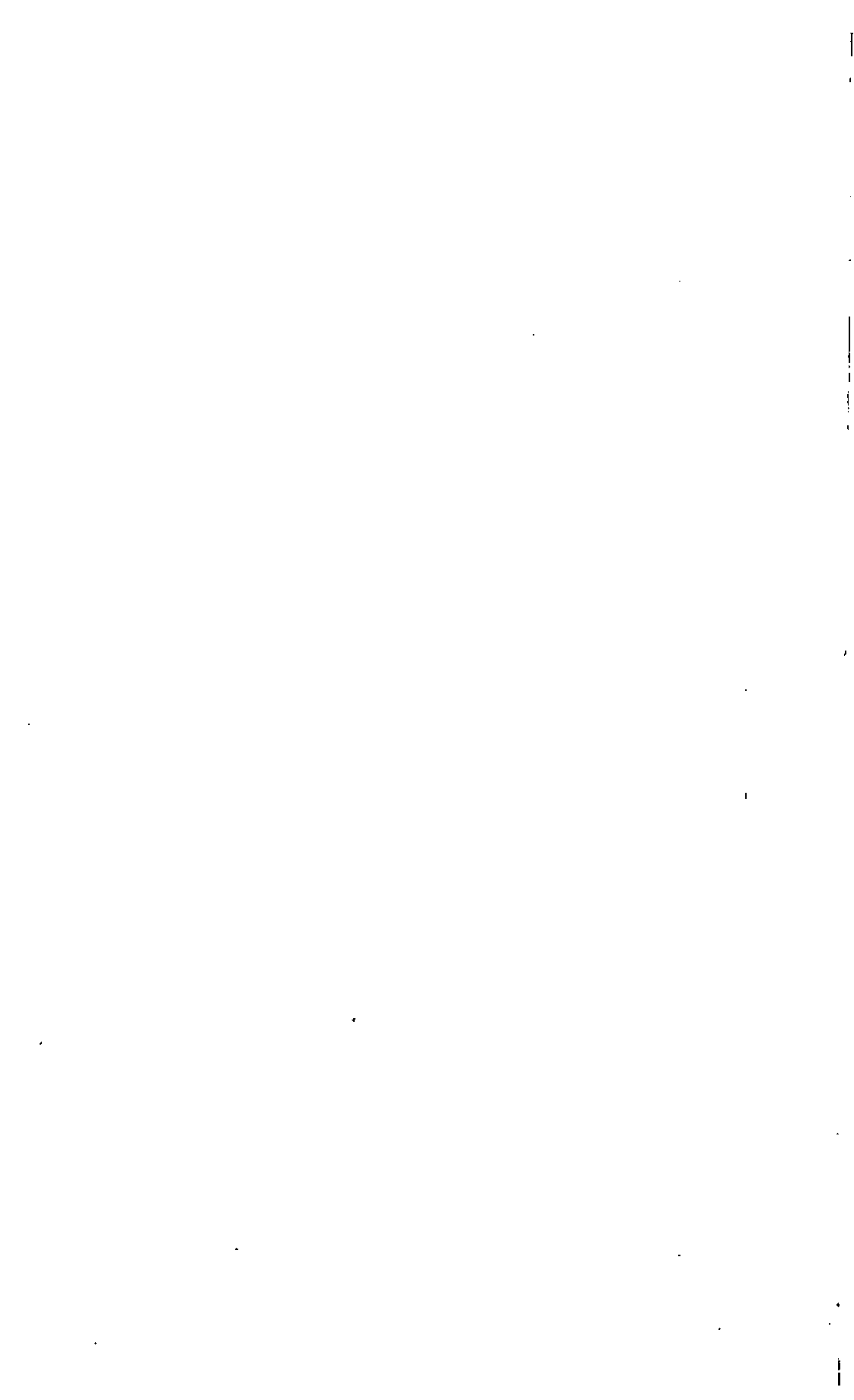
12月27日，北京「三司」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十餘萬人參加的「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聶元梓在大會上作題為〈向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發言，她說：「劉少奇、鄧小平從來也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利益，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12月26日由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等組織聯合成立的北師大井岡山公社的頭頭在大會的發言中，突出地攻擊了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說它「充分暴露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的醜惡靈魂」。

同一天，清華井岡山抄了薄一波的家。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等組織召開了批判、鬥爭周榮鑫、雍文濤的大會。

12月30日傍晚，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到清華大學，對清華井岡山蒯大富等人搞的「12·25」大行動表示「堅決支持」，並揚言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對他的處理只是時間問題。蒯大富深為自己投機得逞而洋洋得意，跟他的同夥們說：「江青這次親自來清華看我們，大大提高了我們清華井岡山的威望和影響，說明我們打倒劉少奇打對了，幹得好，幹得漂亮。」

據1980年3月13日蒯大富的供詞說：「提出打倒劉少奇，當時是出於我的內心，冒點風險也要闖，要立功，這中間也有個人思想，我如果立了功，就是頭功，冒些風險也要幹。」¹²³

123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163。



第五章

奪 權

奪權的概念在毛澤東的腦子裏恐怕是早就存在了。自從他退居二線後，對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人愈來愈不滿意，到了1965年搞〈二十三條〉時就有了把劉少奇「搞掉」的想法，其實也就是要從劉少奇手裏把權力奪回來。他甚至還認為，從中央到基層的工廠、機關、學校的權力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都需要奪權。¹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退居二線，毛澤東也始終擁有對黨和國家一切大政方針的決定權，他是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提出奪權問題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有了自上而下的奪權現象，如北京市委的改組、陳伯達對《人民日報》社的進駐等等，但都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的，而且都是針對一些個別部門所為，並非全面奪權。真正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開始於1967年初。

新中國建立以來，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是個絕無僅有的現象。即使是像周恩來、陳伯達這樣跟毛澤東關係很密切的人，一開始也不能

1 毛澤東在1969年4月九大期間的一次講話中，在論述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時說：「不管叫甚麼名字，總之是觸及了上層建築，從中央一直搞到工廠、機關、學校。過去這些都不在我們手裏，大都在國民黨手裏，都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裏，而且他們還有後台。」參見席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98—99。

接受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1967年1月15日，全國一百五十多個單位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聯合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出席了大會。陳伯達在會上講了話，他稱自下而上的奪權（「接管」）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他說：「剛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辦法，採取派群眾代表監督的方式，他們想偷懶，想讓我們忙得不得了，他們好坐山觀虎鬥。我們如用監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動一點，當然個別地方、個別機關也可用接管的辦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當的，因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要看我們笑話，要當心呀！」周恩來在陳講話後表示：「剛才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我完全同意。……剛才陳伯達同志說得對，我們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樣防止接管風。革命靠自己，每個工廠、單位，都應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組織起來，監督他們認真抓業務工作，不要讓他們躲在後面，叫我們上當。這提得及時，提得很對。」²

陳伯達、周恩來講話後，毛澤東很快知道了。他馬上召開會議，批評了陳伯達。毛澤東說，上海造反組織來奪上海市委的權，怎麼能說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呢？是他們（上海市委）採取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眾把他們的權奪了。毛澤東說，就是要奪權，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權。毛澤東然後講了一大篇話。王力、關鋒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寫成了一篇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發表在1967年《紅旗》雜誌第二期上（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³

《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說：

上海工人階級和其他革命群眾、革命幹部的偉大貢獻，就是他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無所

2 周恩來陳伯達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團體「抓革命促生產」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月15日），載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3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797—798。王力說是1月13日或14日開的十萬人大會，根據當時的傳單，可以判斷是1月15日。

畏懼地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舉行大反擊，創造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權的經驗，他們提供了正確的方針、政策、組織形式和鬥爭方法。……

上海的大革命，體現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和首創精神，體現了工人階級的革命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的經驗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絕不是極端民主化，絕不是小團體主義。只有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實行民主集中制，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才能集中力量打漂亮仗，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的經驗證明，必須緊緊把握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必須向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化等等，進行堅定的，不調和的鬥爭，堅持社會主義的大方向，維護社會主義的所有制，這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

上海革命群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目的是很鮮明的。這就是發動廣大群眾打垮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事業。⁴

所謂全面奪權，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甚麼單位、甚麼組織，一律都要進行奪權。在當年的宣傳媒體上，總是說要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中奪權。既然走資派只是一小撮，為甚麼還要號召所有的單位都進行奪權呢？因為在實踐中，根本無法分清誰是走資派，根本無法確定一個單位是屬於第幾類，既然分不清誰是

4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252—253。

走資派，無法確定一個單位的性質，那就乾脆來個一鍋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周恩來在1967年1月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一段話：「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呢？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該奪過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以後，是甚麼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⁵ 1月26日下午，周恩來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工交口各部委造反派代表。在接見中有人遞條子問：中央保余秋里，又要奪權，如何理解？周恩來回答：「這是兩回事嘛！外交部沒有爛也奪了權，陳毅還去祝賀。現在奪權，不完全是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才奪權，現在是連鎖反應，上海開始第一仗，《文匯報》提倡後，十號登了報。中央決定《人民日報》公布後，估計北京會產生連鎖反應，這是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周恩來進一步解釋說，如果要搞清楚當權派的性質後再奪權，就會出現爭論，時間就會拖得很長。周恩來說：「現在是連鎖反應，勢在必行。中央下了決心，因勢利導，幫助你們，由下而上的搞。」在這次接見中，周恩來提出了奪權的四項原則，即：左派奪權、聯合奪權、本單位為主、由本單位發展到全系統。⁶ 在此前後，周恩來還有一些關於奪權的講話，則強調不能一概而論地號召奪權。1967年2月20日，周恩來在介紹山西奪權情況的會議上說：「自1月號召奪權以來，不管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起來奪權，這樣，全黨全國還成甚麼樣子？怎麼解釋毛主席的偉大紅旗佔統治地位？這不等於把我們黨十七年的偉大革命和建設成就都抹煞了嗎？不能這樣，邏輯上也站不住嘛！」⁷

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808。王力說周是1月21日傳達的，不確，此次軍委擴大會議是1967年1月19日至20日召開的。

6 周恩來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講話(1967年1月2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 中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959。

一 「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

1 毛澤東的生日宴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七十三歲的生日。當晚，毛澤東、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赴家宴。晚宴並不豐盛，四菜一湯，每人一小碗麵條，外加烤白薯、煮玉米。陳、張、王、關、戚、姚六人應該算是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左派隊伍中最精銳的部份了。毛澤東對這些親信侃侃而談，直抒胸臆，講了他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觀點。當事人之一的王力對此有詳細的回憶：

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毛主席說：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連，大串連使全國革命聯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這些代表人物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的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文化大革命他們不是真搞，他們是兩面派，陰一套陽一套，用種種手段對抗革命路線，破壞群眾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最重要的手法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操縱一些群眾來壓制革命，保護他們自己。挑動武鬥，企圖製造混亂。他們總是把鬥爭矛頭指向群眾，指向革命路線，也就是指

向無產階級司令部。他們用「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製造宗派，搞亂階級陣線，來對抗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提倡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的血統論，不平反、不銷毀材料，還要秋後算賬。

他們為甚麼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甚麼，就叫作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倡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地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小撮人以及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就繳械了。現在，對這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叫他懸崖勒馬，如果再搞兩面派，他們就是和走資派同流合污，或者他們就是走資派。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說，最近時期出現新的局面，廣大工農兵起來了，衝破了各種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學生起了變化，發展壯大了，提高了，革命學生到工人、農民中去，同工農相結合。還有一個特點，黨和國家機關的革命幹部起來造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負責人的反。主力是工人，沒有學生和工人結合也不行，沒有機關幹部也不行。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

毛主席講話總的概念是：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吃飯時，毛主席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這話在吃飯前也說過。⁸……

毛主席說，抓革命才能促進生產，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決生產的方向道路問題，才能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規章制度，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毛主席說，有人藉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他們過去靠舊框框吃飯，離開舊的一套就不會走路，就不會說話。挑動群眾停止生產，挑動群眾鬥群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為走資派。任何阻擋這場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歷史潮流沖掉。毛主席說，我同陶鑄爭論的實質就是這個。……

毛主席還說，學生一定要下廠下鄉，把學生革命運動和工人農民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合成一體，才有一個幾億人的大軍，才能解決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各文化單位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和鬥批改不能孤立地搞，革命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應投入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真正明辨是非，知道為甚麼要搞文化大革命，為甚麼要搞兩條路線鬥爭，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究竟甚麼是對，甚麼是錯。這樣上層建築領域內的鬥批改才有真正的實質性的內容，才能達到改，改成新的一套。只有這樣結合起來，革命的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生才能了解中國的實際，中國的國情，也才能聽到工農

8 王力在另一處說，毛澤東的祝酒詞是：「為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乾杯」，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63。另據葉永烈《「文革」瑣記》（《新觀察》，1988年第9期）中說，毛澤東祝酒時說的是：「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另據《廖漢生回憶錄（續）》中說：「（1966年）12月30日，傳達毛澤東主席在29日發出的最新指示：『決心全面內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280）」

兵的聲音，才能有適合中國情況的上層建築，才能有適合中國情況的教育內容、教育制度和方法。才能使全部上層建築的機關、學校真正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中國國情、脫離根本宗旨。學生、文化機構、上層建築要同工人農民結合成一體，充分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向社會主義的敵人舉行總攻擊。

毛主席認為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制度（不是說社會主義制度，是說舊的規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舊紀律（對直接上級絕對服從）要搞掉。毛主席關於大民主的思想，就是這樣來的。他認為我們舊的一套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同蘇聯差不多，他認為大民主好，便於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毛主席說，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容易形成或已經形成少數人對群眾的壓制以至壓迫。毛主席還講了另一面，說我們的大民主必須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集中指導下的大民主，對革命群眾以及對方的不同意見，只能擺事實講道理，不能用強制方法壓制別人。在人民內部，不能只許自己發表意見，不許別人發表意見。那就違反了大民主。有人故意破壞無產階級大民主，製造武鬥，挑動群眾鬥群眾，壓制革命，這種破壞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作法，也就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保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沒有。因此我們的專政機關，必須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專政機關不能干涉甚至壓制民主，不能亂抓人。只能對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說怪話反對領導，而是真正去放毒藥）、製造交通事故、暗害、間諜活動這些現行反革命要專政，依法制裁。革命群眾要發動起來，幫助監督專政機關，保障實現無產階級大民主。毛主席反覆講，放毒不是指的思想上的問題，思想反動的，即使堅持資產階級思想，只要沒有違法，就不能抓。要擺事實講道理，同他辯論。……

毛主席說，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還不能說已經解決了。他說，這個鬥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說，文化大革命中少奇同志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只是兩條路線鬥爭的進一步暴露。這一鬥爭現在也沒有了結。劉少奇之後這鬥爭還是在鬥。各級、各個領域都存在這問題。(毛主席退居二線後)他們在黨內佔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響，清除這些影響，使各方面、各領域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還要作深入細緻的工作，還要有很長時間的鬥爭。對這一點必須有清醒的認識。緊緊抓住這一問題，是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的關鍵。⁹

2 打倒陶鑄

陶鑄自從到中央工作以後，就與江青、陳伯達等人發生了不少矛盾。陶鑄雖然主觀上也想緊跟毛澤東，但在實際行動上卻常常與毛背道而馳。陶鑄堅持文化大革命運動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堅持工礦企業和農村不搞運動，不能影響工農業生產的思想，被毛澤東認為是「企圖阻擋歷史潮流」。1966年11月下旬以後，對陶鑄的批判日益公開化。

11月28日，江青在北京舉行的「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發表講話，其中說到：「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¹⁰ 文藝界是陶鑄分管的，在中央領導人的排名上也排在陳、康之前，江青在文藝界的大會上，公然將陶鑄排斥於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之外，這實際上就是向造反派暗示：陶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

9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693—700。

10 陳伯達江青周恩來謝鐘忠吳德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2月19日，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慫恿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五個人貼出〈陶鑄同志貫徹執行的是甚麼路線〉的大字報。¹¹大字報指責陶鑄：一、是中央某些機關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關鍵人物；二、是扼殺中小學「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要角色；三、玩弄折衷主義、充當極少數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人物的「護法神」；四、把矛頭引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大字報貼出後即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大字報的作者受到圍攻。12月20日，戚本禹口授一信，用電話傳給大字報作者。信的全文如下：

你們幾次來信都收到了，謝謝你們。因忙於其他事情一直沒有答覆你們，請你們原諒。

我對你們部裏的事情，沒有調查研究，不能講甚麼意見，希望你們根據〈十六條〉和《紅旗》雜誌社論的精神進行討論，將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教育陣地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陣地，希望你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佔領這個陣地。關於李××、錢××、齊××、朱××、劉××五位同志給陶鑄同志寫大字報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可以寫的。對這張大字報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但是說這張大字報是「反革命」的大字報，針對這張大字報說：「誰反對陶鑄同志就砸爛他的狗頭。」這是錯誤的。有人把貼大字報的人說成「反革命」，進行圍攻、鬥爭，甚至扣押他們，更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這樣做。

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命的群眾必須同反對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的言論和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是革命的群眾也不允許任何人假借反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壓制革命。

戚本禹

1966、12、20

¹¹ 閻長貴：〈一張反對陶鑄大字報的出籠經過〉，《黨史博覽》，2003年第1期，頁48—56。

戚本禹的信，貌似溫和，實際上內含殺機，不經意間就將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是位於毛、林、周三人之後的全國第四號人物）置於不受保護的境地。所謂「可以寫」大字報，就是可以懷疑、可以打倒。

12月，陶鑄鑑於王任重身體不好（患有肝炎和肝硬化），又受到中央文革小組和武漢地區造反派的雙重壓力，給毛澤東寫了個報告，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首要的是應該讓他治病。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中央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12月27日、28日兩天，由周恩來主持，開了給王任重提意見的聯席會。中央文革小組諸人先向王任重提了一些意見，然後矛頭一轉，對準陶鑄開了火。批判的內容主要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繼續推行劉鄧反革命路線，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¹²

12月29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對江青等人未經中央討論，就擅自指責陶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一事提出批評。毛澤東對陶鑄說：「你為甚麼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接下來，毛澤東還說了陶鑄的一些好話，說陶鑄來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許多工作。陶鑄以為有毛澤東保了他，問題可能不會太大。

12月30日晚，陶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由北京南下串連的紅衛兵和武漢地區高校造反派代表組成的「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陶鑄在接見前提出了三點建議：一、不要搞錄音，會後雙方合作搞一份談話紀要。二、讓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參加（是被造反派從廣州揪來北京的）。三、派代表提問，集中回答問題。而造反派態度強硬，偏偏對着幹，一是非錄音不可，二是堅決不讓李一清參加，三是任意提問。造

12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442—443。

反派的一個頭頭說：「今天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而不是你接見我們。所以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你必須老實回答！」陶鑄說：「你們這種會議形式，對我是不恰當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組成員，是接見你們，你們這種形式是不恰當的，這種形式我不贊成。」¹³雙方僵持不下，造反派「勒令」陶鑄回答問題，陶鑄被激怒了，他向造反派大聲提出抗議。這正中造反派的下懷，他們故意擴大事態，說陶鑄鎮壓群眾，並強行把雙方爭論的錄音帶帶走，甚至企圖把陶鑄也揪走。警衛人員怕發生意外，於是進入會場執行任務。他們身上帶着槍，造反派又借此製造事端，說陶鑄運用武力鎮壓群眾。長達六個小時的接見以陶鑄最後承認自己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靜而結束。

1967年1月4日下午2時，陳伯達、康生、江青在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時，宣布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陳伯達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是同他有關係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後來變本加厲。……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那個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跟我們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他獨斷專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組，而且背着中央。你們揭得很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康生說：「同學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¹⁴而這個時候陶鑄正在人民大會堂的另一個房間裏與周恩來商談政治局會議準備議定的事項。¹⁵

打倒陶鑄，早有徵兆可見。1966年12月下旬，由學部「紅衛兵聯隊」、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師大「井岡山」、人民教育出版社「紅旗戰鬥聯隊」等組織發起，成立了「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

13 陶鑄回答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問題(1966年12月3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4 陳伯達等對「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指示(1967年1月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07。

(簡稱「批陶聯委會」)，開展聲討陶鑄的活動。1967年1月3日，「批陶聯委會」各單位開入中宣部造反，把「過去閻王殿，今日鬼門關——徹底砸爛」的對聯和「打倒陶鑄」、「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標語貼到了中宣部，並在中宣部大樓裏設立了聯委會的辦公室。1月4日晚7時半，「批陶聯委會」獲悉江青、陳伯達關於打倒陶鑄的講話後，召集北京和外地組織數千人，排成五路縱隊，開向中南海。他們在中南海門前靜坐，要求陶鑄接見。當中包括北醫「八一八」、地質「東方紅」、人大「紅旗」、「紅衛兵」、「東方紅公社」、北工大「東方紅」等組織，還有外地的浙江美院、南京大學等院校的學生數千人。至午夜零時50分，周恩來指示，可派三五個代表進入中南海商談。靜坐學生推舉北師大「井岡山」等五個單位各派一人參加。有三輛廣播車在中南海門外輪番廣播〈敦促陶鑄投降書〉、〈陶鑄論陶鑄〉等文章。¹⁶周恩來在接見「批陶聯委會」代表時說：「陶鑄同志是中央常委，現在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合適，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討論。」¹⁷

江青等人未經毛澤東同意，就擅自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身為政治局常委的陶鑄，此事令毛澤東大為不快，幾次批評了江青、陳伯達。但毛澤東批評的主要是江青等人事先未向他報告，批評的是程序問題而不是實質問題。對陶鑄，毛澤東是早就不滿意了。1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陶鑄問題，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¹⁸

在陶鑄被打倒的同一天，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也被打倒了。1967年初，由軍隊院校學生組成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決定在1月5日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指名要陳毅、葉劍英到會「接受教育」。周恩來知

16 參見《首都紅衛兵》報1967年1月6日的文章：〈大扒手陶鑄已成囊中之蟹〉。

1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08。

18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83。

道此事後，於1月3日中午到釣魚台，與中央文革小組協商，江青等人表示同意周提出的勸說學生們不要開這個會。1月3日和4日兩個晚上，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的成員、總參、總政的負責人以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的代表，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開會。經勸說，學生們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表示原定1月5日的大會不開了。劉志堅遵照周恩來顧全大局的指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事前，周恩來悄悄向劉打過招呼，建議為了緩和學生們把矛頭指向老師的激烈情緒，是否由全軍文革小組承擔一些責任。劉志堅在會上說：我是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有些情況向葉帥、陳總及時匯報反映不夠，他們對有些情況不太了解，因此講話當中難免有某些不妥當的地方，這個應當由我來承擔責任。我有折中主義的思想，又想發動群眾，又害怕搞亂……此時，康生突然打斷劉志堅的話，拍着桌子說：「劉志堅，你不是甚麼折中主義，你就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這個會要開，要批，要鬥，就是要批鬥你劉志堅！」據劉志堅事後了解，「康生、江青、陳伯達等曾利用會議休息時間，悄悄乘車去林彪處商量的大約一個小時才回來。很明顯，把我拋出去交學生批鬥，這是林彪、江青等人事先策劃好了的」。¹⁹

1月8日，林彪在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宣布關鋒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1月11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發出改組全軍文革小組的通知。新的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組長：徐向前

顧問：江青

副組長：蕭華、楊成武、王新亭、徐立清、關鋒、謝鏜忠、李曼村

組員：王宏坤、余立金、劉華清、唐平鏞、胡痴、葉群、王烽、和谷岩、張濤。

將劉志堅這個「車」拋出去，很明顯是為了保陳、葉等「帥」，這一招學生們也能看得懂。一些極端的學生不依不饒，堅持要批鬥陳、葉

¹⁹ 劉志堅：〈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51。

等人。於是，原來的「批資籌備處」分裂為「一籌」、「二籌」。「一籌」是所謂「上揪派」，不滿足於批鬥劉志堅，堅持要批陳、葉。「二籌」則表示同意批鬥劉志堅而不上揪陳、葉等人。1月19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批鬥劉志堅的萬人大會。

3 寒冷的冬天

這一年的冬天，是個寒冷的冬天。

歷時半年的文化大革命，起起伏伏，大哄大嗡，已經把整個中國搞得天翻地覆，混亂不堪。在這場大動亂中，許多老革命家慘遭劫難。

12月13日，江青在接見軍事院校代表時說：你們紅衛兵這也能，那也能，怎麼就不能把彭德懷揪回來呀？讓他在大山裏頭養神，將來好回來反我們，把我們打入十八層地獄呀！之後，戚本禹指使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的頭頭朱成昭 and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頭頭韓愛晶，派人到四川揪彭德懷。12月27日，彭德懷被揪回北京。後經周恩來安排，將彭送到北京衛戍區監護起來。

1967年1月10日，「戚本禹奉江青之命，開會布置揪鬥朱老總。就在這天晚上，一夥人闖到朱老總住處。正巧這晚朱總不在家，那些人就在門前和牆上貼滿『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軍閥』、『炮轟朱德』等大字報。接着，北京街頭也出現了『打倒朱德』的大標語」。²⁰ 戚本禹還到中國人民大學，鼓動造反派揪鬥曾當過朱德秘書的副校長孫泱。²¹ 由人民大學紅衛兵、紅衛隊、紅衛軍聯合組成的人大「三紅」成為批判朱德最賣力氣的群眾組織。他們的大字報和大標語貼遍了整個北京城。他們對朱德的批判並無多少實際內容，使用了許多空洞的口號和粗俗的辱罵之詞。²² 在民主革命時期，朱毛並稱，同是中國共產黨的

20 紀學：〈最後的十年——康克清談朱德同志〉，《解放軍報》，1986年11月29日。

21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下冊（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頁14。

22 人大「三紅」的標語有「殺豬頭，挖豬心」等語。

代表人物。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一邊把毛吹到天上，一邊將朱罵成一錢不值，令多少人歎歎不止。

1966年9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打招呼」，說賀龍有問題。9月14日，毛澤東將賀龍找去，說了些「我對你是了解的」、「我當你的保皇派」之類的話，但並沒有真正要保賀龍。此後，賀龍被剝奪了參加軍委常委會的權力。10月，「打招呼」的範圍擴大到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12月，江青在一次接見群眾的會上公開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不久，賀龍的家也被抄了。賀龍幾次搬家，「但是每轉移到一個地方，就有人來揪鬥」。²³ 1967年1月9日，林彪主持軍委擴大會議，在會上將賀龍說成是「大軍閥」、「大土匪」。此後，賀龍即被打倒。

1月12日，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直接指揮下，中南海內的造反派於當晚強行闖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住處，分別召開了對他們的批鬥會。²⁴

各級黨、政、軍幹部普遍受到衝擊、批判。他們要在大會、小會上接受批鬥，還要沒完沒了地檢查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群眾性的批判、鬥爭，很多是非理性的，充滿了暴力的色彩，一批領導幹部被迫害致死。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1967年1月8日)、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1967年1月21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1967年1月22日)。

張霖之的死最為慘烈。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北京學生造反派代表，會上江青講話中稱「張霖之是彭真死黨」²⁵。當時正在大慶休養的張霖之趕回北京，並於12月19日主動到北京礦業學院聽取意見，被造反派扣押。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群眾大會上說：「煤炭部張霖之是彭真的死黨，炮轟煤炭部一小撮

23 薛明：〈向黨和人民的報告——憶賀龍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頁131—132。

24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9。

25 早在1965年初中央討論〈二十三條〉時，毛澤東就曾稱張霖之為走資派。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做得很對，做得很好！但要打倒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這個炮火還不夠，還要繼續炮轟，狠狠地打擊！」此後，張霖之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遭到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部的造反派的殘酷鬥爭。張被毒打致死後，遺體上有三十二處傷，頸部有幾個血洞，慘不忍睹。據張霖之夫人李蘊華講：對張霖之的批鬥有記錄可查的是五十五次。1967年1月22日，通知家屬前去看望，趕到那裏造反派通知說張霖之已經死了。前一天的白天，他們給張霖之戴上六七十斤重的鐵帽子，用繩子栓住，跪着挨鬥。晚上不讓他睡覺，脖子上掛一個用布包着的鐵爐子，勒得脖子上一道很深的傷痕，跪在小凳子上不許動，一動就踢倒凳子，連人帶爐子一起摔下來。就這樣逼供了整整一夜。到天剛亮的5點多鐘，被殘酷地折磨死了。²⁶

周恩來得知張霖之慘死的消息後，一方面在公安部對張霖之的死組織調查，一方面採取緊急措施保護其他各部委負責人。他以召開生產會議的名義，將各部部長集中到中南海，讓他們休息。一機部部長段君毅、八機部部長陳正人、冶金部部長呂東、水電部部長劉瀾波等十幾個部委負責人，因此得以暫時喘息。周恩來還規定，批鬥部長須經國務院同意，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劉瀾波曾對此發出感嘆：「霖之同志的死救了我們大夥。」²⁷

二 「一月革命」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

26 參見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15—16。

27 俞鹿：〈周恩來、鄧小平與張霖之的平反昭雪〉，《縱橫》，2002年第7期，頁4。1992年11月，國家民政部批准張霖之為革命烈士，證書上寫着：「張霖之同志於1967年壯烈犧牲，經批准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

開總攻擊的一年」。在此號召下，發生了使全國性動亂進一步加劇的上海「一月革命」。

1 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18日下午，以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為首的機關造反派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了「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徐景賢、副書記郭仁傑等響應張春橋、姚文元的號召，於此前幾日率寫作班全體人員起來造了市委的反，他們還串連市委機關內部的造反派，聲稱要搞「心臟爆炸」、「後院起火」。徐景賢等人聯絡了《支部生活》造反隊、市委辦公廳造反兵團、市委黨校革命造反聯合戰鬥隊共同發起了批鬥市委大會。他們的行動得到了上海「紅革會」和「工總司」等造反組織的支持。「紅革會」動員了八千多人前來助威，「工總司」也派了一千五百多人到會聲援。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書記、市委常委以及部、局級領導幹部均被「勒令」到場接受批鬥。會場四周懸掛着的大幅標語上寫着：「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²⁸ 市委寫作班在大會上宣讀了集體〈造反聲明〉，徐景賢作了〈造反才知主席親〉的長篇發言。發言中稱：上海市委「始終貫徹執行了一條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海的黨組織「從上到下貫徹了一條黑線」。會後發行了十萬份題為〈市委心臟爆炸，曹家後院起火〉的會刊。

這次大會後成立了「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聯站」），徐景賢、郭仁傑、王承龍²⁹等為負責人。該聯絡站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成為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辦事機構。上海市委後院起火後，市委、市人委以及各局、區、縣造反組織林立，揪鬥單位領導幹部成風，上海市的黨政機關工作陷於癱瘓。

28 陳丕顯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曹荻秋任市委副書記、市長，楊西光任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常溪萍任市委教育衛生部部長。

29 王承龍當時為《支部生活》造反隊負責人。

12月23日，上海「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市委「資反路線」大會，要求市委承認「赤衛隊」為革命群眾組織，制止「工總司」的打、砸、搶活動、反對張春橋簽字同意的「雙五條」、要求張春橋回上海作檢查等八項要求，曹荻秋被迫簽字同意了「赤衛隊」的要求。25日，「工總司」又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大會，把曹荻秋揪到會場，迫使他當眾宣布同「赤衛隊」簽字的八條作廢，「赤衛隊」是「保皇組織」。28日下午，二萬多名「赤衛隊」成員陸續來到康平路市委機關，要求市委領導人澄清是非。29日上午，曹荻秋同「赤衛隊」談判後，承認「赤衛隊」是合法的群眾性組織。「赤衛隊」準備下午撤離康平路。「工總司」以「赤衛隊」抄了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為名，調集十多萬名「工總司」的造反隊員包圍、控制了以康平路為中心的周圍道路，不讓「赤衛隊」撤出。

30日凌晨2時，「工總司」一派手持長矛、木棍衝進康平路市委機關大院，對手無寸鐵的赤衛隊員進行圍攻和毆打。「工人造反隊員開始向康平路的赤衛隊員衝擊，到六點多鐘，康平路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七點鐘，近二萬名赤衛隊員排成單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六大堆。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傷送至醫院治療。工人造反隊員還繳獲幾百箱餅乾。」³⁰「赤衛隊」三百多名骨幹被「工總司」扣押。當晚，「赤衛隊」總部被解散，各區的大部分「赤衛隊」基層組織相繼被砸。31日，約二萬名「赤衛隊」成員北上赴京告狀，被阻於上海郊區昆山縣。上海鐵路局調度所八十多人中，七十多人是赤衛隊員，被迫離開了工作崗位，這樣就造成運輸無人指揮，上海鐵路交通中斷。從30日凌晨到31日的二十六小時中，停開客車二十六列，五萬多旅客不能乘車，五萬多旅客被阻於中途；停開貨車三十八列，中途停車二十二列，貨物積壓數萬噸。在當時群眾組織林立，幹部普遍受衝擊，黨政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再加上這一嚴重事件，使上海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於極度混亂。³¹

30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草稿），1969年。

31 金春明：〈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後後〉，《黨史通訊》，1983年第18期，頁19。

2 兩報奪權

1967年1月3日晚，《文匯報》社造反組織「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奪了《文匯報》社的領導權，接管了報社。第二天，《文匯報》以套紅標題刊登了他們的奪權聲明——〈告讀者書〉，這是上海第一個宣布奪權的單位。1月5日，《解放日報》社由造反派宣告奪權。1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該報社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告讀者書〉，宣布接管《解放日報》，並稱：「舊的《解放日報》對黨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必須徹底批判，徹底改造。我們《解放日報》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有責任接管《解放日報》的領導權，《解放日報》就是要成為革命左派的報紙，就是要成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專政工具，就是要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堅強陣地。這個陣地我們是佔定了，這個權我們是奪定了。」

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從北京回到上海。他們肯定兩報社奪權「大方向是正確的」。在1月7日到9日的三天裏，張、姚五次接見《文匯報》、《解放日報》和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造反派，對他們的奪權行動鼓勵有加。

此時的上海，出現了一股要錢要物、搶佔住房、化公為私、任意揮霍國家財產的經濟主義之風。據李遜在〈「文革」中發生在上海的「經濟主義風」〉一文中說：

在上海，最先提出經濟要求的不是工廠的正式職工，而是沒有穩定職業的臨時工、合同工和外發加工的外包工，還有曾經在上海工作過後來被動員回鄉的「回鄉支農」職工；以後又進一步發展到支援內地的職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文革」中上海在職職工提出經濟要求始於1966年12月27日。當日，上海港務局所屬九區的部份學徒工在搶「黑材料」（即搶人事檔案）時發現一份有關學徒工工資的上級文件。對照這份文件，他們認為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於是到局裏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局黨委書記李廣發字同意補發一年。³² 這個消息

32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一經傳開，各單位的在職職工紛紛起而效仿。十幾年來習慣於被動地等着黨和政府分配利益的職工們，一旦發現自己能有主動爭取經濟利益的機會，馬上尋找各種理由與當權者談判。幾天之內，這股風便迅猛地席捲了幾乎所有的工廠和企業。所有的局長、處長、科長都成了寶貝，被人們爭先恐後地搶來搶去，逼着在各種經濟要求的紙條上簽字。

非正式職工以及已經去外地的職工提出的要求只是改變身份，而在職職工的要求則直接指向經濟利益。

據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967年4月統計：上海在1967年1月經濟主義風潮中，僅增加、補發職工工資、獎金、津貼、福利費，分掉工會節餘經費、集體公積金、股金，以及發放串連費、物資等等，就耗資3500萬元至4000萬元。³³其中，華東電業管理局1967年1月5日一天便為所屬工廠提取補發工資128萬元，相當於該局四個月的工資總數。³⁴僅1966年12月30日到1967年1月3日的短短五天裏，全上海被搶佔的公房有2.2萬平方米，私房被搶佔的有30多萬平方米。

周恩來於1967年元旦凌晨打電話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要他出面妥善解決上海面臨的嚴重問題，貫徹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並特別強調要與群眾組織協商，一起解決上海的困難局面。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陳丕顯通知各群眾組織負責人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商定了一些解決辦法，並決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傳單。會後根據會議精神，由造反派組織代表³⁵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進攻——急告全市人民書〉（《人民日報》轉載時將「急告全市人民書」改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傳單。「工總司」、「紅革會」、「炮司」等十一個群眾組織同意簽名，

33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清理經濟風時所發款項並要求退還的工作情況總結〉，1967年4月。

34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反對經濟主義聯絡總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1966年11月—1967年3月15日〉（討論稿），1967年3月17日。

35 主要執筆者是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到上海串連的紅衛兵舒澤池。

由陳丕顯簽發，印二十萬份在全市散發、張貼。1月5日，《文匯報》頭版頭條刊出了這份傳單。經濟主義之風愈颯愈甚，至1月6日，全上海市銀行各區辦事處被搶提一空。1月8日，上海三十二個群眾組織負責人開會，決定起草一個〈緊急通告〉，並推選「紅革會」和「機聯站」代表起草，提出了反對經濟主義的九條措施。陳丕顯等出席了這次會議。1月9日，《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了〈緊急通告〉。

1月8日晚，毛澤東在一個小範圍的會議上高度讚揚了上海兩報的奪權，他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5日的告全市人民書可轉載、廣播」，「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全國就有希望。」「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起來，就管住了。」「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³⁶ 1月10日，毛澤東對江青送來的兩篇新華社電訊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文匯報》《解放日報》記者評述上海地區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作出批示：「（一）此兩件很好；（二）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³⁷

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發出賀電。中央文革

36 1967年1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讓毛澤東思想佔領報紙陣地〉的社論，其中引用了毛澤東1月8日的談話：「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事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

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86。

小組第一次得以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這是毛澤東提升中央文革小組地位的一次重要舉動。2月初，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³⁸ 賀電中說：「你們在1967年1月9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³⁹

3 打倒市委大會

張春橋、姚文元回到上海後，頻繁召集徐景賢、王承龍、王洪文等開會，鼓動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奪權。張春橋說：對市委不必再抱甚麼幻想，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他還強調：通過打倒陳、曹大會，可以使全市人民知道陳、曹已經打倒了，不再承認舊市委的領導。「工總司」、「機聯站」等組織具體籌備了打倒市委大會。大會的名稱定為「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

1月6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三十二個全市性的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了十萬餘人參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大會批鬥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韓哲一、王一平、馬天水、梁國斌、楊西光等人，並把部局級以上領導幹部數百人拉到台上「陪鬥」。全市共設369個分會場，通過十四個廣播中轉站向全市市民廣播，電視台同時播放實況。大會發出了三個通令，第一號通令，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省市長。由造反派對他實行監督勞動。第二號通令，要陳丕顯在七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

38 王力說：「這件事後來我問毛主席，我說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並列，合適嗎？我的概念中，文革小組是常委的參謀秘書機構，怎麼成了權力機構？我還說政治局不能同中央並列，書記處也沒有同中央並列過，文革小組怎麼能同中央並列？毛主席笑而不答，說『就是要這樣好』。我想可能非常時期要用非常的形式，也就不再提了。」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95。

39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44—245。

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第三號通令說：大會認為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請求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徹底改組。張、姚在向中央匯報的〈情況簡報〉中說：「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勢大好。」這次大會之後，上海市的黨政機關癱瘓，全市的實際領導權歸於張、姚之手。

1月8日，以「工總司」和「工總司」交通六局（鐵路、海港、海運、長航、交通、郵電）聯合指揮部為主，「機聯站」、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等的代表參加，共四十餘人，聯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奪取了上海交通運輸大權。張春橋說，這個火線指揮部「實際上也是一種新的政權形式」，「可稱為『經濟蘇維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1月13日，張春橋在全市造反派組織座談會上公開表示支持造反組織衝砸公安局，奪取公安局的領導權。張說：上海公安局不僅已經癱瘓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不少壞事，成了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支持造反派成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文保會」），行使公、檢、法機關的職能。「文保會」由「工總司」等十五個組織組成，王洪文任主任。他們宣稱「文保會」是「參加接待、調解工廠、企業、學校兩派糾紛，負責全市性的集會，維持全市治安」。「文保會」實際上成為「工總司」等造反組織鎮壓反對派的工具。3月1日，上海市政法指揮部成立，「文保會」保留組織名義，停止一切活動，政法指揮部完全取代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等專政機構。

從1月11日起，上海奪權進入高潮。三天內，市、區、縣、局級單位有四十九個被奪權。有的是造反派上下、內外結合奪權，有的是本機關造反派奪權，也有外單位造反派前去奪權的。甚至銀行、電視台也相繼被奪權。根據中共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後來對銀行、電視台、交通等要害部門實行了軍事管制。

1月16日，毛澤東批准了上海市的奪權。他在中央碰頭會上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⁴⁰ 當

4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13。

天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了評論員的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章說：

光榮的上海工人階級，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組成了百萬革命造反大軍。他們聯合其他革命組織，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中奪了權，建立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上海工人階級和其他革命群眾、革命幹部的偉大貢獻，就是他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無所畏懼地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舉行大反擊，創造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奪權的經驗，他們提供了正確的方針、政策、組織形式和鬥爭方法。⁴¹

實際上，這個時候還不能說上海已經完成了奪權。雖然從總體上說，原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等黨政機關確實已經被擊垮，已經喪失了對局勢的控制能力，但新的代替它的權力機構並未成立，造反派組織還不能以政權名義發號施令。

4 炮打張春橋事件

從1967年1月中旬到2月初，上海先後發生過四次奪權行動。當時，上海各主要造反組織正在醞釀全市性的奪權和籌備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事宜。少數組織因利益分配不均等原因數次發難。

第一次，1月15日凌晨，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與「工總司二兵團」等組織宣布奪權。

第二次，1月22日中午，「上三司」再次宣布奪權。

第三次，1月24日晚，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

4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51—252。

會)聯合「機聯站」、「工總司」、「農司」的一些人突然奪取了上海市委、華東局和十個區的大印，宣布奪權。

第四次，2月2日，以「工總司二兵團」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大聯委」)宣布奪權。

這幾次奪權活動事先沒有取得張春橋、姚文元的同意，被認為是干擾了他們的戰略部署，均以失敗告終。「上三司」奪權失敗後被鎮壓，負責人被抓。「紅革會」、「二兵團」等組織也遭到張、姚的排斥，因此對張、姚極為不滿。張春橋歷史上曾經化名「狄克」攻擊魯迅，以及其妻李文靜歷史上曾被日偽逮捕後自首等事實，也在此時被一些群眾組織所了解。

1月23日，復旦大學「孫悟空」戰鬥組在外灘貼出「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標語。⁴²以後，各種質問、批判張春橋的大字報陸續出現在上海的鬧市區。大字報的題目有：〈一問張春橋〉、〈為甚麼——二十問張春橋〉等。

為進一步搜集張春橋的材料，1月27日夜，「紅革會」在上海市委黨校將徐景賢綁架到復旦大學扣押起來，令其交代寫作班和張春橋的問題。上海警備區根據張春橋的命令，由警備師政委徐海濤率四個摩托車排和一個步兵連，全副武裝包圍了復旦大學。這種嚴厲的舉動引起了「紅革會」學生的憤慨，把部隊堵在校門外，質問是誰派部隊鎮壓紅衛兵。相持數小時後，部隊撤離。「紅革會」在全市散發〈一二八事件真相〉傳單，在南京路貼出「張春橋是調動解放軍鎮壓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禍首」的大幅標語。

1月28日晚，「紅革會」系統和「上三司」等組織代表在中蘇友好大廈(現上海展覽中心)開會，決定進一步炮打張春橋。張春橋、姚文元主動到場，接見各高校「紅革會」負責人。張、姚受到在場的近百人的圍攻達六小時之久。會場上不時響起陣陣口號聲：「張春橋是兩面派！」「打倒徐景賢！」「砸爛寫作班！」

42 1月22日，張春橋接見上海各造反組織時，透露了這樣的信息：毛澤東同意張春橋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姚文元當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副市長。

1月29日晚，在復旦大學禮堂，「紅革會」聯合其他八個組織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會上決定，第二天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全市炮打張春橋的十萬人大會。

炮打張春橋的事件發生後，張、姚緊急向北京匯報求援。30日凌晨，王力根據張春橋的意見，並經陳伯達、江青同意，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起草了特急電報。電文如下：

一、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以陳丕顯、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

二、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無理綁架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同志，必須立即釋放，並向他們道歉。

三、中國人民解放軍採取保護革命群眾組織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扣押了人民解放軍的師政委，是十分錯誤的，絕對不能容許的。

四、各群眾組織內部之間的爭執，應當採取協商談判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應當用綁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紅革會的老同學們，幫助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⁴³

張春橋接到電報，立即批示：「印八開，二十萬份，立即出動廣播車，廣為宣傳散發。」同時，王洪文受命一面派人到街上覆蓋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大標語，一面緊急調動人馬封鎖人民廣場，準備衝擊會

43 王力說：「給上海的電報是我起草的，但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毛主席定的調子，當面對我講的，我記下來，又經過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我把它整理成文，文革小組討論通過，江青送給毛主席，告訴主席這是王力根據主席意思起草的。毛主席說：很好，有革命氣魄（不是說有造反派氣魄），還說了很多好話，毛主席很得意。」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878。

場抓人。在這種形勢下，「紅革會」被迫取消了預定的全市大會和示威遊行，釋放了徐景賢。隨着炮打張春橋行動的失敗，上海最大的紅衛兵組織「紅革會」受到沉重打擊，其市級組織由此被搞垮。

「一二八」炮打事件後，在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中反對張春橋的活動並沒有停止。1968年4月，上海發生第二次炮打張春橋，即「四一二」炮打事件。

5 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市黨政機關癱瘓之後，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工總司」等即在張春橋的布置下籌備建立新的權力機構。1月19日，在「工總司」等造反組織負責人會議上，決定要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新的權力機構，並將這個機構定名為「新上海公社」。後經張春橋與陳伯達、王力商定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⁴⁴1月中旬，徐景賢讓人在外灘一座高樓上掛出四條巨幅標語，內容是：「歡迎張春橋同志當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歡迎姚文元同志當上海市委第二書記！」「歡迎張春橋同志當上海市市長！」「歡迎姚文元同志當上海市副市長！」

在公社籌備過程中，張春橋多次使用了「一月革命」這個詞。他說：「一月革命的勝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心裏」，「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爛了被資產階級奪了權的舊國家機器產生的、新的地方權力機關」。

2月5日，上海舉行百萬人大會，正式宣告「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說：「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的任務，就是奪權。要奪權，就要徹底地奪，就要百分之百地奪，……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定要把一切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了的市、區、縣各級黨政機關以及工廠、企事業單位、農村人民公社、商店、學校、街道等等的黨權、政權、財

⁴⁴ 王力說：「『公社』不是上海發明的，首先是北京發明的。是陳伯達打電話給上海，通報北京準備成立公社了，要上海考慮成立公社。」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70。

權、文權，統統奪過來，完全、徹底、乾淨、全部地奪過來！不達目的，誓不能休！」⁴⁵張春橋在成立大會上說：「根據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建議，並且得到發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組織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兩個人即日起參加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張、姚分任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正副主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廖政國代表駐滬陸、海、空三軍發言表示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堅決支持。

上海人民公社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當天發布了〈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第一號通令〉。〈通令〉主要內容如下：

宣判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自1966年5月16日以來由舊上海市委、市人委簽署的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指示、文件，從即日起，宣布一律作廢（轉發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文件除外）。

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全市各級、各單位、各部門的領導權，凡是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篡奪的，都必須實行自下而上的全面奪權，寸權必奪，毫不退讓，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部隊必須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保護革命組織和革命群眾。

公安局、法院、檢察院、電台、報社等無產階級專政工具，都受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統一領導和監督。全市各革命造反組織，都有義務支持保證他們進行正常工作，不得隨意衝擊。

各單位必須擁護和執行〈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和各項通令，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這兩個極其重要的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關於「抓革命，促生產」和「節約鬧革命」的偉大號召。

45 〈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1967年2月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對地、富、反、壞、右分子，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社會上一切牛鬼蛇神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於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上海人民公社，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辦。

凡要求加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工作的各革命造反組織，應提出申請，由臨時委員會集體審議批准。

2月12日，毛澤東接見從上海回到北京的張春橋、姚文元。在談話中，毛澤東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稱提出了疑問，他說：「將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不要？要不要改變國號？叫中華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國承認不承認你？」2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道問題的通知〉，其中規定：

(一) 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奪權鬥爭的臨時權力機構，叫甚麼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合(即由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黨政機關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今後要先報告中央，經中央批准後，再在當地報紙上發表。

(二) 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除對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採用人民公社的名稱。⁴⁶

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⁴⁷張春橋任市革委會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任副主任。

46 〈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道問題的通知〉(1967年2月1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7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定〉(1967年2月23日)中說：「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道問題的通知〉中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就上海臨時最高權力機構的名稱問題進行了討論。我們深深感到，這一指示充分體現了中央對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關懷，對上海人民的革命精神的重大愛護。我們堅決擁護中央的正確指示，一致通過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三 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的奪權

在1967年1月中旬以後，全國上下到處都出現了奪權的現象，在省、市、自治區一級的奪權中，奪權較早而又被中共中央所承認的地區有：山西、山東、貴州和黑龍江。

1 最早奪權的省份是山西

山西省的奪權，是在康生、江青等人的具體支持下，由原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帶頭進行的。

1936年，北平草嵐子監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中的一批中共黨員幹部，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共六十一人，經中共中央批准，履行手續出獄，劉格平是僅有兩個未履行手續出獄的人之一。⁴⁸ 1966年11月23日，劉格平寫信給林彪、康生，將當年履行手續出獄的一批黨員幹部誣為「叛徒集團」。此事正合康生心意，康生在兩個月前（1966年9月）曾寫信給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12月10日，康生電召劉格平進京。後來康生等人製造了震動全國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12月底，江青又電召劉格平進京，當面授意他「回山本站出來當第一把手」，「領導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據王力說，毛澤東很欣賞劉格平，曾說過：山西就讓劉格平搞吧！把劉格平調到北京來，了解一下他的情況，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起來。⁴⁹ 1967年1月4日，江青委託王力、關鋒在北京飯店與劉格平談話，要劉回山西去參加文革，把革命群眾組織聯合起來，爭取領導幹部站出來，把山西革命和生產的大權掌握起來。⁵⁰

48 另一人為韓培義。

49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51。

50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當代山西大事記》，上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頁375。

山西省和太原市的造反派此時已多次衝擊省委，批鬥省委領導人。12月下旬，造反派在太原五一廣場和杏花嶺體育場相繼召開十萬人和二十萬人大會批鬥陶魯筋、衛恆、王謙、王大任。⁵¹ 12月25日，造反派又衝擊了《山西日報》社，查封了辦公室、編輯部。12月27日勒令該報停刊。28日，強行查封了報社。1967年元旦，「紅聯站」、太原工學院「紅旗戰鬥隊」搶佔了太原市有線廣播站。由於山西省委機關不斷被衝擊，省委領導人頻繁被揪鬥，省委的工作基本陷於癱瘓。

1月6日，劉格平回到太原，召集山西省軍區政治委員張日清等開會，傳達中央指示，背着原省委秘密組建取代省委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這個小組由劉格平、張日清、袁振(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太原市委第一書記)、劉貫一(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守中(省委委員、太原市委書記處書記)組成，劉格平任組長，張日清任顧問。⁵² 1月7日，張日清向毛澤東、林彪及中央軍委發電報，請求允許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1月10日，劉格平、劉貫一、何英才(省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袁振、陳守中與山西太原造反派組織串連，並向社會公布了他們五人聯名寫的揭發省委、策動奪權的「五人大字報」，題為〈請看！以衛恆、王謙為首的鑽進黨內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1月12日，劉格平、張日清等人召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山西革命造反兵團、山西革命工人野戰兵團、山西紅色造反聯絡站、北航播火兵團、首都赴晉造反大隊等三十五個群眾組織的頭頭開會，成立「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會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調動一萬餘人，連夜搶佔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機關，搶奪印章、檔案，查封辦公

51 陶魯筋為原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後調任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衛恆為省委第一書記；王謙為省委第二書記；王大任為省委書記。

52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史·當代卷》，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437—438。「一一二」奪權後，山西省核心小組於2月10日發出通知，宣布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成立。組長劉格平，副組長張日清，秘書長劉貫一，副秘書長劉志蘭，成員陳永貴、袁振、徐志遠、陳守中、胡煒。2月25日，中共中央下達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成員名單，去掉了胡煒。3月6日，中央決定增補六十九軍政委費中南為核心小組成員。

室，查抄省委領導人的家，抓捕扣押省、市黨政領導人。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原山西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自即日起由本指揮部接管。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我們於元月12日夜奪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黨政機關的權和抄了一些壞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槍支、彈藥和黑材料，徹底搗毀了反黨分子的巢穴。這個反造得好！好得很！」⁵³

「一一二」奪權後，山西省委多數領導人表示，沒有中央的指示，堅決不能把權交給造反派。1月18日，省委書記處書記趙雨亭和省委常委劉開基在北京向華北局反映山西的奪權情況，堅持認為奪權和「五人大字報」是錯誤的。⁵⁴

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接見山西造反派代表，明確宣布支持造反派的奪權，王力說：「我們支持這樣一個行動，我們支持山西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從衛恆、王謙、王大任手裏奪權！」王力在講話中還說：「要改變一個觀念——有了甚麼問題都要求省委解決，這沒有必要，那等於要他們的命嘛！你們要幹甚麼就幹甚麼，你們可以依自己的意見去改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單，一句話：要奪權！」⁵⁵ 1月22日，林彪批准張日清〈關於軍隊參與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請示報告〉。1月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山西造反派奪權的消息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的第一號通告。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通告全文，並配發題為〈山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社論中說：「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為全國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鬥爭創造了新的經驗。山西省委內革命的領導幹部，為全國革命的領導幹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樣。山西省軍區的人民解放軍部

53. 〈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1967年1月1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人民日報》1967年1月25日刊登了這個通告。

54.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六卷（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0），頁163。

55. 王力關鋒等接見山西革命群眾時的講話（1967年1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隊，為全國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樹立了鮮紅的旗幟。……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⁵⁶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自1月12日起，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關押、看管，於1月29日夜間自殺身亡。

從1月13日起，太原造反派對省直各單位都實施了奪權行動。至18日，相繼奪取了《山西日報》、山西人民廣播電台、太原電信局等四十多個單位的權。1月20日，山西省核心小組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又發動第二戰役，進一步奪取了電力、自來水、鐵路交通等部門的權。到月底，省級領導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奪權基本完成。2月1日和7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又發出第二號、第三號通告，號召在「全省範圍內展開全面徹底的奪權鬥爭」。至2月底，全省各地、市、縣黨委和人委及數以萬計的企事業單位全部被奪權。

3月12日至18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太原聯合召開山西革命組織代表大會。會議選舉產生山西省革命委員會，選出委員245人，常委27人，劉格平任主任，張日清、劉貫一、袁振、郭永彪、謝振華、焦國鼎、陳永貴為副主任。⁵⁷

2 從青島到濟南

山東省的奪權是從青島開始的。1月17日，王效禹（青島市副市長、中共青島市委嶗山縣四清工作團副團長）派康生的兒子張子石等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運動的情況並請示今後怎麼辦。1月19日下午，戚本禹對張子石等人說：「你們趕快回去！現在的大方向就是奪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旗子不要讓人家搶去。」當晚，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張子石等人，鼓勵和支持他們在青島市和山東省奪權。

5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60。

57 《山西通史·當代卷》，上冊，頁454。

1月22日，在王效禹的組織下，青島二十三個群眾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了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當天，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在匯泉廣場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大會，宣布：青島市的革命造反派已經把青島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權，從青島市委、市人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裏奪過來了。會議宣讀了〈告青島全市人民書〉。

1月24日，濟南市一些造反派組成的「大聯合革命委員會」在職工劇院召開全市有線廣播大會，宣布奪取了濟南市委、市人委的權力。當天，各造反派組織還開會商討奪山東省的權，但未達成協議。於是，山東革命工人造反總指揮部（「山工總」）和山東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山工聯」）兩大派分別行動，到省委、省人委以及所屬機關搶權。在有些地方兩大派發生衝突。當晚，「山工總」出動近萬人襲擊「山工聯」總部，砸毀了「山工聯」辦公機關，綁架了「山工聯」主要負責人。第二天，「山工總」等十七個造反派組織在《大眾日報》發表〈告全省人民書〉，號召造反派聯合起來，展開全面奪權。

1月28日，王效禹率「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奪山東省委省人委大權赴濟代表團」一行二十二人到達濟南。1月30日，王效禹的這個代表團緊急呼籲山東造反派聯合起來奪權。2月2日，由二十五個造反組織聯合成立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2月3日，濟南召開十萬人大會，宣布奪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權。山東省軍區司令員童國貴和王效禹在大會上講了話。大會通過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告全省人民書〉和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第一號通令〉。〈通令〉宣布：前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等一切權力，自即日起，全部歸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所有，停止前山東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權力及活動；原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各部委負責人，原山東省人委省長、副省長、各廳局辦委負責人，三日內向本委員會報到，聽候處理。

2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山東赴京代表團，聽取了山東奪權鬥爭情況的匯報。2月22日，

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再次接見山東代表團。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講話，指示：山東要建立一個以王效禹為首的領導核心，王效禹從青島到濟南工作；山東省的臨時權力機構必須是革命的「三結合」，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建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山東省核心領導小組」，臨時代行省委職權，名單報中央批准。2月23日，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改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共有委員六十餘人。5月，根據中央決定，省革委會公布：王效禹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楊得志任第一副主任，韓金海、王竹泉、趙修德任副主任。⁵⁸3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祝賀山東省奪權成功。

3 「西南的春雷」

貴州的奪權，是通過原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進行的。李再含原為貴州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他很早就開始批判貴州省委，曾公開聲稱要「反戈一擊，站在造反派一邊，造走資派的反」。從1966年9月至1967年1月，李再含背着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直接向中央發出十八份電報，系統地向中央報告貴州文化革命的情況，包括群眾運動、紅衛兵情況、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等。王力認為李再含是部隊中少見的擁護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並向毛澤東作了推薦。王力在回憶錄中說：「他（指李再含）經常發較長的電報，對毛主席有很大啓發，認為貴州有李再含就行了，這也是毛主席考慮部隊支左的一個現實來源。」⁵⁹

1月20日，李再含向總政治部並中央文革小組發電報，反映貴州某造反派負責人及其總部的若干問題。毛澤東於1月21日在李再含的這封電報上作了批示：

58 參見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編著：《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頁514—517。

59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38。

總理：

似應將李再含、軍區司令員、省委個別革命幹部及若干群眾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領袖，共若(約)十幾人，找來北京，加以研究、確定政策，然後叫他們回去執行。請與文革小組商量決定。

毛澤東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個省、市似可都照這樣辦，一個一個地解決。⁶⁰

李再含如約到京，在中央文革小組處得到了關於奪權的具體指示。

1月25日，貴州省的造反派奪了貴州省委、省人委和貴陽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1月26日，《新貴州報》發表〈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通告〉，宣布：「為保證貴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前進，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向全省人民莊嚴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貴州省委、省人委、貴陽市委、市人委等黨、政、財以及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

貴州的奪權得到了當地駐軍的支持。1月26日，部隊配合造反派，包圍了保守派群眾組織所在地，逮捕了其領導人。2月2日，貴州省軍區組織大規模的遊行集會，表示對造反派的支持，省軍區的主要領導人連續五次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奪權。⁶¹

1月31日，毛澤東看到貴州造反總指揮部的通告，他提筆批道：「恩來同志：這個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發表？新近搞的那個文件⁶²，待他們回去商量修改後，可以再發表，作為第二篇。如何，請酌。」⁶³ 2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個通告，並發表社論〈西南的春雷〉，

6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94。

61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31。

62 指〈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十項通令〉。

6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15。

稱貴州的奪權是「西南地區在隆冬季節響徹雲霄的第一聲春雷」。1月28日，貴州省造反總指揮部發出通告，限令原貴州省委書記、副書記、省委常委自即日起三日內到省市造反總指揮部報到，聽候處理。2月3日，貴州省造反總指揮部發出〈十項通令〉，提出對領導幹部實行「抓、罷、提、留、調」的五字方針，這個方針為迫害幹部、提拔重用造反派定下了調子。

2月13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再含任主任，張明任副主任。

2月17日，陳伯達向毛澤東報送四份新聞稿，分別是：〈貴州革命造反派舉行盛會慶祝貴州省臨時權力機構——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告全省人民書〉〉、〈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誓師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和〈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的經驗〉。陳伯達在送審報告中寫道：「貴州省材料四份，內容較豐富，關於三結合的經驗也說得好。請主席審閱。如認為可以發表，名稱是否簡稱為『貴州省革命委員會』。請批示！」2月20日，毛澤東批示：「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請你們在四份材料一律改過來。」⁶⁴ 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送審的前三篇新聞稿；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送審的第四篇新聞稿。這四份新聞稿中的「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一詞，發表時均改為「貴州省革命委員會」。

4 「東北的新曙光」

黑龍江的奪權是由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為首的造反派聯合進行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是紅色造反團的重要人物。在黑龍江省委中支持和參加造反的領導幹部是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

潘復生過去曾在河南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平反後調到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當主任，1965年10月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文化大

6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38。

革命開始後，潘復生表現得很左，早在1966年7月底，他就指示「省委要旗幟鮮明地支持學生造反鬧革命」。⁶⁵ 8月16日，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在省委院內貼出「省委不革命就罷他娘的官」的大字報。當天下午，潘復生召開省委書記處會議，決定採取高姿態，把問題拿到群眾中去辯論，發動群眾進一步批判省委錯誤，並發出了通知。8月18日，在哈軍工「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大會上，潘復生未經省委討論，說「八一六」通知是錯誤的，宣布撤銷通知，支持學生炮打省委這個司令部，並戴上紅衛兵袖章參加遊行，成為全國第一個支持紅衛兵造反的省委第一書記。8月26日，省委機關的幹部職工在八區廣場召開「炮打司令部進軍大會」，會上點名批判歐陽欽、李范五、王一倫、任仲夷等領導人，⁶⁶ 還給李范五、王一倫戴了高帽子。潘復生在會上講話對造反派表示支持。此後，省委書記處的十二名書記中，除潘復生外全部被批鬥。到9月下旬，黑龍江省委已呈癱瘓狀態。9月22日，中共中央電示，要求黑龍江省組織臨時省委，以解決省委對全省工作的領導。由於種種原因，臨時省委未能成立。潘復生因到黑龍江省時間較短，造反派批判省委的許多問題都與他無關，而且他在運動中支持造反的態度比較堅決，所以毛澤東決定依靠潘復生來領導黑龍江省的奪權運動。⁶⁷

1967年1月10日開始，哈爾濱大專院校的紅色造反團聯合向《黑龍江日報》社、《哈爾濱晚報》社、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人民廣播電台、省財政廳、省人民銀行、哈爾濱市長途電信局、省和哈爾濱市公安機關等奪權。12日，哈軍工和省委機關等單位的紅色造反團聯合組成了「省委機關接管委員會」，先後接管了省委各部、委、辦的工作機構和省委機要室。16日，在潘復生和黑龍江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的支持下，哈爾濱三十二個單位的造反團成立聯合總部，發表〈紅色造反者聯合接管省市黨政財文大權的公告〉。

65 楊易辰：《楊易辰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216。

66 歐陽欽當時任東北局第二書記，李范五任黑龍江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王一倫、任仲夷任黑龍江省委書記。

67 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44。

與紅色造反團對立的多數派組織「紅旗軍」、「戰備軍」、「榮復軍」、「八八團」、「赤衛隊」等於1月15日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黑龍江省革命造反派聯絡總部」，準備加入奪權行列，並向一些已被紅色造反團奪了權的單位發起衝擊，但遭到紅色造反團的堅決反擊。中央文革小組宣布「三軍」（「紅旗軍」、「戰備軍」、「榮復軍」）為反動組織予以取締，其頭頭被逮捕。「八八團」、「赤衛隊」於1月下旬先後宣布解散。

1月31日，造反派在哈爾濱召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大會宣布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同時發布〈第一號公告〉，稱：「黑龍江省委、省人委的黨、政、財、文等一切大權，自即日起歸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停止黑龍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領導權。」哈爾濱師範學院學生范正美任班長，潘復生、汪家道為顧問。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東北的新曙光〉的社論，肯定了這次奪權行動和建立的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3月23日，改名為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3月，中共中央批准潘復生、汪家道為省革委會正副主任，范正美等為常委。

四 北京的奪權

1 各行其是的奪權

1967年1月中旬以後，北京也出現了全面奪權的風潮。各高等院校及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造反派組織紛紛捲入了這場奪權運動。

1月12日、14日，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公社聯合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的一些人，兩次奪了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的權，並違背中央指示，在電台九次播送〈奪權宣言〉。

1月15日，北京輕工學院紅色造反委員會的井岡山戰鬥兵團到第一輕工業部奪權，發表了〈關於接管第一輕工業部的通告〉。年輕的大學生們對如何奪權並無把握，當戚本禹接見他們時，問道：「你們準備如何幹？」學生回答：「我們要監督輕工業部的工作，監督輕工業部的財政開支，我們當部長當不了。」戚本禹說：「那不一定，要破除迷信。」

青年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就能幹嘛！不要當官，但要關心國家大事，掌握國家命運。行！你們這樣幹，行。」

1月17日，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在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支持下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權。政法公社與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公社的造反派聯合發出的〈重要通告〉中說：「為了誓死保衛毛主席，為了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為了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了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為了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為了維護社會治安，我們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鄭重宣布：自今日起，由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特此通告。」謝富治於當天下午5時，在公安部禮堂接見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造反派時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革命行動，你們的行動好得很！你們幹得對！幹得勇敢！你們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辦事的，你們辦得好！我們公安部全體革命同志熱烈地歡迎你們！堅決地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此事後來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實行軍事管制。

1月18日，有幾批造反派先後到北京市委奪權。由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首都職工紅色造反總聯絡站、一機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及北京市委的造反派等組織宣布接管中共北京市委的一切權力。1月20日，造反派又到北京市人委奪了權。參與「一一八」奪權的一些組織成立了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委員會。1月18日晚，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在人民大會堂與北京左派學生、機關幹部召開的座談會上，鼓勵學生參加奪權行動。周恩來說：「今晚已有三十多個單位的造反派去（北京市委）奪權了，進駐了市委大樓，祝賀他們奪權的勝利。……北京市範圍很廣，奪權鬥爭不能一下子解決。首先要吸收廠、礦職工參加全市的職工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大專院校，特別是綜合大學像北大、清華等，對北京市的奪權鬥爭應多負一些責任。」⁶⁸

68 中央首長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年1月1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月19日，北京大學紅旗兵團與華北局機關造反派聯合宣布奪了華北局的權，但很快被中央所制止。同日，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接管了第一機械工業部。

1月20日，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八八戰鬥隊和財政部的造反派一起奪了財政部的權。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介紹財政部奪權的「經驗」。同日，周恩來派聯絡員向財政部下達指示：財政部的業務權不能奪。2月17日凌晨，周恩來親自接見參加財政部奪權的造反派，嚴厲地批評了造反派。他說：「你們要走上邪路」，「走到了危險的邊緣」，並指出：「財政大權是黨中央的」，「財政大權只能監督不能奪」。「財政部的黨組要恢復」；「方毅、姚依林是黨的好幹部，是我下命令保護他們的，通緝令要取消，是對我下的通緝令，對三、四十年的老幹部，都靠邊站，一概打倒，……你們這樣做，我們怎麼能信任你們，支持你們？」⁶⁹在這次接見中，周恩來當場下令將抵制不能奪業務權命令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逮捕。

1月中旬，北大紅旗兵團、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師大「井岡山」等許多組織到《北京日報》社串連，醞釀奪權。1月18日，師大「井岡山」支持《北京日報》社「星火燎原」等組織宣布奪了報社的權，成立了革命造反奪權委員會，並於1月21日發表〈奪權宣言〉，引起其他三十多個組織的不滿。1月19日，以北航「紅旗」駐《北京日報》聯絡站為首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創立新北京日報聯合委員會」（「聯委會」）調集千餘人，對《北京日報》社進行「二次奪權」，於24日發出通告，宣布《北京日報》社的「一切大權歸聯委會」。1月23日，地質「東方紅」駐《北京日報》新聯絡站發表聲明稱：「一、聯委會是虛假的大聯合，原地質駐《北京日報》聯絡站不能代表地質東方紅，聲明退此聯合委員會，並勒令其立即解散。二、目前《北京日報》實權已被以北航紅旗為首的少數人操縱，新生的《北京日報》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新生的《北京日報》必須停刊，它所表現出來的形左實右的機會主

69 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2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義思潮必須徹底批判。」1月29日，財金學院八八戰鬥隊也聲明退出聯委會，並要求聯委會立即解散。兩派爭執不休，直到3月12日，《北京日報》社實行軍事管制。

1月，《人民日報》社的奪權活動被中央制止，但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將北航「紅旗」韓愛晶派去奪權的吳介之委任為《人民日報》群眾監督小組的組長。

1月19日，教育部北京公社在北大紅旗兵團等組織的支持下奪了教育部的權。20日，教育部延安公社在師大「井岡山」等組織的支持下又搞了反奪權。2月2日，兩派在教育部發生武鬥，數百人被打傷。

1月31日，北京石油學院、礦業學院等校造反派參加的國家計委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奪了國家計委的文化革命領導權，並對計委的業務工作實行監督。

2月10日，北京水電學院紅衛兵、工農子弟兵參加了水電部系統二十七個組織組成的革命造反委員會，宣布奪取水電部的「黨、政、財、文一切大權」，「解散水電部黨委，解散水電部政治部」。2月25日後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革命造反委員會將奪權通告修改為「從2月10日起，水利電力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水電部革命造反委員會領導，責成水電部革命造反委員會行使職權。從2月25日起，行政業務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進行監督」。

關於北京市的奪權，各個高校造反派組織都在磨拳擦掌，準備一試身手。中央文革小組也幾次三番地鼓動造反派進行奪權。

1月22日，北航「紅旗」為爭得在北京市奪權的有利地位，扣押了北京市委負責人吳德。當天陳伯達、江青給北航「紅旗」打電話說：「……起草一個決定，不必開誓師大會，考慮準備北京市工農兵和革命師生代表大會，組織市人民政府。不一定要用市長這一形式。標語和傳單都暫不印，轉告其他組織。工農兵都要派代表參加，哪些可以接管，用甚麼形式，應交給代表大會研究。立即放吳德同志回去，監督其工作。代表大會馬上準備，工農兵代表大會不能交給這一派，也不能交給那一派。北京市學校比例可以多一點，可以搞主任輪流主持會議。接管問題可在會上充分討論。」

1月24日，陳伯達接見北大、北航等校造反派。他在談到奪權問題時說：「建議你們工農兵學商開個臨時聯席會，籌備一個比較大範圍的工農兵學商的代表會議。」⁷⁰ 1月26日，陳伯達、江青等接見北京高校造反派時，陳伯達又提出：「跟同志商量一下，搞一個工農代表大會……你們看條件成熟不成熟？」早就躍躍欲試的學生們齊聲高喊：「成熟！」他們早就想動手在北京市奪權了。但北京是首都，誰都不知道具體該怎麼奪權，也一直未得到中央關於北京市奪權的具體指示，暫時還未敢輕舉妄動。江青在那次接見時的講話中說：「大聯合不是為聯合而聯合，是為奪權而聯合……我說還是在三個司令部的左派隊伍基礎上聯合，不要讓別人以為三個司令部不起作用了。」

造反派聞風而動。師大「井岡山」和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紅衛兵聯隊等組織在民族文化宮開會，策劃奪權事宜。會後，以師大「井岡山」和學部「聯隊」的名義，向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建議信，建議迅速成立以戚本禹為總指揮的「北京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來領導北京市的奪權。⁷¹ 由地質「東方紅」的朱成昭主持，在政法學院召開了造反派組織頭頭會議，商討成立「北京工農兵聯合奪權指揮部」，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組織的代表參加了會議。

1月25日，「三司」發出關於迅速成立工農兵聯絡站的倡議，發表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告北京市革命造反派書〉。

1月27日，由北大、清華、地質、師大及北京市大中學校、工礦企業共二百多個單位發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並發出緊急倡議，提出：「迅速召開北京市工農兵學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會，從走資派及一小撮頑固推行反動路線的傢伙手裏全面地奪回北京市的領導權。」由於觀點和利益的分歧，各造反派之間矛盾重重。2月6日，地質「東方

70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三）（1967年1月2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1 譚厚蘭：〈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向首都革命人民請罪〉（1971年2月3日）。

紅」、師大「井岡山」、農機「東方紅」、林院「東方紅」、師院「革造」等一些組織宣布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1月下旬，在一片混亂的奪權鼓噪聲中，北京各主要大學的造反派紛紛招兵買馬，聯合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成立了好幾個全市性的奪權籌備組織。⁷²各派系之間你爭我奪，各不相讓，但實際上，誰也沒有能力承擔起北京市的奪權任務。

2 毛澤東干預北京奪權

北京是首都重地，北京市的奪權如何搞，將對全國產生重要的影響。毛澤東對北京市的奪權早有考慮。他沒有讓在造反派中呼聲很高的戚本禹來領導北京市的奪權，而是點名叫謝富治、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主持籌備北京市的奪權。

2月1日，戚本禹在接見北京高校造反派時說：「最近正在考慮成立一個聯合組織『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這個意思，要進行籌備，要按巴黎公社原則選舉它。現在中央文革在討論，由謝副總理負責。謝副總理是各部第一個支持左派的，他首先支持了『政法公社』，他在左派組織中有崇高的威望。傅崇碧、李震來籌備。」⁷³

2月1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與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委員會宣布合併，改稱北京人民公社，並於當天發表北京人民公社籌委會第一次會議決議。這一合併後來因觀點分歧而作廢。

2月7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與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總部、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聯合，成立了新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72 這一時期，為在北京市奪權而成立的全市性造反派聯合組織主要有：首都革命造反派奪權鬥爭委員會、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總部、首都革命造反紅衛兵代表大會籌備處、首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農兵聯絡站、首都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總部等。

73 謝富治戚本禹對北京市紅衛兵和公安幹部的講話（1967年2月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月9日，謝富治向北京紅衛兵談大聯合的奪權問題時說：「北京市大聯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學生搞學生，農民搞農民，然後大聯合。」「主席強調奪權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否則中央不承認。」⁷⁴ 2月10日，謝富治又說：「過去也曾講到，要成立一個過渡式的統一組織。但是根據中央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和文化大革命的參謀部——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要有三方面的代表：革命左派、革命幹部和解放軍。……想搞一個臨時籌備委員會，或叫籌備小組。……上海有個公社，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現在還是叫革命委員會。」⁷⁵

根據謝富治的講話精神，2月13日，北京「奪權鬥爭委員會」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達成四條協議：

- 一、按系統組織代表(工人、學生)；
- 二、北京奪權鬥爭委員會保持現狀；
- 三、學生由一、二、三司等組成紅衛兵代表大會領導，凡參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一律撤出；
- 四、由三個工人組織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派一個工人組織組成四人小組，負責召集工人討論籌備工人代表大會的問題。

2月15日，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講話說：

北京市的奪權和其他各省市不一樣，北京市已經奪了一次權。奪了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趙凡、陳克寒等的權，是在毛主席指導下奪的。李雪峰、吳德等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現在是第二次奪權，與各省市不一樣，各省市是第一次。……北京不一定用「公社」這個名字。現在農村有公社，還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個公社。現在北京搞的傾向革命委員會。……現在要搞三結合權力機構。⁷⁶

74 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2.9—1967.10)〉(寫於1967年9—10月)。

75 謝富治與首都三司等組織座談紀要(1967年2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6 謝富治傅崇碧與首都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談紀要(1967年2月1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月17日、18日，謝富治接見「奪權鬥爭委員會」等組織，與造反派討論準備參加奪權的幹部問題。2月19日，戚本禹向造反派介紹準備參加奪權的幹部，他說：「市委的吳德、劉建勳、丁國鈺、高揚文、李清泉是比較好的，是願意跟毛主席走的，可以工作的」，「今後要揪他們，要經過謝副總理批准，這是中央委託他做的。」

2月22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成立。紅代會的領導機構為由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組成的核心組。2月25日，中央文革決定，周景芳以謝富治、戚本禹的代表身份，主持籌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⁷⁷

3月5日，謝富治等人向毛澤東報告說：「中央文革指示我們幾個人負責籌備北京市的奪權工作。經過一個月的醞釀協商，準備在最近成立九十多人的臨時權力機構——北京市臨時革命委員會。如主席、中央同意，我們擬在本周召開會議，成立臨時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於3月9日將報告批給周恩來：「工人代表大會還沒有開，中學和農民的代表大會還無消息。開全市代表大會並選舉革委會，似以在三月下旬為宜。」⁷⁸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致河南省軍區黨委的一份電報中通報了毛澤東關於北京市奪權問題的指示：「主席最近對北京市指示，奪權不要匆忙，先做好充分準備，開好工、農、學的代表大會。」

3月19日，北京市貧下中農代表代表會議（簡稱「農代會」）成立。3月22日，北京市革命職工代表會議（簡稱「工代會」）成立。3月25日，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中學「紅代會」）成立。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謝富治任主任，吳德、鄭維山、傅崇碧、聶元梓等人任副主任。同日，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通告，宣布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黨、政、財、文各項大權，從即日起歸北京市革命委員會。4月23日，北京市革委會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埋葬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批判鬥爭大會，八萬人參加。彭真、劉仁等被揪到會場批鬥。

77 《當代中國的北京》編輯部：《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2003）》（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頁226—227。

7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59。

五 全面奪權

1967年1月中旬以後，在中央的號召下，全面奪權的風暴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從中央到地方，從學校、機關到企事業單位，從城市街道到農村社隊，到處都在奪權。但奪權多數是在無序的狀態下，由各群眾性的造反組織自行其是地進行，因此造成了極其混亂的局面。除前面所述的上海、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北京等少數幾個由中央直接插手干預的省市自治區的奪權，在奪權後不久即得到正式批准，成立了臨時的權力機構，其餘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奪權都沒有馬上被中央認可。雖然造反派在奪權後都一本正經地宣布接管黨、政、財、文一切大權，但沒有得到中央的承認，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行使權力。

各省、市、自治區的奪權，情況極其複雜，加之材料不全，詳情難以盡述，下面對中央國家機關和各地的奪權情況做些簡略的介紹。

1 國務院系統的奪權

1967年1月中旬至2、3月份，中央所屬的各部委大部分也都奪了權。正如周恩來所說的，奪權在當時已是大勢所趨。實際上，在中央號召奪權後，已經形成了不管甚麼情況都要奪權的局面，根本不再考慮原來的領導班子屬於甚麼性質，即不管是好的、比較好的，還是有嚴重問題的或已經爛掉的。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中央只能採取索性放開手讓群眾奪權的辦法，不管甚麼情況，都先奪過來再說。所以，周恩來對國家科委、外交部等單位的奪權都表示了支持的態度。

為了讓國務院各部委能夠在奪權的形勢下繼續運轉，周恩來強調：中央各部的奪權中只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而不能奪業務的領導權，對業務只能監督。⁷⁹ 1967年2月18日，周恩來在接見國防工業口造反派時，對二機部的奪權提出了批評。周恩來說：

79 1967年1月26日，周恩來曾提出，有少數單位的造反派搞業務的能力強，能擔當起來，既奪運動的領導權，又奪業務權。如廣播事業局，他們有中層幹部參加革命造反派，這樣的組織在中央其他部門中也有，新華社也是這樣的。

你們沒有報過中央呀！也沒有叫你們監督黨委的領導權。同志們，你們簡直是沒有邊了。你們造反精神很好。部黨委上面還有中央，不能叫黨委靠邊站，只能叫某個人靠邊站。革命不能革到無產階級司令部，革到毛主席頭上。……財政、外交、國防、國防工業、宣傳等大權屬於中央，你們不能奪。……我們號召你們機關奪權，一般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監督，這是再三聲明的。業務屬於國務院，中央各部黨委直接屬中央，即使你們造反團領導層成員是黨員也只能領導群眾組織，要奪文化革命的領導權是贊成的，要奪黨權就是毛主席的權，奪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權，奪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中央廣播事業局。中央想奪業務權試點，但不成功。……他們領導業務，把領導幹部、中層幹部完全排開了，就不行了。⁸⁰

國務院各部委的奪權少數得到中央的承認，有的還成立了革命委員會，⁸¹但絕大多數沒有形成大聯合、三結合，而是形成了打內戰的局面。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的奪權都沒有軍隊幹部參加。周恩來在3月下旬的一次講話中說：「中央各部一個都沒有搞『三結合』。」⁸²5月28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對國務院×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送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在送審報告中寫道：「國務院各部(委)經過今年領導革命、監督業務的奪權鬥爭後，現在大多數單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兩派，互相鬥爭，影響業務和生產甚大，勢非實行軍管不可。」毛澤東批示：「照辦」。

80 周恩來接見國防工業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講話(1967年2月1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1 如衛生部，1967年2月28日成立革命委員會。衛生部革委會是在衛生系統革命造反派奪權委員會的基礎上，由衛生部機關造反派代表為主，有中國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中醫學院、中醫研究院、中華醫學會、健康報社、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醫院、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等十一個在京直屬單位造反派代表參加，結合了衛生部臨時黨委書記孫正等領導幹部而組成的。但3月下旬周恩來接見衛生部代表時說，衛生部成立革委會的報告中央並沒有批准。

82 周恩來接見衛生部領導和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3月2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在全面奪權運動中，各地黨和政府領導機關基本上全部癱瘓或半癱瘓，並先後被奪權。作為中央政府的國務院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儘管國務院的工作同樣非常艱難，疲於堵塞運動帶來的種種漏洞，但是總體而言，國務院的工作始終沒有停止，在各部委都無例外地開展了奪權運動的情況下，國務院的各項工作仍能保持其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對於穩定國家和社會、遲滯和挽救國民經濟的崩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然，國務院工作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也是相對的，國務院各個部門同樣遭到運動的衝擊，損失也是相當嚴重的。

2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奪權

吉林

1967年1月16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央和東北局報告說：「當前主要問題，是省委已經癱瘓，無力擔負繁重、緊迫的鬥爭任務。書記處同志，在省委工作的十人，因犯有嚴重錯誤而停止工作的二人，因病不能工作的三人，其餘五人經常在群眾組織中，無法堅持工作；五名常委，因犯有錯誤而停止工作的一人，其餘四人，一般也只有一個人能堅持工作。由於省委領導長期分散，不能形成集體，因而對運動中的問題，不能研究，對中央的指示無力貫徹執行。」⁸³ 1月18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東北局報告：吉林省市統戰系統、吉林師大等五個群眾組織決定，立即接管省委統戰部，一切權力、一切文書檔案歸造反派，查封檔案，封存印鑑。同一天，長春市紅衛兵總部（簡稱「二總部」）等六十二個單位的群眾組織聯合召開「長春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猛烈開火大會」，提出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奪權鬥爭。晚9時，長春市「二總部」與省委機關的造反派對省委實行了聯合奪權，成立了「接管委員會」，查封了省委機關各部門，發出六條通令。與此

83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社會主義時期吉林省黨的活動大事記（1966—1985）》（徵求意見稿，1987）。

同時，吉林省人委、長春市委、市人委也都被接管。接着其他市、地、縣相繼被接管。

但吉林省奪權後不久，很快就出現了造反派的分裂。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組織「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和「光機八一五」等於2月初宣布退出「二總部」，另行組織了「長春公社」。吉林省駐軍支持「二總部」的奪權，認為「長春公社」是「分裂主義的產物」，「大方向錯了」，不予承認。到2月下旬，長春市形成兩大派四個組織（「紅革會」與「二總部」為一派，也稱為「紅二派」；「長春公社」與「東方紅公社」為一派，稱為「公社派」），兩派矛盾日益尖銳，後來形成長期武鬥的局面。

廣西

1967年1月15日，廣西自治區直屬機關造反總部、廣西工人革命造反總部（簡稱「廣西工總」）、廣西建築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廣西建司」）、廣西汽車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廣西汽司」）、廣西紅衛兵造反總部（簡稱「廣西紅總」）、紅衛兵南寧八三一部隊（簡稱「南寧八三一」）、自治區直屬機關造反聯絡站等廣西各主要群眾造反派組織聯合組成「廣西革命造反大軍」。當晚，自治區黨委書記處在南寧召開「西園會議」，傳達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指示：區、市黨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軍」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軍」封管《廣西日報》的行動，二要支持「造反大軍」奪權。⁸⁴ 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權！〉的社論。當晚，首都「三司」駐南寧聯絡站召集南寧各群眾組織頭頭開會，策劃奪權。會議決定並成立以「廣西工總」為主體的有二十六個群眾組織參加的「廣西革命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當天，「廣西工總」、「廣西紅

84 1967年1月7日，《廣西日報》社「硬骨頭」等十九個戰鬥組及「廣西革命造反指揮部」等組織發布〈封閉《廣西日報》通告〉，決定從即日起改出《每日電訊》。1月15日，以「廣西工總」為主的二十五個造反組織聯合組成「廣西革命造反大軍封管《廣西日報》行動委員會」，重新封閉並接管《廣西日報》，改出《新聞報道》。參見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編：《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13—14。

總」、「南寧八三一」和「廣西藝總」等二十多個造反組織，在南寧市組織首次大遊鬥。被遊鬥的自治區黨政領導人有伍晉南(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鍾楓(區人委副主席)、尚持(區黨委組織部長)、陸地(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等二十三名幹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1月23日，廣西「工總」、「紅總」、「南寧八三一」、廣西「八一八紅衛兵總部」、首都「三司」駐邕聯絡站等造反組織的頭頭率領二十六個造反組織的奪權隊伍，於凌晨3時進駐自治區黨委，奪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權。相繼被奪權的單位還有區人委、區公安廳、高級法院等。之後，各地、市、縣層層都搞起了奪權，有的地方甚至大、小生產隊和街道居民委員會也被奪權。1月24日晚，廣西造反大軍奪權行動委員會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奪權祝捷再戰誓師大會」，參加大會的有146個單位的四萬多人。廣西軍區的代表在大會上講話，表示「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鬥爭」。

廣東

1967年1月19日晚，廣州中山大學「紅旗公社」等組織開會，決定奪省委的權。1月21日下午，廣東省造反派在省委黨校禮堂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會後，造反派將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張雲等省委領導人帶往中山大學，⁸⁵22日上午，中山大學「紅旗公社」的造反派向趙紫陽宣讀了一個〈奪權通令〉，要求他交出廣東省委、省委辦公廳和文化革命辦公室的三顆大印。趙紫陽當即給省委書記林李明寫了個條子：「林李明同志：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奪權，這是革命行動。請把省委、辦公廳、文化革命辦公室三個印交給他們。」林李明在接到趙紫陽的條子後，又打電話請求中央辦公廳，未獲得答覆。林李明也被帶到中山大學。趙紫陽等人經過研究，決定一邊請示中央，一邊交印。在場的幾個省委書記都簽字表示同意

85 當時趙紫陽為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區夢覺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廣東省政協主席；尹林平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張雲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省委常委。

交印。⁸⁶ 趙紫陽說：「交印嘛，就是奪權的象徵。」造反派向趙紫陽等省委領導人交代：奪權後書記處仍要在造反派的監督下繼續工作，不許消極怠工，不許躺倒不幹。22日下午，召開了有造反派代表參加的省委書記處會議，書記處書記除曾志外（在北京）都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起草一個〈中共廣東省委告全省黨員、幹部、人民書〉。當晚，又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省委各部委、各系統負責人和造反派代表參加了會議。省委要求各部委、廳局支持這次奪權，機關工作、接待工作要照常進行，不能癱瘓。以後，省委書記處會議和常委會議都要有造反派組成的監督小組參加，所有的決定都要經監督小組同意才能生效。省委領導人都必須參加勞動和向造反派匯報思想情況。參加奪權的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廣東省革命聯合委員會（簡稱「省革聯」）。

對廣東省這樣向造反派交印讓權的行為，周恩來感到十分惱火。2月27日，周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廣東局勢，不宜久拖，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此外，還建議對同廣東情況類似的雲南擬亦先行軍管。毛澤東閱批：「同意這樣做。」⁸⁷

廣東省的奪權是倉促進行的，造反派的聯合極不充分，奪權後不久即產生了對奪權兩種不同的態度：「省革聯」的人說奪權好得很；包括北京「三司」駐穗聯絡站⁸⁸ 在內的反對派則把這次奪權說成是假奪

86 趙紫陽等人還與造反派簽署了〈印章使用協約〉，內容如下：省委書記處（一部分同志未到會）決定省委大印立即凍結（短時期）。辦公廳、省文革辦公室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監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監督。並一律轉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時，必須在造反派派出之監督人員同意時方能使用。鑰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的手裏。趙紫陽為首的廣東省委交權之事當時在造反派的小報上有詳細報道。2月27日，周恩來因趙紫陽自動向造反派「讓權」，致信毛澤東，建議對廣東以及有類似混亂情況的雲南實行軍事管制，得到毛澤東的批准。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76—1477。

8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32。另據周恩來1967年4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在珠江賓館的講話中說，廣東的奪權辦法是不可仿效的。奪了權，掌不了權，癱瘓了，所以中央決定實行軍管。趙紫陽為首的舊省委利用了這次奪權，這是極其嚴重的錯誤。

88 北京「三司」駐穗聯絡站參加了「一二二」奪權活動，但後來由於觀點分歧，於2月12日發表聲明，指責「一二二」奪權是「大騙局，是一取一送的假奪權醜劇」，宣布退出「省革聯」。

權，是趙紫陽的「假讓權，真反撲」，說「省革聯」墮落成為「趙紫陽的御用工具」。2月19日，廣州五萬多反對「省革聯」的造反派召開「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強烈聲討「省革聯」的「假奪權」，揚言要把「省革聯」奪去的權重新奪回來。2月21日，廣州軍區聯合辦公室宣布「省革聯」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代表」，不承認它的合法性。2月22日，廣東四十多個群眾組織成立「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省聯總籌委會」）。至此，廣東出現互相對立的、跨行業的兩大派群眾組織。

陝西

1967年1月23日，西安地區大中院校「文化革命統一指揮部」召開會議，研究奪權問題。確定由陝西師大、陝西工業大學、西安石油學院、西安外國語學院的造反組織和「紅造司」等奪西北局的權；西安交大、西安冶金建築學院的造反組織和「西安地區炮打司令部戰鬥隊」等奪省委的權；西安解放軍電訊工程學院、西北工業大學的造反組織奪西安市公安局的權。之後又吸收「工聯」、「農總會」等造反組織參加，成立了各級接管小組。從此，西北局、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各區縣、各學校、機關、企事業單位也相繼被奪權。陝西省的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出現了分裂，在1966年10月中旬以後即形成的，以西安交大為首的東派，和以西軍電、西工大為首的西派兩大派之間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奪權後未能成立臨時權力機構。

2月23日，西安軍分區黨委暫行西安市委、市人委的職能。3月2日，經蘭州軍區批准，由陝西省軍區、蘭州軍區空軍、二十一軍共同組成「西安地區駐軍支援左派統一指揮部」（簡稱「支左指揮部」），對西安鐵路局、陝西省廣播事業管理局、廣播電台、西安廣播電台、《陝西日報》社、《西安晚報》社、東方紅廣播站實行軍事管制。3月12日，西安駐軍支左指揮部決定，由二十一軍派出五十七名幹部和一個連隊，分別進駐省、市委辦公廳、工交政治部及省、市各工業局等二十一個部門「抓革命，促生產」，並決定由二十一軍副軍長蘇錦章、參謀長馬友里、西安軍分區司令員劉文華等和原主管工業的省委書記處書記蕭純、副省長惠世恭等分別建立陝西省、西安市工業領導小組。不久又

成立了「陝西省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這些組織措施在維持社會、生產和工作秩序方面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新疆

1967年1月12日，《新疆日報》社造反派宣布奪了《新疆日報》社的權，改出造字號的《新疆日報》。1月19日，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紅二司」）等群眾組織在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召開「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並發出〈緊急呼籲〉、〈緊急通告〉，呼籲新疆造反派組織實現大聯合，向走資派奪權。1月25日，「紅二司」等造反組織宣布奪了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委、烏魯木齊市委、市人委的權，向全國、全疆發表了〈奪權聲明〉，成立了「自治區奪權指揮部」。隨後，自治區各單位、各地、州（市）、縣也先後被奪權。自治區各級領導機關完全陷於癱瘓，全疆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之中。

1月26日，在石河子市發生了大規模流血事件。1月19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主要領導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奪取了兵團機關各部門的領導權，繼而，從兵團到各師、團場、連隊層層奪權。26日凌晨3點到下午3點，兵團獨立團和農八師武裝處調集的六個武裝值班連隊，先後在石河子八一毛紡廠、工四團木工廠、農八師師部等地，與前來奪權的另一派群眾發生衝突，衝突中共打死二十七人，打傷七十八人。⁸⁹兵團、軍區、新華社記者和中央文革小組對此事件的觀點大相逕庭。以裴周玉為主任的兵團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給中央的電報說：「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張仲翰⁹⁰等勾結堅持反動立場的國民黨舊軍官、舊軍人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劃的反奪權、奪軍權的反革命事件。」軍區認為這是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鎮壓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組在1月31日的《文化革命動向》上刊登了〈新華社記者評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認為是一起鎮壓革命群眾的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

89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發展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頁282。

90 武光當時為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兼政府第一副主席，張仲翰為新疆自治區黨委常委、文革前主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工作的第二書記，兵團第二政委。

出於邊境安全的考慮，在此事上沒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而是支持了軍區的意見。⁹¹ 後來將此事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逮捕所謂「一二六」犯罪分子四十六人。⁹²

2月7日、8日，在毛澤東的催促下，周恩來約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區負責人談新疆問題，認為新疆奪權條件不成熟，擬對新疆自治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行軍管，以推動和促進「三結合」。2月10日，新疆軍區的造反派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名，批鬥軍區參謀長何家產，強行給何戴上高帽子，實行了變相體罰。經中央軍委批准，新疆軍區拘留了有關這一事件的策劃者和肇事者。2月11日，「自治區奪權指揮部」組織幾千名學生和群眾包圍了軍區大院，要求軍區將何家產停職檢查，把軍權交給支持造反組織的軍區領導人。中央軍委及時制止了這一亂軍的行為，並明電指出：「新疆軍區對公然違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軍委命令的分子執行紀律是完全正確的，全體指戰員、革命師生、革命工人、革命幹部都必須支持這個正確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圍新疆軍區機關的革命群眾都自覺回到本單位去，向違抗中央軍委命令的現象作堅決鬥爭。」決定將支持造反組織的軍區個別領導人和四個部長調北京學習。事件才得以平息。2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布了〈關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二條)。規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軍事管制下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眾組織和個人對兵團的文化大革命不許干預和串連」；除大中學校、醫療單位、文藝團體和科研部門外，「其餘所有單位一概不搞奪權鬥爭」；「所有武裝部隊，只進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戰備」等。⁹³

91 1968年5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負責人時說：「處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見，完全是主席的。王關戚幾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訴他們，你們不要這樣幹，石河子問題是主席親自處理的。」

92 1979年1月，經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布：「對因此事件無辜死難、受誣陷和曾被捕入獄的同志，應公開徹底平反昭雪。」

93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文化大革命的規定(1967年2月1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根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編：《中國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下冊(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發展史》等書，文件名稱中沒有「軍區」二字。

安徽

1967年1月26日，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為首，聯合安徽省暨合肥市二十六個群眾組織，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軍區的支持下進佔安徽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機關，宣布奪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委的權。當天中午，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奪權聯合總指揮部（後改名「安徽省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並召開奪權大會。大會發布了〈奪權通告〉和〈罷官通令〉，宣布：自1967年1月26日中午12時起，正式奪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權；宣布罷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葆華、李任之、桂瑾、楊效椿、趙凱的官。⁹⁴

幾天之前，造反派要奪權的消息即已報到毛澤東處。1月21日，南京軍區黨委向林彪並中央軍委報告說：「頃接安徽軍區報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駐安徽聯絡站等單位向安徽軍區提出，22到23日，在合肥召開十五萬到二十萬人大會」，「要安徽軍區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隊警衛會場。他們提出，如派部隊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並限安徽軍區21日14時前答覆。是否派部隊，請速指示。」毛澤東當即批示：

林彪同志：

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

毛澤東

一月廿一日

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又及⁹⁵

94 李葆華為省委第一書記，李任之為省委書記處書記，桂瑾為省委常委、副省長，楊效椿為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趙凱為合肥市市長。

9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97。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一直明確指示軍隊不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運動。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給衝擊昆明軍區的昆明造反派發去電報，說：「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關於人民解放軍不介入黨政軍民各界文化大革命運動規定，我們呼籲你們離開昆明軍區大院，使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武裝工具得以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開展。」電文被廣泛宣傳後，進駐昆明軍區的造反派開始陸續撤離。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毛澤東讓解放軍支左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證奪權的順利進行。此後不久，毛澤東又賦予解放軍以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等任務。3月19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

「一二六」奪權後，由於對奪權的意見分歧，合肥地區造反派組織分裂成為互相對立的兩大派，一派認為「一二六」奪權好得很，一派認為好個屁，後來人們將兩大派分別稱為「好派」（「G派」）和「屁派」（「P派」）。兩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釀成武鬥。3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指出：「根據兩個月實踐檢驗，安徽「一二六」奪權沒有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沒有把矛頭指向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沒有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對「一二六」奪權不予承認和肯定，決定立即成立以南京軍區副司令員錢鈞為首的安徽省軍事管制委員會。

江蘇

南京「一三」事件⁹⁶後，江蘇省最大的保守派組織「南京市工礦企業赤衛隊」（簡稱「赤衛隊」）等組織被壓垮，受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省紅總」）等造反組織把自己主動挑起

96 1967年1月3日，「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總司令部」在南京市太平路江蘇飯店圍攻「赤衛隊」，雙方發生大規模武鬥。武鬥造成市內交通中斷，下關碼頭輪渡停開，共有一千多人受傷，其中「赤衛隊」近七百人。「一三」事件後，「赤衛隊」被打成「保皇組織」，勒令解散，許多成員受到迫害。

的武鬥，醞釀為江蘇省委、南京市委策劃「赤衛隊」挑起武鬥，並借此揪鬥省市黨政領導人，衝擊黨政機關。1月9日，南京地區造反派「接管」了《新華日報》、江蘇省人民廣播電台、南京市人民廣播電台，並召開十萬人大會，控訴省市的「罪行」。1月16日，由造反派控制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提出：「要不惜一切代價把一切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回來」。此後，「南京地區造反派聯絡總站」、「南京八二七」、「南京地區批判劉鄧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絡總站」等組織先後召開「揭發控訴江蘇省委罪行大會」、「打倒江蘇省委、砸爛書記處大會」，批鬥江蘇省委、南京市委負責人等，為奪權製造輿論。省委負責人江渭清、彭沖、許家屯等被揪鬥並被戴高帽子示眾。

造反派在如何奪權、由誰掌權的問題上充滿了分歧和爭鬥。

1月17日，「南京地區造反派聯絡總站」開會決定成立「江蘇南京地區革命造反聯合會籌委會」（簡稱「籌委會」），由文風來等九人組成常委會，負責各造反派組織的統一行動。

「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等組織密謀在1月22日清晨行動，奪取江蘇省委、省人委、南京市委、市人委的大權，後因內部意見不一致而未能付諸實施。

1月24日，南京地區造反派組織負責人三百餘人在中蘇友好館電影館開會，「省紅總」為首的一派與以「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奪權方案達成共識。1月25日，「省紅總」等造反組織決定搶在「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一派前進行奪權。「省紅總」等二十五個造反派組織及三個外地造反派駐寧聯絡站負責人開會決定成立「奪權指揮部」，指揮部設在南京師範學院。

1月26日清晨，「奪權指揮部」調動一萬多人，衝入江蘇省、南京市機關，並將省、市主要負責人集中在南京師範學院，宣布奪取了江蘇省、南京市的黨、政大權。1月27日，「奪權委員會」在南大召開會議，決定除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四枚印章外，其餘印章交各部門造反派掌管。1月28日，「奪權委員會」在南京《新華日報》上發表

〈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聲明〉，公布了三個通告和一個通令，宣布一切權力歸「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籌備委員會」。⁹⁷

「一二六」奪權得到了江蘇省軍區和南京軍區的支持。南京軍區政委杜平於2月5日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籌委會會議上說：「一二六奪權，我們當時就討論了，要堅決支持。後來提出，印要解放軍保管。我們想，如果把印交給我們保管，就等於一二六奪權不算數了，這樣解放軍就成了一個中間人物，所以我當時就堅決不同意。我們堅決支持的。」

由於奪權是在十分倉促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江蘇省的範圍內並沒有聯合起大多數造反派。參加奪權並掌握大權的以「省紅總」為代表的造反派認為「一二六」奪權好得很。沒有參加「一二六」奪權的「南京八二七」和「南工東方紅」等造反派組織立即發表「緊急聲明」，不承認奪權行動，認為「一二六」奪權是搶權，「好個屁」。南京地區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為「好派」和「屁派」。

「省紅總」將對立派稱為「新老保」，並以「誰反對一二六奪權誰就是反革命」的帽子壓制對方。一些反對「一二六」奪權的南京造反派到北京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見，他們在北京的大街上書寫了許多大標語：「一二六奪權是混蛋奪權！」「江蘇一二六奪權是一小撮個人野心家的靈魂的大暴露！」「堅決砸爛江蘇省奪權委員會！」「省紅總」在《新華日報》上連續數天用整版的篇幅，在「一二六奪權就是好」的通欄大標題下刊登擁護「一二六」奪權的稿件。江蘇省人民廣播電台也反覆播送「一二六奪權就是好」的報道和廣播評論。在兩大派爭執不下的情況下，3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對江蘇省實行軍事管制。

雲南

1967年1月，原來已經聯合的造反派又發生分裂。在1966年12月9日由昆明工學院「八二三戰鬥兵團」、雲南大學「毛澤東主義炮兵團」等一

97 參見中共南京市委辦公廳、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南京市檔案局：《風雨同舟——南京探索前進三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444—445。

百多個組織聯合組成的「大聯委」(全稱為「昆明地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內部矛盾衝突不斷，1月22日，以雲南大學「炮兵團」為主的六十二個組織從「大聯委」中分裂出來，另成立「新雲南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聯絡站」(簡稱「新雲南」)。此後經過不斷分化組合，正式形成雲南省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以「新雲南」為主，成立「毛澤東主義炮兵團」，簡稱「炮派」；一派以「大聯委」為主，成立「八二三戰鬥兵團」，簡稱「八派」。當奪權風暴颳到雲南時，兩大派便各自為政，爭相奪權。

1月26日，昆明「新雲南」所屬造反派組織兵分兩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奪了省人委及其所屬廳局的權，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機關宣布奪了省、市委的權。當晚8時，昆明「大聯委」又召開十萬人的「大奪權誓師大會」，會後遊行示威到省委機關，再次宣布奪了省委的權。在奪權活動中，雙方發生對峙局面，最後省委的印章被「大聯委」派搶走。奪權之後，兩大派發生了激烈的大辯論。奪權之風很快遍及全省各地。2月10日，中共中央電召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興、趙健民、郭超、薛韜等及兩大派代表赴京商討雲南局勢，希望能夠推動雲南省的「三結合」。3月，中共中央決定對雲南省實行軍事管制。

湖北

1966年11月16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封閉《湖北日報》。12月18日，北京南下和武漢地區的造反派強行佔據漢口紅旗大樓，封閉了《武漢晚報》。1967年1月初，「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頭頭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胡厚民(武昌造船廠工人)等利用其控制的造反組織刊物《工人戰報》進行奪權的輿論宣傳，鼓吹「要造黑省委的反」，「造反就是奪權」，並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和湖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進行非法關押。1月14日，《湖北日報》發表〈告全省人民書〉稱：「《湖北日報》的新生標誌着革命造反派全面奪權的開始。」1月19日，「工總」等四十一個造反組織聯合在《湖北日報》發表〈告全省人民書〉，宣布「一切權力歸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責令省、市委中「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傢伙」，「必須

立即從地下黑窩裏爬出來，立即回到原工作地點，接受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監督、批判和鬥爭」。到1月21日，省科委、省公安廳、省廣播電台、武漢市公安局、電信局、教育局、總工會、銀行系統、市廣播電台等幾十個部門和工廠企業被奪權。1月26日，湖北省各造反組織在武昌洪山禮堂召開奪權大會，把湖北省黨、政領導人張體學等押到會場，宣布奪取湖北省領導權。但造反組織之間在權力分配等問題上意見分歧，1月27日，「工總」等五個組織宣布「一二六」奪權無效。

江西

1967年1月11日，南昌地區三十個造反組織聯合發表〈告全省人民書〉，號召「萬炮齊轟司令部，烈火猛燒省、市委」。13日，《江西日報》社造反團宣布接管《江西日報》，奪了報社的權。16日，《江西日報》發表社論〈權，只能由造反派來奪〉。14日，省直機關造反派在省人民廣播電台奪權。17日，南昌地區三十二個造反組織聯合成立「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員會」。17日，江西省省直機關部分廳局級幹部成立造反隊，21日，發表〈徹底摧毀省委內的黑堡壘〉的宣言，號召省直機關領導幹部起來造反。24日，南昌市造反組織奪了南昌市的黨政大權。26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員會」奪了江西省的黨政大權。

造反派奪權後的一大舉動就是否定八一南昌起義。⁹⁸ 2月4日，造反派在人民廣場舉行大會，「造八一建軍節的反」，宣布徹底砸爛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2月5日，《江西日報》發表題為〈徹底摧毀八一建軍節〉的社論。

浙江

1966年12月30日，以浙江美術學院學生張永生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省聯總」）在杭州成立。當天，「省聯總」聯合

98 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極度盛行，在歷史問題上也處處突出毛澤東而貶低其他領導人。否定「南昌起義」一方面受文革初期「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突出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

本省及北京、哈爾濱等外省市駐杭聯絡站的二十二個造反組織查封《浙江日報》社，奪了編委會的權，由「省聯總」主編，改出《新華電訊》，並發表了〈我們為甚麼要封掉《浙江日報》——告全省人民書〉。1967年1月10日，「省聯總」等組織正式宣布奪取《浙江日報》社的領導權，形式上恢復《浙江日報》。與此同時，《杭州日報》社的造反派在「省聯總」等組織支持下，接管了《杭州日報》社。1月5日，「省聯總」為首的造反組織召開「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冰大會」，提出：打倒陳冰，火燒江華、李豐平。中共浙江省委被迫撤銷陳冰、于冠西的職務。1月7日，他們又在省體育場召開「批判、揭發、鬥爭陳偉達大會」。⁹⁹1月11日，「省聯總」等二十五個組織依照上海的形式，聯合發出〈緊急通告〉，指責省委「大搞修正主義的物質刺激，用『糖衣炮彈』向革命造反派進攻」。1月14日，「省聯總」所屬浙江大學「紅色造反聯絡站」等數十個造反組織以揪「殺人凶手」（省軍區領導人的親屬）為名，組織幾千人衝擊省軍區。1月16日，「省聯總」和所屬三十多個組織聯合發出〈緊急通令〉，宣布：凡是省、市一級單位的奪權，須經「省聯總」同意，凡是省、市以下單位的奪權，須經「省聯總」所屬有關組織同意。1月18日，「省聯總」又同「省級機關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省機總」）聯合發出〈緊急通令〉，宣布直接對省委辦公廳、省人委辦公廳、省委宣傳部、省婦聯等部門的奪權，對省府大院其他部門則由本單位造反派監督管理或奪權。同時，「省聯總」向全省派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煽動並幫助各地造反派奪權。

1月下旬，「省聯總」等造反派與浙江省軍區的矛盾逐漸激化。25日，造反派強行佔據省軍區司令部、政治部，企圖劫持省軍區主要領導人。事後，他們又組成「控告團」，赴京告狀。26日，省軍區指戰員在遊行時與造反派發生衝突。27日，《浙江日報》發表社論〈省軍區一小撮人想幹甚麼〉。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浙江最近發生事件的決定〉，把造反派連續衝擊省軍區的責任歸咎於省委和省

⁹⁹ 陳冰當時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江華為省委第一書記，李豐平為省委常委書記，于冠西為《浙江日報》總編輯，陳偉達為省委書記。

軍區領導人，責成省委和省軍區有關人員作出深刻檢討。31日，中央指派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中共中央辦公廳丁鈞到杭州處理該事件。

浙江省的奪權並不被中央認可。2月9日，周恩來就浙江省軍區是否參加「省聯總」批判江華大會一事批示：會議可以參加，但不講話，不表態。¹⁰⁰

2月上旬，由於周恩來、譚震林等人幾次講話指出「毛主席要保江華」，造反派內部在對待江華問題上出現分歧。當「省聯總」決定12日召開揭批江華大會時，11日夜，周恩來派專機責成造反派將江華送往北京。「省聯總」仍於12日召開數萬人參加的「批鬥浙江頭號走資派江華大會」，但被浙江大學「紅暴會」等一批人衝散。會後，以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工人翁森鶴為首的一批人組織成立了「浙江省紅色暴動委員會」（簡稱「紅暴」），與「省聯總」相對立。此後兩派發生了一系列武鬥事件。3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浙江省實行軍事管制。

寧夏

1967年1月25日，《寧夏日報》發表「銀川地區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等二十二個群眾組織的〈緊急通知〉，聲稱要「堅決開展全面的奪權鬥爭」，並於當天組成了「寧夏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聯委會」），寧夏大學學生安建國任「聯委會」主任。1月26日，寧夏軍區黨委根據中央關於人民解放軍要支持左派的決定，表態支持「聯委會」。1月27日，「聯委會」奪了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和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的黨、政、財、文大權。同時，還接管了銀川市的黨、政、財、文大權。「聯委會」於1月28日在《寧夏日報》發布〈奪權公告〉宣布：「一切領導權，由本聯合委員會接管，委員會下設文化革命委員會和生產建設委員會。」2月11日，寧夏軍區發表聲明，撤銷了對「聯委會」和「一二七奪權」的支持。寧夏軍區選對造反派已奪了權的《寧夏日報》社和區公安廳等單位實行了軍事管制，取締了一些造反派組

100 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24-125。

織。¹⁰¹此後，參加「一二七奪權」的造反派組織發生了分化。3月10日，「銀川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處」（簡稱「籌備處」）成立。3月12日，寧夏軍區表態支持「籌備處」。3月18日，「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簡稱「總指揮部」）成立。寧夏開始形成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的局面。

青海

1967年初，青海省的造反派組織形成了以「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簡稱「八一八」）為一方和以「紅衛兵總部」為另一方的兩大派。在奪權運動中，兩派的鬥爭相當激烈。1月4日，「紅衛兵總部」等組織「封閉」了實際上掌握在「八一八」一派手裏的《青海日報》，改為無地方稿的《新聞電訊》版。「八一八」於1月12日又「正式接管」了《青海日報》，並將《新聞電訊》版改為《特刊》。1月15日，「八一八」派的《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發表告讀者書，宣告「新生」的《青海日報》正式出版。1月23日，「八一八」派又相繼奪了青海人民廣播電台的權。同時，支持「八一八」奪權的省委辦公廳一名負責人和個別工作人員私自將省委印章送交「八一八」的頭頭。1月24日，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通知召開黨委會議，研究「交權」問題。1月29日，「八一八」派的四十個組織聯合起來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在西寧召開了奪權大會，宣布奪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員會的黨、政大權。1月30日，《青海日報》對此作了報道，並發表了奪權大會給毛澤東的致敬電和告全省人民書。隨後，又相繼發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通告第一號、第二號以及〈告全省農民書〉等。¹⁰²青海省軍區在收到中央關於人民解放軍支持左派群眾的決定後，即確定支持「八一八」的奪權，並上報蘭州軍區、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消息一公布，引起「紅衛兵總部」這一派群眾組織的強烈反對，他們衝進省軍區機關揪鬥了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此後，劉賢權又召集軍區常委會，撤銷了原來的決定，決定把支持「八一八」這一派群眾組織，改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2月15日以後，劉賢

101 中共寧夏軍區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檢查（1967年12月2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2 陳雲峰主編：《當代青海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頁195。

權被奪權，失去了自由，並遭到批鬥、毒打、隔離和武裝看押。¹⁰³ 省軍區的領導權落到副司令員趙永夫手裏。

遼寧

1967年1月30日，遼寧大學「八三一」群眾組織與一部分相同觀點的工人造反組織成立了「八三一瀋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1月31日，由二十四個群眾造反組織發起成立的「遼寧省革命造反奪權指揮部」於凌晨3時宣布接管遼寧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權力。奪權指揮部在奪權後立即給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致敬信，並發表聲明：省委、省人委今後一切日常工作，由奪權指揮部負責。除「亮相」的領導幹部（即表示支持造反派並得到諒解的幹部）以外，其餘幹部一律停止工作，檢查交代問題。至此，遼寧省委、省人委及其直屬各部門便全部停止活動。遼寧省的奪權並不成功，在各群眾組織之間矛盾重重，互不相讓。2月16日，遼寧省暨瀋陽市二十多萬群眾，代表全省七十四個群眾組織在瀋陽市人民廣場舉行集會，宣告「遼寧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遼聯」）成立。大會通過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宣言〉和〈緊急呼籲書〉。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遼寧省軍區第三政治委員楊棄、原中共瀋陽市委書記莫文祥等在大會上講了話，表示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5月10日，一些觀點相同的群眾組織在瀋陽南站站前廣場召開「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簡稱「遼革站」）成立誓師大會。「遼革站」還組織了三十萬人參加的「聲討和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東北的代理人大會」。遼寧省軍區第三政委楊棄、副司令員凌少農參加了大會。至此，遼寧省形成了「八三一」、「遼聯」、「遼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

西藏

1967年1月11日晚，《西藏日報》社「紅色新聞造反團」宣布奪了該報社的權。隨後，新華社西藏分社、廣播電台、中共拉薩臨時市委和市

103 安紹杰主編：《劉賢權將軍》（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頁218—219。

人委以及自治區的各部、委、廳、局也相繼發生奪權。全自治區的奪權發生在2月5日，拉薩市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同時宣布奪權，並發生衝突。區黨委內亂成一團，工作陷入癱瘓。2月9日，北京紅衛兵和「拉薩革命造反總部」成員衝進西藏軍區，要揪鬥西藏區黨委第一書記張國華（中共中央已於1月下旬同意張國華到北京治病，任命周仁山為區黨委代理第一書記），並要求軍區支持他們搞的「二五」奪權，造反派高呼「打倒張國華」的口號，在軍區大院內滯留十多個小時。2月10日，中央軍委決定：西藏軍區領導機關和軍區生產部的文化大革命暫時停止下來，轉入正常的戰備工作。西藏所有軍墾農場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2月12日，中央軍委覆電西藏軍區指出，張國華是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的，儘管他在工作上有缺點和錯誤，但基本上是個好同志。軍區領導人把電報內容告知北京紅衛兵和拉薩造反派，但他們寧可相信來自北京的小道消息（張國華參加了「二月兵變」）而不相信中央軍委的電報，還是要揪鬥張國華。2月24日，又由中央文革小組打電報給「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等組織，說明中央軍委的電報是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組完全擁護這個電報所說的內容。¹⁰⁴

甘肅

1967年2月5日，甘肅省造反派聯合組成的「蘭州市紅色造反派聯絡委員會」（簡稱「紅聯」）奪了甘肅省委、省人委的權。蘭州軍區、甘肅省軍區都支持「紅聯」和「二五」奪權。甘肅省軍區司令員詹大南以軍方代表的身份，參加並主持「紅聯指揮部」的工作。奪權後，各群眾組織之間爭權奪利，矛盾逐漸激化。5月初，「紅聯」產生了分裂，原「紅聯」內的「工聯」、「長征團」、「七·一」、「蘭鐵紅司」、「大專院校三司」、「省級機關遵義公社」、「市級機關三司」、「赴蘭紅衛兵聯合戰鬥隊」等殺出「紅聯」，組成「甘肅紅色造反派聯合第三司令部」（簡稱「紅三司」）。在

¹⁰⁴ 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頁182。

對待甘肅各群眾組織和準備結合的幹部問題上，甘肅省軍區與蘭州軍區發生了分歧。以詹大南為首的甘肅省軍區支持原「紅聯」，反對「紅三司」；支持原甘肅省委書記王世泰，反對原甘肅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胡繼宗。而以張達志為首的蘭州軍區支持「紅三司」，支持胡繼宗，反對王世泰。

5月10日，在周恩來召集的擴大的常委碰頭會上，決定對河北、甘肅兩省實行軍管。5月12日，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軍委文革小組的名義，發出了〈關於甘肅問題的幾點意見〉，其中提出：「鑑於當前甘肅省成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還不成熟，中央決定對甘肅實行軍事管制。」

5月14日，毛澤東看了蘭州軍區黨委關於支持「紅三司」的請示報告後，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此件請閱。所見似有理由，請與張、冼、¹⁰⁵詹大南諸同志商處。胡繼宗同志等既已站出來，所見與軍區一致，積極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實行軍管，而照軍區意見，做一時期工作之後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員會。以上請商酌。」¹⁰⁶

7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批發了〈關於甘肅問題座談紀要〉，其中提出：「鑑於『紅三司』成立和胡繼宗等同志已站出來，蘭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愈來愈好。大家認為甘肅省可不實行軍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建議由冼恆漢同志任組長，徐國珍、張忠、胡繼宗同志任副組長。」

河南

1967年1月12日，中共河南省委召開省委文化革命小組各辦公室主任會議，商討群眾組織奪權和省委對策。會議決定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邊倒」。1月17日，鄭州大學、河南醫學院、鄭州工學院、河南農學院、鄭州糧食學院和河南中醫學院六所大學的造反派組成「炮轟省委聯絡站」，搶佔省委辦公大樓，同省委機關造反派結合在一起，造省委

¹⁰⁵ 張，指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冼，指蘭州軍區政治委員冼恆漢。

¹⁰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40。

的反，搜集省委負責人的材料。1月21日，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開會決定，六所院校的革命造反派接管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1月22日，鄭州大學等六所院校的造反派組織又進駐省委機關。1月23日，河南省委、省人委被奪權。

天津

1967年1月2日，中共中央決定：天津市由河北省轄市改為中央直轄市，解學恭任市委第一書記，閻達開任市委第二書記。上海造反派的〈緊急通告〉發表後，天津的造反派也聞風而動，紛紛開始奪權。從1月7日到月底，《天津日報》社、天津人民廣播電台、天津電視台、市電信局、市公安局、市計委、新華書店等單位，相繼被造反派奪權。但全市性的奪權並未發生。2月25日，天津市「三結合」的「奪權籌備工作領導小組」（由群眾組織、解放軍代表、革命幹部代表三方組成的領導班子，也稱「奪權領導小組」）成立，解學恭任組長，蕭思明任副組長。3月5日，天津市召開大專院校紅代會會議。天津奪權領導小組準備召開各方協商會議，商定革委會及其常委會名單，並預定於3月12日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周恩來於3月9日將天津即將成立革委會的情況報告毛澤東。3月10日，周恩來打電話給解學恭，要他考慮先開大學、中學、工人、農民、機關革命派代表會議，然後再開全市革命組織協商會議和群眾大會，宣布成立革委會的程序。毛澤東也在周恩來9日的報告上批示：「以推遲到三月下旬成立，照總理十日意見辦理為宜。」¹⁰⁷

3月15日，天津市奪權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通知，天津市工人、農民、大學紅衛兵、中學紅衛兵、幹部五個代表會議籌備小組成立。3月15日至22日，天津市先後召開了市貧下中農、市級機關幹部、大專院校紅衛兵、中等學校紅衛兵和職工等五個系統的代表會議（即「五代會」），分別選出參加「天津市無產階級革命派代表會議」的代表317名。

10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61。所謂「總理十日意見」，即周恩來給解學恭電話的內容。

因為「五代會」是倉促召開的，一些有不同意見的組織沒有被吸收進去，因此在天津造反派中間產生了許多矛盾和分歧。3月24日，解學恭等向毛澤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和北京軍區報送〈關於天津市奪權問題的請示〉，希望中央批准天津早日成立革委會。4月7日、9日、10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三次接見天津代表團。鑑於天津造反派內部分歧較大，短時間內難以統一，中央在接見後明確對天津問題的處理方針：「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擴大革命派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還需要做一段工作。」¹⁰⁸

內蒙古

內蒙古自治區在「一月革命」中的奪權活動，是圍繞着《內蒙古日報》展開的。1月11日，《內蒙古日報》社內部的群眾組織「東方紅戰鬥隊」（簡稱「東方紅」）突然查封並接管了報社，奪了報社黨、政、財、文各項大權，停止了《內蒙古日報》的出版，代之以《東方紅電訊》。

當時內蒙古已成立了「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簡稱「工農兵」）、「無產者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簡稱「無產者」）、「呼和浩特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簡稱「呼三司」）等全區性組織。「工農兵」、「無產者」與「呼三司」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工農兵」、「無產者」指責後者為「大雜燴」，而造反精神更強的「呼三司」則將前二者視為保守派。

1月18日，「東方紅」的對立派組織「紅衛軍總部」（「無產者」派的）在《內蒙古日報》社進行了又一次奪權。1月23日，「無產者」出版了黑體字作報頭的《內蒙古日報》（新1號）。「東方紅」串連「呼三司」醞釀再次反奪權。這期間，報社發生多次武鬥事件。掌權的「紅衛軍總部」一派跑到內蒙古軍區，要求軍區支持。軍區自1966年5月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以來，揭發批判了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烏蘭夫，以後又掀鬥了軍區第一副政委吳濤和軍區副司令員孔飛、副政委廷懋、副參謀長塔拉和政治部副主任鮑蔭扎布。到1967年1月，全軍區停止工作，靠邊站和被掀鬥

108 中央首長接見天津駐軍及幹部群眾代表的講話（1967年4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的幹部多達235人。¹⁰⁹當時主持軍區工作的是軍區黨委副書記、副司令員蕭應棠。經請示中央軍委後，軍區領導決定派一個連到報社制止武鬥。去制止武鬥的部隊支持了報社「紅衛軍總部」，引起了對立派「呼三司」的憤怒。

1月29日，「呼三司」數千人包圍了內蒙古軍區南大門並在那裏靜坐示威。剛剛發布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明令禁止衝擊軍事領導機關，所以軍區有恃無恐，並不把「呼三司」放在眼裏。為防止意外事變，軍區又在南大門修築了臨時工事，在樓頂上架起了機槍，槍口直對南大門外。

2月5日，「呼三司」圍困軍區已達七天。正午時分，內蒙古師範學院四年級學生韓桐手持話筒，正在向軍區喊話。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怒不可遏，對着喊話的韓桐舉槍扣動扳機，韓桐應聲倒下。子彈從韓桐左邊第五根肋骨打入，肺動脈被擊穿，經搶救無效身亡。

槍擊事件迅速上報中央。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立即在2月6日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出特急電報，要求內蒙古軍區立即停止衝突，不要擴大事態；同時要求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內蒙古軍區、「呼三司」和「紅衛軍總部」四方面，各派三至五名代表來京，商談解決內蒙古問題。當時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許多領導人已被造反派組織抓走批鬥，勉強湊出書記處書記王鐸、李樹德以及李質、張魯、郭以青五人及四方代表共二十人，分乘兩架專機直飛北京。

2月10日，周恩來與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內蒙古四方代表，周恩來詳細詢問了打死韓桐的經過，當即命令內務部調查事件原委。內務部部長曾山立即帶領技術人員飛抵呼和浩特。經過詳細調查，查清了柳青開槍打死韓桐的全部過程。柳青後來遭到拘押，1969年內蒙古全面軍管後，柳青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後改判為無期徒刑。1980年，服刑十三年的柳青才獲得釋放。

109 任亞平主編：《內蒙古自治區志·共產黨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頁221。

四川

1966年11月13日，由「紅衛兵成都部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重大八一五戰鬥團」等七個組織主持，在成都召開了二十五萬人參加的「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黨委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李井泉、廖志高在會上作了檢查。大會進行中，「紅成川大支隊」高呼口號，衝擊主席台，致使會議中斷。此後不久，「紅成川大支隊」宣布退出「紅成」，成立「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簡稱「八二六」），成都地區的造反派開始分裂成「紅成」和「八二六」兩大派。11月18日，李井泉經陶鑄批准離開成都前往上海治病，不久被造反派從上海揪回成都。11月21日，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被工交系統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狀，於12月返回成都後，被扣留在成都東郊。12月下旬，四川省委書記許夢俠、杜心源被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狀；省委書記楊超被工交系統造反派扣留；省委書記趙蒼璧被省公安廳造反派看管。四川省委自此完全癱瘓。12月4日，「紅成」和「八二六」兩大派發生大規模武鬥，數十人被打傷。12月17日，造反派查封並佔據了《四川日報》社。1967年1月4日，四川人民廣播電台被造反派奪權並佔據。1月19日，部分造反派封了四川省委印章，並宣布奪權。1月24日，由以重慶大學「八一五」為首的四十多個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會」奪取了重慶市委、市人委和市級黨政機關的一切權力。同日，重慶市造反派在外地來渝串連造反派的支持下，砸了所謂重慶市的「保皇四軍」——毛澤東思想工人戰鬥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毛澤東思想赤衛軍、毛澤東思想文藝軍。駐重慶的五十四軍明確表示堅決支持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的「革命行動」。2月8日，四十六個造反組織聯合發表〈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宣稱：重慶市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成立，負責行使重慶市的黨、政、財、文大權。重慶警備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任「革聯會」主任。由於造反派在權力分配中意見分歧，後逐漸分化為擁護「革聯會」的「八一五」派和反對「革聯會」的「反到底」派。

河北

1966年4月，河北省會由天津遷回保定。伴隨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這次河北省會的搬遷倉促匆忙，一切都因陋就簡，如同戰爭時期機關疏散的情況一樣。省會搬遷到保定後，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委員會機關由天津市遷往保定市辦公，省直各廳、部、委、辦、局，除少數單位遷往保定市外，多數單位分散到天津至保定、保定至石家莊一線的各個市、縣。11月後，北京、天津及河北各地的紅衛兵猛烈衝擊省委機關，批判省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分別於11月12日、27日、30日和12月4日共四次在造反派召開的批判大會上作檢討。¹¹⁰1月5日，天津和保定的紅衛兵造反派查封了《河北日報》。12日，造反派組織主辦的《河北日報》出版。13日，河北人民廣播電台停止自辦節目，除播送天氣預報外，全部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節目。1月23日，在保定的各派紅衛兵同各造反派組織發起奪權運動，一天之內，省委、省人委、保定地委、保定專署、保定市委、保定市人委等在省會的三級黨政領導機關全部被奪權。同一天，唐山地、市委被奪權。2月1日，石家莊地、市及各直屬部門和單位統統被奪權，所有黨政機關陷入癱瘓狀態。省、市、地領導人多次遭到大會批鬥。¹¹¹

福建

1966年11月1日至5日，廈門市第八中學、華僑中學、廈門大學以及南下學生組成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封閉了中共福建省委大樓，並發表封閉公告。11月4日，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在省體育場召開的群眾組織和紅衛兵大會上作第一次初步檢查。11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通知，指示縣以上（不包括縣）大、中專院校黨委會應立即停止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領導，撤銷院校黨委「文革辦」。各院校應按〈十六

110 韓立成主編：《當代河北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198。

111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316-317。

條〉的規定由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選舉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組、文革委員會和文革代表大會，作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各院校黨委會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負責日常行政工作，組織學習「毛著」和組織黨的生活等。

1967年1月9日，「福州工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省革命委員會」等十個群眾組織聯名發出〈告全省人民書〉，號召群眾起來造省委的反，提出要反對「經濟主義」、「工聯主義」等，並要求「除必要的生產、文化革命、辦公經費外，各機關團體流動資金一律暫時凍結」。

1月中旬以後，福州市「一一·二三」行動指揮部和「八二九」組織的部分成員，挾持葉飛、梁靈光、許亞、鄭重等省、市領導，到福州魁岐召開所謂「打倒葉飛、鄭重聯合會」。1月22日，福州市郊六十多個群眾組織共二千多人在中共福建省委駐地舉行「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會上通過了〈給毛主席致敬電〉和〈告全省農民書〉，大會倡議建立「福州農民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備委員會」。從此全省農村相繼成立造反組織。

福州軍區在奪權運動中沒有積極支持造反派，因此遭到造反派的嫉恨；1月26日、29日，連續發生了造反派衝擊軍區的事件。此後，福州軍區借〈軍委八條命令〉之威，在福建造反派中抓了一批「反革命」。1月31日，福州軍區發布〈福建前線部隊公告〉，警告造反說：「為着維護最高統帥命令的尊嚴，對軍隊內部極少數違抗中央軍委命令的違法分子，實行了紀律處理。外部如有借此進行造謠誣蔑，或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繼續衝擊軍事機關，醜化中國人民解放軍者，我們一定按照最高統帥命令，堅決採取必要的措施。」2月6日，中央軍委轉發了〈福建前線部隊公告〉。

為解決福州軍區和造反派的矛盾，中央召集造反派代表王雲集、陳文德、莊志鵬等十二人進京，參加福建問題座談會。3月31日，周恩來總理接見福建赴京全體代表，指出1月26日衝擊軍區是錯誤的，但對犯錯誤的人不要揪住不放，凡與1月26日衝擊福州軍區和2月7日衝擊《福建日報》社有牽連被打成「右派」而被捕的，一律釋放。

4月30日，中央就福建問題提出十點意見，指出衝擊軍區和報社事件不能作為劃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也不能作為革命與保守的分水嶺，不予追究，但衝擊軍區是不對的；一切因此被捕的，應立即釋放；一切因此被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組織的，應立即平反；要求各革命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中央同時宣布，福建先實行軍管，並責成軍管機構按中央精神，處理近幾個月來發生的事件。¹¹²

湖南

1966年11月13日，長沙地區造反組織召開「批判湖南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大會」，省委領導人上台檢討。14日，以搜查「黑材料」為名，長沙地區造反組織強行衝擊、搜查、封閉省委和省人委機關辦公大樓，繼而又衝擊、查封《湖南日報》、《長沙日報》社和省公安廳、省人民法院。對省委辦公樓的查封持續十餘日之久，省委許多領導人或被揪去批判鬥爭，或被迫離開機關躲避。由此開始，省委處於不能正常工作狀態。1967年1月下旬，湖南各派群眾組織開始奪權。《湖南日報》社內部群眾組織宣布奪取報社領導權，聲明該報從此脫離中共湖南省委領導，也不再是省委的機關報。報社內部奪權又招來外部奪權或反奪權。湖南大學一部分群眾組織抬走人民委員會存有印鑑的保險櫃，聲稱奪了省人委的權。1月15日和20日，湖南兩大派群眾組織「長沙市高等學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高司」）和「湘江風雷」分別召開「批判中共湖南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等被掛牌批鬥遊街，並被群眾組織控制起來失去自由。張平化後來被省軍區找到離長沙去北京，中共湖南省委完全癱瘓。2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批示湖南省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要「採取專政措施」，¹¹³此後，「湘江風雷」遭到嚴厲鎮壓。2月27日，湖南省軍區主持

112 參見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大事記》（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頁376。

113 中央文革小組的批示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和『紅旗軍』的頭目，應當立即採取專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眾。」

召開全省三級幹部會議，宣布由軍區會同地方成立省生產領導小組，負責全省工農業生產事宜。¹¹⁴

3 「三支兩軍」

在全國大多數地區，群眾性的奪權以後，原來的黨政機關均已癱瘓，由此造成的權力真空則由軍隊來填補。1967年2月23日，周恩來與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要求各省、地、縣各級都要以軍事部門為主，立即行動起來，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領導春耕生產。¹¹⁵ 3月12日、13日，《人民日報》連續報道北京市懷柔縣成立了由縣委書記、副縣長、縣武裝部負責人、當地駐軍代表及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抓春耕生產的消息，並先後配發題為〈建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春耕期間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不奪權〉的社論。13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召開的全軍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呼籲：無論如何要在3月份解決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各級領導機構成員要以解放軍為主，光靠群眾組織不行。如果沒有領導機構，可以先成立生產指揮部。現在就抓，不能再晚了。14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起草給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黨委的電報，電報指出：「北京懷柔縣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的經驗很好。」「中央認為，懷柔縣的經驗應在全國推廣。全國各省(市)、專區、縣各級革命群眾組織、革命領導幹部和人民解放軍當地軍事領導機關或駐軍，都要立即行動起來，以軍事代表為主，建立一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尤其要迅速建立縣一級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要拿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動員一切力量，狠抓農業及其增產措施，狠抓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對春耕生

114 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黨史委編著，文輝抗、陳清林、李萬青主編：《湖南五十年大事記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216-217。

11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31-132。

產的支援工作。」起草後，周恩來將電報稿送毛澤東批准，並註明：「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接近於『三結合』的籌備小組，但以抓生產為重點，或者就是軍管會下抓生產的班子。如能組成，不論何屬，都是好事。」¹¹⁶於是，各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以軍人為首的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各地名稱各異，有的叫指揮部，有的叫辦公室）。1967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全軍支農部隊達到73.9萬人，第二季度每天支農人員在50萬人以上。到1968年，全軍共抽出116個團、119個營、2666個連、125個排、861個宣傳隊，到1236個縣（市）的社、隊，進駐定點支農。僅1968年第二季度支農就動用汽車二萬多輛、各種機械八百多台、馬車三千多輛，勞動日達三千多萬個。¹¹⁷

3月10日，周恩來在得到毛澤東關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前要先開工人、農民、中學生代表大會或群眾大會的批示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說已告謝富治和解學恭，要求他們先開各種代表大會，然後再開全市革命組織協商會議和群眾大會，宣布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程序。毛澤東批示：「各省、市亦宜照此辦理。凡條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條件成熟，然後舉行。處於無政府狀態者，則先實行軍管。」¹¹⁸3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各省、市、自治區一級的奪權，在採取行動之前，應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來京同中央商量。沒有經過中央同意，不要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不要在地方報紙上報道和廣播電台上廣播奪權。」

3月19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軍委決定：

（一）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暫告一段落。除了照顧戰備、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視情況抽調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

116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36。

117 鄧攬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47。

1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60。

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這些單位究竟能抽調多少人員，何時開始，由各總部、軍兵種黨委討論決定。

(二)各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包括各軍區所屬的這些單位)，可在整風告一段落後，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為這些單位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步驟。這樣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力量，又可以使這些單位的人員，更好地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向工農群眾學習，促進思想革命化。這些單位的整風何時結束，能抽調多少人員，何時開始，由各總部、軍兵種、大軍區黨委討論決定。

(三)各總部、軍兵種(包括在北京的所屬院校)抽調的人員，由總政治部統一分配、使用。駐各軍區所在地區的院校抽調的人員，統一由各大軍區、省軍區領導、調配和使用。¹¹⁹

4月3日，中央軍委常委開會討論了加強「三支兩軍」辦事機構問題，決定在中央軍委設立三個辦公室，即支左辦公室、支工支農辦公室、軍管辦公室，軍訓工作由總參、總政分管，不另設辦公室。並決定：支左辦公室，由蕭華直接與中央文革聯繫；支工支農辦公室，由楊成武、邱會作等組成；軍管辦公室，由葉劍英主持，吸收總參、總政及軍委辦公廳的負責幹部參加。各辦公室的任務是：了解情況，研究問題，並負責向中央、中央文革、軍委反映情況，提出建議，辦理中央、中央文革、軍委交辦的事項。按照中央軍委的規定，人民解放軍師以上機關都設立了「三支兩軍」指揮部(或辦公室)。

「三支兩軍」工作從1967年1月下旬開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陸續派出了大批幹部、戰士執行這項任務。從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間，每月投入「三支兩軍」的部隊人員，均在90萬人左右。當中最多時為1968年上半年，全軍參加「三支兩軍」的人數達到95萬多人(其中瀋陽軍區10萬餘人、京軍區10.2萬餘人、濟南軍區4萬餘人、南京軍區11.4萬餘人、福州軍區12.4萬餘人、廣州軍區5萬餘人、武漢軍區12.5萬

119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61。

餘人、成都軍區11.5萬餘人、昆明軍區4.7萬餘人、蘭州軍區10.2萬餘人、新疆軍區1萬餘人、西藏軍區3200餘人、總部各機關6300餘人)。空軍出動飛機1976架次、海軍出動艦艇237艘參加「三支兩軍」工作。¹²⁰九大以後，隨着各級革委會的成立，形勢逐漸穩定，「三支兩軍」的人員逐漸減少。

毛澤東決定派軍隊支左，其根本目的是支持造反派的全面奪權。但在文化大革命混亂複雜的局面下，軍隊很難分辨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而且由於各種原因，軍隊大多對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與保守派在許多問題上有共鳴。軍隊開展支左後，大多數大軍區和省軍區、武裝部都在支左問題上犯了「錯誤」。

3月3日，毛澤東在瀋陽軍區的一個報告上批示：「軍隊不能坐視工業生產下降而置之不理。」¹²¹ 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信中宣布：「黨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大力協助地方，支持工業生產工作。」¹²² 3月上旬到4月上旬，全軍各部隊派出幾萬人的宣傳隊，深入到8354個廠礦企業，宣傳「抓革命、促生產」。1967年和1968年全軍的支工人數都達到十幾萬人。¹²³ 部隊支工使遭受嚴重破壞的工業生產得到某種程度的恢復，一些因武鬥而癱瘓的重點工程得以繼續進行。解放軍參加了這一時期許多重點工程的建設；參加鐵路、公路新線的建築；派出人員、機械到車站、碼頭突擊裝卸、運輸，解決壓車、壓船、壓港問題；以至頂班採煤採礦。自1966年起，解放軍先後組建了冶金、煤炭、黃金、鈾礦等專業部隊，擔負國家急需的礦產資源的勘探、開採任務。

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通知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派軍隊幹

120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41。

121 毛澤東在瀋陽軍區組織機關幹部到工廠宣傳毛澤東思想情況簡報上的批語（1967年3月3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48。

122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59。

123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46。

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這樣做，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組織紀律性。駐京部隊派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經驗很好，很有成效，應當在全國推廣。」1967年3月7日，毛澤東又對天津警備區司令員鄭三生等關於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的報告上批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預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¹²⁴ 軍訓最開始是為了保證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的安全，維護好秩序，駐京部隊奉命對外地來京串連的人員，進行接待和組織工作。後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軍訓的內容由原來比較單純的軍政訓練變成了全面參與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部隊抽出幹部、戰士，組成「軍宣隊」或「軍訓團」進駐學校，參與組織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軍訓。

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愈來愈混亂的局面嚴重危及邊防沿海、專政機構、機要檔案、國防工廠、重要倉庫等要害部門的安全和正常工作。從1967年1月至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陸續作出對一系列單位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和指示。

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省、自治區有九個，即江蘇、浙江、安徽、廣東、雲南、青海、福建、西藏、河北。全國實行軍管的大城市有二十五個，如南京、廣州、旅大、汕頭、阜新、鎮江、無錫、常州、揚州、溫州、淮南、湛江、個舊等；全國實行軍管的專區（包括自治州和特區）有十九個，如大慶特區、伊春特區、延邊、南通、舟山、銅陵特區、惠陽、佛山、海南島、麗江、臨滄、保山、思茅、紅河、文山、阿里、玉樹等；全國實行軍管的縣有176個。

中央各部除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系統外，預定實行軍管的有三十七個部委，國防科委向所屬的五十八個院、所、廠，派出了軍管會或軍管小組；國防工辦所屬二、三、四、五、六、七機部均實行軍管，同時也對各機部所屬的六十一個院、所、廠派出了軍管會（組）。

1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61、250。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國大部分地專以上所屬的銀行和倉庫均實行了軍管，共有1219個銀行實行了軍管和軍事保護，佔全國實有數2876個的42%。全國實行軍管的廣播電台(站) 547個，佔全部電台2295個的24%。全國實行軍管的報社111個，佔全部210個報社的53%。省以上的公安部門，除遼寧、黑龍江、河北、山東、上海、湖南、貴州、河南、湖北外，其餘20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安部門實行了軍管。全國18個鐵路局中有齊齊哈爾、吉林、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烏魯木齊、昆明等10個鐵路局實行了軍管。沿海中央直屬的15個港口，軍管了9個，即上海、大連、秦皇島、天津、青島、黃浦、連雲港、湛江和海口。全國實行軍管的廠礦共有1041個，另軍事保護的廠礦153個，其中煤礦、國防工廠佔較大的比重。對部分軍隊單位也實行了軍管，如北京地區的總後301、302、309醫院、北京軍區總醫院、京西賓館、高等軍事學院、軍事博物館、總政1201印刷廠、總後裝備技術研究院和軍事醫學科學院。¹²⁵

六 「二月逆流」

在全國範圍內搞大規模的奪權運動是史無前例的。1967年2月，陳毅、譚震林等為代表的所謂「二月逆流」，反映了全國大多數幹部和群眾對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等一些極端做法，特別是對奪權運動的懷疑、抵制和反對。但「二月逆流」其實是在接受和服從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總的指導思想的前提下，所做的一些很有限的反抗。在毛澤東的堅決反擊下，陳、譚等人遭到嚴厲批判，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文化大革命的戰車繼續朝着更左的方向呼嘯前進。

125 鄧捷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47-48。另據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其中有些數字與此處不同，如該書中說：軍管的銀行數為1400多個。

1 北京軍區事件

在全國各大軍區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形勢也和地方一樣混亂不堪。到1967年初，出現了許多嚴峻的局面。幾個大軍區出現了造反派亂揪亂鬥軍區負責人的事件，中央軍委頻頻收到告急電報。1月1日凌晨2時20分，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急電：「昨晚9時，有數千名造反派學生衝進軍區大院，毆打警衛戰士，揪鬥軍區領導，唐子安副司令員在揪鬥中被打成重傷，生命垂危。目前，衝擊仍在繼續。請軍委指示。」1月1日凌晨3時，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張才千急電：「昨晚11時，大約萬名紅衛兵搜抄了八名軍區領導的住宅，兩名部長和一名副政委被抓走，下落不明，請軍委指示。」1月1日上午9時，解放軍藝術學院「星火燎原」的造反派衝擊北京軍區司令部大樓，並揚言要查抄所謂「華北黨」。軍區司令員楊勇果斷下令，將造反派關進了地下室。下午2時，毛澤東親自打電話向楊勇詢問此事，楊勇回答：「報告主席，今天上午軍區門衛、內衛和總值班室都向我報告，這夥人強行衝擊軍區司令部辦公樓，砸了檔案室，撬開了保險櫃，威脅到核心軍事機密。當時我就在辦公室，沒有接到任何通知。既然中央文革沒有通知我這是革命行動，我也就無法判斷他們是革命左派。因此我採取了適當的防衛措施。」毛命令楊勇立即放人，楊勇表示堅決執行命令。毛澤東不無幽默地補上一句：「我們就把上午的事情當作一次防突襲演習吧。」¹²⁶其實，毛澤東、林彪早已對北京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有所不滿了。1966年5月成立首都工作組時，北京軍區的兩個副司令員（鄭維山、傅崇碧）成為組員，而司令員、政委卻都沒有參加。8月18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楊勇、廖漢生（軍區政委）提出了「封鎖」林彪的問題，要求他們「尊重林彪同志，多請示，多匯報」。¹²⁷北京軍區原計劃各軍級單位以上的機關從9月開始搞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根據軍委、總政的指

126 姜鋒等：《楊勇將軍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頁404—406。

127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258；舒雲：《百戰將星——楊勇》（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頁264。

示暫緩進行。1967年1月7日，北京軍區召開第120次常委會議，決定軍區司政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於1月9日開始，並決定由軍區副政委陳先瑞、副參謀長宋玉林等組成一個班子抓工作。此時已經把楊勇、廖漢生排除在外了。¹²⁸

據陳先瑞回憶：1967年1月初，林彪面示楊勇：「北京軍區文化大革命趁勢展開，燒掉廖漢生。」對此，楊勇感到很為難，於是就請示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問他怎麼辦，蕭華說由他請示中央文革小組後再說。很快，就有了答覆，說由上面派人到北京軍區貼大字報、點火，這樣，軍區機關的「四大」就可以乘勢展開了。¹²⁹ 1月8日晨5時，《人民日報》社負責人唐平鑄、《解放軍報》社負責人胡痴等奉林彪、陳伯達、江青等人之命將他們七人署名的大字報送到北京軍區，貼在軍區主樓的橫樑上，內容為：廖漢生反毛澤東思想，封鎖林副主席，同楊尚昆、賀龍有黑關係。¹³⁰ 大字報十分引人注目。軍區各群眾組織看了大字報後立即採取行動。戰友文工團「燎原」、軍樂團「星火」和其他一些人，抄了廖漢生的家，查封了他的文件，然後「燎原」一批人又把當時正在參加軍區常委會議的廖漢生從會場「揪」走。楊勇等軍區領導人事前並不知情，但事情發生後，軍區黨委召集各群眾組織負責人開會時，軍區幾位領導人都在會上就「揪廖」表了態，大意是：堅決支持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廖是百分之百的三反分子，是賀龍一條線上的人，是陰謀搞政變的，大家把他揪出來好得很，但要保證他的安全。廖在軍區關了四五天，由軍區警衛營看管。戰友文工團「新燎原」1月12日偷偷把廖送往中央樂團地下室，後又交北京衛戍區看押。¹³¹ 廖的被揪

128 舒雲：《百戰將星——楊勇》，頁265。

129 陳先瑞：〈廖漢生、楊勇被抓與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問題〉，《百年潮》，2000年第4期，頁40。

130 據《廖漢生回憶錄（續）》中說，1979年秋，大字報的署名者中的一位給他寫了道歉信，披露了事情的真相：1967年1月5日晚，林彪辦公室打電話通知那幾個人到毛家灣林彪家裏去。在林彪家裏參加接見的還有陳伯達和江青。林彪、陳伯達、江青當面向他們布置了寫大字報的任務。參見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頁294。

131 王年一：〈關於賀龍冤案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2年第4期，頁8。

出打倒顯然得到了中央的認可。廖漢生被抓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曾在總政翠微路招待所，臨時召集北京軍區領導開會。他當着楊勇和北京軍區其他領導人的面，說楊勇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1月20日前後，在北京街頭和軍隊內部出現了一份署名「總政紅色造反團漫天雪戰鬥隊」的傳單〈揪出三反分子楊勇〉。¹³² 1月22日清晨，北京軍區一些造反派前往京西賓館揪鬥楊勇，與楊勇的警衛員形成對峙。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在電話中給楊勇的警衛員下命令說：「楊勇有問題，你交人吧。」¹³³ 造反派給楊勇戴上鐵絲簍子做的高帽子，把他拉到北京軍區大院進行遊鬥。此後，楊勇即被隔離。

陳先瑞認為，楊勇、廖漢生是怎麼被打倒、關押起來的問題本來是清楚的，但上面又幾次追查是哪個方面下的命令，誰把他們抓起來的？1967年3月，上面追查抓楊勇的問題，北京軍區寫了報告，並請求批示，但上面沒有批覆。對此，陳先瑞感到很不理解。他們一個是副總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一個是國防部副部長兼軍區政委，誰敢抓他們呀？如果抓錯了，上面說一句話不就放出來了嗎？

陳先瑞的文章還披露：1973年，當時任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的紀登奎曾負責清查楊勇、廖漢生之事。在周恩來的過問下，紀登奎在軍區黨委常委會上作了結論：楊勇、廖漢生被抓起來，關押審查，經反覆核查，北京軍區沒有責任，上面誰批准的，怎麼定的，以後誰也不要問了。¹³⁴

廖漢生、楊勇突然被打倒的原因和經過撲朔迷離，至今無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打倒楊勇成為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的一項罪名。會上有人揭發說：是徐、聶、葉三

132 據鄭維山在林彪授意和支持下篡奪北京軍區領導權(鄭維山的反革命罪行揭發材料之六)中說，這張傳單是根據楊成武的夫人趙志珍的授意寫的。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33 參見舒雲：〈楊勇和警衛員孫啓增〉，《縱橫》，2000年第7期，頁36。

134 陳先瑞：〈廖漢生、楊勇被抓與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問題〉，《百年潮》，2000年第4期，頁21—22。

人點頭抓楊勇的，後來他們推脫責任，說是上面點頭的。在會議期間，還把當事人鄭維山找來，與徐、聶、葉三人當面對質，鄭維山言之鑿鑿地說：「是在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你們三人點頭的，說對楊勇要燒，要燒焦。」周恩來在會上講話中提到此事時，也是將責任歸於徐、聶、葉。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開幕時，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楊勇：「有些地方對幹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將來還是要工作的，群眾理解了，就解放他們。北京的楊勇是怎麼回事？……這些人總還是有功勞的吧？」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打倒廖漢生、楊勇成為林彪的一個罪狀。在批判鄭維山時，說鄭參與了策劃打倒廖、楊事件，篡奪了北京軍區的領導權。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與會人員時說：楊勇是怎麼一回事？（葉劍英：當時我也不清楚。）廖漢生為甚麼要抓？（周恩來：廖漢生是與賀龍有關係。就是賀龍，主席當時也不同意這樣搞。）楊勇這個事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對我說過，後又不承認。¹³⁵ 1972年7月7日，毛澤東曾有一批示：「送總理閱處。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請交劍英、德生一閱。」¹³⁶

文革後，鄭維山在回答總政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徐厚田詢問此事的情況時道出部分內幕：1967年1月21日晚，在三座門開會，老師們說，鄭維山，毛主席有指示，對楊勇燒而不焦，你回去後執行。但沒有做具體的解釋。讓副司令員去「燒」司令員，鄭維山一頭霧水，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在會後再去請示。電話打到徐向前處，徐的警衛參謀說徐剛睡下，不能驚動。鄭又找到聶，聶說：這是毛主席的指示，你就看着辦吧！鄭只好硬着頭皮回軍區。但是毛澤東的話早已傳到軍區，等鄭回去，楊勇已經被抓起來了。廖、楊被抓後，軍區造反派說軍區黨委是黑

135 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的講話（節錄）（1971年11月1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02。

黨委，便把鄭維山在內的幾位副司令員、副政委也都抓起來了。¹³⁷後來經徐向前親自給軍區造反組織打電話，才把鄭維山等人放了。¹³⁸

鄭維山所說與現有材料有一些出入，在當時的揭發材料中說：1月21日晚11時，鄭回到軍區後，就布置抓楊勇，說：「楊勇是彭德懷分子」¹³⁹，「這次楊勇為蕭華的問題跳了出來，要把他燒焦、打倒。」12時，鄭讓秘書打電話找了幾個人到他的辦公室布置說：「楊勇是漏網的彭德懷分子，要砸爛，要燒焦。怎麼搞法，你們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們幾個人了，你們一定要保密。」¹⁴⁰

在現存的文革資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1967年1月20日早8時，徐向前在回答北京軍區「紅色尖兵」戰鬥隊的提問時說：「楊勇是彭德懷式的人物，關於怎樣鬥他，你們自己解決，關於其他人，你們自己去揭發。」同日，陳伯達在講話中說：「我請示軍委四位副主席¹⁴¹後，四位副主席說，北京軍區問題很嚴重，是奪權和反奪權的問題。楊勇的問題準備在運動後期解決。但是他現在跳了出來，因此由你們行動解決。」

所謂「楊勇為蕭華的問題跳了出來」是怎麼回事呢？大致情況如下：1967年1月19日下午，京西賓館的軍委碰頭會上，江青等人狠批蕭華，準備讓蕭華當天晚上在萬人大會上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¹⁴²會後徐向前宣布要嚴格保密，不准外傳。但會上已說要在北京開萬人大會，並給北京軍區分配了參加人數。楊勇回軍區即召開軍區常委擴大會，布置參加批蕭大會事宜，會未完，消息走漏。當晚，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和總政文工團的一些人抄了蕭華的家，沒抓到蕭

137 指張南生、吳岱、吳先恩等人。

138 舒雲：〈中將鄭維山平反的前前後後〉，《黨史博覽》，2002年第1期，頁16。

139 楊勇紅軍時期在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任職。

140 林彪反黨集團的大將鄭維山的反革命罪行揭發材料彙編(1974年4月2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41 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

142 這次批蕭華的活動後因毛澤東在當天保了蕭華而不了了之。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頁66—68。

華，把蕭華的秘書抓起來了。蕭華從後門走脫，跑到西山葉劍英處，才免遭揪鬥。對此事幾位老帥大為惱火，於是就有了1月20日的「大鬧京西賓館」。

在軍委碰頭會之前，幾位老帥已商量過楊勇的問題。徐向前為楊勇打了保票，說：「楊勇是個好同志，是員戰將；……不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均作出了重要貢獻，楊勇同志主持北京軍區的工作，擔子很重，也很盡職，有事及時向我們請示匯報。」¹⁴³ 為甚麼徐向前後來改變了說法呢？合乎邏輯的解釋只能是：毛、林表態了，說話了。

1967年1月29日凌晨（1時零5分至4時45分），周恩來與徐向前、鄭維山在國務院會議廳接見北京軍區幾個造反派組織，周恩來在講話中說：「廖漢生和楊勇的問題，要批深批透」；「廖漢生在北京軍區一向不突出政治，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按林副主席指示辦事，不貫徹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八作風，不認真學『老三篇』」；「廖漢生和賀龍的關係，跟的很緊。」「楊勇在北京多年，從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匯報。……廖漢生封鎖林副主席，楊勇也封鎖林副主席」；「楊勇把矛頭對向蕭華同志，完全是錯誤的，想要把水攪混，他自己可以逃脫。我就懷疑抓廖漢生是他布置的。」周恩來在講話中表揚了鄭維山，說他對毛主席無限忠誠，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我們很信任他」，並宣布鄭為北京軍區代理司令員。筆者注意到，周恩來在講話中說了一句很關鍵的話：「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倆（按：指周與徐）找大家談談。」¹⁴⁴ 這也進一步印證了毛、林在北京軍區事件上是講了話的。徐向前2月1日在接見總後系統造反派時，有個造反派代表說，我們把廖漢生揪出來，鬥了廖漢生。徐向前說：「你們可以這樣認為，但我們心中有底，廖漢生並不是群眾揪出來的。」¹⁴⁵

143 舒雲：〈中將鄭維山平反的前前後後〉，《黨史博覽》，2002年第1期，頁16。

144 周恩來徐向前接見北京軍區幾個革命組織時的講話（1967年1月2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45 徐向前與總後勤部系統革命造反派組織代表的談話（1967年2月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 《解放軍報》的奪權

在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解放軍報》曾經因為宣傳突出政治而大出風頭。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這兩家重要的宣傳機構都由《解放軍報》的負責人出面接管，唐平鑄任《人民日報》的代總編輯，胡痴任新華社代社長。但到1967年1月，《解放軍報》也未逃脫被奪權的命運。1967年1月13日清晨，《解放軍報》社內以毛澤東與江青的女兒李訥(化名蕭力)為首的幾個人，在報社辦公大樓內貼出了一張題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揭開了《解放軍報》社的奪權序幕。這張大字報提出：

[軍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來，在劉志堅反動路線的直接影響下，報紙的宣傳和社內的文化革命就背離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走上歧途。……幾個月來，軍報宣傳的方向偏了，報社內部的文化革命也相當一段時間冷冷清清，常委一開始就為運動劃框框、定調子，繼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壓制革命群眾的積極性，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派工作組到工廠頑固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群眾鬥群眾。直到廣大革命群眾紛紛起來革命的今天，社黨委仍然以正確者的姿態出現，不承認犯了路線錯誤，軍報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完全是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惡果，胡痴同志身為黨委書記，在這方面是負有嚴重責任的。……報社黨委在思想上貫徹了劉志堅的一套黑貨，在組織上包庇了一批有反黨罪行的、有嚴重錯誤的人，把他們放在主要的領導崗位上。

大字報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擊隊」。《解放軍報》社內掀起大揭發、大批判和大揪鬥的高潮，胡痴、和谷岩(《解放軍報》社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原記者處副處長)等人遭到揪鬥，唐平鑄也成為揭批對象和鬥爭目標。唐、胡、和三人剛剛成為改組後的全軍文革小組成員還不到一周時間即慘遭厄運。

1月17日，林彪親自寫信表示支持蕭力等人在《解放軍報》社的造反行動。林將此信報毛澤東時附言道：「主席：《解放軍報》的問題是否如

此答覆請批示。」毛澤東收到後立即作了批覆：「同意，這樣答覆好。退林彪。」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同志們：

《解放軍報》社由蕭力、方撫時、孫浩剛、李志高、宋玉芬、武將、楊秉文、劉福山等八位同志組成的革命造反突擊隊，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你們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你們的行動，好得很！我堅決地支持你們！

「亂」不要緊，「亂」然後才能治。

《解放軍報》，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報紙才能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為了照顧人民解放軍的威信，照顧國際影響，對於《解放軍報》要採取「內批外幫」的方針。在報社內部，革命烈火燒得愈旺愈好。但在形式上不能採取《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做法，不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解放軍報》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軍書之類的東西。以胡痴為首的小集團要那樣做，完全是個陰謀。對於這個陰謀必須揭穿。對胡痴等人，必須徹底揭露，徹底批判。報紙的社論、評論，責成總政蕭華同志關鋒同志負責，重要的社論、評論，送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審閱。

《解放軍報》是保護單位之一。你們要耐心勸說學生和其他機關的幹部，不要到辦公大樓上去。你們可以在辦公樓外邊設接待站，接待來訪的學生和幹部，聽取他們的意見和批評，歡迎他們送大字報。勸說他們不要到《解放軍報》社揪人，要相信報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林彪

一月十七日¹⁴⁶

當晚，徐向前、葉群、蕭華、關鋒等來到《解放軍報》社，宣讀了林彪的信和毛澤東的批示，正式肯定了蕭力等人的造反行動。

儘管林彪在信中說「《解放軍報》是保護單位」，但還是沒能阻止很多軍事單位，尤其是大批軍事院校的造反派湧向《解放軍報》社。1月20日，在聽到傳聞說，北京的紅衛兵組織正在接管《人民日報》社，已經得到中央文革王力、關鋒等的支持，裝甲兵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串聯了七個造反組織共一千多人，先在裝甲兵部機關大院召開了準備接管軍報的籌備和策劃會議，成立了一個「接管《解放軍報》臨時指揮部」。中午時分，大批人馬開到《解放軍報》社，並與《解放軍報》社內部不同意接管的人發生了衝突。一段相持過後，外來的造反派開始衝進辦公大樓。中央文革小組得到消息後，由陳伯達親自兩次發布緊急通知，要求外來人員退出報社，未果，又派關鋒到報社與外來造反派代表談判，逼迫他們退出報社。同時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出面，將領頭衝擊報社的裝甲兵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頭頭王澍逮捕。這起衝擊軍報的事件後來被定為報社內部一些人「同軍事院校一小撮壞人相互勾結奪軍報的權，並妄圖綁架蕭力同志」的「反革命事件」，不少當事人慘遭迫害。¹⁴⁷

此後，在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主持下，《解放軍報》社成立了臨時黨委，由原副總編輯張秋橋（張春橋之弟）任副書記，主持工作。入伍、入黨才幾個月的蕭力成為黨委委員。稍後，總政治部調原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副院長趙易亞到《解放軍報》社任總編輯、臨時黨委書記。趙易亞上任不及半年，蕭力再次造反，將趙易亞挑落馬下，並取而代之。這樣，蕭力白手起家，從一個「新兵蛋子」陡然躍升為全軍矚目的軍級單位的第一把手。這並非二十幾歲的蕭力有多大本事，實際上是站在蕭力背後的毛澤東、江青支持、操縱的結果。

3 兩個「大鬧」和《軍委八條命令》

除北京軍區外，其他幾個大軍區也出現了混亂的局面。周恩來在1月29日的講話中就提到，瀋陽軍區政治部貼出大字報，圍攻陳錫聯，

147 盧弘：〈《解放軍報》「1·20反革命事件」始末〉，《縱橫》，2001年第11期，頁13—16。

中央決定保護陳，由蕭華代表中央去保陳。在福州軍區，韓先楚也遭到圍攻。南京軍區文工團的造反派把許世友以下的軍區負責人拉出去，逼迫他們跪下來接受批鬥。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強調：「地方愈亂，軍隊愈要穩。不然，敵人乘虛而入怎麼辦？」他列舉大量事實說明，全國十三個軍區，有七個軍區在搞運動。全軍157所院校都在搞運動。到處抓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目標就是抓各個軍區、軍種兵種的領導人。三個總部，總後癱瘓了，總政幾乎癱瘓，總參部分癱瘓。海軍癱瘓了，空軍癱瘓了。凡癱瘓了的單位，所有的辦事機構、會議室、招待所全部被佔領。領導人來一個抓一個。他說：「現在空軍指揮部只好轉移到戰備工事中去。如果全國空中有甚麼事，指揮中斷了，事情誰去辦？」¹⁴⁸

1月20日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舉行。徐向前和葉劍英二人就蕭華被抄家之事拍案而起，大發脾氣。同時與會的江青、陳伯達等人當時都被震懾住了。此事史稱「大鬧京西賓館」。

1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的高級將領。毛澤東要求軍隊「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戲一樣，要亮相」。他批評許多軍區把造反派講得一片黑暗，好像一點光明也沒有。他要求軍隊「能公開支持的，就公開支持，時機不成熟的，就半公開支持」。許多軍隊幹部向毛澤東訴說部隊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問題和運動中受到殘酷鬥爭的情形。當北京軍區的幹部說到司令員楊勇被抓走了時，毛澤東說，那還了得，到處抓人怎麼行！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說，造反派點名揪我，我抗議！高帽子是給地、富、反、壞、右戴的，為甚麼要給我戴？我跟了毛主席這麼久，把我當地主鬥，我想不通！毛澤東說，那些辦法是當時對付土豪劣紳的，用來對付共產黨的幹部

148 范碩：〈沖天一怒京西賓館〉，《中華兒女》，2000年第12期，頁17。文中「有七個軍區在搞運動」，應為六個，根據〈中央軍委關於各軍區開展文化大革命步驟問題的決定〉和〈中央軍委重申軍區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進行的指示〉，「處在反帝、反修第一線的軍區（濟南、南京、福州、廣州、昆明、新疆）和有隨時策應各軍區任務的武漢軍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都在「暫緩進行」之列。

是不好的。第二炮兵政治委員李天煥向毛澤東報告：副司令員吳烈被包圍了。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毛澤東說，要允許工作，不能過頭了，不能搞逼供信。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後，軍委碰頭會就軍以上機關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方法，以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的名義向毛澤東、林彪寫出〈請示報告〉，要點如下：一、大軍區、省軍區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進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錯開，何時開始，要經中央軍委批准；二、堅持文鬥，不武鬥，不許抓人，不許動手打人，不許戴高帽子，不許遊街，不許抄家；三、軍隊不許奪權；四、在外地串連的軍隊人員一律返回本單位；五、運動一定要堅持黨委領導的原則；六、不許衝擊和佔領軍隊領導機關。

1月24日，徐向前親自去林彪家反映軍隊的混亂狀況，提出自己的意見。林彪此時和徐向前、葉劍英等人在「軍隊不能亂」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對於中央文革江青等人對老師們和軍隊的責難，林彪表態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¹⁴⁹ 林彪表示：軍隊不能亂，我同意軍委搞一個文件。當即由他口授，秘書記錄，整理了七條。後經陳伯達、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等參加討論，形成初稿。又拿到釣魚台徵求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周恩來、陳毅等參加)。1月25日，林彪將「七條」呈送毛澤東審閱，並附一信，報告了「七條」產生的過程。

毛澤東對林彪的信和「七條」十分重視，他在林彪的信上多處劃了着重號。林彪給毛澤東的信附有五個附件，這些附件同樣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

[149] 林彪還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對她大發了一頓脾氣，說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和領導的，現在走到了修正主義邊緣，怎麼解釋？我這個國防部長怎麼交代？是修正主義，我們國家還有甚麼希望，不就完了嗎？盛怒之下，林彪把跟前的茶几都給掀翻了，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並要到毛澤東那裏告狀，辭職不幹了。葉群嚇得大哭，拼命拉住林彪，勸說他千萬不能和江青鬧翻，無論如何也不能得罪江青。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197。

附件一是1月25日上午10時全軍文革辦公室一工作人員的電話記錄，內容是：「烏魯木齊第二造反司令部、軍區步校造反團、新疆軍區參加五大的代表共五六百人，1月23日到司令部大樓，要開大會，罷官奪權。」

附件二是1月25日上午，南京軍區許世友司令員及其秘書的電話記錄。9時，許世友的電話記錄內容是：「現在軍區很亂。全國三軍院校各造反團體，都在南京鬧。軍區三個常委被罰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罰了跪，後勤部正副政委被拳打腳踢。司令部把張才千副司令抓走了，現在下落不明。」10時，許世友秘書報告了「昨天下午，軍區首長被罰跪、撕掉帽徽、領章」的具體人員名單。這個電話記錄引起了毛澤東的很大關注，他在記錄上多處劃了槓槓。

附件三是1月25日下午1時40分南京軍區王必成副司令員的電話記錄，內容有二：一、許司令來電話說，可調一個營的部隊，保護軍區機關，如果有壞人來搞，可以自衛。二、如果有人來搞我們軍區的指揮所，如何處理。

附件四是邱會作給林彪、葉群的信和邱會作妻子胡敏的電話記錄，反映邱會作被總後造反派揪鬥的情況。

附件五是徐向前1月25日上午10時給林彪的信，信中報告了「七條」討論情況，並重申：「總之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柱，……必須要穩當點，才好辦事。否則軍隊不易控制，指揮失靈，副作用即會更大多了。」徐在信中還提出：「全軍文革工作，或直由中央文革領導進行，由你直接掛帥抓總。層次不宜多設為好。否則甚易誤事。我只能作一點具體工作，免吃老本。」¹⁵⁰

毛澤東於1月26日批示：「所定七條，很好，照發。」毛並提出：「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經過在京的軍隊領導幹部的討論，「七條」很快修改成「八條」。1月28日，毛澤東正式批准。〈中央軍委命令〉全文如下：

150 胡長水：〈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產生原因析〉，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頁2002—2003。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全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為了適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發展的新形勢，特規定如下：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撒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連。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

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女子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以上規定，從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體指戰員、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同志，必須嚴格遵守，違者要受紀律處理。¹⁵¹

中央軍委辦公廳在下發八條命令的通知中，要求廣為張貼，並要印成材料，做到每個指戰員人手一份。2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出：這個命令，除第七條關於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條，都適用於地方。

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過火行為做了限制，規定不許衝擊軍隊，使一批軍隊幹部感覺有了對抗造反派的尚方寶劍。

2月5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中央常委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參加外，葉劍英、江青、王力列席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提出，由於一些人被打倒，書記處負責的工作沒人抓。毛澤東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毛澤東就湖南「湘江風雷」問題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他拿出2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2月3日關於「湘江風雷」的情況報告所作的批示，對陳、康、江三人說，為甚麼匆忙發出這個批示？也不送給我看。毛澤東進一步批評說，文革小組沒有民主集中制，這怎麼行？……一直到現在還沒建立起制度。不只是文革小組內部沒有民主集中制，而且對我也不報告，文革小組沒有經過正式會議作出過決定，各人說各人的，康生說一套，陳伯達說一套，江青說一套，對上也沒有報告。

2月10日，毛澤東再次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毛澤東說：「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

15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62。〈中央軍委命令〉初稿中原有「軍以上機關（司、政、後、科委）的文化大革命，一概不能成立戰鬥小組，已經成立的一概取消」一條，在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時被刪掉。

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指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裏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只有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這是因為毛澤東原來沒看到陳伯達1月4日關於打倒陶鑄的講話記錄，看到以後，非常不滿。毛澤東說，文革小組要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他讓王力立即打電話叫在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回北京參加會議。毛還講：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只准在這個地方說，在文革小組批評，在別的地方一概不准談。毛澤東還提出常委會的範圍要擴大，並提名增加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關鋒、戚本禹等人。¹⁵²

儘管毛澤東說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在別的地方一概不准談，但葉劍英和李富春還是向幾個元帥和副總理透露了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

152 這裏採用《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73—974)裏的說法，曾濤在《正義的抗爭——所謂「二月逆流」的前前後後》(載《回首「文革」》，下冊，頁814—815)一文中的說法稍有不同。曾文寫道：「2月6日，毛澤東再次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批評中央文革小組，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運動發動起來，你們有功，你們現在驕傲。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毫無經驗，沒有領導過罷工，沒有指揮過打仗和群眾運動，只是做了一些調查研究工作。陳伯達對我從不接觸，不談心，就是送一點文件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看得起的人。江青和陳伯達從來沒有勸過我，一個要節省一點，一個對幹部要寬大一點。毛澤東在談到幹部問題時說：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這裏來。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啓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沒有同林彪同志、總理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你們不也是十一中全會選舉的嗎？抓人只能抓反革命，不能抓犯錯誤的人，陶鑄、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賀龍、朱德等等。毛澤東接着說：今後，每周到我這裏談一次。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關鋒、戚本禹，不要另外搞三、四個常委的小組。平常我要多看些材料，一周一次會。日常工作總理多做一些。」可作參考。考慮到毛在談話中有讓王力打電話叫張、姚從上海回北京的內容，張、姚是2月12日回北京的，因此日期以2月10日較為合理。

引起了他們的共鳴。這些談話成為引發「二月逆流」的重要原因。所以後來毛澤東說，這些老同志是「借批評文革的東風」。

2月11日，經毛澤東批准，以中央軍委名義正式發出了葉劍英等人草擬的〈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條，即規定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2月16日，中央軍委又發布〈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規定軍隊可以奪權的範圍，「只限於學院學校（機要學校、尖端技術學校、飛行學校和有外訓任務的班、系除外）、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只限於解放軍總醫院、軍區、軍種總醫院、教學醫院）、軍事工廠（有尖端技術試驗任務的工廠、海軍基地所屬工廠和絕密工廠除外）。各學院學校、軍事工廠等單位的警衛、通信、練習、勤務和運輸分隊的權不能奪，也不准參加奪權。在規定可以奪權的範圍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單位都不准採取自上而下的辦法進行奪權。2月27日，中央軍委又對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作出補充規定：凡繼續開展四大的單位的文化革命戰鬥組織，應以基層行政單位進行改組，所有超越基層行政單位的文化革命戰鬥組織，如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各大單位的造反總部、聯絡站等，應一律撤銷。所有文化革命戰鬥組織所使用的宣傳工具，如有線廣播、宣傳車、印刷工具等，應一律移交各單位黨委文革辦公室。¹⁵³

2月11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¹⁵⁴

153 中央軍委的三個文件分別見於《「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90、293、326。

154 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67年1月11日決定取消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賀龍等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2月2日，周恩來致信陳伯達、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一、提議今後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時起在釣魚台開碰頭會，以文革（小組）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其他有關同志按問題性質臨時通知參加。」「二、提議今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志（周、陳、康、李）為主，副總理（陳、李、譚、謝）和劍英參加。務請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周恩來是想在當時的條件下繼續保持一種相當於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形式，以便決定黨和國家日常工作中的大事。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2月4日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22。但實際上，從2月7日起，由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還是按計劃隔日舉行一次。

葉劍英在會上指責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甚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甚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憤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政權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要不要支柱啦？要蒯大富這類人指揮軍隊嗎？康生反駁徐向前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甚麼了不起！聶榮臻在會上說：你們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聯動」成員、反動保守分子，進行打擊迫害，縱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有的還關押起來，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2月14日下午，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江青稱病未到會，實際上只批評了陳伯達。此前陳伯達很緊張，甚至想到要自殺。

2月16日下午，懷仁堂碰頭會繼續進行。會議原定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但一開始就陷入了爭論。譚震林見了張春橋就壓不住火，指責其不要黨的領導，目的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陳毅也將憋在心裏的話衝口而出：這些傢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會議主持人周恩來在三個多小時的會上，幾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當譚震林發脾氣準備離開會場時，才拍着桌子大聲將他叫回。當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幹部是從《紅旗》雜誌1966年第十三期社論開始時，周恩來當場責問康生、陳伯達：「這麼大的事情，為甚麼不叫我們看看？」周恩來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將會議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派汪東興前來聽會，但當他趕到懷仁堂時，會議已經接近尾聲。

從感情上說，周恩來肯定是同情譚震林、陳毅等人的，但他更具

有過人的精明。他並不同意他們這樣真刀真槍地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對着幹。據周恩來的秘書周家鼎回憶：1967年2月初，周恩來親自給幾位老師和副總理寫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大意是：運動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只能因勢利導，發氣無濟於事。要十分注意你們的言行，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節外生枝，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動。要他們「戒慎戒懼」，遇事三思……周恩來叮囑周家鼎親自送給幾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給本人，不要轉手，閱後由本人簽字帶回。周家鼎拿着信先後到過陳毅、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余秋里等人那裏。這封信簽名回來，周恩來看過後，就被銷毀了。¹⁵⁵

4 反擊「二月逆流」

周恩來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大鬧懷仁堂使原來處於被動狀態的中央文革小組有了反撲過來的機會。

當天晚上，王力、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到毛澤東處匯報了懷仁堂會議的情況。毛澤東對這些老同志的態度大為惱火。就在前兩天，2月14日，毛澤東還親自找幾位老同志談話，講中央文革小組是正確的。¹⁵⁶ 2月17日，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可能更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譚震林在信中說：

昨天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155 參見2002年3月4日《人物周報》。另外，錢竹偉：《廖承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也提到了周恩來這封信的內容：「你們一定要十分注意你們的言行，不要說過頭話，不要做過頭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難，不要節外生枝，不要叫別人抓住把柄……」（頁413）。

156 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1968年10月），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他們不聽主席的指示，當着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甚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衝口而出」，陶鑄、劉志堅、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對於這些錯誤批評過嗎，只批評陶鑄，其他人都未批評，而且，批評陶鑄為時很短，根本不給人改過的機會。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啓龍、江華就是如此。我們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百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¹⁵⁷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等人開會。毛澤東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

¹⁵⁷ 譚震林給林彪的信未見正式公布，具體文字有多種不同的版本，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82；《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頁237—238；中國二十世紀通鑑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二十世紀通鑑》，第四冊（北京：線裝書局，2002），頁4448—4449。

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麼！把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乾脆請美國、蘇聯一塊來吧！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甚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周恩來勸毛澤東不要這樣生氣，並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得好。毛澤東提議要把這件事拿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會上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¹⁵⁸

康生會後對王力等人說：「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毛澤東發怒的原因就在於他認為老同志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否定中央文革小組，要否定江青。王力說，原來康生對江青還敢說話，在毛澤東提出要批評江青時，他還拍着桌子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而19日以後，康生嚇壞了，從此康生在江青面前俯首帖耳。¹⁵⁹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七次批評陳、譚、徐等人的政治生活會，到會人員除參加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的以外，還有江青、葉群、關鋒、戚本禹、蕭華、楊成武、汪東興等。

毛澤東2月28日在陳伯達報送的一份材料上批示：「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值得注意。」在批陳、譚、徐的政治生活

158 據陳毅的秘書杜易回憶，在毛澤東嚴厲批評後，陳毅接連寫了兩封信，希望能與毛澤東見上一面，當面說明情況，消除誤會，但都未能如願。毛澤東在給陳毅的回信中說：「歷來犯錯誤的改也難。」「見面有期，稍安毋躁。」參見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32。

159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83。

會上，大鬧京西賓館和大鬧懷仁堂被當作反革命復辟的逆流，後來稱為「二月逆流」。

2月24日晚，戚本禹把到人民大會堂開會的師大「井岡山」負責人譚厚蘭找到一邊說：「你回去以後，派些人把人民大會堂周圍農大紅旗貼出的『譚震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這些大標語覆蓋上。」同時暗示譚震林有問題。3月4日下午，戚本禹、謝富治與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人座談，戚本禹說：「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聽說譚震林鎮壓造反派很厲害，那裏資本主義復辟嚴重，你們紅代會應該表態呀！劉少奇、賀龍這些人現在雖然倒了，但是他們的老同事、老部下還在，如果這些人掌權，我戚本禹的腦袋保不住了，聶元梓，你們幾個人的腦袋也保不住。」「甚麼聶元梓一派，甚麼師大派，甚麼地質王大賓，甚麼譚厚蘭，統統殺頭。」¹⁶⁰

3月7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校內開始貼出批判譚震林的大標語，師大「井岡山」發表關於炮轟譚震林的聲明，率先發動了北京紅衛兵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3月8日，北京城內到處貼滿了「炮轟譚震林！」「譚震林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等大標語。當天，師大「井岡山」、農大「東方紅」等十幾個組織衝擊在北京農業展覽館舉辦的「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召開了「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誓師大會」，高呼「打倒譚震林，解放全農口」等口號，並批鬥了農業部代部長江一真。3月10日，謝富治、戚本禹前往農展館，參觀了大寨展覽，並接見了師大「井岡山」的二百多人，師大「井岡山」匯報了幾天來批譚的「戰鬥經過」。謝、戚表示要把情況如實匯報給周恩來和中央文革，據師大「井岡山」總部負責人說，謝在聽取他們匯報臨走時說了句「造反有理！」

幾天之內，北京各個造反派組織紛紛表態，「炮轟譚震林，粉碎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因為與師大「井岡山」等組織存在種種矛盾，「新

160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24。

北大公社」在此問題上比其他組織慢一拍，但到3月11日，「新北大公社」也開始炮轟譚震林。「新北大公社」3月13日發表聲明說：「新北大公社鄭重聲明，決心把譚震林揪出來，鬥倒，鬥垮……新北大公社號召全體社員和全校革命師生員工積極行動起來，與兄弟單位革命造反派並肩戰鬥，把譚震林打倒，徹底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3月13日，紅代會發出通告，號召全市紅衛兵組織「猛轟譚震林，解放全農口」。3月14日，紅代會組織北京高校數十萬人走上街頭，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聲討譚震林「鎮壓農林口文化大革命、實行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下午1時許，各路遊行隊伍匯集天安門廣場，遊行至下午2時結束。過去周恩來對批譚一直持保留意見，但這時也改變了口徑，3月14日，周恩來的聯絡員董楓在財貿聯絡委員會講話說，譚震林的問題同志們認為要搞就搞，由大家決定。3月16日，在北京農業大學召開了有178個單位參加的聲討譚震林大會，農大「東方紅」、師大「井岡山」、清華「井岡山」和農林口許多單位的代表在大會發言。3月17日，紅代會「批譚聯絡站」、全國農展館等造反派召開了有134個單位參加的「徹底揭發批判『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誓師大會」。3月20日，造反派又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徹底擊潰譚震林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大會」。

批判「二月逆流」後，一批老同志遭到批判，中央政治局會議也不開了，黨和國家一切大事均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解決，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過去的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當然這一切都是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情有獨鍾為背景。毛澤東當時曾說過：「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讚許之情。196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各地來電格式的通知，其中要求有專電向中央請示，屬於「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可告中央文革小組；屬於行政業務問題，可電告國務院。這是對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一種非正式的確認。

5 二月「鎮反」

〈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發出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都鬆了一口氣。在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下令把坦克開進了南京城。¹⁶¹許世友要求軍區黨委常委認真學習〈軍委八條命令〉，深刻領會，堅決執行，特別強調軍以下不搞「四大」。許世友說，沒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來，那有甚麼可說的！南京軍區把政治部領導的「三團兩隊」（話劇團、歌舞團、歌劇團、軍樂隊、體工隊）下放到各野戰軍，由部隊代管搞正面教育。責令《人民前線》報停刊。拆散步兵學校，疏散人員，連同有造反傾向的軍區機關幹部，一律派往省軍區、軍分區和人武部去參加「三支兩軍」。對鬧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組織和造反派，採取了硬性措施。軍區機關和駐三省一市的所屬部隊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開除、475人被看管或隔離反省。南京市有10個群眾造反組織被取締，有330多個造反派頭頭被關押。所有被看管、被隔離、被關押的人都要寫檢討，交代問題，向毛主席請罪。¹⁶²

在湖南長沙，傳達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後，湖南省軍區立即行動，於2月5日開始抓捕「湘江風雷」大小頭目，兩三天內長沙抓捕約千人。¹⁶³2月7日，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批鬥「湘江風雷」頭頭的大會。「湘江風雷」組織龐大，號稱百萬之眾，被抓捕的各級頭目上萬人。¹⁶⁴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星火燎原」是在全軍有很大影響的一個造反派組織。他們分頭前往全國各大軍區去煽風點火，支持造反。他們號稱曾經在一周內橫掃了幾個大軍區，他們的旗幟一度飄揚在幾個大軍區的辦公樓頂上。「星火燎原」組織中有幾個人參加了長沙「湘江風雷」

161 蕭思科：〈王平上將奉命兩進北京城〉，《中華兒女》，1998年第7期，頁18。

162 李文卿：《近看許世友(1967—1985)》(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29—30。

163 中共長沙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長沙黨史大事年表(1919—1992)》(長沙：內部出版，1993)，頁174。

164 據「湘江風雷」負責人葉衛東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大學「聲援兩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會」的講話說，「湘江風雷」被逮捕的人數達五、六萬之多。

的活動。中央軍委2月9日發出通知說：「最近在湖南長沙，解放軍藝術學院三人參加了反動組織『湘江風雷』，進行反革命活動，還有部分學生，特別是藝院『星火燎原』在湖南、瀋陽、福州等軍區造謠、抄家，任意抓人，帶頭衝擊軍事領導機關，進行殘酷武鬥，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條命令。為了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指示，以護軍紀，保衛文化大革命，軍委決定：藝術學院所有人員，限五天之內返回本校進行整風，違者以軍紀處分。」¹⁶⁵

2月8日，武漢地區「工總」、「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簡稱「九一三」）、「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二司」）等在《長江日報》上發表〈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即「二八聲明」）。聲明否定「一二六」奪權，提出要向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發動總攻擊，「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武漢軍區是支持「一二六」奪權的，2月18日，經全軍文革小組同意，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指出「二八聲明」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的，是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武漢部隊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造反派激烈反對武漢軍區的聲明，攻擊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3月3日，鑑於軍事機關不斷遭到衝擊，解放軍遭到謾罵、圍攻，甚至綁架，武漢軍區發表〈致各革命群眾組織和革命群眾的公開信〉，警告一小撮人，不要與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為敵，否則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絕不會有好下場。3月17日，武漢軍區和公安機關逮捕「工總」頭目朱鴻霞、胡厚民、夏邦銀（漢陽軋鋼廠工人）和各分部頭目數百人。¹⁶⁶3月21日，武漢軍區發表通告，宣布解散「工總」及所屬組織。

〈軍委八條命令〉公布後，廣州軍區也對一些衝擊過軍區的造反派組織進行了鎮壓，被鎮壓的組織包括「八一兵團」、「老紅軍」、「千鈞

165 中央軍委關於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生參加「湘江風雷」的通知（1967年2月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66 據王力1967年8月15日接見新華社各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說，武漢軍區把「工總」的頭頭抓了516人。

棒」、「大中紅旗」等，大部分為工人組織。軍區在宣讀了〈軍委八條命令〉後，在廣州逮捕各組織頭頭450人，在廣州以外地區共逮捕了造反派頭頭238人。在「廣交會」開幕前的3月22日至28日的一周內，又逮捕了造反派頭頭508人。這樣，廣州軍區前後共逮捕了造反派頭頭1196人。但廣州軍區鎮壓的造反派組織多為工人組織，對學生造反派組織頭頭沒有抓，對逮捕的造反派頭頭多數很快便釋放了，而且對宣布一些要勒令解散的組織也進行了平反，所以周恩來在接見廣東各派代表時說：「廣東的處理是很謹慎的」，廣州軍區的錯誤「還不那麼嚴重」。¹⁶⁷

吉林省駐軍(包括省軍區、十六軍、空一軍)對省內比較激進的造反派「長春公社」施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和軍事壓力。駐軍公開表態支持「二總部」，而不承認「長春公社」。2月26日，駐吉部隊參加了對「二二三」事件的控訴大會，並出動飛機撒放傳單批評「長春公社」的傳單，會後又派部隊參加了對「公安聯總」負責人的遊鬥。3月4日，駐軍對解放軍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出兵實行紀律制裁，抓了他們的頭頭。在駐軍強大的壓力下，「長春公社」等組織被迫打着白旗請罪，組織被壓垮了。在組織「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光機八一五」整風時，駐軍又提出了「三個徹底」，即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改組，最終使這三大組織瓦解。¹⁶⁸

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街道工業分團」以查抄黑材料為名，衝擊成都市公安局，並扣押公安局負責人，搶走檔案和槍支。次日，成都軍區派出部隊，協助公安部門，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業分團頭頭等十三人，將其遊街示眾後關進監獄。此後，「造反兵團」開始把鬥爭矛頭指向成都軍區。2月11日，成都軍區逮捕軍內造反派五十餘人。當天，「造反兵團」和「八二六」在成都市舉行「聲援成都軍區造反

167 參見周恩來1967年4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在廣州珠江賓館的講話，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68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發吉林省軍區、十六軍、空一軍「給長春市廣大革命群眾的公開信」(1967年8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派」的示威遊行，並衝擊成都軍區，企圖揪鬥成都軍區領導人，開始圍困成都軍區，封鎖軍區南營門和東營門。12日，造反派繼續調集人員衝擊成都軍區，抓走軍區司令部一個副參謀長，並開始在軍營外搭棚住下，準備長期圍困和封鎖成都軍區。17日下午，「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簡稱「解大聯總」）在成都人民南路廣場召開「砸爛韋傑、甘渭漢¹⁶⁹為首的成都軍區黑司令部誓師大會」，會後舉行示威遊行，號召更多的人去衝擊和圍攻成都軍區。

18日凌晨，成都軍區廣播了葉劍英17日批發的〈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六戰鬥兵團同志們的信〉（後稱〈二一七信件〉），信中肯定了軍區派出部隊捕捉搶劫成都市公安局的幾名首犯，對嚴重違反中央軍委命令的少數軍內人員採取措施是完全正確的，要求「造反兵團」和「八二六」不要圍堵、衝擊軍區，不要干涉軍人行動自由；勸告參加衝擊和圍困軍區的人盡快撤離軍區。同時警告造反組織頭頭，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繼續煽動群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軍隊，衝擊軍區機關，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他們全部負責。下午，成都軍區派出直升機在成都地區、其後又在全川散發了這封信。中央軍委的公開信廣播後，圍困軍區的造反派開始撤離。下午，「八二六」發出〈緊急動員令〉，號召針鋒相對，血戰到底。

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門開始收容審查造反派的頭頭和骨幹分子。「二月鎮反」開始。至22日，僅成都地區公安機關就收容337人。2月21日，成都「造反兵團」和「八二六」數萬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規模的集體請罪活動。2月28日，在成都軍區支左辦公室幫助下，頒布了〈四川省公安廳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布告〉。到3月4日，公安機關在成都地區拘捕造反派頭頭和骨幹分子五千餘人。3月2日，四川省公安廳在成都軍區支左辦公室幫助下，向四川省各市、專、州、縣發出〈取締反革命組織和右派組織的意見〉。3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發布〈緊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團」、「八二六」等少數造反派頭頭，「打着造反派旗號，幹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惡活動」，要堅決予以取締。此後，在四川全

169 韋傑當時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甘渭漢為成都軍區第四政治委員。

省取締造反組織一千一百多個。在鎮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頭頭及骨幹分子八萬餘人，其中成都地區抓了三萬三千餘人。¹⁷⁰

從1月28日到4月5日，據不完全統計，經葉劍英批准，在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取締了114個「非法」的或「反動」的組織。¹⁷¹

福州軍區在〈軍委八條命令〉頒布後，對多次衝擊軍區的造反派進行了嚴厲鎮壓。2月11日，福州二十萬軍民舉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一次新反撲誓師大會」，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在大會上批判了造反派衝擊軍區的行為，他在講話中說：「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然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¹⁷² 3月9日，「紅九二」總部負責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衛軍頭頭蔡肇基、吳丘陵等在萬人大會上被公開逮捕。福建省軍區副司令員林乃清宣讀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紅九二」、「革委會師院分部」、「教工赤衛軍師院分部」等組織。3月22日，福建中醫學院召開「聲討控訴反革命罪行大會」，當場逮捕張志耀等八人，拘留了林要火、吳梅英等十四人。據福建省軍管會統計，「全省各地軍隊、人武部和軍管部門出面逮捕和拘留兩千多人，取締和解散了八十多個大小組織。對軍內四大單位和軍區機關中少數人違反〈軍委八條命令〉問題的處理，逮捕八人，拘留六十五人，解散了幾個組織。」¹⁷³

170 關於四川「二月鎮反」中抓人的數字，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的《四川省志·大事記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中說是八萬餘人，而《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中說是32554人(頁312)。另外，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引述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的報告說：「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區截至4月19日止，已釋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審查人員共27865人，佔總數的85%。」(頁315)照此推算，四川地區共抓了32782人。筆者採用了《四川省志·大事記述》中的數字。據筆者分析：《大事記》和《文稿》中的數字是經過正式逮捕、拘留、收容手續而抓捕的人數，《省志》中的人數則是實際抓捕的人數，其中有很多人(超過半數)並未辦理正式逮捕、拘留、收容手續。

171 范頌：〈「三支兩軍」的緣起與「七二〇」事件的爆發〉，《中華兒女》，2001年第2期，頁18。

172 《八·二九戰報》，第2期。

173 〈福州軍區黨委常委關於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錯誤的檢查報告〉，轉引自葉青：〈福建「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研究〉，中國國家圖書館博士論文文庫，2003\k29\20。

2月23日，青海發生了「二二三事件」。青海省軍區和駐軍在支左問題上認識不統一，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副司令員張江霖表態支持「八一八」；以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和總後青藏辦事處副主任張曉川為代表的大多數指戰員則表態支持「紅衛兵總部」，並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青海地區部隊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聯合指揮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地區部隊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聯合指揮部」。根據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關於軍管報社、電台的指示，2月14日，西寧衛戍區司令部發表公告，公告說：「查《青海日報》自1月12日，由『青海日報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接管以來，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操縱下，製造謠言，進行虛假的宣傳報道，欺騙黨中央，欺騙青海省廣大革命群眾，對青海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根據我省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組織的強烈要求，決定自1967年2月14日起，對《青海日報》實行軍事管制。」「八一八」派抗拒軍管，調動人馬日夜守衛在《青海日報》社印刷廠院內。2月15日以後，劉賢權被奪權，並遭到批鬥、毒打、隔離和武裝看押。¹⁷⁴ 省軍區的領導權落到副司令員趙永夫手裏。2月23日，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宣傳車開到報社印刷廠大院門口的馬路上，廣播〈通令〉，宣布「青海省八一八紅衛兵戰鬥隊總聯絡站及其所屬組織」為「反革命組織」，予以「立即取締」，並要求守衛在報社印刷廠內的「八一八」人員，接受〈通令〉，於當天中午12時全部退出印刷廠。「八一八」抗拒不退，並通過自己的廣播，進行反擊。下午2時許，部隊進入報社大院。有戰士的槍走火，其他戰士誤認為「八一八」向解放軍開了槍，報社大院內各處進駐的戰士便都向「八一八」開了槍，釀成重大流血事件。這次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傷。¹⁷⁵

「二二三」事件後，「八一八」派遭到嚴厲鎮壓。據劉賢權說：

對革命群眾和幹部實行法西斯白色恐怖，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

174 安紹傑主編：《劉賢權將軍》，頁218—219。

175 陳雲峰主編：《當代青海簡史》，頁194—197；中共青海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青海省大事記》（西寧：內部出版，1986），頁182—183。

3504人。採用各種刑法對革命群眾實行逼、供、信，不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綁、抄家，而且株連了自己的親屬和小孩。同時，大搞「請罪」，人人過關，人人寫檢查，有的集體跪倒「請罪」，長達四、五個小時。繼「二二三」事件後，24日又鎮壓了民族學院的革命師生，打死打傷12人，再一次製造了流血事件。¹⁷⁶

葉劍英在聽了趙永夫電話報告後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後來在西寧傳說是「林副主席來電說，打得對，打得好！」）葉劍英還安排趙永夫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介紹了他們的經驗。

3月初，中央文革小組的簡報上刊登了紅衛兵來信，控訴趙永夫武裝鎮壓左派。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重新審查「二二三」事件。3月11日，毛澤東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¹⁷⁷ 3月13日，關鋒、戚本禹在政協禮堂接見青海「八一八」的代表，開始調查「二二三」事件。3月21日，陳伯達、康生參與接見和調查。3月23日，周恩來、康生、江青參與接見和調查。這幾次接見的記錄表明，調查完全是先入為主的，基本上只聽「八一八」一派的控訴，根本不聽趙永夫等人的辯解。3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為「二二三」事件徹底翻案，稱：「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二〇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決定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¹⁷⁸ 隔離

176 劉賢權在青海省軍管小組長和機關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4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77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頁96。

178 王昭為中共青海省委第二書記。

反省。¹⁷⁹ 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着手籌備建立以劉賢權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

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平反具有很強的示範效應，在2、3月份受到壓制的造反派紛紛起來要求平反，並開始了新一輪的衝擊軍區行動。

6 〈軍委十條命令〉

4月1日，在中共中央為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而發出的通知中，要求各地特別注意：一、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宣布一個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必須經中央批准。二、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人。三、對證據確鑿的群眾組織負責人中的個別反革命或壞分子，應依法處理，但要同這個組織中的廣大群眾區別開來。四、對犯錯誤的組織或群眾，應採取整風的方法解決問題。五、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擊另一方。毛澤東在這個〈決定〉稿中加寫了一段話：「許多外地學生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了。」¹⁸⁰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由首都紅衛兵駐《人民日報》監督組成員根據武漢和北航「紅旗」赴漢的造反派提供的材料，於2月中旬起草，經王力修改並下令發表的。據這個監督組成員交代說，這篇社論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

179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1967年3月2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軍委轉發總政治部〈關於趙永夫同志所犯錯誤的結論和處理意見〉，指出：「1967年2月，青海省軍區內部發生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二二三事件』的後果是嚴重的，但考慮到趙永夫同志已隔離受審十年，對錯誤已有認識，同意給予趙永夫同志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原級不動，按正師職予以安排」。

18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05。

漢、成都等地的軍隊領導(因為這些地方壓制造反派最厲害)，不要壓制造反派紅衛兵。¹⁸¹

此後，林彪提出：現在需要有個新的東西，向全軍發出一份新的命令，規定幾條，不然有些人又會犯趙永夫那樣的錯誤。4月6日，經林彪提出，中央文革小組討論後，毛澤東批准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正式發布。軍委的十條命令如下：

(一) 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准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

(二) 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對於確實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須證據確鑿，經過批准手續。

(三) 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對於犯有某些錯誤的群眾組織，要積極進行幫助教育。對於確實查明被反動分子控制的群眾組織，要做分化爭取工作，孤立其最壞的頭頭，爭取被蒙蔽的群眾。必須公開宣布其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的，要經中央批准。

(四) 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對業已查明特別壞的右派頭頭，要追究，但應盡量縮小打擊面。不能僅僅根據是否衝擊過軍事機關這一點來劃分左、中、右。

(五) 對待較大的群眾組織採取甚麼態度，應就地深入調查研究，進行階級分析；採取重大行動前，應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

(六) 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群眾自動寫的檢討書，退還其本人。有些長期不覺悟並且堅持錯誤觀點的群眾，不要急於要他們認錯，而要給以時間，讓他們在鬥爭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

181 參見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09。

(七) 在軍隊中要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學習毛主席著作，必須結合兩條路線的鬥爭，廣泛搜集揭露反動路線和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各種具體材料，印發到連隊進行教育，使廣大指戰員了解他們的反動事實，進行徹底批判，肅清其惡劣影響。

(八) 對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幹部，要詳細交代政策。要防止趙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趙永夫原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是一個混進黨內軍內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陰謀手段，篡奪軍權，對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或思想很右的人來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有事同群眾商量，善於採用說服教育的方式，而不應採取簡單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對業已違反了上述諸條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積極進行善後處理。今後，堅決按以上各條辦事。¹⁸²

〈軍委十條〉的發布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軍委八條〉，各地被軍隊鎮壓的造反派又有了翻身的機會。形勢的大起大落，使全國的混亂局面更加複雜，更難以收拾。毛澤東在〈軍委十條〉發布後不久說：「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他們那裏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台，灰溜溜的。」毛澤東還說，〈軍委八條〉出來，軍隊神氣的不得了；〈軍委十條〉出來，群眾組織又神氣的不得了。八條叫擁軍，十條叫愛民。八條與十條要結合起來。¹⁸³毛澤東說得很輕鬆，做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軍委十條〉發布後，全國各大軍區、省軍區都不同程度的遭受造反派的衝擊，軍隊與造反派

182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90—391。

18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14；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94—995。

的矛盾普遍激化。周恩來在1967年4月的一次講話中，將這一形勢講得極為透徹：

這種情形(指衝軍事機關)，當時全國都是很多的，從西北算起，新疆搞了，蘭州搞了，青海搞了，西安搞了，寧夏也搞了，內蒙古搞了，山西搞得比較好，奪權奪得比較早，他們那個地方也鬧了一下，天津、河北搞了，北京搞了，瀋陽搞了，長春搞了，哈爾濱因為奪了權嘛，好一些，這你們曉得的。……那裏不是哈軍工搞的，是另一派搗亂，是「八八」。……還有山東搞了，安徽搞了，南京搞了，杭州搞了，南昌搞了，福州搞了，恐怕無一例外，還有開封、武漢、長沙、南寧、廣州、昆明。貴陽因為得到了左派的支持，所以這個情形轉變過來，軍隊跟左派結合在一起了，但是軍區開始一部分人也有一點抵觸，那是內部另外一種鬥爭。成都、重慶，四川搞得更多，最後拉薩也搞了。所以無例外，成為一個運動浪潮，席捲全國。¹⁸⁴

184 周恩來在廣州接見群眾組織及駐軍代表的講話(1967年4月1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第六章

大批判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五期上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從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新的一頁。王力回憶說：「四月一日，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總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主席改了三遍。戚本禹傳達主席命令，立即廣播。這一來劉少奇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¹ 在同一期《紅旗》雜誌上還發表了王力寫的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其中對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進行了批判：

《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揚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¹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991。

這段話是毛澤東所加的。² 這一切清楚地表明，劉少奇的問題升級了。

在發動公開批判劉少奇的同時，一個群眾性的「揪叛徒」運動也開始了。

在開展對於劉少奇的大批判和群眾性的「揪叛徒」運動的同時，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出現了分裂的現象。而造反派的分裂，又導致原本想很快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建立的革命委員會難產。

一 打倒劉少奇

毛澤東原來表示過不同意對劉少奇進行公開批判，還說過劉少奇以後還要留在中央委員會裏。³ 周恩來、陶鑄等幾次直接出面制止造反派給劉、鄧貼大字報也都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為甚麼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會發生變化？金沖及主編的《劉少奇傳》中說：「毛澤東為甚麼改變了對劉少奇的態度？原因很複雜。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陷害。他們有計劃、有預謀地將造反派捕風捉影揭發劉少奇的材料、特別是誣陷劉少奇有重大歷史問題的材料，報送毛澤東；同時有意向社會散布，製造輿論，影響毛澤東改變看法。」⁴

這是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前面說過，筆者不相信毛澤東是被江青「說服」了才同意批判《海瑞罷官》的。同樣，筆者認為在劉少奇問題上，毛澤東也不是被動的。毛澤東與劉少奇共事四十多年，相互之間知根知底。劉少奇為在中國共產黨內樹立毛澤

2 王力說：「我原來寫的評論沒有涉及《修養》，主席看清樣時叫加一段。『修養是唯心主義』那一段，這是主席的語錄。主席當場口授，我記下來整理打印好再給主席看了，主席說馬上發。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開罵劉少奇。」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93。

3 1967年1月17日，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時說：「劉、鄧是不是能選上（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出版社，1998），頁1055。

4 《劉少奇傳》，下冊，頁1056。

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領導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毛澤東在經過長期的考查後也早已確認了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毛澤東可不是那麼容易被「林彪、江青一夥」蒙蔽、欺騙的。

筆者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改變對劉少奇的態度，起着主要作用的並不是林彪、江青。眾所周知，毛澤東早在幾年前就決定要把劉少奇「搞掉」，只是在對劉少奇的組織處理上還沒有想得太具體。毛澤東下了很大的決心，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遭遇到了重重阻遏，毛澤東一意孤行不顧一切地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在劉少奇的問題上，也愈來愈嚴厲。他是把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作為堅持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種手段。

毛澤東原以為在全國開展奪權運動，很快就可以把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按照他的想法打爛之後重建起來，他估計大約有三個月的時間就差不多了，即所謂「二、三、四月看出眉目」⁵。但實際上，打爛容易重建難。在奪權中又暴露出許多新的矛盾，造反派內部由於觀點和利益的衝突，普遍出現了分裂。毛澤東在1967年5月的一次談話中說：「本來在一月風暴以後，中央就在着重大聯合的問題，但未得奏效。後來發現各個階級、各派政治勢力還在頑強地表現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是沒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還要分。所以現在中央的態度只是促，不再捏了。」⁶所謂促，即是用大批判來促進大聯合，毛澤東想通過批判劉少奇，使造反派把目標集中到打倒劉少奇上來，通過批判劉少奇達到促進大聯合，從而早日實現全國奪權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所領導的批判劉少奇的一系列重大政治舉措，在黨內並沒有遇到很大的阻力，當時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認可和贊同，尤其是在黨的高層領導幹部中，筆者尚未聽說有人為劉少奇鳴

5 1967年3月13日，周恩來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說：無論如何要在3月份解決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35。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89。

不平，說公道話的。在黨的基層幹部中出現了極少數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為劉少奇聲張正義的人，如張志新等。黨外人士章士釗直接給毛澤東寫信，欲調解毛劉分歧，並致信劉少奇，明確表示對劉的同情，他在信中指斥那些批判劉少奇的所謂「十大罪狀」等等，是「黑白驟爾變色」，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斯殆別有用心」⁷。

1 劉少奇問題的升級

196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王光美專案小組（對外稱中央辦公廳丙組）。名為王光美專案小組，實質是正式整劉少奇的開始。王光美專案小組的組長是謝富治，成員有汪東興、蕭華、葉群。後來江青、戚本禹很快補充為小組正式成員。謝富治只是名義上的組長，專案組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江青手裏。這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多次在各種場合公開攻擊劉少奇，同時支持、鼓動造反派開展對劉少奇的揭發和批判。

1967年1月1日，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慫恿下，中南海內39局「6711戰鬥隊」的造反派在劉少奇的住處福祿居貼出大字報，在院內的地上、牆上刷「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1月3日晚，在戚本禹的指使下，中辦秘書局「紅旗兵團」的造反派在福祿居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⁸1月6日，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十六個單位召開「徹底打倒我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大會」。會後，清華「井岡山」的造反派製造了一起所謂「智擒王光美」的鬧劇。他們先到北京師大一附中，將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扣為人質，然後以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名義，向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裏打電話，詐稱劉平平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車軋斷了腿，需要馬上截肢，家長必須到醫院簽字。王光美被騙來到醫院後，遭到扣押並被帶到清華

7 章士釗：〈致劉少奇〉（1967年3月），載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八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頁418。

8 賈蘊勳：〈貼身衛士憶少奇蒙難——寫在少奇同志離開我們三十周年的日子裏〉，《百年潮》，2000年第1期，頁16—18。

團，受到濟華「井岡山」的審問和批鬥。後來在周恩來的干預下，才將王光美放回。⁹

1月12日，戚本禹在釣魚台十六樓召集中央辦公廳一些人開會，對他們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甚麼不去鬥他們？¹⁰ 當晚，中辦秘書局的造反組織「紅色造反團」一二百人喊着口號衝進福祿居，第二次圍攻、批鬥劉少奇夫婦。

1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與劉少奇談話。劉少奇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對此未置可否。

3月9日、10日，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對劉少奇進行了毫無顧忌、指名道姓的批判。

陳伯達在講話中說：1962年颶單幹風，就是劉少奇為首、鄧小平贊成的。他們的那一套，就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1964年劉少奇作了一個公開報告，反對毛主席。日本投降以後，他就提出共產黨員要當「紅色買辦」，就是要當美帝國主義的買辦，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那時候，劉少奇是完全悲觀的。陳伯達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意見，他說：毛主席認為，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脫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空空洞洞地講一點個人修養，是欺人之談。毛主席說，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本書儘管講了那麼多馬列主義概念，階級鬥爭概念，結果把階級鬥爭變成了個人修養。毛主席說，不講現實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鄧小平每次開會，基本節目就是打牌，每次開會都要打。在派工作組問題上，氣勢很凶，很囂張。¹¹

9 劉先琴、郭家寬：《風風雨雨劉平平》，《作家文摘》，1994年6月24日，第6版；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274—277。

10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下冊（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頁9。

11 陳伯達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9日），載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康生在講話中說：劉少奇到天津視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會議公開聲明說，中國今天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否則就違背人民的利益，違背工人的利益。這是劉少奇的綱領。同一個時候，他還在幹部會議上講了兩句概括的話，他說：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少了；勞動人民不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這些是修正主義。他在城市發展資本主義，在農村反對搞合作社，主張發展富農經濟。後來的大砍合作社，事實上是他的主張。他在1957年反對黨校學習毛澤東思想，1959年在廬山反彭、黃時不積極，1962年又大颯單幹風，1964年搞形「左」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實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切是有聯繫的，絕不是偶然的。¹²

3月21日，毛澤東、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見軍以上幹部會議與會人員後，留下來議論一些問題。議論中對有人提到「劉耀祖案中涉及劉少奇在1929年叛黨嫌疑問題」作了研究，決定把這方面的材料「交丙組專案辦公室調查研究」，並指定由康生分管這件事。此前，康生利用北航「紅旗」等六個組織搜集的批判劉少奇的材料，給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聲稱他已掌握確鑿證據，證明劉少奇在歷史上有問題，被捕叛變過，建議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毛澤東於3月21日批准了康生的報告，還在工作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圈閱同意。¹³此後，王光美專案小組實際上就成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小組，對劉少奇的專案審查工作正式開始。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沒有用任何方式通知他本人，也從來沒有聽取過他的陳述。¹⁴

12 康生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64。中央常委議論時沒有記錄，後來也沒有形成文件或會議紀要。分管此事的康生事後讓工作人員寫了一份備案性質的簡短材料，這份材料中記載有：「共同研究之後，決定」：「關於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1927年叛黨嫌疑及1929年在瀋陽被捕等材料，交丙組專案辦公室調查研究。」康生親筆在這份材料的下面註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來、伯達、康生都看過。」參見黃暉：《劉少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199。

14 《劉少奇傳》，下冊，頁1055—1056。

2 「革命大批判」

戚本禹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中指責劉少奇吹捧電影《清宮秘史》，並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國赫魯曉夫」為劉的代名詞，對劉少奇發出一連串的質問，最後下結論說：「你根本不是甚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對這篇文章，劉少奇感覺有口難辯，極為憤慨。他說：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事情是從黨內高層的一位秀才對劉少奇的揭發引起的。這位秀才說，他親耳聽見劉說過《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¹⁵ 劉少奇於1967年3月28日寫信給毛澤東，說明自己「根本沒有《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種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說出「《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樣的話，要求中共中央調查。¹⁶ 1967年4月10日，清華「井岡山」的造反派在審問王光美時問及此事：

問：劉少奇為甚麼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

王：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肯定沒有講過。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

問：對戚本禹同志批《清宮秘史》的文章怎麼看？

王：這部片子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對，這部片子劉少奇沒有說是愛國主義的。我和他一起看的，當時只看了一半，以後天亮了看不清了，他甚麼也沒說。這是肯定的，他沒說過。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沒說過。

問：照你這麼說戚本禹同志在造謠了？

王：是不是有另外人假借劉少奇的名義說過這些話。

問：你覺得這文章寫的對不對？這是毛主席看過的！

15 胡喬木就一九五零年批判電影《清宮秘史》一事回答紅衛兵（1967年4月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6 《劉少奇傳》，下冊，頁1056—1057。

王：是嗎？是主席看過的嗎？我覺得還是從革命利益出發，從事實出發，如實向毛主席匯報情況。¹⁷

4月6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再次批鬥劉少奇，並勒令他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4月14日，劉少奇按照「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由在劉少奇辦公室工作的秘書、警衛、服務人員所組成）的要求，交出了一份書面答覆，具體回答了戚本禹文章中的「八個為甚麼」。其中在回答「為甚麼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說：

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為甚麼，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為甚麼犯路線錯誤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樣性質的錯誤，可見他們也不知道為甚麼。我將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閱讀毛主席指定我要讀的其他書籍和報刊的有關文章，以便能夠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這個問題，並且認真地在革命群眾實踐中去加以檢驗。那時我才能答覆我為甚麼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又如何改正這個錯誤。¹⁸

「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把劉少奇的書面答覆的原件上報，另外以大字報的形式抄了一份在中南海院內貼出。這一做法被其他造反派指責為「為劉少奇開脫罪責」，幾小時後，大字報即被人撕毀。此後，劉少奇被完全剝奪了申辯的權利。

4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在清華大學舉行三十萬人的大會批鬥王光美。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三百多名高級幹部被拉去「陪鬥」。造反派強迫王光美在接受批鬥時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鍊」，進行人格侮辱。

17 清華大學《井岡山》報。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656。

從3月底開始，全國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文章，對劉少奇進行全方位的攻擊，目的顯然就是要把劉少奇徹底搞臭。¹⁹5月8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重頭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知說：

5月8日，《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擊中了《修養》一書的要害，也擊中了黨內最大的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要害。通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一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大破修正主義，大立毛澤東思想。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²⁰

4月7日，《北京日報》發表社論〈打倒反動的馴服工具論〉。4月9日，戚本禹在北京市革委會籌備會上說：「《北京日報》7日的社論〈打倒反動的馴服工具論〉出來的當天，毛主席說：『我從來就不同意馴服工具論。』各報要轉載這篇文章，電台一天要廣播六次。要表揚《北京日報》。最近第一流的文章在《北京日報》。」²¹戚本禹的這番話說明毛澤東對「革命大批判」的開展情況是十分關注的。

「革命大批判」為中央所號召，造反派自然紛紛響應。4月2日，北京紅代會組織數十萬人上街遊行，「聲討劉鄧陶的罪行」。4月3日，紅代會召開大會，批判劉少奇所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北師大

19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現在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正在全國展開，各個戰線上都在向他開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經在一個場合講過，要做到家喻戶曉，使他臭得比當年蘇聯的托洛茨基還要臭。」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562—563。

20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459。

21 戚本禹關於《北京日報》的談話（1967年4月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等七十三個單位舉行了徹底批判劉少奇的誓師大會。4月3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刊登了五篇北京造反派頭頭關於大批判的署名文章：聶元梓的〈新的進軍號吹響了〉，蒯大富的〈從政治上徹底批臭「修養」〉，譚厚蘭的〈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的新階段〉，韓愛晶的〈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敲起喪鐘〉，李冬民的〈高舉革命的批判大旗前進〉。

8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通知說：「為了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深批透，徹底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為了把這場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區、各部門的鬥批改結合起來，需要在中央報刊和地方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一些中央部門、中央局和省、市委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通知主要有三項內容：（一）已經在中央報刊上點名批判的有彭真、彭德懷、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周揚、蕭望東等七人，已在地方報刊上點名批判的有陶鑄、王任重、李井泉、賈啓允、閻紅彥、汪鋒、歐陽欽、李範五、烏蘭夫、王鐸、王逸倫、王昭、任白戈、王鶴壽等十四人。「對於這些已經點名批判的修正主義分子，在中央報刊或地方報刊上還要繼續深入地進行批判。」（二）在中央報刊上下一步擬予公開點名批判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有薄一波、呂正操、林楓、安子文、楊秀峰、蔣南翔、吳冷西、張聞天、張勁夫、韓光等十人。（三）在地方報刊上下一步擬予公開點名批判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有西北局劉瀾濤、習仲勳、胡錫奎，東北局馬明方，上海市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天津市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省林鐵，安徽省李葆華，福建省葉飛，河南省文敏生、趙文甫，廣東省趙紫陽，江西省方志純，四川省廖志高，吉林省趙林，寧夏自治區楊靜仁、馬玉槐，山西省陶魯筋、衛恆、王謙、王大任等二十四人。²²

隨着「革命大批判」的開展，從中央到地方，大批領導幹部被不斷地拉出來交給群眾批鬥。據檔案資料記載，從1967年4月23日至10月

22 中共中央關於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1967年8月1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7日半年期間，僅經謝富治批准批鬥北京市主要領導幹部和中央部門領導幹部的群眾大會就有107場，其中批鬥彭真53次，批鬥劉仁46次。²³

「革命大批判」運動聲勢浩大，如火如荼。各種各樣的大批判專欄遍布於校園、機關、廠礦、部隊。造反派在大批判上也進行着競爭，以此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

在當時的大批判中，披露出許多中央高層的政治鬥爭中歷來不為人知的情節。筆者曾見過一份南京大學「紅色造反派」於1967年6月10日根據清華「井岡山兵團宣傳組」的材料翻印的材料，在翻印者按語中說：

這一篇談話是主席和中央幾個負責同志在64年座談「四清」的紀要。據說是由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叛徒薄一波根據當時的談話私自記下的，並命名為「兩位主席的談話」。他之所以這樣做，很顯然是借此吹捧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思想，殊不知這篇材料在今天卻成為我們革命造反派批判劉少奇的一份很好的材料。從這篇紀要中，我們可以看出劉少奇這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何等的專橫跋扈，目中哪裏還有毛主席，他還十分賣力地推行他的形左實右的路線以及所謂「桃園經驗」。是可忍，孰不可忍！

據與相關資料查證，這個材料是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內容是討論社教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劉二位發生了當面的意見衝突。薄一波參加了那次會議並作了記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薄一波被打倒，他的許多記有重要內容的筆記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並在大批判中被派上了用場。這份材料是有份量的，因為其中暴露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分歧，因此成為了在對劉少奇的大批判運動中的一顆重磅炸彈。

大批判的調子一個比一個高，上綱上線一個比一個厲害。但如仔細觀察一下，可以發現，許多大批判專欄裏面的內容都是雷同的，許

23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530。

多文章互相抄來抄去，許多消息、動態都是道聽途說或以訛傳訛的。「革命大批判」運動外表搞得很熱鬧，形式上是全民動員，家喻戶曉，「人人口誅筆伐」。實際上，搞大批判最積極的大專院校的學生們不過是在借此向中央文革邀寵，為了在派性鬥爭中爭取主動。8月5日凌晨，謝富治、吳德、丁國鈺召集北京大專院校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座談當天召開批判劉少奇大會問題。會上，一名北航「紅旗」代表說：「〈五一六通知〉發表了，理應掀起一個大批判高潮，可內戰打得一塌糊塗，7月初聯合的形勢很好，大批判的高潮剛要掀起，山頭主義、分裂主義又泛濫起來了。武鬥又多起來了，大批判又沒有搞起來，揪劉火線也成了某些人分裂打內戰的場所……大批判怎麼搞？現在都批不下去，好多學校連大字報都沒有，我們學校有些人的思想也動搖了。」²⁴

3 「五一團結」

「二月逆流」風波後，中央的政治格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由原來的兩套班子（中央碰頭會、文革碰頭會）變為一套班子（文革碰頭會），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幾位元帥、副總理在中央決策中的作用大大降低。兩個月後，毛澤東又對幾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作出了團結的姿態。

據陳毅的秘書杜易回憶：「1967年4月29日下午3至5時，毛澤東邀請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他的住處聚會。這是毛澤東2月給陳毅回信說『見面有期，稍安勿躁』以來，陳毅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這次在毛澤東家聚會，周恩來巧妙地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擬定了包括陳毅、譚震林等受到批判的老同志在內的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首都慶祝活動的名單，呈送毛澤東批准。」「陳老總聚會回來後，我問他，這次見面同主席談問題了嗎？陳老總說，今天聚會時，主席只說是約大家聚

24 濟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建工「新八一」、礦院「東方紅」等整理的座談紀要。

聚，除了談到準備慶祝五一節外，沒有談運動問題，他不談，別人不提，我也不好提懷仁堂會議上的事，所以沒有談。」²⁵

1967年5月5日，周恩來給因「二月逆流」問題而受到批判的陳毅、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並李富春等六人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信中說：「五一團結，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否則，「那就又要來一個新的反覆」。「為着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²⁶

所謂「五一團結」，《周恩來年譜》中的解釋是：「指『五一』天安門焰火晚會。因所謂『二月逆流』而受批判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與毛澤東一起，出席了焰火晚會。5月2日，《人民日報》作了報道。」²⁷ 據杜易回憶，「五一節晚上，陳毅和許多老同志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陳老總回家情緒比較好，主動對我說：『今晚在天安門城樓上，主席拉住我合影，對我說：我是保你的。』我問：『那為甚麼不公開說呢？』陳老總說：『主席這麼說也就夠了，不能要求過高，還要求他公開講啊！』」²⁸

周恩來這封信是告訴幾位老同志，「五一團結」並不意味着毛澤東已經原諒了他們，不要天真地認為自己還能像以前一樣對中央的決策說三道四，否則就會走上絕路。李、陳、譚、李、余、谷等人，是周恩來在文革初期與中央文革小組周旋，維繫黨和國家正常運轉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和得力助手，他不希望他們同中央文革小組發生直接衝突而導致被徹底打倒。周恩來的信雖然措辭嚴厲，但確實是用心良苦。

5月1日中午12時半，毛澤東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車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然後又到中山公園，「同首都三百萬群眾，一起歡度五一

25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頁150。

26 陳揚勇：《抗爭與策略：對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76。

2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50。

28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頁151。

節」²⁹。在毛澤東和林彪乘坐的汽車後面，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粟裕、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等也乘車相隨。實際上，當時沒有事先布置，公園裏人很多，毛澤東的車隊一進公園即遭群眾包圍，動彈不得，只得撤回。王力回憶說：「五一節上午，主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集合了幾個人：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張春橋、姚文元被主席派到濟南去了）從敞篷汽車見群眾。」「主席不要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參加，以上面這些人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主席那時一面叫一些同志上天安門，一面又怕模糊了『界限』，另搞了這個。」³⁰

二 「揪叛徒」

在中共黨內歷次運動中，歷史問題都是要被提及的重大問題。文化大革命中的「揪叛徒」活動更是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揪叛徒」一方面是為了搞臭劉少奇，一方面是為全面奪權掃清障礙。「揪叛徒」活動是由康生等人首先提出，鼓動紅衛兵群眾組織廣泛參加，造成聲勢。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正式肯定了這一群眾性的活動。通知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揭露了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長期包庇的叛徒集團，挖出了一批混進黨內的叛徒特務分子，對於純潔黨的組織，對於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通知對「揪叛徒」活動作了一些政策性的規定。³¹

29 《人民日報》，1967年5月2日。

30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1002。關於哪些人隨毛澤東去了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王力的記憶有誤。

3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499。

1 「六十一人案件」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康生即讓彭真專案審查辦公室調查薄一波等人1936年出獄問題。康生還指使紅衛兵去查當年北平的舊報紙，說在那裏能查出一大批叛徒。1966年9月16日，康生給毛澤東寫信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啓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11月，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色造反團」的兩名學生在北京圖書館從三十年代的舊報紙上查到高仰雲（南開大學黨委書記）等人所寫〈反共啓事〉，便向中央文革小組寫報告，稱發現了「叛徒集團」，同時以南大「八一八」的名義發表〈告全國人民書〉，搶先把材料公布於眾。隨後，劉瀾濤、趙林³²等的同類問題也被紅衛兵查到。11月24日，周恩來接到西北局關於紅衛兵追查劉瀾濤出獄問題給中央的請示報告後為中央起草了給西北局的電報，指出：「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在將電報稿送毛澤東審批時，又附信說明：劉瀾濤等同志出獄事七大、八大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澤東當天批示：「照辦。」³³

周恩來的努力只取得了暫時的效果，「叛徒集團」的事情沒多久就世人皆知了。中央文革小組對南開大學紅衛兵抓叛徒的活動讚賞有加，並批准同意南開大學「揪叛徒」的學生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審訊和查閱機密檔案。

1967年1月10日，戚本禹對解放軍總政文工團的部分人說：「劉少奇一貫搞資本主義，始終找不出根子，紅衛兵小將查出安子文叛黨，

32 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趙林，時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

3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93—94。

這些變節分子叛徒，查出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³⁴2月12日，關鋒對參加軍訓的解放軍代表說：

陸定一在中宣部搞的是法西斯專政。他們代表資產階級和國際上有聯繫。組織上招降納叛，把壞人拉到中央。組織部有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佔據了組織部、文化部、國家監委、工交很多重要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小將們從國民黨報紙上翻出了他們的自首書，小將是有很大功勳的。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他們鑽入黨內竊居重要領導崗位，跑到我們心臟中去這是非常危險的。³⁵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的談話中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住，然後叛變，在報紙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履行手續』是一些甚麼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毛澤東在1966年11月底曾親筆批示，同意周恩來所說的「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但很快即改變了看法，說自己不知道「履行手續」是怎麼回事。實際上，毛澤東當然知道「履行手續」是怎麼回事。1943年，薄一波到延安的第二天，即向毛澤東匯報了在北平五年半的獄中鬥爭，毛澤東連連讚賞。談到出獄之事時，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你們在班房裏做了很好的工作。」³⁶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的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此後，「揪叛徒」活動正式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展開。

34 戚本禹在總政話劇團接見部分造反派的講話(1967年1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5 關鋒談路線鬥爭和奪權問題(1967年2月1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6 魏敬民：〈「六十一人案件」始末〉，《百年潮》，2003年第1期，頁57—58。

當年在「揪叛徒」活動中最有影響的是天津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南開大學「八一八」曾自豪地宣稱：「我們派出了幾十個抓叛徒小分隊、幾百個專案調查組，調查人員出動了幾萬人次，行程約一百五十萬公里（其長度可繞地球三十七周半）。從海南島到黑龍江，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雲貴高原到福建前線，從大江南北到長城內外，除台灣、西藏外全國二十多個省、幾百個城市都留下了我『八一八』戰士的足跡，共計調查了北京、太原、濟南、武漢、開封、南京、蘇州、杭州、保定等十二個敵偽反省院材料……。」南開大學的另一派組織「衛東」也不甘示弱，在揪叛徒的活動中也是極其活躍的一個組織。據南開大學兩派組織自己宣稱，他們在這一活動中迫害十二級以上領導幹部即達一千二百餘人。³⁷

1967年4月14日，康生親自給聶元梓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天津南開大學衛東戰鬥隊組織了劉仁等調查團。從初步調查的結果，看到了舊北京市委內部隱藏了許多叛徒，我想新北大應組織調查組，系統地調查彭真、劉仁等黑幫的具體材料。」³⁸聶元梓接到信後立即遵命照辦，組成了有八十人參加的直屬校文革領導的「揪叛徒兵團」（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戰鬥隊），並將組建情況和活動方向等報送康生、謝富治。5月22日，聶元梓寫信給謝富治，要求「公安機關協助」。5月26日，公安部副部長李震按謝富治的要求接見了「揪叛徒兵團」的負責人，表示大力支持，准予到全國各地查閱機密檔案。聶元梓為了實施康生誣陷、迫害彭真的陰謀，親自精心策劃了從誣陷北京林業學院院長胡仁奎入手，進而誣陷彭真的策略。康生將北大「揪叛徒兵團」寫的材料批給彭真專案組，彭真專案組於1967年9月據此寫了〈彭真包庇國民黨大特務胡仁奎、李倫進行特務活動，並通過胡、李與蔣介石、閻錫山暗中勾結〉的材料。這些材料成了1968年7月9日彭真被誣陷為「大特務」，遭到逮捕的主要根據之一。³⁹

37 蕭荻：〈歷史不容忘記——記南開大學清查「抓叛徒活動」的前前後後〉，《藍盾》，1985年第7期，頁60。

38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132。

39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133。

中國人民大學「三紅」在「揪叛徒」活動中極為活躍，他們不僅抓自己學校的所謂「叛徒」，還到社會上到處去抓；不僅在北京抓，還到外地去抓。據他們自己宣布，到1967年5月27日為止，人大「三紅」「抓劉記叛徒集團挺進縱隊」「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直接領導下」，挖出全國各地叛徒大大小小共計2100餘名（新揪出的有1800名）。其中有：

一、人大郭影秋、李培之等大小38名叛徒。

二、以王若飛為首的叛徒集團：包括華北局書記蘇謙益、南京市市長岳維藩等。

三、揪出在抗戰前夕，山西某處叛變的一個叛徒集團共二百餘人，其中有中國農業機械研究院黨委書記張文昂、經委副主任郭洪濤、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王卓如、紡織部副部長王道成。

四、揪出在上饒地區叛徒集團共304人，其中有右派作家馮雪峰、上海衛生局局長王聿光。

五、查出中共鄂西北地區叛徒計460名，有鄧一陶、王濤、馮錫五等。

六、查出江西地區的叛徒史懷玉、羅德紅、高定秀等三個叛徒集團共117名。

七、查出北京、福建、湖北等監獄共計叛徒307名，如包克等。

八、查出國家檔案局副局長大叛徒張中、商業部紡織局副局長王章、山西人委參事室主任王學南、鄭州糧食幹校校長張德茂等四人。

1967年5月29日，北京中央財金學院造反派突然廣播說：「李先念是大叛徒頭子」，並將大標語貼到中南海圍牆和北京大街上。他們還聲言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打倒李先念的動員大會。周恩來得知後立即通過聯絡員向造反派頭頭傳達：天安門大會不要開，大街上的大字報要統統蓋掉。但此時周的話不太靈了。5月31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打倒大叛徒頭子李先念誓師大會。

把李先念說成是大叛徒頭子的理由是：全國總工會造反派在抄陳少敏（全總書記處書記）的家時，發現了陳和鄭位三於1957年5月29日為妥善處理一些幹部的歷史問題而給中央組織部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中說：1946年中原突圍前，為了保存力量，鄭位三、陳少敏代表中共

中央中原局於4月6日對不能跟隨主力部隊突圍的幹部曾作了一口頭決定：一、盡可能利用社會關係，化裝去其他解放區。二、不能化裝去的，盡量利用社會關係隱蔽。三、如果被敵人發現，而又無法隱蔽的情況下，可以新四軍戰士或農會會員的面目向敵人自首。只要不暴露黨員的身份，不以黨員面目自首，以後歸隊不以自首論。如果以黨員身份自首，則當別論。

這一決定現在看來是無可非議的，是有利於保存革命力量的政策。但在當時卻是很容易引起非議的。允許向敵人自首，那自然是叛變的行為，這與「六十一人案件」有異曲同工之處。

6月9日，李先念向毛澤東、黨中央寫了報告，說明他不記得有「四六決定」，並表示如果有，也是出於突圍不出的人員不至被害以保存力量。此事不難搞清楚。好在毛澤東對李先念是信任的，沒有讓李先念在此問題上下不了台。毛澤東事後請李先念看戲，在開演前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邊坐下，並幽了他一默：「大叛徒頭子來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在一起看戲」。⁴⁰

1967年6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批准廣州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報送的〈關於揪叛徒調查工作的請示〉和所附的調查葉劍英的「第一號調查方案」，欲將葉打成叛徒。此事原委是這樣的：6月21日，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根據1934年香港《工商日報》兩則報道（內有「共匪葉劍英之侄願率第二團反戈剿匪」等內容）整理成「葉劍英投敵經過」報送林彪、江青、陳伯達、周恩來，轉呈毛澤東。江青當面向毛澤東訴說此事，遭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在這份香港《工商日報》影印件上批：「葉隨軍長征，距11月29日已一個多月。」6月29日毛澤東又批示：「所舉港報消息兩則，純是造謠。」7月7日，汪東興奉毛澤東命，將有關材料送給葉劍英，並致信說：「劍英同志：香港消息，造謠材料，現送上，請閱後退我。」⁴¹

40 程振聲：〈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中華兒女》，1998年第8期，頁5。

41 范碩：〈「三支兩軍」的緣起與「七二〇」事件的爆發〉，《中華兒女》，2001年第2期，頁21。

文化大革命中以叛徒名義遭到迫害的幹部到底有多少無人知曉，但總數肯定要以十萬計。「廣東地下黨」冤案中被非法關押和審查批判鬥爭的人數就有7100人；「冀東冤案」中受誣陷遭迫害的人數達84000餘人，其中2955人被迫害致死；「新疆叛徒集團案」中受誣陷的幹部有92人，其中26人被迫害致死。

2 「伍豪事件」

1967年5月初，天津南開大學「衛東」的一些紅衛兵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啓事〉。當他們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後，將載有啓事的報紙的抄件派周少華、張國忠兩人專程送到北京。周少華是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的女兒。劉西堯在一篇文章中說：「這次反總理的『五一六』思潮，與一位曾長期在國務院工作的人有關，他竟把天津『八一八』造反派弄到的一份載有國民黨反動派捏造的『伍豪聲明』的報紙，送給江青，妄圖陷害總理。」⁴²說周榮鑫「妄圖陷害總理」是言過其實。但周榮鑫跟周恩來工作多年，應對周恩來有較深了解與信任。江青與中央文革諸人對周恩來不滿、不敬的態度和將材料送江青後可能造成對周恩來不利的局面應是周榮鑫所能夠預料到的事情。考慮到周榮鑫於1966年12月16日已被江青當眾拋出打倒，處境已很糟糕，⁴³對周榮鑫也不應太過苛求。

5月12日，周少華寫信給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報告此事。5月13日，戚本禹與關鋒一起與周少華、張國忠兩人談話並將抄件取走送予江青。

5月18日，江青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康生，將〈伍豪等脫離共黨啓事〉擺在三人面前，信中說：「5月12日夜，收到周榮鑫的女兒周少華（天

42 劉西堯：〈「文革」中我給周恩來當聯絡員〉，《中華兒女》，2002年第2期，頁35。

43 據吳德回憶：「周榮鑫、雍文濤被揪走後，好幾天都未放回來，我們就派人想辦法去找。周榮鑫找回來後，周總理讓他在國務院燒鍋爐，紅衛兵再找他時，就說周榮鑫已經參加勞動去了，實際上把周榮鑫保護起來了。」參見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35。

津南開大學紅衛兵)給中央文革來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啓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談。」這封信實際上是逼周恩來作出交代的通牒。面對這個挑釁，周恩來迅速地、斷然予以反駁。5月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寫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啓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居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當天，周恩來調閱了上海各舊報，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併送給毛澤東。信中說：「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啓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偽造啓事」，「偽造啓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⁴⁴

毛澤東對此事完全了解。1932年2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曾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說：

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於1932年2月20日左右連日登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啓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啓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蔑。而《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報館對於伍豪等的更正啓事(照他們的章程納廣告費的)，竟完全拒絕登載。這些報館顯然是利用反革命的國民黨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帝國主義工部局的庇護，而積極實行這種危害革命反對工農兵士群眾，並且間接幫助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民眾革命的行為。中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最高革命法庭根據這個理由，宣布《時事新報》、《時報》、《申報》以及一切登載所謂「伍豪等」的啓事而又拒絕登載更正啓事的報館總經理的死刑！⁴⁵

4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54—155。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63—464。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送去的信和材料後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⁴⁶毛澤東的這個批示並未明確表示自己的態度，容易使人產生歧義。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不明確表態實際上也是一種表態，給了江青等人以各種想像的空間。據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鄒吉成的回憶，他在釣魚台值班時曾多次聽到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就〈伍豪啓事〉問題向周恩來高聲質問，而周恩來則不厭其詳地向他們作解釋。⁴⁷周恩來在其後半年左右的時間裏，心中可能一直在打鼓，他要反覆琢磨毛澤東的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毛澤東不明確表態，周恩來被掛在了半空中。周恩來對此是很不痛快的。1967年6月3日，他接見國防工業系統群眾組織代表和軍管會代表，在談到「揪叛徒」問題時，重申：材料要送中央核實，不要在街上貼大字報。有的是敵人搞的陷害材料。要從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着想，不能把毛主席身邊的人都看得那麼壞。⁴⁸

半年以後，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范海泉又給毛澤東寫信反映1932年2月上海各報登載過〈伍豪等脫離共黨啓事〉。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⁴⁹直到這時，周恩來才得以從這個危機中解脫出來。

此事給周恩來震動極大。周恩來一生謹慎，對關係到他政治生命的大事，他不敢有絲毫怠慢。本來早在延安整風時，在1943年下半年召開的中央座談會上，周恩來即將此事原原本本地談過。1967年10月、11月，周恩來讓鄧穎超將發表〈伍豪啓事〉的上海各舊報紙及周恩來為此事給毛澤東寫的信和〈大事記〉等有關材料一一拍照，準備交由中央存檔。1968年初，周恩來曾在一封致江青的信中寫道：「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並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1968年5月8日，在一次毛澤東親自參加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再次談

4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464。

47 王凡：〈釣魚台內外的江青〉，《黨史博覽》，2002年第1期，頁38。

48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59—160。

4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464。

了此事經過，並說：「我已將那件事的報紙和我的報告影印了，還要寫一個材料。」毛澤東在會上說：「前幾天，許世友忽然坐飛機來找我，要親自交給材料。我一看是舊《申報》，就知道還是那個『伍豪啓事』。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他都不知道這件事是敵人偽造的，可見了解當時的歷史情況很不容易。」「有些幹部對當時歷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驚，說『這還了得』。」1972年6月23日晚，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啓事」問題的報告〉。周恩來在會上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他有關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1972年8月3日下午，周恩來與李先念、紀登奎、汪東興約周榮鑫、周少華談話，詢問了1967年天津的一些紅衛兵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所謂〈伍豪啓事〉以及將載有這一啓事的報紙抄件送與戚本禹的情況，並要周少華就此事經過情況寫了一個材料，即〈匯報我和張國忠通過戚本禹向中央報告國民黨反動派報紙捏造總理黑材料的經過〉。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來施行大手術治療，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在醫院守候。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特意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於1972年在批林整風會上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用顫抖的手簽上了名字，並註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⁵⁰ 由此可見周恩來對此事的高度重視。

「伍豪事件」當時並未對外洩漏，社會上沒有出現任何與此有關的消息。

三 造反派的分裂

法國歷史學家馬迪厄 (Albert Mathiez) 在《法國革命史》一書寫道：當王朝和保王黨最終覆滅，就輪到革命黨人來打得頭破血流了。在進

50 《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頁213、233、531、721。

入全面奪權階段後，各地的造反派內部普遍出現了分裂。起初，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多是從運動初期的造反和保守的矛盾轉化而來，同時也存在着各組織之間在名譽、地位等問題上的糾紛。1967年初，全國上下普遍開展的奪權活動進一步引發了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由於觀點和利益的分歧，這些矛盾和衝突愈來愈尖銳和激化。

1 北京的兩大派

1967年1月，在《北京日報》的奪權問題上，北航「紅旗」與師大「井岡山」、地質「東方紅」產生了尖銳對立。在教育部的奪權問題上，北大「紅旗兵團」與師大「井岡山」等組織嚴重對抗，並發生了武鬥。1月30日，在清華「井岡山」、礦院「東方紅」等組織與石景山區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公安分局造反，要接管分局時，與早就參與公檢法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發生衝突，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動了一千多名警察，抓了一百多名礦院「東方紅」和清華「井岡山」的造反派。此後，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中的分裂傾向愈來愈明顯。

從1967年1月下旬北京「三司」連續發出的幾份通告中，可以明顯看出在造反派紅衛兵內部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銳。1月21日，「三司」發出總字第一號通告稱：「自新北大井岡山紅衛兵成立以來，背棄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堅定的革命左派聶元梓同志，充當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急先鋒，井岡山紅衛兵的大方向始終是錯誤的……本司令部決定將新北大井岡山紅衛兵開除出我司令部。」⁵¹ 1月23日，「三司」發出總字第二號通告稱：「北外六一六紅衛兵在元月五日寫了一篇〈周恩來你要幹甚麼〉的大字報。1月17日又去搗毀周總理即將去參觀的紅旗大隊的展覽會等等。……決定開除北外六一六紅衛兵。」1月23日，「三司」發出總字第三號通告稱：「我司令部所謂『文藝部』的成立是非法的，幹了許多壞事……現開除劉利吉、艾國成、陳志國出司令部。」1月24日，「三司」發出第四號通告稱：「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兵團負責人

51 這個通告是在江青對北大「井岡山」明確表態後作出的。

劉富元、顧家桂……於(1966年)10月下旬公然搶了三司的大印，長期不予歸還，最近又炮打周總理、康生同志等。我們相信政法兵團絕大多數是革命的，因此責成政法兵團開除劉富元、顧家桂，徹底整頓革命組織。」⁵² 這時候的北京高校造反派早已不是鐵板一塊，它的分化和分裂已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了。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成立，形式上將全北京市的紅衛兵運動統一起來了。3月8日，「紅代會」發出〈重要通知〉，宣布：「從紅代會成立之日起，一司、二司、三司都已經光榮地完成其歷史使命，不再存在了。任何組織或個人均不得再以三個司令部的名義進行活動，三個司令部的一切公章一律宣布無效。」⁵³ 但實際上，各紅衛兵組織之間的矛盾並未得到解決。「紅代會」剛成立時的統一假像很快就被新的更為激烈的衝突局面所打破。

1967年4月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爆發了一場北京當時規模最大的武鬥，雙方幾千人上場，數百人受傷，被稱為「民族宮事件」。

事情也是從「奪權」引起的。1967年1月，民族文化宮參加民委統戰系統「紅色聯絡站」的「東方紅」奪了民族文化宮的權，對立面「二七兵團」對自己被排斥在外，一直耿耿於懷。4月4日，「二七兵團」聯合「新北大公社」⁵⁴「紅一團」、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大隊」、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紅衛隊」、「紅衛軍」(簡稱「人大三紅」)、中央民族學院「抗大」等十九個單位成立了「批展聯委會」⁵⁵，並於4月5日在民族文化宮召開「批判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會」。大會

52 據清華「井岡山」的《動態》稱：政法兵團與天津政法公社勾結，從1966年12月30日開始去天津小站調查陳伯達的材料，先後七十天。同時，北京政法兵團去山西反對張日清(林彪樹的典型)。

53 此後，北京「一司」、「二司」再未見有任何動作，而「三司」後來又有表現，現在可以見到的「三司」最晚的文件是在1967年8月17日的一份公告，公告的內容是為北京大學「井岡山」翻案。這份公告刊登在北京大學「井岡山」主辦的《新北大報》第12號(1967年9月16日出版)。

54 「新北大公社」是1967年2月15日左右，由北大「紅旗兵團」、「北京公社」等組織聯合成立的。

55 即批判原來在民族文化宮展出的「民族工作展覽」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

遭到民族宮「東方紅」的強烈抵制，大會橫幅被剪掉，麥克風被搶走。4月8日，民族宮「東方紅」聯合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中央民族學院「東方紅」等數百人將「二七兵團」和「新北大公社紅一團」、民院「抗大」等強行驅出民族宮。接着，雙方都向民族宮調人增援。支持民族宮「東方紅」的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北石「北京公社」、北外「紅旗造反團」、教育部「延安公社」、學部「紅衛兵聯隊」、農機「紅旗」、人大「新人大公社」等來了約三千人，支持民族宮「二七兵團」的民院「抗大」、北石「大慶公社」等也來了一千多人。雙方混戰一場，數百人受輕傷，十餘人受重傷。地質「東方紅」和師大「井岡山」這一邊人多勢眾，武鬥中佔據優勢。據4月11日的地質《東方紅》報稱：「4月8號，我東方紅戰士與民族文化宮東方紅、民族學院東方紅公社、統戰部紅色聯絡站、學部紅衛兵聯隊，以及政法公社、農機東方紅、林院東方紅、工大東方紅、郵電東方紅等單位的親密戰友在民族文化宮共同戰鬥，狠狠地痛擊了一小撮保皇派的猖狂挑釁，爭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眾組織，取得了輝煌勝利。」

當天下午，由「紅代會」核心組組長聶元梓和副組長蒯大富簽發了「經戚本禹同志同意的兩項命令」：

一、紅代會所屬單位之間發生矛盾，絕對不准武鬥，目前雙方離開民族宮、民委，不得接觸(包括所有矛盾雙方，而本機關除外)。

二、雙方掌握的材料不准轉移，不准銷毀，暫時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紅代會主持協商解決。

儘管這兩項命令冠有「經戚本禹同志同意」的字樣，但還是沒有甚麼權威性，況且聶元梓領導的「新北大公社」也是武鬥事件的參與者。地質「東方紅」當即發表「嚴正聲明」：

一、紅代會委員聶元梓、蒯大富發表的兩項命令根本沒有經過全體常委的討論，更沒有經過全體委員的討論，絲毫沒有是非

觀點，沒有兩條路線鬥爭觀念。此命令是完全錯誤的，也是完全非法的。

二、我公社革命委員會研究決定，完全不承認此命令，也根本不執行這項命令。

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由聶元梓、蒯大富兩人負責。

至4月8日深夜，武鬥尚未平息，事態繼續擴大，民族宮警衛排的解放軍戰士向武鬥雙方宣讀〈軍委八條命令〉中關於「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條款，學生們則回以「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凌晨兩點半，中央文革小組派戚本禹的秘書為代表，和吳德、聶元梓到民族宮召集雙方開會，傳達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要求雙方「馬上撤出民族宮、民委」。4月9日上午，雙方陸續撤離民族宮。「民族宮事件」將北京高校兩大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公開化了，並且開創了以武鬥解決問題的惡劣先例。

4月11日下午，地質「東方紅」、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等派出六輛廣播車，開進北大校園。地質「東方紅」等指責民院「抗大」在「民族宮事件」中從展覽會搶走部分材料，後轉給了「新北大公社」，他們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這些材料，並要求和「新北大公社」就此事進行辯論。雙方在北大校園內發生衝突。當天夜裏，地質「東方紅」、北郵「東方紅」等又派出數千人湧進北大校園，雙方發生大規模武鬥。夜裏1點，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聞訊後，打電話傳達三點指示，要求雙方停止武鬥，脫離接觸，但未能奏效。12日凌晨，地質「東方紅」、北郵「東方紅」數千人在北大校園裏鬥爭了北大兩名學生，後又將二人抓到地質學院。下午，雙方再次發生武鬥。

4月12日晚，北京大學校文革主持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校文革副主任孫蓬一在大會上說：「(今天)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校肆意破壞以後，在我們學校開了一個所謂控訴會，鬥爭了我們的同學，用了比對黑幫、對敵人更加殘忍、更加凶惡的手段對待

我們的同學，大家可以從這些事實中進一步看看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尖銳性。」⁵⁶

人大「三紅」、民院「紅衛兵總部」和「抗大公社」、礦院「東方紅反到底兵團」、北京醫學院「八一八」、北京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歸國留學生「延安兵團」和「追窮寇第四野戰軍」、中央統戰部「11·4紅旗戰鬥隊」、中央民委「工農兵革命造反大軍」、高教出版社「魯迅戰鬥隊」和「前進戰鬥隊」、中央民族歌舞團「32111造反戰鬥組」、民族宮「二七兵團」等單位，以及天津、鄭州、洛陽等地來京的一些群眾組織在大會上表示「堅決支持北京大學的革命行動」。

同時，另外一些造反派組織也發表了支持地質「東方紅」的聲明，如林院「東方紅」在4月12日發表的「嚴正聲明」中說：「我東方紅公社堅決支持地質東方紅等兄弟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動，我們是風雨同舟的革命戰友，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新北大公社總部一小撮混蛋在4月11號晚公開分裂紅代會，挑起大規模武鬥，打傷許多我東方紅公社、地院東方紅公社、郵電東方紅公社、農大東方紅公社等革命組織的戰士，並砸壞許多廣播車，新北大公社總部一小撮壞蛋罪責難逃，絕沒有好下場。」地質「東方紅」還和工大「東方紅」、北郵「東方紅」、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農大「東方紅」等十五個組織聯合發表了「告革命造反派戰友的公開信」，題為〈憤怒控訴新北大公社一小撮所策劃的法西斯暴行——記四·一一在北京大學發生的大規模武鬥〉。

4月14日，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組織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關於目前局勢的嚴正聲明〉，批判「新北大公社」，公開將造反派內部的矛盾公諸於世。〈嚴正聲明〉中說：「最近在新北大校園裏出現了一股反對謝富治同志、影射中央文革、攻擊兄弟組織的歪風。」

「新北大公社」寸步不讓，當天就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紅衛兵總部」的名義發出針鋒相對的〈嚴正聲

⁵⁶ 《新北大》報，1967年4月13日。

明〉，說以「紅代會」名義發出的聲明「是在沒有得到紅代會核心組組長、我校駐紅代會代表聶元梓同志最後同意之下做出的，因此我們鄭重聲明，這個所謂『嚴正聲明』對我校完全沒有約束力」。「新北大公社」稱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組織的聲明「完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造謠惑眾」，並為此向對方提出「最強烈抗議」。

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大公社」的聲明中有這樣一段話：「謝富治同志如果有缺點錯誤，是完全可以討論批評的，這並不等於反對謝富治同志，更不等於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別想在這個問題上撈一根稻草。」這表明，「新北大公社」與謝富治的積怨在這時已經產生，在後來的一年多時間裏，「新北大公社」多次向謝富治發難。

從4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紅衛兵中的矛盾逐步表面化、尖銳化，期間並伴隨着大大小小的武鬥。4月3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與「井岡山革命造反聯合會」發生武鬥。4月4日，北石院內「大慶公社」與「北京公社」、「勝利公社」發生武鬥。4月10日，北石「大慶公社」與「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4月11日，北京鐵道學院「紅旗」與「革聯」，因爭用禮堂引起武鬥。4月12日，中央財經學院內發生了文革以來第一次武鬥，該院「八八戰鬥隊」一分為二，一方開會，另一方去衝，造成武鬥，打傷十餘人，有一人腦震蕩。4月13日，北京第二醫學院發生武鬥，據統計被打傷較重的有二十九人。同日，北京化纖學院「紅旗」等組織與「燎原井岡山」、「東方紅」等發生武鬥。4月19日，北外「紅旗大隊」與「紅旗造反團」發生武鬥。

此後，北京高校的兩大派鬥爭愈來愈激烈，雙方的分野也逐漸明確。1967年8月25日，地質《東方紅》報上有一篇文章寫道：「4月上旬民族宮事件的爆發，終於使得原來各個局部性的磨擦，匯集轉化為全面性的衝突。對這場衝突到底採取甚麼態度，支持誰？反對誰？這在當時北京各個群眾組織，不約而同地以出人意外的速度紛紛表態，各自選擇自己的隊列。」

事實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種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大多都表示了自己的立場。在「民族宮事件」和北大「四·一一」武鬥中，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紅」、外語學院「紅旗大隊」、石油學院「大

慶公社」、民族學院「抗大公社」、政法學院「政法兵團」、化工學院「按十六條革命造反隊」、郵電學院「古田造反團」、工商專科學校「衛東彪兵團」、「八一八革命造反團」、林業學院「魯迅公社」、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東方紅」、北醫「八一八」、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中央美術學院「紅旗兵團」、語言學院「紅旗」、中國醫科大學「向陽」、「從頭越戰鬥隊」等組織；傾向地質「東方紅」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外語學院「紅旗造反團」、石油學院「北京公社」、民族學院「東方紅」、郵電學院「東方紅」、政法學院「政法公社」、工商專科學校「革聯」、林業學院「東方紅」、礦院「北京紅衛兵」、工大「東方紅」、語言學院「東方紅」、農機「東方紅」、農大「東方紅」、北京農業勞動大學「東方紅」、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八一紅衛兵總部」、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東方紅」、中國科技大學「東方紅」、北京工業學院「東方紅」、財金「八八戰鬥隊」、經濟學院「紅旗公社」、北京鋼鐵學院「革造」、輕工「七二九兵團」、機械學院「紅旗」、北醫「長征紅衛兵」、「燎原公社」等。在傾向地質「東方紅」的陣營中，可以明顯看到有許多是原「三司」的骨幹組織。雙方陣容以後還不斷有些變動，但基本上形成了兩大派。

最初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並不支持「新北大公社」。1967年4月12日，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礦院「東方紅」發表的關於北大、地質武鬥的聯合聲明中，沒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話，只說：「我們堅決擁護謝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辦事。對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東方紅等革命組織之間的矛盾應從革命大局出發，在紅代會的主持下解決。」在北大發生武鬥時，清華、北航都派人去湊熱鬧，並發生了人員在北大被打、被扣，宣傳車被砸的情況。4月14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代會」代表時，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狀。但在後來的許多重大活動和事件中，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都是站在了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場上。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以後逐漸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為首的所謂「天派」和以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為首的所謂「地派」兩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

在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逐漸形成兩大派的同時，各個高校內部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也都不約而同地產生了分裂，形成了對立的兩大派組織。

4月14日，清華「井岡山」中一部分人分裂出來，成立了與蒯大富的「團派」對立的「四一四派」。從此，清華園內開始了無休止的派性鬥爭，從文鬥到武鬥，從小打到大打，一直打到1968年7月27日工人宣傳隊進清華。

北大校園中始終存在着反對聶元梓、反對北大校「文革」的力量，起初是所謂「井、紅、飄、0、團」五大組織⁵⁷，後來五大組織於1967年8月17日聯合組成為與「新北大公社」相對抗的「井岡山兵團」。

北京高校中絕大多數學校都存在着兩個相互對立的組織，有些學校是在兩大對立的組織之外還存在一些小組組織，但這些小組組織基本上也是分別傾向或依附於兩大組織的。有少數學校情況比較特殊，如北航、體院、礦院、農大、地質、師大、北郵等，雖然也有反對派的存在，但力量對比懸殊，在多數時間裏基本上是一派的天下。

北京中學的造反派也發生了分裂。1966年10月以後，高校造反派已逐漸成為北京紅衛兵運動的主角，中學的老紅衛兵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雖然也很激烈，但多是局限於校內，對社會上影響不大。1967年2月24日，江青、謝富治接見中學造反派時說：中學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同「聯動」作鬥爭。3月以後，中學都開始軍訓，在軍訓團的領導下，大力強調大聯合，並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組織。

1967年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小組兩次接見北京大中學校造反派，談軍訓問題。

4月3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接見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江青在講話中批評了軍訓解放軍在北京中學解散造反派組織的做法，她說：衛戍區有很多做法不妥當，我們沒有讓他們支持聯動，衛戍區的同志要虛心聽取小將的意見，要把左派組織恢復起來，壯大起來，大聯合哪能不以左派為核心呢？康生在講話中對

57 即「井岡山」、「紅聯軍」、「紅旗飄」、「0363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造反派」。

北京衛戍區負責軍訓工作的副司令員李鍾奇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李鍾奇3月27日的講話是完全錯誤的，他在這個講話中不談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談兩條路線鬥爭，不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劉鄧反動路線的鬥爭，完全是聯動觀點。」⁵⁸「這個講話是聯動的代表作，現在聯動又活動起來了，為甚麼他們老不散？就是黨內、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支持他們。」⁵⁸傅崇碧，李鍾奇不同意康生的話，當場起身辯解，被江青、陳伯達制止。

中央文革小組及謝富治等的這次講話使中學一度受挫的造反派大受鼓舞，並激起了他們對軍訓解放軍存在的不滿情緒。過去因為怕被別人扣上「反對解放軍」的帽子，造反派大多不敢公開對軍訓團和衛戍區進行對抗，現在有了「中央首長」講話的尚方寶劍，他們便覺得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抗爭了。批評軍訓團和衛戍區的大字報很快就上了街，有的還直接點名批判李鍾奇。

4月4日，王力、關鋒、戚本禹接見中學造反派，他們講話的主旨是說解放軍應當堅決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評了給軍訓團和衛戍區貼大字報的做法，王力說：「軍隊同志的缺點、錯誤，一定要採取適當方法，不要公開提。關於軍訓要總結經驗，即使軍隊的同志支持錯了也要給他們提供情況，讓他們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鍾奇』這個口號不好，要改掉，要愛護衛戍區，衛戍區是保衛毛主席的，不能把他們搞臭。」他們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了要搞班級大聯合。這次講話又給中學裏支持軍訓團的那部分紅衛兵以鼓舞，他們堅持認為支持軍訓團沒錯，搞班級大聯合沒錯。

北京中學造反派中互相對立的兩派各取所需，互相指責，並由此形成公開對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兩大派。「四三派」是中學中造反最堅決的一批組織，他們對軍訓以來一些學校的軍訓團解散造反派組織的做法不滿，認為軍訓團「右傾」，後來發展到公開炮打李鍾奇。「四三派」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組織有北大附中「井岡山」、清華附中「井岡

58 中央首長接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代表的講話(1967年4月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山]、一〇一中「毛澤東主義公社」、六中「紅旗」、二十八中「八一八紅衛兵」、電校「井岡山」等。江青在4月3日的講話中提出：「中學的左派組織不能解散」，使這一派學生大受鼓舞，一些已經解散的組織又重新樹起旗幟，拉起山頭。有些學校的「四三派」（如電校「井岡山」、一〇一中「毛澤東主義公社」等）還公開聲明退出了軍訓。「四四派」在中學造反派中佔多數，他們認為中央文革小組關於要搞好軍訓、搞好大聯合的講話是對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四四派」一般出身較好，同軍訓團的關係比較融洽，不同意「四三派」對「聯動」成員和老紅衛兵的過分的批判和鬥爭，因此，有些「四四派」組織也被「四三派」罵為「聯動」或「聯動」的幫凶。「四四派」中比較有影響的組織有二十五中「東風」、「新六中紅旗」、清華附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電校「紅旗公社」等。

從兩派的組織構成來看，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在「四三派」中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或所謂社會關係複雜的人數較多一些。在文革前就已經存在的「左」的「階級路線」使過去的剝削階級成員及其家庭飽受折磨，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初起時，大多數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學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和壓制，他們希望通過「造反派」改變自己的境遇的要求一般都比較強烈，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行為也較為激烈。〈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⁵⁹一文則反映了「四三派」學生中最極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狀況。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稱「四三派」是「對再分配有最激進要求的那一部分人」，由此斷言「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種與歷史發展緊緊相扣的生氣勃勃的新思潮。它與反動的抵制再分配的聯動思潮水火不相容，並以最激進最徹底的姿態投入戰鬥，它是最令特權人物感到恐懼的勢力」。

總的來說，「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它們都毫無保留地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聽從中央文革小組的號令，是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中學中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要依靠力量。

59 載良鄉電校「井岡山」主辦的小報《四三戰報》第1期（1967年6月11日），署名「湘江評論」。

在新成立的北京中學紅代會中，「四四派」佔有明顯的優勢，主要負責人和多數成員屬於「四四派」。4月下旬，中學紅代會作出決定，不承認六中「紅旗」等「四三派」的十一個組織，吸收與這些組織對立的「四四派」組織加入了中學紅代會。已經加入了中學紅代會的「四三派」組織，為了與「四四派」相抗衡，組織了「四三串連會」，在北京市各中學造反派中進行串連，發動一個又一個的宣傳攻勢，組織各種活動，與被「四四派」掌握了實權的中學紅代會對着幹。

中學「四三派」雖然人數少，但能量很大，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北京各大學造反派組織的支持。4月19日，由謝富治指示成立，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等八個高校造反派組織參加的中學運動調查組發表了〈關於目前首都中學運動的聲明〉，提出「目前聯動和保守勢力配合社會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把矛頭指向造反派，妄圖反攻倒算，挑撥革命造反派與解放軍的關係，把反對解放軍、反對軍訓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頭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提出前段中學大聯合中存在右的錯誤，必須迅速糾正，表示堅決支持「中學革命造反派小將」。從措詞用語上可以明顯看出他們是支持「四三派」的。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在對待北京中學兩大派的态度始終是比較明確的，他對「四三派」情有獨鍾，多次強調中學搞大聯合要「以『四三派』為主」。5月9日，清華「井岡山」與體院毛澤東思想兵團八百餘人騎自行車進城遊行，高呼「打倒聯動！」「堅決支持中學革命造反派！」「徹底批判反動血統論！」以此表示對中學「四三派」的支持。

2 「五一三」事件

「五一三」事件使駐京各軍事單位眾多造反組織形成了陣線分明的兩大派，即「老三軍」和「新三軍」⁶⁰。「老三軍」這一派基本上是擁護本單位現任領導人的，即在空軍是擁護吳法憲、余立金的，在海軍是擁護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的，在北京軍區是擁護鄭維山的。「老三軍」的主要

⁶⁰ 也有將「老三軍」稱為「大三軍」，將「新三軍」稱為「小三軍」的。

組織有海軍直屬機關的「紅聯總」等。「新三軍」則多是本單位的造反派，是要造各單位的當權派的反的，「新三軍」的主要組織有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星火燎原」等。事情是由一場演出引起的。空政文工團原想在5月份組織一次演出。空政文工團當時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主任劉素媛將此想法報告了毛澤東（劉因過去經常在中南海陪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跳舞而有機會見毛）。毛澤東建議她去找葉群談談。在葉群的建議下，空政文工團串連了北京軍區的戰友文工團、海軍的海政文工團、第二炮兵的二炮文工團與自己觀點相近的群眾組織，一起排練節目。因為演員來自陸、海、空三軍文工團，以後這一派就被稱為「老三軍」。⁶¹

空軍、海軍、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表示支持這場演出，並成立了「三軍聯合演出委員會」。另一派群眾組織得知消息後，立刻被激怒了。他們認為這是「老保翻天」，馬上發表聲明說：如果對方膽敢單方面搞演出，就要衝擊演出會場，砸爛會場。在此前不久，周恩來曾接見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代表，提出各種不同觀點的群眾組織該當聯合起來演出，並表示：你們聯合演出我就看，不聯合我就不看。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聽說以後，感到問題嚴重，分別給兩派群眾組織做工作。他勸說「老三軍」不要演出或推遲演出，以免激化矛盾，引起武鬥；同時，通知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新三軍」派組織，不准衝擊演出會場。「老三軍」自恃有林彪的支持，堅持演出。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演出開始後，「新三軍」派解放軍藝術學院「星火燎原」、海軍政治部文工團「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空軍體工隊「戰鷹紅色造反團」、八一體工隊「革聯」、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新燎原」、高等軍事學院「井岡山」等十多個軍內造反派組織和支持「新三軍」的北京一些大學的造反組織共一千多人，以「不能讓老保上台演出」為藉口，兩次衝擊了演出大會。兩派發生武鬥，雙方共有二百多人受傷，數十人受重傷。事件發生後，林彪派葉群到醫院慰問「老三軍」的受傷人員。從此，「老三軍」派成為公認的革命派，而「新三軍」派則一敗塗地。

「五一三」事件是軍隊內部兩大派分裂的標誌性事件。

61 耿耿：〈劉素媛在毛澤東身邊的一段經歷（下）〉，《黨史博覽》，2002年第7期，頁40-41。

「三軍」造反派以「五一三」事件劃線站隊，搞所謂政治演出。6月9日，林彪觀看「三軍革命文藝戰士」的聯合演出，隨之，駐京各大軍事單位上街張貼標語，熱烈歡呼林彪的觀看演出，以示支持和「緊跟」。對此結局，葉群曾得意地吹噓說：「解決軍隊內部這麼大的亂局，首長（按：指林彪）沒講一句話，只看了一場戲，就把那個『衝派』壓垮了。」⁶²

「五一三」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了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垮台。在「五一三」事件後，葉群指使海軍、空軍的一些人在北京各主要街道上張貼大標語：「蕭華是『五一三』事件的罪魁禍首！」「打倒『五一三』事件的黑後台蕭華！」⁶³蕭華從此一蹶不振。7月25日，林彪親自對蕭力說：「要徹底砸爛總政閻王殿！」林彪的講話傳達後，蕭華徹底被打倒。

「五一三」事件後，海軍的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空軍的吳法憲、余立金，總後勤部的邱會作等一批軍隊高級幹部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終於站穩了腳跟。

「五一三」事件後，「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名聲大振，成為影響當時北京政局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有句順口溜：「全國看北京，北京看三軍。」8月17日晚，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接見「三軍」代表，江青在講話中說：「現在要靠三軍的牌子，要利用三軍的牌子，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正軌。」江青的話頗堪玩味。當時全國幾乎所有的大軍區、省軍區，直到軍分區、人武部在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怎樣才能讓軍隊真正成為防止局面失控的「堅強柱石」呢？那就是通過「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來穩定北京軍內的局勢，進而穩定全軍、全國。

「三軍」派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⁶⁴的支持和肯定後，成為全軍正確路線的代表，勢力大增，很快就在各總部、各軍、兵種掌握了實權。對「三軍」派掌權稍有異議者，即會遭到嚴厲地懲罰。

62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頁123。

63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頁115。

64 「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指以毛澤東為首，包括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以及部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內的一小批人，這些人組成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最高領導層。

炮兵司令員吳克華沒有響應「三軍」的一些聯合行動，被加上「反對三軍黨委」的罪名。在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戚本禹等人的策動下，於7月5日的夜間，掀起了炮轟吳克華的統一行動，大字報、大標語布滿了北京城。從7月13日起，每天組織上萬人到炮兵機關大院，遊行示威，揪鬥吳克華。7月15日下午，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戚本禹在京西賓館接見炮兵政治委員陳仁麒。葉群對陳說：「你最大的錯誤就是不向林副主席報告情況，大權旁落。」戚本禹說：「找你談話，是為了了解情況，為了保你。」7月27日下午，葉群對吳法憲、邱會作說：「要叫他（按：指陳仁麒）回到炮司去，揭開炮兵的階級鬥爭蓋子，要空軍和總後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支援。」葉還說：「這是林副主席的指示，林彪已同江青商量好了。」此後，陳仁麒殺回炮兵主持工作，並大肆整人。從8月初開始，接連召開批鬥吳克華等炮兵領導幹部的大會，製造了「吳克華、蘇進、向守志、劉何、謝良、歐陽毅篡軍反黨集團」。⁶⁵

8月中旬，北京的大街上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標語、大字報，總政機關陷於癱瘓。一些大字報將蕭華的生活作風問題公之於眾，造成惡劣影響。8月17日，經江青建議，周恩來同意，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四人組成臨時性的軍委看守小組，主要任務是負責駐京各軍事機關、部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監督總政的運動不要出現偏差。⁶⁶ 看守小組後改稱辦事組。10月15日，軍委看守小組在給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的報告中說：

根據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1967年8月17日指示，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四同志組成一個小組，由吳負責，任務主要負責駐京各機關、部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

65 歐陽毅：《歐陽毅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367—369。

66 1968年10月30日，江青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軍委辦事組是怎麼產生的呢？1967年夏天，鬥爭蕭華的時候，出現了不嚴肅的現象，把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變成低級下流，轉移了鬥爭大方向，侮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因此，我建議成立一個看管小組。開始是四個人。後來……在軍隊產生了新的辦事班子——軍委辦事組。」參見王年一：《關於「軍委辦事組」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1年第7期，頁45。

總政機關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要出偏差。9月24日，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又決定增加楊成武同志為辦事組成員，並指定楊為組長，吳為副組長。10月4日，我們研究了軍委辦事組如何進行工作的問題。認為，由於總政目前處於癱瘓狀態，軍委文革小組目前實際上也處於癱瘓狀態，軍委辦事組是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下，負責處理軍隊系統駐京機關、部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體工作。各大軍區、省軍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軍委辦事組負責辦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組交辦的一些有關具體工作。至於部隊各項建設、戰備工作、行政工作、幹部工作等等，統由軍委常委直接領導進行。提到辦事組來的這類問題，均呈送常委處理。……軍委辦事組是個臨時性的，待政治工作組組成後，即將辦事組的工作移交政工組負責，軍委辦事組即行撤銷。

但毛澤東對這個臨時性的小組卻另有考慮。10月28日，毛澤東在軍委辦事組的報告上批示：「剛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⁶⁷ 毛澤東對原來的軍委常委並不滿意，又不便馬上解決。他是否在這個時候就考慮了用軍委辦事組取代軍委常委，尚不得而知。但在五個月後，發生「楊、余、傅事件」，毛澤東說：「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軍委辦事組遂正式取代軍委常委，成為中共中央主管軍事工作的領導機構。

3 五一六兵團

在北京造反派紅衛兵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周恩來的暗流在湧動。這股暗流的存在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不無關係。1966年9月召開的部分高校師生座談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對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等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的發言不但不制止，反而予以鼓勵。1967年2月，戚本禹派閻長貴到地質學院說：「反

⁶⁷ 王年一：〈關於「軍委辦事組」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1年第7期，頁46。

對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反革命，惡毒攻擊陳伯達、康生、江青，也是反革命。」3、4月間，戚本禹先後到北大、中央音樂學院和中央戲劇學院說：「現在提到炮打某某人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除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不可隨便與無產階級司令部聯繫起來。」「不能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如果反對他們，我們就要反對他，可以依法處理。」⁶⁸ 絕口不提周恩來，其手法與江青在反陶鑄時用的手法毫無二致。

在對文化大革命各種問題的態度上，周恩來確實與中央文革小組有明顯的區別，一些極端的造反派認為周恩來偏於保守，跟不上形勢。一些造反派提出，打倒劉少奇以後的主要矛盾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在反擊「二月逆流」的活動中，就有一些激進的造反派提出要「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把矛頭指向了周恩來。

1967年5月16日，北外「六一六紅衛兵獨立營」貼出大字報〈戳穿一個大陰謀〉，攻擊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同一時期，在鋼院、農大、商學院、二外等學校也不斷出現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一些學生認為，〈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導致劉少奇、鄧小平的被打倒，這一〈通知〉在1967年通過一周年時公開發表，也將會有大人物被揪出，這個大人物就是周恩來。⁶⁹ 他們便打起〈五一六通知〉作為自己的旗幟，但由於在此之前他們公開進行反對周恩來的活動曾受到群眾的反對和批判，於是便採取隱蔽的方式，經常在夜闌人靜之時，張貼標語、大字報和傳單，但這些東西一經發現，往往都會立即被撕去或覆蓋。

5月底，張建旗等人在北京鋼鐵學院成立了「鋼院五一六兵團」，成員共七人。6月2日，張建旗貼出了〈給周總理的一封信〉和署名「鋼院五一六兵團」的大字報〈二十三個為甚麼〉，公開將矛頭指向周恩來，攻擊周恩來是「二月黑風的後台」。「鋼院五一六兵團」成立以後，還向

68 戚本禹對中央音樂學院等院校組織的講話(1967年4月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9 1967年7月17日，毛澤東在武漢說：(公開發表)5月16日的通知，我同總理臨時決定的，發得那麼快，引起了很多猜測，整到總理頭上。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70—171。

毛澤東、中央文革等寫過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在6月4日前給以指示，如不給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動。

炮打周恩來的行動引起了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不滿和憤怒。許多造反派和群眾組織紛紛發表聲明，表示要「迎頭痛擊反總理的逆流」。5月24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發表聲明說：「炮打周總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⁷⁰

5月27日，外交部翻譯唐聞生、外交部辦公廳綜合組幹部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說：「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我們認為對總理的錯誤和缺點可用小字報或書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總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統帥。對總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問題上與總理持有不同意見，可以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眾中展開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但不能借此炮打總理、攻擊總理，把總理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其後台。」並說：「我們絕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法，這種提法是錯誤的。」毛澤東於5月29日在唐、王來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⁷¹

中央文革小組於5月29日和6月3日，兩次接見北京高校造反派，對公開炮打周恩來提出了批評。陳伯達在講話中說：「目前社會上出現從右和極左方面來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情況，要提高警惕。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裏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6月3日，「鋼院五一六兵團」中有三人宣布退出。此後，張建旗等人又串連北京農業大學、師範大學、商學院、三中、一〇一中等學校的一些人，於6月30日、7月1日，在北京外語學院召

70 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9—10月）。

7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59。

開「第一屆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簡稱「五一六兵團」），這個組織的骨幹分子有二十多人。在「五一六兵團」代表大會決議中提出：「周恩來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一員主將」，是「反革命兩面派」。

7月上半月，「五一六兵團」在財貿口、農口發動所謂「第一次戰役」和「第二次戰役」，大量散發〈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個大陰謀〉、〈告農口革命戰友書〉、〈二十三個為甚麼〉、〈五一六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關於當前形勢的幾個思考題〉等傳單，在八機部貼出標語「打倒二月黑風總後台」，影射攻擊周恩來。8月3日、4日，「五一六兵團」在紫竹院公園開會，決定成立總部，由張建旗（鋼院）、程鎮華（商學院）、蘇東海（師大）、郭樹忠（農大）、劉秉傑（農大）五人任常委，下設負責農林、財貿、文教、工交、軍事、中學、外事、全國聯絡等八個方面軍，確定了各方面軍的負責人。有個別外地學生（如長沙一中、湖南師院附中等）也參加了「五一六兵團」的活動。

8月上旬，「五一六兵團」頻繁活動，在西單、王府井、東四、北海、動物園門口、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處都出現了他們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傳單，題目有：〈周恩來是劉鄧司令部的人〉、〈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周恩來在農口幹些甚麼〉、〈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後台周恩來〉、〈周恩來之流背叛五一六通知〉、〈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周恩來〉等等。他們還向北京各大專院校，以及湖南、湖北、廣東、新疆等地郵寄傳單，還到城裏挨門挨戶塞傳單。這是他們活動的高潮，也是他們在遭到毀滅性打擊前的最後一次表現。⁷²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召開造反派座談會，在會上提出「被壞人操縱的五一六兵團是反革命組織，它把矛頭對準周總理，實質是對準中央」。⁷³造反派立即行動起來，批鬥了「五一六兵團」的主要成員。

8月14日，鋼院「延安公社」、地質「東方紅」、農大「東方紅」、師大「井岡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專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團聯絡站」，下設

72 參見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1期，頁34。

73 中央首長對北京學生代表的講話（1967年8月1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農、工交、財貿、外交、文教、中學等分站。8月18日，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農大「東方紅」、鋼院「延安公社」等七十六個組織聯合發表聲明，表示「決心與五一六黑匪兵團決一死戰」。8月25日，北外「紅旗大隊」等組織抄了貼過攻擊周恩來大字報的北外「六一六」，並宣布「抄出大批黑材料」。8月26日，北京及全國一千多個單位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張建旗等五名常委被揪鬥。

9月3日，《人民日報》報道〈黨中央負責人在北京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發出戰鬥號召〉，報道說：「中央負責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眾必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嚴防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必須堅決鎮壓美蔣特務、蘇修特務、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破壞活動，堅決取締『五一六兵團』這個被一小撮壞頭頭操縱的反革命組織。」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其中特別提到了「五一六兵團」：

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毛澤東對姚的文章讚賞有加，連稱「很好」、「極好」，並在關於「五一六兵團」的段落後邊加寫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⁷⁴

7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401、403。

9月10日，謝富治在接見中學代表時說：

五一六兵團所以壞，因為他們是把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解放軍。五一六兵團非常反動，又非常渺小，他們人數不超過五十人，其中相當多是受蒙蔽的年輕人，真正的壞人不超過十幾人，可能有點後台老闆、走資派。為甚麼要批判它呢？因為還有市場，他們是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

在一片喊打聲中，「五一六兵團」徹底瓦解了。「五一六兵團」的主要成員均被捕入獄。1968年，結合清理階級隊伍，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批判和清查「五一六」運動。1970年3月27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提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面派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這個通知一方面要求糾正擴大化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採用體罰或變相體罰的手段，並提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另一方面又提出：「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⁷⁵ 實際上這是鼓勵人們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組織」。1971年2月，中央決定成立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的「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清查「五一六」的運動愈搞愈大，牽連的人愈來愈多。由於所謂「五一六分子」並無準確的判定標準，一般即以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中的兩句話為標準，即：「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人民解放軍。」⁷⁶ 後來又加上反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這樣籠統的標準，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不同的人可以給予完全不同的解釋。兩派對立的群眾組織常常互相攻

75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420。

76 有文章說，這兩句話也是毛澤東所加。

擊，指責對方組織中有「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的當權者往往把反對派當作「五一六」來加以打擊。在清查「五一六」的運動中，普遍存在逼、供、信的現象，大批無辜受難者成為運動的犧牲品。據北京市革委會文教組報告，在北京工業大學一所學校就揭發出「五一六」嫌疑分子542名(在校的406名，已坦白的164名)。⁷⁷

實際上，除北京1967年有過一個人數很少的「五一六兵團」外，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根本不存在的，完全是主觀主義、人為製造出來的假案。清查「五一六」運動使全國數以百萬計的人蒙冤，慘遭迫害。

4 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是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在1967年3月7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大專院校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中規定：「各院校根據本單位具體情況，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學術上深入地進行批判和鬥爭。着手研究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學方針和教學方法。」

5月4日，陳伯達、戚本禹到北京師範大學，在聽取師大革委會的匯報後，陳伯達對師大文化大革命發表意見，號召師大全校師生對師範教育的改革問題展開大膽、廣泛的討論，並建議師大在教改中寫出兩本書，一本《世界教育制度發展史》，一本《中國教育制度發展史》。⁷⁸

關於教育改革問題的討論在一些高校開展起來：北航組織了關於十七年來教育戰線兩條路線鬥爭情況、半工半讀、抗大經驗等問題的專題調查，還開展了文藝大批判活動，對電影《林家鋪子》、《兩家人》、《武訓傳》、《青春之歌》等進行批判；北師大組織批判兩種教育制

77 北京市革委會文教組：〈關於北京工業大學批清運動中落實罪行的情況報告〉(1971年8月5日)。另據7月24日的師大運動情況簡報說：「已揭發五一六嫌疑分子876人」。

78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年5月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度、兩種勞動制度，編寫《中國教育制度發展史》、《教育戰線上十七年來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毛主席關於教育的語錄》等書。

5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分頭調查北京中學文化大革命和軍訓的情況。5月11日，陳伯達去了六中和二十八中，康生去了和平門中學，戚本禹去了人大附中。5月12日，康生、關鋒在人民大會堂與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及兩校軍訓團進行座談。毛澤東打算根據中央文革小組調查的情況，中央開會，作出今後軍訓如何搞的決定。

當時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組織中內戰頻繁，「四三派」與「四四派」的矛盾愈來愈尖銳、激烈。在四中、二十八中等學校出現了「四三派」與「四四派」的武鬥事件。5月11日下午，陳伯達在二十八中就說：「今天來第一是看你們武鬥的『成績』，看是多少分，能不能打100分，我看差不多，武鬥100分。」

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各中學調查中聽到的都是「四三派」與「四四派」無休止的爭論，沒有聽到多少關於如何搞好軍訓的具體意見。康生在師大附中說：「毛主席叫我來聽聽大家對軍訓的意見，你們的興趣是四三、四四、老紅衛兵、小紅衛兵，這你們叫我怎麼向毛主席交代？」後來，關於軍訓的文件也沒了下文。

北京市革委會一再想穩定北京形勢，以便創造一種順利進行大聯合、三結合和鬥、批、改的局面。5月9日，北京市召開「北京市建立和鞏固革命秩序大會」，動員造反派和群眾起來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5月14日，經中央批准，北京市革委會發布〈重要通告〉，強調制止武鬥，並就避免和制止武鬥作了若干規定。通告還強調：「已經外出串連的北京學生和群眾，除中央特許的以外，應當立即全部返回北京。」6月3日，謝富治按中央指示到紅代會傳達兩條命令：「1．紅代會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紅代會的名義跑到各地自作主張，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秩序。2．紅代會和各大專院校要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委會決定；立即將北京各院校派往各省和北京各單位的同學調回來。」⁷⁹

79 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9—10月）。

7月3日，為紀念毛澤東「七·三」指示⁸⁰發表兩周年，紅代會在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表示堅決貫徹毛主席的教育方針，為建立和鞏固新的教育制度而奮鬥。

北航於7月3日開始「復課」。《人民日報》於7月5日在頭版報道了北航進行「復課鬧革命」的具體做法：每天上四節課，每節課二小時。上午第一節學二小時毛主席著作。第二節一周內三天搞大批判，三天學業務。下午第三節，每周一次學工，一次學農，一次學軍，三天各系自行安排。晚上第四節，兩個半小時，搞文化大革命運動。

7月6日，北京輕工業學院「紅鷹兵團」召開「迎接鬥批改教育革命新高潮誓師大會」，並於7月7日發出復課鬧革命的通知。下面是他們的一周課程安排表：

| 時間 | 課程內容 | 備註 |
|-------------|-----------|-------------------|
| 6:00—7:20 | 軍政訓練課 | 各支隊可組織去玉淵潭游泳 |
| 8:00—9:50 | 毛澤東思想課 | 回班學習，內容另行安排 |
| 9:50—10:10 | 課間休息 | 做課間操 |
| 10:10—11:40 | 鬥批改課 | 聯合其他組織共同鬥朱康一小撮 |
| 12:30—14:20 | 午休 | |
| 14:50—16:40 | 鬥批改課 | 以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為主 |
| 16:40—18:00 | 學工學軍學農勞動課 | 輪流自己修建校園，球類游泳 |
| 18:30—20:00 | 自由活動 | |
| 20:00—22:00 | 聯合課 | 各組織戰鬥隊召開串連會，形勢座談會 |

當時關於教育改革的具體內容的探討並不多見，多數停留於喊口號式的表態。真正涉及教育改革的大字報內容也很簡單和偏激，下面是當時的一些大字報摘錄：

80 1965年7月3日，毛澤東對共青團中央辦公廳1965年6月25日編印的《團的情況》(增刊)第18期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情況下降〉一文批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毛澤東的這個批語後來被稱為「七·三」指示。

學校就是大公社：建議把學校變成一個聯絡站，設在專區，公社辦個系，工廠辦個專業，變成「五位一體」的人民公社的組成部分。

還是講習所好：中學可以用一年時間來進行長征，邊長征邊學習。現行大學可以取消，設立各種各樣的講習所，學生經過一定組織到工廠、農村、商店、鐵路……在實際中學習鍛煉，再到講習所來進行總結學習。

延長小學，取消中學，縮短大學：小學現在的六年延長到九年，實行普及式，七歲開學，十五歲畢業。小學畢業後一律到工廠或農村參加勞動，改造思想，聯繫實際，向工農學習。過去的高中是作為進大學的階梯的，現在必須把它砸了。大學還是要招生，沒有高中生招誰呢？招工農兵，招勞動了兩年的思想好的肯鑽研的「小」學生。大學學習打破以前的框框，以自修為主，互相討論，互相交流。大學學制三年，這樣，二十歲就可以畢業。

工農兵來教大學：小學六年，七歲入學，內容為毛選學習、政治、文化、自然科學知識，畢業後學工、學農。三四年後，由工人、貧下中農選送專門化學校。這些學校由本單位或本系統舉辦。如大慶辦石油學校，林場辦林業學校，……由本單位的工農為師，結合實際生產進行學習和研究。畢業後回原單位或統一分配。

北京的大學都滾蛋：北京市大學真多，甚麼地質、礦院、農大、政法等等，還有清華和北大。照我們看，這些甚麼院校可以統統滾出北京去！石油完全可以遷到大慶去！礦院可以遷到河北、山西等礦山地區去！林院更可以去蘭考縣或大沙漠改造大自然去，在大城市裏搞甚麼名堂！地質可以遷到大西南去！農大、農機可以到農村的廣闊天地去，直接為農業服務。關於政法學院可以不要。北大倒可以研究研究。古時候有個顧炎武讀萬卷書，走萬里路，理論實踐知識都很豐富。我們現在學文史，可以長征去，搞社會調查，階級分析，宣傳毛澤東思想。

北航提出一個公式：抗大(指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 共大(指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 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 共產主義大學，並組織全校師生圍繞這個公式進行討論。地質學院成立了教師、學生、幹部、工人四結合小組進行教改工作，在地質學院的大字報中還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教師圍着學生轉好得很！」

此後，礦院、清華、農機、石油、地質等院校相繼召開了「復課鬧革命」誓師大會。

7月11日，北京五十多所高校的九十個組織和外地一些組織的代表共三萬人在北京航空學院聯合召開復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到會講話。據當天《人民日報》報道，北京已有七所高校復課，另有師大、地質、郵電、外交、礦業、政法、國關、醫大等校已決定於12日復課。

所謂復課鬧革命，形式上搞得熱熱鬧鬧，但實際上並沒有多少人真正復課。很多單位和組織參與搞有關復課鬧革命的活動，不過是為了表明自己是緊跟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大多是為了裝裝門面，走走過場。

四 難產的革委會

1967年1、2月份，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提倡和鼓動下，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基本上都由造反派奪了權，但真正能夠建立起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只有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山西和北京六個省市。毛澤東原以為到4月份就差不多可以在全國範圍內看出眉目來了，周恩來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說：無論如何要在3月份解決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但事與願違，除上述六省市以外，各地的革委會均遭遇難產。

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臨時權力機構的過程，一直拖到1968年的9月，歷時二十個月。各地革委會遭遇難產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大聯合」、「三結合」的問題解決不了。當時為數眾多、五花八門的造反派

群眾組織，個個都認為自己是最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都想「以我為核心」，由自己作為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參加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委會的過程中，各組織往往為了席位和職務的分配而爭論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對於誰是革命幹部的代表，往往也成為爭論的焦點。一派要結合的幹部，另一派則高喊打倒。幹部要參加「三結合」必須先在群眾面前「亮相」，而在「亮相」中就要表明觀點，在對群眾組織的態度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喪失參加「三結合」的資格。

從1967年2月開始，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就不斷地為解決各地成立臨時權力機構問題而努力。各地參加奪權的一些主要的造反派組織代表和準備參加「三結合」的幹部代表、軍隊代表被召到北京來，由周恩來主持，進行協商、談判。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恩來在2月接見中央、地方、軍隊負責人四十三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二十七次；3月接見各地負責人四十九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三十一次。⁸¹雖然中央很着急，但造反派組織之間依然矛盾重重，糾紛不斷。中央原來打算對一些問題複雜的地區用軍管的辦法來加速解決大聯合、三結合的問題，效果並不理想。

一般來說，中央還是有權威的。在中央宣布某地的某個群眾組織是反動組織或保守組織後，基本上就會令該組織土崩瓦解，或者是一蹶不振。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不少例外。湖南的「湘江風雷」就是一例。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二四批示」，將「湘江風雷」定為與「紅旗軍」一樣的反動組織。但事實上是中央文革小組搞錯了，「湘江風雷」確實是個造反派組織，在毛澤東的干預下，「湘江風雷」得到了平反，並且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成為湖南省最著名的造反派組織。內蒙古的「工農兵」、「無產者」也被中央定為保守組織，支持「工農兵」、「無產者」的內蒙古軍區被指責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這次中央並未搞錯，「工農兵」、「無產者」就是與「呼三司」這樣真正的造反派組織對立的保守派組織。但「工農兵」、「無產者」與支持他們的內蒙古軍區並未俯首聽命，而是採取了堅決的抵抗。

8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32、142。

1 內蒙古的抵抗

從1967年2月10日至4月13日，為解決內蒙古問題，周恩來等人曾六次接見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內蒙古軍區和對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代表。4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決定〉中說：2月5日以來，內蒙古軍區個別領導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打擊了「呼三司」等革命群眾組織，大批逮捕了革命群眾，支持了內蒙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及其操縱的保守組織。王逸倫、王鐸要負主要責任。⁸²王逸倫隔離反省，王鐸停職檢查，交群眾批判。決定由原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吳濤(原副政委)任軍區政委；成立以劉賢權、吳濤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在劉賢權到任前，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代理。

中央決定發布後，被宣布為保守組織的「工農兵」、「無產者」等組織的大批群眾表示堅決不服，紛紛上街遊行，要求中央重新調查內蒙古的情況。5月11日，兩派群眾數千人在內蒙古區黨委機關發生大規模武鬥。內蒙古軍區的大批幹部、戰士也表示不理解，許多人參加了支持「工農兵」、「無產者」的遊行示威活動。到內蒙古代理軍區司令員的滕海清也遭到了多數軍區幹部戰士的反對和圍攻。內蒙古軍區一大批幹部戰士⁸³前往北京告狀。

到北京的大批內蒙古軍區幹部戰士一面上訪告狀，一面在北京尋求支持自己的力量。北京的造反派因為中央已明確表態，所以都不支持他們。後來內蒙古軍區的軍人找到了一些被中央宣布為反動組織「聯動」成員的北京「老紅衛兵」，得到了他們的同情和支持。5月中旬，一批北京「老紅衛兵」來到呼市。他們在進行了一些調查了解後，發表了支持內蒙古軍區和「工農兵」、「無產者」的看法。一份署名為「首都紅衛

82 王逸倫、王鐸均為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83 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內蒙軍區問題的通報〉(1967年6月15日)中說，到北京上訪的軍區幹部戰士有二千五百多人。

兵最愛黨最愛毛主席最不怕死戰鬥隊」發表的〈關於內蒙呼市形勢的十點看法〉的傳單曾在呼市流傳，傳單中斷言：「中央八條」（即〈關於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是不得人心的，是三司中一小撮人勾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謊報軍情，欺上壓下造成的，是有原則錯誤的。傳單中說：「一切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以及一些不願和工農兵相結合的學生是為八條歡呼的，是仗有八條而無所不為的，廣大工農兵都不同意八條。」傳單號召「堅決造八條的反」。⁸⁴

到北京告狀的內蒙古軍區的軍人受到中央多次接見，每次接見都出現「頂牛」的現象。周恩來等人三番五次地宣傳中央的政策，軍人們則頑強地要求中央收回「八條」。會場上每每出現哄鬧、混亂的場面：

在5月16日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負責同志接見的大會上，他們無理取鬧，不聽總理講話，多次高呼對抗中央決定的反動口號。還當場打傷了一位擁護中央決定的內蒙同志。在5月20日的大會上，他們反抗中央的活動愈演愈烈。他們在大會上拍桌子，跺腳，起哄，搶奪擴音器，大喊大叫，衝上主席台，將內蒙軍區政治委員吳濤同志毒打致傷，還毆打了軍委辦公廳工作人員和會場服務人員，甚至公然在會場上宣讀事先準備好的反對中央的五條反動要求。⁸⁵

鑑於內蒙古軍區軍人的頑固態度，中央軍委於5月21日作出五條決定：一、內蒙古全體來京人員必須於5月24日前全部離京返回內蒙古。二、軍區領導機關和部隊一律進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軍隊不許串連，不允許有戰鬥組織，不許隨便參加遊行和集會。三、對少數對抗中央指示的人，要視其情節輕重給予適當處分。四、軍區指戰員絕

84 1967年5月25日出版的《草原風暴》報。該報為解放軍內蒙古軍區「紅色造反團」、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首都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赴呼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聯合主辦的。

85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內蒙軍區問題的通報〉（1967年6月1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對不准參加武鬥，要堅決反對打、砸、搶、抄、抓。五、支持左派群眾組織，教育和團結保守組織群眾。⁸⁶

5月24日在政協禮堂的接見大會上出現了打傷內蒙古軍區政委吳濤的事件。25日，周恩來下令逮捕打人凶手，並到毛澤東處報告內蒙古問題。26日，周恩來約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粟裕等商談解決內蒙古問題。⁸⁷ 當天作出中央軍委五條決定。決定內容如下：

根據內蒙古軍區在京人員這幾天的行動，採取如下決定：

1、對黃厚、王良太實行隔離反省，對劉昌、張德貴實行停職反省，停止與各方一切聯絡。⁸⁸

2、對24日搗亂會場，毆打吳濤，宣讀五條反動要求的少數頭子實行清查逮捕。

3、對現在六個招待所的788人宣布禁止外出，要他們自己檢舉來京鬧事的為首人員和後台指揮人員，這些人員集中到外地整訓，暫不回蒙。

4、準備調一師兵力移駐呼市，將不守紀律的警衛營、通訊營一部分人員、高炮營、測繪大隊等調離呼市，分駐北京軍區指定地區。

5、宣布內蒙古軍區為省級軍區，劃歸北京軍區編制，滕海清、吳濤、劉彬立即隨北京軍區調進部隊回呼市指揮。⁸⁹

內蒙古的抵抗着實讓中央惱火，中央的處理也是極其嚴厲的。中央的通報中把內蒙古軍區軍人們在北京的行為定為「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是違反黨紀軍紀和國法的犯罪行為」。⁹⁰ 6月15日，中共中央、中

86 這五條決定經毛澤東批准。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55。

8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56。

88 黃厚當時為內蒙古軍區副司令員，王良太為參謀長，劉昌為副政委，張德貴為政治部副主任。

89 中央軍委關於處理內蒙古軍區的決定(1967年5月2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0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內蒙軍區問題的通報》(1967年6月1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向全軍發出了關於內蒙古軍區問題的通報，並將中央軍委5月26日的決定印發到全軍團以上黨委。

滕海清、吳濤立即隨北京軍區××軍××師開進呼和浩特，以穩定局勢。當時，被定為保守派的「紅衛軍」等組織在5月10日製造了衝擊內蒙古黨委辦公室大樓的事件後，一直佔據着內蒙古自治區工會大樓。××師進駐呼市後，派兵包圍了這座位於呼市中山路上的高大建築。5月30日，軍隊佔領了工會大樓，「紅衛軍」等組織被強行解散。⁹¹

2 「天下未亂蜀先亂」

古語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常被人看作是容易出亂子的地方。文化大革命中四川是亂得最厲害的地區之一。1966年12月4日，重慶市體育場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發生了大規模群眾性武鬥事件，四百多人受傷。這次武鬥事件比同年12月30日發生在上海康平路的群眾性武鬥事件時間要早，規模要大。⁹²

1966年底，有人提出：鄧小平過去是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地區問題嚴重。毛澤東也認為「要集中把李井泉在西南地區的頑固堡壘突破」。毛澤東認為李井泉、廖志高是堅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方面的，要徹底批判，搬掉這個石頭。⁹³ 就在此時，有人將為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張西挺翻案的問題提了出來。⁹⁴ 12月31日，王力寫信給江青轉中央，信裏提出：劉結挺、張西挺問題是突破李井泉在西南的頑

91 圖們、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頁44—45。

92 詳情見何蜀：〈「文革」首例大規模武鬥不在上海在重慶〉一文，載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八十三）增刊第242期（2000年11月20日出版）（<http://www.hxwz.com/CR/ZK00/cr83.hz8.html>）。

93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35—736。

94 劉結挺原為中共宜賓地委書記，其妻張西挺為中共宜賓市委第一書記。因嚴重違法亂紀於1965年一起被開除黨籍。

固堡壘的重要關鍵。王力建議：成立調查組，把情況弄清楚，重新處理劉、張的問題。此時，北航「紅旗」小報登載了四川省委把劉、張關押起來後劉結挺寫的日記，反映他堅持自己的觀點，鮮明地反對彭德懷。北航「紅旗」的小報得到毛澤東的欣賞，毛澤東欣賞劉結挺這個人。毛澤東問江青，劉、張問題當時是不是鄧小平批准的？江青叫王力去查，王力查了檔案後寫信向江青匯報說：是鄧小平、彭真、楊尚昆等批的。⁹⁵

1967年春夏之交，四川再次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4月1日至4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四川宜賓問題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的，⁹⁶名義上是聽取各方面代表的意見，實際上只許劉結挺、張西挺等人進行「控訴」，不許對方申辯。4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四川宜賓地區劉結挺、張西挺等平反的通知〉。〈通知〉認定，劉結挺、張西挺案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一手製造的」，「完全顛倒了黑白的『冤案』」，「應以平反」，並稱「受到陷害的劉結挺、王茂聚、張西挺、郭林川、李良等是堅持黨的原則的好同志」。劉結挺、張西挺後來成為四川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的負責人。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成立革委會時，劉、張夫婦雙雙成為革委會副主任。四川省的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擁護劉、張，一派反對劉、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爭鬥不休。對劉、張的態度，成為四川省派性鬥爭的焦點。

5月6日，成都一三二廠（即國營峨嵋機械廠）發生大規模武鬥流血事件。當天，該廠造反派調集廠外造反派圍攻廠內的保守派「產業軍」。雙方開始用磚頭、棍棒交戰。當造反派圍攻該廠保密生產區時，退守生產廠房的「產業軍」動用民兵武裝的各種槍支，向圍攻者開槍射

9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39—740。

96 1967年3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一份反映四川宜賓文化大革命情況的簡報上批示：「中央文革小組：此事應加以處理。可找雙方各十人左右來京商談，成都軍區甘渭漢也應來。請商總理酌辦為盼！」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97。甘渭漢當時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

擊，打死48人，打傷127人。⁹⁷被打死者中有一名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叫李泉華的學生，所以北京很快就有了反應。當天晚上，北京地質學院大操場上舉行了兩萬人參加的「聲討李井泉，支援四川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會」。北京其他一些大學也舉行了支援四川造反派的示威遊行。

5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決定〉的主要內容有：一、認定「以李井泉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堅持執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定撤銷李井泉的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和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二、認定「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從2月下旬以來，支持了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後操縱的保守組織，把革命群眾組織『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川大八二六戰鬥團』等，打成了反革命組織，大量逮捕革命群眾。他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變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時，擅自調動部隊到宜賓，支持宜賓軍分區，支持宜賓地委內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鎮壓革命群眾組織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在萬縣軍分區，還製造了武裝鎮壓群眾的流血慘案。在其他一些軍分區和地委，也或輕或重地犯了這樣的錯誤。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三、由新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司令員梁興初和劉結挺、張西挺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四、「要幫助革命群眾組織恢復和發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團這樣的革命組織，要注意同紅衛兵成都部隊及其他革命組織加強團結，不要互相攻擊，而轉移了鬥爭目標。」⁹⁸

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先後發出了關於好幾個省市自治區的文件，⁹⁹

97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50—197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314。

98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446—447。

99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3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3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4月13日）、〈中共中央關於福建問題的意見〉（4月3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但都沒有四川省對全國的影響和震動大。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的「以天下為己任」的造反派紛紛奔赴成都，增援四川造反派。

中央決定下達後，四川非但沒有出現聯合、穩定的局面，反而加劇了各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據《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記載，5月13日，宜賓以「紅旗派」為首的造反派，在劉結挺、張西挺的支持下，圍攻保守組織「紅色派」，以致發生大規模武鬥。武鬥一直延續到20日，造成千餘人傷亡，一幢四層大樓被燒毀。5月14日，樂山城區造反派「紅色造反兵團」與保守派「四軍五部」在原中共樂山地委招待所發生劇烈衝突，「四軍五部」被迫撤至城郊。此後，「紅色造反兵團」在城內構築工事，動用木棒、鐵棒乃至槍支守衛，不准城外保守派進城。城外的「四軍五部」用木棒、鐵棒及土炮攻城，並斷絕城內的水、電，相互攻擊拼殺達五十餘天，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雙方被打死103人，被打傷1500人。¹⁰⁰

5月23日，四川省革籌小組、成都軍區在成都召開十多萬人參加的「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誓師大會」。四川最大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抵制了這個大會，因為他們認為，中央決定中突出宣揚了「工人造反兵團」和「八二六」，而把「紅成」僅僅當成了團結的對象，認為是劉結挺、張西挺有意分裂「紅成」派。24日，「紅成」派自己召開了另一個誓師大會。會後不久，「紅成」就提出了「炮轟劉結挺、火燒張西挺」、「砸爛省革籌辦事機構（時為劉、張所掌握）」等口號。此後，四川造反派開始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

6月26日，「紅成」組織「萬人赴京匯報團」離開成都北上。此前，「紅成」在成都市舉行了號稱有四十萬人參加的「上京匯報誓師大會」。周恩來得知後，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通知「紅成」：中央不同意「紅成」組織「萬人赴京匯報團」去北京，有甚麼問題由省革籌負責解決，請已出發的人員返回成都。「紅成」不為所動，堅持北上。29日，周恩來獲知「紅成」「萬人赴京匯報團」部分人員已抵達四川綿陽時，再次指

100 《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50—1978）》，頁315—317。

示：革命群眾要聽毛主席的話，要遵照中央的決定，可以派十個代表到北京商談。30日，周恩來又指示四川省革籌小組：「紅成」到京人數，十人不行，力爭五十人，萬一不行，無論如何不能超過一百人。7月1日，當周恩來得知「萬人赴京匯報團」仍繼續北上時，又給在綿陽的張國華打電報並轉告「紅成」負責人，指出，你們要動員五萬餘人赴京告狀，這無論從哪一方面講，對抓革命，促生產，支援三線建設，便利交通運輸，節約鬧革命，都會引起不良後果。更無法聽取匯報，進行會議。希望你們以大局為重，保持你們的革命精神，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與張國華切實商量代表人數，以便通知鐵路局接待你們早日來京。7月8日，「紅成」總部表示同意只派六十名代表赴京，並盡力說服其他人立即返回成都。10日，周恩來和陳伯達聯名致電「紅成」總部並同時告四川省革籌小組，中央將派出代表團赴西南，希望你們把在赴京途中的八九千人迅速勸回成都。¹⁰¹「紅成」的六十名代表後由周恩來派飛機接往北京，但由於後來發生了「七二〇」事件，中央聽取「紅成」匯報之事一直拖到9月下旬才進行。

中央代表團由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四人及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張根成加上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的四名大學生組成。他們於7月初到達成都後，表態支持「八二六」，壓制「紅成」，一點也沒有緩解四川兩大派的矛盾。

101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65—166。

第七章

天下大亂

1967年夏，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更加混亂。

由奪權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亂，又直接導致全國的正常經濟秩序普遍被打亂，有的甚至陷入癱瘓。交通運輸特別是鐵路運輸遭到嚴重衝擊。從1967年上半年起，京廣線長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區，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東北長春、四平地區等許多路段被迫停止通車，或斷續通車。到8月份，鐵路平均貨運日裝車比7月下降45%。由於武鬥，全國鐵路幹線除北京至山海關、徐州、武漢、包頭，鄭州至西安及黑龍江省內各線尚能保持基本通車外，其他幹線都堵塞或經常不通或時通時斷。1967年鐵路日平均裝車數僅為計劃的46%。沿海和長江航運8月貨運量比7月減少21.6%，有些港口發生武鬥，沿海八個港口滯留在港船舶達到200艘，其中外輪163艘停工待卸或待裝的有112艘。1967年初起煤炭生產節節下降。繼5月宣布對煤炭部直屬六個礦務局實行軍事管制後，6月又對煤炭部直屬的68個礦務局實行軍事管制，但仍無法有效地控制局面。8月，部屬煤礦平均日產量24萬噸，比7月減少30%。由於武鬥陷於停產、半停產的煤礦有16個。到1967年12月，煤炭部直屬各礦務局日產煤水平只達到正常生產水平的50%左右，是新中國成立後歷史上最低水平。鐵路運輸和煤炭生產的緊張局面，直接影響到冶金、電力等等其他

生產部門，造成惡性的連鎖反應，導致整個國民經濟都不能正常運轉。¹

全國大多數地區的群眾性奪權沒有得到中央的認可，各群眾組織之間由於觀點的分歧和利益的衝突，矛盾愈來愈深，各省、市、自治區都出現了相互對立的兩大派或三大派組織。其中，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寧夏等地的形勢尤為嚴重。這些地區的保守派力量比較強大，而且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駐地解放軍的支持。一些地區的駐軍也捲入派性鬥爭，在野戰軍與地方部隊之間，在省軍區與大軍區之間，常常在支左問題上出現觀點分歧。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常常激化為大規模的武鬥事件。許多地區出現了農民進城參加武鬥的現象，中共中央為此明令禁止，但成效甚微。群眾性武鬥由原來的棍棒、石頭發展到使用槍、炮等現代化武器，死人的數目大大增加。毛澤東在1966年底所預期的「全國全面內戰」，在相當一部分地區成為了現實。

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六個省市，也都出現了造反派的分裂。

在上海，「工總司」掌權之初即出現了分裂，原「工總司」所屬的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一兵團、第二兵團、第三兵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被清除出造反派。後來，上海柴油機廠「聯司」和上海全市的「支聯站」又與「工總司」形成尖銳的對立。8月4日，「工總司」為鎮壓上柴「聯司」，調動十萬人馬，發動了上海最大的一起武鬥事件。

北京的大專院校造反派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為首的「天派」和以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為首的「地派」，中學的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北京兩大派鬧得很凶，但真正大打出手、武鬥達到高峰，還是在1968年。

山東省革委會在「二三」奪權後不久，發動了所謂「反逆流」，即認為走資派乘貫徹幹部政策，充實和加強領導班子和造反派開門整風的機會，發動了猖狂反撲，捲起了一股反革命復辟逆流。4月3日，省革

¹ 參見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頁646--647。

委會組織了二十萬人和解放軍駐濟南部隊，召開了反逆流誓師大會，並組織了遊行。在「反逆流」中受到衝擊的群眾組織於4月22日聚集十萬人在八一廣場集會，對省革委會以「反逆流」名義進行打擊部分群眾組織和各級革委會的行為表示不滿。這一派群眾組織被稱為「四二二」派。此後，濟南市兩大派群眾組織對立的局面愈來愈嚴重。5月7日，濟南發生大規模武鬥。「山工總」和「紅山指」對「四二二」派進行了鎮壓。濟南市內以「四二二」派為主建立的革委會幾乎全部被摧垮，影響涉及全省。

山西省在奪權後，兩個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劉格平、張日清分別支持「紅總站」和「紅聯站」，全省形成兩大派對立的局面，雙方不時發生武鬥事件。中共中央於4月、7月兩次在北京召開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明確表態支持劉格平及「紅總站」。8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擴大會議紀要〉，其中明確「肯定了劉格平、袁振、曹中南、陳永貴、徐志遠等同志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支持革命小將和廣大革命造反派炮轟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大方向是正確的。會議也肯定了張日清同志參加奪權，站出來支左，做出了很大成績。但是後來，張日清同志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張日清的錯誤主要是：「在軍隊內進行反對劉格平」，在晉中問題上，不支持陳永貴，「反而支持軍分區少數執行錯誤路線的負責人」。²儘管有中央的明確表態，但山西兩大派的矛盾並未解決，還是經常在一系列問題上發生衝突，後來更發展到大規模武裝衝突。

貴州省在4月10日召開全省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會議（簡稱「省紅代會」），4月11日，部分反對派學生衝擊「省紅代會」，被稱為「四一一」派。之後，「四一一」派由學校逐步發展到社會，在全省範圍內形成為與當地革委會相對立的群眾組織。6月8日，貴陽地區「四一一」戰鬥兵團成立，部分工人則成立了支持「四一一」聯絡站。

2 中共中央批轉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擴大會議紀要（1967年8月20日），載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黑龍江的「紅色造反者」奪權後，造反派內部由於在由誰掌權等問題上發生分歧，並為爭奪各方面的權利而迅速分化和改組。1967年春，黑龍江大學等院校「造反團」中一些人反對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長趙去非結合進省革命委員會，提出「炮轟趙去非」的口號，並成立了「炮轟聯絡站」（即「炮轟派」）。與此同時，哈爾濱工業大學和省委機關的另一些造反派則組織成立了與「炮轟派」相對立的「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即「捍衛派」）。兩派從維護各自權利出發，發生許多糾紛、衝突，以至釀成殘酷武鬥。³一部分造反派與省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潘復生、汪家道之間也出現了分歧，全省上下圍繞着支持還是反對革委會形成了「捍衛派」和「炮轟派」，也有人將「捍衛派」稱為「山上派」，將「炮轟派」稱為「山下派」。

1967年初，毛澤東估計幾個月內全國的奪權問題即可基本解決。從4月開始，中央對各省市自治區頻頻發出指示、決定，旨在加快各地臨時權力機構的建立。但事實上卻是欲速則不達。周恩來9月17日在北京接見造反派代表時預計：「估計到今年年底，我們全國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可能解決二十個以上，或者接近二十四五個。」周恩來講話時全國已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共七個省市（即山西、上海、山東、黑龍江、貴州、北京、青海），結果到1967年底，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省市自治區共九個（增加了內蒙、天津）。7、8、9三個月的天下大亂，打亂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原來的部署，大大推遲了全國新權力機構建立的時間。

一 「七二〇」事件與「揪軍內一小撮」

1 毛澤東為甚麼要到武漢去游長江？

1967年7月6日、7日、9日，毛澤東連續召集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毛澤東提出他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漢游泳橫渡長江。武漢

3 趙培興主編：《中共黑龍江簡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244。

當時正是兩派鬥爭激烈、武鬥頻繁的時候。出於對毛澤東安全的考慮，周恩來等人極力勸阻毛澤東不要去冒這個險，但毛執意前往，大家只得服從毛的決定。周恩來提出讓謝富治到武漢來，負責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毛澤東同意了。

毛澤東為甚麼要到武漢去游長江？

一年前，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贏得萬眾歡呼。他從武漢回到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支持紅衛兵，支持大串連，把劉少奇、鄧小平等一舉搞了下去，把整個中國搞了個天翻地覆。那時，他是何等意氣風發，何等激昂慷慨？但自從開展奪權運動以來，局勢的發展就不那麼盡如人意了。他原以為有三四個月的時間即可基本解決體制重建的問題，結果是過了半年還看不出甚麼眉目來，各地的「大聯合」、「三結合」問題重重，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曠日持久，進展緩慢。毛澤東說是要去游泳，實際上是想親自去解決湖北省的問題，樹立一個就地解決問題的樣板。在這之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要建立革命委員會，都要由當地兩大派派出代表團，加上軍區的代表、領導幹部的代表，一起到北京來，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參與，經過多次談判協商而解決。這一談判協商的過程複雜多變，常常形成久拖不決的局面。

湖北省武漢地區的局勢在全國是有代表性的。〈軍委十條命令〉發布以後，曾遭到武漢軍區嚴厲打擊的造反派重整旗鼓，再次向軍區發起進攻。造反派聲稱要粉碎武漢地區的「二月黑風」和「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譚」（意為武漢的譚震林，這裏指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⁴）。迫於形勢，武漢軍區釋放了「工總」的一部分被捕人員，但其主要頭頭朱鴻霞未予釋放。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軍內外造反派時說：「成都、武漢，那是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衝一衝。」⁵武漢和北京南下的部分軍內外造反派立即提出「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號。造反派不斷挑起事端，謾罵、圍攻、毆打執行支左任務的武漢

4 陳再道當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中共湖北省常委、武漢軍區司令員。

5 中央首長接見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4月1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軍區指戰員，甚至綁架出面做工作的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向武漢軍區施加壓力。在此情況下，武漢地區的保守派群眾組織於5月16日成立了「百萬雄師」聯絡站。「百萬雄師」在一系列問題上與「工總」等造反派相對立。「百萬雄師」認為，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是正確的，不能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過去十七年中，省、市委的成績是主要的，大多數地方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反對把領導幹部一律打倒。

武漢軍區於6月4日發布〈公告〉，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確的，重申不得為「工總」翻案。同時，檢討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工總」等造反派認為軍區是「假檢討，真反撲」，因而鬧得更凶。「百萬雄師」則認為軍區太軟弱。兩派衝突升級，6月17日在漢口六渡橋、6月24日在漢陽軋鋼廠和武漢水運工程學院發生大型武鬥。據不完全統計，武漢市從6月4日至30日，在武鬥中，死108人，傷2774人。⁶

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就武漢武鬥事件致電武漢軍區，電報說：「最近，武漢市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是極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一些人對若干學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凶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匯報。」⁷這份經康生授意擬定的電報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28日，武漢軍區發出制止武鬥的通知，未能奏效。武漢的局勢愈來愈嚴重。

7月10日，周恩來電話告武漢軍區：武漢群眾組織不要來北京了，就在武漢解決問題。⁸

7月14日，毛澤東、周恩來到達武漢。在此之前，中央已確定了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政策，即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

6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99。

7 中央文革辦事組、全軍文革辦公室給武漢軍區電報（1967年6月2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68—169。

公開檢討；要為「工總」平反；「三鋼三新」⁹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進行「大聯合」；「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據陳再道回憶說，周恩來曾對他說，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為了打倒你們。為了打消陳再道等人的顧慮，周恩來曾告訴鍾漢華：主席臨動身時講了，要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¹⁰但實際上，毛澤東、周恩來這時候已經對陳再道等人失去信任，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毛澤東在武漢時的安全保衛工作沒有交給武漢軍區，而是交給武漢空軍負責。¹¹

2 王力捅了馬蜂窩

7月14日，謝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奉命從重慶趕到武漢。當天，謝、王等人上街看大字報時被武漢群眾認出，很快便有造反派敲鑼打鼓貼出大標語表示歡迎。事前中央並沒有讓謝、王等公開出面活動，謝、王等請示周恩來，周正在為毛的安全擔心，他臨時決定說：「這也有好處，群眾正在懷疑為甚麼東湖賓館的電燈亮了？這樣正好說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漢，要就地解決問題，以便掩護主席。」¹²

毛澤東坐鎮武漢，每日召集周恩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楊成武、鄭維山、汪東興、李作鵬、陳再道、鍾漢華等人開會，討論武漢問題。毛澤東指示：要給「工總」平反，放掉朱鴻霞；「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不能打倒陳再道。15日至18日，周

9 即武漢的造反派群眾組織：「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新華工」（華中工學院「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色造反司令部」的簡稱）、「新華農」（華中農學院「新華農東方紅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簡稱）、「新湖大」（湖北大學「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的簡稱）。

10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513。

1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1005。

12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1005。

恩來主持召開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傳達中央精神，要求武漢軍區主動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對部隊進行教育，要各群眾組織進行整風，提高認識，認真執行中央的指示。18日晚，毛澤東再次找周恩來、謝富治、王力、陳再道、鍾漢華等談話。毛澤東指示，武漢軍區要承認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但不要開大會檢討，寫個東西，到處去發；要保護陳再道、鍾漢華；要做好部隊以及「百萬雄師」的工作；要設立一個接待站，專門接待群眾組織來訪，做好思想工作。毛澤東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這次談話後，周恩來飛返北京。直到這時，一切還在按照既定方針有序地進行着，武漢局勢似乎還在掌控之中。

就在當天夜裏，王力捅了馬蜂窩，武漢三鎮頓時失去控制。

謝富治、王力、余立金、劉豐、蕭前¹³等人到機場送走周恩來後，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鋼二司」總部所在地）講了一番話，其中以王力的講話影響最大，引起了軒然大波。王力在講話中表示了對武漢造反派的堅決支持，聲稱「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定不移地支持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受壓抑、受打擊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¹⁴王力、謝富治的講話傾向性非常明顯，對造反派是個極大的鼓舞。他的講話公布後，又引起了保守派及支持保守派的武漢軍區指戰員的憤恨。

陳再道在回憶中說，王力「把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透露給武漢造反派」，「加劇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引起了武漢軍民的極大反感」。席宣、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簡史》中說，王力在支持造反派的講話中說「『工總』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19日，『工總』派群眾組織用高音喇叭和廣播車，到處播放王力的講話錄音，引起『百萬雄師』等群眾組織的極大憤怒，終於引發了『七·二〇』事件」。金沖及主

13 劉豐時任武漢空軍副司令員，蕭前時任武漢空軍政治委員。

14 王力在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講話（1967年7月19日夜晨），根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當時所做的錄音整理。

編的《周恩來年譜》中說：「7月20日，中央代表團謝富治、王力到武漢處理問題，壓制被武漢軍區支持的群眾組織『百萬雄師』，並把它定為『保守組織』，招致該組織的不滿。」這些說法都不準確。¹⁵

經查閱當時的王力講話記錄可知，實際上，王力雖然在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造反派，但並未具體透露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四點方針（即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給「工總」平反；「三鋼三新」是左派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周恩來於7月18日下午在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上做總結講話時傳達了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四點方針，會議要求不向下傳達。但武漢軍區的一些領導人擅自批准獨立師（8201部隊）向下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因為獨立師與「百萬雄師」關係十分密切，當日，通過派駐各區、「百萬雄師」聯絡分站和大單位的支左軍人或軍代表，有關精神迅速傳到「百萬雄師」各級組織。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於當年12月1日的檢查中承認：「周總理的指示，再三交代不要向下傳達，我批准蔡炳臣（按：獨立師政委）傳達了，這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亂爆發我點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謝副總理等同志指示後，我不按最高指示辦，反而叫大家快傳達，分秒必爭。這是我點的第二把火。」¹⁶鍾漢華的這個檢查是在「七二〇事件」後的政治高壓下做的，關於「反革命暴亂」的定性是中央作出的，檢查的措辭用語未必準確，但事實應該是清楚的。

19日晚，「百萬雄師」群眾和部分駐漢部隊指戰員乘坐上百輛大卡車和拉着警笛的消防車湧進武漢軍區大院，要求謝、王接見，並要與之辯論。在獲悉謝、王已回東湖賓館後即掉頭驅車前往東湖賓館。20日凌晨，數百名「百萬雄師」代表湧進東湖賓館，強行將王力抓出來塞進汽車，拉到軍區大院，要求他回答問題，並試圖逼迫他簽字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在此過程中，王力遭到毆打並造成小腿骨折。

15 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08—525；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頁16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71。

16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頁203。

當天上午，武漢軍民一起湧上街頭，數千輛大卡車載着工人、農民和駐漢部隊指戰員，排成四路縱隊，浩浩蕩蕩地進行遊行示威。武漢三鎮猶如一座爆發了的火山。此後連續幾天，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街道堵塞，到處都是震耳欲聾的口號聲：「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王力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罪該萬死！」「打倒王力！」「中央派人來，王力滾下台！」「周總理到武漢，王力靠邊站！」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七二〇」事件。

「七二〇」事件後，毛澤東在同楊成武等談話時說：「在武漢，我同你們談話時，當時王力的態度就很凶。」他批評王力「沒有先做好部隊的工作，然後再去做好兩派的工作。沒有好好進行調查研究，下車伊始就哇裏哇啦地叫，這種人沒有不犯錯誤的」。「前一次王力他們解決百萬雄師就是不聽我的，不先同部隊講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眾中去表態，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個馬蜂窩，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們搞得太凶了。」¹⁷

平心而論，將武漢「七二〇」事件的爆發歸罪於王力，顯然有失公正。王力在講話中確實是支一派、壓一派，加劇了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情緒。但這並不是王力個人的態度，解決武漢問題的大政方針早已由中央決定，沒有7月18日夜裏王力的講話，也會爆發大規模的群眾性抵制運動，當年4月，內蒙古自治區的保守派及支持保守派的軍區指戰員們的行動就是明證。

20日下午，林彪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商討應變措施。會後，周恩來率兩個中隊全副武裝的中央警衛團戰士趕赴武漢處理善後。21日凌晨，毛澤東經勸說後悄然乘專機離開武漢去上海。據王力說，毛澤東「對被迫離開武漢很惱火，這是他老人家成為黨的領袖以後從未發生過的事情」。¹⁸

「七二〇」事件的爆發，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武漢地區各種矛盾交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98。

18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1010。

織、衝突的結果，武漢軍民對王力、謝富治的憤怒聲討，實際上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中央文革小組、對文化大革命的強烈不滿和抗議。「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規模最大的一次群眾性公開的抗議活動。

3 「揪軍內一小撮」

所謂「揪軍內一小撮」，是「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略說法。現有許多論著將這一口號的提出歸咎於1967年1月關鋒等人所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是很不準確的。王力關於此事的回憶說：

人們又說，一九六七年一月王力夥同關鋒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提出徹底揭穿黨內軍內一小撮。這個宣傳要點還拍成照片，鉛印的名字有王力、關鋒、唐平鑄、胡痴，簽名的只有胡痴一個人。這件事王力不知道。為甚麼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這時王力剛被任命為中央宣傳組組長，唐平鑄、胡痴是成員，關鋒是總政副主任、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林彪委託關鋒管《解放軍報》。王力知道，過去不管誰領導中央宣傳部工作從來不管《解放軍報》。這個宣傳要點王力連看都沒有看過。關鋒提到過這件事的過程，說這個要點是根據軍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寫的，但沒有說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認為這個問題即使是胡痴簽了名，也不應追究責任。而且這問題還應該進一步研究。因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這一段話，是毛主席加的。這不是說得更厲害嗎？怎麼能責怪後來的這個宣傳要點呢？怎麼能把責任推到四個人身上呢？¹⁹

19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291—292。

王力的這個說法值得注意：即這個宣傳要點「是根據軍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寫的」。當時軍委常委包括幾位老師在內，軍委常委會議一般由軍委秘書長葉劍英主持，而林彪一般是不出席這樣的會議的。如果葉劍英主持的軍委常委擴大會議確實作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決定，那顯然就不應說成是「關鋒、王力等四人」、「江青等人」或「林彪、江青等人」的責任。

其實，「揪軍內一小撮」，本來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文化大革命是幹甚麼？就是要揪黨內、軍內、政府內和各種文化界的「一小撮」。這在〈五一六通知〉中就由毛澤東親自明確宣布了。所謂「軍內一小撮」，就是「黨內一小撮」的組成部分。只要「揪黨內一小撮」是合理的，那就沒有理由說「揪軍內一小撮」有甚麼問題。

何蜀在〈「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²⁰一文中具體論證了毛澤東本人確實有「揪軍內一小撮」的意圖，而且作了切實的部署。

最早公開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是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軍報》社論，社論的標題是「一定要把我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這篇社論號召：

要把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徹底，還必須繼續放手發動群眾，還要經過激烈的鬥爭，衝破重重阻力。……這種阻力，主要是來自混進軍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在我們軍隊裏，確實有那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他們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兩面三刀，欺上瞞下，玩弄資產階級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就在這篇社論發表的前一天，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與江青之女蕭力(李訥)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軍報》報社宣布造反、奪權，報社負

20 《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1期(總第八十四期)，頁145—160。

責人胡痴隨即被「打倒」。這篇公開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是造反奪權之前就寫好的，還是奪權之後才趕寫的，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對這篇煽動在軍隊內部奪權造反的《解放軍報》社論，毛澤東不可能一無所知。

從下列文件還可以進一步看出，「揪軍內一小撮」完全不是瞞着毛澤東的陰謀活動，而是貫徹毛澤東意圖的安排，並從一開始就處於毛澤東的掌握中。

1967年1月26日，毛澤東對全軍文革小組1月25日編印的《軍隊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要報》第五號刊登的〈關於奪權的若干情況和問題〉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眾提出，究竟哪些機關可以奪權，哪些不能奪權；奪了權的人們對待不同意見的群眾應取甚麼態度（應爭取多數，不能排斥）。請加以研究。」²¹隨後，中央軍委於2月16日作出了〈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中央軍委這個文件的第一條列舉了軍隊奪權範圍限於哪些單位後說：「在這些單位中，哪些要奪權，哪些不需要奪權，要看黨委領導存在問題的性質。如果領導權確是掌握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的，要堅決奪回。」²²

中央軍委的文件必須經軍委主席毛澤東閱後才能簽發，這個文件鼓動「堅決奪回」軍隊單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力，可以被視為在毛澤東指示下宣布「揪軍內一小撮」的明文規定。

1月30日，毛澤東將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關於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的報告批給林彪、周恩來：

此件值得一閱。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01。

22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93。

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你們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²³

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軍隊內部與其他各界一樣無例外地「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這說明毛澤東確實認為存在着「軍內一小撮」，應該把他們揪出來「徹底批倒」。

2月7日，毛澤東對西藏軍區黨委關於請示中央盡快對西藏軍區領導人張國華等表明看法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葉、聶、徐各同志：請你們研究一下，張國華、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壞人，一二日內擬電告我，發出表態，是為至盼！」²⁴

毛澤東批示中點名的王其梅時任西藏軍區副政委。在這個批示中毛澤東要林彪、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判斷西藏軍區領導人張國華等人「究竟是好人、壞人」，結論倘為後者，那自然就屬於「軍內一小撮」了。後來王其梅就是被當做「軍內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2月9日，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把「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的文稿送林彪審閱。報告稱：「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會上的指示，起草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今天上午召集三十二人參加的會議，進行討論和修改。特呈上請審查批示。」林彪10日將此文件轉報毛澤東。毛的批示是：「照辦。如昨夜會議上有修改，照修改稿辦。」軍委於2月11日將此文件下發。²⁵

該文件的第二條規定：「由軍委決定已經展開四大的單位，除因必要暫停進行的以外，要繼續充分發動群眾，堅決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團結大多數，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²⁶

可見，「揪軍內一小撮」實乃「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

2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09。

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18。

2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26。

2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27—228。

文化大革命中，「揪軍內一小撮」在全國範圍內形成高潮有兩次：第一次是〈軍委十條命令〉發布後，第二次是在「七二〇」事件後。當時各地普遍出現了衝擊軍區、揪鬥軍區領導人的事件。

7月22日下午，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會議，將「七二〇」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會議決定電召陳再道等人赴京。周恩來起草了電報稿：「中央考慮到『百萬雄師』派代表來京事，一時不易談成，而武漢局面又急需安定，擬先約陳再道、鍾漢華、傅傳作、劉豐、吳世安、周志剛、趙蘭田、溫錫、張緒、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等十二位同志於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來京。中央已令空軍派飛機往接，何時動身，望告。」24日，陳再道一行到達北京，從26日起，開始了遭受一連串的批鬥。²⁷

7月23日，中央文革向各地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軍聯合行動，聲討武漢「七二〇」事件。在以後的幾天裏，全國各地駐軍和各大城市的造反派都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表示對武漢造反派的支持和聲討陳再道。7月25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等回到北京。林彪親自出席。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向繭力說：「要戰鬥，要突擊！要砸爛總政閻王殿！」此後，總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部長們和大批幹部受到迫害。總政治部被砸爛後，被實行軍管。林彪還向蒯大富、韓愛晶等人說：「從前我們要作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指陳再道等）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作文章。估計最近一個月將是全國矛盾激化的一個時期。」蒯大富馬上找到王力，探詢「大作文章」的底細。在得到王力暗示「大作文章」的矛頭是指向徐向前以後，蒯大富立即策劃和組織實施「打倒徐向前」的宣傳煽動活動。²⁸

27 陳、鍾、牛、蔡、巴等人於7月26日在京西賓館常委碰頭會上遭到批鬥，後又於8月4日、7日交給三軍造反派進行大會批鬥；9月4日在空軍大院、9月6日在海軍大院，由空軍、裝甲兵、工程兵和海軍、總政、二炮，分別主持召開了鬥爭大會。其中8月7日的批鬥大會從晚上7時半開始，直開到早晨7時半結束，長達十二個小時。

28 7月22日上午，毛澤東在同楊成武談話時曾提出懷疑：七二〇事件會不會在決策時有哪個老師參加？參見董保存：《政治漩渦中楊成武》，見「亦凡公益圖書館」(www.shuku.net)。

7月25日，康生等人在新華社電訊稿中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據王力說，當天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幾點指示：「第一，同意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二，『百萬雄師一小撮壞頭頭』前面要加幾個字，成為『百萬雄師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小撮壞頭頭』。三，同意出席大會的名單（即不要葉劍英、徐向前），另外再加上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李作鵬。後來發表時沒有加余立金，因為余立金是被歡迎的成員。」²⁹

7月26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紀念「八一」建軍節的通知〉中說：「徹底批判反黨分子彭德懷、羅瑞卿的反動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揭露他們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相勾結，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支持和策劃下進行篡黨、篡軍的罪惡活動，把目前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大批判運動推向一個更深入的階段。」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中說：「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7月26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到會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和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在京負責人。謝富治、吳法憲指責陳再道等人是「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禍首，並攻擊徐向前包庇陳再道，要求追究徐向前的責任。陳再道、鍾漢華等武漢軍區的人被迫分成三排面向會場，斜向主席台站着，接受詢問。會議中間，吳法憲、劉豐等人將陳再道、鍾漢華等的領章、帽徽揪掉，並施以拳腳。³⁰中央常委碰頭會尚且開成這樣，怎麼可能要求群眾組織會遵守「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約束呢？

29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1011。

30 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73。

7月26日，經毛澤東批准，武漢軍區發表公告稱：「七二〇」事件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王任重和陳再道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³¹

7月27日，中央軍委撤銷陳再道、鍾漢華武漢軍區司令員和政委職務，任命劉豐為武漢軍區第一政委，30日又任命曾思玉（原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為武漢軍區司令員。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政委巴方廷也被撤銷職務。獨立師被整訓改編。當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表〈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信中說：

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他們解散「工總」這個革命組織，並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們逮捕很多革命組織的群眾，也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這些都是絕對不容許的，應當堅決平反，一律釋放。

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他們利用「百萬雄師」的一些受蒙蔽的群眾，用造謠欺騙的手段，顛倒黑白，把他們引入迷路。

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反對中央，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竟然採用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

這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造成的嚴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漢市的廣大革命群眾和駐軍廣大指戰員的無比憤怒，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嚴正譴責，遭到了全國陸海空三軍的強大反對。他們已經陷入億萬軍民憤怒聲討的汪洋大海之中。

對於策劃這一嚴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壞人和打人凶手，必須立即追查，依法嚴辦。³²

3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04。

32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05—506。

「七二〇」事件後，「百萬雄師」迅速解體，其成員遭到殘酷的迫害。據不完全統計，湖北全省在「七二〇」事件後，被打傷、打殘、打死的幹部、軍人、群眾，達184000餘人，僅武漢市就打傷打殘66000多人，打死600多人。³³

在「揪軍內一小撮」活動中，北京大專院校的造反派表現得非常積極。7月25日晚到26日，蒯大富召集清華「井岡山兵團總部」會議和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兩總部聯席會議，傳達林彪講話和王力的示意，提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號。蒯大富聲稱要把「打倒徐向前」作為「大作文章」的「第一篇文章」。³⁴ 7月29日，清華「井岡山」發表關於「打倒徐向前」的聲明。當晚，清華「井岡山」的總部成員鮑長康帶人去綁架徐向前，因徐不在綁架未逞，隨即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辦公室。他們翻牆進入院內，竄入臥室和辦公室，把整個樓內翻騰得亂七八糟，還搶走裝有絕密、機密文件的檔案箱五個和其他材料，包括徐向前的工作日記五本和「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團以上幹部花名冊」等材料。³⁵ 他們還在徐向前住處的牆壁上、走道的地板上、枱曆上、茶几上，到處寫上「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和標語。

7月30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有全國大部分省、市和一些軍事單位造反派頭頭一百多人參加的「全國形勢討論會」。蒯大富在會上傳達了林彪、王力的指示，說：「現在要解決軍內問題，全國都要注意這個新動向。」8月3日，清華「井岡山」的小報發表社論〈打倒帶槍的劉鄧〉。社論說：「竊踞軍委副主席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串通其在各地代理人陳再道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空前瘋狂地對革命派進行血腥的鎮壓，使全國不少地區文化革命出現了反覆。」社論最後號召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打倒帶槍的劉鄧！」

33 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24。

34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下冊（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頁154、160。

35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155。

從8月2日開始，北京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徐向前指揮部」，並組織人馬在國防部所在地三座門開闢了所謂「揪徐戰場」，聲言一定要揪出徐向前，將徐向前鬥倒鬥臭。此後全國範圍內的「揪軍內一小撮」愈演愈烈，僅清華「井冈山」就向二十三個省、市、地區派出近二百人，攜帶有調查徐向前等內容的調查提綱，把「打倒徐向前」的活動推向全國。³⁶煽動並參與當地造反派衝、砸軍事機關，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七二〇」事件前後，全國各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了大量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文章。

7月27日，《解放軍報》社論〈乘勝前進——祝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取更大的新勝利〉中號召：「堅決打擊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7月2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向武漢的廣大革命群眾致敬！〉中稱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擊了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猖狂進攻」。同日，《解放軍報》社論〈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無敵——再祝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取更大的新勝利〉中說：武漢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決心掀起一個向中國的赫魯曉夫，向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同日《解放軍報》的另一篇社論〈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中說：「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

7月29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沿着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乘勝前進〉中說：武漢部隊領導機關「決心跟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劃清界限，堅決把他們打倒」。同日的《解放軍報》社論〈堅決同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戰鬥在一起〉說：「破壞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及其在那裏的代理人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7月30日，《人民日報》社論〈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大團結萬歲！〉中說：「中國的赫魯曉夫和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

36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154—155。

權派是遠沒有凍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報》的另一篇社論〈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中說：「被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控制操縱的『百萬雄師』，正在土崩瓦解。」

7月31日，《解放軍報》社論〈新的考驗〉向「犯了路線錯誤的幹部」發出號召：「從實際行動上和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劃清界限，徹底揭露和批判他們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上述一系列社論之後，7月30日新華社播發了將於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的社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7月31日全國各大報均在頭版刊登。《紅旗》第十二期有兩篇社論，一篇題為〈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文章稱「武漢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武漢地區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說：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些傢伙，還在垂死掙扎。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毛澤東在1967年8月對「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提出質疑，認為「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據說他還對《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社論批了「還我長城」幾個字。此後，「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便在公開的宣傳媒體上消失。毛澤東批評「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並不是不要揪「軍內一小撮」，而是不要公開提揪「軍內一小撮」，是一種策略。但這存在一

個明顯的悖論：公開提「揪軍內一小撮」不策略，那麼公開宣傳「揪黨內一小撮」就策略嗎？毛澤東批評「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反映出毛澤東確實是把軍隊作為他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保證力量。但是同時也有許多材料顯示，毛澤東對軍隊中很多人支持保守派是很惱火的，這在本章的後面將會提到。

二 「揪劉火線」

從1967年7月初開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圍，開展了為時一個多月、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的批判、揪鬥劉少奇的活動，是當時發生的一個參加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重大事件。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一線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當時被稱為「揪劉火線」。「揪劉火線」也被稱為圍困中南海事件，實際上是在中央關於「大批判」的號召下，由造反派上演的一齣鬧劇。

1 劉少奇與建工學院

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曾在北京建築工業學院蹲點。³⁷ 劉少奇被打倒以後，建工學院的造反派曾多次要求批鬥劉少奇。

1967年1月初，建工學院「井岡山紅衛兵總部」、「前鋒」、「八一戰鬥團」等造反派組織先後向劉少奇發出「勒令」，要他前往該院作檢查，並揚言如劉不能按時前往，他們就要「採取行動」。劉於1月5日寫信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1月6日將劉的信批告周恩來：「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7日凌晨3時許，周恩來

37 劉少奇曾於1966年8月2日到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參加學生大會並作了講話；8月3日，劉少奇再次到建工學院，分別同兩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座談；8月4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同駐建工學院工作組負責人進行了談話。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647—648。

接見建工學院幾個造反派組織的代表，明確指出：劉少奇不能揪出來，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鬥。同時強調這是毛主席的指示，並告誡他們說：你們可以送大字報，要揪不行，要照顧黨和國家的影響。³⁸

4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清華大學召開了號稱三十萬人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大會。此前，清華大學造反派曾多次要求王光美回清華檢查，都沒有得到批准。批鬥王光美大會的召開，明顯地給造反派發了一個信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劉少奇的政策已經有了改變。

4月下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等組織成立「揪劉聯絡站」。6月3日，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到中南海遊行示威，要求黨中央將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交給他們批鬥。他們後來又在「揪谷」的旗幟上加上了「揪劉」的字樣，既「揪谷」又「揪劉」。此後，「新八一戰鬥團」與「井岡山」、「前鋒」、「革命造反聯絡站」等組織聯合成立「揪劉火線指揮部」，並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扎寨，表示要「堅決揪出劉少奇」。所謂安營扎寨，不過就是在馬路邊上豎起旗幟，搭起帳篷，架上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些宣傳板報，造反派學生輪班在那裏值守，成天到晚用高音喇叭呼喊口號，進行「打倒劉少奇」的鼓動宣傳。他們是要用這種不同尋常的形式引起人們的關注，顯示自己揪鬥劉少奇的決心。後來他們又在中南海北門外也設置了「揪劉火線」。

他們這種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屢見不鮮。1966年8月，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為了揪鬥工作組長趙如璋，曾在國防科委門前靜坐示威，折騰了整整二十八晝夜，最後如願以償，並借此一舉成名，成為響噹噹的造反派。

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的宣傳活動在中南海西門外持續了十餘天，到6月14日，除少數人堅持留下外，大隊人馬已返回學校。此後，他們還不斷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鬥劉少奇的要求。6月29日，周恩來就建工學院學生輪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鬥劉少奇事批示：由汪東興勸學生們回去，我們保證要他交出書面檢討。如勸後仍不走，請戚本禹出

38 參見《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653；《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09。

面處理。³⁹ 7月4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劉火線」對造反派表示支持，並說：「你們可以繼續寫勒令，讓劉少奇給你們寫檢查。」當天，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通知劉少奇說，黨中央的意見要劉少奇向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寫一個檢查。

7月8日，劉少奇寫出一份「向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及革命師生員工的檢查」，再次對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等問題承擔了責任。他在這份檢查中寫道：「1966年7月底，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號召所有負責同志都親自參加北京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識。我就是毛主席的這個號召下，在去年8月1日到李雪峰同志處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後確定到建工學院的，「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沒有要創造甚麼經驗、向全國推廣的意思。」「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了，我才知道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我對自己所犯的這次錯誤，直到去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在建工學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種錯誤，主要應由我來負責。……我要向受過以我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壓制和迫害的革命師生賠禮道歉。希望同志們在對我進行大揭發、大批判的過程中，形成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核心的大聯合和『三結合』，把建工學院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⁴⁰

這樣一個委曲求全，意在維護黨和國家大局、主動承擔責任的檢查，不但沒有絲毫緩和來自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方面的壓力，反而被指責為「假認罪、真反撲的鐵證和宣言書」，並被用來作為發動新的一輪「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工具。

3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65。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064；〈劉少奇給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書面檢查〉（1967年7月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戚本禹原來打算將劉少奇的檢查交給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這個消息引起了「新八一」的對立面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的嚴重抗議。「八一戰鬥團」成立於1966年8月1日，「新八一戰鬥團」是於1967年4月20日從「八一戰鬥團」中分裂出來的。「八一戰鬥團」認為劉少奇應該給他們寫檢查才對，因為劉少奇在建工學院蹲點的時候，還沒有「新八一戰鬥團」這個組織呢。7月9日，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聞訊後馬上發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並派人到中南海西門外架起帳篷，安裝高音喇叭，聲稱「不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鬥倒鬥臭誓不罷休」。

經中央文革小組建議，7月13日，建工學院新老「八一戰鬥團」達成四項協議，決定聯合取回劉少奇的檢查，共同對劉少奇進行大批判。

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還組織了巡迴報告隊，到北京各單位去煽動「揪劉」，並派人到上海、天津、西安、長春等地，大辦「揪劉」小報，在全國各地大造輿論。

2 「揪劉火線」的迅速擴大

建工學院新老「八一」的行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和鼓勵，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學校及北京市各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造反派的紛紛仿效。7月11日，在北航召開的北京高校「復課鬧革命」誓師大會上，韓愛晶等人就建工「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門、北門「揪劉」之事詢問陳伯達的態度，陳伯達說：「群眾運動的大方向總是正確的，揪劉少奇是當前的方向，完全正確的嘛！」「沒有錯，可以搞。」⁴¹

7月13日晚和14日晨，毛澤東、周恩來先後離京去武漢視察。他們剛走，戚本禹便煽動中南海機關的造反派在7月14日強迫劉少奇出來看大字報，讓中南海的造反派乘機進行圍鬥。當天晚上，造反派把圍鬥劉少奇的情況專題報告戚本禹，還遞交了一封給汪東興並周恩來的

41 北京市革委會文教組批清協作辦公室：〈關於圍困中南海的一些罪證和線索〉（1971年7月10日）。

信，提出要開大會「批鬥劉少奇」。戚本禹避開周恩來，將這封信批給康生、陳伯達、江青，請他們決定。陳伯達批示將「批鬥劉少奇」擴大為「批鬥劉、鄧、陶夫婦」，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鬥並抄家」。

7月14日，在北京大中學紅代會的組織下，大專院校十五萬人、中學十萬人和大批工人、機關幹部，舉行規模巨大的示威遊行，聲討劉少奇的所謂「新反撲」、「新罪行」。此後，各種群眾組織的示威遊行持續不斷。

7月15日，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又向劉少奇寫了一封「勒令信」，信的全文如下：

勒令

劉少奇：

你交上來的是他媽的甚麼「檢查」！又臭又長的五千餘字，無處不在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無處不在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妄圖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輝煌成果，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極，混蛋透頂！

你不甘心自己的滅亡，借檢查之名，行反撲之實，妄圖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擋車，自不量力，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劉少奇，你別白日作夢了！

你的所謂「檢查」，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宣言書，是鼓動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線反撲的動員令，我們要迎頭痛擊，徹底粉碎，不把你這條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審，我們決不收兵！……劉少奇，我們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紅小兵是不好惹的，你這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有甚麼資格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

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像你們這樣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如若亂說亂動，立即取締！

我們勒令：你必須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於本月25日零時交出你的第二份檢查！不得有誤！！

紅代會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一戰鬥團

1967年7月15日

對於「新八一」這種粗暴無理的要求，劉少奇實在忍無可忍。7月16日，他致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拒絕再作新的檢查。信中說：「鑑於我上次交出的檢查影響不好，說我是進行『反撲』，『挑動群眾鬥群眾』，現在再向建工學院進行第二次檢查，也還會和上次檢查差不多，也不會有好的影響，所以我不準備向建工學院再作第二次檢查了。」⁴²

7月16日、18日、19日，戚本禹先後三次在有專院校紅衛兵組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上煽動說：「甚麼劉少奇，甚麼彭德懷，甚麼鄧小平，甚麼賀龍，甚麼彭真這些人，彭、羅、陸、楊都是賣國求榮的，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不把他們批倒」，「你們領袖之類的」，「都要抓起來，殺頭！」⁴³

7月17日，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向劉少奇發出「最緊急最嚴正聲明」，再次「勒令」劉少奇「於7月22日零時以前收拾鋪蓋，帶著臭老婆滾出中南海，否則我們將採取最緊急、最堅決、最強硬的革命行動！」為了表示他們揪鬥劉少奇的「堅強決心」，7月18日零時開始，「八一戰鬥團」在中南海西門外宣布進行「揪劉絕食鬥爭」。他們在「絕食誓詞」中說：「劉賊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最近他又乘檢查之機，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向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猖狂的反撲。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頭可斷，血可流，絕食到底，不把劉賊揪出中南海，讓全世界人民鬥倒鬥臭，我們誓不罷休。」幾天後，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勸說下，他們才放棄了絕食。

7月17日晚，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具體策劃後，由戚本禹於18日凌晨一點多鐘召集中南海機關造反派開會，布置成立「批鬥劉、鄧、陶戰鬥指揮部」，並決定：當晚先批鬥劉少奇、王光美，在開批鬥會的同時抄家，會後對劉少奇、王光美分別隔離「監護」。戚本禹在會上煽動說：「對劉、鄧、陶面對面鬥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的任務」，「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

42 《劉少奇傳》，下冊，頁1064—1065。

43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8—9。

以低頭彎腰」。⁴⁴ 7月18日晚，中南海院內召開了三百多人參加的批鬥劉少奇大會，並進行人身侮辱，低頭彎腰，罰站兩個多小時，同時進行抄家。毛澤東在武漢聞訊後對此事進行了批評。

7月18日晚，地質「東方紅」、清華「井岡山」、經濟學院「東方紅」、建工「八一」等一百多個組織共一萬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劉」誓師大會。這個誓師大會的影響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業都知道了「揪劉火線」，也使得「揪劉火線」迅速擴大。

3 推波助瀾

在「揪劉火線」鬧得沸沸揚揚之時，由中央文革小組控制的宣傳輿論工具也在不斷地為所謂「大批判」大肆鼓噪，把「大批判」抬高到無以復加的高度。

7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通欄標題〈奮起千鈞棒，痛打落水狗——首都興起空前規模的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高潮〉，其中有一段專門寫到正在中南海西門外「揪劉」的「新八一」：

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新八一」戰鬥團的戰士，義憤填膺，怒火萬丈，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猛烈開火。去年8月初，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曾到這個學校進行所謂「蹲點」，明目張膽地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大唱反調，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革命師生們早就對他恨之入骨。他們說，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是一批反動透頂的豺狼，和一切反動派一樣，「你不打，他就不倒」，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我們切切不可書生氣十足，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落水狗」，不能有半點惻隱之心，而必須刀出鞘，彈上膛，窮追猛打，把他們批得臭臭的，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44 《歷史的審判》，下冊，頁9。

7月19日，《北京日報》發表題為〈偉大的歷史任務〉的社論，聲嘶力竭地為「大批判」吶喊：

在我們英雄祖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億萬革命人民按照天才統帥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正在進行一場震撼世界的偉大戰鬥——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展開革命的大批判。這場空前規模的大批判，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偉大歷史任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大決戰，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關鍵。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撤他們的職，罷他們的官，奪他們的權，是經過一番艱苦鬥爭的；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他們批倒、批垮、批臭，叫他們遺臭萬年，永無翻身之日，則是更加艱巨更加嚴重的鬥爭。毛主席早就指出，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等待時機，反攻過去」，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近拋出來的名為「認罪」，實為反撲的「檢查」，不是再一次從反面教育了我們許多同志嗎？

7月19日開始，中南海周圍的「揪劉火線」人數猛增，無數人群擁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學校、工廠、機關團體，難以計數的群眾組織爭相在中南海牆外安營扎寨，進行聲援，匯成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⁴⁵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參加了這一活動。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中南海牆外，搭有七千多個棚子，安有五百多個高音喇叭，豎有三千多面各種名目的旗子。府右街從南到北，山頭林立，席棚相連，車水馬龍，人聲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兩側，也排滿了造反派的「揪劉」陣地。

45 據王年一〈關於「圍困中南海」的一些資料〉說：「至7月中旬，到中南海西門安營扎寨的已有二十萬人。」《黨史研究資料》，2001年第9期，頁38。

在那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眾組織在北京市內的主要街道進行遊行示威，尤其是在東西長安街、府右街等處更是人山人海，遊行活動經常造成交通擁堵。7月21日，戚本禹對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負責人說：「今天你們為甚麼沒有派人去拍片（指群眾冒雨去中南海「揪劉」遊行）？」新影廠的群眾代表回答：「我們正在請示軍代表。」戚本禹說：「革命選用請示？哪裏有槍聲，就到哪裏去！」⁴⁶

在當時的「揪劉」活動中，有兩個相互對立的全市性組織，一個是由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新北大公社」等組織聯合工交系統一些群眾組織，於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無產階級革命派揪鬥劉少奇聯絡站」（簡稱「聯絡站」）。到8月初，共有七百多個單位參加。另一個是由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組織串連工交、財貿系統一些群眾組織，於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揪鬥批判劉少奇聯絡總站」（簡稱「聯絡總站」），共有一千五百多個單位參加。「聯絡站」和「聯絡總站」在「揪劉火線」各自設有「火線指揮部」。兩大派組織都把「揪劉」活動當作相互競爭的一個重要內容，看誰人多勢眾，看誰聲勢浩大。兩大派都想藉此顯示自己這一派更革命，對「無產階級司令部」跟得更緊。7月24日，「聯絡總站」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揪鬥劉賊聲援武漢革命造反派誓師大會」，三十多萬人參加了集會和遊行。8月1日晚，「聯絡站」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共有一千多個單位約三十萬人參加了大會。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分為「天派」和「地派」的說法逐漸開始流行。所謂「天派」，是因為這一派的主要組織之一是北航「紅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關的，所以稱為「天派」；所謂「地派」，是因為這一派的主要組織之一是地質「東方紅」，就取它的「地」字，稱為「地派」。天地相對，用「天派」、「地派」來稱呼北京對立的兩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於是很快就流行開了。

46 戚本禹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談話（1967年7月2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同時期的關於戚本禹這次談話的傳單上記載，戚本禹還說：「這麼大的群眾運動，這麼大的雨，群眾自發地走上大街遊行，我從進城以後還沒有看見過。這麼大的群眾運動，要揪劉少奇保衛毛主席你們卻不去拍，過了就拍不上了。」

7月25日，天安門廣場召開歡迎謝富治、王力大會，戚本禹在天安門上對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等說：「你們紅代會幾個組長揪劉少奇有沒有決心？要堅持，要有膽量才行呀！聶元梓同志，你是組長，應該好好抓一下，別人不好管。一定要統一領導起來，這是當前的大方向，你們一定要負起責任來。紅代會開個會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紅代會核心組根據戚本禹的指示，開會研究了如何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問題，決定要大造輿論，發「勒令書」，限劉少奇在8月5日以前滾出中南海。他們還具體策劃了一個衝進中南海抓劉少奇的計劃。⁴⁷

7月26日凌晨三點多，戚本禹到「揪劉火線」進行慰問，他對建工學院、政法學院的造反派說：

我認為你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革命行動。以後還要你們想更好的辦法。……背水一戰，這是表示揪劉的決心嘛！你們可以發通令，寫勒令信，組織批判會。……他在「認罪書」裏說不知道自己錯了，8月5日後才知道，這完全是假的，這是要批判的要害，其實當時他已挨批評了。但7月29日講話，他說：「運動你們不知怎麼搞，我也不知道。」這句話很惡毒的。你們要批，要把他7月29日的講話和在你們學院的講話結合起來批。去建院是恐慌，想撈稻草。……你們可以喊叫他出來，發通牒，一下子出來後面就沒有高潮了，引而不發是最厲害的戰略戰術。……你們別着急，水到渠成。⁴⁸

中央文革小組還專門指示，由幾所解放軍醫院派出醫療隊，到「揪劉火線」巡迴醫療。

47 據韓愛晶1971年寫的一份交代材料透露，這個計劃內容包括：定於8月4日晚間，兵分兩路衝進中南海，一路直奔劉少奇住處，把他揪出來；另一路找中央領導人說要人。由建工「八一」和體院的隊伍開路，其他學校的隊伍隨後蜂擁而入，紅代會作強大後盾。另外，在地質「東方紅」和師大「井岡山」的幾個造反派頭頭的筆記本中也發現有「今晚零點要採取強硬的革命行動」等字句。

48 戚本禹在「揪劉火線」的講話（1967年7月2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揪劉火線」愈搞愈大，人數愈來愈多，不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圍滿了造反派，而且還有向南面的長安街擴展的趨勢，到7月底、8月初，已有不少單位開始在中南海南面的長安街邊上安營扎寨，整個長安街上的交通都受到了影響。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組派戚本禹接見各路造反派，先稱讚造反派「揪劉是革命行動」，然後傳達兩點指示：一、南門不能設點；二、不能衝中南海。並授意造反派們寫一個撤離南門的決議，內容是：(1) 與劉少奇鬥爭到底；(2) 撤離南門；(3) 保證不衝中南海。造反派當場表示堅決照辦。

4 「揪劉火線」的撤銷

在造反派圍困中南海期間，周恩來曾多次對造反派的過火行動提出過委婉的批評，並堅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始終不敢進入，從而保護了在中南海中的許多領導人。毛澤東也沒有被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的努力所打動，在「揪劉」問題上，他始終堅持了「背靠背」的原則。最後在他的干預下，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撤除「揪劉火線」的決定。「無產階級司令部」號召對劉少奇開展「革命大批判」，造反派應聲而起，反響熱烈。但「無產階級司令部」要的是全民動員，從政治上思想上搞臭劉少奇，又不希望局面失去控制。造反派不知底細，大鬧特鬧，最終也未能達到將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目的。這一場鬧劇的上演，用孟老夫子的話來說，就叫「引而不發，躍如也」。這可能正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所需要的。

1980年7月19日，戚本禹在受審訊時交代說：

中南海被困，中央沒讓交出劉少奇，我馬上向總理匯報了，總理也很緊張，怕學生揪鬥，出問題，馬上召開了中央日常工作會議討論，參加會的有陳伯達、江青、康生、王力、謝富治等，在會上你一言我一語的，最後總理作了幾條決定：(一) 8月5日在北京召開萬人大會紀念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批判劉少奇。(二) 中南海裏面由中南海機關群眾代表各單位群眾批判劉少奇，

並拍電影給學生們看，讓他們離開中南海，不要包圍了。決定讓謝富治去向學生宣布這個決定。以上大家都同意了。謝富治說：「我去不行。」他讓我跟他去，我同意了。總理下指示中南海內部的批鬥會由我負責，北京市的大會由謝富治負責。最後我就同謝富治在中南海門前一輛大卡車上向學生們宣布了中央的決定。⁴⁹

8月4日晚，「天派」的「聯絡站」在天安門廣場召開號稱有二千五百多個群眾組織共七十三萬人參加的「紀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一周年大會」。大會進行當中，出現了「地派」的一些組織前去衝擊會場進而雙方發生武鬥的現象。為了調解北京高校在「揪劉」問題上的矛盾，謝富治、關鋒、戚本禹等於8月5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兩大派的代表開會，並商定8月5日下午在天安門廣場，兩派聯合召開聲討劉少奇大會。謝富治傳達中央指示：今天大會後，各單位的隊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圍了。會議中間，關鋒、戚本禹對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說：「現在衝中南海不是時候，條件不成熟，搞不好會鬧禍，各單位撤回吧。」⁵⁰

8月5日下午，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參加的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發表一周年大會。同時，由中南海造反派對劉少奇再次進行批鬥。圍困中南海達一個多月的「揪劉」活動達到了高潮。

8月5日以後，圍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隊伍陸續撤回，但「揪劉」活動並未馬上停止，許多造反派組織的「揪劉」活動又持續了一段時間。8月9日，陳伯達在中南海西門外看見還有不少造反派組織沒有撤離，他在一個所謂「工建革聯揪劉指揮部」的門前停下，問他們：「你們準備甚麼時候撤？」回答是：「不知道。不把劉賊揪出中南海，我們就是不撤！」後在陳伯達的要求下，才勉強同意撤。在中央文革小組和北

49 轉引自王年一：〈關於「圍困中南海」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1年第9期，頁42。

50 北京市革委會文教組批清協作辦公室：〈關於圍困中南海的一些罪證線索〉（1971年7月10日）。

京市革委會的一再要求下，大約在8月10日左右，所謂「揪劉火線」終於撤除，喧鬧了一個多月的府右街、文津街等處開始安靜下來了。

8月8日，在北京工業學院禮堂，召開了「隆重紀念8.5，8.8，8.12⁵¹一周年大會」，會上宣布：「全國各地在京無產階級革命派揪劉少奇聯絡總站」成立。武漢「三鋼」、河南「二七公社」、湖南「湘江風雷」、呼和浩特「三司」、川大「八·二六」，以及大慶、瀘州、石家莊、黑龍江、唐山、張家口、新疆、無錫、邢台、安徽等地的造反派分別在大會上發了言，大會還制定了聯絡總站宣言。⁵²

「揪劉火線」撤銷之後不久，在中南海周圍又上演了「揪陶」一幕。8月21日，衛生部和首都衛生系統群眾組織在中南海西門外召開「揪鬥反革命兩面派陶鑄大會」，成立「首都衛生系統無產階級革命派揪陶火線指揮部」。大會向陶鑄發出「通令」稱：「我們勒令：反革命兩面派陶鑄必須於8月23日以前滾出中南海，接受首都醫藥衛生系統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審判。」實際上，從7月20日首都衛生系統中國醫科大學「紅旗」等組織向陶鑄發出「第一號勒令」以來，類似的「勒令」已有六次之多。衛生部「紅色造反團」、醫大「紅旗」、健康報「延安公社」等組織宣布：從8月22日零時起，在中南海西門外展開揪陶靜坐鬥爭，再次勒令陶鑄必須於8月23日滾出中南海，接受衛生系統造反派的審判，交出認罪書。衛生系統的造反派自8月中旬起，在「揪陶火線」上連續召開了十三次控訴會、批判會，舉行了五次示威遊行。這次「揪陶」折騰了一個星期，8月29日凌晨，陳伯達、謝富治明確指示：所有群眾組織都撤回本單位去。⁵³

8月29日，中南海西門外還有農口「鬥鄧（子恢）、鬥廖（魯言）批譚（震林）聯絡站」的一批人為揪鬥譚震林之事還在那裏堅持不撤，他們要

51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會議公報。

52 北京工業學院《東方紅》報，1967年8月12日。

53 陳伯達謝富治對「揪陶火線」戰士的指示（1967年8月2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求周恩來接見他們，還要求將譚震林交給他們批鬥。為此，陳伯達、謝富治親自前去解決。陳伯達說：「你們不要上壞人的當，馬上撤回去，不要向中央施加壓力。」謝富治也說：「中南海是黨中央所在地，你們在這裏弄得四面城門緊閉，影響很不好，趕快撤回去！」這些可以算作是「圍困中南海事件」的餘波了。

三 「三砸一燒」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國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一樣，受到了很大的衝擊，走了很大的彎路。中國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中國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在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時間裏，在中國方面只有1966年6月周恩來的一次出訪，而來訪的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加在一起只有五位。⁵⁴ 中國還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更嚴重的是，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多個國家中的近三十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其中不少是由於中方外交方面處理不當而引起的。駐若干國家的大使館受到衝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1967年夏天，對外交工作的衝擊達到頂點，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對外交大權的控制。毛澤東在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說：「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⁵⁵ 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54 這五位分別是：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毛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和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

55 〈毛澤東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63。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左」的東西大行其道。在對外宣傳方面，不顧內外有別的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對外活動的主要任務，屢屢發生唯我獨革、強加於人的錯誤。在對外交往中，多次發生不顧國際交往的常規，行動粗暴過火的錯誤。特別是1967年夏天，北京連續發生所謂「三砸一燒」⁵⁶的嚴重涉外事件，造成中國與各國關係緊張的局面，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極大的損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是其中最為嚴重、影響最大的一次事件。

文革時期中國外交工作遭到大衝擊、大破壞，發生了多起惡性涉外事件，這些到底應該由誰來負責？有人說應該由王、關、戚來負責，也有人說應該由林彪、江青來負責，還有人提出康生、陳伯達也難辭其咎。《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說：「『文化大革命』初期，黨在對外關係方面的工作也受到『左』傾思想的嚴重干擾。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夥插手外事部門，興風作浪，甚至圖謀篡奪中央的外交大權。……對於這些極左錯誤，周恩來和廣大外事幹部一直表示反對，並努力設法制止。毛澤東也多次提出批評，要求糾正。經過他們採取一系列措施，外事工作一度出現的偏差較快得到糾正。」⁵⁷這樣的敘述將會引導讀者認為：文革初期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外交路線是正確的，只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插手，才遭到破壞，在經毛澤東、周恩來的批評糾正後，錯誤較快地得到了糾正。筆者認為，這樣的敘述與歷史本來面目相去甚遠。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事工作上有一條極左路線的話，這條極左路線也是和整個文化大革命相聯繫的，是文化大革命「左」的方針、路線在外事工作上的反映而已。

文化大革命開始前，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國內形勢，也錯誤地估

56 指北京的造反派於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

57 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527—528。

計了國際形勢。在批判了王稼祥的「三和一少」⁵⁸以後，中國在對外關係方面即逐漸向更「左」的方向滑去。所以在文革初期，並不存在一條超然的正確路線。

1967年夏，中國對外關係全面緊張。中國除與美國、蘇聯繼續保持相互敵視的態度外，與印度尼西亞、緬甸、印度、尼泊爾、蒙古、英國、捷克、肯尼亞等國家都出現了外交糾紛。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仍然孤芳自賞，盲目樂觀，認為「形勢很好」⁵⁹。本來是危機重重，應當努力修補對外關係，而毛澤東卻偏要擺出一副「和尚打傘，無法搭(無)天」的姿態。毛澤東雖然批評過在對外宣傳上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種提法，但從他所說「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⁶⁰來看，他並不認為這句話本身有甚麼問題。實際上，毛澤東本人就明確地認為，中國應該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1967年7月7日，毛澤東接見了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全體人員並講了話。這篇講話集中地反映了他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毛澤東說：

-
- 58 1962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爭取對外關係相對緩和的一系列建議，被毛澤東視作「修正主義路線」，王稼祥的主張被曲解後概括為「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更將對王稼祥的主張概括為「三降一滅」(即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出〈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指出：康生、「四人幫」等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線的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應予平反，強加於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該推倒。
- 59 毛澤東1967年7月7日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人員時的講話。毛澤東的講話引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群眾組織編印的《學習資料》，題目為〈中國要成為世界的兵工廠〉，時間為1967年7月7日。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也見諸其他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等材料中，有的版本中毛澤東講話的題目為〈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經查，1967年7月7日，毛澤東、林彪於當天下午接見了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新華社七日訊)，因此，判定毛澤東的講話為接見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代表時的講話。
- 6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76。

目前許多地方反華，形式上好像是我們孤立，實際上它反華是害怕中國的影響，怕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反華是為了鎮壓國內的人民，轉移人民對它統治的不滿。這個反華是美帝、蘇修共同策劃的，這不表示我們孤立，是我們在全世界影響大大提高。它越反華越促進人民的革命。這些國家的人民認識到中國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們中國不僅是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就是刻了字的武器（除一些特殊地區）也可以。就是要公開支持，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⁶¹

毛澤東同意批判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他還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武裝鬥爭。正是出於此種目的，他不惜以毀壞與鄰國之間正常的國家關係為代價。他在講話中說：「緬甸政府反對我們更好，希望他們同我們斷交，我們就可以更公開地支持緬甸共產黨。」⁶²

1967年發生的「三砸一燒」等多起惡性涉外事件，可以從這裏找到最根本的原因。

1 多事之秋

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關係破裂發生在1965年9月。當時印尼發生了一場流產的政變，親華的以艾地為首的印尼共產黨參與其事。印尼輿論對中國的不滿激增，軍人趁勢發動政變，對中國友好的蘇加諾總統下

61 轉引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群眾組織編印的《學習資料》。毛的這篇講話也見諸其他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等材料中。

62 196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趙毅敏就中國共產黨參加中緬兩黨會談的代表團成員組成問題給周恩來並報毛澤東的報告上，提出了中共代表團組成人員建議名單，其中包括江青。5月26日，毛澤東批示：江青以不參加為好。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355。由此可知，在毛澤東此次談話前不久，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緬甸共產黨代表團在中國進行了會談，中共中央確定了要支持緬甸共產黨搞武裝鬥爭的方針。

台，印尼共產黨遭到嚴厲鎮壓，隨後爆發了一場迫害印尼華僑的大規模反華排華浪潮，中印(尼)關係迅速惡化。1966年9月2日，印尼外交部通知中國大使館：從亞齊地區被無理驅逐到棉蘭集中的受害華僑共4500人，要求中國政府派船把他們接運回國。中國政府一方面嚴正要求印尼政府立即停止集體驅逐華僑的種族主義暴行，一方面派船前往棉蘭接運受害華僑。1967年4月23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人緊急召見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巴倫，最緊急、最強烈抗議印尼軍警包圍、封鎖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武裝劫持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的嚴重事件。4月2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最強烈抗議印尼政府粗暴踐踏國際關係準則，悍然宣布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和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為「不受歡迎的人」，喪心病狂地迫害華僑的反華暴行。4月26日下午2時，北京各界群眾集會，聲討印尼政府的反華行徑。從4月24日起至4月28日止，北京各大中學校師生、工人、機關幹部等各界群眾連續前往印尼駐華大使館進行抗議，示威遊行，累計人數超過六十萬人。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並未能使印尼政府的反華排華政策有所收斂。印尼境內頻繁發生反華排華事件，印尼武裝軍警和暴徒多次襲擊華僑造成流血事件。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眾在抗議和示威遊行後砸了印尼駐華大使館。此舉致使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於8月6日和10月5日兩次遭到襲擊和搗毀，並使兩國外交關係中斷。

印度政府是率先承認新中國並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非社會主義國家，曾與中國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9年中印邊界發生第一次軍事衝突之後，兩國關係惡化。1962年10月，因印度不斷蠶食中國領土而引發了中印邊境武裝衝突。1967年6月12日，新華社報道：「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最近竄至北京西郊某地，對我軍事禁區進行窺測和偷攝禁區照片，被我人民解放軍當場拿獲。同日，外交部照會印度駐華使館，提出最強烈抗議，並宣布：自即刻起，中國政府不再承認魯冠南的外交官身份，而且在中國司法機關對其罪行進行法律制裁前，魯冠南不得離開中國。」6月13日下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萬人公審大會，對魯冠南進行缺席公審，判決魯冠南犯間諜罪，判處驅逐出境，立即執行，並宣布印度大使館三等秘書維杰為不

受歡迎的人，限其三天內離開中國國境。6月14日，魯冠南被押送離京。印度政府很快作出強烈反應，下令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一等秘書陳魯直立即離印，並宣布中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承浩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印。6月16日，印度大批暴徒衝入中國大使館，打傷使館工作人員多名，暴徒還放火燒了大使館汽車房裏的車輛和使館外面的一個展覽櫥窗，打碎了使館建築物的許多玻璃窗。而後大批印度軍警嚴密包圍了中國大使館，剝奪使館人員外出行動的自由，使館同北京的聯絡中斷。6月17日，中國外交部第一亞洲司負責人召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沙梯，向印度政府提出嚴重警告和最強烈抗議，並宣布：「自即時起，印駐華大使館全體印籍人員，未經中國有關當局的許可，一律不許離開大使館，否則，一切後果由印度方面自己承擔。」6月18日，大批示威遊行的北京造反派和群眾湧入印度駐華大使館，發泄了他們的憤怒。

緬甸曾是中國的友好鄰邦。1967年6月，中緬之間因為毛澤東像章事件關係惡化。事件的起因是中國駐緬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澤東語錄和毛澤東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和干涉。過去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在緬甸也散發過表示效忠英國女王的徽章，這種記憶使得緬甸方面對像章事件特別敏感和忌諱。為此，緬甸政府制定了一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在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影響下，中國一些駐緬人員把國內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做法也搬到緬甸來了。6月23日，中國駐緬臨時代辦就「6月22日，仰光原中國女子中學的學校當局強行剝去華僑學生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並公然侮辱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一事向緬甸外交部提出抗議。緬甸政府於當天宣布封閉原中國女子中學和原華僑女子中學。此後又無限期關閉了九所華僑中學和小學。當地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衝突，數十名華僑和學生在衝突中喪生。

6月26日，韓念龍副外長召見緬甸駐華大使，強烈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國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6月30日，北京各界群眾四十萬人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7月1日，中國外交部向緬甸駐華大使館轉交中國政府備忘錄，嚴正拒絕緬甸政府在6月29日備忘錄中提出的要求中國政府阻止中國人民抗議緬甸反華暴行的示威

遊行的無理要求，並再次要求緬甸政府立即撤除緬甸軍隊對中國大使館和華僑居住區的包圍。到7月3日為止，到緬甸駐華大使館示威遊行、抗議的群眾累計超過一百萬人。

3日下午，北京造反派在故宮午門召開了十萬人的抗緬大會，聲討緬甸政府。會後大批群眾湧向緬甸駐華使館，砸了大使館的一些設施。據後來揭發的材料說，聲討緬甸政府的大會是戚本禹策劃的。戚本禹找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等開會說：「中央文革認為有必要開大會抗議緬甸政府。政府發表的聲明，有局限性。總理做事穩重、謹慎，未免有點保守。會後要搞兩路遊行，一路到緬甸大使館，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領導看看群眾的革命精神。」根據這些跡象，於是有不少人就認為1967年夏天對外關係上的極左路線是王、關、戚一夥，或者說是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搞的。實際上，這種認識是很膚淺的。

據各方面的材料分析，中央文革戚本禹等人唆使造反派對緬甸駐華大使館採取極端的強烈行動，其根源來自毛澤東。

據王力回憶，7月1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戚本禹等人的談話中說：緬甸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毛澤東說：現在在我們國家裏，群眾今天提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沒有甚麼了不起。他舉例說，群眾喊打倒朱德、打倒陳雲、打倒陳毅的口號，沒有甚麼了不起。他還說，群眾喊打倒奈溫的口號，也沒有甚麼了不起。⁶³

8月7日晚，在王力與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談話時，「聯絡站」的代表就提出：「中央許多精神下不到我們這裏，如主席7月1日對緬甸問題的指示，我們不知道。」

大約在8月10日左右，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關鋒、戚本禹的講話。關、戚在講話中對外交部多方指責。例如，關於抗議緬甸政府的社論，《人民日報》和外交部各寫了一個，說外交部寫的那一篇「旗幟不鮮明，戰鬥力不強」，最後用了《人民日報》寫的那一篇。還有，《人民日報》在新聞報道中提到了「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外交部向《人民

⁶³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1017。

日報》提出了質問。另一件事，蒙古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發請柬時名單中有蕭望東、周揚、蔣南翔等人。外交部將周揚的請柬扣下，其他的照發。《人民日報》認為此舉為明顯的挑釁行為，第二天《人民日報》對此事未予報道，外交部又去電話提出質問。關鋒說，外交部十多年來受到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領導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針鋒相對、敢於鬥爭的指導思想，而是怕，怕甚麼呢？就是怕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關於緬甸問題，如果是在7月1日以前，那沒有甚麼話可說，7月1日後，主席對緬甸問題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講的，緬甸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戚本禹同志講，外交部領導思想上就是顧慮重重，怕這怕那，甚至於挨罵的時候，自己還在那裏說兩國友好關係。戚本禹同志說：看來今後外交戰線上希望寄託在這些年輕的小將身上。姚登山講了一個口號單子的故事。緬甸事件剛起，群眾上街遊行，他看到第一亞洲司的同志起草了一個口號單子，其中有「打倒奈溫反動政府」，送到部黨委，去掉了「反動」二字，韓念龍解釋說，這句子太長了，所以去掉。戚本禹聽到這個話很生氣，說：這個句子不是長不長的問題，而是敢不敢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問題。⁶⁴

毛澤東1967年7月7日在接見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代表時的講話中也提到了緬甸問題。毛澤東說：

現在形勢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對國大黨搞武裝鬥爭。印尼共產黨清算了修正主義，已起來。緬甸游擊隊也有很大發展，比泰國武裝鬥爭還有基礎，已搞了幾十年，過去黨不團結（有紅旗黨、白旗黨）現在統一起來了，反對奈溫是一致的，武裝活動的地區已佔緬甸土地的百分之六十，緬甸比越南的地理條件還好，迴旋區大。泰國的地理條件也很好。緬甸起來，泰國起來，這樣就把美國完全拖在東南亞，當然我們還必須着眼在我們國土上早打、大打。

64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第三動態組所編的《動態》第120期（1967年8月12日）上刊登了姚登山的傳達講話。

緬甸政府反對我們更好，希望它同我們斷交，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公開地支持緬甸共產黨。⁶⁵

當年10月，中緬經濟技術合作協議被廢除，在緬工作的214名專家全部返回北京。

7月初，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有少數人不滿中國的革命宣傳，到中國圖片展覽館搗亂，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向尼外交部提出口頭抗議後，尼方申明它珍視兩國友誼，不允許損害兩國關係的事情在尼土地上發生，為圖片展覽館事件向中國表示道歉。中國大使館認為可不再提書面抗議了，但康生卻主張「應當不怕反華，不怕斷交，堅決鬥爭」，結果於7月21日就「尼泊爾國內的反動勢力侮辱中國人民和蓄意破壞中尼友好的嚴重反華行為」向尼泊爾政府提出了最強烈抗議。⁶⁶不難看出，康生的主張不過是毛澤東在緬甸問題上表態的翻版。

5月，香港新蒲崗一家人造花工廠發生勞資糾紛，港英當局派軍警鎮壓，毆打和逮捕了該廠的許多工人以及不少前往慰問被鎮壓工人的香港各界人士。在現場採訪的中國新華社記者也被打傷。為此，中國外交部召見英代辦提出最強烈抗議。16日至18日，前往英國駐華代辦處駐地示威遊行的北京群眾達一百萬人之眾，並召開了十萬人參加的聲討大會。上海紅衛兵還進入英國駐滬僑務工作人員的住處，砸了玻璃和傢具，甚至打了人。22日，中國外交部再次召見英國代辦，宣布中國政府決定取消英國駐華代辦處向上海派駐僑務工作人員的安排，並限令他們在四十八小時內離滬。此後，香港當地的鬥爭步步升級。

7月8日，發生「沙頭角事件」。當天在沙頭角舉行聲討港英政府罪行的大會，沙頭角英界的許多居民也聞訊趕來參加。當大會結束港方居民返回英界時，遭到港英警察的阻攔，發生衝突，中方民兵也予以還擊。雙方互相開槍射擊，結果中方居民一人死亡、八人受傷，港英

65 毛澤東1967年7月7日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人員時的講話。

66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210。

警察五人死亡、十二人受傷，兩輛港方的裝甲車被毀。當天，中方沙頭角、鹽田和橫崗的部分群眾，為護送暫留中方的港方居民回去，聯合舉行示威遊行。群眾到港方沙頭角警署抗議，要求保障港方居民的安全。英警拒不接受，並將警署大門關閉。群眾即用煤油焚燒警署大門，英警開槍打死點火的中方沙頭角民兵張天生，打傷港方學生陳立強。中方部分群眾對警署發動進攻，港英當局出動大批軍警圍捕。守衛在中英街各處的中方邊防部隊奉命分別向警署和前來圍捕中方群眾的港英軍警射擊，掩護群眾安全返回。港英軍警死傷五十多人。⁶⁷事件發生後，英軍廓爾喀步兵十一旅開進沙頭角英界，從警察手中接管了邊界的防務。至8月7日，英軍全面接防，使雙方邊界局勢陡然緊張。中方也有上萬民兵在深圳河邊擺出與英軍對峙的陣勢。

2 「王八七講話」

7月15日起，外事系統造反派開始在外交部門前安營扎寨，開展「揪陳」（即揪鬥外交部長陳毅）活動。8月初，北京外語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第一機床廠等單位聯合組織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反帝修聯絡站，專門造「國際帝、修、反」的反。

8月1日上午，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紅衛兵團七十多人衝進外交部大院，要揪鬥陳毅。一些學生肆無忌憚地把矛頭指向周恩來。據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人員反映，有的學生對警衛戰士說：「周總理是陳毅的後台，不倒總理就打不倒陳毅。總理說話不算數，伯達同志叫陳毅到群眾中去，就是總理不放。」8月2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衝進外交部的外賓接待室，打罵前來勸阻的工作人員，並寫了「外交部是賣國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標語，貼在外賓接待室。外交部原準備當天在外賓接待室召見蒙古駐華大使，向他們提出抗議，由於造反派的搗亂，召見不能進行，蒙古大使反向我方提出抗議。外交部副部

67 深圳市史志辦公室：《中國共產黨深圳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302—303。

長喬冠華、姬鵬飛被外語學院紅旗造反兵團扣留，關在地下室裏。徐以新副部長被北外「六一六」扣留。8月3日，北外「六一六」五十多人將外交部門口堵死，工作人員不得出入，文件、電報都發不出去，外交部的業務工作中斷，外交部黨委癱瘓。

造反派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接見並支持他們的行動，他們揚言：「只有中央文革說話我們才聽，中央文革不說話就表示支持我們的行動。」

8月4日，首都新聞界舉行「支持香港人民抗暴鬥爭」大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到會。開會期間，戚本禹與當時被稱為「紅色外交戰士」的原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政務參贊、臨時代辦姚登山談了話。戚本禹對外交部的運動談了看法，他表態說：陳毅應該下到群眾中去接受批判，在外交部門口的「揪陳」活動是革命行動。姚登山第二天在外交部傳達了戚本禹的講話精神，引起了外交部另一個群眾組織「革命造反總部」的強烈反對。當天，該組織給周恩來等人寫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

我部姚登山同志8月4日在一次活動中，和戚本禹同志作為個人接觸，曾談到批判陳毅問題。姚不顧8月4日總理關於批陳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志的談話，作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傳達，在傳達過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北外六一六和紅旗造反團，在聽了姚傳達後，也紛紛貼出號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段，為自己衝外交部的錯誤行動作掩護。我們認為，姚這樣做的結果，必然造成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在批陳問題上矛盾的印象。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的會上傳達後，聯絡站某些戰鬥隊的代表，上台表態，只提戚本禹同志8月4日的講話，不提總理8月4日的指示。現遞上姚的傳達全文及有關傳單、號外供參考。

敬禮

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

1967、8、5

8月7日下午，在外交部小禮堂召開了對陳毅的第一次小型批判會。

當晚，中央文革小組多數人都去出席文藝晚會，只留在「七二〇」事件中腿部受傷打了石膏不能走動的王力在釣魚台。9時正，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王宗琪等人如約來到釣魚台十六樓。中央文革小組想從姚登山他們那裏了解「革命造反總部」的情況，並對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表示支持。「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告訴王力，「革命造反總部」在外交部沒有甚麼影響，是個保守組織。他們向王力闡明聯絡站的觀點：「根據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認為陳毅是外事口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根據陳毅的三反言行，我們認為是敵我矛盾，應該把陳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於將來對陳毅的處理，那是中央決定的事，我們最後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我們聯絡站也有同志提出『要與陳毅血戰到底』的口號。」⁶⁸

王力在「聯絡站」的代表匯報後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8月5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按：指全外交部）同志傳達了關鋒、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談話。現在我們知道有人反對，現在竟有人告狀告到我們這裏，告到總理、伯達、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攻擊姚登山，實際上攻擊戚本禹，這不正常。這不是革命勢力，這是保守勢力。我反對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做法，鮮明地反對！姚登山同志傳達後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狀，說甚麼居然喊出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對他們來說這成了罪過。為甚麼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們來談談。……戚本禹對「總部」來信和傳達記錄都看了，他說姚登山傳達的沒有甚麼出入，是他講的話，他負責任。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甚麼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做檢查，就可以揪。1月份他檢查了，後來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後他不到群眾中

68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動態組根據記錄整理的〈王力同志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的重要講話〉（1967年8月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以下所引王力講話皆出於此。

來，揪他有甚麼不對？不是革命行動，是反革命行動？堵了外交部大門，這當然是方法問題，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問題誇大，上網，說得那麼嚴重。「六一六」對總理的態度是不對的，要改。原則性問題不對，中央文革小組都指出了，6月3日我們小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⁶⁹。都講了話。支持革命派，同時教育革命派，我們向來是這樣的。「紅旗造反派」、「六一六」揪陳到外交部門口安營扎寨，大方向有甚麼錯？！一點也不錯。

王力在談話中對「聯絡站」代表鼓勵有加。當「聯絡站」代表抱怨說「在整風時有人批評我們奪權奪過頭，說業務權是中央的」時，王力說：

這話不對。外交業務權指路線方針政策這個權集中於中央，集中於主席。革命和業務不能分開。……你們要充分運用監督權，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挑幹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選幹部，你們監督就要把它監督掉。挑幹部出國也好，幹甚麼都好，第一條要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沒有這一條甚麼都不行。不看這一條，只看甚麼級別、甚麼資歷、甚麼長，這個統統打倒。二十幾歲可以當中央部長，毛主席說的，為甚麼不可以？……看來現在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原封未動。造反派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線方針政策中央主席決定，至於怎麼樣貫徹執行，還是三結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為主體，甚麼形式大家創造。因為要辦外交，要幾個「長」，當然這幾個「長」不一定是原來的

69 1967年5月27日，外交部幹部唐開生、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說：「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我們絕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法。」29日，毛澤東將此信批給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59。6月3日，陳伯達、康生、江青、戚本禹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事口造反派，稱周恩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制止造反派對周恩來的攻擊。

「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幹。組成的新班子堅決批判「三降一滅」，貫徹毛主席的外交路線。你們要記住一個最根本的分界線，是擁護還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以此為分界的條條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王力在第二天又親筆給姚登山寫了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們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8月5日的一封信，並附了你講話的一個材料。這封信和材料，關鋒、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認為，革命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志講的幾句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這些話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號，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這些為甚麼一定要加以反對呢？鬥爭的矛頭究竟要指向誰呢？在要陳毅到群眾中檢查的問題上，總理同文革小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圖從中尋找甚麼裂痕是徒勞的。現將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禮

王力 1967.8.8⁷⁰

王力在後來的回憶中說：「八七講話，傷害了陳老總，是不對，我承認。」但他又說：「我的插話，錯話不少。但這些錯話的發明權不是我的，大多是毛主席的原話。」「在『八七講話』中我奉命要講，戚本禹說的『群眾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就讓他們喊，沒有甚麼了不起』這話是對的。因為這本是毛主席7月1日講的原話。」王力還說，毛澤東7月1日的講話「居然沒有向總理傳達」，如果傳達了的話，周也就不會反對「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了。⁷¹

在王力講話後，外交部的造反派果然幹勁倍增。

70 王力給姚登山的一封信（1967年8月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1015—1017。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造反派曾向王力請示，王力表示不贊成砸，但他又說：「除重大原則問題找我外，不要事事請示，大方向對了就幹，自己解放自己。」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通過了由姚登山「抓總」的「業務領導小組」奪權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團」拋出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籌」奪權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聯絡站又議定了由姚登山當主任的「革委會」奪權方案。在此期間，造反派還在外交部和天安門廣場刷出「強烈要求姚登山當外交部長」的大標語。

8月19日，由進駐外交部的外語學院紅旗造反團小分隊封了外交部黨委，宣布「一切黨政大權歸聯絡站」。8月20日，外交部「聯絡站」、「九九兵團」和北外「紅旗造反團」企圖用繼續扣押副部長、中斷外交活動和積壓文電的辦法施加壓力，迫使中央承認他們的奪權。

3 火燒英國代辦處

在外交部被奪權的混亂時期，發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鬥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港英當局必須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十九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員。」⁷²由謝富治主持，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數萬人參加的聲援聲討大會。

「反帝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聞訊後，緊急召見「反帝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雙

72 此照會事先經周恩來批簽，事後周恩來常自負疚，引為教訓。1967年11月12日，周恩來在接見數十位回國參加運動的駐外大使時，為造反派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再次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說，他不應該批發為要求香港啓封報刊而提出的限期四十八小時的通牒，結果導致造反派的過激行為。參見宗道一：〈「王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中華兒女》，2002年第1期，頁35。

方一直爭執到深夜，周恩來在得到保證不進入代辦處的允諾後才離去。

8月22日晚，「反帝修聯絡站」組織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覆最後通牒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記者克萊爾·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報道：「代辦處外，中國軍隊站成一排，彷彿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號的人，以保護裏面的外交人員。示威者在樹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還舉着強烈排外的標語。天色漸晚，一個紅衛兵組織架起了探照燈，另一個組織領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湧進了代辦處——戰士們讓開了道。他們先燒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衝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英國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Donald Hopson)和工作人員一起躲進了保險庫，這是入口處左邊大樓裏用來存放檔案和密碼的一間地下室。但他們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出來。」後來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說：「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他人隨我之後，院子裏大約有五千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婦女們發瘋似的撲過來，想用棍棒將我打倒。他們抓住我的頭髮拖我，揪住我的領帶勒我。」「我的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唐納德後來逃到了英國代辦處後面的印度大使館，躲在大門後。

霍林沃思還寫道：「代辦處的幾位女士想到對面阿爾巴尼亞大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被關在鐵門外。阿爾巴尼亞人還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們受凌辱。然而，有兩位姑娘在芬蘭大使館受到保護。全體代辦處工作人員不僅遭唾挨踢，還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髮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訴我，暴徒中竟然還有英國人。其中一個領頭的還穿着精製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亂踏。」

高音喇叭播出了周恩來的指示，命令人們解散，但也沒有立即奏

效。直到凌晨，狂熱的人群才離去。據說，周恩來聽了匯報後，痛心地下流下了眼淚，後悔自己過於輕信造反派的保證。當晚，他緊急召見造反派代表，氣憤地質問：「難道我們國家的榮譽都不要了嗎？」

美國友好人士韓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於1971年夏天訪問了清華大學，他親自訪問了清華大學的許多幹部、教師、學生，根據大量的訪問記錄，寫成了一部紀實性的著作：《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其中有親身參與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憶。以下段落即譯自該書。

8月23日，在洗劫英國代辦處中扮演主角的是四一四而不是團派，因為這個事件中主要負責的群眾組織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聯絡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華四一四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成員都是一些緊跟王力的左傾幹部，並且得到外語學院幾千名學生造反派的支持。他們堅決反對陳毅，主張讓從雅加達回國的武官(按：應為臨時代辦)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國代辦處發了一份最後通牒，要求港英當局在四十八小時之內釋放被捕的中國新聞工作者，否則就必須對一切後果負責。在通牒規定的限期要達到的那一天，清華四一四接到電話，要他們動員起來，到英國代辦處前去示威。廣播喇叭一喊，全體四一四的擁護者集合開會，一個反帝反修聯絡站的幹部對他們說：「今天我們要去向英國人顯示我們的力量，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我們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英國人非法竊取了許多情報。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覆，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復。帶上改錐、鉗子，我們到那兒要打開他們的檔案櫃。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射擊，不要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所有能說英語的人到前邊來。帶上電筒。」

發言者隨後打開一張地圖，指出代辦處的位置，以及電源開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高衛慶說：「我們都很興奮，我們出動了一個龐大的隊伍進城，後來還覺得不夠，又派出了一些人。我們的隊伍幫助包圍了

英國代辦處。開始是守紀律的，我們整齊地一排排坐下，遵照總理規定的五條，他說，我們可以寫抗議書、集會等，但絕對不許衝擊代辦處。

「我們的抗議大會於晚上9點開始，通過高音喇叭，我們憤怒地譴責英國人在香港的暴行。『你們將何去何從？』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問。10點鐘，通牒限期到了，該怎麼辦呢？我們只知道要向他們顯示力量！那時，解放軍圍繞着代辦處。總理曾經說過我們不能衝擊，我去問該怎麼辦，我得到的答覆是：雖然總理是那麼說了，但是群眾要採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

「實際上，那些妄圖打倒總理的人，早就策劃了這次衝擊，反帝反修聯絡站的活躍分子拿着喇叭跑上來，有些人跳起來向代辦處大樓的牆上扔墨水瓶，這是佯攻。當前面飛舞墨水瓶時，其他的人從後面設法進入了代辦處大樓，他們開始把椅子、沙發從窗戶裏向外扔，我們身後的喇叭鼓動我們行動起來。我們衝向解放軍的防線，喊着：『閃開，讓我們進去！』解放軍的防線由八層士兵組成，有幾個小伙子想從他們頭上爬過去，但他們摔下來了。士兵的防線終於被衝開了一個缺口，我們衝過去爬柵欄，士兵們把一些人拉下來，但其他人卻過去了。

「11點，我們看見起火了，最初是從代辦處的車庫裏的一筒汽油開始燃燒的，後來大門開了，人們衝進來，汽車也開始燃燒，三輛汽車着了火。消防車來了，但人們不讓他們進來，他們只得回去了。火勢愈來愈大，消防車又回來了，許多消防員衝過擁擠的人群，接近了大樓。就在火起之時，周總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們全部停止進攻。但這個指示沒有廣播，我們一直到後來才知道，但我們一知道，馬上就撤離了那個地方。但已經太晚了，我們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解放軍的防線讓開路，讓英國人跑進地下室並把他們自己鎖在那裏，但人們破門而入將他們揪了出來。警察過來干預，他們把英國人帶到街對面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但在穿過街道時，我們的一些人還過去撕他們的衣服。

實際上，我們多數人都認為這種舉動不大好，為甚麼在我們國家要採取這種暴力？接到總理的指示後，我們都撤離了，都感到是做錯了甚麼事。大樓是怎麼燒起來的？我們四一四由始至終參加了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從那以後，許多人反對我們，批判我們，給我們施加了許多壓力，我們檢討了很多次，而團派沒有捲入這一事件，他們便利用我們的這一錯誤拼命整我們。」⁷³

8月23日的《人民日報》報道：「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幾天後，中國駐英國代辦處遭到類似的報復。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極大地損壞了中國的國際聲譽，在對外關係上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迫使中國政府付出重大代價以善其後。

四 奪槍問題

7月18日晚，毛澤東在與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鍾漢華等人談話時說：「為甚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8月4日，毛澤東從上海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提出了武裝左派的問題，二是提出了群眾專政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此前林彪曾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說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奪槍問題，並且起草了一個制止奪槍的指示。⁷⁴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他在信中說「奪槍問題並不嚴

73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32-134.

74 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林彪的信中說：「當前的問題仍然是兩派對立，武鬥升級；特別是搶奪部隊槍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發生，且有蔓延之勢，急需設法制止。」參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頁130。

重」。毛澤東在信中還說到：另一個主要的問題是群眾專政，說「北京過去大體上就是這樣做的」⁷⁵。毛澤東認為當務之急是「武裝左派」和「群眾專政」，稱「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⁷⁶。

國內許多有關文革的著作中都強調指出：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代表團時公開提倡「文攻武衛」的口號，次日，「文攻武衛」的口號在《文匯報》公開發表。從此，全國武鬥急劇升級。江青當時在全國的影響力、號召力確實了得，但真正對全國局勢造成根本性影響的還是毛澤東。毛澤東提出的「武裝左派」和「群眾專政」兩大口號對全國動亂局面的加劇所起到的巨大影響，現在還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甚至還不太為人所知。

1 關於奪槍的一些典型案例

196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向應召來京談判解決問題的浙江、江西、廣西、湖南、河南、遼寧鞍山、鞍鋼等地的群眾組織發出通知，要求他們保證做到：不上街遊行，互不打架，互不衝擊，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礙鐵路、公路、輪船運輸，不動員農民進城、攔路、攔車，不奪槍，不開槍。⁷⁷ 7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禁止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的通知中提出：「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一律不准以任何藉口，挑動農民進城武鬥，更不能為了武鬥，發動農民製造凶器，發給槍支彈藥。」⁷⁸ 文革中，在許多地區「奪槍」和「發槍」這兩個概念實際上是很難分得清楚的。一般情況下，解放軍就是要給擁護自己或自己支持的一派群眾組織發槍，也多數會採用讓群眾組織來「搶」的形式。所以，禁止奪槍和禁止發槍基本上是一個意思，當然也有例外的情

75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1012—1013。

76 周恩來對毛澤東致江青信所作的摘記，手稿，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232。

77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496—497。

78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00。

況。⁷⁹ 奪槍問題在文革中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全國各地都有發生。從中央6月24日和7月13日兩個通知中，我們可以得知，奪槍問題發生得比較早，又比較嚴重的地區是：浙江、江西、廣西、湖南、河南、遼寧、四川、湖北、安徽、寧夏、山西。

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奪槍事件發生在甚麼時候？過去一般認為就是在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中，那次事件中有十九枝步槍、七枝衝鋒槍被搶。

1978年12月27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做出了關於原生產建設兵團幾個問題的決議，其中寫道：「1967年石河子『一·二六』事件，經反覆調查，已查明與張仲翰、陳實、劉一村、王慎等同志和武光都沒有關係，完全是丁盛陰謀篡黨奪權，調動兵團值班部隊血腥鎮壓革命群眾的反革命事件。」⁸⁰ 1979年1月，經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布：「對因此事件無辜死難、受誣陷和曾被捕入獄的同志，應公開徹底平反昭雪。」⁸¹ 丁盛、裴周玉等關於群眾奪槍而引發事件的說法被稱為「誣告」。⁸² 因此，文革中最早的奪槍事件是否發生在「一·二六」事件中，現在還不能下最後的結論。

79 徐友漁在〈我親歷過的武鬥〉一文中寫道：「部隊的武器怎麼會落到群眾組織手裏？它們是『搶』來的，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明搶暗送的雙簧戲。到了這時，軍隊已深深地捲入『文革』之中，他們要在未來掌握當地的權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對另一派。在武鬥中，他們不能公開出面作戰，因此就讓群眾組織把自己的武器『搶走』。每次發生搶槍事件之前，部隊和群眾組織之間都有周密的計劃、安排。部隊會把槍支彈藥的數量、類型、存放地點作詳細交代。他們要裝得煞有介事的樣子，保護自己的武器，有時還要假意和搶劫者打鬥一番，向天鳴槍告警，事後報告警備區，但事情也不過僅此而已。經常出現這種情況，搶槍者在慌亂中走錯了地方，沒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帶走一部分武器，這時部隊會通知群眾組織頭頭，叫他們馬上再去搶第二次，等武器全帶走後，再去報警。」參見《自由的言說——徐友漁文選》（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頁52—53。

80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發展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頁332。

81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編：《中國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1966年5月至1991年12月）》，下冊（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頁11。

82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發展史》，頁282。

現在可以確定的文革中最早的奪槍事件發生在四川成都。據史料記載：1967年1月29日，以「成都造反兵團街道工業分團」為主的四千多人於上午11時，衝進市公安局，砸抄辦公室和保管室，搶走文件檔案資料及公章、空白介紹信、逮捕證、槍支彈藥等，到下午撤出時，還綁架二十一名幹警。次日，成都軍區派出部隊，協助公安部門，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業分團頭頭等十三人。⁸³

四川宜賓發生的奪槍事件也比較早。1967年2月16日，宜賓造反派衝擊駐宜7830部隊，並搶奪輕機槍1挺、衝鋒槍1枝、半自動步槍4枝、子彈190發，打傷解放軍戰士多人。⁸⁴

在全國來說，四川武鬥開始得早，規模也大。除聞名全國的成都一三二廠武鬥事件外，還有樂山武鬥事件。樂山城區兩大派群眾組織，比較激進的造反派組織名為「紅色造反兵團」，相對保守的群眾組織名為「四軍五部」。1967年5月14日，兩派群眾組織在原中共樂山地委招待所發生劇烈衝突，雙方開始時用磚頭瓦塊對打，「四軍五部」被迫撤至城郊。此後，「紅色造反兵團」在城內構築工事，動用木棒、鋼棒乃至槍支守衛，不准城外群眾進城。城外群眾用木棒、鐵棒乃至土炮攻城，並斷絕城內的水、電，相互攻守拼殺達50餘天，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雙方被打死103人，被打傷1500人。⁸⁵7月初，謝富治、王力為首的中央團到成都，支持「八二六」，壓制「紅成」，致使四川地區兩大派的對立情緒更為嚴重。7月下旬以後，造反派在「文攻武衛」的口號下，大肆搶奪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和物資。僅瀘縣武裝部的武器庫就被造反派搶劫達21次，被搶劫步槍2481枝，輕機槍115挺，重機槍12挺，手榴彈115枚，各種炮72門，子彈28.4萬多發。以致從成都、重慶、宜賓、瀘州、涪陵等地開始，全川武鬥不斷升級，造成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⁸⁶

83 中共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成都地方史大事記（1949—1989）》（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頁117；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306。

84 《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頁308。

85 《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頁317。

86 《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頁321。

四川武鬥又屬重慶最為厲害。在重慶有許多大型軍工廠，有生產常規武器步槍、衝鋒槍的，有生產坦克、裝甲車的，有生產各種炮的，這些在武鬥中都派上了用場。1967年8月12日，重慶「反到底」和「八一五」兩大派武鬥人員在嘉陵江機器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加人員五百餘人，前去支援兩派武鬥的人員上萬。武鬥中，動用各種槍炮及坦克、裝甲車，雙方死亡達數十人，經濟損失嚴重。8月13日，望江機器廠造反派武鬥組織包圍駐廠部隊一連一排指揮所，連續開槍射擊，打死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等三人，部隊被迫還擊。8月14日，長安機器廠和三鋼廠兩派武鬥組織在嘉陵江大橋發生大規模武鬥，並猛烈炮擊上清寺，打死十一人，傷多人，燒毀房屋數幢。⁸⁷ 8月18日，重慶「八一五」派攻打九龍坡黃桷坪王家大山「反到底」派佔據的電力學校，雙方在武鬥中共死亡四十五人。8月18日至20日，「八一五」派為固守其佔據的沙坪壩區，向這一地區「反到底」派佔據的石油路河運學校、郵電器材廠和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大坪重慶醫學院等地發起總攻，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等武器，上百人死亡。8月20日，重慶市內處處炮聲轟隆：楊家坪地區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與空氣壓縮機廠「八一五」派對射炮擊，江北區「反到底」派炮擊「八一五」派佔據的紅港（朝天門碼頭）、兒科醫院、枇杷山等地，「反到底」派「黃山警備區司令部」炮擊「八一五」派佔據的彈子石等地。8月22日，「反到底」派「黃山警備區司令部」武鬥隊下山向「八一五」派佔據的南岸區中心地帶上新街南岸區武裝部、區委大樓等制高點發起進攻，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二十二。8月中下旬重慶兩大派在楊家坪地區空氣壓縮機廠等地進行的大規模武鬥，參與人員上千，動用了槍炮、坦克，持續一周左右，許多街道房屋被毀，雙方死亡上百人。8月29日至31日，重慶市北碚地區造反派武鬥人員二千餘人衝進四〇四團營區，搶走槍支3000枝，輕重機槍49挺，炮16門，槍彈16萬發，手榴彈8000枚，打死指戰員二人，抓走

87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頁99。

十八人。⁸⁸ 9月1日，周恩來聽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匯報說到重慶一個工廠因武鬥一夜打了一萬發炮彈時，極為生氣，說：這是國家財產，我是很痛心的。⁸⁹ 9月19日，毛澤東在武漢接見曾思玉、劉豐時，楊成武談到：「聽說重慶打了一萬多發炮彈，開始也不大相信，以後聽梁興初同志講為甚麼打，怎麼打的，都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好，這是個訓練，戰備演習，拿了槍炮，不打不過癮。」

江西也是奪槍問題比較嚴重的省。據周恩來說，大規模搶(發)槍「是從江西開始的，影響到湖南，又影響到廣州」。⁹⁰ 據張春橋1967年9月28日接見江蘇代表團時的講話，江西全省共奪(發)槍七萬多枝，其中大多數是發的，少數是搶的，已收回的槍支有五萬多枝。⁹¹ 1967年3月以後，江西省造反派與支左解放軍產生了矛盾。3月14日，江西省軍區在省體育館舉行十萬人大會，副參謀長周子韜在會上作〈關於南昌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報告〉，針對江西省奪權後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批評。4月14日，劉瑞森(支持造反派的省委書記處書記)等人指責省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在4月20日造反派召開的「徹底批判周子韜『三一四』黑報告大會」上公開煽動、挑撥軍隊與群眾組織的關係。4月23日，江西造反派頭頭萬里浪等人組織造反派人員衝擊省軍區機關，輪番靜坐絕食長達六十餘天。4月24日，江西省和南昌市造反派組織封閉了由軍區軍管的《江西日報》社。從5月1日起，以造反派組織名義出版《新華社電訊》。5月7日、17日，周恩來兩次就《江西日報》問題致電江西省軍區黨委轉江西省學生造反組織，要求立即從《江西

88 《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頁100。

89 《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頁100。梁興初匯報的數字可能有些誇張。據〈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四川班革命大批判發言之四·郭一民：憤怒揭發批判劉結挺、張西挺挑動群眾鬥群眾，大搞武鬥，大反人民解放軍，營造獨立王國的嚴重罪行〉(中央學習班鉛印材料)(郭一民曾任四川省革籌組辦事組組長)中說：「8月份重慶武鬥升級，達到最高峰，一個月內打了一萬多發炮彈。」

90 中央首長第五次接見湖南三方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8月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1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年9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日報》社撤出，讓報社正常工作，但造反派組織拒不執行。5月16日，江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籌」）成立。6月7日，省「大聯籌」頭頭萬里浪、陳全生、蔡方根等人策劃綁架來江西參與領導江西省軍區支左工作的福州軍區第二政委劉培善等人。這一行動受到了周恩來的嚴厲批評。

6月28日，江西農學院的造反派與南昌縣蓮塘鎮對立派群眾組織發生武鬥。29日凌晨，省「大聯籌」頭頭陳全生策劃從江西省軍區所屬部隊搶奪槍支彈藥，組織六批武裝人員赴蓮塘參加武鬥，造成嚴重流血事件（蓮塘的保守派得到宜春軍分區和南昌縣武裝部的支持，在武鬥中佔據優勢，造反派死亡十餘人）。同日，贛州發生大規模武鬥，造成流血事件（贛州軍分區和贛州市武裝部給保守派「聯絡總站」發了槍，在武鬥中「大聯籌」派死傷慘重，事後查點，發現造反派屍體223具）。⁹²

6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給江西省軍區轉省「大聯籌」電報指示：「立即停止奪槍的錯誤行動，退出軍事機關，並將槍支彈藥退還軍區，返回原駐地，聽候中央派人員處理。我們命令江西軍區不許採取任何報復行動。如果雙方任何一方不這樣做，不聽中央的話，就要犯極嚴重錯誤，我們等待籌委會同志的回答。」⁹³ 7月1日，周恩來等在京接見江西「大聯籌」代表時指出，省「大聯籌」奪槍是錯誤的，要及時制止武鬥，實現革命的大聯合。7月3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林彪，匯報江西情況，提請批准調二十六軍一個師進駐江西支左和加強軍管會及未來的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小組。次日，毛澤東批：調一個師問題，待江西會議開得有眉目再定為宜。⁹⁴ 7月4日，省軍區發出〈關於制止贛州武鬥問題的命令〉，責成贛州軍分區和當地駐

92 據〈周總理第六次接見江西四方代表座談記錄〉（1967年8月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另據「大聯籌」1967年8月12日出版的《火線戰報》說：「目前，據江西省大聯合籌委會與廣州部隊新調贛州某部聯合調查，已發現我造反派和紅衛兵屍體490具（不包括江中打撈的），其中有223具已被認出來。」

93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給江西大聯籌的電報（1967年6月2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68。

軍採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鬥。周恩來在8月5日接見江西四方代表時說：「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知道贛州事件後，親自派廣州部隊去的，要不然，你們（按：指「大聯籌」派的代表）的生命還保得住嗎？」⁹⁵

8月10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干決定〉，認為江西省軍區及部分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決定改組江西省軍區，派遣濟南軍區、廣州軍區的部隊進駐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為江西省軍區政治委員，楊棟樑為省軍區司令員，成立以程世清為主要負責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⁹⁶ 中央的一系列舉措並未能平息江西的動亂。8月24日，江西撫州地區發生嚴重武鬥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堅決支持左派的原則，派出支左部隊前往介入。武鬥中先後死亡的幹部群眾有六十五人。⁹⁷

3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正式成立，省軍區政委龍潛任主任，省軍區副司令員阮賢榜、舟嵎要塞區政委曹思明、二十軍政委南萍、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任副主任。軍管會內部在支左問題上一直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以南萍、陳勵耘為首的二十軍、空五軍堅決支持「省聯總」，而以龍潛為首的浙江省軍區則比較支持「紅暴派」。

5月9日，「省聯總」組織數萬人召開堅決擊退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大會，把鬥爭矛頭指向了省軍管會、省軍區的主要領導人。6月11日至7月23日，中央召集浙江三軍代表和「省聯總」、「紅暴」兩派代表到北京開會。開會期間，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多次單獨接見「省聯總」代表，向「紅暴」派和省軍區施加壓力。7月13日、23日，會議達成關於浙江問題的兩個協議，肯定空五軍、二十軍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指責以龍潛為首的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責令他們深刻檢查。同時提出要以「省聯總」為主實現兩派大聯合。

95 周恩來第六次接見江西四方代表座談記錄（1967年8月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9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32。

97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江西歷史大事記》（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頁297-301。

「省聯總」代表回杭州以後，聚集各地的造反組織，多次召開大會，批判、掛牌遊鬥省軍區政委龍潛、司令員張秀龍等，強迫龍潛檢討。

浙江溫州地區存在着對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工總司」（即溫州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和「溫聯總」（即溫州革命造反派聯合總司令部）。6月下旬，「省聯總」宣布吸收溫州「工總司」為其下屬組織。在「省聯總」的支持、慫恿下，「工總司」與「溫聯總」兩派之間的鬥爭日趨尖銳、激烈。7月10日，溫州市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兩派分別佔領市區各制高點，控制主要交通要道，武鬥規模愈來愈大。7月21日，溫州軍分區所屬6515部隊六分隊、防化連及軍械庫部分武器遭兩大派組織搶奪。被搶武器中，除步槍、衝鋒槍外，還有輕、重機槍，火焰噴射器和六〇炮、八二炮、一二二榴彈炮等重武器。⁹⁸

8月5日，「省聯總」頭頭張永生等人唆使造反派千餘人包圍省軍區軍械二庫，騙開大門，扣押和打傷守衛人員後，強行砸開倉庫，將一千多件槍械和價值約四十萬元的軍用物資洗劫一空。9日，張永生再次糾集千餘人，又搶走省軍區軍械一庫的汽車及子彈幾百萬發，手榴彈萬餘枚。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記載，5日和9日兩次共搶走長短槍1900餘枝，輕重機槍523挺，炮40門，子彈120萬餘發，手榴彈1.69萬餘枚。⁹⁹

8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改組浙江省軍管會和省軍區的決定〉，任命二十軍政委南萍為省軍管會主任，任命二十軍軍長熊應堂為省軍區代司令員，南萍為代政委。命令二十軍進駐杭州，統一指揮省軍區所屬部隊和地方武裝，領導「三支兩軍」工作。23日，省、市造反派和駐杭三軍數萬人集會，南萍和空五軍軍長白崇善在會上講話，表示二十軍、空五軍堅決支持「省聯總」為代表的造反派。26日，省軍區召開「交權」大會，龍潛、張秀龍、阮賢榜等省軍區領導被造反派強按下跪，搞噴氣式。會後，原省軍區黨委全體成員被關押和揪鬥。省軍

98 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溫州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122。

99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07—308。

區及其所屬部隊和軍分區、人武部，甚至民兵連的廣大幹部戰士，也被作為「龍子龍孫」，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有的被活活整死。¹⁰⁰

8月下旬，「省聯總」為了控制全省，以「文攻武衛」開路，在全省各地大規模武力鎮壓「紅暴」派。24日，「省聯總」召開攻打蕭山誓師大會。26日凌晨，張永生、賀賢春組織省級機關和杭州市數十個單位經過軍訓的三四千人，全副武裝攻打蕭山，打死九十多人，打傷一百多人。蕭山攻下後，二十軍立即進駐軍管。8月24日，「省聯總」部署所屬組織，攻打富陽縣城。富陽縣城被打下之後，又製造了一系列武鬥事件。10月3日，「富聯總」謊稱縣主要領導被龍門公社對立派所綁架，在得到省軍管會負責人的支持後，富陽縣造反派當晚組織攻打龍門公社。在攻打富陽縣城和龍門公社等武鬥中，打死100多人，傷殘300多人，關押700多人，燒毀房屋1200多間，砸了166個單位和2000多間房屋。¹⁰¹

湖南省武鬥嚴重，奪槍事件時有發生。據「湘江風雷」負責人葉衛東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大學「聲援兩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會」上的講話說：「搶槍支的情況非常嚴重。……現在街上經常看到一個小孩肩上背着一枝槍，手上提一枝槍，腰上挎着一枝槍。」從7月底到8月下旬，湖南省邵陽軍分區、邵陽武裝部大批武器彈藥被搶，共計被搶走各種槍支818枝，「六〇」、「八二」迫擊炮27門，手榴彈1萬多枚，子彈250萬發。¹⁰²

1967年7月至9月，廣東各地兩派群眾組織武鬥事件迭起。7月23日，廣州「東風派」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在中山紀念堂舉行成立總部大會，而對立的「紅旗派」組織則在越秀山體育場開會。中午，兩派群眾在紀念堂、吉祥路一帶發生武鬥，共聚集了二萬餘人。廣州市軍管會抽調二十一個連的解放軍趕到武鬥現場，在衝突的雙方中間築起

100 中共浙江省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57。

101 《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頁155—158。

102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頁317。

人牆，才將事態控制住。此後，兩派武鬥不斷升級，造反派開始搶奪當地駐軍的槍支彈藥，用來相互廝殺。8月5日深夜，廣州兩派群眾組織衝進已實行軍管的市公安局，捆綁起哨兵，打昏查哨的連長，砸開武器倉庫大門，搶走各類槍支1850枝，子彈數萬發。8月8日晚，廣州市郊區金雞嶺槍械庫被搶；8月9日，廣州市軍管會遭衝擊，被搶去一批槍支彈藥。8月10日至12日，廣州警備區機關遭受群眾組織八次衝擊，被搶走一批槍支彈藥和其他裝備。¹⁰³

8月18日，廣州地區的兩大派群眾組織在長堤省總工會大樓發生武鬥，槍戰達四小時，雙方共死亡三人，傷三十三人。19日零時，周恩來親自從北京來電指示：立即停止武鬥，撤出攻打省總工會的隊伍。此後，武鬥才逐漸宣告平息。8月22日，周恩來等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廣東赴京兩派群眾組織談判代表，提出四項緊急措施：一、各派組織立即停止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槍支彈藥、物資裝備、糧秣和車輛；二、各派組織所持有的武器、彈藥和車輛立即封存，準備交還解放軍；三、停止一切武鬥，禁止打、砸、搶、抄、抓；四、立即釋放一切被扣人員。赴京的廣東兩派群眾組織代表都表示同意和堅決執行。但是，衝突事件仍然不斷發生，武鬥仍未能得到制止。9月1日，周恩來等人再次接見廣東兩派，並重申了8月22日提出的四項緊急措施。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廣東兩派談判代表在北京達成了停止武鬥、無條件釋放所抓人員、不准奪槍、將奪來的槍支歸還給解放軍等四項協議。9月15日，周恩來等人又一次接見廣東兩派代表，強調廣東兩派群眾組織搶劫解放軍的槍支必須在9月20日之前上繳完畢。¹⁰⁴

1967年4、5月間，廣西的群眾組織圍繞着幹部問題分成了支持韋國清的「支韋派」和支持伍晉南的「支伍派」。「支伍派」於4月22日成立了「南寧四二二火線指揮部」，後改為「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四二二」）；「支韋派」於5月25日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動指揮部」，後改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廣西的「四二

103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卷十一（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頁122。

104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廣東黨史大事記》（內部發行，2000），頁315—316。

二」和「聯指」兩大派的矛盾愈來愈激烈，雙方多次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事件。7月13日，廣西「聯指」組織紅衛兵到廣西軍區警衛連和區黨校分部駐軍6984部隊搶走步槍、衝鋒槍三百餘枝、輕機槍三挺、六〇鋼炮一門和一批彈藥。8月18日晚，廣西「四二二」頭頭經過策劃，糾集了三百人到金雞村搶劫軍用列車的援越炮彈四千多發。20日中央文革來電責令交還後，「四二二」才將炮彈大部分交還部隊。8月20日晚，「四二二」南寧航運「工總」乘船到蒲廟搶奪邕寧縣武裝部槍支彈藥。從8月到9月5日中央頒布〈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前，全廣西搶奪部隊武器的有十九個縣、市，其中被「四二二」搶奪的有桂林、臨桂、靈川、永福、平樂、興安、資源、象州、宜山、橫縣等十個縣、市；被「聯指」搶奪的有陽朔、玉林、武鳴、扶綏等縣；兩派都搶奪的有南寧、邕寧、柳州、梧州、柳江等五個縣。9月15日，南寧「聯指」延安片總指揮同金光農場「聯指」頭頭公開違抗中央〈九五命令〉，策劃搶奪金光農場民兵武器。由南寧「紅色公安」帶領八十多名武鬥骨幹，乘坐兩輛汽車前往。共搶得蘇式7.62步騎槍八十枝、輕機槍四挺、九二式重機槍一挺、五〇式衝鋒槍五十枝。¹⁰⁵此後廣西武鬥持續發展，愈打愈凶，奪槍事件愈來愈多，愈來愈大。1968年5月5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組織3800人，出動45輛汽車、一列火車客車，到南寧市長崗嶺廣西軍區軍械庫搶奪武器裝備，共搶走各種槍支7044枝，其中輕機槍479挺，高射機槍48挺，六〇炮4門，炮彈60發，子彈120萬發。5月10日，柳州「聯指」搶走駐軍6985部隊和519部隊各種槍支316枝，子彈1萬多發，六〇炮、迫擊炮2門，四〇火箭筒2具。5月21日，柳州「四二二」派組織數千人到柳州火車站搶走準備援助越南的子彈11000多箱，共計1700多萬發子彈。6月4日，廣西「聯指」所屬組織3500人第二次到廣西軍區軍械庫搶奪武器，共搶去各種槍支1859枝，六〇炮8門，子彈100多萬發。¹⁰⁶

105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43、51、52。

106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頁387。

雲南省在3月底實行軍事管制以後，「八派」和「炮派」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鬥爭非但沒有平息，反而日趨激烈。4月26日，「炮派」召開大會，「八派」去衝擊會場，在廣場和東風路一帶出現了數萬人武鬥的嚴重局面。5月29日，兩派又在軍醫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共有一百多人受重傷，「炮派」的不少人被抓到「八派」的大本營昆明工學院私設的監獄非法關押。昆明地區的大規模武鬥引起了中央的關注。5月30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電告昆明軍區黨委，要求「對昆明地區兩大派的武鬥，軍區機關、部隊幹部戰士不要介入，應該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制止武鬥，勸說群眾擺事實、講道理，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逐步解決兩派之間的問題，不要打擊一方壓制一方，使矛盾激化」¹⁰⁷。

實際上，雲南省的問題正是出在這個地方：軍區介入了地方群眾組織的矛盾鬥爭，在軍管會內部就存在着兩種不同意見，兩大派群眾組織在軍管會內都有人暗中支持。7月下旬以後，雲南武鬥進一步嚴重升級。「八派」首開率領同夥「搶槍」先例。兩大派的武鬥從使用棍棒、梭標，發展到運用現代化武器進行槍戰。8月23日，「八派」慶祝「八二三」一周年遊行之後，到支持本派的昆明步兵學校「搶」槍，用以武裝「八管區」制高點。8月24日，「炮派」得知消息後，也跑到小麥峪軍械庫去「搶」武器，裝備駐守西站、雲南大學、新華山等「炮管區」各制高點。兩派形成軍事割據。僅1967年8月至12月，兩派搶槍二十餘次，共搶走部隊、地方、民兵武器庫槍支約34857件，彈藥不計其數。¹⁰⁸ 據《雲南省志·中共雲南省委志》記載，在兩大派和流散社會的各種槍支達十餘萬枝之多。¹⁰⁹

在昆明武鬥嚴重升級的影響下，多數地州市與昆明兩大派掛鈎的造反派也相繼發生嚴重武鬥。

107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昆明軍區黨委的電報(1967年5月3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08 王元輔主編：《雲南五十年——中共雲南省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頁132—133。

109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雲南省志·中共雲南省委志》，下卷(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1071。

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是重災區，全州八個縣都發生武鬥，在武鬥期間死亡達二千餘人，傷殘更多，是雲南在武鬥期間傷亡最多的一個州。

東川市的兩派武鬥，市武裝部武器庫中的槍支彈藥被搶劫一空，東川礦務局副總軍代表帶領支左部隊全副武裝，在武鬥動員大會上說：「全體造反派要緊急行動起來，有槍拿槍，無槍拿棍棒，沒有棍棒拿石頭，沒有石頭用嘴咬，要把礦區每一寸土地變為消滅『炮匪』的墳墓。我們全體軍代表和支左部隊決心和造反派團結在一起，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東川支左部隊於1967年12月17日夜間攻打石膏礦，打死睡夢中的職工十餘人。全市武鬥打死124人，廠礦企業全部停產。

曲靖地區的兩派武鬥導致專署公安處的倉庫被砸開，各型槍支數百枝、子彈數萬發和收繳來的鴉片被搶走。五層樓的工農兵旅社被燒毀。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駐滇西部隊十四軍軍長梁中玉以「滇西支左委員會」的名義支一派、壓一派。他把大理軍分區的大多數幹部定為「支保勢力」，說大理軍分區只有三個人是好的。1967年12月5日，梁支持的一派二百多人乘六輛卡車到十四軍軍部「搶槍」（發槍），首開大理地區搶槍之風。1968年1月10日至13日，還是這一派幾百人去衝擊大理軍分區，撬開軍械庫、被裝庫、作戰保密室，搶走武器、彈藥、軍用地圖、文件資料，抄了軍分區幹部的宿舍，搶劫財物。¹¹⁰

東北地區的武鬥也相當厲害。1967年8月11日，吉林「長春公社」襲擊長春市英俊區（現二道河子區）武裝部和長春拖拉機廠武裝部，搶走大量武器。8月13日，「長春公社」派觀點的駐長春軍事院校聯合「長春公社」數千人襲擊解放軍第五坦克學校軍械庫，將三個倉庫的武器全部搶光，搶走大量槍支彈藥，僅機槍就有一百七十挺（其中有高射機槍五十挺）。8月14日，「二總部」出動近千人，五十多輛汽車，洗劫了解放軍白老虎屯武器庫。據不完全統計，從8月9日到14日的五天中，長春市就發生四十多起搶奪部隊及人武部門槍支彈藥的事件。隨後，全省各地縣、各大廠礦等基層單位民兵的槍支相繼被搶。在吉林省長春市的武鬥中使用了坦克。9月13日，長春市起重機廠等十多個單位的

110 《雲南省志·中共雲南省委志》，下卷，頁1066—1068。

「二總部」組織的三百多人，使用步槍、機槍、機炮、六〇炮、炸藥包等武器襲擊「長春公社」英俊區駐地吉林建築一公司「小白樓」，雙方發生激烈槍戰，造成二人死亡。雙方槍戰過程中，駐長春軍事院校公社派觀點的組織出動四輛坦克增援「小白樓」。遼寧省的武鬥也很普遍，據《中共遼寧黨史大事記》裏記載：遼寧九個市、地和二個鐵路局後來共收繳各種槍支200916枝。¹¹¹

8月21日，中央軍委總參作戰部報告：停泊在廈門某地十艘軍艦遭廈門群眾組織襲擾，一些人不斷地衝上艦去搶奪炮艦武器。今天又有港務局「新海員公社」十一人衝上炮艦奪槍，後又有群眾乘坐八艘機帆船追著軍艦要奪槍，致使這十艘軍艦不敢靠岸，被迫起錨在海裏轉圈。到下午5時20分，與一架從金門起飛前來偵察的國民黨炮兵校正機發生遭遇戰。周恩來獲悉這一情況當即指示：「請伯達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來、陳伯達等人的名義宣布，不准奪炮艇的武器，在敵人面前奪野戰軍的武器是錯誤的。如勸告不聽，繼續再奪，即宣布為反革命。」當晚，中央文革辦事組將周恩來的指示電告福州軍區轉廈門市各群眾組織。¹¹²

以上所述，不過是全國各地奪槍情況的幾個典型案例。奪槍現象極其普遍，尤其是1967年夏秋之際，達到高潮。全國沒有奪槍的地方，只有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當時基本上沒有奪槍的，僅內蒙古、河北、山東、山西、甘肅、青海等少數地區。其後，大多數地區逐步穩定了局面，制止了奪槍事件的泛濫，但在一些派性鬥爭激烈的地區，奪槍事件還時有發生。

2 毛澤東為甚麼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

奪槍的規模有多大？毛澤東在一次同外賓的談話中說：我們這裏早幾年天下大亂，全國各地都打，全面內戰。兩邊都發槍，一共發了

111 高峰主編：《中共遼寧黨史大事記》（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頁251。

112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二十世紀通鑑》，第四冊（北京：線裝書局，2002），頁4504。另可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80—181。

一百萬枝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¹¹³

實際情況遠遠超過了毛澤東的估計。據不完全統計，到1967年8月19日止，全國共發生了1175起搶奪部隊的武器、彈藥的事件，共搶奪武器、彈藥有：步槍2.16萬餘枝、衝鋒槍4600餘枝、手槍2000餘枝、其他槍2100餘枝、輕機槍1190餘挺、重機槍350餘挺、高射機槍78挺、六〇炮40門、迫擊炮22門、火箭筒61具、無後坐力炮8門、子彈648.7萬餘發、彈藥1296公斤、雷管4290餘枝、手榴彈16300餘枚、噴火器10具、高射機槍子彈700發，湖南一個工廠28噸發射藥、重慶一個兵工廠72萬餘發子彈被搶。¹¹⁴又據不完全統計，到1969年9月止，被搶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況是：被搶奪的各種槍1877216萬(枝、挺)，收回2131036(枝、挺)；被搶奪的各種火炮10266門，收回火炮14828門；被搶奪的各種槍彈44217萬發，收回槍彈34004萬發；被搶奪的各種炮彈390642發，收回炮彈294259發；被搶奪的手榴彈2719545枚，收回手榴彈2734381枚(以上統計中，有的收繳數大於被搶數，是因為搶奪數中沒有統計軍工廠生產的新產品和群眾組織自製的武器彈藥)。¹¹⁵

全國到處都在搶解放軍的槍，到處都在用槍炮自相殘殺，到處都在流血和犧牲，這樣的局面還不嚴重嗎？毛澤東為甚麼還要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呢？

毛澤東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場上說話的。鑑於全國多數地區的支左部隊並不真正支持造反派，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更是與保守派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二月鎮

113 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的談話(1972年6月28日)。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冊，頁834—835。

114 轉引自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42—43。其中數字有不準確之處，例如：「手榴彈16300餘枚」，肯定大大低於實際數字(疑為163萬餘枚之誤)。1967年8月5日和9日，浙江「省聯總」的張永生等人搶劫省軍區軍械庫，兩次共搶走手榴彈1.69萬餘枚。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頁307—308。

115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45。

反」中，各地駐軍大多都參與了鎮壓造反派的行動。2月9日，毛澤東在〈關於軍隊在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中不准任意開槍的規定〉文件稿上批示：「關於支持真正左派廣大群眾問題，現在出現許多搞錯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於被動。」¹¹⁶5月初，山東省軍區向濟南軍區並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發電報，反映山東省的造反派將鬥爭鋒芒指向了解放軍，省軍區、軍分區、縣市武裝部參加「三結合」的領導幹部幾乎都被造反派公開點名，成為打倒的對象。毛澤東對山東省軍區的電報頗不以為然，他批示說：「看來山東學生、工人出事地點(就全省說，佔少數)，省軍區、軍分區、縣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問題。」意即：不是造反派衝擊軍隊有問題，而是軍隊自己有問題。5月10日，毛澤東又對劉伯承轉來的，署名為「濟南軍區機關全體革命群眾、濟南駐軍全體支左工作人員」的來信做了批示。來信稱「目前濟南反對解放軍的大風已經颳到十二級了」，毛澤東批道：「此件表現這一時期軍隊許多人的心情」，「其實不是那樣嚴重」。5月11日，毛澤東看到《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上登載的〈濟南、山東兩軍區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材料，其中講到濟南軍區政治部、山東省軍區司令部兩位幹部來信，反映濟南軍區、山東省軍區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認為「濟南軍區和山東省軍區已由過去對造反派感情不深發展到目前的公開對立」。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值得一閱」，「同樣情況在全軍內，在許多人身上都存在，當然不是多數」。5月13日，毛澤東又對濟南軍區一位支左幹部的來信做出批示。這封信認為：濟南部隊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軍不是左派的後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後盾。部隊與造反派十分對立，這種對立現已公開化，雙方支持的群眾組織不斷遊行示威，有時還發生武鬥。毛澤東批示：「這位同志反映的問題，是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很值得注意。」並指示中央文革小組將此信印在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編印的《快報》上。¹¹⁷從上述毛澤東對山東的四

1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221。

11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28—329、336—339、343—344。

次批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對待此類軍隊與造反派矛盾問題時，傾向性是很鮮明的。

多數地區的激進的造反派與當地駐軍的關係都比較緊張，而當兩大派群眾組織矛盾激化發生武鬥時，激進的造反派往往要吃虧。毛澤東在武漢看到駐軍支持保守派，造反派力量處於劣勢時，就提出要給造反派發槍，把造反派武裝起來。江青7月22日講話支持「文攻武衛」的口號，其實與毛澤東的「武裝左派」的提法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的邏輯是：要以真正擁護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為核心，來搞「大聯合」、「三結合」，如果造反派在與保守派的鬥爭中處於劣勢，就應該武裝左派，幫助造反派打敗保守派。左派奪槍，理所應當，談何「嚴重」？甚麼是毛澤東認為的嚴重問題呢？7月4日，中央軍委辦公廳編印的《群眾來信摘抄》上登載了江西赴京控告團、江西贛州赴京控告分團的電話匯報，反映贛州武鬥情況嚴重，人員傷亡很大，斷糧斷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隊前往制止武鬥。毛澤東將此件批給林彪、周恩來：「贛州問題嚴重，涉及整個贛南十多個縣，調一個師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撫州等處，對贛南鞭長莫及。是否可從廣州軍區調一個師，至少一個團進駐贛州，將事情辦好後仍返廣東。此事請先考慮，待面商。」¹¹⁸ 贛州武鬥造反派被打死二百多人，毛澤東認為這才是嚴重的問題，遂緊急調兵遣將，前往增援。

為了改變軍隊多數支持保守派的局面，毛澤東採取了兩個措施：一是調派野戰軍參加支左；二是對全國人武部以上幹部辦訓練班。5月7日，毛澤東在對山東省軍區電報的批示中就指出：「山東及各省，正規軍弄錯的較少。」所謂正規軍者，就是指野戰軍而說的。各地最初支左任務多由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擔任，他們與所在地方的群眾聯繫較多，大多傾向於支持保守派或造反派中擁護軍隊、相對溫和的組織。野戰軍一般參加支左較晚，許多地方是在中央明確表態後，形勢較為明朗時才參加支左的，所以相對來說，「弄錯的較少」。1967年8月，毛澤東指示要對全國人武部以上各級支左幹部辦訓練班，以使之

11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70。

提高路線鬥爭覺悟，轉變同情，支持保守派的立場。毛澤東說，人武部十幾年沒有開過會，現在每省都應開人武部以上幹部的會，小省來一二百人，中省來四五百人，大省應到千人左右。在北京開，實際上是輪訓。¹¹⁹9月17日，毛澤東在江西南昌的談話中，舉了內蒙古軍區獨立營的例子，來說明辦學習班可以使過去支持保守派的軍隊幹部戰士轉變為支持造反派。他說：

我看訓練的辦法好。內蒙一個獨立營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對中央對內蒙問題的決定。他們到了北京，氣可大了，大鬧，都不聽總理的話，打破傢具，會開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條要求。以後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訓練了四十天，都轉了，回去還支左，不支右。獨立營，獨立師，這一下就轉過來了。我對現在的右派，不那樣看死，一訓，就轉過來。有壞人是極少數，多數是認識問題。有的把認識問題說成立場問題，一提到立場問題就上了綱，一輩子不得翻身，難道立場問題就不能改變嗎？對大多數人來說，立場是能變的，極少數壞人是不能變的。¹²⁰

8月17日，周恩來在關於開辦各省武裝幹部訓練班送審意見稿中提出：根據毛主席關於要辦好人武部以上各級幹部訓練班的指示，我們設想訓練的方法，主要採取整風和「四大」的形式，閱讀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關材料，請中央負責同志講話，請革命左派介紹鬥爭經驗，大、中、小會議相結合。訓練步驟可配合中央解決各省問題的步驟分四批進行，每批暫定兩個月，可交錯進行。訓練工作由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直接領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協助進行。各省的訓練班都要組織一個小的領導班子，挑選一批軍隊的造反派和地方上的紅衛兵參加工作。經毛澤東批示：「照辦」後，8月19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了這個文件。¹²¹

119 董保存：《政治漩渦中楊成武》。

120 毛澤東在江西南昌同程世清等的談話(1967年9月17日)，出處待查。

1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399—400。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一些省市向造反派發了槍。

在〈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干決定〉中提出：

在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下，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目前首先在南昌、贛州兩地，準備研究實行。革命的群眾武裝，是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衛國家財產、維護革命秩序、制止壞人殺害左派群眾的強大力量。今後，軍分區、人武部，決不准以任何藉口把槍支彈藥發給或變相發給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藉口奪取解放軍槍支、搶劫軍火倉庫和各種軍用物資。¹²²

這個文件明文規定要給造反派發槍，建立群眾武裝，同時嚴禁給保守派發槍。

7月10日，中共中央對河南省軍區黨委的檢查作了批示，指責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明確指示應由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負主要責任。中央決定劉建勳重返河南省主持工作，成立以劉建勳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不久，中央決定調原十五軍政委王新接替何運洪任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8月12日，河南省革籌小組、省軍區召開各軍分區及河南「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等群眾組織負責人會議。省革籌負責人劉建勳、紀登奎講話要求軍分區、人武部、公安局把槍發給造反派，不允許保守派有槍，並提出「槍換盾」（即由保守派換給造反派）的口號。同時明確提出，當前軍分區、人武部由支持保守派轉向支持造反派的標誌就是：槍發給了造反派。此後，河南全省各地搶奪軍隊、人武部、公安局槍支彈藥的事件接連發生，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不斷升級。¹²³

8月16日下午，北京航空學院舉行「武裝北航紅旗誓師大會」，宣告成立北航「紅旗」武裝部隊。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等參加了大

122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32。

123 中共河南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下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193。

會。會上宣讀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武裝北航紅旗是中央決定的。」

8月18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也發了槍。李鍾奇等出席了授槍大會。這次給師大井岡山發槍是謝富治親自批准的。與此同時，北師大成立了軍事委員會，下設民兵師、基幹民兵團。「井岡山公社」負責人譚厚蘭任軍事委員會主任、民兵師政委。

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組之所以選中了北航「紅旗」和師大「井岡山」為典型，因為這兩個學校都是有相當影響力的造反派組織，校內基本上是一派掌權。在北京紅衛兵中搞的武裝左派，主要是象徵性的，發的槍支彈藥始終並未派上用場。

「武裝左派」，給群眾組織發槍有相當大的風險：一是誰是左派有時候分不清楚，有的地區幾派群眾組織爭相造反，相互之間又矛盾重重，確認哪個組織是左派成為一道難題；二是左派內部會分裂，拿了槍自己與自己打，例如武漢地區即是如此。所以「武裝左派」喊得挺響，實際上真正實行的並不多見。9月28日，張春橋在接見江蘇代表團的講話中說：「中央決定一定要武裝左派，要發槍，但有個條件，等到大聯合搞好了，局勢穩定了才發槍。」¹²⁴ 真等「大聯合」搞好了，局勢穩定了以後，「武裝左派」還有必要嗎？

五 「群眾專政」

「群眾專政」的提出是與「砸爛公、檢、法」相配套的。因為要否定原來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和整個過去的舊體制，毛澤東提出了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的一系列新概念。「群眾專政」的內容其實並不全是新的，有許多是在過去的歲月裏就大量存在的。

「群眾專政」在文革中給全國人民帶來的是巨大的災難。「群眾專政」在文革中的典型案例，1966年是北京大興縣殺害「四類分子」的事

124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年9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件；1967年是湖南道縣的大規模殺人事件；1968年是廣西自治區的大規模殺人事件。

「群眾專政」是毛澤東的一個發明，當時在台上的其他中央領導人未見有異議。但從實際操作的層面上來說，至少周恩來是有保留意見的。1968年7月10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大學原黨委委員、法律系和哲學系主任、國家一級教授何思敬被打致死的報告上批告謝富治：「這類被打致死，或係自殺，或係被人滅口，人大最多。我建議，公安部轉告(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成立專門機構，追查此類案件，總要查出一個究竟。否則，任何一個群眾組織都可以私捕私訊，打人致死，專政機關置之不問，決非善策。」¹²⁵

1 〈公安六條〉與「砸爛公、檢、法」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¹²⁶這一條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風靡全國的形勢下，幾乎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但這條規定用的「攻擊污蔑」這四個字極為籠統、抽象，成為後來大量冤假錯案的原因之一。〈公安六條〉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出現了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思潮的情況下，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保衛文化大革命而制定的。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號通令〉中公然宣布：「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對地、富、反、壞、右分子，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社會上一切牛鬼蛇神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於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

125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44。

12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47。

和中央文革小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上海人民公社，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辦。」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最高人民法院組織各地法院複查了1966至1976年十年中判處的部分反革命案件，其中因受〈公安六條〉影響而被誤判的冤假錯案竟佔到總數的一半以上。另據揭露，「僅僅由於對林彪、江青一夥有一字一句損害而被定為『惡毒攻擊』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國就有十萬多人。在『四人幫』慘淡經營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製造的冤假錯案就有24.9萬多起，受到株連的無辜群眾在一百萬人以上。」¹²⁷

〈公安六條〉還規定了群眾直接鬥爭和處理所謂「反動分子」的程序，這是對當時出現的一些群眾組織非法進行「審判」活動的公開認可。其中第三條規定：「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眾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眾的，都是違法行為。一般的，由黨政領導和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批判教育。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第五條規定：「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一般的，由革命群眾同他們進行鬥爭。嚴重的，公安部門要和革命群眾相結合，及時進行調查，必要時，酌情處理。」¹²⁸ 注意這裏有兩個「一般的」，就是說，在多數情況下，都應該由群眾或群眾組織對那些有「違法行為」的人進行批判教育和鬥爭。其實這就是後來所說的「群眾專政」。

文革中推行〈公安六條〉的結果，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在「惡毒攻擊」的罪名下，判處了一大批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為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鳴不平，對毛澤東的錯誤進行批評，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志士仁人，很多人被判處了重刑，少數竟慘遭殺害。例如：江西省贛南醫專的教師陳耀庭和他的妻子謝聚璋，從1966年10月至1967年底，先後寫了十萬餘字的文章、信件寄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和一些黨政機關，信中說：「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全部都是錯誤的。」他們被定為「反革命犯罪」，1970年3月陳耀庭被處死刑，慘遭殺

127 穆青、郭超人、陸拂為：〈歷史的審判〉，《人民日報》，1981年1月26日。

128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47。

害；謝聚璋被判處死緩，後被折磨死於勞改場所（此案於1980年平反糾正，宣告陳、謝二人無罪）。按照〈公安六條〉審判刑事案件，根本不講犯罪構成，不分析動機目的，不區分故意與過失，也不研究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係，將一些毫無聯繫的事件硬性拼湊在一起，任意「拔高」、「上網」，隨意按「反革命」定罪判刑。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各地公安機關軍管會判處了十萬餘件反革命案件，經文革後複查，冤錯率高達八至九成。¹²⁹

1967年初，上海奪權後成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用以代替原來的上海市公安局、法院和檢察院。在此後近十年的時間裏，上海市不存在任何司法機關。上海的奪權經驗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迅速為全國各地所仿效。公、檢、法機關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極大的衝擊，有的被取消，有的則陷於癱瘓。

1967年1月25日，謝富治在一次講話中說：「『法院』這個名稱是舊的東西，沿用國民黨時期的名稱。……要通過鬥爭把原來法院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統統搞掉。……建國十七年來，這個問題沒有解決，要靠你們造反來解決。」同年8月7日，謝富治在公安部大會上的講話中又說：「現在的公安機關如果不徹底改變，不把舊機器徹底打碎，要轉變過來是困難的。……不把原來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論、組織方面的壞東西徹底砸爛，就永遠跟不上毛主席思想。」¹³⁰ 謝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現十分惡劣，對他的批判其實還很不深入。但問題在於：謝富治個人是不可能那麼大的膽量和能量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的，謝富治在當時的講話中就明確說到：他的講話「可能有錯誤。但總的精神，是有毛主席的指示作依據的。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的面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¹³¹

129 郭成偉主編：《新中國法制建設50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268-269。

130 謝富治在公安部門鬥爭羅瑞卿大會上的講話（1967年8月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31 1967年9月18日，毛澤東在湖南與黎原、華國鋒、章伯森等人談話時說：「我一聽到公檢法垮台，人就高興！聽說富治同志這次才說了幾句話。」參見董保存：《政治漩渦中楊成武》。

所謂「群眾專政」，就是可以不經任何法律程序亂捕、亂押、亂搜查、亂沒收，使全國陷入無法無天的混亂境地。同時，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建立了大量的專案組，行使司法權，成為迫害幹部群眾特別是迫害領導幹部的工具。

2 湖南道縣事件

1967年夏，湖南道縣發生的大規模殺人事件就是群眾專政的一個典型案例。¹³²

道縣存在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紅聯」在全縣多數地區佔優勢，其成員大多出身成分較好，受到縣武裝部、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的支持；「革聯」則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及少數幹部組成，成分較複雜，造反精神較強，在縣城的勢力較大。1967年7月以後，兩派矛盾衝突激化，發生了多次武鬥事件。

8月8日，在派性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革聯」派衝擊縣武裝部，搶走了武裝部的全部槍支彈藥。8月11日，縣武裝部的負責人召開全縣各區、公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會議通報了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的槍被搶情況後，縣武裝部負責人煽動說：階級敵人要翻天了，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8月13日，「紅聯」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革聯」總部。「紅聯」中了「革聯」的埋伏，被打死二人，打傷多人。事後，「紅聯」抬屍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派性武鬥引發了大規模的殺人事件。

廣大農村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成為在派性鬥爭中失利的「紅聯」派發泄憤怒的對象，當時到處可以看到「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

132 湖南道縣事件的詳情，可參見章成：〈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載宋永毅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頁111—203。

山萬代紅」的標語和「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一片恐怖之中。

當時道縣流傳着這樣的謠言：「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加之在這期間，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所謂的反革命「綱領」，即：「8月大組織，9月大暴動，10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8月中旬開始，各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動員部署殺人。一些區、公社甚至大隊都組織起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有的叫「貧下中農高級法院」）。

道縣的大規模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1590個大隊，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死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的影響，零陵地區其餘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江華瑤族自治縣殺898人；寧遠縣殺1092人；江永縣殺325人；雙牌縣殺345人；永州市（原零陵縣的一部分，文革後設立）殺158人；南山縣殺145人；祁陽縣殺218人；東安縣殺11人。

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分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分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

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蚣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8天時間共殺1054人。蚣壩公社是殺人最多的公社，共殺了524人。躍進大隊是殺人最多的大隊，於一天之內殺了64人。

殺人手段多種多樣，基本可以歸納為十種：

- 1、槍殺（包括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 2、刀殺（包括馬刀、大刀、柴刀、梭標等）；
-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 4、炸死（又稱「坐土飛機」）；
- 5、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
-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
- 7、棍棒打死（包括鋤頭、鐵耙、扁擔等）；

- 8、繩勒死(包括勒死和吊死)；
- 9、火燒(包括熏死)；
- 10、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8月23日，道縣柑子園公社正式掛牌成立了「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這個「法院」成立後，共開庭審訊了十三人，其中八人被判死刑。還有許多殺人事件是由各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道縣和零陵地區其他各縣的殺人事件中，當時掌握實際權力的各縣抓促領導小組和縣武裝部的主要幹部，對殺人事件大多採取了縱容態度。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在當時的派性鬥爭中的立場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念深入人心的結果。當時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在貧下中農與「四類分子」之間，當然應該站在前者一邊，否則就是立場問題。¹³³

133 江華瑤族自治縣在殺人事件期間曾下發過一份〈關於制止殺人的六條意見〉，是這種觀念的具體表現，全文如下：

- 一、群眾自覺組織起來，造四類分子的反，對他們實行專政的大方向是對的。貧下中農殺四類分子，首先是四類分子挑起來的。因此，我們不能壓制和指責他們。我們應當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央有關政策，不能犯保護敵人，打擊貧下中農的錯誤。
- 二、要教育群眾不要上敵人的當，不要被敵人把我們的陣營打亂了，如發現宗派鬥爭，要教育團結對敵。對某個四類分子處理意見不一致，要進行協商。決不能互相殘殺，長敵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 三、要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與群眾的情緒。指揮部的人員要下去幫助區社幹部開展工作，要站在廣大貧下中農一邊，因勢利導，不要驚惶失措，不能阻礙群眾運動的發展。
-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對的。如果把群眾意見大的四類分子都捉起來，實際上是保護了敵人，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的一種表現。對解放十七年來一貫不接受改造，而現在又要向貧下中農奪權的四類分子，群眾要殺他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眾的造反精神是對的，我們只能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給群眾潑冷水。
- 五、教育群眾提高警惕，防止敵人暴亂和殺害貧下中農。我們一定要支持貧下中農，要和他們站在一起，對於他們的某些錯誤行為，通過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有關政策，廣大貧下中農自己一定會糾正過來的。
- 六、混進革命隊伍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群眾來要，盡量做好說服工作，對地富子女要加強教育，實在說服不了的，群眾一定要的，也得給。

參見《文革大屠殺》，頁187—188。

在殺人事件發生期間，零陵軍分區曾將道縣殺人的情況上報，湖南駐軍四十七軍轉發了這份電報：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凶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道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唯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張採取行動。各地從7月以來，特別是從8月22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烏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207人，其他縣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為，對殺人凶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分子，必須按照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77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湖南駐軍四十七軍在得知道縣殺人的情況後，於8月22日開始派出140師炮兵520團進駐道縣，與縣武裝部共同組成支左領導小組，對公檢法、電訊、氣象等單位實行軍事管制，下令制止武鬥和非法殺人。四十七軍還組織部隊下鄉，宣傳中央、省革籌、省駐軍支左領導小組的有關指示，制止亂殺人的現象。¹³⁴9月1日、2日，部隊派出軍用飛機散發禁止殺人的傳單。

道縣殺人之風迅速向外蔓延，鄰近的幾個縣都發生了大規模殺人事件。1967年9月27日，四十七軍和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就此聯合發出緊急通告：

……最近道縣、江華、江永、東安、南山、零陵等縣的一些地方不斷發生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現行反革命事件。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發出以下通告：

134 李振祥：《四十七軍在湖南「三支兩軍」紀實》(長沙：內部出版，2004)，湘新出准字(2004)第021號，頁84。

一、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1967年1月13日〈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堅決制止任何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事件發生。

二、目前道縣、江華、江永、東安、南山、零陵等縣農村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主謀者，要嚴加追查，依法懲辦。

三、對各縣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必須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1967年9月5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所屬部隊。在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收繳以後，掌握在革命造反組織手中的武器亦應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離開本單位的群眾、幹部一律保證返回原單位參加鬥批改，不准以任何藉口對其進行圍攻、毆打甚至殺害。對於沿途所設的關卡，要立即撤消，並嚴禁攔路搜身，保證行人安全和郵電、交通運輸暢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隊、生產隊張貼)

對湖南道縣大規模的殺人事件，零陵地區有關方面曾在1968年和1974年作過兩次象徵性的處理。文革結束後，受害者親屬紛紛鳴冤告狀。1978的冬天，零陵地委書記帶領工作組赴道縣調查，寫出專題報告，湖南省委批發了五號文件。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視察湖南，專程去零陵，聽取了道縣殺人的情況，明確指示：「對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回故鄉時，也曾對道縣殺人事件作了明確指示：「要嚴查懲辦。」

自1984年5月開始，零陵地委先後從地、縣抽調了一千多名幹部，組成「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歷時二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情況大致如下：

一、對一千多名殺人策劃者和凶手作出了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等黨紀政紀處分。

二、幾十名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為首組織策劃殺人的國家幹部被逮捕，並判處有期徒刑。

三、對那些謀財害命、強姦輪姦殺人者、積極主動充當凶手情節特別惡劣者、上級明確制止殺人後仍然成批組織殺人者逮捕法辦，追究刑事責任。

四、給數以千計的被害者和被殺者的家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以及相應的撫恤金。

1967年10月，在湖南道縣、江華縣等地發生大規模殺人事件的影響下，廣西全州縣東山區三江公社（現為東山瑤族鄉三江村）發生了黃瓜沖坑殺七十六人的慘案。10月3日，在民兵營長黃天輝策劃指揮下，將三江公社的地主、富農及其子女共七十四人捆綁雙手，押到黃瓜沖山上一萬丈深坑處，強迫他們跳坑。有的自己跳，有不肯跳的便遭毒打，最後用叉叉下坑去。在「斬草除根」的思想指導下，三江公社的民兵第二天還到湖南零陵縣將兩個已入贅到當地的地主兒子抓回坑殺。據統計，在被殺的七十六人中，有地主十六人，富農五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¹³⁵

11月22日，廣西資源縣中峰區（現為中峰鄉）中峰公社在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期間，研究決定審判槍殺兩名地主子弟蕭榮喜、盛雲星。蕭榮喜的罪名是「調皮搗蛋，打過隊長」；盛雲星的罪名是「把毛主席像的左眼戳瞎了，侮辱偉大領袖」。為便於審判和今後抓階級鬥爭的需要，成立了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並任命了法院院長、審判長、陪審員等。當天下午，「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在中峰區公所門口召開宣判大會，向參加區三級幹部會議的幹部和附近上千群眾宣布將蕭、盛二人判處死刑。將蕭、盛二人槍殺後，又以「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名義出了布告。

1967年底，廣西各地兩派群眾組織，尤其是「聯指」派亂殺人現象日益嚴重。容縣民兵在11月內，就打死地、富分子和一般群眾以及「四二二」成員六十九人。¹³⁶

135 這一慘案的組織策劃者黃天輝罪惡嚴重、民憤極大，在1983年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被依法逮捕，於1985年1月被處決。參見《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53—54。

136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58。

12月16日，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發出〈緊急動員起來，立即制止武鬥，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十項命令，要求立即停止武鬥，不准搶奪武器，堅決收繳槍支彈藥，群眾組織不准隨便抓人、打人、殺人等。但是命令頒布後，各地亂殺人的事件仍接連發生。

12月19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市縣「四二二」造反大軍赴邕「反屠殺控訴團」二百餘人，到廣西軍區靜坐和遊行，強烈要求革籌小組和軍區制止武鬥，嚴懲殺人凶手。同時，各縣「四二二」「反屠殺委員會」向自治區革籌小組、軍區發出公開信，提出五點要求：一、立即制止農民進城參加武鬥，解除各地武裝民兵和「聯指」對「四二二」的圍攻；二、立即派野戰軍到上述地區制止武鬥，收繳武器；三、立即下令取締「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等反動組織；四、立即解決各地受迫害來邕去桂的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生活問題；五、韋國清、廣西軍區要立即到群眾中去公開檢查改正錯誤。12月20日，「四二二」派人員在廣西軍區負責人接見時提出：解除民兵「聯指」武裝；按總理指示，立即取消「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等要求。

12月24日，經中共中央同意，廣西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聯合發布了〈取消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等組織的緊急通知〉，指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和「貧下中農肅反委員會」等組織是非法的，必須立即取消，停止活動，今後不得再成立類似組織，更不得以任何名義、任何藉口私設法庭，隨意捕人、殺人，如有違抗者，嚴加追查，依法懲辦。¹³⁷

137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58—63。

第八章

理還亂

1967年夏秋之際，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混亂的一段時間。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說：「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毛澤東說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但那不過是他作為一個大政治家在表現自己過人膽魄時的一種豪言壯語而已，真正面對亂成一鍋粥的國內形勢，其實他並沒有，也不可能有甚麼現成的治國良方。

毛澤東當然也不願意看到形勢失控的局面，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力圖控制局面。其中一個重大舉措就是決定將中央文革小組的兩名主力王力、關鋒隔離審查，以後不久又將另一名主力戚本禹也隔離審查。毛澤東大力號召造反派搞「大聯合」，認為這是解決各省問題，改變當前混亂狀況的關鍵所在。他提出了「鬥私批修」的口號，決定在全國各地大辦學習班，促進「大聯合」、「三結合」的實現。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全國多數地區的混亂局面有所控制。從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期間，內蒙、天津、江西、甘肅、河南、河北、湖北、廣東、吉林、江蘇、浙江等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但在局部地區，派性鬥爭、武鬥始終沒有停止過。

一 王力、關鋒的垮台

毛澤東領導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通過中央文革小組來進行的。1967年2月以後，中央政治局不再活動，原來的中央常委碰頭會也不經常召開了。¹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作原來的中央書記處，黨和國家的所有重大問題都要先拿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研究處理。

中央文革碰頭會原為中央文革小組例會，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在釣魚台十六樓召開。批判「二月逆流」以後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起初為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共十人。2月25日，經毛澤東同意，補充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葉群四人，稱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列席人員，享有正式成員的一切職權，參加所有的會議和活動。此後不久，又增加蕭華為列席人員。²1967年7月中旬以後，蕭華被打倒。7月底，穆欣被中央文革小組拋棄，令其回《光明日報》社參加運動。8月底，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8月以後，吳法憲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離審查。3月，楊成武被打倒。3月以後，中央文革碰頭會又增加黃永勝、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30說：「原由周恩來主持、各副總理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中央碰頭會也被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這裏說的中央碰頭會，也稱常委碰頭會。實際上，中央碰頭會並未完全由中央文革碰頭會所取代。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說：「5月8日，《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459。5月28日，中央常委碰頭會通過了〈關於對國務院×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78。7月26日下午在京西賓館批陳再道的會，也是一次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周恩來年譜(1949—1976)》對1967年2月以後的中央常委碰頭會多有記載。

2 1967年4月21日，蕭華、楊成武接見「七一五革命造反團」等群眾組織時，楊成武說：「我們主要在中央文革工作，90%的時間都在中央文革，我們的意見也是中央文革的意見。」

溫玉成兩位成員。這時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為：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汪東興、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溫玉成，共十二人，不再分正式成員與列席成員，至九大未變。

1967年8月底，毛澤東決定將中央文革小組兩名重要成員王力、關鋒隔離審查，在全國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連同後來也被隔離審查的戚本禹，一起被稱為「王關戚事件」。

1 「運去英雄不自由」

1967年7月中旬，毛澤東離京南下，北京的亂攤子丟給了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

當時，周恩來的日子很不好過。「伍豪事件」的陰影還籠罩在他的頭上，他不得不小心謹慎，如履薄冰般應付眼前的一切。據說那時鄧穎超甚至把裝有洗漱用具的挎包掛在門廳的衣帽架上，以便一旦出事時，可以隨身帶走。當時任空軍司令員、軍委看守小組組長並開始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吳法憲回憶說：「這一段是總理最苦悶的時期，他那時情緒不高，很沉默。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動不動就拍着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並要大家表態。當時沒有甚麼人為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我當時既佩服總理真有涵養，又為這樣一個老革命落到這步田地感到心寒。」³

但是，黨內鬥爭經驗豐富的周恩來並沒有完全被江青等人制服，他忍辱負重，引而不發，等待時機。

王力8月7日的講話出籠後，周恩來敏銳地感覺到此事的嚴重性。他打電話向中央文革查問此事，並將一份印有王力講話的材料批給康生、王力，提議三人在一起「談一談」。康、王二人未予理睬。⁴中央文革的風頭正健，並不把周恩來的提議放在心上。

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232—234。

4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77。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大火剛被撲滅，周恩來就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向他們宣布：外交部的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封閉副部長們的辦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無中央；火燒英國代辦處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周恩來表示，對這件事，還要做進一步調查處理，同時向毛澤東報告。

8月25日凌晨1時，剛開完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周恩來，單獨約見才從上海毛澤東處回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近來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來特別提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指出：這個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並連鎖反應到外貿部和國務院其他部，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藉口揪劉少奇把中南海圍得水泄不通，宣傳上又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指《紅旗》雜誌在8月1日發表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要牢牢掌握槍桿子〉中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臭」）。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把一份印有王力「八七」講話的材料交給楊成武，要他轉送給毛澤東看。

當天上午，楊成武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直飛上海，向毛澤東轉達周恩來的意見。毛澤東當時並未答覆。在經過一天的考慮後，毛澤東下了決心，他對楊成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以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

26日中午，楊成武趕回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當晚，周恩來在釣魚台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來宣布：「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隨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楊成武記錄下來的毛澤東的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翌年1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⁵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967—968。

其實在此之前，毛澤東對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已經有所注意。1967年3月2日，王力未經批准，就在軍以上幹部會議小組會上發言，傳達了毛澤東2月28日關於「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值得注意」的批示。毛澤東看了會議簡報後，就曾對王力說：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傷害總理。

陳伯達曾向毛澤東送過關於同王力、關鋒、戚本禹有關係的一些人秘密開會，策劃掌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權力的材料。毛澤東對陳伯達也講過，北京市是讓一派操縱了，但這個問題很複雜。並點了關鋒、吳傳啓、林聿時三個人的名字。⁶當時，毛澤東說，對他們的問題要慢慢來。

王力、關鋒、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經公開發表過比較有影響的宣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還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寫過評論員文章和社論。他們都參加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條〉等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起草工作。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們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他們寫的一些文章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讚賞，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愈來愈自以為是，愈來愈狂妄。用王力後來在自己的檢查中的話來說，就是「更加忘乎所以，尾巴翹得更高了」。他們唯江青馬首是瞻，對於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都不太放在眼裏，經常當面頂撞，出言不遜。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慫恿下，他們有時甚至對周恩來也敢採取大不敬的態度。

1967年夏天，北京大學校文革給《紅旗》雜誌寫了一封信，「勒令」交代1962年重新發表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經過。這封信送到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都在這封信上簽名表示同意。因為重新發表《修養》的事情牽涉到康生和陳伯達，陳伯達在此信上批了「不同意」三個大字，並對江青說，一個黨刊，接受一個群眾團體的「勒令」，不覺得羞恥嗎？江青也覺得此事非同一般，她後來在批判王力等人的時候說，王力他們是想要「把兩個常委端出去」。鑑於陳

6 關鋒、吳傳啓、林聿時三人曾在一起用「撒仁興」為筆名合寫過文章。

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內地位不穩，毛澤東在1967年夏天曾兩次重申了陳伯達作為「一組之長」的地位。

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毛澤東曾經欣賞和重用的筆桿子，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得力幹將。毛澤東對他們實行果斷的處置，同時也是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沉重一擊。9月4日，戚本禹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的錯誤，他在信中說：

最近以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關鋒、王力同志犯了很嚴重的錯誤，其表現形式是「左」傾盲動……。王力同志在外交問題犯錯誤，就同我有關(事由我起)……。我這幾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許多問題。……我真怕甚麼時候自己不爭氣，離開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給革命造成損失。……小組裏出了事，江青同志心裏難過。他叫春橋同志和我去看了關鋒、王力，開導他們。

9月24日，毛澤東從南方回到北京。他在中南海聽到王海容等人匯報有關情況後，針對王、關、戚問題，援引了晚唐詩人羅隱的兩句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⁷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等人都曾經是紅極一時、炙手可熱的左派人物，他們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廣播電台和各大報刊上，他們在被隔離審查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組中最為活躍的人物，他們到處發表講話、演說，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接見各方面的群眾組織代表，對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種種重大問題進行表態。在群眾眼中，他們都是神通廣大的通天人物，經常捧着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尚方寶劍對各方面發號施令，狐假虎威，狂妄蠻橫，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他們的崛起和垮台都很突然，在他們被隔離審查以至被送往監獄關押之後很長時間，正式的

7 參見宗道一：〈「王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中華兒女》，2002年第1期，頁42。宗文還寫道，王海容、劉華秋等人寫出題為〈王八七講話是一株大毒草〉的大字報，於9月27日貼出，在外交部引起轟動。此說不確。王海容、劉華秋等九人寫的大字報題為〈王力八七講話的要害是向中央奪權〉，時間為1967年9月8日。

宣傳媒介對他們從政壇上的突然消失都諱莫如深，不置一詞。社會上關於這三個人的各種小道消息紛紛揚揚，不脛而走，但對他們究竟犯了甚麼錯誤，到底出了甚麼問題，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2 北師大「九七事件」

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後，《紅旗》雜誌負責人林杰也被批鬥。北師大「井岡山」負責人譚厚蘭曾在《紅旗》雜誌社實習過一段時間，早就與林杰過從甚密，曾得到過林杰的不少幫助，在某種意義上說，譚厚蘭就是林杰一手扶持起來的造反派頭頭。她在9月1日晚師大革委會會議上還是一口咬定「林杰是堅定的革命左派」。會後，譚厚蘭率領師大「井岡山」一部分人到《紅旗》雜誌社遊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師大革委會、師大「井岡山公社」於9月1日發表〈關於目前形勢的嚴正聲明〉，其中還在振振有詞地說：

運動以來，一些別有用心的傢伙一直把林杰—關鋒—康老，說成是一條黑線，妄圖分裂中央文革，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扼殺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罪惡活動早已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可是，最近這些傢伙又重新拾起了這一法寶，明目張膽地對抗中央文革首長的指示，孤注一擲，大搞政治賭博，繼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並妄圖借此搞垮井岡山紅色政權，我井岡山公社全體社員和全校革命師生員工堅決不答應！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們就打倒誰！

9月3日，在《紅旗》雜誌社幫助工作的師大「井岡山」成員王東回校向譚厚蘭匯報，說林杰確有問題，已經被批鬥、被抄家了。譚厚蘭聽後痛哭失聲，說：「這樣一來，全國的造反派被壓下去，文化大革命就會被葬送。」

9月2日，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組織開會，聽北師大「造反兵團」（1967年2月成立，3月解散）的人介紹譚厚蘭保林杰的情況，討論如何利用這一時機整垮師大「井岡山」。

9月6日，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組織在北航開會決定，9月7日在師大召開慶祝師大「造反兵團」成立大會，由「造反兵團」邀請社會上的單位來參加大會，「天派」各校要盡量多去人參加大會，由體院「毛澤東思想兵團」的劉長信負責調動會場隊伍，大會指揮部設在師大對面的電影學院「井岡山總部」，對大會進行遙控。

9月6日，師大革委會成員樊立躍等人發動「政變」，推翻師大革委會，成立「專政委員會」，並對譚厚蘭進行抄家和限制自由。9月7日上午，「專政委員會」召開了批鬥譚厚蘭大會。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等組織的大批人馬湧進師大參加了師大「造反兵團」的慶祝大會⁸。

當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到師大傳達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緊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組堅決反對開群眾大會鬥爭譚厚蘭，反對搞垮師大革命委員會。譚厚蘭和師大革命派在2、3月份反對譚震林、批判譚震林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支持他們的這種行動，你們應當立即釋放譚厚蘭同志，希望你們嚴格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路線，提高革命警惕性。」⁹ 當晚，謝富治派李鍾奇去師大，傳達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1·北師大革命委員會、井岡山是革命組織，譚厚蘭同志是革命的，如果有缺點、錯誤，可以批評，可以進行檢討。2·不能搞垮革命委員會，不能搞垮井岡山革命組織，不能揪鬥譚厚蘭，不能限制她的自由，召開萬人鬥爭大會是錯誤的。凡是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歸還。以上指示由原革委會負責處理執行。」

北京市革委會也於當天發布了通告：

1·北師大今天在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的操縱下，推翻師大革委會，非法綁架和鬥爭譚厚蘭與師大革命委員會委員，這些作法都

8 大會的名稱為「打倒林杰，砸爛反動組織五一六兵團，慶祝井岡山造反兵團恢復活動大會」。

9 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北師大問題的緊急通知(1967年9月7日)，載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是完全非法的，都是違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違反中央負責同志最近的講話精神。現宣布無效。應立即恢復師大革命委員會的一切權力。

2. 樊立躍等人自己組織的「專政委員會」是非法的，應立即宣布解散。

3. 樊立躍、黃家林、李五權三人拘留審查。¹⁰

據康生說，北京市革委會的通告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他在講話中還說：「要不制止，會引起連鎖反應，全國都要受到衝擊。」¹¹

中央文革小組當天晚上接見「天派」幾個組織的代表，江青罵道：「你們是蠢木頭、敗家子。叫你們不要管人家的事，你們偏要去，結果出了亂子，上了壞人當。一定要抓（專政委員會的）三個人。回去要開門整風，《北京日報》、市革委會也要開門整風……你們一點毛澤東思想都沒有，回去好好學習姚文元文章（指〈評陶鑄的兩本書〉），好好整風，你們要進行檢查。」

中央文革小組對北師大「九七事件」作出的反應是迅速的，堅決而有力的。王力、關鋒被停職反省後，中央文革小組因為恐怕人們對王、關二人的批判會波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和整個小組，一直對此事保密。「九七事件」發生時，「打倒林杰」的大標語已公開在北京街頭張貼，如不及時制止，勢必很快就會出現一個批判王力、關鋒等人的高潮。中央文革小組也不願意看到在「反擊二月逆流」中為打倒譚震林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師大「井岡山」就此垮台，師大「井岡山」的垮台可能會引起人們對「反擊二月逆流」的重新評價。

王、關被審查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震蕩。在北京造反派中與王、關牽連較多的是「地派」，而「天派」中的一些人則早就開始對王、關有所懷疑。8月31日夜，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幾百人衝擊《光

10 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寫於1967年9—10月）。

11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年9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明日報》社，與報社部分職工發生武鬥。9月1日中午，報社造反派和中央戲劇學院「紅旗文藝兵團」將穆欣綁架。周恩來在接到報社職工報告後，責令將穆欣釋放。穆欣於9月2日向周恩來寫信報告了自己被綁架的經過：

總理：

我昨天下午2時被中央戲劇學院「紅旗文藝兵團」抓去，今晨5時半已回到報社。昨天下午轉了幾個地方，最後一個地方是北航。每次轉換途中及室內行動都蒙住眼睛。

所有看押的人都不談話。午夜前後，在北航有一男一女找我談話，他們提出的主要有這些事：

「交代你分裂中央文革的罪行。」

追問我從小組回報社¹²時誰同我談的話。

「你是五一六兵團的後台。」

「你曉得8月30日發生的『重大事件』麼？你從8月29日到9月1日到甚麼地方開過會？見過甚麼人？同甚麼人打過電話？」

「你同《紅旗》雜誌甚麼人聯繫？你同林杰是甚麼關係？」……

對這些問題，我作了簡單的回答，他們很不滿意，對我說了許多威脅的話，談了十幾分鐘，便把我送回關押的小屋。

今晨4時左右，他們蒙住眼睛把我送到宣武門外，急速把車開走。

因為昨天報社有人向您報告了我被抓的事，知您關注，特把經過簡報如上。感謝黨的關懷。

穆欣 9月2日¹³

由此可知北京大專院校的造反派信息是多麼的靈通，8月30日王、關被隔離審查，第二天他們就探出了風聲。

12 穆欣是8月4日在與王力、關鋒談話後，回報社「參加運動」的。

13 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頁462—463。

9月初，北京街頭開始出現有關王力、關鋒的大字報。9月8日，中央文革辦事組電話通知北京的一些大專院校，讓他們將這類大字報進行覆蓋。電話指示說：「這些大字報不要上街，主要矛頭對準劉鄧陶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¹⁴9月17日，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群眾組織代表時，江青說：「中央的事情你們不要管，很多事情，你們不應當知道。我們要遵守黨的紀律，不應該告訴你們。我們已經解決了的事情，你們還去亂搞。我們有的事情要封鎖到最小的範圍。」¹⁵

二 「鬥私批修」

毛澤東力圖控制局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經他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連續發出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8月25日），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9月5日），關於嚴禁搶奪國家物資商品、衝擊倉庫、確保國家財產安全的通知（9月13日），關於在外地串連學生和在京上訪人員立即返回原單位的緊急通知（9月23日），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10月14日），關於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10月17日），關於各級軍區機關目前不搞「四大」和軍以下部隊堅持正面教育的通知（11月14日）。這些措施一般來說都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也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毛澤東是在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採取這一系列措施的，使這一切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為了對造反派進行一定的約束，毛澤東提出了「鬥私批修」的口號。

早在1967年初全國開始奪權的時候，毛澤東就很注意糾正和克服學生造反派中普遍存在的各種毛病。經他親自審改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就提出：

14 參見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146期（1967年9月10日）。

15 中央首長分別接見大專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年9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必須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去克服自己頭腦中和自己團體中的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分散主義、非組織觀點、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錯誤傾向。所有這些違背毛主席教導的、妨礙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思想和行動，都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都是當前尖銳的階級鬥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映。¹⁶

毛澤東還親自推薦《人民日報》轉載了北京「三司」《首都紅衛兵》報的一篇文章〈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都在不同場合向造反派宣傳了這篇文章。¹⁷北京「三司」的文章說：

我們同時進行着兩個革命：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觀世界的革命。我們同時進行着兩個奪權鬥爭：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自己頭腦裏「私」字的權，只有在思想上徹底奪了「私」字的權，才能保證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徹底勝利。頭腦裏的奪權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必須進行這個鬥爭，這需要有刺刀見紅的勇敢精神。而進行這個鬥爭的最好辦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投入工廠和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和工農相結合。知識分子和工農相結合，乃是克服知識分子種種弱點，實行革命化的唯一途徑。¹⁸

張春橋在一次講話中談到了「鬥私批修」的來歷。他說，在毛澤東乘火車回北京的路上，車上的乘務人員在運動中分為三派。毛澤東找了這三派的人在一起談話，詳細地聽他們在他面前進行了兩個小時的

1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269。

17 周恩來接見鐵道部革命造反派的講話(1967年2月1日)；江青、戚本禹對中央新聞紀錄製片廠群眾代表的講話(1967年2月1日)，均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8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打倒「私」字，實行革命造反派大聯合(1967年1月3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辯論。毛澤東對他們說：你們沒有甚麼根本利害衝突，希望你們聯合。毛還要求他們多做自我批評，不要講對方的錯誤。這些乘務人員並沒有因為偉大領袖說了話馬上就聯合起來了，他們還是照樣互相指責。與毛同行的張春橋和楊成武就幫着做三派乘務人員的工作。工作一直做到離北京還有三個小時路程的時候，張春橋就問這三派的人能不能達成協議？張說，毛主席在一個省也不過就談兩個多小時，跟你們這三派人也談了兩個多小時，還不能聯合，那我看你們回去怎麼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怎麼向群眾交賬。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在離北京還有三個小時路程的時候達成了協議，聯合了。於是就到毛澤東那裏去報喜。毛澤東對他們說，祝賀你們。送你們四個字：鬥私，批修。這就是「鬥私批修」的來歷。¹⁹

毛澤東是要用「鬥私批修」這個口號將造反派引導到他所希望的軌道上去。早在年初開始全面奪權時，毛澤東就曾提出過用軍訓的方法對大、中學校的造反派進行教育，結果並未收到明顯效果。當年6月25日，《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一篇社論時，在編者按中用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毛澤東還說過：「本來想在知識分子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²⁰

10月1日，首都五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建國十八周年大會。林彪在講話中說：「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要鬥私批修。……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用『鬥私，批修』這四個字為綱，加強對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的思想教育。要開辦各種學習班，中央

19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年9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0 毛澤東同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談話記錄，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89—1490。

辦、地方辦，各個革命群眾組織也可以辦，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1967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社論，其中指出：「經過一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派，每一個革命幹部，每一個紅衛兵都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取得了許多正面和反面的經驗。這就為我們大學習、大總結、大提高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社論號召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用整風的辦法，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特別是多做認真的自我批評，把自己頭腦中的『私』字狠狠鬥掉，把利己主義、實用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無政府主義狠狠鬥掉。」11月20日新華社報道，北京市在短時間內辦了各種形式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九千八百多個，參加學習的人近五十萬。

毛澤東號召辦學習班，是想通過這種形式，把他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灌輸下去，保證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11月16日，毛澤東將江西省革籌小組的四條經驗轉發各地。江西省革籌小組認為，形勢不能迅速好轉，一個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聲音傳不下去。毛澤東在這一句後面，加括號寫了一句話：「此種現象在全國很多地方存在。」²¹ 毛澤東大力提倡辦學習班，就是想讓他的聲音真正傳遍全國的每一個角落。

1 毛澤東的南巡講話

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整理轉發了〈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所謂「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說法並不確切。毛澤東7月14日凌晨從北京出發到武漢，「七二〇」事件後於7月21日凌晨乘飛機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差五天兩個月，於9月16日坐火車離開上海，經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9月23日回到北京。華北地區只是離京和回京時路過而已，其實沒有甚麼視察活動。毛澤東原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41—442。

準備在武漢搞一個就地解決大聯合、三結合問題的典型，但還未展開就因為突發事件而匆匆離去。毛澤東在上海住了較長時間，但他在滬的活動內容至今披露甚少。現在收在〈重要指示〉中的，大多數是毛從上海返京途中，在杭州、南昌、長沙、武漢和鄭州五處的談話內容。

毛澤東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把最為混亂的局面稱為「形勢大好」，是毛澤東以他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得出的與常人相反的結論。關鍵在於對待亂的看法。毛澤東說：「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這是一種典型的自欺欺人的說法。在全國大多數地區都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局面的情況下，毛澤東為甚麼還會有這樣的說法呢？因為毛澤東想要根本解決「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已下決心搞掉以劉少奇為首的原中央第一線領導人，打碎舊的體制，他當然不怕亂，甚至希望亂，亂才能暴露問題，暴露敵人。他在這裏講的「敵人」，應該理解為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8月16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見阿爾巴尼亞兩位外賓時說：「有些地方還要亂一些時候，亂是好事。有些外國朋友問我，為甚麼你們高興亂呢？如果沒有大亂，矛盾就不能暴露。」他在這次談話中還說：「凡是爛透了的地方，就有辦法，我們有準備。凡是不痛不癢的，就難辦，只好讓它拖下去。」²² 在毛澤東看來，有些地區兩派對立，搞大規模武鬥，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是好事。他說：「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廬山、贛州經過大武鬥，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²³

22 毛澤東同萬捷爾、莫依修、繆非特、穆希談話記錄，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99—1500。10月12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時又說：「為甚麼我們不怕亂呢？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見同書頁1509。毛澤東曾向他身邊的護士吳旭君說：「你總說『亂』。你沒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條：這個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見同書頁1486。這個材料是在事隔三十五年後訪問吳旭君的談話記錄。

23 毛澤東同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的談話，1967年7月14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91。

據楊成武回憶，毛澤東在講「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這句話的時候，緊接着說：「全國在春節前就差不多了，解決了。」並且說：「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結束，不能再搞了。」²⁴毛澤東對未來形勢的樂觀估計是盲目的，他顯然是低估了混亂局勢的嚴重性。9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與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的一次長談中說：「現在有七個省、市的革命委員會是比較好的（按：指上海、北京、山東、山西、黑龍江、貴州、青海），還有幾個省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今年還有不到四個月，可不可以再解決十個省？如果再解決十個省，形勢就很好了。」²⁵實際情況是，到1967年底，全國僅增加了內蒙古自治區和天津市兩個省一級的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所預期的「再解決十個省」的想法大部分落空了。

毛澤東反覆號召各地的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群眾組織的分裂，從根本上來說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結果。毛澤東要在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消除派性，當然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認為派性和武鬥都是有階級敵人在背後操縱指揮。張春橋在接見江蘇代表團時說：主席講，一個工廠工人為甚麼分成兩派，究竟是為甚麼分裂了？而且是你死我活的。無非是，第一個原因是黨內走資派操縱、挑撥的，調查一下各個方面，沒有逃出主席這個估計的，都是有人挑動。第二種是造反派內部混入了壞人，這些人是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美蔣特務、壞蛋，利用造反派的某些錯誤，不正確思想來搞陰謀活動。²⁶毛澤東在一次同外賓的談話中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過。等到事情出來以後，就看出了現象。」「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鬥爭。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

24 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頁40。

2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00—1501。

26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年9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鬥的幕後指揮。」²⁷毛澤東的這種分析和判斷是錯誤的，在這種錯誤的判斷下提出的解決辦法還是要抓階級鬥爭，抓壞人，當然也就很難收到理想的效果。

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正確對待幹部，說幹部的大多數是好的，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這些話從字面上看沒有甚麼不對的，但從根本上說，毛澤東本人就不能正確對待幹部。在對國內、黨內形勢作出極端嚴重判斷的前提下，製造出了莫須有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將大批幹部劃入了走資派的範圍。在這樣嚴重混淆敵我、混淆是非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正確對待幹部？不過，毛澤東在談話中多次講，在對幹部進行批判鬥爭時要用文鬥，不要搞武鬥，也不要搞變相的武鬥。這些對改善廣大幹部的處境多少有些好處。

毛澤東要求對「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加強教育，告誡說：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文革開始以來，全國數以千萬計的大中學校學生捲入了運動，在一年多的運動過程中，暴露出他們身上的許多問題、缺點和弱點，一些造反派頭頭和打、砸、搶分子甚至犯下了嚴重的罪行。毛澤東在談話中批評了造反派身上存在的派性、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思想——懷疑一切、「以我為核心」等等。但實際上，紅衛兵所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響應了他本人的號召炮打司令部，造走資派的反。而對這一點，毛澤東始終是肯定的。²⁸

毛澤東在江西的談話中，還提出了要批評極左派思想。他說：「幹部垮得這麼多，究竟是個好事還是壞事？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這種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與社會上壞人勾結在一起。我們不是專為保守派說話，是教育左派的問題。」²⁹1966年底和1967年

27 毛澤東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的談話，1967年12月18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15。

28 5月16日，毛澤東在會見剛果外賓時說：「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我們政府、中央、公安部毫無辦法，紅衛兵、群眾一起來，就有辦法了。幾十年我們不清楚的事，紅衛兵一鬧就清楚了。」「你不借紅衛兵的力量，甚麼法子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86—1487。

29 毛澤東同程世濟等的談話，1967年9月17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04—1505。

以後，部分大、中學校學生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許多做法不滿，將中央文革小組某些成員和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一些激進的造反派稱為極左派，將他們宣揚的文化大革命思想稱為極左思潮。毛澤東當然不會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那是保守派的看法。他認為所謂極左派，實際上是犯了懷疑一切錯誤的左派。196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江西省革籌小組正確對待極左派的經驗。這份文件認為，極左派中絕大部分群眾是老造反派，有的單位(如醫學院)在「火燒省市委」時期有較大貢獻。他們的主要錯誤是以反右傾為名，一度把矛頭指向省「大聯籌」和省革籌小組。不能用打砸搶的辦法來對付極左派，而應耐心地同他們講道理。³⁰

在〈重要指示〉中問題最大、造成後果最嚴重的是毛澤東關於群眾專政的說法。毛澤東在談到向壞人專政的問題時說：「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例如，北京大體就是這樣做的。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政府只宜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人。一個組織裏的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看到這些說法時，會使人聯想到延安搶救運動時，毛澤東曾提出過「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口號。其實，在對那個口號的理解上也存在着較大的誤區。³¹政府和公安機關大規模捉人當然不好，但將其捉人權下放給「群眾」則更糟。所謂「北京大體就是這樣做的」，是指1966年底北京出現有人懷疑和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即所謂「十一月黑風」、「十二月黑風」時，各造反派組織爭相將懷疑、炮打中

30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轉江西省革籌小組正確對待極「左」派的經驗(1967年12月2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1 一般認為這個口號體現了毛澤東與康生的區別，挽救了大批黨內幹部的生命。但仔細研究後即可發現，毛澤東並非認為「搶救運動」方向錯了，而是着眼於將運動向縱深方向推進。毛澤東曾明確指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一個不殺則特務敢於坦白，大部不抓，則保衛機關只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由於讓「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多數」，於是出現了成千上萬件的冤假錯案。「搶救運動」的詳情可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一書。

央文革小組的人進行批判、鬥爭，一般在揪鬥過後還要將人「扭送」公安機關。謝富治在一次大會上講話說：

不要軍隊，更不要公安機關抓人。毛主席講：北京大體上是按照這樣做。是群眾扭送的多，公安機關抓的少。但是有點沒有做到，就是群眾左派扭送的多，現在來看，沒有一個是保守派自己送，像聯動分子大多數是革命群眾扭送的，保守勢力送來的一個也沒有，都是左派送來的，這比公安機關就先進了一大步。如果做到保守勢力自己抓，這個工作還很艱巨。政府可以在廣大群眾要求下，加以協助，抓少數壞頭頭。這個我們不是沒有做過，有些學校要我們抓人，我們派了人去，但主要還是靠他們，我們主要是協助。³²

政府、公安機關在「左」傾思想指導下，在政治鬥爭中往往會犯擴大化的錯誤，會犯混淆敵我的錯誤，但一般行動還有章可循，造成的危害大多還能夠有所控制。而群眾專政一來，那真是無法無天了，甚麼駭人聽聞的事情都能發生，造成的危害極其巨大，私設公堂成為普遍現象，濫殺無辜的事件時有發生。在群眾專政的口號下，成千上萬的生命被剝奪，國家和民族遭受史無前例的浩劫。

在〈重要指示〉中沒有將毛澤東關於「武裝左派」的言論整理進去，恐怕是出於對形勢失控的擔心所致。但武裝左派一事對整個形勢的影響極大，後果極為嚴重。現有關於文革的著作對此要麼不置一詞，要麼語焉不詳。³³

32 謝富治在公安部門鬥爭羅瑞卿大會上的講話(1967年8月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3 董保存：《政治漩渦中的楊成武》一書(見於互聯網上「亦凡公益圖書館」[shuku.net])披露了毛澤東在這一時期關於武裝左派的一些說法，摘錄於此，供參考：

1967年7月18日晚，毛澤東在同陳再道、鍾漢華等人談話時說，江西為甚麼基幹民兵可以有槍，為甚麼紅衛兵不可以有槍。毛主席有點為紅衛兵鳴不平，他說，如果劉培善有氣魄，就把民兵的槍支收回來發給紅衛兵。

8月3日上午，楊成武奉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之命，從北京飛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毛主席聽到湖南打算武裝長沙一萬工人左派時，表示同意。毛主席還詳盡地介

2 復課鬧革命

為了做出響應黨中央號召，緊跟毛主席戰略部署的表示，10月13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在北京林業學院舉行了首都大專院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開學典禮。出席典禮的一些造反派頭頭紛紛表示要以「鬥私批修」為綱，「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老五篇³⁴」，開展批評和自

紹了上海準備武裝十萬工人的做法。主席說：「張春橋寫了一個報告，準備武裝上海十萬左派工人，分三步走：第一步組織起來，第二步發一部分槍，第三步全部發槍。他們有一百多萬工人，武裝起十萬就好了，不脫產的。」毛澤東還指示楊成武好好看看張春橋的報告。主席一邊闡述自己的意見，一邊發問：槍在右派手裏好呢？還是在左派手裏好呢？人武部當然不是全壞的。毛主席主張：正規軍的槍奪了不要緊，以後再發嘛！主席說：聽說四十七軍有個團長槍被奪走了大哭起來。這是個好團長。右派搶去了哭是對的，左派搶去了就不要哭。他說：武裝左派問題，把農村的槍統統收起來，以後發到左派手裏。發槍主要是城市，首先是城市，一定要在左派佔了絕對優勢，才算條件成熟。但將來呢，左派還會有分化。右派佔優勢，不能發；左右派勢均力敵的，也不能算條件成熟，還是不能發。那麼，究竟怎麼武裝呢？毛主席主張，先組織起來，可以先發木槍。解放軍派人去幫助訓練，把政治、軍事訓練好。

8月4日，毛主席聽取了從武漢來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靜匯報武漢「七·二〇事件」後的情況，並讓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也參加了旁聽。余立金談到：由於兩派之間的鬥爭加劇，都在搶奪武器，應該設法制止。

毛澤東對此看得並不太嚴重。他說：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爛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轉。不痛不癢的就會拖下去，全國奪的槍，只有二三萬枝嘛！

然而事態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複雜嚴重得多。過了不到一個月，全國各地被搶的槍支達48萬至50萬之多！毛澤東聽了仍說：那有甚麼了不起，三四十萬枝有多少喲？不多！50萬枝有多少喲？不多！光全國民兵武器就有350萬枝嘛。

1967年9月17日，毛澤東在南昌與程世清、楊棟樑等人談話時，程世清在匯報中說，中央九五命令後十幾天的時間，收到了群眾交上來的槍達五萬多枝，他們用這些槍武裝了一個工人團、兩個營又一個連。毛澤東插話說：「哦，武裝工人，這個好。」在講到搶槍問題時，毛澤東問：「槍，基本上是搶的還是發的？或者是以借的名義？」黎原、章伯森實話實說：「是軍區發的。」「槍發給左派了，現在他要送回來，給你們保管好了槍，不然右派又搶走了，這是個好經驗。」

34 指毛澤東的五篇著作：〈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我批評，在靈魂深處大鬧革命」。大部分人都是在作表面文章，只是因為當時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圍剿派性」的要求，因此不能不作出一點姿態。學習班根本沒有解決甚麼實質性問題，結果只能是草草收場。

為了在社會上造成一種圍剿派性、促進大聯合的強大聲勢，各大報刊上大力宣傳北京市紅衛兵大聯合的成績。據當時新華社的報道，在10月中旬，北京衛戍區軍訓指揮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大力舉辦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329所中等學校的1729名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參加了學習班的學習，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到10月23日為止，有230餘所中學在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和駐京部隊軍訓人員的幫助下，各派紅衛兵實現了大聯合，學校也建立起了臨時權力機構，學生們都回到了班級，進行復課鬧革命和開展「革命大批判」，進行學校內部的鬥、批、改。在10月下旬，又報道北京航空學院、北京農業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地質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北京礦業學院、北京體育學院、北京政法學院、北京林業學院、北京水利電力學院等一批高等學校陸續復課的消息。

作為消除混亂現象，圍剿派性，使紅衛兵返回學校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央強調大、中、小學都要復課鬧革命，中央關於復課鬧革命的通知在全國城鄉學校普遍張貼。

中共中央曾在1967年初號召中、小學復課鬧革命，但是在所謂反擊「二月逆流」以後，復課鬧革命受到嚴重衝擊。後來，因為在奪權問題和軍訓問題上的矛盾，北京大、中學校的紅衛兵普遍形成了分裂，絕大多數學校裏出現兩派對立的局面。從全市範圍來說，大專院校紅衛兵分成了「天派」和「地派」，中學紅衛兵分成了「四三派」與「四四派」，並導致在1967年2、3月間成立的大、中學校紅代會形同虛設，「大聯合」徒具虛名，派性鬥爭更加激烈。因為在1967年夏季時，人們關注的重點是社會上的事件，許多學生在外地串連，不曾返校，所以校園內的惡性武鬥事件還未成為普遍性的大問題。根據中共中央通知的要求，不僅所有滯留在外地的北京學生都要返回學校，而且還要復課鬧革命，所以必須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才能保證中央戰略部署得以實施。

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中、小學一律立即開學；各學校都必須認真執行毛主席關於鬥私批修的指示；一切大、中、小學校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在教學的實踐中，貫徹實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逐步提出教學制度和教學內容的革命方案；各學校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建立革命三結合的領導班子。〈通知〉還提出：各大、中、小學校都要立即積極籌備招生的事宜。³⁵

10月19日，北京市革委會發布〈關於貫徹執行《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的決定〉，要求「全市大專院校、中等學校(包括中等專業學校、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學校)和小學校一律立即開學，復課鬧革命。各校所有師生員工必須立即回校，經教育仍不到校者，應給以必要的紀律處分」。在這之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於9月7日發出了〈關於一九六六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人民日報》11月1日發表了題為〈在新的考驗面前〉的報道，報道了北京郵電學院1966屆畢業生在填寫畢業生登記表時，堅決響應黨的號召，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堅決服從組織分配的消息。這實際上是向全社會公布即將對滯留在校的畢業生進行分配的信息，同時也是在宣布學校裏的運動將進入最後階段。這種消息的發布，無疑是把學生召回學校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在這樣一種輿論宣傳和行政措施的召喚下，分散在外地，或者游離於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外的「逍遙派」們都陸續回到了學校，回到了班級。從這時開始，紅衛兵的活動範圍基本上被限制在校園裏，不再允許他們八方串連，四處點火，在各地設立聯絡站，參與社會上的奪權和派性鬥爭。這種情況表明，紅衛兵的地位和作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紅衛兵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已遭嚴重削弱。

在要求學生們返回學校的同時，對於返校後學生們的活動，當時也做出了統一的部署和安排。10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長江日報》

35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93。

10月22日的社論說：「復課鬧革命的中心是鬧革命。當前復課鬧革命，主要是以『鬥私批修』為綱，……特別要狠抓本校內的鬥、批、改。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主課。」遵照這種精神，返校的紅衛兵和師生們即根據當時在社會上佔主導地位的「左」傾思潮和理論，進行所謂的教育革命。當時也確實熱鬧和紅火了一陣。儘管這些活動都是少數人的活動，但在宣傳上卻是不遺餘力的。11月3日，《人民日報》報道，北京林業學院在教育革命中決定取消原來的教研室，改為建立「專業連隊」來領導教學和教改的經驗；還報道了北京師範大學教改組就考試制度、升留級制度、招生制度的改革所作的設想。

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教育革命的幾個初步方案〉³⁶以供討論。在編者按中說：「毛主席最近教導我們：『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這一條毛澤東語錄的發表，引起了北京一些老紅衛兵的注意。清華附中紅衛兵在11月6日編印的《挑戰》報上發表了〈復課鬧革命，還是復古反革命？！〉一文，針對當時關於教育革命的宣傳中一些「奇談怪論」進行了反駁：

有人說，復課鬧革命，要「邊教邊改」。邊教邊改嗎？教甚麼，改甚麼，都是有強烈的階級內容的。這個口號根本就沒有觸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這一根本問題，它絲毫無損於資產階級的一根毫毛。在這個口號下，最多只能帶來一些教材的改革，這是資產階級完全可以接受並且歡迎的。它是立字當頭的，因此它不是馬列主義的，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有人說，「復課就是革命」，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折衷主義。不把舊的一套砸爛，就只能復古，就只能復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課，這裏有甚麼革命可言呢？有人說，「該畢業了，還是誰有本事誰上大學！」在無產階

36 毛澤東批准發表了上海同濟大學、北京林學院、北京師範大學革委會等的三個教改方案。

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了一年半的今天，出現這種論調，豈不發人深醒嗎？³⁷

這些中學生天真地認為，現在發表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語錄，這本身可能就是對前一階段宣傳的一種否定。老紅衛兵正可以利用這個有利時機，衝上教育革命的第一線，建立新的功勳，一舉擺脫長期沉悶被動的局面。

11月8日，以清華附中紅衛兵「五二九戰團」、「八一兵團」的名義，發表了一篇在當時有一定影響的文章——〈評最近一時期教育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方向〉，文章矛頭直指《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人民日報》10月25日的社論〈大中小學都要復課鬧革命〉。文章說：

現在許多中學的「教育革命」和《人民日報》那篇社論所鼓吹的「教育革命」並不是甚麼新鮮貨色。蔣南翔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早就搞過。他們也搞甚麼教材改革，甚麼方法改革，甚麼邊教邊改，甚麼學生當老師之類。這種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沒有絲毫共同之處，它完全是背離無產階級政治的，完全是為培養修正主義苗子服務的。它閹割了無產階級的政治靈魂，抹煞了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強烈的階級內容，磨滅了其革命的鋒芒，把教育革命完全變成為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的東西。……這篇社論實際上違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代表了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思潮。這一股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歪風吹得到處都是，成為當前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主要的頑固阻力，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³⁸

這樣點名跟《人民日報》叫板在當時並不多見。幾天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跑到清華附中說：「聽說清華附中老紅衛兵反對教

37 清華附中紅衛兵：〈復課鬧革命，還是復古反革命？！〉（1967年11月6日）

38 清華附中紅衛兵五二九戰團、八一兵團：〈評最近一時期教育革命中的資產階級方向〉（1967年11月8日）。

育革命，我特地來向他們請教。」³⁹他當然不是要和老紅衛兵討論教育革命的問題，不過是說些挖苦的話，表明在教育革命問題上，中央文革根本不同意老紅衛兵的意見。

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認真學習和堅決執行《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學校中掀起學習和執行這一文件的群眾運動以推進教育革命。《毛主席論教育革命》是由陳伯達等人摘編的一本小冊子，書中收錄了毛澤東在1927年至1967年間發表的有關教育工作的書信、語錄等共五十一條。中央通知中說：「這是我們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偉大綱領」，「這是復課鬧革命的根本指針。它不僅對於大、中、小學校的教育革命，而且對於各條戰線的鬥、批、改，都具有十分巨大的指導和啓示作用。」⁴⁰

為了進一步穩定全北京所有高等院校內部的局勢，使得返校學生能盡快實現以教學班為基礎的大聯合，北京市革委會根據中共中央當時的有關指示精神，決定通過北京衛戍區在全市部分大專院校開展軍訓。

1968年1月中旬以後，全市所有大專院校都陸續進駐了由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或軍政訓練團。在此期間，一部分院校陸續開展了軍訓活動，一部分院校在駐校解放軍宣傳隊的組織下，開展了「鬥私批修」，辦學習班等活動。在一些相對穩定的學校，1966屆畢業生分配工作也已經開始進行。

通過這一系列措施，使得北京大、中、小學校都陸續出現了復課的氣象，特別是中、小學校。有的學校師生們開始修理在運動中被破壞的門窗和桌椅板凳，有的學校教師和學生一起編寫教材，在一些小學校裏不時地傳出齊聲朗誦毛澤東語錄的聲音。但這一切只是表面現象，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廣大師生和紅衛兵組織間造成的矛盾和派性分歧，並沒有通過復課的活動而消除，學生中的對立情緒依然十分

39 陳伯達謝富治在清華大學附中的講話（1967年12月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0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644。

嚴重。雖然不同觀點的學生可以回到同一間教室，但實際上仍然是人以派分。這種現象在中學高年級和大專院校中更為嚴重。因此，消除派性還是個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即使學生全部返回學校，也難以真正恢復校園內的秩序。

1967年12月16日，謝富治、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紅衛兵座談會，把北京市大中學校的一些主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召集在一起，傳達毛澤東關於整頓紅衛兵和共青團的指示，徵求關於如何進行整頓和今後紅衛兵與共青團的關係等問題的意見。

謝富治雖然比戚本禹職務高、資格老，但他還是和往常一樣主動擔當配角，他說：「我和戚本禹同志一起來向你們請教，最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要了解一下如何整頓共青團和紅衛兵，委託我們兩人找你們談一談，整頓紅衛兵和共青團的問題，戚本禹同志管這方面的工作，我今天算陪客。」

戚本禹此時處境已經不妙，江青懷疑他在整自己的「黑材料」；而且他和已經被隔離審查的王力、關鋒關係密切，在諸如「懷疑一切」、「揪軍內一小撮」等問題上，戚本禹的言行比王、關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垮台已經是早晚的事了，不過外界對此尚不知情。戚本禹說：「毛主席說，要整頓紅衛兵和共青團。我們今天找一部分人，大部分是一般群眾，有老紅衛兵、新紅衛兵，一些小頭頭，各方面都找了些代表。主席給紅衛兵的信發表一年多了，紅衛兵存在哪些問題，要整頓組織。……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重大作用，應該整頓、鞏固、發展。」「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小將們徵求一個意見，要不要恢復已經癱瘓的共青團。」

座談會上意見紛紜，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意見：

一、共青團與紅衛兵並存，共青團是先進青年組織，紅衛兵是群眾組織，類似基幹民兵。(戚本禹問：「兩者組織上如何分工？」)

二、取消共青團，用紅衛兵代替。紅衛兵實際上已經代替了共青團。原來的共青團是全民團，紅衛兵是新生事物，主張全國設紅衛兵代表大會，下設紅衛兵總部、分部、支部。(謝富治問：「用紅衛兵代替共青團，可解放軍沒有紅衛兵，工廠、農村大部分也沒有紅衛兵怎

麼辦？」有學生答道：「把工廠、農村的共青團改為紅衛兵，解放軍內不要紅衛兵，紅衛兵就是解放軍的後備軍，解放軍裏好的同志就可以入黨了。」)

三、用共青團取代紅衛兵。

四、學校用紅衛兵，部隊、工廠、農村用共青團。(有人問：如果紅衛兵從學校轉到工廠、農村怎麼辦？)

值得注意的是，到會學生中絕大多數的意見是要保留紅衛兵，而同意以共青團取代紅衛兵的，恰恰是最先創立紅衛兵組織的清華附中的老紅衛兵代表，他說：「我贊成恢復共青團。紅衛兵雖然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但發展到目前已經難以保持先進性。一是它沒有絲毫的年齡限制；二是沒有嚴格明確的政治標準，弄得現在人員過雜、魚目混珠。所以我再說一遍，贊成恢復團組織，請向毛主席報告。」⁴¹

關於紅衛兵、共青團整頓的內容，與會者提出：「要徹底批判修正主義的建黨路線、彭氏階級路線、馴服工具論等修正主義貨色，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整頓小資產階級派性、搖擺性、無政府主義、組織性紀律性鬆懈等資產階級思想。」

關於最終是由紅衛兵取代共青團，還是由共青團取代紅衛兵，中共中央並沒有表示過明確的態度，但在那破字當頭的年代，紅衛兵取代共青團成為既成事實。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北京市香廠路小學取消少先隊、建立紅小兵的一份材料。這份材料認為：「少先隊基本上是一個少年兒童的全民性組織，它抹煞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根本不突出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先鋒戰鬥作用。」而「紅小兵團是少年兒童的一種很好的組織形式。它富於革命性、戰鬥性，有利於推動少年兒童的思想革命化」。據此，全國小學以紅小兵取代少年先鋒隊達十一年之久。少先隊是被紅小兵徹底取代了，而共青團則在幾年後又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共青團與紅衛兵在全國的中學裏共存了近十年的時間，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8年，才最終由共青團取代了紅衛兵。

41 詳情參見葉曉鷹：〈紅衛兵之旗〉，《傳記文學》，1990年第2期，頁49。

3 籌備九大

1966年8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準備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再開，現在要準備」。當時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搞一年就差不多了。1967年9月，毛澤東從上海返京途中幾次談到召開九大的問題。9月19日，毛澤東在武漢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的談話中談到了他正在考慮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他說：「要開一次九大，準備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後年1月份召開。」9月20日，他在武漢同曾思玉、劉豐等人的談話中又說到召開九大的問題，他說：「我看明年秋季9月份開，至少後年1月份開。」⁴²

毛澤東指示張春橋、姚文元就如何準備九大的問題在上海做些調查。姚文元於10月11日向毛澤東寫信說：絕大多數人的意見，都希望早開(九大)，多數主張在明年上半年，至遲不超過明年秋天。代表由各方協商產生。紅衛兵說，要多一些工人和紅衛兵代表列席大會，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紅衛兵入黨。不選劉、鄧、陶、彭、羅、陸、楊，劉少奇是叛徒，要進一步批臭，清除出去！「恢復黨組織」這個口號不妥，容易曲解為恢復原狀，應為整頓和改造。劉少奇一套修正主義貨色尚需繼續大力批判。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於10月21日向全國發出〈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並轉發了姚文元的信。⁴³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向中央請示，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了批示：中央認為各地都應當這樣做。但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活。黨組織應當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⁴⁴

4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05—1506。

43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598—599。

4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600—601。

11月5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着重談了關於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其實，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軍，也是整工、青、婦、學。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當然，壞人還是搞不乾淨，一次搞乾淨，是不可能的。整黨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統統整好。九大以後，根據新的黨綱、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我贊成康生同志意見，一個是叛徒、特務，一個是文化大革命當中表現很壞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這就很寬了。毛澤東談到黨要吸收新鮮血液，要吐故納新。他說：恢復組織生活，不要恢復老樣子。有些黨員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積極，一聽說要恢復組織生活，他們又神氣起來了。我看這些人要檢討。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不積極，甚麼理由？無非要做馴服工具。這樣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檢討。黨綱要修改。組織紀律性還要有，但我們講的是自覺的紀律。盲目服從，做馴服工具不行。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經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63年搞了個十條，才隔三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後十條，也不徵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廢除級別問題，也要談一談。⁴⁵

在着手籌備九大和整黨工作的時候，毛澤東認為需要對文化大革命從理論上加以總結，以利於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實鞏固下來。由陳伯達等人起草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關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這篇文章首次將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作了概括：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

45 陳東林、杜濤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34。

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文章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上述這些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的觀念，天才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這篇文章是陳伯達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他們歸納的六條，是把毛澤東的一些話串到一起，編起來加以解說。陳、姚文章寫成後，送給毛澤東看，毛認為可用。這六條基本上可以概括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思想。

龔育之曾對這一理論作過很好的批判。他說：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書最後說：「只有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下，社會進化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這以前，在每一次社會全盤改造的前夜，社會科學的結論總是：『不是戰鬥，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這裏區別了兩種不同的社會歷史情況：一種是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社會進化歸根到底必然要通過政治革命，即「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另一種是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社會進化不再通過政治革命，不需要也不應該繼續採取「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情況，因為在一定範圍內還存在着階級鬥爭，這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就是

說，還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進行破壞社會主義活動的分子的鬥爭。但是，就社會的基本情況說，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取得了政權，改造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後，已經不存在整個社會的階級對抗，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即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已經不需要也不應該繼續發動「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所號召的卻正是這樣的「政治大革命」。這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剝削階級專政的社會歷史條件混為一談。所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而「革命」又是在它的原義，即推翻現存的統治階級的意義下來使用，這本身在理論上、在邏輯上就是荒謬的，在實踐上造成了自己亂了自己的內亂。⁴⁶

11月，各地陸續上報了一批關於召開九大的意見，毛澤東看後提出，要把第一批材料綜合一下，通報全國，並繼續徵求意見。於是，就由中央文革小組整理了一份通報，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義於11月27日發出。這份通報以群眾意見的形式，着重提出了以下意見：

一、九大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就是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總結八大以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特別是總結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總結歷史上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修改黨綱、黨章，整頓和純潔黨的組織，選舉無限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中央委員會。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並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二、徹底批判八大的黨綱、黨章和劉鄧在八大的報告，九大的新黨綱、黨章，一定要突出毛澤東思想，一定要貫串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46 龔育之：〈關於「繼續革命」的幾個問題〉，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85-86。

紅線，一定要充分反映毛主席在黨的建設方面對馬列主義創造性的、劃時代的新發展。

三、九大要大講特講黨的歷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並加以總結。要編寫一本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歷史的材料，要編印毛主席有關這方面的論述，用以教育黨員和幹部。建議中央作出新的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代替有錯誤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四、把隱藏在黨內的叛徒、特務、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統清除出去，以根絕隱患。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一批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有才能的新生力量應選入中央委員會。

五、建議1968年國慶節前召開九大，九大過後接着開「人大」，把劉少奇罷掉，解決國家主席問題。九大規模要大，人數要多，代表產生採取自上而下、上下結合、內外結合、各方協商的方法，要多選一些部隊、工人、貧下中農和紅衛兵的代表參加大會。⁴⁷

以上這些意見假群眾之名，實際上表達了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召開九大的一些想法，通報中所列各條，後來成為各地修改黨章所遵循的指導思想和準則。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由以上中央文件的發出可知，毛澤東確實是想盡早召開九大的。但形勢的發展遠比毛澤東預想的要慢得多，一直到1967年底，全國一共只有九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還不到全國的三分之一，召開九大的問題只好向後推遲。

三 動亂在繼續

總的來說，1967年7、8、9三個月之後，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努力下，全國動亂的局勢有所緩和，一些武鬥最厲害的地區如湖北、安

47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636--637。

徽、江西、浙江等地的局勢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全國動亂的大環境仍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毛澤東對待「亂」的態度沒有改變，他還是堅持「大亂才能大治」的觀點。10月12日，毛澤東會見由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毛澤東在談話中說：我們要全面解決還得幾個月，我們準備三年，到今年6月1日算一年；大體上過一段時間，亂得最厲害的地方也好辦了。不痛不癢的地方不好辦。這種群眾運動打內戰，這麼一打，就分清了甚麼是左派，甚麼是右派。右派搞「農村包圍城市」。我們現在有計劃地武裝工人，武裝革命左派。外國人講中國天下大亂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謠的；有些地方我們還嫌它亂得不夠。為甚麼我們不怕亂呢？因為你不讓他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武漢問題是我去鬧起來的，我就不相信武漢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漢，一直到21日才離開。我說我捅了一個馬蜂窩，它不咬人嗎？它沒有下決心咬我，也沒有下決心咬總理。武漢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此外，還有公檢法，打得厲害，我是高興的。過去的公安、檢察、法院有好人，但是也有壞人。這次暴露出來了，武漢公檢法不是分為兩派嗎？那一派垮下去了。⁴⁸

1 安徽：倒過來解決問題

1967年夏天，安徽武鬥嚴重，混亂局勢難以控制。毛澤東親自決定調原駐江蘇北部的十二軍去安徽。7月29日，周恩來向趕來北京的十二軍軍長李德生交代任務說：「安徽武鬥太厲害，已影響到中央的指示貫徹不下去，軍管會指揮不靈，難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緊急動員一下，立即帶部隊去安徽。去了以後不要陷到派性裏去，要廣泛聽取意見，深入調查研究，把情況搞準確，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眾工作，總起來說就是制止武鬥，消除派性，促進聯合，穩定局勢，抓革命，促生產。」⁴⁹

48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冊，頁328。

49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348。

中央決定，安徽的「三支兩軍」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有關「三支兩軍」的問題，直接向黨中央、中央軍委請示報告。所有駐皖部隊的「三支兩軍」由十二軍統管，省軍區獨立一師、二師劃歸十二軍指揮。為了便於統一指揮，中央任命李德生為安徽省軍管會主任兼安徽省軍區司令員，十二軍政委張文碧任安徽省軍區政委。

8月6日開始，十二軍部隊進駐安徽各主要地市及武鬥最嚴重的地區。李德生要求部隊：不管遇到大小武鬥，要堅決把兩派人員隔開，哪怕受到傷亡，做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決不開槍。

8月8日晚，安徽兩派在合肥市爆發武鬥，十二軍派出幾十名機關幹部，帶領三個連隊趕到武鬥現場，舉着《毛主席語錄》，勇敢地插到兩派武裝火線中間，組成人牆，用高音喇叭宣傳政策。幹部戰士冒着遭受毆打和槍彈襲擊的危險，勸阻參加武鬥的人員，收起武器，停止鬥毆和開槍，終於將一場大武鬥平息。

這場武鬥制止後，十二軍黨委再次要求已進駐安徽各地的部隊，採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犧牲，堅決迅速制止各地武鬥。

淮南一些武鬥組織，不但在當地搞打、砸、搶，還開着火車出去搞武鬥，部隊勸阻、說服無效之後，軍領導命令部隊組織成連的人員「臥軌」，終於將其制止。屯溪一帶的武鬥組織，開着汽車外出武鬥，部隊戰士又以「臥路」的辦法將這些汽車擋回。

經過採取果斷措施，安徽各地的武鬥逐步被制止，形勢有了好轉。此後，部隊佔領各城市的制高點，在交通要道派駐小分隊，並派出巡邏隊日夜巡邏，嚴禁武鬥活動，維護社會秩序。

在此期間，李德生多次親自深入各派組織，了解和掌握他們的真實情況，做他們的工作。十二軍、省軍區和所有安徽駐軍明確表態：堅決按照中央關於解決安徽問題的指示辦事，對兩派群眾組織一視同仁，公平對待，實行「一碗水端平」的政策。

〈九五命令〉下達後，十二軍抓住時機，大造輿論。軍管會迅速將〈九五命令〉翻印張貼。部隊和群眾組織都出動宣傳車，從早到晚流動廣播。部隊派出大批收繳武器分隊，深入到群眾組織各據點，動員他

們交出武器。僅兩天時間，即收繳各種槍支近30000枝，火炮290門，以及大量彈藥和凶器。

毛澤東看到新華社《國內動態》登載的十二軍在安徽制止武鬥、收繳武器的情況後，於9月13日親自將這一經驗批轉全國。

安徽武鬥問題得以暫時解決，李德生和十二軍功不可沒。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央在安徽兩派問題上採取了「一碗水端平」的政策，沒有將兩派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而是稱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⁵⁰

李德生到達安徽後，聽取了省軍區領導的情況介紹，又組織力量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聽取了多方面的意見，對安徽造成嚴重武鬥的原因，有了一個基本的看法：這就是因為奪權形成兩派，因為分派而形成對立，因為對立而爆發武鬥，這也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一個共同特點。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倒着來，也就是首先制止武鬥，再實現聯合，然後組織「三結合」，「把領導權掌握起來」。李德生認為這是落實周恩來指示，解決好安徽問題的基本思路。⁵¹

所謂倒過來解決問題，實際上就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從目前最緊急的問題入手，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標不治本。

2 「晉東南辦法」

山西省原來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紅總站」，「紅聯站」後來轉化為「總站派」和「兵團派」，劉格平、陳永貴所支持的「總站派」與山西省軍區支持的「兵團派」形成勢不兩立的對立組織。中央文革小組在山西問題上是明顯站在劉格平、陳永貴一邊的。1967年11月28日至12月27日，中央在北京召開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強調要嚴禁打、砸、搶、抄、抓，立即刹住武鬥歪風。他命令拆除一切武鬥工事，不准衝擊軍事機關、不准揪鬥、圍攻解放軍指戰員。儘管會議上批評了

50 《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1967年3月27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72—373。

51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頁353。

劉格平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及其許多做法，但會議的實質內容還是支持劉格平這一派的。會議決定將山西駐軍的「三支兩軍」工作由山西省軍區交給六十九軍黨委領導。眾所周知，山西省軍區是支持「兵團派」的。與此同時，經中央批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通知，提出關於晉東南各派立即停止武鬥的六條協議：立即停止武鬥；立即撤走從農村及外縣調到臨汾準備參加武鬥的全部人員；任何群眾組織都不能以任何藉口搶奪人民解放軍、民兵、公安機關的武器彈藥；不准搶奪國家、集體和個人的糧食、糧票、財物；要歸口鬧革命；保證正常的民主權利等。

劉格平曾在山西傳達了一段經中央文革小組授意的「最新最高指示」：「要跟六十九軍的同志們說一下，要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主持六十九軍工作的副軍長謝振華對此持懷疑態度。他認為，毛澤東對部隊的指示應由中央軍委傳達，現在卻由地方上的劉格平來傳達，而且是由劉來傳達支持他本人的「最高指示」，這有點不符合邏輯。謝振華主持領導山西的「三支兩軍」工作後，並未積極支持「總站派」，因此遭到造反派的忌恨。

1968年2月22日，謝振華派代表到長治飛機場候機室，主持了晉東南兩派頭頭的停火談判。謝振華要求部隊在候機室外重兵布防，樓頂四個角上架起了四挺機槍，以防兩派武裝衝擊會場。由於解放軍的威勢，加上調解代表的努力工作，兩派頭頭最終同意將武器交給部隊。從此，晉東南炮火連天的武鬥遭到遏制。

一周後，周恩來就廣西韋國清電話請示可否派一個營的兵力去追回被廣西造反派組織搶走的解放軍某部的武器彈藥一事，作了批示：「如一個營兵力不行，可調兩個營去包圍，進行強大的政治攻勢，照晉東南辦法，逼近其工事，勸說其送回武器彈藥。」⁵²所謂晉東南辦法，實際上就是解放軍出動強大兵力，逼迫造反派群眾組織停止武鬥、上繳武器彈藥。但就山西省來說，兩派群眾組織的武鬥還遠遠沒有消滅，不少地區的武鬥還正方興未艾。

52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22。

3 雲南「滇挺」事件

1968年1月5日，山東來雲南支援邊疆建設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團在下關蒼山飯店遭到「八二三」派「四二〇」武裝攻打，被打死七人。1月10日，工八團七十七人由「炮兵團」派負責人李國貞率領，從昆明出發前往下關接回該團被圍困的六百餘人，等待退役回山東。1月14日抵達下關後，捲入了當地的兩派武鬥。當地駐軍黨委從派性出發，給工八團扣上「滇西挺進縱隊」（簡稱「滇挺」）的政治帽子，強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上報昆明軍區黨委，昆明軍區黨委未加核實即上報中央。1月21日，工八團在下關的全部人員七百多人，攜帶武器離開下關返回昆明。當天，康生、謝富治接見在京開會的昆明軍區領導幹部時說：「滇挺是造無產階級的反，他們的槍口不是對敵人，不是對反革命，而是對人民解放軍，他們的行為完全離開了文化大革命的軌道，走到反面了，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行為。」

根據康生等人的講話，1月23日，中共昆明軍區黨委正式形成〈中國共產黨昆明軍區委員會關於處理昆明「炮兵團」派出「滇西挺進縱隊」的問題〉的文件。1月26日上午，昆明軍區副司令員、省軍管會委員魯瑞林等按照謝富治的指示，從北京飛赴昆明。當天下午，即召開緊急會議，部署武裝圍剿「滇西挺進縱隊」事宜。魯瑞林親自坐鎮昆明指揮。26日晚，執行圍剿任務的部隊受命向在一平浪甘海資礦區的工八團住地快速推進，縮小包圍圈。27日下午6時10分，部隊攻佔了甘海資礦區。在圍剿中，打死工八團成員184人，當地「炮兵團」派群眾和煤礦職工、家屬59人，抓捕工八團成員480人。2月13日，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見雲南赴京代表時，宣布工八團為「反革命匪幫」。此後，在1968年接近一年的時間內，軍內外不斷舉辦了「反革命政治武裝土匪滇西挺進縱隊罪行展覽」，在後來的「劃線站隊」和「清理階級隊伍」中，又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並進一步將「滇挺」的行動說成是「執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軍內外一些領導幹部被誣為「滇挺」的「總司令」、「總指揮」、「密謀策劃者」，一大批幹部、群眾

慘遭迫害，有的致殘致死。僅據大理州統計，在追查「滇挺」分子中，幹部、群眾被打死、逼死七百多人，被打傷致殘二千多人，受株連的達十萬餘人。⁵³

4 內蒙古挖「內人黨」運動

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一個革命政黨。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作出〈關於蒙古問題議決案〉，指出內蒙古革命的重要性及其特殊性，分析了內蒙古的社會狀況、民族關係和民族解放鬥爭形勢，闡述了黨的民族政策，並且決定成立內蒙古農工兵大同盟和贊助成立內蒙古國民革命黨。⁵⁴ 1925年10月，在張家口正式成立了內蒙古國民革命黨。它接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雙重領導，在蒙古民族中廣泛開展革命活動；它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特別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北洋軍閥的統治和民族壓迫、廢除王公貴族的封建特權制度、建立人民民主自治政權，聯合國內各革命黨派和各族人民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等基本綱領。1927年8月，改名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46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和東蒙自治政府商定，在承德舉行解決自治運動統一問題的會議，決定解散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撤銷東蒙古人民政府，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內蒙古人民的自治運動。

53 王元輔主編：《雲南五十年——中共雲南省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頁134。1978年9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下發〈關於為「滇西挺進縱隊」政治假案的平反結論〉。

54 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關於蒙古問題議決案〉（1925年10月）中指出：「我們的黨應當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全中國的解放運動結合起來。……我們認為應當組織內蒙古國民革命黨，這是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職任，可是內蒙古國民革命黨和內蒙古農工兵大同盟工作應當密切的聯絡，這是中蒙農民中的革命工作能夠有成效的一種保證。」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419—420。

1967年10月3日，「內蒙揪叛國集團聯絡站」頭頭、原內蒙古自治區文聯副主席、作家協會內蒙分會主席烏蘭巴幹，向自治區革籌小組和軍區領導人滕海清等人遞送了〈烏蘭夫黑幫包庇大叛徒集團罪行的簡要報告〉，〈報告〉中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是蒙修設在內蒙古的大特務組織」。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內蒙古地區第一次正式提出「內人黨」問題。此後，烏蘭巴幹還多次報送了他所編造的有關「內人黨」的材料。

1968年2月以後，以滕海清為首的革委會以烏蘭巴幹編造的材料為依據，領導開展了挖肅「內人黨」運動，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1968年1月6日至18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認為，內蒙古的階級鬥爭的蓋子還沒有揭開，提出打一場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人民戰爭，這就是所謂的「挖肅」運動的由來。

2月4日，江青、康生等在釣魚台接見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滕海清和革委會常委李樹德。康生在講話中說：「烏蘭夫影響很大，流毒很深。首先應在部隊內肅清。一方面對烏蘭夫進行批鬥，同時大揭王逸倫、王鐸，這樣群眾就知道我們不是反對蒙古族。蒙古族的壞人發動蒙古族的群眾去揪鬥，這樣更便利。」「內蒙地區蘇修、蒙修、日本特務不少。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開始可能揪得寬點，不要怕！」

2月6日，自治區革委會負責人召開碰頭會，認為「內人黨」在1947年5月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以後仍有地下活動。為區別起見，此後的「內人黨」常常稱作「新內人黨」。

4月，自治區專案工作會議決定隔離審查八名盟、廳級以上幹部，專攻「內人黨」問題。滕海清指示，挖「內人黨」地方上的突破口是特古斯（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軍隊上的突破口是鮑蔭扎布（內蒙古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專案組對鮑蔭扎布進行了長時間的嚴刑拷打，並對他進行逼供、誘供、指供。鮑蔭扎布在嚴刑下被迫編造了參加地下「新內人黨」的假口供，供出了包括內蒙人委副主席哈豐阿、朋斯克、內蒙高等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內蒙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特古斯、內蒙民政廳長烏力圖、電台台長昂日布等在內的共三十多人。4月

26日，自治區革委會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叛國案件的報告〉。

7月5日至21日，內蒙古革委會召開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處理意見〉。這個文件對民主革命時期從事過革命活動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進行歪曲的歷史分析，並斷定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以後仍有地下「內人黨」活動，文件稱烏蘭夫為「內人黨」的後台，並規定，對「內人黨」支部委員以上的骨幹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論處，勒令一般黨徒進行自首登記，對抗拒者從嚴懲處。7月20日，自治區革委會領導人在挖「新內人黨」問題上向康生請示，康生說：「你們內蒙的同志，腦子裏是沒有敵情的。內蒙有這樣大的反革命組織，你們還向中央請示甚麼呢？有多少挖多少，愈多愈好嘛！」⁵⁵

內蒙革委會三次全委擴大會後，〈關於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處理意見〉上報中央，並以內革發351號文件印發全自治區。於是挖「新內人黨」的活動從原來的群眾運動變成了有領導、有組織、自上而下的大迫害運動。

各單位、各地區聞風而動，很快就挖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內人黨」。與之相伴的，刑訊逼供、致死致殘的人數愈來愈多。內蒙革委會內關於「新內人黨」問題也有了意見分歧，革委會副主任高錦明認為「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塌了！」11月，高錦明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並被停止了工作。

高錦明遭到批判後，內蒙古地區的挖「內人黨」運動開始進入高潮。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機關裏的蒙族幹部紛紛被抓，幾乎無一幸免。在1968年12月由滕海清授意搞的〈關於「內人黨」問題匯報提綱〉中，列舉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人委廳局長以上幹部的名單，現轉錄如下：⁵⁶

55 王任平主編：《內蒙古自治區志·共產黨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頁224。

56 圖們、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頁161—166。

| 姓名 | 原職務 | 誣陷、迫害之詞 |
|--------|----------------|---|
| 烏蘭夫 | 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人委主席 | 1925年參加過「內人黨」。「新內人黨」主席。假共產黨員，真國民黨員。國特、叛徒、內奸，最大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奎璧 | 內蒙黨委書記 | 「新內人黨」副主席。假共產黨員，真國民黨員。國特、叛徒、內奸、烏蘭夫死黨分子，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王再天 | 內蒙黨委書記 | 「新內人黨」副主席，中央執委。日特，蘇蒙修特務，張學良的忠實走狗，內奸，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畢力格巴圖爾 | 內蒙黨委書記兼公安廳廳長 | 老「內人黨」骨幹，「新內人黨」中央執委，老蒙修情報員，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李振華 | 黨委組織部長 | 「內人黨」骨幹。 |
| 特古斯 | 宣傳部副部長 | 老「內人黨」中央執委。「新內人黨」中央書記、中央執委兼組織部長。蘇修特務，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克力更 | 統戰部部長 | 老「內人黨」骨幹。「新內人黨」中央委員，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厚和 | 《實踐》雜誌社總編輯 | 「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兼宣傳部負責人、「內人黨」內蒙直屬機關黨委書記。烏蘭夫的黑代常委之一。 |
| 沙駝 | 《實踐》雜誌社副主編 | 「新內人黨」中央宣傳部負責人之一。 |
| 博彥 | 內蒙總工會副主席 | 「新內人黨」中央委員。 |
| 德力格爾 | 《內蒙古日報》社社長 | 「新內人黨」中央委員，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蒙修特嫌。 |
| 沙梯 | 內蒙團委副書記 | 「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兼秘書長。 |
| 吉雅泰 | 內蒙人委副主席 | 「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假共產黨員，蘇修特務，老蒙修情報員，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哈豐阿 | 內蒙人委副主席 | 老「內人黨」秘書長。「新內人黨」副主席、中央執委、書記。大蒙奸，日特，蘇蒙修特務。烏蘭夫死黨分子，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朋斯克 | 內蒙人委副主席 | 「新內人黨」中央委員。蒙奸，日特，蘇蒙修特務，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特木爾巴根 | 高級法院院長 | 「新內人黨」副主席。老蒙修情報員，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烏力圖 | 內蒙民政廳廳長 | 老「內人黨」中央執委。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蒙修情報員。 |
| 金墨育 | 財政廳廳長 | 老「內人黨」骨幹。「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兼經濟部負責人。 |

| | | |
|--------|----------------|---|
| 雲世英 | 公安廳副廳長 | 烏蘭夫的黑代常委之一。 |
| 高布澤博 | 農業廳廳長 | 「新內人黨」中央執委。 |
| 都固爾扎布 | 畜牧廳廳長 | 「新內人黨」中央執委。蒙奸，日特，老蒙修情報員，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趙真北 | 畜牧廳副廳長 | 「新內人黨」主要骨幹。王再天、特古斯揪出後，是主要負責人。叛徒，「成吉思汗黨」骨幹分子。 |
| 烏力吉敖其爾 | 建設廳廳長 | 「新內人黨」中央執委。蒙修特務，日特。老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戈瓦 | 內蒙語委主任 | 老「內人黨」骨幹。「新內人黨」中央執委。 |
| 額爾敦陶克陶 | 內蒙語委副主任 | 老「內人黨」中央執委。「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兼宣傳部長。蒙修情報員，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昂如布 | 內蒙電台台長 | 「新內人黨」電台負責人，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蒙修情報員。 |
| 義達嘎蘇隆 | 內蒙衛生廳副廳長 | 老「內人黨」中央執委。「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兼宣傳部副部長。蒙修情報員、階級復仇分子，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嘎儒布僧格 | 內蒙人委副秘書長、外辦主任 | 老「內人黨」中央執委。「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兼秘書長。日特，蒙修情報員，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李洪範 | 中央民族出版社副社長 | 老「內人黨」骨幹。「新內人黨」中央執委，並兼過宣傳部長。 |
| 烏蘭 | 內蒙輕化廳副廳長 | 「新內人黨」中央委員。老蘇修情報員，蘇修特務，烏蘭夫死黨分子。 |
| 德力格爾 | 內蒙外辦副主任 | 老「內人黨」骨幹。「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兼聯絡部負責人之一。 |
| 騰和 | 內蒙公安廳一處處長、黨組成員 | 「新內人黨」聯絡部副部長。日特，蒙修特務。 |
| 和興革 | 內蒙財辦副主任 | 「新內人黨」中央執委兼經濟部長。烏蘭夫的黑代常委之一。 |
| 湖洛蒙 | 內蒙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 蒙修特嫌，烏蘭夫死黨分子。 |
| 高興賽 | 內蒙民委副主任 | 「內人黨」骨幹分子之一。 |
| 包正 | 衛生廳副廳長 | 「內人黨」骨幹分子，蒙修特嫌，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高茂 | 衛生廳副廳長 | 「內人黨」骨幹分子，民族分裂主義分子。 |
| 阿木古郎 | 內蒙計委副主任 | 老「內人黨」骨幹。 |

內蒙古挖「內人黨」運動中，幾乎全都採用了嚴刑逼供的辦法，其手段之殘酷令人髮指。

在烏蘭察布盟，盟計委主任比力格圖們的牙齒被人用老虎鉗子一個個拔掉，接着又把舌頭和鼻子割掉而致死。

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書敖日布扎木蘇夫妻倆，被凶手用刮鬚刀片將身上的肉一道道割開，把食鹽揉進去，再用燒紅的烙鐵烙傷口，名曰「發肉條」。兩口子被虐殺後，剛剛五個月的孩子被活活餓死。

達茂旗旗委書記包國良的妻子被打成「內人黨」後，殺手們用繩子拉大鋸，將其陰道和肛門拉通，終身殘廢。

《內蒙古日報》社駐伊克昭盟記者暴慶五於1978年7月27日向內蒙古黨委發回一篇專題報告，披露了在挖「內人黨」高潮中的1969年上半年，在烏審旗圖克公社製造的血腥慘案的事實。報告中寫道：

1969年圖克公社只有2961人，被打成「新內人黨」的就有926人，佔懂事的71%，被懷疑的有270人，被活活打死和後遺症死的49人，當時嚴重傷殘270人，其中116人完全喪失或半喪失勞動能力。所有共產黨支部都被打成「內人黨」支部，70%—80%的共產黨員被打成「內人黨」徒，被揪鬥上刑，被開除……

用燒紅的濕柳棍燙。將女牧民扒光衣服，用燒紅的濕柳棍燙小腹部、肚子。把肚皮燒壞，腸子露出來。再燙陰道，將外陰燙壞，變成不男不女之人。腹部傷口至今不能癒合，直流臭水。

狼牙鞭打人。皮鞭上用電線把按釘、鐵絲頭纏緊，變成帶刺的鞭子。每抽打一下，勾下一些皮血，連打二十多鞭後，脊背皮血被勾掉，露出脊椎骨。大片傷口腐爛發臭，由於不給治療，將一個人活活臭爛而死。抽打皮鞭時，血肉橫飛，甩在牆上也壞臭，氣味嗆人不能進屋。

爛肉撒鹽面。皮鞭、棍棒打壞人，在傷口處撒鹽面，或用鹽開水澆燙，受害者疼得發瘋、昏死。

上腦箍。把受害者的腦袋，用八號鐵絲纏住，再用老虎鉗子狠狠擰緊，鐵絲勒進頭皮裏，或把四個上腦箍的人用鐵絲圍着火爐連起來烤。動不得跑不了。

用燒紅鐵鍬烙，把鐵鍬在火爐上燒紅，烙在受害者頭頂上。結果頭髮、頭皮燒光，露出頭骨。烙出的血和油流在臉上，臉也被燙壞……⁵⁷

通過殘暴的酷刑逼供，編造出一系列諸如「內人黨」黨章、黨綱、黨旗、印章、記錄、文件、日記等假證據，甚至把內蒙古地區的中共黨組織誣陷為「明裏是共產黨，暗裏是內人黨」，而且製造出數不勝數的「內人黨」的變種組織，如「統一黨」、「民族獨立黨」、「柳條子黨」、「沙窩子黨」、「黑虎廳」等荒唐的名目。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間，毛澤東指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已經擴大化了」。5月13日至19日，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等先後四次聽取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內蒙古軍區的匯報，指出滕海清「在前一段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中，主要是在挖『內人黨』的工作中，犯了嚴重的錯誤」。5月19日，滕海清等向中央寫了〈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22日，毛澤東批示：照辦。史稱「五二二」批示。批示在當時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擴大化，停止挖「內人黨」的作用，而且使大批冤假錯案開始得到平反。但當時中央的結論只是認為在挖「內人黨」工作中犯了擴大化錯誤，「反烏蘭夫、挖『內人黨』、清理階級隊伍，方向還是對的」。因而，內蒙古的廣大幹部、群眾赴京上訪，強烈要求徹底批判滕海清的錯誤。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呈癱瘓狀態。當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對內蒙古實行全面軍管的決定，由北京軍區對內蒙古實行分區全面軍管。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副司令員杜文達、副政委黃振棠、張正光組成內蒙前線指揮所(簡稱「前指」)，統一全面領導內蒙古的工作。1970年2、3月間，「前指」負責人鄭維山宣布內蒙古在平反工作上犯了「一風吹」的擴大化錯誤，而且還以「前指」黨的領導小組的名義，宣布內蒙革委會為落實政策制發的一系列文件停止執行，使內蒙局勢又發生逆轉，平反和落實政策的工作陷入停頓。

57 圖們·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頁201—203。

「內人黨」冤案真正得到平反昭雪，是在1978年4月。4月20日，中共中央對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關於進一步解決好挖「新內人黨」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批示同意，並要求認真貫徹執行。〈報告〉中寫道：

究竟有沒有一個「新內人黨」？是全區廣大幹部和蒙漢各族群眾一直關心，並希望給以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大家認為，在揭批「四人幫」鬥爭已經取得偉大勝利的情況下，是應該而且有條件對這個問題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了。隨着形勢的不斷發展，根據在落實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實，使我們愈來愈清楚地看出：所謂「新內人黨」是根本不存在的；當時決定挖「新內人黨」是錯誤的，是原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幾個主要負責人，在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影響下，主觀臆斷，盲目蠻幹，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錯案。因此，應該完全予以否定。⁵⁸

「新內人黨」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之一，它造成的後果極為嚴重，因此案而遭到誣陷和迫害的有346000多人，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6222人。⁵⁹這起冤案殃及面極大，從內蒙古自治區的黨政第一把手烏蘭夫到生產隊的黨支部書記直到普通農牧民，甚至殃及內蒙古周邊的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蒙古族的聚居區。「新內人黨」冤案的始作俑者烏蘭巴幹於1987年11月被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對內蒙古挖「內人黨」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和執行者滕海清，則「念其在長期戰爭中，出生入死，為人民流血奮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⁶⁰，所以從寬，未予追究其刑事責任。

58 中共中央批轉內蒙黨委呈送的〈關於進一步解決好挖「新內人黨」問題的意見的報告〉的批示及附件（1978年4月2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9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1980年11月2日。

60 黃克誠致廷懋信中語，載《康生與「內人黨」冤案》，頁300。

第九章

波瀾再起

從1967年10月到1968年3月，全國混亂局面相對緩和。但自1968年春天開始，隨着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楊余傅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現，全國各地的派性鬥爭又趨激烈，武鬥的規模也愈來愈大。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地到處出現對被懷疑有歷史問題或視為有現行反革命行為的人任意扣押批鬥侮辱、刑訊逼供等現象，導致大批非正常死亡，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為解決許多地方出現的嚴重武鬥局面，1968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並以宣傳落實這兩個布告為契機，在全國大造輿論，制止武鬥，收繳武器，促進大聯合和「三結合」，各地駐軍也對武鬥嚴重的地區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措施。

一 「反擊右傾翻案風」

1967年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了穩定極度混亂的局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將王力、關鋒隔離審查和對造反派的行動加以一定的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原來就始終存在的反對和抵制文化大革

命的力量又得到了發展。北京一些群眾組織不顧中央文革的勸阻，堅持要公開批判王力、關鋒。外地的一些群眾組織公開與中央正式肯定的左派對着幹。在反「二月逆流」時遭到批判的陳毅、聶榮臻等人又得到一些人的公開支持和擁護。而這一切都被「無產階級司令部」認為是右傾翻案的表現。從1968年3月中旬開始，大張旗鼓地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3月11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大專院校代表和中學紅代會代表匯報會上，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代表批評該校對立派組織「北京公社」，說「北京公社」在1967年「反副總理」、「反余秋里，炮打周總理」、「炮打副總理，反總理」。江青質問「大慶公社」的代表：「在二月逆流裏炮打譚震林對不對？譚震林不該打嗎？」她還說：「你們一點都不批余秋里，主席對余秋里是一批二保，你們是一再地保，你們倒是一貫正確了？！」¹

3月15日，江青在接見四川省革籌小組領導成員時說：「目前在全國，右傾翻案是主要危險，我就不相信你們那裏沒有右傾翻案風。北京學生替二月逆流翻案，我們就轟了他一炮。」有人在會上匯報省革籌小組內部的分歧：「十條² 爭論大的是第二條、第五條。有人說，十條過時了。」康生說：「要修改二、五條，這不是替二月鎮反翻案嗎？」江青說：「十條過時，就把李井泉再抬出來嘛！」「你們如果在十條上後退半步，你們就站不住了！說十條過時，就是替李井泉翻案。」「說十條過時了，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風。」³

1 中央首長接見首都大專院校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學習班時的講話(1968年3月11日)，載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2 指中共中央1967年5月7日發出的《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其中第二條主要內容是：「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從2月下旬以來，支持了……保守組織，……把革命群眾組織……打成了反革命組織，大量逮捕革命群眾。」第五條的主要內容是：「要對四川全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組織、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進行妥善處理，一律平反，一律釋放，……要幫助革命群眾組織恢復和發展。」

3 中央首長接見四川省革籌小組領導成員的指示(1968年3月1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月18日，在接見浙江省赴京代表團的會上，江青說：「去年冬天以來，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3月21日，在接見江蘇省革委會赴京匯報團和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江蘇班全體學員的會議上，江青說：「去年下半年，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擊潰了形左實右，擊潰了鑽進我們心臟裏的劉、鄧、陶、彭、羅、陸、楊留下的一批爪牙（按：指王、關、戚等的垮台），右傾保守主義就冒頭了，今年就大肆活動了，表現就是為『二月逆流』翻案。」康生說：「當前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頭子之一譚震林翻案。」⁴3月18日至25日，北京市革委會召開第十二次全體委員會會議，會議提出，當前北京市颳起一股風，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個組成部分。這股風的矛頭是指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黨中央、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會要求各級革命委員會「率領革命群眾，堅決擊退『二月逆流』的反撲」、「把鬥爭矛頭對準當前的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徹底粉碎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風」。

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在〈關於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提出：「要繼續打擊『二月逆流』的翻案風。要堅定地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⁵

1 北京高校學習班和「炮打謝富治」事件

1967年10月以後，全國從中央到地方大力宣傳毛澤東南巡時的〈重要指示〉，主旨是促進「大聯合」、「三結合」，要求造反派克服派性。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以〈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為題，聯合發表元旦社論。社論提出：

4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赴京匯報代表團暨江蘇在京學習班的講話（1968年3月2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1968年4月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新的一年中」，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社論還提出：「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能不能自覺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勢下願不願意做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重要標誌。」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轉發的上海《文匯報》1月12日社論〈論派性的反動性〉，這篇社論以「打倒派性！斬斷黑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三句口號作為結尾。1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關於北京針織總廠解決廠內群眾組織派性問題的報道，同時加編者按說：要「充分發動群眾，歷數派性罪狀，人人批判，個個抵制，使它在群眾中像『過街老鼠』無處藏身」。

1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中提出：「把干擾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妨礙毛主席最新指示執行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打倒。」1月28日，為紀念毛澤東號召「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一周年，《解放軍報》發表社論〈認真執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則〉，提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是一種反動的社會思潮」，解放軍要「堅決執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則，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進行不調合的鬥爭」。凡此種種現象表明，毛澤東這時已經深切地感到，不解決派性問題，難以實現由「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設想。派性的存在，將會嚴重妨礙「奪取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部署，所以他在新年伊始，加強了對圍剿派性的宣傳，試圖以此迅速使派性爭鬥停下來，實現大聯合和「三結合」。但他既要堅持搞文化大革命，就要支持和利用造反派，既要堅持搞全面奪權，就不可能真正地消滅派性。

在北京鬧派性最為嚴重的是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組織，所以北京市革委會在1968年1月27日發出了〈關於分批分期組織大學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開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通知〉，要求以「鬥私批修」為綱，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增強無產階級黨性，實現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

北京市革委會早就想給北京各大專院校造反派頭頭辦學習班，從1967年11月開始醞釀，一直因為各校派性鬥爭激烈，難以實現。到1968年2月，形勢稍有緩和。北京市十八個區縣已有十六個成立了革委

會，有兩個成立了革委會的籌備委員會。而中小學的情況，據當時負責北京市學校軍訓工作的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說，「百分之百實現了大聯合，95%以上建立了三結合」。全北京的六十二所大學「有二十一所建立了三結合，三所建立了大聯合臨時領導機構，還有將近四十所沒有成立」。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市革委會決定分期分批開辦北京高校造反派頭頭學習班。北京市革委會原來打算用三個星期的時間舉辦第一期學習班，組織二十所院校的各派組織頭頭二百多人參加學習。不在二十所院校之內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兩派群眾組織聞訊後，主動要求參加學習，獲得批准。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和北京市革委會常委丁國鈺分別擔任學習班的正副書記。參加學習的人按軍隊的建制方式，分編成五個連。

學習班於1968年2月5日正式開學。開學幾天後又根據「中央首長」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地質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四所院校。這樣，共有25所院校的造反派頭頭251人參加學習班的學習。

後來根據毛澤東對江西省軍區報告的指示精神，以及謝富治傳達的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有關指示，決定擴大學習班的規模。謝富治在學習班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到學習班一再擴大的原因：

我有一次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說：「雲南來了多少人？」我說：「七百人。」本來一個省七百人是比較多的，主席說：「那不夠，再增加一倍。」⁶因此學習班從數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強。我們北京的大學生（學習班）也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加強的。還有一個原因，同學們都知道，我是一個很有缺點的人，做事情不是那麼敢想敢幹，作事情總是經過上級一再提醒甚至批評才做好。我們這個訓練班，中央文革、總理一再關心，為甚麼這個學校沒

6 「雲南班」學員後來陸續增至二千多人。參見王元輔主編：《雲南五十年——中共雲南省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頁134。

來，為甚麼那個學校沒來。所以後來又增加了一些學校。還說，學生、幹部都應該增加，一個學校要增加四五個，所以才這樣一再增加。

1968年2月20日，參加學習班的院校由二十五所擴大為三十六所，學員由群眾組織頭頭，擴大到各校的幹部和職工，總人數達到1406人，是原來計劃辦第一期學習班人數的五倍多。按學習班的要求，各校群眾組織的頭頭一、二、三把手都必須參加學習。北京紅衛兵的「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負責人，全部是學習班的學員。學習班的時間也由原定的三個星期改為沒有期限。謝富治在動員大會上說：「至於我們這個學校辦多長時間，以解決問題為原則，甚麼時候解決問題甚麼時候算，先解決問題先畢業，後解決問題後畢業，不解決問題不畢業。」

在學習班開辦之初，受社會整體輿論導向的影響，在消除派性方面一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特別是在那些原來兩派對立情緒就不甚嚴重的學校。在學習班上還出現了一些不爭地位、不爭名額，搞大聯合的現象。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北京化工學院、北京農業勞動大學、北京化纖學院、北京水電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北京農機學院、北京外貿學院、北京中醫學院等院校建立了「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北京機械學院成立了革委會籌備小組。北京經濟學院、河北北京師範學院、北京輕工業學院的兩派對立組織達成了大聯合協議，向消除派性、建立統一的臨時權力機構邁出了第一步。

但是對於大多數的院校，通過學習班的學習，並沒有收到明顯的效果。特別是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離審查的消息傳入學習班後，在學習班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部分院校的紅衛兵組織提出「打倒派性，斬斷黑手」的口號，提出要搞王(力)、關(鋒)、戚(本禹)、林(杰)反黨集團，要斬斷他們伸向群眾組織的黑手，揪出他們的後台。一時間在學習班內外出現了各種傳言，學習班內人們的思想也十分混亂。儘管在學習班舉辦期間，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曾幾次親自接見，但依然難以穩住學習班的陣腳。

最先在學習班挑起事端的是北京師範大學「造反兵團」。由於戚本禹在過去的講話中一貫堅決支持以譚厚蘭為首的師大「井岡山」，多次對「造反兵團」進行批評和指責，所以戚本禹垮台的消息一傳出來，「造反兵團」立即向以譚厚蘭為首的師大「井岡山」發難。他們在學習班中以及在社會上散發聲明和傳單，提出打倒王關戚林反黨集團，要斬斷黑手，揪出後台。2月19日，師大「造反兵團」提出「學習班必須收回戚本禹在1967年12月27日就北京師範大學問題的講話」，否則不參加學習。由於目的沒有達到，2月22日，北師大「造反兵團」宣布退出學習班。他們還散發傳單、聲明，貼出攻擊譚厚蘭等人和學習班的大標語：「現在是揭開北京市高校派性蓋子的時候了！」「學習班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學習班不抓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學習班不發動群眾揭發王、關、戚、林反黨集團！」「學習班空談派性，捂住蓋子，掩護黑手！」「學習班領導人把學習班引向資產階級方向！」

師大「造反兵團」的行動並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人大「三紅」、「政法兵團」、民院「抗大」、輕工「紅鷹」等「天派」組織的積極支持和響應。2月23日還發生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紅衛兵總部」二十餘人衝擊學習班，踢破房門，企圖揪走參加學習班的學習人員的事件。雖然此事由於李鍾奇出面制止，沒有擴大事態，但是對剛剛開辦才半個月的學習班來說，不能不留下深重的陰影。

經過一系列的工作，學習班又恢復了相對的平靜。參加學習班的人們開始進行「亮私、鬥私」。2月28日，清華「井岡山」負責人蒯大富檢查了自己1967年以來，出於急於在「兩個司令部鬥爭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動的問題，以及在校內壓制「四一四」，對持有不同觀點的人採取殘酷打擊，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錯誤，他亮出了企圖自己一派掌權，搞臭「四一四」，使他們在進入革委會後也成為陪襯，以壟斷清華大權的隱私。2月29日，北航「紅旗」的韓愛晶也檢查了自己不聽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活動的問題。其他院校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也在學習班上做了類似的「亮私、鬥私」。但是他們這些檢查，實際上都是敷衍塞責，做表面文章，依然帶有很強的派性傾向，都認為對立觀點的紅衛兵組織中有「黑手」，想從對方組織中抓「黑手」，斬斷

「黑手」，進而達到搞垮對方，證明自己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正因為如此，這種「亮私、鬥私」沒有甚麼實際意義，學習班內部的明爭暗鬥始終沒有停止過。

3月4日，北京大學參加學習班的聶元梓等人給毛澤東、林彪寫信，提出在北京出現了一種不准講階級鬥爭，不准講路線鬥爭，宣揚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現象」，社會上出現了右傾苗頭。3月5日，聶元梓等人貼出題為〈是徹底揭開北京高校問題的時候了〉的大字報。

3月6日晚，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北京大中學學校群眾組織代表時，師大「造反兵團」告了學習班負責人的狀。師大「造反兵團」的王頌平在發言中說：「我們被趕出了學習班，學習班負責人堅持戚本禹12·27講話原則，在學習班不是來解決大聯合問題，而是解決甚麼兵團反革委會問題，這句話是譚厚蘭親口對我說的，為了捍衛毛主席最新指示，我們不能接受他們的原則，在2月22日，學習班負責人接見我們的時候，又把我們打成『四反一搗亂』組織，說我們要搞垮無產階級專政，讓我們滾出學習班，甚至說要把我們當反革命抓起來……」聶元梓也在會上對學習班負責人加以譴責，說：「我覺得這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不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是起掩蓋黑手的作用，在學習班不能說提高路線鬥爭覺悟、階級覺悟，我們在學習班貼標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提高路線覺悟，加強階級鬥爭觀念』，也被人說成是派性十足。我們本來也想向其他學校學習，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連』……」她提出「要揭派性蓋子」。

3月9日，以「新北大公社總勤務組」的名義貼出了〈揭開派性鬥爭的蓋子，將路線鬥爭進行到底〉的大字報，影射、批判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謝富治。3月11日，「新北大公社」參加首都高校學習班的全體學員貼出一張題為〈這是為甚麼？〉的大字報，指責高校學習班的某些負責人「用『派性鬥爭』掩蓋高校的階級鬥爭，用所謂克服『派性』，打擊和瓦解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隊伍」。

3月13日和15日，由人大「三紅」、新人大「革命造反聯絡站」、輕工「紅鷹」、「新北大公社」、師大「造反兵團」等十幾所院校的紅衛兵組織發起召開了兩次串連會。「新北大公社」負責人聶元梓等出席了串連

會。這兩次串連會的矛頭是指向學習班的，在串連會上的發言普遍認為學習班的指導思想、方針、方法都有問題，不解決學習班的問題，「就會影響揭開北京市兩大派鬥爭的蓋子」。人大「三紅」代表在發言中說：「可是學習班，劉鄧陶沒有了，關王戚林反黨集團沒有了，剩下來的就是整群眾的派性。不去調查黑手，不去調查各校的現狀，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壓制打擊，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學習班大搞調和、折中，不准講分歧，對矛盾能掩蓋就掩蓋，否則就是派性發作。要讓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讓大權落在保守派手中。」輕工「紅鷹」的代表說：「丁國鈺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講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而是張口派性、閉口派性，對『四大』怕得要命，甚至連幾個同志互相幫助也說成是派性串連。」北外紅旗代表在發言中說：「前幾天還有這種論調：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百年以來反帝鬥爭的創舉。有人說，關王戚林問題沒見過報，兩派聯合聲明中不准講，一講你為甚麼就心裏難受呢？就如喪考妣呢？」⁷

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從戚本禹的垮台，聯想到與之關係密切、沆瀣一氣的謝富治。於是他們便四處活動，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謝富治的材料，醞釀掀起「倒謝」活動。

經過一番準備，在1968年3月初，從人大「三紅」等組織中傳出「謝富治停職反省」的消息，同時出現了「土皇帝已死，地頭蛇跑不了」大標語，人大「三紅」、「一一二二縱隊」公開提出要揪「謝本禹」，從而掀起了炮打謝富治活動的序幕。

繼人大「三紅」之後，3月5日，地質學院「二團」貼出了影射攻擊謝富治的大標語：「砸爛關王廟，揪出大小妖！」3月9日，人大「三紅」廣播站又廣播了編輯部文章〈徹底揭開北京兩大派鬥爭的蓋子〉，3月10日，

7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中說：「首都大專院校學習班，又不向中央報告，引起聶元梓他們不滿。你們又開學習班，又不讓串連，人家就開大串連會。不准串連不對，不過你們打倒謝富治也不對。……講不讓串連是對的，但一點也不讓串連也不好，人家還在串連。……串連一下為甚麼不行？天派、地派串連一下為甚麼不行？我講串連一下可以，實際在串連。你不讓好人串連，壞人在串連。多數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的。」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在高校學習班以「全體學員」的名義貼出大字報〈不能走〉，抨擊學習班，提出要揪「關、王、戚餘孽」。3月11日，「新北大公社」參加高校學習班的全體學員貼了一張題為〈這是為甚麼??〉的大字報，大字報中寫道：「學習班的某些負責人卻公開宣稱：『不能鋪天蓋地地講階級鬥爭』，『學習班主要解決派性問題』，這是為甚麼？……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左的思潮。」「他們自己不抓黑手，還反對別人抓黑手，並進而用『派性內因論』打擊堅持抓黑手的革命群眾，他們究竟要幹甚麼？」「以反對『派性活動』，排除『干擾』為名，不許串連，不許貼大字報，看大字報，不許發傳單；甚至限制某些學員的行動，跟蹤，盯梢，整黑材料，壓制不同意見，動不動就用大帽子壓人……」「能否辦好首都高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實的頭等大事。要不要從根本上扭轉高校學習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學習班辦下去，是要不要與劉鄧黑司令部與反黨集團鬥爭到底，要不要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的大問題。」

隨着「倒謝」隊伍的擴大，事態進一步發展。3月16日上午，北京師範大學「造反兵團」貼出了全市第一張點名批判謝富治的大字報〈謝富治、戚本禹「12·27」講話必須全盤否定，徹底批判〉。當天下午，學部貼出〈向「新時代的狂人」的黑後台謝富治開炮〉的大字報。北大「井岡山造反總部」貼出〈打倒謝富治〉、〈捨得一身剮，敢把謝富治拉下馬〉等大字報。人大「三紅」貼出了〈打倒變色龍謝富治〉的大字報。當晚，師大「造反兵團」又貼出大字報〈把鎮壓革命派的劊子手謝富治推上斷頭台〉。

這些大字報和許多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傳，愈來愈多的人加入了「倒謝」的行列，更多的人則還在觀望，注視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3月17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紅」等八單位在人民大學開會商討「倒謝」計劃。清華「四一四」刷出「炮轟謝富治」等大標語。3月18日，北外「紅旗大隊」貼出大字報〈打倒北霸天謝富治〉。在此之後，北京城內相繼出現一大批諸如「炮轟謝富治」、「打倒謝富治」一

類的大標語及批判謝富治的大字報。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在一封致謝富治的公開信中說：「你和戚本禹到底是甚麼關係？……你和他是親密的，不是一般的關係。你為甚麼對他那樣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聽計從，步步緊跟？」

中央文革小組對部分紅衛兵炮打謝富治的活動是明確反對的。一方面是因為謝富治始終是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的，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穩住自己的陣腳，維護自己由於王、關、戚的相繼垮台而遭到損害的形象。中央文革小組先是讓謝富治在3月18日的新聞中露面，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謝富治陪同來訪的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參觀北京針織總廠。3月19日，又由謝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的群眾大會，讓謝富治在群眾集會上公開亮相。

3月21日，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在市革委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上說：「有人利用革委會、衛戍區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把矛頭指向市革委會，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指向衛戍區，指向我們的主任謝富治同志，說甚麼『揪出變色龍謝富治，橫掃小爬蟲』，甚麼『把沾滿鮮血的劊子手謝富治推上斷頭台』……」吳德在講話中明確批評了「炮打謝富治」的行動，並充分肯定了謝富治的工作，維護了謝富治的形象。

中央文革小組和北京市革委會的明確態度，很快就在社會上發生了作用和影響。於是「地派」的一些組織便趁機活躍起來，以維護北京市革委會的名義，走上街頭，開展遊行示威，對「天派」施加壓力。

在看到中央文革小組明確地支持謝富治的情況下，「倒謝」的勢力迅速削弱，有些組織在貼出「重炮猛轟謝富治」的大標語後幾小時又自己將它覆蓋上。「新北大公社」也於3月23日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以謝富治同志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但北大「井岡山」、地質「東方紅」等組織不依不饒，揪住不放，必欲置「新北大公社」於死地而後快。地質「東方紅」、郵電「東方紅」、石油「北京公社」等組織不斷組織隊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聶元梓」的口號。

3月25日，謝富治親自到北京大學，在「新北大公社」廣播站發表講話，針對北大「井岡山」等組織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謝富治的問題，

攻擊聶元梓，要打倒聶元梓一事，明確表示支持聶元梓，批評了北大「井岡山兵團」。通過這一系列的做法和姿態，使得炮打謝富治的活動很快雲飛霧散。

3月25日，謝富治在北京市革委會會議上表示：「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這個精神。我們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經很危險。」他還表示：「打倒聶元梓是錯誤的」，「學習班要做檢查」。這樣一來，又給激烈反對學習班的「天派」紅衛兵添了一把火。3月26日，「政法兵團」、二外「紅衛兵」等組織公開貼出大標語，指責學習班犯了方向錯誤，提出「丁國鈺之流必須公開檢查！」「新北大公社」廣播站3月25日在校園內重新播放了批評學習班的大字報稿。3月26日，「新北大公社」組織了有一千餘人參加的遊行示威。3月30日，李鍾奇代表學習班領導小組作檢討，承認學習班「沒有抓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階級鬥爭，革命小將的意見也提出了這一點，我們認為是打中了我們的要害」。

搞了幾個月的「鬥私批修」、反派性，好不容易才把形勢穩定下來，終於使北京高校一度出現了大聯合、三結合的高潮，儘管這個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地製造出來的假像。但經3月份的炮打謝富治、「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鬧，好景全部化為烏有，許多已經聯合的院校都出現了反覆，派性鬥爭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加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學習班根本無法按預定計劃進行，並且難以繼續維持。

4月19日，學習班舉行結業式，李鍾奇在講話中說：「毛主席說，辦學習班的時間不要太長了，大體兩個月左右。參加學習班的離校兩個多月了，尤其是頭頭，特別是當前階級鬥爭激烈，要有正確的領導，回校要立新功。我們徵求了大家的意見，經北京市革委會和衛戍區黨委的同意，我現在正式宣布學習班結束。」就這樣，北京高校學習班在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的情況下草草收場。這一場大規模圍剿紅衛兵派性、促進聯合的努力完全失敗。在此之後，北京各高校內派性鬥爭有增無減，愈演愈烈，進入了一個矛盾普遍激化，校園武鬥之風盛行的新階段。

2 「耿黃反黨集團」與九十一人大字報

1967年11月12日，耿飆（駐緬甸大使）、黃鎮（駐法國大使）串連一些駐外大使，聯合署名貼出一張大字報，反對打倒陳毅，反對把十七年的外交工作說得漆黑一團，譴責在外交部泛濫成災的極「左」思潮，指出「王八七」的陰魂未散，還在干擾着外交工作。大字報指出：「現在有一股反中央、反總理、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風，一再侵襲我部，王力『八七』講話這株大毒草出籠以後，我部竟發生了篡奪中央外交大權，大量竊取核心機密，對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實行白色恐怖，違法亂紀，胡作非為，……使我部運動和外交工作一度脫離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使黨和國家遭受到不可彌補的損失，給七億中國人民丟了臉。」在大字報上簽名的共有二十六人：耿飆、黃鎮、許建國、仲曦東、曾濤、康矛召、趙行志、楊琪良、章文晉、張世傑、何英、姚念、柴澤民、熊向暉、韓克華、岳欣、俞沛文、陳志方、周秋野、楊守正、陳坦、陳叔亮、朱其文、姚仲明、王雨田、張海峰。後來外交部在批判右傾翻案風時，造反派將耿、黃的問題上升為「耿飆、黃鎮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在他們之後簽名的許建國、仲曦東、曾濤、康矛召四位大使，被扣上了「耿黃反黨集團」的「四大金剛」的帽子。⁸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九十一名司長、大使聯名貼出題為〈揭露敵人，戰而勝之，徹底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的大字報。⁹在此之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重新主持外交部工作，外交部開展了「批極左、抓壞人」的運動。曾經紅極一時的造反派幹部姚登山已被隔離審查。

8 耿飆：《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36—240。

9 這張大字報是由當時的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西亞北非司司長陳楚、禮賓司副司長韓敘、外交學會副秘書趙政一等人聯合寫的，大字報在公開貼出之前曾被送到外交部黨委和臨時性權力機構「大聯合籌備委員會」審閱。聽到消息的司長和大使們爭相在大字報上簽名，簽名者在一兩天之內就達到了九十一人。參見阮虹：《一個外交家的經歷：韓敘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115—116。

九十一人的大字報說：

從去年四月份開始，外交部圍繞着「打倒陳毅」和反對「打倒陳毅」的問題，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這場鬥爭絕不僅僅是關係陳毅同志個人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對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問題，關係到外交部究竟由甚麼階級掌權和執行甚麼路線的問題，一小撮階級敵人多次要打倒陳毅，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堅決對陳毅同志「一批二保」，這場鬥爭是一場資產階級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鬥爭，是外交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焦點，階級敵人的陰謀必須揭穿。「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必須批判。

大字報援引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都說過「陳毅是個好同志」的話來證明「陳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大字報說：

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揪壞人，批判極「左」思潮，狠抓政策，紀律，運動的矛頭始終應該對準一小撮階級敵人，不應該把陳、姬、喬的問題去當主攻方向，也不應該把革命同志的錯誤、缺點抓住不放，正確對待幹部是忠於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主要標誌。……中央明確規定：外交大權不能奪、機要機密不能奪，業務和人事檔案不能擅自動用，政治部是毛主席倡議建立的，不能砸爛。但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和一些極「左」分子竟公然違抗中央指示，封閉了部黨委，砸爛了政治部，篡奪了機要局、破壞了檔案制度，泄露了大量機密，使中央的外交大權、人事大權、機要大權一度旁落和中斷。

大字報最後寫道：

一小撮階級敵人在陳毅問題上製造的混亂，已開始得到澄清，被顛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顛倒過來！……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日理萬機，十分勞累，我們外交部和駐外使館廣大革命同志一起，熱烈

歡迎陳毅同志盡快回來主持部務，我們將在陳毅同志為首的部黨委的領導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大字報反映了處理王、關、戚後，當時許多老幹部中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種種現象的不滿和懷疑，他們長時間憋在心裏的話在這裏一吐為快。但政治經驗豐富的周恩來卻認為，這是一張「幫倒忙」的大字報，他決定此事應該避免擴大。周恩來嚴厲批評了九十一人的大字報，認為九十一人大字報主要有三個錯誤：一，借保陳毅實保自己；二，保陳幫了倒忙；三，與群眾有對立情緒。周恩來認為，對陳毅，「要先批後幫再保，但現在不能講幫和保，首先要批，批了才能服人，批要放在黨委的自我批評基礎上。」

陳毅理解周恩來的苦心，他於2月28日寫信給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周恩來的批評。陳毅在信中說：

我近日讀了外交部九十一位同志的大字報，我又讀了大聯籌和使館四十五個戰鬥隊對該大字報的聲明，部黨委姬、韓、喬三同志先後向我轉告總理對九十一人大字報指示。我現在鄭重聲明，我完全擁護總理指示。九十一人的大字報，其精神和立場是右傾保守的，是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是發泄對革命群眾大批判的怨言的。這張大字報對我改正錯誤毫無幫助，對大字報的作者，則更有助長他們與群眾對立的危險，我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不同意這種錯誤精神和立場。……現在是我改正錯誤的時候，而絕不是評功擺好的時候。批評我者對我有幫助，現在來講好話對我沒益處。……九十一位同志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年多後，竟然拋出這樣一張大字報，說明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真正受到教育。他們與我共事多年，我平日政治不掛帥，對他們幫助太少，我作為領導者，對於他們犯錯誤，我是有責任的。¹⁰

10 陳毅給周恩來的一封信及外交部九十一名司長大使的大字報（1968年2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周恩來後來又對九十一人大字報作過幾次嚴厲批評，說了不少過頭的話。在3月11日和陳毅一起在外交部的講話中，他說：「九十一人大字報代表外交部一股頑固保守勢力，甚至是反動勢力、保字號老保翻天。……這張大字報是反對毛主席的，站在反動立場上，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¹¹ 3月12日，在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館代表時說：「今天，至少外交部、外交學院包括在內，整個北京大專院校右的苗頭已經出現了。在外交部不僅有右的苗頭，九十一人大字報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¹²

3 「楊余傅事件」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的命令〉。命令全文如下：

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

(一) 楊成武犯有極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職務，並撤銷其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

(二) 余立金犯有極嚴重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

(三) 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

此命令發到團，傳達到全體指戰員。¹³

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又發布〈關於黃永勝、溫玉成任職的命令〉，任命黃永勝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副總參謀長溫玉成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11 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的講話(1968年3月11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2 周恩來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館代表時的講話(1968年3月1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3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28。

楊、余、傅三位高級將領突然被打倒，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林彪、江青等人事後攻擊他們的種種罪名現大多得到澄清，但其中一些具體情況至今仍不為人所知。

3月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軍隊幹部大會發表講話說：

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的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中間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的問題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說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說最近從空軍裏面發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兩面派和曲解馬克思主義。¹⁴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也先後在大會上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宣布的我們偉大領袖、偉大統帥毛主席的英明決定和命令」。大會結束前，毛澤東出面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

3月27日下午，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北京市十萬軍民出席了大會。周恩來在會上宣讀了中央3月22日發布的兩個命令。江青在發言中將「楊、余、傅」作為「右傾翻案風」的代表進行了批判。她煞有介事地說，傅崇碧帶武裝，沒有經過中央文革負責同志的允許，開了兩部汽車，擅自闖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她還說，北京大學有兩個戰鬥組織給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寫了一封信，但沒有

1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87。

收到。結果傅崇碧派了一個人到北京大學去要信的底稿、要名單、要後台。這是不正常的，剝奪了革命群眾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權利。她在講話中還把「楊、余、傅」說成是「王、關、戚」的黑後台。¹⁵

4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通知說，中央辦公廳已將3月24日、27日兩次大會上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的講話錄音複製發到各地，要求各地普遍播放這兩次大會的錄音。¹⁶全國各地紛紛舉行集會遊行，開展「粉碎右傾翻案風」運動。

「楊余傅事件」的發生，一方面是因為毛澤東以及「無產階級司令部」感到有「右傾翻案」的危險，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三人都與「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有關係。楊、傅被認為是聶榮臻晉察冀山頭的，余是新四軍幹部，是陳毅的部下。整楊、余、傅，也是對「二月逆流」的再一次打擊。4月6日，聶打電話向葉群詢問：楊成武的「黑後台」究竟指誰？葉群答覆說，並沒有點名嘛，社會上正在炮轟，將來轟到誰就是誰。4月7日，聶寫信給毛澤東，希望就楊成武「黑後台」問題同毛澤東面談一次。4月10日，周恩來電話轉告毛澤東在這封信上的指示：「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¹⁷

李先念的秘書程振聲回憶說：楊余傅事件後，「毛澤東一時聽信了林彪、江青一夥的謊言，親自找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談話，批評他們的『錯誤』，要求他們表態。3月28日，李先念被迫在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人員大會上公開檢查『二月逆流』的『錯誤』。」¹⁸

「楊余傅事件」後的一個直接後果是由軍委辦事組取代軍委常委。1968年3月25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向林彪報告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討論過新的軍委辦事組名單，擬了五個同志，現先送上，請考慮是否妥當，並請在您考慮後，向主席報告請示。名單：黃

15 中央首長在首都十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8年3月2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16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04。

17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096。

18 程振聲：〈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中華兒女》，1998年第8期，頁5。

永勝組長，吳法憲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當天，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毛澤東批示：照辦。1968年3月28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接見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毛澤東說：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¹⁹所謂不開會了，就是不管事了，幾個元帥就此都靠邊站了。

3月30日，吳法憲在軍委辦事組會上說：「經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組辦事組，由總部、軍種主要負責人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領導下主持軍隊工作。辦事組成員由黃、葉、李、邱和吳五個人組成，將來還可以加一個劉賢權同志，黃為組長，吳為副組長。」6月11日晚，黃永勝、吳法憲接見軍委辦事組全體工作人員，吳法憲說：「中央決定，軍委停止工作，軍委常委工作實際上已集中到辦事組來了，起到過去軍委辦公會議的作用。在主席、林副主席領導下，直接對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負責。」²⁰

二 「清理階級隊伍」

「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為了制止武鬥、克服派性、推進大聯合、「三結合」而開出的一個藥方。它在客觀上有一些抑制無政府主義的作用，但總體來說，它打擊的對象絕大多數是無辜的幹部和群眾，造成了無數的慘案、冤案。

「清理階級隊伍」持續搞了很長時間。毛澤東曾說過，搞一段時間以後「要煞車」，但和歷來的群眾運動一樣，一旦把千百萬群眾發動起來，要煞車就不容易了。而且按照毛澤東的「剝筍政策」，也需要不斷地將「清理階級隊伍」搞下去。「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打擊對象也在不斷地變換，開始是所謂「九種人」，即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27。

20 王年一：〈關於「軍委辦事組」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1年第7期，頁47—48。

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後來又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查林彪死黨等運動聯繫起來。本節所介紹的僅為1968年至1969年期間的「清理階級隊伍」情況。

全國「清理階級隊伍」的規模有多大，總共傷及了多少人，至今未見有準確的統計數字。據最保守的估計，全國總共清理出的所謂階級敵人在二百萬以上。許多地區的「清理階級隊伍」採用了「群眾專政」的形式，使用了很多野蠻、殘酷的辦法。

關於「清理階級隊伍」中的揪鬥場面，劉再復有過動人心魄的描述：

早在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吳宓就因為他是《學衡》的創始人和主編而被批判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死敵」、「蔣匪幫的鷹犬」，受盡污辱，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比其他知識分子更有心理承受力。面對革命狂潮，他告訴自己：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俎上之魚，怎麼也得挨刀。無論怎麼交代，反正少不了揪、打、踢、罵，不如橫下一條心由他辱罵毆打。因為他有心理準備，所以抄家、辱罵、搨他的耳光，他都默默地忍受了。可是，他無法承受一個瞬間，那就是群眾喊着震天動地的口號把他揪出來的瞬間，這個瞬間，如此突然，如此恐怖，如此瘋狂，如此無情，它就像一道雷鳴閃動把他撕得心肝俱裂。吳宓這位內心十分堅韌的學人，不能不向自己的朋友承認，他害怕，他害怕這一瞬間。他說：「辱罵吼叫叫我司空見慣，揪扯踢打雖然痛切肌膚，久了也就多少習慣了些，噴氣式確實極乏極累，咬咬牙也還能死命撐過去。我最驚恐者莫過於開會之初，先將我置於會場附近的角落，然後聽到會場震天動地的雷鳴怒吼：『把吳宓揪出來』，迎面有兩個壯漢奔來，各舒一手，抓起我的左右臂，風馳電掣奔向會場，待我腳不點地，運足不及之際，他們『刷』地甩開手，我就猝不及防，仆倒在地，衝力大，跌得重，腦轟，軀裂，四肢散架，其痛苦殊難言語形容；還不待我呻吟，他們又以無比之大力，如抓雞拎鴨，拎起我飛進會場；所以每聞那一聲『把吳宓揪出來！』我就心膽俱裂。看，我這腿，就是這樣摔斷的。」

讀了這段話，我立即明白，這是一個真正殘酷的瞬間，是一個人從生理到心理受到全面摧殘的瞬間，是一個視覺、聽覺、觸覺等人的全部感覺受到全面摧殘的瞬間。這個瞬間，不是走向法庭或走向刑場那種可以由你選擇姿態的瞬間，而是野蠻的群眾暴力左右一切並不容分說把你推向無底深淵的瞬間。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全面專政與群眾專政，在這一瞬間中表現得最壯烈，但也最殘忍。難怪吳宓先生要心膽俱裂。²¹

1. 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

「清理階級隊伍」最早是江青於1967年11月27日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提出來的，她說：「在整黨建黨的過程中，在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都要逐漸地清理隊伍，有黨內，也有黨外；黨內的，就是要消除叛徒、特務及犯了嚴重錯誤死不悔改的人。」在這之後，上海、北京等少數地方就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活動。毛澤東對全國許多地方派性鬥爭激烈、大規模武鬥不斷發生的現象十分惱火，他當然不可能認識到這是他搞文化大革命必然導致的結果，他認定要麼是黨內走資派操縱、挑動的結果，要麼就是有階級敵人在背後操縱指揮。1967年12月18日，他在同阿爾巴尼亞外賓談話時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過。等到事情出來以後，就看出了現象。」「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鬥爭。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鬥的幕後指揮。」²²

1968年3月，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一個重要的判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

21 劉再復：〈心膽俱裂的瞬間〉，《中國老年報》，1977年8月1日。

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15。

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²³ 此後，「清理階級隊伍」的步伐大大加快。5月8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強調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並且提到了共產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提到了江西的打AB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²⁴ 5月11日，毛澤東在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談話時說：

整頓隊伍，把壞人抓出來，基本上是對的。自從我說了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戰爭的繼續後，抓了一批國民黨壞人。抓壞人還是要搞，但是要有條件，要有人掌握。搞到甚麼時候，就要煞車。

〈十六條〉規定，現行反革命就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國家財產。貼了幾張反動標語，也不一定要抓嘛！總之，現在現行反革命的範圍相當擴大。

只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麼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

對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分別，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根本分別，是資產階級專政同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分別。²⁵

5月15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並發出〈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通知〉中稱：北京市「在很短的時間內，已經揪出一批隱藏在革命隊伍裏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革命分子，進一步清理了階級隊伍，給了階級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取得了

23 1968年3月18日，在接見浙江省赴京代表團的會議外，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這個判斷。4月1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芙蓉園裏盡朝暉——熱烈歡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澤東的這段語錄。

24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16—1517。

2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16。6月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七千萬四川人民在前進——熱烈歡呼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中，用黑體字引用了最後一段話。

很大的成績」。謝富治在會上說：「目前，全市各單位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最新指示精神，按照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都在進行這一項工作。」北京市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出現了大批自殺現象。²⁶謝富治在講話中說：

關於自殺的問題，特別是農村，還有學校、工廠都存在，我建議農村要停止一個星期的清理工作，把自殺的風剝下去以後，再進行。當然，這麼大的運動個別壞人自殺也是難免的，但是多了對我們的工作開展不利，很多問題就不好查了。自殺的原因一方面是壞人畏罪自殺，另一方面我們革命群眾可能交代政策、指明出路不夠，即使是反革命，也不要殺嘛，只要他願意接受改造要給予出路，至於活活把人打死，那就更不對了。當然，這些事情都是由於沒有經驗所造成的，不要去追查責任，主要的是總結經驗。²⁷

5月19日，毛澤東在看了新華社《文化革命動向》第1220期上所載的〈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一文後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了這一材料，要求全國各地「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²⁸這以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很快席捲全國。

6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甚至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壞人）」。毛澤東說：

過去我們留下了一些表現比較好的國民黨人，這是我們的政策。我們沒有教授、教師，沒有辦報的，沒有藝術家，也沒有會講外

26 1968年7月4日，北京市革委會向中央報送〈關於清理階級隊伍情況的第二次報告〉。〈報告〉中說，清隊中出現了坐飛機、掛牌子、打人、刑訊、逼供、遊行等錯誤做法。前一段死人較多，全市自殺1687人、打死157人，其中農村自殺1262人、打死145人，現在正在對錯誤做法進行糾正。參見《當代中國的北京》編輯部：《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2003）》（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頁239。

27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20。

28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26—127。

國話的，只好收羅國民黨的一些人或者比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國民黨有計劃的隱藏在我們的工廠、政府機關和軍隊裏。……當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師、技術人員一個也不好，不是這樣，但有一部分很不好。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加以清理，好的繼續留下來做工作，壞的踢開。²⁹

7月，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向中央上報〈關於廣州地區敵情的報告〉，其中說：「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一直在進行着變天活動。據統計，全省光是軍、政、警、憲、特五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漢奸、反動會道門中小道首即達四十二萬人，佔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這些人是翻案復辟的急先鋒。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打進了我們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事業單位和各種文化界。」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各地大都如此，不獨廣東一處。」³⁰北京市的「敵情」更為嚴重。據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1968年10月寫的〈北京市專政對象統計資料〉，北京市共有地富反壞右敵偽軍政警憲特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共計142559名，約佔全市人口總數的2%。³¹

2 部分省市「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於1968年5月以後在全國範圍內普遍開展起來，不過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一般說來，在省市革委會成立比較早的地區，「清隊」搞得也比較早，比較深入。許多地方由於派性鬥爭激烈，武鬥成風，根本就顧不上搞甚麼「清隊」。以下列舉若干地區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具體情況及一些統計數字。

29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18。

30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18。

31 北京市革委會衛戍區上報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寫的〈北京市專政對象統計資料〉(1968年10月8日)。

1968年5月中央批轉北京新華印刷廠「清隊」經驗後，上海市革委會成立領導全市「清隊」工作的專案辦公室，下轄眾多的專案組。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僅市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在抓叛徒和「清隊」運動中製造了大量集團性冤假錯案。上海地下黨冤案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例。全市地下黨被按解放前的原工人運動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學生運動委員會、警察工作委員會和中共上海文委等系統，建立了39個大案，845個小案，全市共有3675人被立案審查，受到殘酷迫害。文革前擔任區、縣、局以上領導職務的原中共地下黨員有99人被趕離領導崗位，65人被拘捕或隔離審查，4人被迫害致死。在科技界僅所謂「兩線一會」假案直接株連到全市科技系統十四個單位的639人。上海文化界原有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到衝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文革前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常委、上海市長、副市長的二十位領導幹部，除張春橋、馬天水、王少庸三人外，全部被誣為「叛徒、特務、走資派」等，遭到殘酷迫害，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機關900多名幹部被誣陷審查批鬥，市委統戰部長陳同生、教衛部長常溪萍等46人被迫害致死。全市局級以上幹部1019人中，受到立案審查的有853人。³²

1968年9月2日，北京市革委會辦事組在〈關於當前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的報告中說：截至8月28日，全市已有68000多人被「揪出」；由於實行了群眾專政，7、8兩月有430人被毒打致死。³³ 11月18日，市革委會在〈關於清理階級隊伍情況的報告〉中說：截至11月13日，全市揪出的各類階級敵人已達80100人；其中：叛徒3297人，特務4761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3207人，現行反革命分子9993人，反動學術權威203人，反動資本家2319人，新挖出的五類分子14435人，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

32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在上海8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657-658。

33 《當代中國的北京》編輯部：《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198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頁263。

子27565人，其他壞分子14320人。³⁴ 1969年3月9日，北京市革委會在呈送中央的〈關於當前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報告〉中說：「到2月底，全市已揪出9.9萬人」；全市已有80%左右的單位進行核實定案，截止到2月20日的不完全統計，全市已定案1.5萬人，佔新挖出壞人(不含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總數的22%，其中定為敵我矛盾的，佔已經定案總數的54%。³⁵

1968年6月28日至7月10日，遼寧省革委會召開第三次常委會議，會議提出狠反右傾思想，放手發動群眾，向階級敵人發動更猛烈地進攻，把各級革命委員會建設成堅強的戰鬥指揮部。會後在全省開展對敵鬥爭，「清理階級隊伍」，大搞「群眾專政」運動。全省有一批幹部和群眾被當作「一小撮階級敵人」受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任意侵害公民權利，隨意抓人、抄家，大搞逼供信，全省上萬人致傷、致死，十幾萬親屬受株連，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嚴重損失。7月4日，遼寧省革委會將鞍山市公安局軍管會總結出的「群眾專政」經驗(即所謂「群專、群偵、群審、群判、群管」的「五群」經驗)轉發全省。³⁶ 這一經驗推廣後，群眾專政隊說揪誰就揪誰，說批鬥誰就批鬥誰，說專政誰就專政誰。私立公堂、私設監房，刑訊逼供，任意踐踏人權，打人致殘致死，任意定性判刑，更有甚者任意將人處死。³⁷ 毛澤東的侄子、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毛遠新後來交代說：「1968年夏，鞍山市送來一個所謂依靠群眾專政辦案的經驗，省革委會討論，決定轉發全省推廣，委託我根據大家討論起草一個批語，文件下發後出現了惡劣後果，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從1968年到196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達二萬多人。批語是我起草的，對此我負有重大責任，是對遼寧人民極大的罪惡。」³⁸

34 《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1989)》，頁265。

35 《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1989)》，頁267—268。

36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講話中說：「鞍鋼有個審訊偵緝的案子，由群眾辦，消息靈通，多少年沒查出來的案子搞出來了。」可見，毛澤東對遼寧「群眾專政」的經驗是很欣賞的。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7 高峰主編：《中共遼寧黨史大事記》(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頁258—259。

38 章捷、鹿音：〈張海妮：我為毛遠新辯護〉，《中華兒女》，1999年第5期，頁19。

1968年5月19日，吉林省、長春市革委會召開「深批深挖，向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動員大會」。會議要求，把「革命大批判」同本單位鬥批改緊密結合起來，向無產階級的一切敵人主動開展猛烈進攻，把他們批深批透、鬥倒鬥臭，徹底肅清他們的「修正主義流毒」，把隱藏的「叛徒、特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統統挖出來。此後，全省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0月21日，吉林省公安機關軍管會在《保衛工作情況》第十五期〈當前清理階級隊伍的一些情況〉中指出，從4月全省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到9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090人，其中，走資派2620人，特務6712人，叛徒16254人，五類分子46037人，有現行活動的五類分子9601人，其他8876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560個，共有集團成員12464人，發現特務、叛徒、反革命嫌疑線索30000餘件。³⁹

1969年5月5日，山東省革委會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全省「清理階級隊伍」清理出叛徒23596人，其中中共黨員6294人；清出特務9131人，其中中共黨員1080人；清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5609人，其中中共黨員4787人；清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58985人，其中中共黨員2549人；清出現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中中共黨員526人；清出其他9046人，其中中共黨員660人。清理出的總數為11.36萬人，其中中共黨員15896人。對清理出的人員處理結果為：逮捕1810人，拘留490人，戴帽5619人，不戴帽2584人，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4111人。⁴⁰

1968年7月，浙江省革委會召開第二次全會（擴大）。會議把「狠抓階級鬥爭，大力開展清理階級隊伍」作為鬥爭的大方向，認為：當前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人民群眾同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以及一切公開的暗藏的反革命之間的矛盾，鬥爭的焦點仍然是政權問題；主攻方向仍然是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及其爪牙，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會後，全省更大規模地進行清理階級隊

39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吉林省委活動大事記（1966—1987）》（長春：1990），吉林省內部資料准印證第90065號，頁75—76。

40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編著：《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550。

伍。8月10日，浙江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討論清理階級隊伍問題時，南萍說：「省委書記和副省長一級幹部，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務，有的是假黨員，沒有一個好的。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叛徒、特務，已經核實的，宣判一批。」陳勵耘說：「溫州就有叛徒三千多人，已混入縣、省至中央各級的一百多人。要把一些影響大的地委書記、部、廳、局長，判幾個讓群眾看看。」原浙江省委委員42人，清隊中28人受審查，佔三分之二；原地委書記、廳、局一級幹部400人，清隊中有133人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佔三分之一。浙江全省被關押揪鬥的約數10萬人，被逼致死9198人。⁴¹

1968年4月15日至27日，江蘇省、南京市革委會第一次會議同時召開，會後於5月6日發布了〈南京市革命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決議〉。決議要求全市人民立即「掀起一個革命大批判、大鬥爭的新高潮，主動地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6月12日至17日，江蘇省、南京市革委會聯席會議又作出〈充分發動群眾，向階級敵人展開更加猛烈進攻〉的決議。19日至20日，全市立即展開了大學習、大宣傳、大貫徹省市革委會決議的群眾運動。僅19日，全市就有約十萬人參加遊行，許多單位普遍召開了座談會、宣講會、誓師會。駐寧部隊抽調了二千多人，組成626個宣傳小組，到982個單位進行宣傳。20日，「市工人大聯委」舉行大集會，宣傳〈決議〉精神。28日，南京高等院校召開「掀起對敵鬥爭強大攻勢大會」，決心落實省市革委會的〈決議〉，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掀起大批判高潮。與此同時，各單位在排摸本單位所謂基本「敵情」的基礎上，一方面組織包括家屬在內的所有人員參加的各種形式的學習班、座談會，學習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理論和對敵鬥爭指示；另一方面，各級領導和解放軍「支左」人員深入各單位、廠礦科室、車間、各居民段，開展談心活動，發動群眾，進行大檢舉、大揭發。各單位還組織專案隊伍，對一些「重大線索」、「重要人物」進行專案審查。截止年底，全市共初步揭發出叛徒429人，特務1954人，死

41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63—164。

不悔改的走資派225人，現行反革命1074人，歷史反革命2343人，階級異己分子652人，蛻化變質分子156人，其他「反、壞分子」3462人。在這個階段，運動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其中有3人被打死，333人自殺。⁴²

1969年4月，雲南省革委會政工組在昆明召開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座談會，會上省革委會「清隊」領導小組負責人劉潤泉作了題為〈乘九大浩蕩東風，扎扎實實全面落實無產階級政策〉的報告。報告說：雲南省的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是從1968年12月中旬開始的，到1969年1月上旬全面展開。到4月份，全省有120個縣(市)開展「清隊」工作，破獲了各種反革命集團案件2030起。至1969年底，全省共清出、揪出「九種人」237310人，其中：叛徒3231人，特務5481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66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208901人，現行反革命分子18028人。破獲「反革命集團」1854起，其他集團案件818起，各種反革命和刑事案6769起。⁴³

山西省大同市從1968年3月中旬開始開展「清理階級隊伍」，5月在全市鋪開。截至當年11月底，全市共挖出「反革命分子」3955名；發現和破獲了一批「特務和反革命案件」；揪出混入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壞人」近百名。此外還進行了全市戶口大清查，查出「五類分子」和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500餘人。大同礦務局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涉及了8245人，造成29起重大冤假錯案。刑訊逼供致傷致殘的就達575人，致死105人。僅「國民黨大同煤礦區黨部」一案就涉及到3627人，致死20人。⁴⁴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清理階級隊伍」搞得也很厲害。1968年6月19日，兵團黨委、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發出〈關於清理階級隊伍應注意幾個問題的通知〉。通知規定：清理階級隊伍，主要目標是清理叛徒、

42 中共南京市委辦公廳、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南京市檔案館編：《風雨同舟——南京探索前進三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468—469。

43 《雲南五十年——中共雲南省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頁149。

44 中共大同市委黨史研究室：《大同市解放後黨史大事記》（大同：內部出版，1987），頁295—296。

特務、反革命分子、張仲翰餘孽⁴⁵，堅持反動立場的國民黨殘餘勢力及隱藏的牛鬼蛇神等。全兵團又掀起大揪大鬥幹部群眾的高潮，從1968年6月到1969年12月，歷時一年零六個月的「清隊」工作，先後揪鬥14700多人。兵團政治部被誣指為「張仲翰在兵團復辟資本主義的黑參謀部」，是「兵團保守勢力的核心和大本營」，被列為清理的重點單位。當時兵團政治部共有幹部261人，204人被揪鬥、抄家、逮捕、關「老牛班」、清洗「下放」和受其他處分，其中2人被打死。各師也如法炮製。農三師大搞所謂「上揪下掃，左右開弓」，先後被鬥的幹部群眾計4970人，非正常死亡156人，因傷致殘256人，刑罰120多種。農八師清出所謂「壞人」4990人。農四師有7596名無辜群眾被關被打，其中打傷1352人，致殘261人，死162人，孕婦被打流產35人，被打致癲19人。⁴⁶

安徽省從1968年1月起，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在運動中大搞逼、供、信，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到9月底，清理出所謂「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叛徒」、「特務」、「壞人」等10萬多人。到11月底，又增加一倍多。據1969年4月的統計，全省「清隊」中揪出各種所謂「壞人」竟達43萬多人。⁴⁷

三 新的派性鬥爭高潮

1968年3月中旬，在中央提出「反擊右傾翻案風」後，全國又出現了新的派性鬥爭高潮。尤其是毛澤東關於文革是國共兩黨長期鬥爭的繼續

45 張仲翰原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新疆軍區副政委、中央農墾部副部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第二書記。文革開始時，張仲翰被打成「反黨集團」的主帥，一大批兵團幹部群眾被稱為「張仲翰餘孽」。1979年11月，解放軍總政治部對張仲翰在文革中的問題做了複查結論，為其徹底平反。

46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發展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頁288—289。

47 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安徽80年簡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頁182。

這條語錄一出來，無異於給原來尖銳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派性鬥爭的大火上澆了一瓢油。過去兩派對罵，不過是罵對方為保皇派、極左派、「大雜燴」等等，現在都上網為階級鬥爭，都將對方罵為國民黨反動派，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鬥。4月2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中公然提出了「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派性」的口號。4月2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刊登《紅旗》雜誌第一期評論員文章〈對派性要做階級分析〉，對這個口號還作了理論上的闡述。文章說：「世界上沒有超階級的黨性，也沒有超階級的派性。無黨性的觀點，是資產階級虛偽的超階級觀點。派別鬥爭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階級內容，就會分不清是非，就會抹煞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反動派的區別。這正是右傾機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此後，派性在「堅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派性」的名義下又猖獗起來。

四川成都地區的「八二六」和「紅成」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始終存在着尖銳的矛盾。1967年9月下旬，四川省革籌和四川省駐軍為貫徹中央關於大聯合的指示，努力促成兩派的聯合。在成都警備區負責人的主持下，「八二六」與「紅成」進行了六次談判，但終因在對待「紅十條」，尤其是在對待劉結挺、張西挺的問題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而未能達成協議。10月1日，兩派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廣場慶祝國慶大會上再次發生武鬥。成都乃至四川省一度出現的和緩局面，又轉入大規模武鬥所造成的動亂之中。1968年1月，成都的「八二六」和「紅成」在成都市搶佔據點，封鎖道路，展開爭奪戰，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的嚴重損失。2月17日，「八二六」和「紅成」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南路展開大規模槍戰，打死行人七人，打傷行人十五人。雙方的爭奪戰至3月7日才基本結束。在這場武鬥中，雙方共被打死三十人，被打傷十二人；無辜群眾被打死十人，被打傷三十五人。在成都警備區的再三勸說下，成都兩派於3月4日達成〈關於立即全面停火、制止武鬥的協議〉。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作出〈對成都兩大派工人、學生、市級機關等革命群眾組織全面達成大聯合協議的指示〉。〈指示〉對成都兩大派達成協議表示熱烈支持，要求各個群眾組織、廣大群眾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已達成的協

議，鞏固和發展大聯合，為盡快建成省、市及各級革命委員會而努力奮鬥。3月15日，中央接見四川省革籌、成都軍區和駐川部隊的負責人，批評「紅成」和重慶「八一五」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劉結挺、張西挺。江青在講話中說：反對劉、張，就是為李井泉、廖志高翻案，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就是反對「紅十條」，就是右傾翻案復辟。此後，四川武鬥再次升級，尤其是重慶的「反到底」與「八一五」之間，從年初開始發生的大規模武鬥，發展到用大炮、坦克、艦艇進行武鬥，使重慶陷入武鬥的戰亂之中。⁴⁸ 7月，宜賓地區革委會主任王茂聚發動第三次「武裝支瀘」（第一次、第二次分別是在1967年的7月和9月），鎮壓反對劉結挺、張西挺的一派群眾組織，挑起了川南地區大規模的武鬥。宜賓方面上萬人武裝隆昌、納溪、合江、瀘州等地，企圖一舉全部消滅反對派，武力統一宜賓地區。據不完全統計，三次「武裝支瀘」，共有三萬多人捲入武鬥，被非法抓捕、關押、揪鬥的人數以萬計，僅致死的人，經清理核實，即達二千餘人，國家財產損失達數千萬元。⁴⁹

3月28日，武漢「鋼工總」頭頭朱鴻霞、胡厚民等發表聲明，認為武漢為王任重、陳再道翻案的逆流不僅有，還很嚴重。在他們的煽動下，前一個時期有所收斂的無政府主義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之間的派性鬥爭和武鬥流血事件重新加劇，連續發生衝擊部隊和搶劫、破壞國家財產和公共設施、殺傷解放軍指戰員和群眾等惡性事件，武漢地區局勢再度惡化。從5月11日至23日，湖北全省已有三十二個縣、市發生搶槍事件五十多起。5月27日、28日兩天，就有一百多個單位的武器被搶，被搶步槍、手槍和衝鋒槍58枝，輕機槍80挺，手榴彈3300枚，子彈220萬發。從搶劫一般的軍用倉庫發展到搶劫國防戰備倉庫和搶劫野戰部隊戰士手中的武器；由暗搶發展到明搶，開着汽車到軍火倉庫去搶。⁵⁰

48 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50—1978）》（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325—329。

49 楊超等主編：《當代四川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195。

50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06—108。

毛澤東在對待各地的派性鬥爭和武鬥問題上，起初是採取比較超脫的態度。他認為亂和武鬥並不可怕，亂可以暴露矛盾，暴露敵人。對待武鬥，就讓他們打去，「他打夠了，就不想打了」。「打夠了，不願再打了，問題已解決了。好像身上長了一身膿瘡，把膿擠出來，身體更健康了」。⁵¹「凡是爛透了的地方，就有辦法，我們有準備。凡是不痛不癢的，就難辦，只好讓它拖下去。」⁵² 1968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現了嚴重的派性鬥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不少大學都出現了大規模武鬥，在毛澤東的影響下，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衛戍區採取了「四不」政策，即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⁵³ 但武鬥愈打愈凶，死人愈來愈多，最後毛澤東不得不改變態度，派工人宣傳隊開進大學校園。

本節以北京為例，介紹1968年3月以後大、中學校內的派性鬥爭，以致武鬥的情況。

1 「四三派」與「四四派」

從1967年5月起，北京中學「紅代會」開始出現分裂，各區縣的「四三派」和「四四派」相繼成立了派性的區縣分會或分團。「四三派」要求對中學「紅代會」進行改組⁵⁴ 以改變「紅代會」內的力量對比。8月發生中學「紅代會」機關報糾紛。8月18日，「四三派」《中學紅衛兵》報又加上《兵

51 毛澤東同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的談話，1967年10月30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08。

52 毛澤東與兩位阿爾巴尼亞專家的談話，1967年8月16日。《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99。

53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召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中也談到：「過去革委會、衛戍區對大學的武鬥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還是對的。」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54 7月10日，屬於「四三派」的「中學紅代會十一區縣(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海淀區、朝陽區、石景山區、豐台區、門頭溝區、通縣、房山縣)委員會」發表《聯合聲明》，其中提出要求：「紅代會必須迅速補台」，「我們十一個委員會補選在運動中衝殺出來的真正左派進入紅代會核心組三至五人，常委十至十五人，委員二十至三十人」。

團戰報》名義，刊登「中學紅代會無產階級革命派」⁵⁵的〈嚴正聲明〉，「宣布：自今日起，不承認它(指原來「四四派」的《兵團戰報》)為中學紅代會的機關報。」「自即日起，中學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報紙，新《兵團戰報》與《中學紅衛兵》聯合戰鬥了！她將是我們中學紅代會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機關報！」此後，北京中學「紅代會」就有了截然對立的兩份機關報。在7、8、9月這三個月裏，北京極左思潮大肆泛濫，紅衛兵運動出現失控，中學的「四三派」、「四四派」鬥爭也呈現矛盾加劇、武鬥升級的嚴重局面，出現了幾起致死人命的流血事件。⁵⁶10月，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談話紀要以後，全國混亂的局面有所緩和，北京市各中學內的派性鬥爭也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在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軍訓總指揮部的努力下，中學「紅代會」在12月下旬進行了組織機構整頓：將原來兩派成立的各區縣分會一律取消；兩派的報紙全部取消，另辦一份新的「紅代會」機關報；對原來的核心組進行了擴充，使兩派的力量對比相對平衡。至當年年底，兩大派鬥爭漸趨緩和。

從1968年3月起，北京中學「四三派」與「四四派」兩派鬥爭再掀波瀾。首先是部分學校的「四三派」組織恢復活動，北京二十二中成立「三七井岡山」，重提軍訓團支左支錯了的話題，北京五中、二十一中等學校的「四三派」準備召開紀念「四三」一周年大會。4月，在城區的主要街道不斷出現有署名「中學無產階級革命派火炬兵團」的大字報和傳單，大字報的題目有〈71個為甚麼〉、〈30個為甚麼〉、〈31個為甚麼〉和一論、二論、三論〈中學運動向何處去？〉等等。5月20日又貼出〈組織起來——四論中學運動向何處去？〉其主要論點如下：

一、我們與「聯動」和中學紅代會一小撮的鬥爭，就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就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

55 當時各派均自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

56 1967年8月中旬，北京鋼鐵學校「東方紅」（「四三派」）學生丁世德在武鬥中被打死；8月25日，北京電校發生「井岡山」（「四三派」）打死「紅旗」（「四四派」）楊廷華的事件。

二、「四三、四四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通通是騙人的鬼話。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大抓革命造反派的頭頭，把革命小將(如三十一中、二十八中)打成反革命。

三、我們處於無組織狀態，儘管我們的文章揭露得再厲害，再深刻，沒有群眾也是不行的，所以必須組織起來，聯合起來，一聲喚！他們就要發抖！針鋒相對，重新組織起來。甚麼拉山頭啦，破壞大聯合啦，都見鬼去吧！《文匯報》已指出，要發揮革命群眾組織的作用。六中、五中、三十一中、四十四中、二十八中、電校、清華附中、師院附中……都樹旗了。好得很！我們堅決支持！

四、必須串連起來，以小聯合為基礎，哪怕開始只有幾個人，無數的小聯合的星星之火，必將蔓延為燎原的烈火。⁵⁷

「四三派」的一些人在某些大學的支持下，串連了二十多個中學原來的「四三派」組織，成立了「中學運動指揮部」、「火炬兵團」等組織。他們開了一些串連會，印發傳單、張貼標語，訴說「四三派」在革委會的組成、清理階級隊伍、參軍和畢業分配等方面受到壓制的情況。與此同時，「四四派」的一些組織也恢復了派性活動。在許多中學裏，經軍訓團作了大量工作才形成的造反派內部的大聯合出現分裂，又形成兩派對峙的局面。隨着北京各大專院校派性鬥爭的加劇，中學兩派鬥爭也出現激化現象，許多中學發生了武鬥事件。但較之於1967年來說，參加派性鬥爭和武鬥的人數和規模都要小得多了。在持續幾個月的鬥爭之後，由於面臨畢業分配和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展，兩派的鬥爭又逐步緩和。至1969年初，老三屆的畢業生基本上全部離開了學校，「四三派」、「四四派」的鬥爭趨於平息。

1968年春夏之交，當北京中學派性鬥爭重新抬頭的時候，北京軍訓總指揮部對反映問題較多，原來「四三派」和「四四派」鬥爭比較激烈，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的清華附中、一〇一中、人大附中、二十八

57 轉引自北京市革委會教育小組寫的《中學情況簡報》(1968年5月24日)。

中、六中、師大女附中、三十一中、二十七中、五中、師大一附中等十所中學進行了調查，在調查報告中所反映的一些情況和統計數字，對於我們了解當時北京中學「四三派」、「四四派」的矛盾鬥爭的具體情況很有幫助。

在十所中學的革委會中，學生委員共110人，其中「四三派」47人，「四四派」46人，其他17人。革委會主任一般由原來學校的「革命領導幹部」或軍隊代表(軍訓人員)擔任，副主任一派一個。⁵⁸ 可以說，在參加革委會的人數上兩派是基本平衡的，但「四三派」始終認為他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處於受壓制的地位。這主要是因為：

一、在參軍和畢業分配方面，由於「四三派」組織人數較少，而且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和「社會關係複雜」的人較多一些，所以參軍、畢業分配去三線和生產建設兵團的，「四四派」去的較多，「四三派」去的較少。從人大附中、一〇一中、二十八中、三十一中等四所「四三派」、「四四派」人數差不多的學校來看，參軍的總人數是266人，「四三派」36人(佔本派人數的2.4%)，「四四派」143人(佔本派人數的7.9%)，「老紅衛兵」81人，沒參加組織的6人。軍訓總指揮部認為，在參軍問題上，「四四派」學生「有些翹尾巴，說了些不利於團結的話，特別是少數第一批紅衛兵⁵⁹，借此趾高氣揚，使少數「四三派」學生政治上感到有壓力」。

二、學校革委會組織學生參加保衛組、專案組和外出調查工作，也是使「四三派」感到受壓抑的一個問題。據十所學校的調查，參加這些工作的兩派都有，由於各個學校的具體情況不同，兩派參加人數互有多少。人大附中、清華附中「四三派」學生參加這些工作的就多些，三十一中、五中「四三派」學生參加這些工作的就少些。例如五中「東方紅」，在二十一個骨幹分子中，有二十人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或者家裏被抄被鬥，「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革委會的負責同志和駐校軍訓

58 在較早成立革委會的學校，有的是「四三派」掌權，有的是「四四派」掌權，後來都進行了「補台」。

59 指「老紅衛兵」。

團的同志認為「這些人搞專案和保衛工作是不太合適的，群眾對他們也不相信」。

三、在清理階級隊伍的初期，十所學校中有五所揪鬥了學生中的壞人，有四所揪的是「四三派」的學生，⁶⁰一所揪鬥的是第一批紅衛兵的學生。這是使「四三派」感到壓力最大的一個問題。

四、在一些少數「四三派」學生反對過軍訓和軍訓團的學校，「四三派」學生與軍訓團在感情上疏遠，有的始終存在着對立情緒。

軍訓總指揮部在對十所中學進行過調查後認為：「目前參加串連活動的還只是原『四三派』中的少數人，一個學校三五個，多者十幾個人，最多的二十人左右，而且他們長期脫離學校，有的在本組織內也失去了威信，只要我們積極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迅速糾正我們的缺點錯誤，頂住大學對中學運動的干預，他們再拉起隊伍重新掀起中學兩派鬥爭是困難的。」⁶¹現在看來，這種估計是過於樂觀了。北京中學運動的形勢必然受到當時整個北京市的形勢和全國的形勢影響。從1968年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全國許多地區都出現了群眾組織派性復發，內戰再起的情況，北京各大專院校校園內武鬥成風，這些都必然影響北京中學的運動。北京的許多中學後來還是發生了嚴重的兩派鬥爭，武鬥也曾風行一時。

2 校園武鬥

1968年5月7日，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在市革委會會議上說：「反掉無產階級派性還行嗎？過去講錯了，毛主席給我們糾正啦！」在這種形勢下，北京紅衛兵的派性又急速地膨脹起來。一些學生組織的頭頭們認為這是中央要重新啓用他們的信號，是他們重整旗鼓的機

60 北京二十八中在1968年1月中旬揪出「八一八」（「四三派」）頭頭王宇、侯瑛。5月，二十八中革委會將王、侯二人定為反革命壞頭頭。北京六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將「紅旗」（「四三派」）的兩個頭頭康典、李峰（均為校革委會委員）打成壞頭頭。

61 北京軍訓總指揮部關於北京市中學革命大聯合情況的報告（1968年7月11日）。

會。所以，一些紅衛兵辦的小報紛紛拋出諸如〈不許否定革命小將——駁唯「派性」論〉、〈紅衛兵萬歲——徹底粉碎否定革命小將的右傾翻案逆流〉等鼓吹派性的文章。至此，北京市革委會在1968年春天所作的消除紅衛兵派性的種種努力完全化為烏有，兩大派的對立情緒比以前更甚。

3月以來，北京高校的兩大派紅衛兵組織在進行遊行示威等活動中，曾發生過數起小型武鬥事件，造成多人受傷。隨着派性矛盾的逐漸增長，終於在北京許多院校和一些中學爆發了一連串的大規模武鬥事件。其中，以清華大學的武鬥最為激烈，雙方共死亡十餘人。在參加武鬥人數之多和持續時間之長上，北京大學也是可以名列前茅的。

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雙方的衝突和鬥爭一直持續不斷。到了1968年3月，雙方矛盾已異常尖銳。這時，大字報、大標語、高音喇叭的較量已不能解決問題了，因而開始要借助於拳頭、棍棒、長矛，甚至於使用現代化的步槍了。3月中旬以後，雙方小規模的武鬥事件多次發生。雙方在經過充分準備後，於3月28日終於爆發了一起大規模的武鬥事件。「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圍繞着幾座宿舍樓的爭奪，進行了一夜的混戰。「新北大公社」人多勢眾，「井岡山」有其他院校的武鬥隊支持，誰也沒有佔到多大便宜。武鬥的結果，不僅破壞了大量的公共財物和設施，還使得雙方共有四百餘人身受創傷。

在這次武鬥事件之後，還發生了一起聳人聽聞的所謂「刺殺聶元梓」事件。其實原本子虛烏有，不過是聶元梓一夥人借題發揮，向對方施加壓力的手段而已。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3月28日夜間武鬥高潮過後，3月29日凌晨，聶元梓陪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到武鬥現場視察。在圍觀的群眾中，有兩名「井岡山」的學生擠到她的身邊，其中一個打了聶元梓兩拳，另一個用改錐捅了聶元梓的腦袋一下。兩名學生在同伴的掩護下趁亂逃走。當時聶元梓是嚇了一跳，並沒有受傷，她周圍的人也沒有把此事當成甚麼大事。待事過之後，經別人提醒，她才意識到這件事可借題發揮。於是通過「新北大公社」廣播站播出了有人「刺殺聶元梓」的消息，並上報北京市革委會。這一招果然有效，

當天晚上10點半，謝富治親臨北大，不僅表示了對聶元梓的支持，還明確指出：「井岡山」應立即自動交出「刺殺聶元梓的凶手和後台」；外校來北大參加武鬥是完全錯誤的，應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評。

4月26日，北大雙方又發生大規模武鬥，有近百人受傷，十幾人被送進醫院。到27日上午，「新北大公社」佔領二十五樓，封鎖了出入的大門，形成了對「井岡山」的環形包圍。中午，「新北大公社」將食堂封閉，使「井岡山」人員無處吃飯。下午4時，斷絕了「井岡山」總部所在的二十八樓的水、電。下午6時，「新北大公社」相繼攻佔了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樓，採取步步緊縮包圍圈的圍困政策。武鬥中，「井岡山」的一名學生被打死。「井岡山」並未屈服，仍表示要與「新北大公社」決一死戰。

在此期間，北京市的一些大專院校不斷出現各種混亂現象。中共中央關於「復課鬧革命」的要求難以貫徹實施。據當時軍訓辦公室的統計，到1968年5月下旬為止，全市五十九所大專院校只有二十所能堅持復課，有二十幾所院校處於時停時復狀態，有十幾所院校因兩派鬥爭激烈，根本無法復課。據北京衛戍區軍訓辦公室1968年5月18日的報告說：

北大、清華、人大、工業學院等多次發生武鬥，雖經制止，尚未完全停下。政法、電力、輕工、科大、石油、鐵道、鋼鐵等院校也不斷發生小型武鬥和摩擦。上述院校的共同特點是：都把對方說成是「反動加老保」，把兩派鬥爭說成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你死我活的鬥爭」，有的提出「誓與反革命地下復仇軍決一死戰」的口號，企圖通通武鬥搞垮對方。這次武鬥，雙方都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有準備的（如調整部署、構築工事、囤積糧食），而且武鬥工具也有發展。這股武鬥風看來一時難以停止。這些院校兩派組織的大多數群眾是不願武鬥的，許多師生紛紛逃避武鬥。僅清華一校就走了七八千人。

5月14日，人民大學發生武鬥，「人大三紅」衝「新人大公社」的工廠，武鬥中用長矛刺死「新人大公社」一人。5月22日，「人大三紅」與「新

人大公社」爆發武鬥，「新人大公社」當場死三人(二男一女)，⁶²雙方都使用了手榴彈。在7月7日的武鬥中，「人大三紅」還使用了自製的土炮。

5月18日中午，北京工業學院發生武鬥，「紅旗」數百人頭戴柳條帽，手執長矛，趁午飯時進攻「東方紅」。「東方紅」受傷四五十人(其中重傷十三人)，一名叫蘇廣榮的學生受傷後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由於武鬥的興起，駐在北京高校的解放軍宣傳隊也無法開展工作，不僅說服工作沒人聽，而且經常遭到圍攻和謾罵。所以，駐在這些學校的解放軍於5月中旬陸續撤離了學校。後來解放軍宣傳隊撤離學校的行動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但是重新進駐學校的工作一直到8月才得以落實。

由於北京市許多院校校園武鬥頻頻發生，一片混亂，對全市各校的工作都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即使是在相對穩定的院校中，「復課鬧革命」、「教育革命」的任務也無法完成。在此期間，一些大學的1966屆畢業生分配工作已經開始，1967屆畢業生分配工作也已着手進行。高年級的學生急於畢業分配，低年級的學生又反映無法開展所謂「教育革命」活動。校園中整天無所事事的「逍遙派」愈來愈多，各紅衛兵組織中都只有少數骨幹分子還參與派性鬥爭，造反派組織對其大多數成員來說已經沒有太大的吸引力了。

1967年11月，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內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為了壓垮對立面「四一四派」，將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徵啓、教務處副處長李康抓起來審問。1968年4月又將清華大學黨委統戰部副部長文學宓、劉承嫻，清華大學黨委辦公室副主任饒慰慈抓起來審問，誣陷他們是「蔣南翔的第二套班子」，並以嚴刑逼供的辦法，製造了所謂「羅、文、李、饒反革命集團」案，以此來打擊「四一四」。蒯大富親自主持了對文學宓的逼供。他指使人對文、饒等人分別採用老虎鉗拔牙、往鼻孔裏灌氨水等這些殘酷的手段，嚴刑逼供。在慘無人道的肉刑折磨下，劉承嫻於5月31日被逼跳樓致重傷，生命垂危，在北京積

62 5月14日武鬥中死亡的是王錫中(工人)；5月22日武鬥中死亡的是楊大志、廖金妹(農經系學生)、陳江(計劃統計系學生)。

水潭醫院搶救期間，經蒯大富同意，強行轉院，繼續迫害，於6月12日被折磨致死。饒慰慈被打得遍體鱗傷，一度精神失常，至今留下脊椎神經損傷等後遺症。在誣陷迫害羅徵啟等人的過程中，還殃及羅的父親、弟弟、朋友共三人。3月，羅徵啟從清華「井冈山」手中逃脫。蒯大富命令孫耘等人一定要把羅抓回。4月3日，孫耘帶人到羅家搜查，孫耘見羅不在，便決定將羅的弟弟羅徵敷強行裝上汽車帶回學校。途中，學生王慶章用棉絲堵住羅徵敷的嘴，導致羅窒息死亡。羅徵敷的死出乎蒯大富的意料之外，他同意讓王慶章去投案自首。

4月20日，「四一四」為了對「團派」進行報復，也抓了一名支持「團派」的幹部——原電機系黨總支副書記陶森。對於「四一四」的這一行動，「團派」於當天發出了最後通牒，聲稱「四一四」必須於四十八小時之內交出陶森，否則後果自負。「四一四」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於是便在他們佔據的科學館等處積極設防，同時宣布，任何人未經允許不得進入科學館五十米以內的地方，否則格抓勿論。4月22日晚上，「四一四」廣播說，23日要在禮堂批鬥陶森。「團派」馬上表示反對，揚言要衝大會會場。駐清華大學的解放軍宣傳隊為防止武鬥，便對雙方做說服工作，但雙方都不願妥協。4月22日午夜，一百餘名「團派」學生佔領了禮堂。23日黎明，「團派」廣播站播發消息說，「團派」已佔領禮堂，並繳獲了「四一四」藏在那裏準備用來武鬥用的四百枝長矛。4月23日清晨6時許，「四一四」在聽說「團派」佔領了禮堂後，便派人去搶佔禮堂東側的舊電機館。「團派」聞訊，也立即派人去搶，雙方人員發生摩擦和扭打。解放軍宣傳隊趕去調解，但毫無效果。雙方開始了激烈的武鬥。到上午10時，武鬥規模進一步擴大，又發展到十一、十二號樓，參加武鬥的達一千餘人。至下午4時，「團派」佔領了舊電機館和十一號樓，「四一四」佔領了十二號樓，武鬥暫時告一段落。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親自到清華大學召集雙方負責人協商停止武鬥，但終因雙方所提條件懸殊，不能取得協議。在這次武鬥中，駐校解放軍宣傳隊為阻止武鬥，有四人被打成輕傷。

4月23日武鬥的發生，加劇了清華大學內部兩派的矛盾，同時也在事實上造成了兩派在校內割據的狀態。為了準備對付隨時可能發生的

武鬥，兩派都在積極進行各種物資準備。4月29日又發生了搶米的武鬥事件。這一天，「四一四」為了準備和「團派」打持久戰，派人劫走了兩卡車大米，並運進了他們控制的科學館內。「團派」由於沒有得到這些糧食，就派人乘車去搶糧店。但車行至半路，遭到「四一四」的伏擊，卡車為躲避冰雹一樣的石塊襲擊而導致翻車，致使一個「團派」學生被翻倒的卡車壓死。為了報復，「團派」在5月2日向「四一四」控制的土建館發動了襲擊。雖然雙方人員傷亡不大，但是館內的貴重儀錶、電器等設備遭到嚴重的破壞。

在經歷了一段兩派談判和交換戰俘的短暫平靜之後，5月30日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武鬥事件。這是最後一次用長矛、石塊等冷兵器作戰的武鬥。在此之後，雙方都開始動用手槍、步槍等現代武器作戰了。這次武鬥是這種升級的臨界點。5月30日的武鬥是「團派」主動挑起的。5月29日，蒯大富在清華大學舊電機館召集「團派」文攻武衛總指揮部的頭頭們開會，研究決定了向「四一四」發動一系列進攻，一舉蕩平「四一四」，使清華園掌握在「團派」手中的一整套計劃。會議決定在5月30日凌晨3時開始攻打在「四一四」控制下的學校東區浴室樓、五號樓和十二號樓，並決定由鮑長康擔任武鬥總指揮。5月30日凌晨，「團派」按照預定計劃向東區浴室發動了襲擊，同時在「四一四」增援隊伍必經的路上設了埋伏，想通過「襲點打援」的辦法一舉消滅「四一四」的骨幹力量。但是，當蒯大富下令拉閘斷電發出進攻信號後，事態並沒有完全按照他們預想的方式進行。因「四一四」對「團派」的進攻早就有所準備，「團派」的偷襲未能成功。於是，「團派」便採取了第二方案，在鮑長康的指揮下，向浴室樓發起了強攻。雙方使用石塊、弓箭、長矛等原始武器，進行拼死的搏鬥。「四一四」的增援部隊也與「團派」埋伏的人馬展開了激戰。「四一四」使用了用拖拉機改裝成的土坦克，但因為「團派」人多勢眾，「四一四」的增援部隊始終未能開到東區浴室來。在激戰中，造成學生卞雨林、許恭生和工人段洪水等四人的死亡。蒯大富見死了人，便想撤退，說：「人死了，撤吧！別打了。」但鮑長康堅持要報仇。在蒯大富離開現場後，鮑長康決定實行火攻。於是「團派」向浴室樓澆汽油，然後用燃燒瓶引燃，熊熊的大火立刻包圍了整個浴室

樓。困守在浴室樓內的二十一名「四一四」學生全部被「團派」俘虜，其中三人被燒成重傷。

東區浴室的血腥戰鬥使得清華園內人人惶恐不安，從5月31日起，就陸續有大批學生、教職工和家屬撤出了清華園。偌大的清華園內只留下日益縮小的兩派骨幹核心分子在那裏對峙。清華園內的兩派基本都是佔據了校園中的一片固定區域，「四一四」控制了東南部，「團派」控制了西北部。唯一例外的是，「四一四」控制的科學館，像釘子一樣插入了「團派」區域的腹地，而與本派的聯繫完全斷絕。堅守在科學館大樓中的「四一四」力圖長期堅守這個陣地，而「團派」則將其圍困，努力迫使其投降。這時，雙方的武器已經開始升級，使用了步槍、手榴彈，並且都在利用本派控制的工廠機械設備製造新的武器。

清華大學的武鬥在對峙中度過了相對平靜的一個月。為了進行武鬥，蒯大富指派任傳仲負責製造、搜集槍支彈藥，製造了一批土槍、土炮、手榴彈、燃燒彈等，並從山西、四川、武漢、徐州等地搜集到機槍一挺、衝鋒槍兩枝、半自動步槍十二枝和其他步槍、手槍、子彈等，偷運回校。

6月30日上午，八號樓的「四一四」派人員全部撤往科學館，與「團派」隊伍在禮堂東面相遇，雙方動用了手槍、手榴彈、長矛、石塊等。「四一四」派投擲的手榴彈炸傷「團派」近十人，四人重傷，其中一人腿被炸斷，另一人腸子被炸壞。「團派」總部遂決定武力封鎖科學館。蒯大富下令，在封鎖中，凡是有進出的就可以開槍，打死了人，由總部負責。7月4日凌晨，「團派」學生張行開槍打死了「四一四」學生朱育生；7月5日，「團派」學生胡遠開槍打死了「四一四」學生楊志軍；7月6日，「四一四」學生楊述立又被開槍打死。這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的關於制止武鬥的「七三」布告已經發表；但清華園內的武鬥局面並未改變。被圍困在科學館內的「四一四」堅持與「團派」對峙。7月9日上午，「團派」用燃燒彈引燃了科學館的房頂，科學館的三樓以上及整個房頂被燒塌。但「四一四」仍在一、二樓堅守。後來由於飲水、傷員等等困難，「四一四」開始採用挖地道的辦

法，想轉移出去。但地道被「團派」偵察出來了，7月16日，「團派」用炸藥將地道炸塌，並抓去「四一四」的一名學生。這時的科學館內，有兩具屍體無法運出，早已腐臭。二十多名傷員傷口感染、惡化。一百餘人在炎熱中，為防止槍擊中彈，只能擠在樓道內生活。二十多天裏，未運進點滴食物和蔬菜。臨時掘的一小口水井，遠不夠使用。「四一四」只得忍受各種困難，在科學館內堅持下去。

為了徹底解決北京市大學校園中的武鬥問題，毛澤東決定派工人和解放軍組成的宣傳隊開進武鬥最厲害的清華大學，宣傳制止武鬥，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⁶³ 1968年7月27日，由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化工三廠等七十多家工廠的三萬多名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隊、四八七四部隊和海軍的部分指戰員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了清華園。宣傳隊在「四一四」控制的區域沒有遇到抵抗，經過長期武鬥和對峙已經困難重重的「四一四」當即表示願意把所有的人集中起來，聽工人和解放軍的宣傳，並開始交了一些武器。「四一四」的廣播站也交給宣傳隊使用。到下午4時，「四一四」的武鬥人員已全部集中，武鬥工具已交出約一卡車(有土槍、土炮、地雷、手榴彈、半自動步槍等)，並拆除了武鬥工事。

聽說大批工人、解放軍開進清華園，「團派」文攻武衛總指揮部的頭頭們緊急磋商，決定用武力抵抗、還擊，不讓工人進樓。這一決定迅速向各武鬥據點作了傳達。「團派」廣播站還播放了「強烈抗議」，說：「工人隊伍是在楊、余、傅黑後台指使下，以宣傳『七三』布告為名，糾集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企圖挑起大規模的武鬥事件。」「團派」在第一教室樓向工人開了槍，打傷了幾名工人，並將一些工人抓進樓裏，進行拷打、審問，聲稱「要揪出楊、余、傅的黑後台」。下午1時，蒯大富在靜齋樓道拔出手槍，叫嚷要和工人「拼了」，並在離開靜齋的時候，把數十發手槍子彈交給了武鬥人員。文攻

63 組織進駐工作的是北京衛戍區的政委劉紹文、副司令員李鍾奇，他們就在距清華不遠的一個公園裏指揮。參見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59。

武衛總指揮部頭頭任傳仲等按照蒯大富「抵抗、還擊」的決定，帶領武鬥人員手持長矛、槍支、手榴彈，向赤手空拳的工人進行襲擊。任傳仲親自帶領武鬥人員在靜齋、甲所、乙所、大禮堂等處反覆衝擊工人隊伍，還用長矛刺傷工人。當晚，任傳仲在靜齋召集部分武鬥人員開會，決定武裝襲擊在9003大樓的工人群眾。這一決定的實施，致使工宣隊員王松林、張旭濤、潘志宏、韓忠現、李文元慘遭殺害，還有731名工人受傷。

當天下午，蒯大富翻牆逃出學校來到北京市革委會，並給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請求援助，並說：「我們建議，外單位群眾立即撤出清華，清華的人自己能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這樣做只能向七三布告反方向前進。清華還從來沒有這樣的武鬥。同時還要搞清楚，這次事件是誰策劃的，是誰組織的。」

28日凌晨，蒯大富發出向毛澤東、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的呼救電報，電報說：

7月27日，在黑手的周密策劃下，假借宣傳七三布告，挑動十一萬不明真相的工人攜帶凶器，突然包圍洗劫清華園。我井岡山戰士數百人遭毒打，傷亡數十人，許多人被捕未放。為避免跟工人階級再發生衝突，我井岡山戰士已全部撤出清華，衣食無著，生命安全無保證。清華井岡山生命垂危，形勢萬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懇求中央馬上接見。⁶⁴

工人宣傳隊派出十名代表與蒯大富談判。工人提出四條要求：一、一起回清華宣傳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二、下令停止對工人開槍，投手榴彈；三、把抓去的工人無條件的放出來；四、交出武器，拆除工事。如果再發生殘殺工人的事情，你要負嚴重的責任。蒯大富只得表示接受。當晚7時30分，蒯大富由工宣隊代表、市工代會代表和解放軍送回清華園。

64 北京市軍訓辦公室：〈清華工宣隊談蒯大富的情況〉（1968年10月24日）。

3 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

7月28日凌晨3點半到上午8點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員接見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接見後，謝富治把聶元梓等五人留下，共同整理了一份〈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然後由他們帶回學校傳達。以下是這個要點的一部分：

毛主席說：今天是找你們來商量制止大學的武鬥問題。怎麼辦？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學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有些學校搞了些鬥黑幫，但很不夠，就是因為分了兩派，忙於武鬥。現在逍遙派那麼多，不搞鬥批改，而要鬥批走，鬥批散。我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還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現在提出四個辦法：（一）實行軍管；（二）一分為二（就是兩派可以分兩個學校，住在兩個地方）；（三）鬥批走；（四）繼續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這個問題也不必現在答覆，回去你們商量商量，討論討論。我說你們脫離群眾，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廣西，陝西布告只適用陝西。在我們這裏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毛主席說：希望你們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甚麼兩派。⁶⁵

從以上要點來看，毛澤東彷彿是耳提面命，把「五大領袖」好好地教訓了一頓。其實並不盡然。

65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53—154。

毛澤東是對「五大領袖」進行了批評，而且有些話說得也很嚴厲，例如他說：「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就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實行圍剿」，「就要實行殲滅」。但仔細研究毛澤東的談話記錄，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五大領袖」的基本態度還是欣賞、愛護和寄予期望的。「五大領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毛澤東打衝鋒的代表人物，毛澤東明確地告訴他們：「我們有偏向」，「偏向你們五大領袖」；「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們工作有多少缺點錯誤，都要護着你們，你們工作也確實有很多困難。文化革命我沒有經歷過，你們也沒有經歷過。」

毛澤東說：「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對聶、蒯、韓、譚、王五人，毛澤東都說了一些好話。

對聶元梓，毛澤東說：「井岡山、紅旗飄中壞人多一些，聶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你們反王、關、戚，好嘛。」毛澤東還對聶元梓等人在首都高校學習班上搞串連表示理解。在談到北大武鬥中有凶手要刺殺聶元梓這件事時，毛澤東很關心地对聶說：「你以後要注意一點，不要一個人到處亂跑。」

對蒯大富，毛澤東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這個經驗很多。」「我們傾向你們這一派，四一四必勝思想我不能接受。」「沒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四一四是右的。」

對韓愛晶，毛澤東說：「韓愛晶，很會出主意啊，是個謀士啊，是不是韓信的後代？」當周恩來、康生批評北航召開全國造反派會議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對韓愛晶講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歲嘛！」康生指責北航支持清華武鬥，給了清華兩汽車槍。韓愛晶堅決否認，並說「衛戍區到我們那裏檢查了好幾次，槍一枝不少」。謝富治、陳伯達、江青一齊批評韓愛晶沒有自我批評精神，毛澤東插話：「不要說他。你們專門責備人家，不責備自己。」並說：「他（指韓愛晶）的性格有點像我年青的時候。」韓愛晶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如果幾十年以後，一百年以後，中國打起內戰來，你也說是毛澤東思想，我也說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的局面，怎麼辦？」毛澤東隨口答道：「出了

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多年來，中國清朝打二十年，跟蔣介石打了幾十年，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甚麼高崗、甚麼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江青批評韓愛晶提的問題：「一是脫離工農，二是脫離實際。一到我跟前就想將來，總說幾十年以後的事。還問我第三次世界大戰甚麼時候打？」毛澤東則說：「想得遠好。這個人好啊！」

對譚厚蘭，毛澤東戲稱：「你是一個女皇。今天到會四個（按：當時蒯大富尚未到達），有兩個女的，真了不起！」對譚厚蘭在北京師範大學內的反對派——師大「造反兵團」，毛澤東一口將其否定：「造反兵團是省無聯⁶⁶式的大雜燴，還要搞反奪權。」

北大、清華、師大校內都有激烈的派性鬥爭，而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則相對平靜。毛澤東問：「王大賓，你的事情好辦一些吧？」王大賓說：「那幾個反對謝富治的跑了。」王大賓還談到地質「東方紅」組織內的團結問題。毛澤東顯然對他的談話比較滿意，就招呼說：「你坐過來，到我這裏來。」

與毛澤東的和藹可親、循循善誘不同，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成員對「五大領袖」的態度卻是聲色俱厲、張牙舞爪的。陳伯達說：「六六年下半年比較好，北京大專院校在全國煽風點火，搞革命風暴是對的。現在腦子膨脹了，自以為了不得，想要統一天下。蒯大富、韓愛晶到處伸手，又沒有學問。」毛澤東說：「二十幾歲嘛，不能輕視年青人。周瑜出身騎兵，才十六歲，你們不要擺老資格。」⁶⁷

另外，從這次談話中還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武鬥問題有他獨特的看法。毛澤東認為，武鬥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現象，對武鬥要作全面分析。他說：「武鬥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

66 「省無聯」，為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1967年10月，由「湖南紅旗軍」、「湘江風雷接管委員會」、「高校風雷」、「紅中會」、「東方紅總部」等組織組成。1968年1月24日後，「省無聯」被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下令取締。

67 毛澤東後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紅衛兵前期、後期甚至於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後期之間有一個時間不聽話，現在就好了。」參見陳文斌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頁357。

驗，第二個好處是暴露了壞人。」毛澤東歷來不主張急急忙忙解決武鬥問題，他認為對武鬥採取「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的態度是正確的。他說：「現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來，再鬥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⁶⁸

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在當天整理印發了一份〈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傳達要點）〉。7月30日，又重印了這份「傳達要點」。重印時增添了一些話，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們歡迎和支持首都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少數有武鬥的大學宣傳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勸說學生停止武鬥，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們支持、尊重人民解放軍。」北京市由大專院校紅代會出面召集四十四個大專院校的代表進行傳達，要求當時還在武鬥的六所院校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收繳武器。聶元梓、蒯大富等在大會上作了檢查。⁶⁹

4 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

毛澤東的指示精神被迅速傳達下去，有力地保證了工宣隊對學校的進駐和領導。到8月底，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經過一個月的收繳武器，收繳的正規武器如下：56式半自動步槍11枝，56式衝鋒槍1枝，43式衝鋒槍1枝，79式步槍8枝，各類手槍12把，96式輕機槍1挺，軍用手榴彈9枚，雷管455枚，還有大量的子彈、炸藥以及其他用品等。收繳的各類自製武器如下：土造手槍42把，土造步槍154枝，土炮約50門，土地雷317顆，土手榴彈1192枚，匕首519把，長矛、木槍、鐵棍共1404件，其他各類凶器59件，難以計數的土槍彈、土炸藥，還有難以統計的教學用車輛、電台、步話機、電話機和其他物品等。⁷⁰ 從4月23日

68 毛澤東召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69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25。

70 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255。

開始到7月27日結束，前後持續共九十六天的清華大武鬥終於徹底平息了。

8月19日上午，由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第六團、七團，即第一機床廠、第二機床廠、北京齒輪廠、外文印刷廠、財經印刷廠的300名工人和200名解放軍指戰員組成宣傳隊開進北京大學校園。駐清華工宣隊2500人將他們送至北大，並在北大校園內遊行一周，以壯行色。

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通知〉說：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而進駐大學的北京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已經取得顯著的成效，在全國起了巨大的影響。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該仿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工人中已經實行革命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已經有了顯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員會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入各學校。先搞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普及。先進大學，後進中、小學。沒有兩派組織，也沒有武鬥的學校，也要進入。抽調工人的人數，大體上可佔當地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點，不會妨礙生產。可以輪換。宣傳隊不要帶武器，那些還沒有實現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以及那些還沒有清理階級隊伍的工廠的工人不要參加。⁷¹

8月20日，軍委辦事組向中央打報告建議：對目前還「沒有成立革委會，沒有實行革命的大聯合，長期打『內戰』，存有不少嚴重問題」的五十三所軍隊院校實行軍事管制。軍管除派領導幹部及一般幹部參加外，擬從部隊抽調一批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和部分五好戰士參加，組織強大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如工人條件成熟，所有軍事院校均應派工人隨同軍管人員進去。打破

71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61。

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9月2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並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批語。⁷²

在姚文元寫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篇文章中，毛澤東親自加了幾段關於評論知識分子的話。在原文「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一句後，毛澤東寫道：「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毛澤東還寫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一遇到工人階級觸動他那個小小的「獨立王國」的利益的時候，就反對起工人來了。這種葉公好龍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不少的。這種人就是所謂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實不過是現代的一批葉公而已。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佔領那些「多中心即無中心」論者盤踞的地方。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⁷³

9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紅旗》雜誌第三期發表的調查報告〈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和毛澤東加寫的編者按，提出給知識分子以再教育。毛澤東加寫的編者按說：

這是上海市的又一個調查報告，現發表，供參考。全國各大、中、小工業城市所屬各工廠的工程技術幹部情況如何，各理工科

7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45。

7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29、531。

高等、中等學校教育革命的情況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員會組織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調查，報告中央，本刊將擇要予以發表。這裏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道，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情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於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於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⁷⁴

9月1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對毛澤東寫的這段編者按作了闡述，指出：中心問題是由工農兵給知識分子以再教育，「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知識分子，使他們改變過去從資產階級教育中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就是再教育的內容。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則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徑。」

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北京衛戍區〈關於召開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情況報告〉。報告說：北京市五十九所大專院校已於8月29日全部進駐了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8月31日，我們召集這些學校的宣傳隊負責人開會，傳達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決了以下幾個問題：一、宣傳隊要對學校實行無產階級政治領導，搞好學校的鬥批改，不要陷於事務主義。工人和解放軍宣傳隊要實行統一領導，對重要問題表態必須經過集體討論。二、對學校的領導，首先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要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與過；要與學生同吃、同住，和他們談心、交朋友，幫助他們解決思想問題。三、在革命大聯合的問題上，一定要通過革命大批判，對學生加強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提高階級鬥爭覺悟。在做好群眾思想工作的基礎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聯合和三結合。四、加強調查研究工

7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50—551。

作，對學校的問題，不要急於表態，更不能輕易表態。五、對各派所抓的人，經過審查，確是壞人的，要實行群眾專政；對一般群眾，可先組織集訓班學習。9月4日，毛澤東看完報告後批告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現在需要規定一些具體政策，我看此件不錯，建議轉發全國各地參考。請酌定。」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了這個報告。⁷⁵

工宣隊進駐大專院校後，大部分學校通過辦各種形式的學習班，很快都出現了大聯合的形勢。少數派性很強的「鐵桿分子」，也曾挑起一些事端，但都未能動搖工宣隊的主導地位。

8月20日，清華園內發生了一起幾名「團派」學生毆打一名「四一四」學生的事件。駐清華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指揮部召開全校群眾大會，令打人者和「團派」頭頭蒯大富在會上作檢查。工人、解放軍宣傳隊表示：「團派」、「四一四」中的群眾都是好的、革命的，兩派的頭頭是有嚴重錯誤的，要求雙方各自做自我批評，揭發本派頭頭的錯誤。蒯大富8月16日在「團派」骨幹分子會議上的講話和「四一四」頭頭周泉纓在大聯合以前寫的題為〈四一四思潮必勝〉的文章，成為全校各個學習班上的批判重點。心有不甘的蒯大富召集「團派」的骨幹分子開會商討對策。蒯大富起草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回顧了清華「井岡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績」，抱怨工宣隊進校後剝奪了他們的一切權力。他還鼓動四名原「井岡山兵團」總部委員寫了一張批評工宣隊的匿名小字報，題為〈一點意見〉，批評工宣隊在對待兩派的問題上不公正。小字報貼出後，不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招致許多群眾的反對。小字報貼出的當天，就有大批的大字報批評這份小字報。批評不僅來自原「四一四」派，還有許多是來自「團派」的。大字報的矛頭很快集中到蒯大富身上，集中批判他下令向工人開槍和他的8月16日講話。蒯大富又糾合十二個人，貼出一張大字報，提出要圍繞工宣隊是否主持公正問題展開辯論。但是這場辯論並沒有能夠挽救蒯大富的頹勢，經過群眾性的揭發、辯論，蒯大富等派頭頭愈來愈孤立。10月24日，蒯大富貼出了大字報〈向工人階級投降——自我揭發批判之一〉。

7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54—555。

總之，隨着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佔領上層建築舞台」，各校的武鬥很快被制止，經過辦學習班和揪「壞人」的活動，曾經紅極一時、威風八面的造反派頭頭們，一個個名聲掃地，一度握在他們手中的學校大權，都歸於工宣隊。8月28日，「新北大公社」召開全體會，宣布「倒旗」。9月5日，北航「紅旗」開會，韓愛晶在會上宣布北航「紅旗」自動解散。更多的群眾組織則是在大聯合的形成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著名的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了揭發、批判和隔離審查。粉碎「四人幫」後，「五大領袖」均於1978年4月被逮捕入獄，分別受到了嚴厲的懲罰。⁷⁶

四 廣西事件

1968年夏，廣西派性鬥爭激烈，武鬥不止，中央為解決廣西問題，發布了「七三」布告，並以此為契機，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進

76 聶元梓在1969年4月被象徵性地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當年11月分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2月再次被隔離審查。1973年4月以後，她被安排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和北京大學儀器廠勞動。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聶元梓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蒯大富於1968年12月分配到寧夏304廠工作，不久又被隔離審查。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誣告陷害罪判處蒯大富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韓愛晶於1969年11月分配到湖南省株州331廠工作，1971年3月至9月被隔離審查，1975年9月至1978年4月被監督勞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傷人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韓愛晶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譚厚蘭於1968年10月分配到北京軍區4627部隊農場勞動鍛煉，1970年6月調回北京師範大學隔離審查，1975年8月結束審查，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誣陷罪和破壞文物罪將其逮捕。鑑於譚厚蘭的犯罪發生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且認罪態度較好，1982年6月1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決定對她免於起訴。譚厚蘭於1982年9月因患宮頸癌病逝。

王大賓於1969年1月分配到四川省地質局成都修配廠工作，不久即被隔離審查。1983年10月20日，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王大賓有期徒刑九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行宣傳，要求各地制止武鬥、推動大聯合、三結合。但廣西問題十分複雜，中央的果斷決策過於草率，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七三」布告發布後，廣西革籌和廣西軍區支持「聯指」派武力鎮壓了「四二二」派，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更為嚴重的是，以後又在廣西各地「颳十二級颱風」，向各種所謂「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造成了數以萬計的死亡悲劇。

1 「七三」布告

中央對廣西兩派的態度前後有很大的差別。從1967年6月1日開始，周恩來及中央文革小組多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聽取雙方代表的意見。中央文革小組一直是支持廣西「四二二」的，周恩來在講話中也多次對廣西「聯指」調動農民進城搞武鬥進行批評。8月24日，周恩來等人第五次接見廣西代表。周恩來在回答兩派提問時說「四二二」是造反派，「聯指」是群眾組織。⁷⁷

中央五次接見後，廣西「四二二」派氣勢大振，不斷加強宣傳攻勢，竭力打壓「聯指」。「聯指」派群眾紛紛倒戈，有的原來表態支持韋國清的領導幹部也改變觀點，發表聲明支持「四二二」。9月28日，根據周恩來在接見時的指示要求，廣西軍區召開「為工總恢復名譽大會」。廣西軍區黨委在會上作檢查說：「砸『工總』是軍區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突出表現，是軍區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個嚴重錯誤，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表示對「工總」廣大群眾公開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復「工總」名譽，堅決支持「工總」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動。

11月8日，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1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對〈協議〉加了批語，毛澤東批示：「照辦」。11月13日，廣西軍區和駐軍代表同廣西各派達成〈關於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促進和實現兩派

77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49。

工人組織革命大聯合的協議》。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這時候，中央的態度與幾個月前有所不同，不再明顯偏向於廣西「四二二」一邊。〈決定〉將兩派都同樣稱為「革命群眾組織」，要求兩派「在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團結起來，實現革命的大聯合」。⁷⁸

1968年以後，廣西「四二二」與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的矛盾愈來愈尖銳，中央也逐漸改變了對廣西兩派的看法。1月下旬，原廣西駐軍同情「四二二」的支左部隊被下令調出廣西。廣西軍區對「四二二」的態度也更加強硬。2月29日，廣西軍區命令6984部隊派二十四輛卡車的全副武裝人員去柳江縣包圍里高墟的「造反大軍」，收回武器，並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⁷⁹此後，廣西軍區頻頻動用部隊武裝來解決廣西派性鬥爭的問題，而且往往是在向中央請示報告並得到批准的情況下這樣做的。4月30日至5月1日，廣西軍區派出八個連的部隊和民兵對「四二二」派的廣西「農總」寧明上石分部（簡稱「上石農總」）進行武裝圍剿。參加「上石農總」的群眾受牽連遭到殺害或迫害致死的達108人，被判處死刑的4人，無期徒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22人。⁸⁰

1968年5月以後，廣西兩派的派性鬥爭日益激烈，不斷暴發大規模的武鬥流血事件。兩派都進行了多次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的行動，但廣西革籌和廣西軍區在向中央的報告中往往將責任更多地加在「四二二」頭上。廣西革籌和廣西軍區的态度必然影響到中央的态度。6月3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廣西的武鬥，主要是柳州、南寧。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裏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搶了一千八

78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624—625。

79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72。

80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85。1980年6月，南寧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與寧明縣公檢法組成調查組，對此案進行複查，認為「上石農總」絕大多數成員是從派性出發加入該組織的，這個組織沒有制定甚麼反革命計劃和行動綱領，因此對「上石農總」不應定為反動組織。經報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核准，於1981年7月批覆南寧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撤銷關於「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的決定，並給予「上石農總」受害者平反。

百多萬發子彈。」⁸¹毛澤東提到的是5月21日，廣西「四二二」派的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搶援越子彈11888箱，共計1700萬發。但在這前不久，廣西「聯指」製造的廣西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搶槍事件⁸²，毛澤東卻並未提及。

5月17日，廣西革籌和廣西軍區向中央報告，在廣西破獲了所謂「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案。報告稱：「我區破獲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捕獲團長一人，副團長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經濟部長一人，支隊長四人，聯絡站負責人共六十三人。繳獲反動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鑑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繫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槍支彈藥等罪證。」報告還說：「該反革命組織下設大隊、中隊，全區已發展匪徒兩千人」，「發展組織和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中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四二二」控制區），利用「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⁸³6月17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發布〈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簡稱「六一七公告」）。此後，在全自治區掀起了聲討「反共救國團」的狂潮。在追查「反團」的旗號下，公開地、集中地對「四二二」進行鎮壓，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數以萬計的人被殘酷批鬥。其中有的人被殺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殺身亡，不少人被打成殘廢，後果極為嚴重。這一特大冤案直到1983年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時才得到平反昭雪。⁸⁴

6月23日，《廣西聯指報》在刊登「六一七公告」的同時，刊登廣西「聯指」指揮部〈關於徹底摧毀蔣匪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總攻擊令〉。其中說，「反共救國團」深藏於「四二二」組織之中，「四二二」的頭頭就是「反共救國團」，對「抗拒緝捕者，可以就地處決」。

81 毛澤東接見部隊團以上幹部學習班瀋陽、南京班時對陪同接見的領導幹部的談話，1968年6月3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19。

82 參見本書第七章關於奪槍的一些典型案例。

83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89—90。

84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96。

「六一七公告」發布後，廣西各地「聯指」派武裝人員亂殺人的情況極為嚴重。對此，廣西革籌、廣西軍區不得不於6月24日向各專區、市革委會、各軍分區、人武部發出〈關於禁止亂殺人、亂抓人的指示〉。但亂殺人、亂抓人並未停止，不少地方反而愈演愈烈。⁸⁵

5月27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報告說：「四二二」所屬的一些組織繼續向「聯指」開槍開炮，封鎖交通，搶佔據點。使市內運輸中斷，糧食供應非常困難，如事態繼續惡化，大武鬥有可能發生。⁸⁶5月29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負責人韋國清、魏佑鏞、焦紅光飛赴北京，向中央當面匯報「當前廣西階級鬥爭問題」。6月13日，中央向廣西發出〈柳州鐵路地區恢復交通的五點指示〉，但未見成效。廣西南寧、柳州、桂林及不少縣市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局勢日益嚴重。

7月3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布告〉（即「七三」布告）。布告中說：

……最近兩個月來，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眾，連續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壞鐵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復通車；

第二，膽敢搶劫援越物資，拒不送還；

第三，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第四，在中央發出「六·一三」特急電報以後，拒不執行，繼續頑抗。

中央認為，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抗美援越鬥爭、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85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98。

86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92。

中央相信，廣西兩派革命群眾組織和廣大革命群眾是要革命的。他們對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極其不滿、極其憤慨的。有些人跟着別人幹了壞事，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

為了迅速制止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在廣西革籌小組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的支持下，努力實現以下各點：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二、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干擾和串連，保證運輸暢通。

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

五、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台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⁸⁷

「七三」布告是當時中央根據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反映的情況而形成的，把「四二二」的一些嚴重錯誤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七三」布告發布後，又調動軍隊和武裝民兵對「四二二」進行了鎮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⁸⁸

「七三」布告發布後，很多地區的武鬥並沒有立即停下來，有些地區的武鬥反而更加嚴重。5月1日剛剛成立了革委會的陝西省出現了專

87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138—139。1969年2月7日的一次會議上，當周恩來談到「七三」、「七二四」布告在全國起了很大作用時，毛澤東說：這也是一大發明。要發布告，造輿論。黃永勝和總理去講了一番，講出了這張布告。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79。

88 1983年廣西區黨委向中央寫了要求重新認識「七三」布告的請示報告，指出「七三」布告本身存在錯誤，發表後又為派性利用，成為一些地區亂殺人的合法依據，帶來嚴重後果。中央批覆原則同意廣西區黨委的意見。

業的武鬥隊，連續製造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事件。據不完全統計，從1967年11月至1968年7月，陝西全省銀行、營業所被搶60餘次，被搶現金730多萬元。搶走和分掉國家倉庫糧食44萬斤，糧票63萬斤。三原縣武鬥燒毀松香90多萬斤，損失達1000萬元，燒毀棉花4000多擔；安康兩派在武鬥中燒毀已包裝好的出口茶葉30萬斤，炸毀供全城居民喝水的自來水塔，毀壞老城民房1.5萬餘間。5月26日，西安鐵路系統發生全線停車事件；6月3日，火車西站又遭衝擊，積壓車皮高達八、九千輛。陝西全省有四個專區電話、電報不通，根本斷絕聯繫的有29個縣，郵件傳遞、電訊時斷時通的有18個縣。陝西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的現象極其嚴重，被搶各類槍支萬件以上，子彈數百萬發。6月2日，勉縣部分造反派襲擊國家絕密檔案庫，將守庫的一個班的14名戰士殺死9名，打傷4名。中央「七三」布告後，武鬥仍很猖獗。7月19日，西安數千群眾攻打白家口地區，動用了航空機關槍、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7月31日，漢中兩派武鬥，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區，還不斷發生武裝攻打革命委員會、殺害革委會成員的事件。⁸⁹

7月12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的談話中談到陝西問題時說：「這些省所謂解放是怎麼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掃就解放了。東北裝了個口袋，一個也沒有跑掉。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這些壞人搞不出來。至於鑽進我們隊伍裏的壞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個工廠需要幾個月。」⁹⁰

7月24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再次發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布告說：

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及其在西北和陝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最近以來，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動、蒙蔽、欺騙少

89 李瑞山：〈關於堅決貫徹執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報告〉（1968年8月2日）。參見中國二十世紀通鑑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二十世紀通鑑》，第四冊（北京：線裝書局，2002），頁4557—4558。

90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18。

數人，不斷挑起武鬥，組成專業的武鬥隊，連續製造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

- 一、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店；
- 二、燒毀和炸毀國家倉庫、公共建築和人民房屋；
- 三、搶劫車船，中斷鐵路、交通、郵電，私設電台；
- 四、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
- 五、拒不執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歷次發布的有關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認為，這是屬於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罪行。

為了迅速制止這一小撮階級敵人這種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 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違抗。

(二) 立即停止武鬥，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產。拆除工事、據點、關卡。

(三) 搶去的現金、物資，必須迅速交回。

(四) 中斷的車船、交通、郵電，必須立即恢復。

(五) 搶去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必須立即交回。

(六) 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搶劫、破壞國家財產、中斷交通通訊、私設電台、衝擊監獄、勞改農場，私放勞改犯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後操縱者，必須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依法懲辦。⁹¹

中央以發布「七三」布告為契機，試圖一舉扭轉全國到處武鬥不止的局面。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宣傳「七三」布告，各地也着實下了功夫。7月15日，湖南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向中央報告〈宣傳貫徹「七·三」布告

91 《「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冊，頁152—153。

情況〉：「幾天之內，部隊出動了宣傳隊1131個，6000餘人，宣傳車27輛，深入到工廠、車站、碼頭、大街小巷、郊區農村人民公社、列車上、輪船上，已向126000餘群眾做了宣傳。採取廣播、宣講、演唱、分片包乾、挨家挨戶訪問、座談、做調查、抓典型、同憶苦、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有的把做好事和宣傳『布告』結合起來，受到群眾讚揚。」7月18日，毛澤東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請考慮可否把此件轉發各地，並加上幾句督促話。」7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將湖南駐軍支左領導小組的報告轉發各地，指出廣泛深入地向群眾宣傳「七三」布告的重要意義，要求各地「立即檢查一下宣傳工作的情況，沒有抓緊的要抓緊，領導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強」，「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戶曉」。⁹²

8月4日，北京市革委會、北京衛戍區就宣傳貫徹中央「七三」、「七二四」兩個布告的安排意見給毛澤東等寫了報告，周恩來對這個報告作了修改。修改後的報告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駐軍要學習廣西的經驗，在宣傳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兩個布告的工作中，軍隊既要造聲勢，造輿論，更重要的是要對學生、對群眾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根據毛主席的批示，參照廣西等地的經驗，我們對下一步的工作擬作如下安排：一、北京駐軍、北京衛戍區已組織幾萬人至十萬人的宣傳隊，深入到大學、工廠、街道、農村等處，發動群眾，宣傳、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兩個布告。二、宣傳工作要點面結合，重點抓好大學和幾個問題多、影響大的工廠、機關、招待所。三、抓好典型。四、發動三軍採取適當形式大力支持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五、市革委會和衛戍區共同組成領導小組，加強領導。六、這次群眾運動要與準備國慶節的治安工作結合起來，持續保證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8月5日，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⁹³

8月14日，上海市革委會向中央報送關於落實兩個布告、解決四百多個「老大難」單位問題的報告。上海市革委會的報告說：我們在幾天

9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06—507。

9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16—517。

內集中出動二十多萬人，大張旗鼓地宣傳兩個布告，在全市造成強大的輿論，同時組織了四百多個以工人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共5800多人，進駐「老大難」單位，宣傳布告，發動群眾，揪出壞人，搞好班子，促進生產。……經過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一階段廣泛深入地宣傳和深入細緻的工作，「老大難」單位的群眾發動起來了，武鬥停止了，武鬥工事拆除了，上交了近萬件武鬥凶器，揪出了一批挑動武鬥的黑手，兩派之間的對立情緒逐步消除，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革命和生產面貌煥然一新，四百多個單位中50%以上的單位變化更為顯著。8月16日，毛澤東批示：「這個材料講得很具體，有說服力，建議轉發各地。」⁹⁴兩天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了這個報告。

2 廣西南寧鎮壓「四二二」的戰鬥

在廣西，「七三」布告成為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支持「聯指」鎮壓「四二二」的尚方寶劍。7月24日晚，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接見廣西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和軍隊部分幹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嚴厲批評「四二二」，認定在廣西殺人、放火，搶奪援越物資都是「四二二」幹的。周恩來甚至說到：「『七三』布告是鎮壓反革命的。」⁹⁵

「七三」布告發布後，廣西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乘「七三」布告之東風，出動解放軍和南寧周圍十幾個縣的民兵及廣西「聯指」的武裝，聯合進攻「四二二」最後剩下的百貨大樓、展覽館、解放路等據點。

南寧市革委會出動了五千多人的宣傳隊，開辦了六百六十多個學習班，大張旗鼓地宣傳「七三」布告。還出動飛機向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展覽館一帶「四二二」的據點散發「七三」布告，號召住在上述據

9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521。

95 中央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組織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指示（1968年7月2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點附近的群眾撤退出來。7月上旬，廣西軍區成立了有廣西軍區黨委常委、南寧警備區司令員宋治平、南寧警備區參謀長陳德華等參加的班子，專門負責「七三」布告的貫徹執行工作。於是，廣西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曠日持久的武鬥，演變成了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地鎮壓與反鎮壓的鬥爭。

7月15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在自治區體育場召開「捍衛七三布告誓師大會」。當天早上，部分參加大會的群眾在經過邕江大橋時，遭「四二二」從橋頭的據點開槍掃射，打死、打傷各二人。誓師大會宣布，「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對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壞七一五大會的反革命事件」。

「七一五」大會後，廣西革籌、廣西軍區責成南寧警備區用武力解決「四二二」佔領的自治區展覽館和解放路的問題。

7月15日下午，廣西「聯指」總指揮顏景堂⁹⁶在自治區人民政府大樓召開「聯指」的常委會議，傳達廣西軍區的指示，研究了攻打解放路等據點的問題。會後，由廣西「聯指」副總指揮姜佔德將「聯指」常委會研究攻打解放路的情況，向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作了匯報，得到了歐的同意。

「聯指」的「前線指揮部」設在南寧飯店。由顏景堂任總指揮，姜佔德任副總指揮。

7月15日下午，解放軍和廣西「聯指」開始向「四二二」的據點和控制區（解放路、百貨大樓、展覽館等）進行包圍。7月16日，「四二二」控制區遭解放軍和「聯指」炮擊。7月17日，解放路一帶的商店、民房起火燃燒。廣西「聯指」桂劇院據點向「四二二」百貨大樓據點開炮，大樓起火燃燒。部隊和「聯指」圍攻解放路一帶時，「四二二」航運「工總」所據守的停泊在邕江河邊的船隻遭到「聯指」炮擊，一批船舶中彈燒毀。「聯指」前後三次炮擊邕江河邊船舶，共燒毀船隻166艘。事後，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和廣西「聯指」宣傳廣播說「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燒停泊在邕江邊的船舶，船上載有援越物資，破壞抗美援朝鬥爭，犯下了「滔天罪行」。⁹⁷

96 顏景堂當時為廣西大學學生，後被判刑。

97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07—108。

7月18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廣州軍區發出〈嚴防階級敵人製造更大規模縱火事件的措施的報告〉，指控「四二二」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縱火破壞。應對措施除發動政治攻勢、制止武鬥外，還成立指揮小組，由軍區、警司、區、市公檢法軍管會、市革委會、×團等領導共八人組成。並組織武裝機動部隊四個連，任務是：一、發動群眾救火，組織部隊火力掩護，階級敵人膽敢向救火群眾射擊，部隊採取堅決措施，保護群眾。二、加強聯防，組織「工人糾察隊」，繼續清理外來人員，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三、對邕江大橋實行武裝保護，嚴防敵人破壞。為了配合武力攻打解放路，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還開展了強大的政治攻勢，積極製造輿論。7月17日，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發出了〈關於一小撮階級敵人對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壞「七一五」大會的反革命事件公告〉。

7月19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又調四個連部隊和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包圍、炮擊「四二二」在解放路一帶的據點，幾條街道硝煙瀰漫，一片火海。南寧警備司令部、政治部發布〈立即行動起來，撲滅反革命分子製造的火災——給全市無產階級革命群眾的一封信〉，同時又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執行武裝掩護部隊、群眾救火指示情況報告〉。⁹⁸

8月1日，「聯指」攻下了百貨大樓。據1983年自治區和南寧市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聯合調查組調查證實，「聯指」攻打百貨大樓，是用高射機槍、四〇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發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藥包，將大樓東北面牆炸崩塌，二、三樓起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和機關宿舍中彈起火燃燒。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警備司令部、廣西「聯指」當時廣播說，是「四二二」自己爆炸了百貨大樓。

7月31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調動部隊和廣西「聯指」武裝人員開始圍殲「四二二」展覽館據點。參加圍殲的解放軍有六九一二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和炮兵第×團高機炮一連、二連，以及玉林、陸川、貴縣、邕寧、武鳴、馬山、橫縣、

98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09。

上林、崇左和南寧郊區「聯指」武鬥隊。指揮部設在明園飯店，下午3時開始包圍炮擊。⁹⁹7月31日晚，打進展覽館，8月1日凌晨結束戰鬥。

8月1日，為慶祝攻下百貨大樓和展覽館的勝利，廣西「聯指」舉行慶功會餐。當天，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又發出一份公告。公告說：「有的人『又製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革命事件』」，並要他們「不折不扣地、無條件地立即全部交出武器，不得擅自轉移、隱藏破壞，如拒不交出，繼續頑抗者，定將依法嚴懲」。

8月2日，開始攻打解放路。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發出了〈關於在向陽路口等地緊急戒嚴的公告〉，封鎖以解放路為中心的一大片地區。

在攻打解放路時，廣西軍區分管作戰的常務副司令員焦玉山出任總指揮。部分解放軍部隊、廣西「聯指」的武裝人員及從南寧周邊各縣調集來的民兵參加了戰鬥。

戰鬥於8月5日結束。解放路及其附近33條街巷被炮擊焚燒成了一片廢墟。廣西「四二二」全軍覆沒。據不完全統計，圍攻解放路和展覽館的戰鬥共造成1470人死亡，其中絕大多數為「四二二」據點中的人，各縣民兵在進攻中被打死60人，參戰的解放軍被打死26人。被抓獲的「四二二」俘虜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虜交各縣領回，其中的2324人被打死。攻打解放路時，共燒毀33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間，建築面積達46萬平方米，使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國家財產損失6000萬元以上，群眾私人財產損失無法統計。¹⁰⁰8月10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毛澤東、林彪、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處理南寧市解放路一帶問題的情況報告〉，對調動部隊和「聯指」武裝人員攻打、炮擊、爆破「四二二」據點，以及雙方對打時互相扔汽油瓶，企圖燃燒對方前沿陣地而引起的火災，燒掉解放路一帶33條街(巷)和河邊的船舶的責任全部加在廣西「四二二」一方。

99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13。

100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15—116。

8月10日，河池軍分區奉廣西軍區之命，在東蘭縣人武部召開「關於用武力解決鳳山『七二九』（廣西四二二鳳山縣七二九革命造反大軍）問題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天峨、巴馬、南丹、東蘭、鳳山等縣人武部的有關負責人，以及鳳山縣「聯指」頭目，六九一一部隊負責人等。軍分區負責人在會上傳達說，根據軍區首長命令，要用解決南寧解放路的辦法解決鳳山「七二九」的問題。會議決定調附近各縣「聯指」武裝人員，會同六九一一部隊、鳳山縣人武部中隊進駐鳳山，「強行收繳」「七二九」的武器。各縣人武部組織帶領各縣「聯指」武裝人員4400多人到鳳山後，對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員全面包圍，抓捕了10000多人（當時全縣人口共103138人）。僅這一次圍剿，全縣槍殺打死1016人。¹⁰¹

值得注意的是，在廣西境內鎮壓「四二二」的戰鬥，並不完全是廣西革籌、廣西軍區自行其事的結果。8月初，廣州軍區在湖南衡山開會，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主持會議。廣西軍區、桂林市武裝部、桂林軍分區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落實『七三』布告，研究出動軍隊，武裝解除武裝據點」。¹⁰²

3 「颳十二級颱風」

「颳十二級颱風」是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常用的一句話，意思是要發動對階級敵人最猛烈的進攻。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對於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戰勝。你不打它，它要打你。這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樹不動，風總是要吹得你動。這是流傳的語言。這句話有道理。其實，我們不是個樹，我們應該成風，我們要颳他們的風。當然，他們要颳我們的風，但我們也要颳他們的風。我們颳它十一級、十二級的颱風，來摧垮他們。單純的消極防禦不行，要採取主

101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17。

102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13。

動的進攻。」¹⁰³ 1967年12月，上海市革委會所屬「打擊投機倒把總指揮部」組織了一支一萬多人的隊伍，於12月19日開展了一次打擊流氓阿飛、投機倒把分子的大行動，「對利用旅店、飯店、招待所、車站、碼頭從事非法套購、搶購、販賣的一小撮投機慣犯和牛鬼蛇神，採取了革命行動……」。12月20日，上海楊浦區公檢法聯合召開公判刑事犯罪分子電視鬥爭大會，對八名流氓、盜竊犯、投機倒把犯進行判決。¹⁰⁴ 12月21日，《文匯報》發表社論〈再颳它一場十二級颱風〉。社論說：

上海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曾在今年8月間，向資產階級反動勢力颳了一場十二級颱風，把當時出現的以上柴「聯司」壞頭頭為代表的一小撮「地主還鄉團」颳得七零八落，土崩瓦解，大快人心。……今天，另一小撮為人類所不齒的流氓阿飛和投機倒把分子，又步他們的後塵，從地下鑽出來為非作歹。階級敵人既已向我們猖狂挑戰，我們有必要認認真真地回敬一下，再颳它一場十二級颱風，乾淨利落地把他們收拾掉。……階級敵人的猖狂破壞活動，從反面教育了我們：火線戰鬥猶酣，千萬逍遙不得。你逍遙，敵人可不逍遙；你在忙於打「內戰」，妄想「吃」掉對方，敵人正求之不得，正想最後把你們雙方統統「吃」掉。如果我們放過了流氓阿飛，放過了投機倒把分子，放過了社會上一切資本主義惡勢力，不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不徹底摧毀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那他們就要對我們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就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是群眾的專政。只有群眾一致動員起來，才能有力地向敵人專政。只要群眾一致發動起來，我們就能把階級敵人從陰暗的角落裏，一個一個地揪出來。我們一定要把風颳過去，見流氓阿飛就鬥，見投機倒把分子就抓。那裏抓到，就在那裏鬥。在學校抓到，就在學校鬥，在街上

103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68。

104 《文匯報》，1967年12月21日上午版。

抓到，就在街上鬥。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振一振我們的軍威，顯一顯我們的身手！把一小撮敵人鬥得無處藏身，臭不可聞！

《文匯報》的社論影響很大，全國許多地區的「清理階級隊伍」中都使用了「颶十二級颶風」的說法。

廣西各地在1967年下半年就曾出現過亂殺人的現象，廣西革籌和廣西軍區在12月16日發出十項命令，其中第四項為：「群眾組織不准隨便抓人、打人、殺人，已抓的人一律釋放。」但是，命令頒布後，各地亂殺人的事件仍接連發生。¹⁰⁵

1968年1月18日，靈山縣「革聯」（「四二二」派）二百多人再次到廣西軍區控訴靈山縣「聯指」在五個公社成批殺害「四二二」成員的罪行，要求軍區制止亂殺人。20日，廣西「工總」和河池地區「四二二」派群眾到廣西軍區聲援靈山縣「革聯」控訴團，在軍區政治部大樓前請願。軍區負責人答應派人到靈山制止亂殺人。¹⁰⁶

但事實上，靈山縣的亂殺人並未停止下來。由於縣武裝部、軍管會的縱容，致使亂殺人之風愈颶愈盛，到3月底，全縣被亂殺死的人數達到2600多人。

4月上旬以後，廣西各地紛紛集會，迅速掀起了一個「反三右」（即反右傾翻案、反右傾分裂、反右傾保守）的鬥爭，向「階級敵人」「颶十二級颶風」，導致亂抓、亂殺人，甚至成批殺人的現象蔓延全區。¹⁰⁷

「七三」布告發布後，廣西地區以宣傳、落實中央布告為名，對「四二二」及「五類分子」大開殺戒，製造了一起又一起駭人聽聞的慘案。

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在南寧召開群眾大會，號召向地、富、反、壞、右、「反共救國團」分子等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廣西各地、市、縣所在地也都召開「熱烈歡呼中央『七三』布告」的幹部群眾大會，大造聲勢，全區共約有三百萬人參加大會。《廣西日報》就貫徹「七三」布告

105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61。

106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66。

107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79—80。

問題，先後發表九篇社論，緊密配合廣西革籌、廣西軍區部署對「階級敵人」的軍事圍剿，對全區又一次出現的慘無人道的亂殺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七三」布告公布後全區亂殺人較「七三」布告前嚴重得多，有些地方死人比布告前增加好幾倍，給全區帶來深重的災難。¹⁰⁸ 7月8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各地發出〈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當時，所謂流竄人員，實際是各地「四二二」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避難人員，一些「聯指」造反組織以清理流竄人員為名，追捕、屠殺「四二二」一批人。¹⁰⁹ 7月下旬，廣西各地進一步掀起了所謂對敵執行「群眾專政」的高潮，颳起了殺人的「十二級颱風」的狂潮，從城鎮到農村，成批亂殺人。

據《賓陽縣志》記載：「1968年7月底，縣革委會主任王建勳（六九四九部隊副師長）、副主任王貴增（縣人武部副政委），以貫徹落實〈七·三布告〉為名，動員向所謂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致使全縣被打死或迫害致死3883人，加上貫徹〈七·三布告〉前被打死或迫害致死68人，文革中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失蹤3951人，造成一大冤案。」¹¹⁰ 賓陽縣在貫徹執行「七三」布告中，全縣每個公社都成批殺了人。從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裏，全縣被打死3681人（其中：國家幹部51人，教師87人，工人27人，集體工75人，農民居民3441人，使176戶全家滅絕），佔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總數3951人的93%。¹¹¹

8月20日，桂林發生「八二〇」事件。桂林「造反大軍」（「四二二」觀點）及同意其觀點的人，在全城大搜捕中，有數千人被抓捕關押，被殺死、打死和迫害致死的共345人。原來兩派群眾組織對等參加的桂林市革委會成員中，「造反大軍」的22個委員，在「八二〇」事件中，被捕關進監獄的有19人。而「聯指」的22個委員不管是策劃武鬥，指揮武鬥，參加武鬥，指揮亂殺人，親自殺人，策劃搶奪武器的，則

108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04—105。

109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03。

110 《賓陽縣志》，第一卷，頁458。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香港：華視文化公司，1993），頁8。

111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11。

都成為執行「正確路線」、「保衛紅色政權」的功臣，有些人還不斷升官晉級。¹¹²

8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在一片血雨腥風中宣告成立。由於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本身存在強烈的派性傾向，廣西革委會基本上成為了「聯指」一派的天下，「四二二」成為被鎮壓的對象。在區革委會成立的前夕，為促進革委會的成立而應召前去北京參加中央開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的廣西「四二二」的九個頭頭，於8月18日被在京一起學習的廣西「聯指」頭頭當作「反革命」拘捕，送進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關押，隨後又被送回廣西各地關押。¹¹³

9月23日，廣西革委會、廣西軍區發出〈堅決制止亂殺人、亂抓人的通知〉。這是鑑於廣西各地對「四二二」及五類分子大抓亂殺的嚴重局面而發出的。但通知未能從根本上提出制止亂捕亂殺的有力措施，各地亂殺人的現象未能很快得到遏制。有的地方在發出不准亂殺人的通知前，還搶先口頭通知說要趕快殺，過幾天就不准殺人了，結果這些地方出現突擊殺人，亂捕亂殺比通知發出前更嚴重。¹¹⁴

廣西在這一場空前浩劫中到底殺了多少人呢？韋純束、劉毅生等主編的《當代中國的廣西》一書中寫道：「廣西壯族自治區在武鬥中被打死的達三千多人，另外在此前後被迫害和濫殺的達八萬多人。」¹¹⁵從另一組數字我們也可以想見廣西亂殺人情況之嚴重。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000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17000多人。¹¹⁶

在無數殘酷的事實中，最突出的是在廣西境內發生了多起吃人的野蠻事件。在歷史上，原始社會生產力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存在着奴隸及戰俘被殺吃肉的現象，而隨着生產力的提高，精神文明、社會道

112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19。

113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19。

114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28。

115 韋純束、劉毅生等主編：《當代中國的廣西》，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130。

116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頁132。

德的發展，人吃人的野蠻行為早已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絕跡。然而，在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國，在廣西卻發生了數百起這種喪失人性、愚昧無知的人吃人慘劇。

在廣西發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蠻事件的有武宣縣、上思縣、靈山縣、天等縣、貴縣、橫縣、武鳴縣、隆安縣、都安縣、大新縣、浦北縣、崇左縣、容縣、欽州縣等縣。僅在武宣縣就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後被野蠻者吃掉。……其中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剖生割的7人。¹¹⁷ 靈山縣檀墟、新墟兩公社就有剖腹食肝22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縣北道公社定更大隊有19例，欽州縣小董茶場有3例。¹¹⁸

1983年在廣西開展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工作(簡稱「處遺」)和1984年整黨工作中，對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各種嚴重罪行和錯誤的幹部群眾進行了處理，對在文革中參與吃人肉的人也進行了處理。

參與殺人和吃人肉的人雖然人數並不太多，但所造成的影響極大，醜聞曾在國內外蜚聲一時，在人民共和國的史冊上記下了最為醜惡的一頁，但它卻是真實存在的。我們必須正視它。只有客觀冷靜地面對它，研究它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及其教訓，才有可能鏟除它滋生的土壤，才能永遠杜絕這種醜惡現象。將這頁歷史告訴人們，是為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用血和淚寫成的歷史來教育民眾，告誡子孫後代，絕不能讓這樣的歷史悲劇重演。

117 《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頁28—29；〈武宣縣被吃人肉者名單〉(武宣縣處遺辦1983年7月4日統計)。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頁96。

118 中共欽州地委整黨辦公室編：《欽州地區「文化大革命」大事件》，頁48—49。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頁97。

第十章

「全國一片紅」

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所支持和倡導的全面奪權終於得以完成，雖然其過程波瀾曲折，反覆無常，但所謂「全國一片紅」終歸不失為文化大革命的一件標誌性的重大成果。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為召開九大做了準備，而且正式將早已被打倒的原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通過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的報告，將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理論和實踐都合法化了，並且在組織上進行了大的調整，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後一項重要程序。九大之後，嚴格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即已結束，但三年文化大革命帶給中國人民的痛苦還遠未結束。

一 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自治區的革委會同時成立。從1967年1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奪權運動，經歷了近二十個月的時間，終於在全國（除台灣省外）二十九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此前後，各基層黨政機關、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企事業單位、農村人民公社等，也陸續成立了革委會。9月7日，北京舉行

有十萬人參加的盛大集會，慶祝除台灣以外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周恩來、江青等出席慶祝大會並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我們一定要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好好地迎接我們現在掀起的鬥、批、改的新高潮。」江青在大會上說：「工人階級，領導階級，要好好地保護紅衛兵小將。」這次大會前，周恩來曾就召開這一大會事請示毛澤東：「我們以電話商量，認為中央文革碰頭會全體同志應參加這次大會，由恩來、江青在會上講幾句慶賀和鼓勵的話。」會後，毛澤東對這次大會提出了批評。9月8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聯名向毛澤東寫檢討說：這次會議沒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議過，講話的代表沒有提中央文革，沒有着重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小將的功勳，還有像蒯大富這樣的代表性人物沒有參加會議，全是因為領導上準備不足。9月9日，毛澤東批示：周恩來、江青講話照發。¹《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於9月7日聯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熱烈歡呼全國(除台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全部成立〉，社論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在各地區的代理人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陰謀的徹底破產」，「它標誌着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了鬥、批、改的階段。」

1 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是在全面奪權基礎上建立的，其建立的過程極其複雜，許多情況到現在也還撲朔迷離，不為人所知，但大都經歷了各派群眾組織之間的聯合、分裂、對抗、武鬥、談判、協商等各階段，最後經中央批准而成立。

1967年《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

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257。

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一年以後，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革命委員會好〉，提出：「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至於在革委會中，「三結合」的三者之間各佔多大比例，權力如何分配，都沒有明確的規定。中央曾通過《紅旗》雜誌社論提出：三結合中，「三者缺一不可，忽視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錯誤的」。在奪權之初，對「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在革委會中的作用強調得比較充分：「必須充分發揮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的作用，必須重視他們的意見，而絕不能把他們當做陪襯，因為他們是廣大革命群眾的代表。如果不承認或貶低他們的作用，那就是否定革命群眾，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革命幹部則提出「他們應該而且可能在這個機構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幹作用」。對人民解放軍代表，只說到：「有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參加，對於勝利完成奪權鬥爭的任務，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²實際上，在全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中，大多以軍隊幹部為主。其下屬各級革委會及機構中，軍隊幹部也佔了相當大的比重，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中，革委會主任由軍隊幹部擔任的有二十個，其餘擔任革委會主任的地方幹部則大都兼任了軍隊職務。³

2 《紅旗》雜誌1967年第5期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1967年3月30日；另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頁374—375。

3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44—246。

附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情況

| 地區 | 主任 | 軍內職務 |
|-----|-----|------------------------|
| 黑龍江 | 潘復生 | 瀋陽軍區政治委員，黑龍江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
| 山東 | 王效禹 | 濟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山東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
| 貴州 | 李再含 | 昆明軍區副政治委員兼貴州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
| 上海 | 張春橋 | 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上海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 |
| 山西 | 劉格平 | 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山西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

另外，全國軍隊幹部擔任縣以上革委會第一、二把手的，共有5193人。其中，在縣以上革委會主任中，軍隊幹部所佔比例，北京為78%，廣東為81%，遼寧為84%，山西為95%，雲南為97%，湖北為98%。⁴「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的代表在革委會中，人數最多，一般佔到委員

| | | |
|-----|-----|----------------------------------|
| 北京 | 謝富治 | 上將，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北京衛戍區第一政治委員 |
| 青海 | 劉賢權 | 少將，青海省軍區司令員 |
| 內蒙古 | 滕海清 | 中將，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內蒙古軍區司令員 |
| 天津 | 解學恭 | 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兼天津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 |
| 江西 | 程世清 | 少將，福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江西省軍區政治委員 |
| 甘肅 | 冼恆漢 | 中將，蘭州軍區政治委員 |
| 河南 | 劉建勳 | 河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
| 河北 | 李雪峰 | 北京軍區政治委員 |
| 湖北 | 曾思玉 | 中將，武漢軍區司令員 |
| 廣東 | 黃永勝 | 上將，廣州軍區司令員 |
| 吉林 | 王淮湘 | 少將，陸軍第十六軍政治委員(後任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 |
| 江蘇 | 許世友 | 上將，南京軍區政治委員 |
| 浙江 | 南萍 | 少將，浙江省軍區政治委員 |
| 湖南 | 黎原 | 少將，陸軍第四十七軍軍長(後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 |
| 寧夏 | 康健民 | 少將，蘭州軍區副司令員 |
| 安徽 | 李德生 | 少將，陸軍第十二軍軍長(後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
| 陝西 | 李瑞山 | 蘭州軍區政治委員兼陝西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
| 遼寧 | 陳錫聯 | 上將，瀋陽軍區司令員 |
| 四川 | 張國華 | 中將，成都軍區政治委員 |
| 雲南 | 譚甫仁 | 中將，昆明軍區政治委員 |
| 福建 | 韓先楚 | 上將，福州軍區司令員 |
| 廣西 | 韋國清 | 上將，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
| 西藏 | 曾雍雅 | 少將，西藏軍區司令員 |
| 新疆 | 龍書金 | 少將，新疆軍區司令員 |

4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頁244。

總數的六成左右，⁵但他們的地位和作用卻是不穩定的，一般來說，他們的地位和作用都是隨着當地混亂局面的逐漸結束而日益降低的。「革命幹部」的地位和作用則相反，他們的作用是隨着形勢的逐漸穩定而提高的，但他們要想在革委會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幹作用」，則還要等到「三支兩軍」人員返回部隊之後才可能實現。

所謂「三結合」，在不同時期、不同部門也具有不同的內容。在地方各級政府機構，是由革命群眾代表、人民解放軍代表和革命幹部代

5 部分省市革委會成立時各部分人員構成表：

| 地區 | 委員數 | 軍隊 | 幹部 | 群眾 | 常委數 | 軍隊 | 幹部 | 群眾 | 編制 |
|----|------|----------|-----------|-----------|-----|----------|----------|----------|---------|
| 天津 | 97 | 22 (22%) | 18 (19%) | 57 (59%) | 31 | 6 (19%) | 6 (19%) | 19 (61%) | 200 |
| 江西 | 149 | 20 (13%) | 23 (15%) | 99 (66%) | 26 | 7 (27%) | 10 (38%) | 9 (35%) | 1200 |
| 甘肅 | 105 | 16 (15%) | 30 (29%) | 53 (50%) | 24 | 8 (33%) | 6 (25%) | 10 (42%) | |
| 河南 | 155 | 29 (19%) | 32 (21%) | 82 (53%) | 41 | 6 (15%) | 12 (29%) | 21 (51%) | 250-300 |
| 河北 | 121 | 26 (21%) | 25 (21%) | 70 (58%) | 31 | 8 (26%) | 7 (23%) | 16 (52%) | 100 |
| 湖北 | 175* | 25 (14%) | 30 (17%) | 100 (57%) | 37 | 9 (24%) | 11 (30%) | 17 (46%) | 200 |
| 江蘇 | 165* | 30 (18%) | 30 (18%) | 95 (58%) | 39 | 12 (31%) | 11 (28%) | 16 (41%) | 200 |
| 浙江 | 150 | 28 (19%) | 28 (19%) | 94 (63%) | 37 | 11 (30%) | 11 (30%) | 15 (41%) | |
| 湖南 | 160* | 27 (17%) | 30 (19%) | 100 (63%) | 35 | 9 (26%) | 10 (29%) | 16 (46%) | |
| 寧夏 | 81 | 17 (21%) | 19 (23%) | 42 (52%) | 19 | 6 (32%) | 6 (32%) | 7 (37%) | |
| 安徽 | 159* | 24 (15%) | 32 (20%) | 90 (57%) | 39 | 7 (18%) | 10 (26%) | 22 (56%) | 120 |
| 陝西 | 149* | 29 (19%) | 29 (19%) | 83 (56%) | 35 | 7 (20%) | 6 (17%) | 18 (51%) | 150 |
| 遼寧 | 175 | 34 (19%) | 26 (15%) | 101 (58%) | 45 | 9 (20%) | 10 (22%) | 26 (58%) | 150 |
| 廣東 | 180* | 27 (15%) | 27 (15%) | 108 (60%) | 39 | 9 (23%) | 10 (26%) | 20 (51%) | 150 |
| 四川 | 270* | 36 (13%) | 50 (19%) | 147 (54%) | 55* | 8 (15%) | 12 (22%) | 32 (58%) | 300 |
| 雲南 | 181* | 25 (14%) | 40 (22%) | 102 (56%) | 47* | 10 (21%) | 10 (21%) | 20 (43%) | 150 |
| 福建 | 147* | 26 (18%) | 29 (20%) | 92 (63%) | 39 | 9 (23%) | 8 (21%) | 22 (56%) | 120 |
| 廣西 | 170* | 26 (15%) | 26 (15%) | 107 (63%) | 45 | 9 (20%) | 9 (20%) | 25* (6%) | |
| 西藏 | 135* | 20 (15%) | 20 (15%) | 68 (50%) | 35 | 8 (23%) | 8 (23%) | 19 (54%) | 100 |
| 新疆 | 150 | 22 (15%) | 25* (17%) | 83 (55%) | 43 | 10 (23%) | 10 (23%) | 17 (40%) | 120 |

註：本表是參照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間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與思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一書的附表加工而成的，*為含有若干機動人數。

表組成。在中央國家機關的奪權過程中，周恩來曾提出過「革命的領導幹部、革命的中層幹部、革命造反派」組成的「三結合」。⁶在工礦企業和農村人民公社以下的革委會，一般由民兵代表代替解放軍代表；在各大中專學校的革委會，是由革命學生代表、革命教職員工代表、革命領導幹部代表組成。1968年8月以後，工人宣傳隊普遍進駐各城市的大中專學校，以後大中專學校的革委會則由革命幹部代表、教職員工和學生代表、工人宣傳隊代表這三部分人員組成。

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後，中央原打算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決定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事宜。9月19日，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了八屆十二中全會所要解決的問題，會後周恩來等向毛澤東報告了討論的情況，報告中說：「十二中全會要解決甚麼問題？一是準備召開黨的九大；二是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經驗；三是解決不僅在實質上、而且也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問題，順帶着也就解決了國家主席問題。」毛澤東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說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會上討論才能作出決定，並指出：「我認為，暫時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中央全會也不要擴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夠了。」⁷周恩來等人正式開會討論並提出「解決不僅在實質上、而且也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這樣關係國家體制的重大問題，相信應是毛澤東考慮過並向中央文革碰頭會打過招呼的。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也拿不定主意。從將全面奪權進行到底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成立革委會後，成立中央的革命委員會。但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名不正言不順，二是誰來當中央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如果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員會，它就成為體現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的象徵，就不可能是短期的，可能要存在相當長的時間，就會帶來修改憲法的問題。還有，中央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國

6 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2月17日)，載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28。

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這些機構還要不要？如果要，中央革命委員會與它們之間是甚麼關係？如果不要，其職能都由中央革命委員會來行使，那麼中央革命委員會這個機構就可能變得非常龐大。就是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員會，七十五歲高齡，身體和精力遠不如前的毛澤東也不會當這個革委會的主任。毛如不當，理所當然就應該由林彪來當中央革命委員會的主任，但這也是毛澤東所不願意的。毛澤東說「暫時不宜成立」，此事後來再也沒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全國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情況一覽表

| 序號 | 地區 | 成立時間 | 革委會主任、副主任 | 點名打倒的原負責人 |
|----|-------------------|-----------|--|---------------|
| 1 | 黑龍江省 ⁸ | 1967.1.31 | 潘復生、汪家道、范正美、劉雪峰 | 歐陽欽、李範五 |
| 2 | 山東省 ⁹ | 1967.2.3 | 王效禹、楊得志、韓金海、王竹泉、趙修德 | |
| 3 | 上海市 ¹⁰ | 1967.2.5 | 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 | 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 |
| 4 | 貴州省 ¹¹ | 1967.2.13 | 李再含、張明、李立、孫晶德、劉安民、康岩中 | 賈啓允 |
| 5 | 山西省 | 1967.3.18 | 劉格平、張日清、陳永貴、李順達、楊承效、劉貫一、陳守中、袁振 ¹² | 陶魯笏、衛恆、王謙、王大任 |
| 6 | 北京市 | 1967.4.20 | 謝富治、吳德、鄭維山、傅崇碧、聶元梓、周景方、劉錫昌、鄧萬田 | 彭真、劉仁 |

- 8 奪權時名為「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3月23日改名為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
- 9 奪權時名為「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2月23日改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
- 10 奪權時名為「上海人民公社」，2月23日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 11 奪權時名為「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3月1日改名為貴州省革命委員會。
- 12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的《山西通史·當代卷》，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中記載：山西省革委會成立時的副主任為：張日清、劉貫一、袁振、郭永彪、謝振華、焦國鼎、陳永貴（頁454）。

| | | | | |
|----|---------|-----------|------------------------------------|------------|
| 7 | 青海省 | 1967.8.12 | 劉賢權、張江霖、達洛 | 王昭 |
| 8 | 內蒙古自治區 | 1967.11.1 | 滕海清、吳濤、高錦明、霍道餘 | 烏蘭夫、王鐸、王逸倫 |
| 9 | 天津市 | 1967.12.6 | 解學恭、蕭思明、鄭三生、江楓 | 萬曉塘、張淮三 |
| 10 | 江西省 | 1968.1.5 | 程世清、楊棟樑、黃先、于厚德、萬里浪 | 方志純 |
| 11 | 甘肅省 | 1968.1.24 | 冼恆漢、徐國珍、張忠、胡繼宗、丘捨民、蕭澤民 | 汪鋒 |
| 12 | 河南省 | 1968.1.27 | 劉建勳、王新、紀登奎、耿起昌、楊力勇 | 文敏生、趙文甫 |
| 13 | 河北省 | 1968.2.3 | 李雪峰、劉子厚、馬輝、曾美、張英輝、劉殿臣、耿長鎖 | 林鐵 |
| 14 | 湖北省 | 1968.2.5 | 曾思玉、劉豐、張體學、任愛生、梁仁魁、朱洪霞、饒興禮、楊道遠、張立國 | 王任重 |
| 15 | 廣東省 | 1968.2.21 | 黃永勝、孔石泉、陳郁、王首道、丘國光、閻仲川、黃榮海、劉繼發、黃育英 | 趙紫陽 |
| 16 | 吉林省 | 1968.3.6 | 王淮湘、阮泊生、鄭季翹、蕭道生、何友發 | 趙林 |
| 17 | 江蘇省 | 1968.3.23 | 許世友、吳大勝、楊廣立、彭沖 | 江渭清、陳光 |
| 18 | 浙江省 | 1968.3.24 | 南萍、陳勵耘、熊應堂、周建人、賴可可、王子燧、張永生、華銀鳳 | |
| 19 | 湖南省 | 1968.4.8 | 黎原、龍書金、華國鋒、楊大易、章伯森、劉順文、胡勇、葉衛東 | 王延春 |
| 20 | 寧夏回族自治區 | 1968.4.10 | 康健民、張懷禮、徐洪學、王志強、安建國 | 楊靜仁、馬玉槐 |
| 21 | 安徽省 | 1968.4.18 | 李德生、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楊效椿、徐文成、張秀英、張家雲 | 李葆華、黃岩 |

| | | | | |
|----|----------|-----------|---|-----------------------------|
| 22 | 陝西省 | 1968.5.1 | 李瑞山、黃經耀、胡焯、楊煥民、顧純、張培信、馬希聖、單英傑、王鳳琴、李世英、孫福林、楊夢雲 | 趙守一、李啓明 |
| 23 | 遼寧省 | 1968.5.10 | 陳錫聯、李伯秋、楊春甫、王良、楊旭、楊棄、毛遠新、尉鳳英、任寶成、王鳳恩、劉忠禮、于桂蘭、張治國、魏禮玲、郝義田、劉盛田 | 馬明方、顧卓新、喻屏、周桓 |
| 24 | 四川省 | 1968.5.31 | 張國華、李大章、梁興初、劉結挺、天寶、張西挺、徐馳、鄧興國、江海雲、王桓霖、彭家治、張泗洲、馮玉德、蔡文彬、楊志誠、但坤蓉 | 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黃新廷 |
| 25 | 雲南省 | 1968.8.13 | 譚甫仁、周興、陳康、魯瑞林、劉明輝、黃兆其、李毅、徐學惠、段寶珍 | 閻紅彥、趙健民、葉飛、范式人、侯振亞 |
| 26 | 福建省 | 1968.8.14 | 韓先楚、皮定鈞、朱耀華、藍榮玉、葉松、伍洪祥、黃亞先、莊志騰、田毓民、洪秀樅、鄭火排、王雲集 | |
| 27 | 廣西壯族自治區 | 1968.8.26 | 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鏞、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韋世經、林福文、毛鳳鸞、廖煒雄、龍智銘、顏景堂、曾春生 | 王任重、賀希明、謝王崗 |
| 28 | 西藏自治區 | 1968.9.5 | 曾雍雅、任榮、陳明義、巴桑、廖步雲、楊東生、苗丕一、阿沛·阿旺晉美、陶長松、劉佑民、土登尼瑪、朱景尚、馬瑞華、次仁拉姆 | 周仁山、王其梅 |
| 29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 1968.9.5 | 龍書金、王恩茂、賽福鼎、郭鵬、裴周玉、李全春、楊立業、胡良才、孜牙、吳巨輪 | 習仲勳、劉瀾濤、武光、呂劍人、張仲翰、伊敏諾夫、包爾漢 |

2 革委會的機構設置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關於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正式革命委員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規定：在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員會的地區，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地專級由省軍區和軍審查，報大軍區批准，縣級由省軍區或軍批准；成立正式革命委員會，地專級由軍區審查，報中央批准，縣級由省軍區或軍審查批准，報大軍區備案。在已建立省、市革命委員會的地區，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地專級由省革命委員會審查、批准，報中央備案，縣級由省革命委員會審查、批准；成立正式革命委員會，地專級由省革命委員會批准，縣級由省革命委員會審查批准，報中央備案。¹³ 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又對此作了〈修改規定〉，將正式成立地專級革委會的批准權，分別下放給了大軍區和省革命委員會，中央只要求備案。¹⁴

革委會的建立是以全盤否定建國以來的黨政領導體制為前提的。建國後所有的地方國家政治組織設施，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地方組織機構、全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治協商會議、民主黨派、地方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共青團、工會、婦聯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毀於一旦，革委會成了中國社會地方國家權力機構中唯一的政治組織。儘管它被稱為是廣大群眾的「創舉」，卻不是經過群眾代表選舉產生的。¹⁵ 原來的國家體制在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就被改變了。

毛澤東強調：「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¹⁶ 按照這個指示，各級革委會都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革委

13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487。

1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617。

15 《紅旗》雜誌1968年第4期社論中稱：「迷信選舉，這也是一種保守思想。」革委會是「經歷了反覆的爭論、團圓、協商、審查，才推舉出來的」。「這比以前單純用選舉產生的更合於無產階級民主，更合於民主集中制……。」

16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革命委員會好〉，1968年3月30日。

會內部成立「黨的核心小組」，成為這一級機構的領導核心，由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組成。

大多數省級革委會剛成立時，一般只設辦事、保衛、政工、生產四大組，全部工作人員只有150至200人，為原來省委、省政府機構人員的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江西省革委會的工作人員編制在全國是最高的，有1200人，但即使這樣也比原省委、省人委編制的4000人縮減了七成。¹⁷ 革委會的這種過於簡陋、缺乏必要的專業化分工的機構設置，顯然與它產生的時代背景有關。革委會的一元化的領導，集黨、政、人大、政府、司法和群眾團體的所有職能於一身，它的領導機構也是一元的，先是不設黨委，後來黨委恢復了也不另設機構，而是由革委會的機構代理，這也就是當時所強調的打破機構重疊、精兵簡政的重要內涵。但在實際工作中，革委會卻難以適應社會實際管理中多方面、多層次的要求。對於一個主要依靠計劃手段、行政手段管理全部社會生活的國家來說，這種不適應就更為突出。於是，革委會的機構一經設立，就又無可迴避地面臨着馬上增加機構的問題。普遍的做法，是在組下設組，大組套小組。由於原有的國務院行政組織法已被棄之一旁，而又沒有制定各級革委會的組織法規，各地革委會的機構設置便五花八門，具有極大的隨意性。在這種情況下，革委會的機構很快就又不可遏制地膨脹起來。¹⁸

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在原市委、市人委工作部門的基礎上進行了改組和調整，成立市革委會的工作機構——組和辦。原市級各局建制基本未動，但不再列入市革委會的序列。到年末，上海市革委會共設有二十八個組、辦，即：辦公室、組織組、政宣組、政治組、材料組、工業組、市政交通組、教育衛生組、財貿組、科技組、經濟計劃組、勞動工資組、地區組、外事組、接待組、農村組、群運組、調查組、聯絡組、保衛組、專題寫作組、大批判寫作組、政法指揮部、三

17 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間中國政體變革的歷史與思考》，頁162。

18 參見煙福林、田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史》（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270—271。

秋指揮部、火線指揮部、文攻武衛指揮部、查抄物資組、畢業生工作委員會。¹⁹

江蘇省革委會成立時，辦事機構設辦事組、政治工作組、政法工作組、生產指揮組四大組，在編185人。原省級機關各部、委、廳、局和直屬企事業單位一律分為大小兩套班子，大班子人員下放勞動，搞鬥批改，小班子分別在四大組領導下抓業務工作。一年後，省革委會決定對原省屬企事業單位採取撤併精簡的辦法，組成重工業、輕工業、機械工業、基本建設、交通、農業生產資料、海洋漁業、農產品、工業品、食品、進出口、醫藥、物資、煤炭石油等十四個公司和郵電管理局，農業、水利氣象兩個服務站，以及中國人民銀行江蘇分行，計十八個單位，在省革委會生產指揮組領導下工作。四大組下轄的小組由十三個增設到二十一個，在編人員增加到1545人。²⁰

張志明對革命委員會這一課題作過長時間的探索和研究，他認為：

這種由軍隊代表、「革命幹部」代表和「群眾」代表組成的所謂「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實質上是毛澤東浪漫的革命空想受挫後，與嚴峻的現實相妥協和折衷的產物，是貫徹執行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的工具。這種臨時權力機構，在其鼎盛時期是集黨、政、軍、財、文大權於一身的地方國家權力機構，其性質是軍人居支配地位的變相的軍事管制。在其平復和衰落時期，革命委員會失去其軍事化色彩，其性質也由地方國家臨時權力機構逐漸轉為黨委領導下的各級地方政權機構，即類似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革命委員會不是毛澤東的發明，也不是所謂人民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創舉」，就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而言，它的成立不僅沒有革除傳統體制中高度集中、高度集權的弊端，沒有超越

19 上海市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編著：《上海黨政機構沿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130—131。

20 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共江蘇省組織史資料簡本（1921—200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頁427。

傳統體制的思路和模式，反而把這種弊端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僅沒有像其標榜的那樣實行「精簡機構」，根除官僚主義莠草的滋生，反而在原來存在的機構臃腫的基礎上，使中國的「幹部」隊伍更加膨脹。……

「文化大革命」在摧毀了建國後建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政治結構以後，最終成立的新的政治調控體系——「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不僅不是一種能夠超越原有政治體制模式的新型政權組織形式，而且使原來的以黨治國模式中業已存在的領袖個人獨斷現象更為嚴重並形成制度，使以往的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一元化弊端發展到極端。所以，用革命委員會取代原來的黨政企事業單位等各種各級領導機構，實質上是我國政治體制在結構、職能上的一次重大的突變和倒退。²¹

除了對「變相的軍事管制」這一判斷我認為尚需進一步研究外，我同意他對革委會所作的基本評價。

革委會體制上的弊端及其成分的嚴重不純，成為國家政治生活長期難以安定的重要原因。但革委會的成立，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局面，填補了國家和地方權力的真空半真空狀態，承擔起組織工農業生產和管理社會生活的責任，使國家的各項工作有可能逐步恢復和展開。

二 八屆十二中全會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是直接為九大作準備的一次中央全會。這次全會主要解決了三個問題：一、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贊同毛澤東關於「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論斷，並對參與

21 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間中國政體變革的歷史與思考》，頁158—160。

「二月逆流」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以及「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王稼祥等人進行了批判，為九大定下了政治上的基調。二、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為歷時兩年多的「炮打司令部」的鬥爭，從政治上組織上作了結論，為九大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安排作了準備。三、討論和修改了新的黨章草案，通過了九大代表的產生辦法。

1 會議概況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於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開。應出席會議的八屆中央委員有一半以上被剝奪了出席全會的權利。全會召開時，原97名八屆中央委員(去世10人)，只有40人到會；候補中央委員中只有19名到會，不足半數(按照黨章規定，召開中央委員會會議必須有半數以上委員參加)。開會時，從候補中委中「挑」了10人補為中央委員，剛過半數。²²而被擴大吸收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人員達74人，佔會議成員總數113人的55%以上(以後發現，出席會議的從地方革委會來的成員中，竟有一人不是共產黨員)。²³被擴大吸收參加會議的人員與中央委員同樣有表決權，而且一些不是中央委員的人被任命為組長，如王洪文，造成非中央委員領導中央委員的局面。²⁴

22 如嚴格按照黨章規定，應由排在候補中央委員前列的楊成武、章漢夫、潘自力、李大章、許世友、帥孟奇、楊勇、劉仁、陳錫聯、萬毅十人依次遞補，實際上由黃永勝(在候補中央委員中列第42位)、許世友、陳錫聯、張達志(第50位)、韓先楚(第92位)、潘復生(第67位)、劉建勳(第78位)、劉子厚(第82位)、吳德(第34位)、李大章十人增補為中央委員。

23 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六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9。

2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時期)》(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頁64。

在13日的開幕式上，周恩來報告了出席會議人員的組成、編組和會議的開法，並宣布了會議議程：一、擬定九大代表產生的原則和方法；二、修改黨章草案；三、講一講形勢；四、專案審查報告。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講話說：

國內問題嘛，就是要總結一下上一次全會到現在兩年多的工作。無非是有兩種看法：一種呢，說還不錯，十一中全會這個決議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確的；也有人說呢，不見得。那個時候我們就講過，十一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通過那個決議的時候，我就打過招呼的，特別是後來10月的工作會議。不要以為通過了決議，以為大家都同意了。實際上呢？舉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後頭呢，證明有許多同志沒有過關，以至於不能到今天這樣的會。中央委員啦，候補委員啦，群眾不諒解。比如有那麼一位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我實在覺得應該到會，但群眾無論如何不能諒解他。

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有？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

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麼幾個，秋風落葉那麼一掃，三年半也差不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把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問題拖長了。也只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個省一個省解決。

我是提出問題，作為討論的建議，現在不能做結論。

這個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這也是一個問題。現在不是講進行到底嗎？究竟甚麼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些。²⁵

2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31—1532。

全會在分組討論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的問題時，圍攻和批判了參與「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和「一貫右傾」的朱德、陳雲、鄧子恢、王稼祥等人。

10月20日，林彪在全會上講話。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10月26日，林彪再次講話。他獨出心裁地講了從古到今的四次文化大革命。他說：第一次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影響兩千年，但同我們這次比較起來，微不足道，是小巫見大巫，沒有甚麼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資產階級的意大利文化，到了十四、十五世紀，以文藝復興進入了繁榮時代；第三次是馬克思主義；這三次都沒有毛主席領導下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偉大。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最大的一次。

全會作出〈關於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和〈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規定了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為所謂「五十字方針」，即：「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決定將〈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印發全黨，作為討論的基礎。

10月31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議通過全會公報，批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提交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通過決議，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這次全會結束後，劉少奇在報刊上被公開點名批判。全會還通過關於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和〈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等文件。毛澤東在閉幕式上講了話，主要內容有：第一，清理階級隊伍，請大家應該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穩、準、狠，重點還是這個「準」字。你如果搞得不準呀，你也狠不起來，也就不那麼穩了嘛。所以，還是要注意調查研究，要重證據，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噴氣式」。第二，對於一些學者，所謂學術權威，不要做過分了。馮友蘭、翦伯贊，還有吳晗，也還有某種用處。你如果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他還提到北京的華羅庚、趙紀彬、任繼愈，上海的周谷城、劉大杰、談家楨、蘇

步青，廣州的楊榮國。第三，對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謂保者，就是幫助他們嘛。看，就是看他們以後的情況，改不改嘛。我的意見，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強迫人家的，我就不那麼贊成。你有這麼幾位，有啥要緊啦？至於有一些老同志嘛，將來是不是還可能工作嘛。我所謂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經打倒了的，比如講譚啓龍、江渭清這些人。我想，也許過幾年之後，大家的氣消了，讓他們做點甚麼。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麼贊成。要那麼純，純得那麼厲害呀。我們這個黨經過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較純一些，從來沒有這麼搞過。但是太純了，我看也不太好。²⁶

2 批「二月逆流」

10月17日，康生在第一小組會上強加給「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為王明路線翻案」等罪名。江青則污蔑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亂軍」。黃永勝、吳法憲污蔑朱德是「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個黑司令」。²⁷ 謝富治在第一小組會上說：「我們回想一下，陳雲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三次叫他發言，他說沒調查沒發言權，後來不到一個月做了個黑報告，反主席、反大躍進、反總路線。」「按陳雲同志的報告搞下去，不知成甚麼樣子。劉、鄧搞反革命修正主義，朱德同志、陳雲同志也是搞修正主義的。『二月逆流』這些人不死心，還要為他們服務。」謝富治最後總結說：「陳雲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劉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經濟小組，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陳雲同志搞些甚麼，多賺錢、賣花布、炒肉片、高價商品。陳雲同志一貫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幹好事。這些事情都要清算。」²⁸

聶榮臻被編在第二小組，天天接受揭發批判。陳伯達追問聶榮臻：為甚麼與葉劍英議論他那段「糊裏糊塗進去又糊裏糊塗出來」的歷

26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32—1533。

2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64。

28 胡楠仁：〈「文革」中的陳雲〉，《縱橫》，1996年第11期，頁5。

史？²⁹這是蓄意陷害。江青則在書面發言中影射聶榮臻企圖謀害毛澤東，說：1948年毛主席住在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城南莊，不幾天，敵機前來轟炸，指揮轟炸的特務電台就設在司令部裏。全國解放後，又把查出與此事有關的特務分子槍決滅口。³⁰康生則說，「不教而誅」這個說法，是「二月逆流」挑頭的話，引起了「大鬧」。陳伯達等還說，聶榮臻與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在西山拉拉扯扯，發泄對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不滿，這是「二月逆流」西山一股的成員。陳伯達等還在會上拿出監視聶榮臻行動的登記材料，追問他某天與某人接觸，進行了甚麼活動？甚至逼他承認，這就是反黨活動。聶榮臻憤怒痛斥：「我們政治局委員之間就不能交往了嗎？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嗎？黨內還有甚麼民主？你們這是搞甚麼？是搞特務活動。」此外，小組會上還集中批判了聶榮臻的「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貫走『專家路線』」等等。26日，聶被迫在小組會上作檢討。³¹

在李先念所在的第三組，一次小組會竟從晚上7時半開到第二天凌晨1時。這種會議的特點是要追查所謂「幕後活動」。李先念的秘書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寫道：

29 1931年4月，陳伯達在天津被捕，後關押於北平國民黨監獄。1932年2月，經陳伯達的同鄉、福建軍閥張貞斡旋，在辦理了自首悔過手續後出獄。彭真曾告訴聶榮臻：陳伯達這次出獄後，因別人聽不懂他講的福建話，無法解決吃飯問題，他又自動回到監獄，後又被趕出來。彭真說，陳伯達是「糊裏糊塗進去，又糊裏糊塗出來」。文化大革命中，聶榮臻在西山住所當做笑話，向葉劍英說過此事。不知怎麼，陳伯達得知了這件事，所以在會上追問聶榮臻。參見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103。

30 1948年5月18日，國民黨軍當局根據特務分子密報，派飛機轟炸了城南莊毛澤東的住處。在敵機轟炸前幾分鐘，聶榮臻緊急動員毛澤東離開住處，進了附近的防空洞，才免遭不測。1949年4月，大同解放後，從敵偽檔案中，查明了搞密報的特務分子就是當時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務長劉從文。經華北軍區軍事法庭審訊，劉供認不諱，1950年被判處死刑。聶榮臻批准了這個判決。劉從文被依法處決。江青就此誣陷聶榮臻。參見《聶榮臻年譜》，下卷，頁1103。

31 《聶榮臻年譜》，下卷，頁1103—1104。

吳法憲多次插話發言。他指着李先念的鼻子問，到陳毅家去了多少次，到李富春家去了多少次，到譚震林家去了多少次？每次都談了甚麼？他誣譏說，「二月逆流」中有兩股黑勢力，一股在國務院，成員有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及余秋里和谷牧；一股在軍委，成員是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及蕭華和楊成武，陳毅是這兩股黑勢力的聯繫人。張春橋等人說李先念反對1966年《紅旗》第十三期社論，就是反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鳴不平，就是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等等。他還誣譏李先念關於1967年經濟情況和財政出現赤字的報告，只反映消極面，給文化大革命抹黑。這時朱德問李先念赤字是多少，張春橋嚴厲斥責說，你又來勁了，只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王洪文也幾次發言，要李先念交代反黨活動。他還企圖挑撥老同志的關係，逼迫老同志相互揭發，利用老同志發言中的某些差異，再分別進行欺詐。……全會閉幕的前夕，即10月28日，李先念在小組會上被迫作全面系統的「檢查交代」。他承認思想感情和立場觀點和各位老同志完全一致，曾讚賞譚震林、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在「二月逆流」中慷慨激昂的發言。同時還聯繫了1956年反冒進、1959年廬山會議和1962年西樓會議思想右傾等「錯誤」，「深挖思想根源」。他深感難以再堅持工作了，於是主動提出罷免自己副總理等一切職務，只要求保留黨籍，做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繼續為黨的事業奮鬥。至此，李先念在小組會上被圍攻批鬥才告一段落。³²

周恩來在全會上也對幾位元帥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說：聶榮臻在科學院、國防科委鎮壓群眾，硬要把一派壓垮，支一派、壓一派，使七機部長期武鬥。聶榮臻在晉察冀鬧獨立王國；百團大戰，他很積極；執行劉少奇「和平民主新階段」，也很積極；大量裁軍，不按毛主席壯大自己力量的指示辦，其惡果使晉察冀邊區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

32 程振聲：〈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中華兒女》，1998年第8期，頁6-7。

時還沒有恢復起來。中央文革曾保過聶，也保了陳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說：「不要你們保。」好像保了他們，他們就不光榮了，他們自以為一貫正確。陳毅同志在一次歡迎外賓時，紅衛兵也去了，他大罵紅衛兵：「你們來幹甚麼！我的檢查是逼出來的，是假的。」66年11月13日、27日，兩次接見，林副主席不同意，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八次接見了紅衛兵，最相信群眾，對發動群眾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們背着林副主席還是接見了。直到在東郊體育場開始接見，林副主席才知道。在會上，他們把長春獸醫大學的李基才大罵了一頓，葉、陳、徐、賀都講了話。賀龍是中央已經點了名的壞人，他們還把他搞去，擺在第一位講了話。聶、葉、徐三人點頭抓楊勇，聶還說：「要燒，要燒焦。」群眾聽說是這樣，於是就抓起來了。後來他們推脫責任，說是上面點頭的。後經再三追問，鄭維山同志還當面對證說：「是在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你們三人點頭的，怕有問題，又找了他們二人，他們說了，要燒，要燒焦。」這樣他們才啞口無言。四川捉人問題。二月大鬧懷仁堂後，17日甘渭漢起草鎮壓群眾的傳單，葉劍英修改後，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接着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趙永夫事件。趙永夫是副司令員，把司令員劉賢權同志關起來，23日鎮壓群眾，在《青海日報》的「八一八」給包圍起來，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趙永夫倒說是林副主席祝賀的。2月開軍以上幹部會，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但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中央看到不對頭，林副主席講了話，才制止了。³³

毛澤東在閉幕式上的講話中也講到了批「二月逆流」的問題。他說：有些同志對於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不大了解，經過十幾天，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全會上，由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麼幾次反覆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

33 〈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1968年10月)，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甚麼十分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這個世界上面，總是左、中、右。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麼贊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陳毅同志，你就以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³⁴

11月11日，張春橋在〈關於傳達十二中全會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提出：在傳達全會精神時，對陳毅、聶榮臻、朱德等人進行點名批判，很有必要。他在報告中說：

「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要不要點名？看來，點名很有必要。我們點了名，激起了廣大群眾的義憤。這些人物的假像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陳毅同志在上海黨內外、軍內外，影響都很大，靜安區一個黨員聽了傳達，在本單位學習小組會上通了一點氣，說「陳毅是反毛主席的」，竟自受到幾個小時的圍攻。因為社會上流傳陳毅的好話很多，甚麼有戰功、能文能武，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等待帝、修、反四面進攻，頭髮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顛倒黑白，把他的錯誤、罪行說成功勞，甚麼陳毅揭發了蘇修搞顛覆的陰謀，陳毅在中央蘇區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請回來的，等等。聶榮臻的「一貫正確」，在上海國防科委所屬單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氣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學課本的，有的工人說，我從小就唸頌揚他的課本。把事實真相告訴了幹部和群眾，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覺悟，揭發了一些他們知道的事實（將另行整理上報）。國防科委系統原來為聶榮臻的問題打內戰，是上海老大難單位最多的，現在有些單位開始聯合了。郊區各縣和市區部分單位，對二月逆流中解放軍支左的錯誤，議論較多，把幾個老總的問題說清楚，反而有利於軍民團結。至於選「九大」代表，群眾一方面認為陳毅不能當

3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315。

外交部長，不能當中央委員，要求將陳毅弄到上海來批判、消毒；另一方面也說只要毛主席指示，我們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參加九大。

11月12日，毛澤東批示：此兩件（另一件為北京市革委會關於召開北京市黨員幹部大會的請示報告）似可轉發各地參考。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向全國轉發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和張春橋的兩個報告。中央在轉發批語中說：中央同意這兩個報告所提意見，請你們參照執行。³⁵

3 關於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

1968年9月，專案組將劉少奇1925年、1927年、1929年三段歷史問題寫成三個材料，作為三個單件上報。9月15日，謝富治向江青報告：「劉賊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三次被捕叛變、叛賣活動罪行，我們先把這些罪證（物證、人證）搞了個清樣出來，請你審閱後再定。還有三個問題的罪證和綜合報告初稿正在寫，準備在九月廿五日以前搞出來。」9月16日，江青審閱了這三份「罪證材料」後批道：

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要是沒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國革命前途是不堪設想的。我作為一個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員，書此以明我的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忠心和氣節，我將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革命的人民，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小學生。

江青在將「罪證材料」批轉中央文革碰頭會其他成員審閱時，點名要求周恩來和康生表態：「請你們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註一下，

35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260—262。

特別是恩來同志和康老，你們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為你們工作經歷決定這點。」³⁶

9月17日，康生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表了態，他在信中將劉少奇稱為「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他寫道：「從各種材料看，他早在1925—1927年，就使用陰險、狡猾兩面派的特務手段，來破壞革命。我覺得他這樣早、這樣久的作潛伏的內奸活動，似乎是很早就受過帝國主義的特務訓練的。是否他在晏陽初的學校裏就受過特務教育？」他還主動檢討自己：「1931—1932年在上海就職工運動工作，我寫文章批評過劉賊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他在職工運動中的經濟主義，並作過尖銳的鬥爭。但由於自己的階級覺悟不高，學習毛主席著作很差，我又錯誤的對此作過檢討，應引為教訓。」

9月25日，陳伯達對三份「罪證材料」表態：「我對罪大惡極的劉賊，同樣有強烈的革命義憤，並向高舉毛主席偉大紅旗，對劉賊及其一夥叛徒特務進行不妥協鬥爭的江青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³⁷

在劉少奇專案問題上，周恩來顯然是與江青、康生不同的。江、康對劉，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而周對劉，則心存惻隱。在審議劉少奇專案時，周恩來一直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不想急於下結論，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頂牛，雙方爭得很厲害。江、康曾幾次對周拍桌子，批他是「懷疑派」，並告到毛澤東那裏，傳下話來敲打他，弄得周壓力很大，最後只好退讓，表示：「要改你們改。」³⁸ 與毛澤東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是周恩來在文革中所始終遵循的一個原則，尤其是在劉少奇專案這樣一個關乎文革全局的大事上，周恩來當然不可能違背毛澤東的意願。1977年，鄧穎超對英籍作家韓素音說：「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文件是恩來簽署的……我們為此而道歉就成了嗎？這件事對恩來說來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這樣做是為了顧全大局。」³⁹

36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247—248。

37 黃輝：《劉少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223—224。

38 汪東興談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陷害劉少奇的問題，1980年7月2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49。

39 韓素音：〈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115。

9月25日，周恩來在「罪證材料」上批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

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樣能夠把劉賊及其一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我們要萬分感謝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聲音(語錄)廣泛地傳達到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億勞動人民中去。沒有幾億勞動人民和幾百萬解放軍戰士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如何能夠發動這場有億萬革命人民參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更要向你學習！⁴⁰

周恩來還於當天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名上送的報告，把劉少奇所謂歷史上三次叛變的「罪證材料」報毛澤東、林彪審閱。報告稱：「劉賊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賊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⁴¹

9月29日，林彪看過三份「罪證材料」後向秘書口授了幾條意見，突出肯定了江青指導專案工作的成績和對劉少奇的定性，他說：「劉賊

40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50—251。

4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50。

少奇五毒俱全，鐵證如山，罪大惡極，令人髮指！」「專案工作卓有成效。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毛澤東對這些「罪證材料」沒有明確批示意見，只是圈閱。毛澤東（可能包括周恩來，甚至康生、江青、陳伯達等人）並不完全相信對劉少奇的極端誇張的指控，他在當年5月8日的一次會議上說過這樣的話：「整出來的劉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說他1946年冬季和美國勾結，組織反共同盟軍，要美國大規模出兵打共產黨，並且要沈其震經過司徒雷登介紹去見杜魯門、艾奇遜。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虛，是騙我們的，是耍我們的。美國大批出兵，當時國民黨都還不願意呢。」⁴²但毛澤東顯然是同意如此給劉少奇定案的。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在同外賓的談話中就說過：「劉少奇的問題不簡單，不單是思想右傾的問題，他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至少四次被捕。現在有人證明，他是向敵人自首過。所以1936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獄，不是偶然的。」到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說：「劉少奇這個案子，現在差不多了。」7月下旬左右，劉少奇的「罪行」得到中共中央領導層的認可。⁴³

專案組以三個材料為基礎，改寫成綜合報告。最後形成的綜合報告是由張春橋修改定稿的。10月19日，這份文件於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定稿通過。

在全會的後半段，討論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名義提出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審查報告〉說：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42 黃崢：《劉少奇研究》，頁224。

43 毛澤東同萬捷爾、莫依修、繆非特、穆希談話記錄，1967年8月16日。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36。

〈審查報告〉最後說：

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消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審查報告〉的正文共有三部分，標題分別是：「一、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二、劉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系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三、劉少奇一九二九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賣」。⁴⁴

全會在通過〈審查報告〉時，僅陳少敏一人對劉少奇冤案拒不表示同意。陳少敏是1928年入黨的老黨員，當時是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在中央高層那些更了解情況、更有發言權的人紛紛舉手表示同意的時候，她堅持了自己的原則。〈八屆十二中全會小組簡報〉中反映了陳少敏在當時所受到的巨大政治壓力。10月22日印發的第四組〈小組簡報〉載：「康生同志對陳少敏同志說，劉少奇有那麼一套，吹捧你們女同志。他過去吹捧過叛徒章蘊、錢瑛，也捧你。這點你要注意。昨天大家討論劉少奇的問題，你睡覺，如果身體不好，可以告假嘛！大家對劉少奇那樣的義憤，你自己一點義憤沒有，這算甚麼共產黨？」10月23日〈小組簡報〉記載：「陳少敏同志至今對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報告沒有明確表示態度。她今天在會上作了一個很不像樣的檢查：『跟着』劉少奇『犯錯誤的，執行他的路線的人，應該解放了』。」這天的簡報中還說，一些人在小組會上對陳少敏展開了嚴肅批評，說她敵我不分，不同劉少奇劃清界限。10月24日的〈小組簡報〉中說：「小組同志對陳少敏同志今天發言東拉西扯，對審查報告始終不表示明確態度，兩次提出批評，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落後到驚人地步，一個農村老太太的政治覺悟也比她高得多。」⁴⁵

44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224—227。

45 黃輝：《劉少奇研究》，頁226—227。

三 幹部下放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報道，並在按語中發表了毛澤東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12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甘肅省會寧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消息，並在編者按中公布了毛澤東在前一天發布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此後，全國各地普遍都開始了大規模的幹部下放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 「五七」幹校

1968年5月，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組織大批省直屬機關幹部下放勞動，同時把「走資派」等有各種問題的人送去勞動改造，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個農場，定名「五七幹校」。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通訊〈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報道了黑龍江辦「五七幹校」的做法，並發表毛澤東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人民日報》編者按中肯定了黑龍江柳河「五七幹校」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經驗，並要求各地加以推廣。此後，從中央到地方相繼辦起「五七幹校」，把大批幹部送到農村勞動。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五七幹校」工作會議，強調辦「五七幹校」對於促進機關革命化，加速「鬥、批、改」有深遠意義，必須長期辦下去。1973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將「五七幹校」工作列入黨委議事日程，組織好幹部輪訓，形成制度。辦「五七幹校」的做法延續到1978年。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五七幹校」陸續停辦。

「五七幹校」的出現，是當時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產物。文化大革命以來遭受衝擊而停止工作的許多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幹部、知識分子需要安置，成立革委會後搞精簡機構又產生了大批需要安置的編外幹部。另外，在「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中出現的數不清的有各種各樣問題的人也無法繼續留在原單位工作，這些情況在全國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五七幹校」於是便應運而生。迫使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的做法，反映了毛澤東輕視知識分子、輕視腦力勞動的錯誤認識。幹部下放勞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經受了勞動鍛煉，增加了對農村、農民的認識和了解，但總的來說，長時間被迫在農村進行體力勞動，脫離自己所擅長的各項業務工作和科學文化研究，荒廢了大好時光，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浪費是極其巨大的。在極左思潮控制下，許多部門的「五七幹校」實際上變成迫害幹部、懲罰知識分子的場所。

2 上山下鄉

1967年秋，北京一批中學紅衛兵率先舉起了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的旗幟。1967年9月，北京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二中的紅衛兵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靜植、寧華、金昆、鄭曉東、胡志堅、高峰、鞠頌東等十人共同決定，到遠離北京的新疆農村落戶，立志做「身居茅屋，心懷世界」的革命青年。他們向北京市勞動局匯報了這個計劃。勞動安置辦公室的幹部考慮到當時中蘇邊境上糾紛多，不穩定，建議他們到內蒙古去。他們同意了，並答應等待北京市出面與內蒙古自治區有關部門聯繫。10月初，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安置辦公室的兩名幹部專程到北京，迎接這十位志願到內蒙古大草原插隊落戶的紅衛兵。10月8日，北京市革委會和有關部門負責人為這十位紅衛兵送行，對他們勉勵有加，並要求他們為在校未分配的同學帶個好頭，打響第一炮。10月9日，十名紅衛兵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在人們熱烈的歡送中，踏上了漫漫知青路。1967年11月，又有三百餘名北京市的中學生來到錫林郭勒草原，由紅衛兵變成了「新牧民」。截至1967年底，北京市已有四千名六六、

六七屆中學畢業生自願報名到東北、內蒙等地插隊、插場（指到國營農場）。⁴⁶

北京紅衛兵在1967年的上山下鄉行動，雖然被大張旗鼓地宣揚，《人民日報》還為此發表了題為〈走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評論員文章，但是他們的行動只是開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先河，為廣大中學畢業生的安置工作提供了思路，在當時並沒有形成大規模的行動。因為當時全國還處於極度混亂的局面，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除台灣省外）只有七個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就是在這七個省、市內，也都存在着嚴重的派性和武鬥現象。所以大規模地組織上山下鄉活動還不具備條件。

進入1968年第二季度以後，全國已經有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社會秩序得到了初步的恢復。在這種形勢下，解決全國多達上千萬的大中學畢業生的分配問題便提上了議事日程。妥善地解決好大中學校畢業生的畢業分配問題，是穩定社會秩序，結束混亂局面的當務之急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在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報告的批示中，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各大、中、小學，本着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的方針，對大、中、小學已到畢業期限的學生，一律及時地予以適當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在中央文件下達後，在條件具備的省、市，都相繼開始了有組織、有步驟的動員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工作。

6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通知說，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從1968年6月開始分配。同時提出：一、畢業生分配工作，必須打破只能分配當幹部，不能當工人、農民的舊制度。二、畢業生分配，要堅持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方針。1966年、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包括研究生），一般

46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116。

都要先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根據國家需要，分配當中小學教師和擔任醫療工作的畢業生，也要一面工作，一面勞動。三、1967年畢業生，不論分配到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單位，其工資暫按原定標準發給。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還發出〈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要求到農場去的畢業生一律實行軍事管理，過戰士生活，按部隊組織形式單獨編成連隊，但非現役軍人。按照中央的精神，絕大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都被分配到解放軍農場或國營農場去鍛煉。

中學畢業生的分配工作要比大學畢業生的複雜得多了。北京市1966至1968屆的中學畢業生共約39.5萬人；其中1966屆10.5萬人；1967屆13.5萬人；1968屆15.5萬人。到1968年上半年，已經安置1966、1967屆畢業生7.5萬人。其中1967年去東北、內蒙、雲南插場、插隊的4000人，分配到三線工廠的6000人；1968年組織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15000人，分配在北京中央和市屬企業當工人的15000人，服兵役10000人，家在郊區縣已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的25000人。隨着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畢業生分配工作也大大加快。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要位置刊登了甘肅省會寧縣下放城鎮居民的消息。從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縣688戶城鎮居民中已有191戶、995人分別到13個公社的生產隊安家落戶。《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說：甘肅省會寧縣城鎮的一些脫離勞動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識青年，紛紛奔赴社會主義的農村，在那裏安家落戶，這是一種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風尚。編者按接着說：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導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希望廣大知識青年和脫離勞動的城鎮居民，熱烈響應毛主席這個偉大號召，到農業生產的第一線去！

《人民日報》傳達的這一毛澤東最新指示，立即在全國掀起一個上山下鄉的熱潮。各地不顧具體條件，很快將大批知識青年下放到農

村、生產建設兵團和農場。遼寧省在1968年底就動員了三十萬人下鄉，江西省也在1968年底動員十多萬畢業生上山下鄉。北京市因為工礦企業缺人，曾將一批「老三屆」畢業生（主要是六八屆畢業生）留城就業，動員下鄉工作因此受到影響。問題反映到中央，受到周恩來的批評。結果，六九屆畢業生一個不留，全部動員下鄉。對於那些仍在猶豫觀望的「老三屆」學生，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在群眾大會上明確地警告說：「我告訴你們，等到甚麼時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徵兵，等也是白等！」北京市的近四十萬中學畢業生，到1969年上半年絕大部分安置分配完畢。

少數仍懷有革命激情的學生自覺自願地報名下鄉了，大多數並不自覺自願的學生在各種壓力下也被迫離開了家。上千萬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以他們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為代價，為開發、振興農村落後地區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對國家來說，這一運動造成了後來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的人才斷層，對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帶來了長遠的困難。

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的畢業生陸續離開了學校，在全國各地的工廠、農村、部隊裏，開始投入了新的生活。大批畢業生的離校，直接導致了紅衛兵運動的消亡。儘管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的遺存，紅衛兵組織依然存在於中等學校中，但這時的紅衛兵組織已經完全失去了昔日紅衛兵的造反特色。

1969年5月初，《人民日報》報道：

北京、天津、瀋陽、南京、鄭州、南昌、長春、杭州、合肥、西安、長沙、武漢、廣州、成都等大中城市，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都超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下鄉知識青年的幾倍、幾十倍。全國在近半年期間，共有數百萬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生，奔赴祖國內地和邊疆的廣大農村。如今，我國每一個農村公社，每一個農場、牧場、林場，都有了在那裏安家落戶的知識分子。這是我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偉大創舉，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成果，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到1969年底，全國上山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即達267萬之多，使1967年以來下鄉的知識青年總數達到467萬之多，這還不包括人數更多的回鄉知識青年。⁴⁷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帶動了對城市人口的清理、下放工作。江蘇省革委會於1969年2月13日發出通知，規定以下人員必須下鄉：一、城鎮的初中、高中(包括半工半讀學校和其他中等學校)、大學畢業生及社會青年；二、長期脫離勞動和其他應該下鄉的城鎮居民；三、原各級機關和企事業系統需要下放的人員；四、需要可能下放的企、事業單位。又規定，城鎮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根據黨的政策，凡應該遣送下鄉的，按以下辦法辦理：原籍是農村的，遣送回原籍交當地貧下中農監督勞動；原籍是沿海公社、國防要地的，應嚴加控制或變更安置地點；世居城鎮的遣送本省農村，交群眾監督勞動。「黑五類」分子去農村時，要將他們檔案轉去，使貧下中農了解他們的罪行。⁴⁸

3 珍寶島事件

60年代開始，中蘇兩黨的爭論不斷升級，兩國間的邊界衝突也逐漸加劇。1964年以後，蘇聯政府在中蘇邊界大量增兵，繼續惡化邊界形勢，造成一系列流血事件。據統計，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期間，兩國間的邊界事件達到4189起，比1960年到1964年期間增加了1.5倍。

珍寶島位於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面積不足一平方公里。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珍寶島成為中蘇雙方邊界鬥爭的焦點之一。1967年1月23日到1969年3月2日的封凍季節裏，蘇軍即侵入珍寶島地區十六次。1967年11月底到1968年1月5日，蘇軍侵入珍寶島以北的七里沁島十八次。在這些事件中，蘇軍毆打以至開槍射擊和用裝甲車擠壓中國巡邏人員和邊境群眾，多次打傷執行正常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軍人，搶走槍支彈藥。⁴⁹

47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頁170。

48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頁168—169。

49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頁317。

1968年1月24日，中央軍委電報指示瀋陽、北京等有關軍區，要求加強中蘇東段邊防警戒的重點部署，做好軍事上配合政治外交鬥爭的必要準備。中央軍委要求邊防部隊在反挑釁鬥爭中，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後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同時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如遭到蘇方毆打，我可還手自衛，不要開槍；如蘇方使用裝甲車等向我衝撞時，我可採取必要的防護措施，並向蘇方提出強烈抗議。蘇方用裝甲車等繼續向我衝撞，並軋死軋傷我方人員時，我可相應還擊，如炸毀其車輛，棒擊其人員，但不能開槍射擊；如蘇方向我開槍，我應當場向蘇方提出最強烈抗議，並鳴槍警告。當我兩次警告無效，打死打傷我方人員時，我邊防部隊可開槍實行自衛還擊；採取上述任何一種自衛措施，都要掌握「先禮後兵」的精神，並把還擊行動控制在我境內。中央軍委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同時強調邊防鬥爭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鬥爭，邊防上每一行動，都要考慮全局，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⁵⁰ 這樣，從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央軍委對衝突程度的嚴格控制及調整下，中國邊防部隊在蘇聯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應，始終採取了忍讓和克制的態度。

1968年8月，蘇聯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強烈譴責蘇聯的侵略行徑，並指出蘇聯已經走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道路。毛澤東逐漸對世界格局作出新的判斷，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開始取代美國帝國主義，成為中國及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頭號敵人。

1969年初，珍寶島地區的形勢更趨緊張。1月25日，黑龍江軍區提出了珍寶島地區反干涉鬥爭方案，設想以三個連左右的兵力參加珍寶島地區的鬥爭，以一部兵力上島潛伏，並在珍寶島附近的公邊防檢查站設立由合江軍分區參謀長王子良等五人組成的指揮所。瀋陽軍區基本同意這個方案。2月19日，總參謀部、外交部也同意了這個方案。

50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頁318。

總參謀部在給濟陽軍區、黑龍江省軍區的覆電中重申，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後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既不示弱，又不主動惹事。在具體鬥爭中，要選擇重點，預有準備地堅決予以自衛還擊，速鬥速決，不予糾纏。中共中央同意選擇珍寶島作為對蘇進行自衛還擊的重點。⁵¹到2月底，中國方面已經對珍寶島地區進行自衛反擊作戰做了周密的部署。3月2日，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終於爆發。

在3月2日、15日和17日的戰鬥中，中國邊防部隊共擊毀擊傷蘇聯邊防軍坦克、裝甲車17輛，擊毀卡車、指揮車各1輛，打死打傷250餘人，繳獲T-62型坦克1輛、各種槍支31枝(挺)，彈藥和軍用物資1部。3月20日，中央軍委通令表揚參加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的全體指戰員。

有研究者指出：珍寶島事件發生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前，是有着重要歷史背景的。珍寶島事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蘇邊界長期衝突的繼續，是中國對蘇聯不斷挑釁的反擊，而且事件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作為歷史研究的着眼點，關鍵問題在於這次事件選擇的時機，在於一次小小的邊界事件在中國和國際上引起的轟動效應，它表明中蘇邊界爭端已成為中國對國際戰略問題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構成了中國調整對外戰略策略的一個關鍵環節。中國對珍寶島邊界衝突的反應，一方面是對蘇聯的軍事威脅及核威脅作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特別是向美國公開顯示中蘇兩國已經走到戰爭的邊緣，雙方關係的惡化已無法挽回，通過利用國家關係中最敏感的邊界問題，公開表明中國與美國已具有了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這即為中美聯合抗衡蘇聯的對外戰略調整做了充分的鋪墊。⁵²

珍寶島事件後，中國在首都北京和全國城鄉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強烈抗議蘇聯侵犯中國領土。在3月4日至12日不到十天的時間裏，參加示威遊行的軍民達到四億人次以上。⁵³此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針對蘇聯的戰備高潮。

51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頁319。

52 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載張化、蘇探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918。

53 參見1969年3月13日《人民日報》。

四 九大

關於九大，〈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出了明確的結論：「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這個結論，完全正確。

中共九大的召開，標誌着文化大革命基本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1969年3月3日，在中央討論一個文件的署名時，毛澤東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毛澤東並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這些組織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⁵⁴

1 政治報告的起草

1969年2月1日，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討論了九大的準備工作。會上，毛澤東指派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由陳伯達負責，張春橋、姚文元參加）。會後，周恩來起草了〈中央文革碰頭會為九大進行準備工作的議程（草案）〉報毛澤東、林彪，其中包括：九大代表集中到京的日期和開會程序、九大代表的審查和批准草案、黨章草案修改稿、一九六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形勢和政策討論大綱（草案）、九大後中央機構、有關九大的宣傳方針等。

陳伯達當天即向他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講了他要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主題設想。他說：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就是說，經過了一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陳要求二王幫助他搜集這方面的資料，要各地方有關在經濟建設、生產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資料。

陳伯達當時擬用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他帶着提綱去和林彪商量後，回來改成總題目下十個小標

⁵⁴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47。

題。陳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毛。毛很快圈閱退回。⁵⁵

2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談到政治報告的起草問題時，他說：「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會上初步商定報告稿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開幕。⁵⁶會後，陳向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索要北京市經濟方面的材料，被謝拒絕。謝對陳說：「伯達同志，你可別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北京市的材料，要多少，我給多少，可你要我不能給，請你理解我。」⁵⁷長期以來，陳伯達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貌合神離，到九大前夕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很僵了。陳伯達欲將張、姚甩開，自己單獨完成起草工作，但又力不從心，到了交稿的時間交不出稿子，惹得毛澤東發了脾氣。3月3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說明道理。會議決定的，一個人(指陳伯達)推遲時間。」3月7日，毛澤東在談話時又批評陳伯達：「開會，一個主要的是文件，一個是黨章，一個是選舉。做了決議又不辦，不辦又不報告。還是準備兩手：一個是寫出報告可用，一個是不能用。」他問陳伯達：你究竟甚麼人在搞？陳回答：我自己一個人在寫。毛澤東說：「你這個人每次都說知過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變。」⁵⁸毛澤東一罵，陳伯達嚇得馬上將已寫完的部分報告稿交周恩來。3月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由陳起草的九大報告稿和九大準備工作會議的時間、議程。會後，周將會議情況書面報告毛澤東、林彪：「九大書面報告稿，伯達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還有兩個半問題(國際、毛澤東思想和團結起來)，請伯達同志三天內將它寫

55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頁88。

56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45。

57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頁89。

58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45。

完，然後大家來議。」⁵⁹ 3月12日，毛澤東提出換人的問題，說：「是不是請你們三位：康、張、姚三位。」「兩家各搞各。」並且點明報告的主題：「總之，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鬥爭，為甚麼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這以後，九大報告就由張春橋、姚文元來起草。三天後，毛澤東說：「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給陳伯達是一個月，給你們半個月，索性4月1日開會。」

毛澤東決定棄用陳伯達而起用張、姚來搞九大報告，應該主要不是因為陳伯達動作遲緩，而在於報告的指導思想。毛澤東要的是突出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必要性、重要性，而陳伯達卻要講抓生產。後來在討論張、姚起草的稿子時，陳伯達批評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施坦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⁶⁰ 毛澤東聞言大怒，訓斥陳伯達：「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報告，你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⁶¹

陳伯達起草的報告稿被否定，引起林彪的不快。據吳法憲回憶：「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麼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後，陳開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因為這是林、陳兩人商量的。」在由張春橋等起草後，「林說：寫甚麼就是甚麼，我林彪一字不改。」⁶² 葉群還打電話安慰陳說：不用你的稿子沒關係，他們要搞就讓他們搞去，林彪同志是了解你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毛澤東將起草九大報告的重任交給張春橋、姚文元後，兩人自然十分努力，3月16日就向毛澤東交出報告稿的第一部分。毛澤東批示：

5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84。

60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頁114。

6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70—271。

62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46。

「看了一週，寫得好，只需要個別詞句的修改。」⁶³張、姚很快將報告稿陸續寫出並分批送審，毛澤東改了多遍，在3月31日完稿。

中央文革碰頭會於3月中下旬，五次在毛澤東處(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討論九大報告問題。毛澤東說，可以考慮在報告中加進陳伯達的意見。與會者都對張、姚稿子表態同意，陳伯達只得說：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澤東說：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⁶⁴

2 會議經過

1969年3月9日至27日，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由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共128人參加的九大準備工作會議。在這期間，發生了中蘇邊界武裝衝突——珍寶島事件。這一事件加重了黨內本來就已存在的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認識，對九大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毛澤東在九大準備工作會議上提出，九大的任務是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準備打仗。這三句話成為九大的指導思想。

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極其保密的情況下在北京召開。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黨員2200萬人。大會的主要議程有三項：一、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二、修改黨章；三、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各地代表在3月下旬陸續集中北京。出席九大的代表分住在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大會秘書處設在京西賓館。各賓館警衛森嚴，大門緊閉，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內電話全部撤銷，靠街的窗戶不得打開，晚上須拉上窗簾。⁶⁵

出席九大的代表來自四十五個單位，其中有二十九個省、自治

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1。

64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頁90。

65 煙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頁43。

區、直轄市，十一個大軍區，另外加上海軍、空軍、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直屬機關、中央軍委直屬機關。

所有代表分為六個大組：

第一組：黑、吉、遼三省、瀋陽軍區、空軍。

第二組：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內蒙、中央直屬機關、北京軍區。

第三組：山東、江蘇、浙江、福建、上海、濟南軍區、南京軍區、福州軍區。

第四組：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安徽、廣州軍區。

第五組：甘肅、陝西、青海、寧夏、河南、湖北、蘭州軍區、武漢軍區、海軍。

第六組：雲南、貴州、四川、西藏、新疆、國務院直屬機關、軍委直屬機關、昆明軍區、成都軍區、新疆軍區。⁶⁶

在九大開幕之前，各單位的代表團分別開會，傳達了毛澤東關於九大任務的指示，着重討論了加強戰備的問題，並初步議論了黨章草案。3月30日，各代表團分頭醞釀通過了大會主席團名單。大會主席團原定為175人，大會開始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臨時增加徐海東，故為176人。

從4月1日至24日的正式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4月1日至14日，討論通過政治報告和黨章；第二段，從4月15日至24日，選舉中央委員會。其間共開了三次全體大會。

4月1日下午5時，大會正式開始，由毛澤東主持，並致開幕詞。毛澤東簡要地回顧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歷次代表大會的情況，提出：「我們希望這次代表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大會先通過大會主席團名單，並推舉大會主席。毛澤東拿林彪開玩笑說：「我提議林彪同志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馬

66 根據周恩來1969年5月14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精神的報告。參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上驚慌地站起來大聲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連連擺手說：「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於是，全場舉手通過。於是毛澤東又提議林彪當副主席，周恩來當秘書長，也獲得通過。

接着，由林彪作政治報告。政治報告共分八個部分：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三、關於認真搞好鬥、批、改；四、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關於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六、關於黨的整頓和建設；七、關於我國和外國的關係；八、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政治報告全面論證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上，提出了「認真搞好鬥、批、改，把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等任務。

從4月2日起，開始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改草案。各小組對政治報告進行逐章逐段的學習討論，並結合實際，「鬥私批修」。所謂「鬥私批修」，主要是對參加大會的一些老同志再一次進行批判，並迫使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作自我批評。會前，毛澤東曾當着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的面說過：「二月逆流，報告中不講。」⁶⁷但實際上，報告中還是嚴厲地批判了「二月逆流」：

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現的……這股逆流，矛頭對着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它的總綱領就是一條：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經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復。⁶⁸

67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43。

68 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316。

4月11日和13日，毛澤東兩次召集大會秘書處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的會議。他在會上的兩次講話大致內容如下：

找同志們來商量一件事，這個會是小組會一直開下去，還是開一次大會？我們商量了幾次：中間開一次大會通過報告和黨章；然後搞選舉，再開一次大會，結束。另外有一個問題和同志們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組的簡報上說，現在有一種傾向掩蓋着另一種傾向。清理階級隊伍有一種傾向，就是擴大化。對這個問題，我談過幾次。清理階級隊伍，要把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搞出來。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規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擴大化。在歷史上有不少這種事。

三次大會決定國共合作是正確的，但這個傾向掩蓋了黨的獨立自主。國共合作，掩蓋着另一個矛盾，就是階級矛盾。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算犯錯誤的人，他們是王明那些二十八個半的人，但在蘇區吃過苦。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圍剿中幫過忙。一個時期紅衛兵大字報一貼，現在要選作中委也困難，其實他們同朱德、陳毅同志也差不多。朱德、陳毅，許世友同志說他們反了幾十年，其中也有不反對的時期。如紅四軍七次代表大會後，他們領導開紅四軍八次代表大會，總想奪軍權，但心裏又不踏實，就跑到中央去請示，中央不答應，又請我回去。

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沒有經常講，沒有公開向大家講，結果廣大群眾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消滅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裏利用而不進行限制、改造，所以，這次又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讓歷史家去作結論，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為是由文化革命開始的。不管叫甚麼名字，總之是觸及了上層建築，從中央一直搞到工廠、機關、學校。過去這些不都在我們手裏，大都在國民黨手裏，都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裏，而且他們還有後台。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成，還要一個時期，要認真抓一

下，要搞一點典型。(林彪：主席親自在北京抓了八個典型，就是我們說的六廠二校嘛！)我們管不了那麼多，要你們去抓。過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插手，現在可以了，我只抓幾個典型，統統都抓搞不過來，所以要抓典型。

清理階級隊伍，軍隊也搞了一下吧？不過軍隊要謹慎。南口有一個工廠，八個人搞了一個專案，把黨委書記搞成狗特務，後來交給群眾去查，不是特務，是個好人。搞專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麼準確，不那麼可靠。他們的觀點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們過去行軍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過癮。搞專案的人搞錯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這麼久，翻案還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講話。還是超脫一些好。我不搞專案，超脫了一點，就好講話。把人家既關起來了，不容易放。要放怎麼辦呢？你還要講點理由：你為甚麼抓我，現在為甚麼放我？總要講個理由。有些人關在牛棚裏不少，有些人還關在地下室。有些犯錯誤的人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上來了。有些人戴高帽子，掃茅廬，有些知識分子掃掃地，是可以的，搞點清潔衛生工作，有好處。我們不贊成搞噴氣式、掛黑牌，也不主張多抓人。你抓多了怎麼辦呢？總要想個辦法，抓了要放，總要找個理由，無非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現在擴大化的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鑑於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着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眾中有無政府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機放毒。我看這些，包括武鬥，都無關大局。所有武鬥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那裏打的凶，那個地方雙方幾萬人，穿上群眾的衣服，實際上是退伍軍人，改換服裝指揮。這些好像不得了，其實都沒有甚麼事。

下一步搞選舉，選舉的名單由下面提，然後大組提。我提議幾位老同志要選進去。我開幕講話就有這個意思：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不把這幾個犯錯誤的老同志選進去不好。黨內有幾個反對

派有甚麼要緊？你反你的嘛！如果不選他們，可能壞得更快。他們不改怎麼辦？地球還不是照樣轉！⁶⁹

4月14日召開第二次全體大會，由毛澤東主持。先進行大會發言，後對政治報告和黨章進行表決。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九人先後發言。

周恩來在發言中主要肯定了林彪在建國前和建國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歷史功績，並以此對林彪成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正確性和合理性作了說明。⁷⁰他說：

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志一直緊跟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從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⁷¹

69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50—1551。另根據周恩來1969年5月14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精神的報告、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補充。

70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92。

71 原文載於《周恩來等九位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大會上的發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員會翻印，1969年5月7日。據說在周恩來講到林彪是「光榮代表」時，林彪站起來說：「我林彪沒甚麼，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賀龍、朱德早就完了，沒有今天。」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79。

陳伯達在發言中讚揚毛澤東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開拓了前人沒有探討過的各個領域，把馬列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領導下，摧毀了劉少奇修正主義集團、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一個燦爛輝煌的勝利。」「從來沒有一個會議像我們這個大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動。世界共產主義者和革命人民都為我們而歡欣鼓舞，帝、修、反、蔣匪卻為之膽戰心驚。」

康生在發言中介紹了新黨章的起草和修改經過，並將新黨章明確規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說成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的大事。說新黨章概括地闡述了毛主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來自珍寶島前線的孫玉國是基層參戰部隊指戰員代表，他向大會匯報了同蘇聯入侵軍隊血戰的情況，表示「寧可粉身碎骨決不在蘇修面前讓寸分」。他上台時和發言結束後，毛澤東都站起來鼓掌，同他握手，並且說：「坦克、裝甲車、大炮、飛機，我們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們步兵的勇敢。」⁷²

最後，大會一致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決定將這兩個文件委託大會主席團秘書處作文字上的校訂後發表。

新黨章總綱把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晚年「左」傾錯誤的「基本路線」寫入其中，而且對文化大革命也明文加以肯定，更為荒謬的是，將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的內容也堂而皇之地載入黨章。在「黨員」這一章裏，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也是極為荒謬的。

從4月15日開始，大會進入第三項議程：醞釀、提名和選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5日，由大會主席團秘書處發出關於九大中委和候補中委的選舉辦法。辦法中規定，中委和候補中委的總數不超過250人，⁷³並規定了各類人員的比例。其中，毛澤東和林彪為「當然候

7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時期）》，頁68—69；《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52。

73 1969年3月2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林彪，報告九大準備工作情況時說：九大中央委員名單草案（中委115人，候補中委95人，共210人）也已提出。毛澤東批示：照辦。中委人數恐須略為擴大一些。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88—289。

選人」；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12人(即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和軍委辦事組的另外3個人(即李作鵬、邱會作、劉賢權)，為「一致通過的候選人」。還規定，原八屆中委和候補中委提名為九屆候選人的，限定為53人。

辦法下達後，各個小組就開始醞釀提名，由各大組匯總，再由大會主席團進行協商審定，最後進行一次無記名投票的預選，確定候選人名單。在這個過程中，存在着錯綜複雜的鬥爭，特別是關於軍隊方面和工農群眾方面的候選人，爭奪相當激烈。經過多次會議的研究協商，但因為軍隊候選人和工農群眾候選人提名太多，大大超過比例，而難以定下來，原定21日選舉和閉幕的時間表不得不向後推遲，最後只好突破原定中委和候補中委總數不超過250人的規定，使候選人名單達到了279人。

4月23日，召開各大組的會議，對候選人名單進行了預選。

當晚，毛澤東又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和軍委辦事組成員、各大組部分召集人開會。毛澤東在會上說：

請各位同志注意，不要脫產，又要工作。有的在地、縣、社、隊、工廠，如果長期脫離了，就如我們一樣，作機關工作人員了。但是我們要請他們不脫產，他們只了解那個單位，不大了解全國，猶如我們不大了解他們一樣，所以要他們過問全國的事情。他們在本地方很活躍，但一到中央，到處記者去採訪他，作報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可能垮台，所以我們對他們就要認真負責。新選進的，我就擔心他們脫離群眾。

這一次列出的名單，恐怕困難的還是幾個老同志，要選上的話，如有的人，要他檢討也檢討不清楚。不要寫了，寫了大家更不滿意，還不如不寫。這事總檢討，就養成一個我們通常的習慣，叫做不滿意。寫的不徹底，越寫越不徹底，那就還不如讓他去到群眾中去接觸實踐、改造。世界上有這些同志，你有甚麼辦法啊！也有功勞，也有錯誤，有檢討。我看差不多了，要看以後

的行動，他們也看我們的。比如在延安講了懋前懋後治病救人，但是人家不相信，有理由，你得有表現才行，七大一選就相信了。儘管你選他，可是像王明、李立三那些人最後壞了，那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地球還不照樣轉！還要選個政治局，要選個常委，這個事可麻煩哩！你們大家想一想，一步一步來做，中委還沒有選出嘛，先要選中央委員會。我想還是由下而上的方法比較好，只提一個數目，不提名單，叫大家想人，這就需要一點時間，但開始要想這個問題，你們想一想，政治局怎麼組成，常委怎麼組成，是用群眾路線的方法比較好。⁷⁴

4月24日，召開第三次全體大會，進行選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主席團秘書處作出規定：對朱德等十位老同志，既要保證這十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據說這樣才能使這些人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促使他們轉化。為此，各代表團受領任務：把哪些人投或不投這十名老同志的票，落實到「人頭」。

當天到會代表1510人，僅有二人請假。

在檢票的間隙裏，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同全體代表一起照了相。

晚9時左右，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請大會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宣讀選舉結果。大會主席團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委全部當選。毛澤東以全票當選。與毛澤東一樣獲得全票的還有工人代表王白旦。周恩來1509票，林彪1508票，江青1502票，張春橋1496票。⁷⁵

十位老同志得票結果如下：朱德809票；陳雲815票；李富春886票；陳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聶榮臻838票；葉劍英821票；鄧子恢

74 根據周恩來1969年5月14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傳達九大精神的報告。

75 九屆中央委員選舉結果產生後，一些小組的代表對中央文革江青等未獲全票，以及有人在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名字上打「×」的情況表示「極為憤慨」，認為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為此，周恩來在請示毛澤東後，沒有印發這些小組的簡報。在5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在談到這件事時說：（少幾票）沒有甚麼關係嘛，斤斤計較一兩票！頭上有幾個「×」那又算甚麼？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94。

827票；李先念922票；張鼎丞1099票。幾位文革中的風雲人物如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山東的王效禹、貴州的李再含、山西的劉格平、張日清、四川的劉結挺、張西挺也成為會議上有爭議的人物，雖經大會主席團作工作，得票數也較少。劉結挺1435票；劉格平1117票；王效禹1066票；聶元梓、李再含、張西挺、張日清作為候補中央委員入選，分別得937、1256、1400、1152票。⁷⁶

這次大會選出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68%的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未選入中央委員會，許多功勳卓著、德才兼備的老幹部被排除在外。一批幫派體系中的骨幹和親信，以及一些投機鑽營之徒和「打、砸、搶分子」進入了中央委員會。⁷⁷

宣布選舉結果後，由林彪宣布大會閉幕。

大會閉幕以後，中央組織各地九大代表到北京的一些工廠、學校和農村參觀，主要是參觀所謂毛澤東親自抓的八個典型，即：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針織總廠、北郊木材廠、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新華印刷廠、化工三廠、北京大學、清華大學。5月1日晚，代表們在天安門觀看了焰火。此後，九大代表陸續離京回到各地。

3 九屆一中全會

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會議。會議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

76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頁49。

77 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的《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會大辭典（1921—200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文革後，九屆中央委員會中被開除黨籍的就有五十三人之多，他們是：林彪、丁盛、馬福全、王秀珍、王洪文、王效禹、王推湘、葉群、申茂功、劉均益、劉結挺、劉盛田、劉錫昌、江青、江禮銀、年繼榮、陳伯達、李作鵬、吳法憲、張桓雲、張春橋、邱會作、徐景賢、唐岐山、唐忠富、夏邦銀、康生、黃永勝、鹿田計、董明會、謝富治、馬天水、王光臨、王維國、華林森、陳啟峰、李定山、張世忠、張西挺、張秀川、岑國榮、羅錫康、金祖敏、姚連蔚、聶元梓、郭玉峰、郭宏傑、梁錦堂、崔海龍、盤美英、隆光前、謝望春、樊德玲。

席。⁷⁸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二十一人：毛澤東、林彪、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選出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人：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⁷⁹

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他說：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支部書記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甚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甚麼獎金，等等。……

要過細地做工作。對於這種事情要過細，粗枝大葉不行，粗枝大葉往往搞錯。有些地方抓多了人，這個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來幹甚麼呢？他也沒有殺人，也沒有放火，又沒有放毒，我說只要沒有這幾條，就不要抓。至於犯走資派錯誤，那更不要抓。工廠裏頭，要讓他工作，要他參加群眾運動。人家犯了錯誤，無非是過去犯的，或者加入國民黨，或者做了些壞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個時期的錯誤，就是所謂走資派，要他們跟群眾一道，如果不讓他們跟群眾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關了兩年，關在「牛棚」裏頭，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來一聽呀，講的話不對頭了，他還是講兩年前的話。他脫離了兩年的生活。對這些

78 在最初的黨內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毛澤東還曾提名周恩來為黨的副主席，後來因周恩來本人堅決反對而作罷。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274。

79 據《毛澤東傳》披露：在對政治局成員所投的277票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獲全票，陳伯達275票，黃永勝274票，江青270票，吳法憲、葉群的得票比張春橋、姚文元高。在對政治局常委的投票中，除毛、林、周、陳、康五人當選外，江青得150票，黃永勝得130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553。

人就要幫助了，要辦學習班，還要跟他講歷史，講兩年的文化大革命過程的歷史，使他逐步清醒。⁸⁰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點出了幾個當時問題較多的省，他說：「(楊得志跟王效禹)你們兩個人的關係是敵我關係，還是人民內部的關係呀？據我看是人民內部吵吵架。」「還有山西，也是人民內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麼盡吵幹甚麼！還有雲、貴、川的問題。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問題就是了。」⁸¹

同日，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委員和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

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林 彪 劉伯承 陳 毅 徐向前 聶榮臻 葉劍英

委 員：丁 盛 王秉璋 王樹聲 王效禹 王輝球 章國清

葉 群 皮定均 劉 豐 劉興元 劉賢權 許世友

陳士矩 陳先瑞 陳錫聯 李天佑 李作鵬 李雪峰

李德生 吳法憲 張達志 張池明 張國華 張春橋

邱會作 楊得志 杜 平 瀾勁光 鄭維山 冼恆漢

袁升平 梁興初 黃永勝 曾紹山 曾思玉 彭紹輝

韓先楚 粟 裕 溫玉成 謝富治 譚甫仁 潘復生

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

副組長：吳法憲

成 員：葉 群 劉賢權 李天佑 李作鵬 李德生 邱會作

溫玉成 謝富治

五 九大之後

九大之後，全國局勢總的來說是趨於穩定的。各地在進行「整黨建黨」的過程中，陸續建立和恢復了黨的組織。原來派性鬥爭最激烈的大

8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36—37。

8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頁39。

中學校內，都由工人宣傳隊控制了局面。大批畢業生分配離校和上山下鄉，無異於給派性鬥爭來了個釜底抽薪，由派性引起的大規模武鬥更是明顯減少，社會秩序相對穩定。連續兩年嚴重下滑的國民經濟開始回升。1969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6.9%，其中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4.3%。

1 徐州是全國的一個縮影

徐州地區在文化大革命中局勢複雜多變，翻過來，掉過去，兩大派群眾組織你方唱罷我登場，今天還在台上掌權，明天就被趕下台，政治風雲變幻莫測令人眼花繚亂，堪稱全國動亂時期的一個縮影。

1967年2月2日，在駐徐部隊的支持下，徐州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籌」）成立，有十一個造反組織、二十六個單位參加。3月18日，根據江蘇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和濟南軍區的指示，並經濟南軍區、南京軍區批准，駐徐部隊黨委和徐州市「大聯籌」在體育場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成立由軍、幹、群三結合組成的徐州市革命委員會（又稱三一八革委會），由劉汝賢任主任。

4月10日，徐州師範學院「反到底」紅衛兵走上街頭，呼喊「踢開徐革委會，徹底鬧革命」。同時，以楊正祥為首的造反派宣布退出徐州市革委會，並提出「踢開徐雜會，徹底鬧革命」的口號。此後，徐州市各造反派在圍繞「踢開」還是「支持」市革委會這個問題上，形成勢不兩立的「踢」、「支」兩大派別。5月1日，「踢派」成立了「反到底聯絡站」。5月5日，「支派」成立了「批鬥劉鄧統一指揮部」。至此，徐州市「踢」、「支」兩派正式形成。兩派矛盾日益尖銳，互相攻擊，並逐步掀起武鬥惡浪。

5月30日，徐州「支」、「踢」兩派因集會遊行而發生大規模武鬥事件。郊區「紅農會」農民進城加入「支派」參戰，圍攻「踢派」「火車頭」等據點。武鬥持續到31日，「踢派」群眾開走31台火車機車到達浦口。這次武鬥雙方傷1200餘人，死6人，毀壞大批物資，使鐵路運輸遭到嚴重破壞，客運中斷28小時，貨運中斷96小時，積壓物資165000噸，直接經濟損失達數百萬元。武鬥使大批「踢派」人員離開徐州到濟南、南

京、北京等地告狀。武鬥結束後，徐州市革委會、徐州衛戍區發表聲明，指出兩派鬥爭是奪權與反奪權的階級鬥爭，「支派」的自衛還擊是完全正確的。31日，徐州鐵路分局實行軍管。

6月29日，徐州市革委會、徐州衛戍區聯合發表聲明，指出「踢派」與「支派」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支派」是正確的，「踢派」要求踢開市革委會是錯誤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色造反總部」、「八一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按：均屬「支派」）是堅強的革命左派組織，全市紅衛兵應以左派為核心，實現大聯合。

7月5日至24日，中央文革小組派遣由濟南軍區政委、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帶領的工作組到徐州處理問題。在徐期間，王效禹強迫部隊「轉彎」，由支持「支派」轉向支持「踢派」，批評徐州衛戍區在「支左」中犯有嚴重錯誤，市革委會犯了嚴重方向路線性錯誤，鼓動「踢派」奪權。此後，駐徐部隊、徐州軍分區及市革委會分別發布公開信，檢討在前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

8月5日，徐州「支派」組織宣布集體退出市革委會，徐州市三一八革委會徹底解體。

8月31日，徐州市「支」、「踢」兩派因集會遊行再次發生大規模武鬥。9月1日，在王效禹授意下，山東棗莊、薛城、兗州8000餘人到徐支持「踢派」參加武鬥。武鬥持續到9月3日，造成雙方共23人死亡，400餘人受傷，2000餘戶被抄。「支派」成員2000餘人到上海、南京等地，成立了跨地區、跨行業的「淮海八三一」組織。此次武鬥後，「踢派」控制了徐州局勢。

9月4日，徐州市「踢派」組織十萬人在體育場召開「抗暴自衛祝捷」大會，「反到底」總指揮部宣讀〈告全市人民書〉。張銓秀（六十八軍軍長）代表徐州衛戍區在大會發言，表示駐徐部隊毫不動搖地站在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指揮部一邊，祝賀「踢派」組織取得抗暴自衛的勝利。

1968年初，撤離徐州的「支派」「淮海八三一」部分成員返回徐州附近，於三堡、桃山集一帶襲擊火車並進行破路、炸橋、劫貨等破壞活動，致使徐州至浦口的鐵路交通一度中斷，直接影響全國鐵路運輸。2月6日，中共中央頒布命令，指示要對煽動、操縱和指揮破壞鐵路、

炸毀橋樑、襲擊列車、殺人劫貨的極少數壞頭頭，堅決鎮壓法辦。此後，駐徐部隊對潛入三堡、桃山集一帶的徐州「淮海八三一」成員進行武裝圍剿，抓獲一批頭目。

3月1日，徐州市革委會改組，建立以「踢派」骨幹為主體的徐州市革委會（又稱三一革委會），楊正祥任主任。此後，兩派仍舊紛爭不斷，武鬥不斷。

4月12日，中共中央為解決徐海地區（按：指徐州和連雲港）問題，決定在北京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徐海班。7月13日，由徐海地區兩派組織代表及解放軍「支左」人員代表共一百餘人的「徐海班」正式開學。徐州兩派為了顯示各自的實力，借機製造緊張局勢。8月11日，「支派」成員進駐徐州飯店，建立據點，與「踢派」的「火車頭」成員設在鐵路招待所的據點相對峙，經常發生槍戰，擾得市民人心惶惶。7月21日，徐州市革委會發布〈緊急通知〉，要求在「徐海班」舉辦期間，兩派組織不要搞遊行集會，不准衝擊和進駐軍事機關，不允許以任何藉口圍攻毆打解放軍，不准張貼把矛頭指向解放軍的標語、大字報等。但此時的革委會已無多大權威，它提出的各項要求不可能被嚴格遵守。

在中共中央的敦促下，在北京參加「徐海班」的徐州「支」、「踢」兩派代表於9月27日達成落實「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實現大聯合的協議。但後來的事實表明，要落實這個協議卻是難而又難。

12月24日至25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國務院會議室兩次接見駐徐州的六十八軍軍長張銍秀及徐州市、徐州鐵路分局兩派代表。周恩來指出駐徐部隊「支左」態度不端正。他批評說：全國武鬥停止了，就是你們徐州不停，怎麼搞的？怎麼交代？周恩來指出：鐵路要同地方堅決脫鉤，武鬥雙方都有責任，兩派據點都得撤除，不准互相進攻；徐州是關鍵性鐵路地段，要做出模範來。於是，徐州鐵路分局的兩派代表很快又達成大聯合協議。但沒幾天，徐州鐵路分局「火車頭」即違犯協議，開走全部火車頭，致使全線交通運輸中斷七天，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12月30日，周恩來再次接見「徐海班」兩派人員。周恩來指出：徐州鬧了兩年了，不能再繼續了，落後得不成樣子了，我都替你們焦急

了。針對28日徐州鐵路停車事件，周恩來強調指出，徐州是戰略要地，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全國鐵路一盤棋，徐州這個十字路口一卡，就影響全國，從給國家造成的損失來講，已超過「柳州事件」⁸²。周恩來傳達了中央碰頭會的決定：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溫玉成直接解決徐州鐵路、煤炭、電業系統的問題；把這三個系統的兩派頭頭及「支左」人員從「徐海班」中抽出來，分別由鐵道部、煤炭部、電力部的軍管會單獨開辦學習班，由三個部軍管會主任親自掛帥，以求盡快、徹底解決徐海問題。

1969年1月24日，在北京的徐州「支」、「踢」兩派發出〈聯合通告〉，要求徐州兩派立即停止武鬥，五天之內必須將所有武器上交徐州警備區，對違者將依法懲處；五天之內徹底解散以各種形式集中的人員，返回本單位，按系統、行業、單位實現大聯合，任何人不許干涉外單位的革命和生產；立即停止互相攻擊，對已抓的人員要無條件釋放等。經毛澤東批准，由周恩來親自過問，在北京參加「徐海班」的部分人員組成「回徐工作團」，回徐州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匯報在京學習成果，以求達到收繳武器、制止武鬥、促進兩派聯合的目的。但此事遭到嚴重干擾，「回徐工作團」在徐州三個多月後只能無功而返。

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組給駐徐州部隊發出電報，通知徐州「支」、「踢」兩派各增加四十二名代表去北京學習。

中共九大過後，徐海問題還是遲遲未能解決。5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央其他領導人接見「徐海班」全體人員。在此之前，毛澤東對徐海地區的文化大革命作過幾次講話，批評徐州「支」、「踢」兩派先後各自為政，把對方打跑，成立「一黨政府」。毛說：「徐州已經翻了幾個個了，再也不能翻個了。」「徐州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要大聯合。」「一派不靈，兩派才靈，一派掌權不行，兩派聯合才行。」「講明政策，多數人是能接受的。」⁸³ 接見時，周恩來就大聯合問題提出了以

82 1968年6月1日，因廣西兩派武鬥，鐵路運輸在柳州火車站中斷達兩個月之久，嚴重影響大西南和廣西地區的進出口物資運輸，援越抗美的軍用物資運輸也無法進行。

8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619。

現有革委會為基礎，按照平等原則，通過充分協商，進行改組的原則。5月26日，周恩來再次接見「徐海班」和徐州鐵路、煤炭、電業三個學習班的全體人員。周恩來指出，徐海學習班，是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最長的一個學習班，不但包括徐州、連雲港各方面的同志，還有鐵路上的、煤炭方面的、電業方面的同志，希望徐州兩派盡快解決問題，達成聯合。

6月4日，中央領導人接見在京參加「徐海班」學習的駐徐部隊全體人員。駐徐部隊(六十八軍)軍黨委隨即召開由在京三十八名駐徐海地區部隊軍、師兩級幹部參加的會議，統一對徐海地區大聯合的認識。7月27日，軍黨委就這次會議所達成的共識以〈關於貫徹落實「九大」精神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上報中共中央。報告說：現已完成了改組徐州市革委會和成立江蘇省徐州專區革委會的準備。報告附有〈關於改組徐州市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關於成立江蘇省徐州專區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這個文件實際上是徐海地區兩派就停止武鬥、收繳武器，實現大聯合所達成的協議，是對「徐海班」學習的總結。

7月29日，中共中央就駐徐部隊軍黨委〈關於貫徹落實「九大」精神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作出批示，並經毛澤東批示「照辦」，以中發(69)45號文件下發。中共中央批准了改組徐州市革委會，成立江蘇省徐州專區革委會的方案。中央的批示中說：「由於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和資產階級派性的影響，徐海地區的革命大聯合遲遲不能實現，生產運輸時常受到干擾，因而徐海地區『文化大革命』形勢落後於全國。中央希望徐海地區迅速實現歸口大聯合，建立『三結合』的革委會，加倍努力，迅速跟上全國大好形勢。」7月31日，長達一年另十八天的「徐海班」結業。

8月1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徐州市革委會改組(又稱八一革委會)，張銓秀任主任。江蘇省徐州專區革委會成立，柴榮生(徐州軍分區司令員)任主任。隨着徐州市革委會的改組，徐州全市自上而下重新大聯合，重建或改組革委會。至此，分裂混亂的局面才告一段落。⁸⁴

84 參見謝端堯主編：《中共徐州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2 「反復舊」

1968年下半年到1969年上半年，全國許多地方都掀起了「反復舊」運動。各地在成立革委會後，掌權的大多為支左的解放軍幹部，許多派性嚴重的造反派受到批判。他們不甘心就此退出曾給他們帶來極大快感的政治舞台，紛紛揭竿而起，搞起了「反復舊」運動。在全國來說，「反復舊」運動搞得比較厲害的有四川、山東、湖北等省。

1968年10月至1969年6月，劉結挺、張西挺在四川大搞「反復舊」運動，把反對他們的一些地區和單位說成是「獨立王國」，把剛被結合進革委會而又反對他們的老幹部說成是「穿新鞋，走老路」，搞「復舊」。「反復舊」運動使四川形勢又發生了一次反覆。有的單位革委會被搞垮，兩派聯合了的單位再度陷入分裂。四川的工農業生產再次遭到破壞。西昌、達縣、江津地區和成昆鐵路等建設工地以及永榮、廣旺、芙蓉等煤礦和電力部門出現了較大的反覆，嚴重影響了三線建設。到1969年6月，毛澤東批評「反復舊」之後，「反復舊」運動才逐步收場。11月5日至12月27日，中央在北京召開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根據會議討論情況，寫出了四川省革委會、成都軍區黨委〈關於解決四川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和〈關於加速四川地區三線建設的請示報告〉。省革委會、成都軍區黨委對省革委會成立以來工作中出現的失誤集體承擔了責任，同時也嚴肅地揭發了劉結挺、張西挺的問題。12月25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中央對兩個報告作出批示，決定調整四川省革委會領導班子，確定了省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成員名單和決定成立成都軍區支左領導小組、四川三線建設領導小組及其組成人員。中央領導人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劉結挺、張西挺是個人野心家，要發動群眾揭發批判。此後，劉、張實際已被撤職。1970年2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為四川舉辦了六千多人參加的學習班，並宣布把劉、張「掛起來，靠邊站」的決定，為進一步解決四川問題打下了基礎。1971年8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撤銷劉結挺、張西挺黨內外一切職務。⁸⁵

85 楊超等主編：《當代四川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198—200。

1968年12月，王效禹等以貫徹八屆十二中全會為名，在山東全省發動了「反復舊」運動，集中打擊迫害了一大批軍隊和地方幹部，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全省39%的縣、市革委會和47%的公社革委會被摧垮、改組，搞變相奪權。12月17日，濟南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強佔館驛街派出所，掀起砸爛公檢法的浪潮。1969年1月，王效禹等人派「工宣隊」進駐軍隊開展「四大」的單位，企圖搞亂軍隊。全省社會和經濟再度陷入嚴重混亂和癱瘓、半癱瘓狀態。山東的情況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九大閉幕後，中央將山東省革委會和濟南軍區在京的二十七人集中學習，解決山東問題。毛澤東、周恩來等先後七次對解決山東問題作了指示。4月24日，根據中央指示精神，王效禹、楊得志、袁升平以給中央報告的形式，就解決山東問題提出十條措施。25日，中央對報告作出批示，指出：王效禹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在全省進行「反復舊」運動，犯了嚴重的錯誤。這種錯誤是帶方向性的，但還是前進中的錯誤。解決山東問題的原則是：「既要徹底糾正錯誤，又要照顧大局，努力穩定山東局勢。」5月29日至6月2日，山東省革委會、濟南軍區召開聯席會議，傳達中央負責人對山東問題的批示，揭發批判王效禹發動「反復舊」、抵制清理階級隊伍的錯誤，認為他的目的是以此搞亂軍區黨委，達到改組軍區黨委的目的。王效禹在會上檢查了自己的錯誤。6月5日至14日，山東省革委會、濟南軍區召開地方、軍隊幹部聯席會議解決王效禹問題。會議認為通過批判王效禹的錯誤，找到了山東問題的癥結所在，認識到了王效禹錯誤的嚴重性。要求把中央關於山東問題的批示等文件傳達到公社革委會委員以上、部隊營級以上，按照既要穩定局勢，又要糾正錯誤的原則，主要是糾正「反復舊」的錯誤，因「反復舊」引起的革委會領導成員和工作人員的變動，原則上要以「反復舊」以前為基礎，適當地充實和調整。不要糾纏歷史，不要互相攻擊，不要搞串連，不要重拉隊伍。此後，山東工作實際上由楊得志、袁升平等部隊領導人負責。1971年3月，中央決定撤銷王效禹的一切職務，楊得志任山東省革委會主任。⁸⁶

86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1），頁544—552。

1969年3月至5月，湖北省的造反派胡厚民、朱鴻霞等在湖北省、武漢市發動「反復舊」運動。4月3日至9日，朱鴻霞、李湘玉等人操縱的武漢市工代會多次召開常委會，提出「張體學信不過」、「造反派受壓」等口號。4月9日晚，朱鴻霞與李湘玉、吳焱金聯名發表由其執筆寫的〈人民解放我解放、灑盡鮮血為人民〉一文，並抄成大字報，印成傳單和小報，四處張貼和散發，極力鼓吹「殺向社會『反復舊』」。朱鴻霞還到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武漢市第六棉紡織廠等單位煽動「反復舊」。4月27日，朱鴻霞、胡厚民在漢口工藝大樓前召開「反復舊誓師大會」，並組織了火把遊行。4月29日，中共中央召集武漢地區結合在省、市革委會中的群眾代表二十二人到北京，解決武漢的「反復舊」問題。5月7日，由朱鴻霞、胡厚民等暗中組織指揮的「工人調查團」，衝擊省、市革委會，並以工代會的名義，到處散發〈給湖北省武漢市革命委員會的一封公開信〉，攻擊省、市革委會主要領導人「復舊」，煽動反復舊，反對省、市革委會主要負責人。5月9日至11日，朱鴻霞等暗中操縱的武漢市工代會舉行全委擴大會議，制定〈關於湖北省、武漢地區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若干問題的決議〉，誣衊湖北省黨政領導人「舊病復發，老債未清，又欠新賬」，「在湖北省、武漢市實行全面復舊」，「復活舊的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是「拼湊老班子、恢復老樣子、還走老路子」，誣衊安排領導幹部重新出來工作是「包庇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煽動要重新把權奪回來。並決定向武漢市革委會派出「工人調查團」。5月17日，「工人調查團」進駐市革委會，調查市革委會領導搞「復舊」的問題。一些重新出來工作的老幹部因此再次受到衝擊。

5月19日，周恩來等在北京接見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時指出：「5月11日武漢工代會〈關於湖北省、武漢地區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決議〉把形勢估計錯了」，「17日工代會進駐市革委會是錯誤的」。⁸⁷ 造反派對周恩來的批評拒不接受、改正，而

87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98。

且通過《揚子江評論》這個刊物繼續堅持「反復舊」，表示要繼續大幹特幹，要把「反復舊」鬥爭進行到底。

5月27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武漢反復舊問題〉的文件，批評武漢地區的「反復舊」運動「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中國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把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置於一切之上。這樣做，是不符合毛主席關於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和一元化領導的教導的」。⁸⁸ 省革委會及時向全省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後，武漢及全省的局勢逐漸趨於穩定。

3 局部動亂，綿延不絕

在全國大多數地區局勢趨於穩定，派性鬥爭逐漸平息的情況下，少數地區的武鬥和派性鬥爭還在繼續，局部動亂，綿延不絕。

山西在全國奪權最早，但奪權後形成了兩大派群眾組織「紅總站」和「紅聯站」，劉格平、陳永貴等支持「紅總站」；張日清、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等支持「紅聯站」。兩大派長期對立，武鬥不斷。山西局面混亂，導致煤炭生產危機，直接危及全國的能源供應，從而引起中共中央和全國的不安。中共中央為解決山西問題，曾先後於1967年4月、7月、12月，1968年5月四次在北京召開專門會議，1968年1月下旬至9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辦了「山西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調山西各大群眾組織頭頭到京學習，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69年4月初，晉中、晉南再次發生武鬥事件。周恩來就此事批示陳伯達、謝富治、溫玉成，要求命令當時正在北京出席九大的山西省革委會負責人劉格平、張日清、謝振華，「當場分別打電話回去，詢問事實真相，各自負責解決本方應解決的問題」。並要求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第一政治委員李雪峰「繼續過問此事」。⁸⁹ 九大過後，山西武鬥進一步加劇。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專門針對山西的措詞嚴厲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

88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大事記(1949年5月—1993年12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16—117。

89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290—291。

員會布告》。〈布告〉指出：「在山西太原市、晉中、晉南的部分地區，混在各派群眾組織中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壞頭頭利用資產階級派性，蒙蔽一部分群眾，抗拒執行中央歷次發布的通告、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反革命罪行。」〈布告〉要求武鬥雙方必須立即無條件停止武鬥，解散各自的武鬥隊，撤除一切武鬥據點，上繳一切武器裝備；武力強佔地盤，拒不執行本〈布告〉、負隅頑抗者，由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包圍，強制繳械，逃跑流竄者，由人民解放軍實行追捕，歸案法辦。⁹⁰同日，中共中央下發文件，調劉格平、張日清回京，參加中央學習班，任命謝振華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組長、省革委會主任，主持山西工作。經中央批准，謝振華調動北京軍區駐晉各部隊，並從河南調入一部分部隊，共二十多個團，開赴山西各地宣傳「七二三」布告精神，全面收繳武器，制止武鬥。「七二三」布告發出後，太原市又發生了一起武鬥事件，謝振華當即派部隊將帶頭搞武鬥的「紅總站」武鬥總指揮楊承效（原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總指揮）抓了起來，並大造輿論，公布楊的罪狀。然後經報請中央批准，下令槍斃楊承效。逮捕和槍斃楊承效對各地的武鬥組織頭頭發生了巨大的震懾作用。此後，山西全省各地持續兩年之久的武鬥被逐漸平息，全省局勢相對安定下來。

貴州也是在全國奪權較早的省份之一，但貴州的兩大派矛盾並未得到妥善解決。以李再含為首的省革委會對主要的反對派「四一一」一直採取壓制的辦法，但總是壓而不服，武鬥糾紛不斷。在貴州省革委會和省軍區、駐黔支左部隊內部，領導幹部之間也分為兩派，存在嚴重的對立，在對待兩大派組織的問題上也持完全相反的立場。1969年7月底，中央派記者宮策、劉回年等赴貴州調查，交代他們：到那裏後多觀察、了解，不表態，只向中央反映實情。調查組很快發回內參調研材料，報告了在李再含支一派、壓一派、武裝一派、消滅一派的思想指導下，貴州全省出現武鬥不斷的複雜局面。8月23日至9月下旬，中央調貴州省革委會、省軍區及各地（州、市）革委會、軍分區的主要負責人、部分群眾組織頭頭共一百多人集中到北京開會，由中央直接

90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頁356。

解決問題。周恩來在會上批評李再含不說實話，變成兩面派，說他在貴州自封小紅太陽，搞多中心，封建意識。9月2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向毛澤東呈報〈關於解決貴州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說：毛主席批發的兩個「五條」和中央兩次解決貴州問題的指示，都是符合貴州實際的，是正確的。但由於李再含等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派性，對中央指示採取兩面派態度，拒不執行，使貴州形勢愈來愈嚴重，全省出現了較大的反覆。李再含的主要錯誤是：抗拒中央，搞多中心論，對中央封鎖消息，說假話，重大問題不請示報告，鬧獨立王國，突出個人，公開散布違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支持武裝一派，消滅一派，對「四一一」實行踏平政策，一手策劃貴陽「7·29」獨立師開槍鎮壓群眾事件，發動所謂「三反一粉碎」運動，把二十八個縣革委會、貴陽市和全省許多基層革委會「推倒重來」。⁹¹ 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發〈中共中央對貴州核心領導小組〈關於解決貴州當前若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即中發〔69〕71號文件）。中央決定：一、調昆明軍區副政委藍亦農兼任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代理省核心領導小組組長，主持貴州工作。調四十三軍軍長張榮森擔任貴州省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省軍區司令員，並統一領導全省駐軍支左工作。犯有嚴重錯誤的李再含等七人暫不回黔，留下繼續學習、檢查。二、調四十三軍一二九師（6908部隊）進駐貴州，擔任支左工作。三、中央為貴州舉辦一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將省革委會辦事機構工作人員、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的部分幹部，省工代會及三線重要廠礦兩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共2019人調北京參加學習。該學習班從11月25日開始至1970年4月17日結束。1969年冬至1970年春，中共貴州省核心領導小組和貴州省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對全省53個縣、273個企事業單位進行了補台工作，增補了一批軍隊幹部，解放了一批地方領導幹部進各級領導班子，撤免了一批造反派頭頭，對各級革委會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⁹²

91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關於解決貴州問題的請示報告（1969年9月24日）。

92 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南寧：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頁424—426；劉回年：《重大事件親歷：一個將軍記者眼中的政治風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頁84—86。

新疆革委會成立後，並未能夠結束新疆混亂的政治局面，相反，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思想指導下，不斷開展「革命大批判」，人為地挑起新的鬥爭。1968年10月至12月，自治區革委會二次全委（擴大）會議和新疆軍區四級幹部會議同時召開。會議主要批判所謂「兩個主義、一個王國」（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獨立王國），批判已經擔任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新疆軍區政治委員的王恩茂。並以新疆軍區黨委名義向軍內各級黨委下發「打倒王恩茂」的電報，在全疆軍內外引起極大混亂。會議之後，地方、軍隊都集中揭發批判王恩茂，並株連到一大批黨政軍幹部、群眾，已經在革委會結合或重新分配工作為數不多的黨政領導幹部，有的又被「回爐重煉」，還未完全拆除的兩派群眾組織的山頭又壘了起來，派性鬥爭抬頭，社會秩序再次陷入混亂。1969年1月10日，在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楊立業的策動下，十月拖拉機廠一派群眾組織將王恩茂綁架上大卡車遊街。3月10日，自治區革委會又以〈堅決貫徹中央「二一九」批示的決議〉的形式下達全疆，再次強調要狠批王恩茂的「兩個主義、一個王國」，「要粉碎」他全面反攻倒算的企圖，要揭開「原軍區黨委階級鬥爭蓋子」，從而使新疆局勢愈加混亂。6月18日，周恩來接見在京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新疆班領導小組成員時批評了新疆的做法，他說：新疆革委會成立以後，新疆領導班子沒有做到團結大多數，而是栽到一派之中，犯了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你們說，王恩茂問題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九大」以後還這樣講就是謬論。你們1968年四幹會批王恩茂的做法是錯誤的，你們拿「二一九」指示，來壓另一派，是錯誤的。⁹³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邊疆各省、市、自治區各級革命委員會，各族革命人民，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邊疆部隊全體指戰員：一、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二、大敵當前，共同對敵；三、駐邊疆部隊指戰員必須堅

93 《新疆通志·共產黨志》編纂委員會：《新疆通志·共產黨志》（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頁446；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編：《中國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1966.5—1991.12）》，下冊（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頁22、24。

守戰鬥崗位，堅決執行命令；四、一切革命群眾組織，必須實行按系統、按行業、按部門、按單位的革命大聯合；五、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的「七·二三」布告；六、絕對不准衝擊人民解放軍，不准搶奪軍隊的武器、裝備和車輛；七、要保證交通運輸，保證通訊聯絡暢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大力支援前線；九、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此後，新疆動蕩的局勢才有所緩和。

在西南邊陲的西藏，從1969年春天開始，發生了一系列叛亂、暴亂事件。

3月9日，丁青發生暴亂事件。丁青縣一些人成立所謂「怒瀾兩江衛教神軍總指揮部」，武裝襲擊當地機關和駐軍，搶劫各種槍支300餘枝、國營牧場牛羊900餘頭(隻)、國庫糧食50餘萬斤，毒打殘害幹部、群眾20餘人。

5月20日，邊壩發生暴亂事件。1月底，邊壩縣一些人制定了「不要共產黨、不要交公糧、不要社會主義」的「三不」綱領；繼而又建立「四水六崗衛教軍」和「翻身農奴革命造反司令部」。5月20日，他們襲擊縣委機關，打傷幹部職工三十餘人。6月8日，又集中二千餘人襲擊縣委機關，奪縣革委會的權，搶走縣革委會各辦事機構公章。接着，又幾次襲擊邊壩縣、區機關和軍宣隊，搶劫縣人武部武器彈藥，炸毀軍宣隊住房，打、搶、燒、殺達十七天之久，打傷幹部、戰士上百名，還進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蠻手段，殘害致死幹部、戰士五十餘人。

6月13日，尼木縣發生暴亂事件。尼木縣一反動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並呼喊口號，煽動群眾圍攻、毆打軍宣隊，軍宣隊十二人全部被害。21日，在尼姑廟殺害基層幹部積極分子十三人。

7月，日喀則地區南木林等縣出現騷亂活動。日喀則地區南木林、謝通門、拉孜、昂仁等縣反動分子造謠惑眾，製造騷亂，搞垮了一批縣、區、鄉(公社)革委會。

7月26日，比如縣發生暴亂事件。上半年，一些人混入群眾組織，利用宗教迷信，組織「白色神軍」，大肆進行打、砸、搶，揪鬥區鄉幹部。有的在公路沿線設卡攔車，破壞橋樑。砸爛道班17個，搶去國營牧場馬260餘匹，牛1820餘頭，羊5920餘隻。7月26日，少數壞人誘騙

群眾搶奪當地駐軍武器彈藥，打傷打死戰士多人，搶劫燒殺達7天之久，搶走各種槍支18枝，六〇炮2門，火箭筒2具，手榴彈5000餘枚，以及一些炮彈、子彈等。8月1日，又煽動全縣8個區、12個鄉的部分群眾向縣機關和駐軍發起攻擊，並向縣人民政府開炮。機關和駐軍被迫開槍還擊。

據統計，西藏全區共搞垮區鄉政權379個，人民公社55個，互助組3020個。在這一系列暴亂中，西藏黨、政、軍、群各系統有2800多人傷亡(其中被殺180多人)。凡暴亂所及地區，到處白旗狂飄，一片白色恐怖。

9月25日，中共中央下令平息西藏一些地區的暴亂。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會關於一些地區發生反革命暴亂的報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區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利用民族情緒，宗教迷信，煽動脅迫群眾搶劫國家和群眾財物，破壞交通，已完全屬於反革命性質。」必須「採取斷然措施，決不能讓其蔓延」。西藏軍區據此下達了平息暴亂的命令。⁹⁴

1968年11月3日至12月21日，中共浙江省革委會黨員代表大會在杭州召開。會上，陳勵耘、南萍、熊應堂以貫徹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和批「二月逆流翻案邪風」為名，對省軍區副司令員阮賢榜、李國厚和政治部主任羅晴濤等人，搞突然襲擊，非法扣留了李國厚；誣陷原浙江省軍區是「二月逆流在浙江的總根子」，阮、李、羅三人是「反黨集團」、「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影射攻擊南京軍區許世友等主要領導人反對黨的一元化領導，搞「多中心」。會議通過了〈關於揭發和批判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反對「三紅」，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的決議〉。1969年1月8日至30日，為解決浙江省成立革委會後兩派鬥爭尖銳的問題，中央召開關於解決浙江問題的「一月會議」，南京軍區領導人許世友、杜平、錢鈞和原南京軍區浙江調查組組長陳德先，浙江省革委會南萍、陳勵耘、熊應堂，省軍區阮賢榜、李

94 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頁187—189；任榮：《戎馬征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頁314—315。

國厚、羅晴濤等十人參加。中央文革小組和軍委辦事組都是支持南萍、陳勵耘等人的，康生到會上批評阮賢榜、李國厚等不承認改組後的省軍區和省軍管會的領導，是奪權、翻案、復辟，分裂軍隊，是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2月，浙江省革委會下達「一月會議」傳達提綱，稱阮、李、羅三人是「十足的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是「浙江颳起翻案復辟邪風的總代表」，是「浙江分裂軍隊，毀我長城的總根子」，並在軍區系統層層揪鬥阮、李、羅的代理人，把軍內外大批幹部打成「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幹將」、「老保」。南萍、陳勵耘等人控制了浙江省的大權，直到九一三事件後才免職。

在浙江省內受到排斥和壓制的「紅暴」派極力反抗「省聯總」派。1969年2月8日，「紅暴」派搶劫舟山戰備武器倉庫的槍支三千多枝，子彈五萬多發，並於當晚將槍、彈分發各地。16日至21日，浙江省「紅暴」派聯合大會在舟山舉行，成立了「浙江省紅暴派聯合會指揮部」。與此同時，浙江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會議提出實現全省「一片紅」，向九大獻禮，決定用武力統一浙江。全省靠武力解決的有富陽、嵊縣、玉環、麗水、縹山、臨海、諸暨、黃岩、龍泉等二十八個縣(市)。在玉環縣，南萍、陳勵耘等調動部隊和十幾個縣的二千餘名造反派武裝攻打玉環縣，當另一派舉起白襯衣，放下武器時，兩派相距幾十米的情況下，進攻者「省聯總」派竟用機槍掃射，當場打死十七人，傷二十一人。6月2日，為抗議《人民日報》對浙江問題的不實報道，浙江「紅暴」派頭頭方劍文率領一百五十多人赴京告狀。6月4日，他們在北京大鬧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同時，方劍文發回電報，提出繼續組織人員赴京。6月12日，大批浙江人員滯留在新華社靜坐。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中央採取嚴厲措施，分兩批將浙江「紅暴」派人員武裝押送回杭州。8月4日，中央專門為此發了文件，「同意對方劍文的問題進行公開批判」。浙江省革委會把「紅暴」派的頭頭集中起來辦學習班。此後，浙江全省層層召開批判會，批判「紅暴」派的「多中心論」。⁹⁵

95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67—170。

黑龍江省雖然很早就成立了革委會，但省內兩大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鬥爭一直沒有停止，擁護省革委會的一派稱為「山上派」，反對省革委會的一派稱為「山下派」。以潘復生為首的省革委會支持「山上派」，壓制「山下派」，但又沒有力量牢固控制省內局勢，致使黑龍江省長期處於兩派鬥爭的混亂之中。1970年7月8日，周恩來指示：「黑龍江問題的根子在潘復生那裏。」7月23日，周恩來再次當面批評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龍江的問題主要是一派掌權，一派壓另一派。」1971年2月，中共中央派人去黑龍江處理潘復生問題。3月16日，黑龍江召開全省縣團級以上幹部大會，揭發批判潘復生的錯誤。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免去潘復生的中共黑龍江省核心小組組長和省革委會主任等黨內外一切職務。

後記

一

2002年年初，我與夫人一起興致勃勃地參觀了中華世紀壇。全長262米的青銅甬道上，鐫刻着十八萬字的銘文，概括了中華民族從孕育到啟蒙、成長、發展的歷史過程。甬道上有清流水淌過，寓意着歷史的長河，從百餘萬年前一直流淌到我們親歷過的時代。我發現，建成才一年有餘的青銅甬道上，赫然有好幾處塗改映入眼簾，猶如一件華麗新衣上的幾處補丁，很是扎眼。後發現是因原銘文錯誤而後又進行修改所致。在近現代歷史上的錯誤有：陝北公學成立的時間(1937年誤為1939年)、延安自然科學院成立的時間(1940年誤為1939年)等等。最大的錯誤是將劉少奇逝世的時間(1969年11月12日誤為1968年11月12日)也搞錯了。

在印有青銅甬道銘文小冊子的出版後記中寫道：

青銅甬道銘文的文稿，是由中華世紀壇組委會聘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的數十位專家，用近一年的時間，認真研討，數易其稿才完成的。初稿完成後，又對文稿中所涉及的各學科、各行業的專題內容，請各專業機構或學術團體的專家，進行核定、修改，反覆修訂達十餘次才最後定稿。

銘文中出現的錯誤，尤其是劉少奇逝世的時間錯誤是極不應該的。劉少奇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逝世的時間很多老百姓都知道，而且才過去不過三十餘年，竟被這許多專家所忘卻！這樣的錯誤足以令撰稿、審稿和定稿的衋衋諸公長久蒙羞！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現在許多事情在轟轟烈烈、大張旗鼓的表面下，充滿了浮躁和疏漏；許多當時感覺刻骨銘心的大事件，用不了多少時間，就會被包括專家在內的許多人拋諸腦後。

文化大革命發生於不遠的三四十年前，當時給中國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動亂與災難，過來人多以為文革的教訓是難以忘卻的。可是現在我認為，如果不抓緊進行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和文革史料的保存、搜集、整理、出版，用不了多少時間，文革中的許多事情都會被人遺忘的，就像劉少奇逝世的時間被人搞錯一樣，文革歷史的真實面貌也會逐漸模糊以至湮滅。

何蜀在〈不應有的遺忘〉一文中講到這樣一件事：兩位很有名的攝影師在回憶錄中竟把楊尚昆的被打倒說成是因為他給毛澤東錄音而「被江青、『四人幫』緊緊抓住不放，而且添油加醋」地說成是對毛澤東搞「竊聽」所致，甚至還冒出來這樣一句話：「楊尚昆被『四人幫』揪出來以後……」¹，這樣的「高論」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眾所周知，彭、羅、陸、楊是在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被打倒的，當時還沒有所謂的「四人幫」。看來，現在確實有人在有意無意地忘記或者塗改文革。

二

國內以文化大革命為主要內容的書，對我幫助最大和給我較深印象的有以下幾本。

最早出版的是高舉、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此書雖然錯漏不少，但畢竟有濫觴之功，它的出版填補了國內文革研究領域的

¹ 參見侯波、徐肖冰口述，劉明銀整理：《帶翅膀的攝影機——侯波、徐肖冰口述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46。

空白狀況。據說最近幾年又有修訂本出版，增補了不少史料，可惜我未能親睹。

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史料豐富，評論精當，出版十多年後仍可稱為國內文革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本書。此書出版於80年代後期，包括本人在內的很多讀者希望能夠看到作者的新著。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立論嚴謹，關於文革的歷史背景與起因的分析很有見地。但全書僅二十八萬字，內容上要包括1966至1976十年的歷史，當然是有些力不從心。

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敘述清晰，在一些問題的分析上很有特色。該書向讀者表明：文革的許多重大事件乃至整個文革，沒有毛澤東的首肯或決定，是無法進行或無法出現的。在我看來，這是研究文革的一個關鍵點。抓住了這個關鍵點，許多問題才能講得清楚。

文革過去已近三十年，但國內記述、研究文革的論著卻還是寥寥無幾。在並不太多的關於文革的著作、論文中，又有不少以論代史，從宏觀上發議論多而從事實的基礎上進行研究的少。現有的關於文革或有關文革的書，我覺得大多過於簡練，過於空洞。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很難通過這些書來全面了解這段歷史，而經歷過文革的人又往往覺得看了這些書很不解渴，許多歷史的謎團還是找不到答案。

我認為，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存在着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一、對文化大革命的界定。從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這三年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特殊時期，國內一般稱為文革的第一階段。其實，這三年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文革可以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可以稱為廣義的文革，而狹義的文革則是特指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這三年。西方一些著名學者也認為中國的文革是三年。²

2 2003年11月，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我問從美國來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專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據您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一共搞了多長時間？」麥先生不無幽默地回答：「我們原來認為是三年，不過為了與你們國內的口徑一致，而且也為了我們的書能在中國更好地銷售，我們把它改成了十年。」

在1966年到1976年的這十年中，有許多共同的東西，例如：都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始終都在宣稱進行文化大革命；「左」傾思潮始終居於統治地位。後七年基本上是延續了前三年所確立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毫無疑問，前三年和後七年也有許多重大的區別。例如：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暴發式的，最為混亂、無序，而後七年的運動則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內運行；前三年全國的黨政領導體系基本上都經歷了從被砸爛或癱瘓到重建的過程，而後七年黨政領導體系始終都比較健全；前三年社會運行的基本形態是群眾運動，後七年則基本恢復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模式。

將廣義上的文革和狹義上的文革混為一談，結果就淡化了文革的特點，實際上不利於對文革研究的深入。

二、為尊者諱。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有些人雖然也抽象地承認毛澤東應對文革負主要責任，但在論述中常常強調他發動文革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常把文革中的許多壞事說成是「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有意無意地掩飾了毛澤東的主導作用。例如在文革中的外交問題上，許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關、戚，當成了文革時期外交上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澤東則成為了糾正極左思潮的人物，這就根本顛倒了事情的本來面目。周恩來、陶鑄、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人在文革中曾有過多次對文革的批評，努力糾正一些具體的錯誤，但在文革的進程中，他們在很多時候也是看不清形勢，他們都曾努力緊跟毛澤東，也說過許多錯話，幹過許多錯事，也整過許多好人。對文革造成的民族災難，他們也應負有一定的歷史責任。同樣，對這一時期的江青、林彪、陳伯達等人，也應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誇大、不醜化，力求反映他們的本來面目。例如江青，她遇事易衝動，說起話來口無遮攔，常常信口開河。但細究起來，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並不都是她個人的行為。毛澤東確實有許多批評、挖苦她的話，但不容否認，江青還是文革時期毛澤東所最信任的人。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兩封信就是明證。江青的一些言行，實際上

反映了毛澤東的思想。明乎此，我們就可以從江青關於文革的種種議論中，從她攻擊劉少奇、林彪、周恩來的許多話語中，摸到毛澤東的一些思想脈搏。又例如林彪，他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時所主要依靠的對象，但他在很多問題上與毛澤東並不一致，而且在他與毛澤東發生分歧的問題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澤東更正確一些，或者相對來說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報告問題上，在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上。

三、對文化大革命的殘酷性反映的不夠。文革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期，它把許多「左」的錯誤發展到極致，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段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人的人權——人的生命權、思想和言論的權利、個人尊嚴、個人財產權，被踐踏無遺。社會動盪，人民遭難，人性扭曲，出現了許多罕見的醜惡現象。在廣西，出現了大規模的殺害人民群眾和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現象，堪稱文革中最為醜惡的典型事例。在所謂「鬥爭哲學」的指導下，全社會混戰一場，冤、假、錯案遍於國中。據我估計，文革時期，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當以百萬計。一個雲南趙健民特務假案，審查了138萬多人，其中立案審查17萬多人，打死逼死17269人，打傷致殘的61000多人。一個「內人黨」的錯案就有34萬多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我認為文革中這些最黑暗、最醜惡的部分，不應該被掩蓋起來，應該作為深刻的教訓留給後人。

四、國內過去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重於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許多論者長於宏觀評論，但對於文革中許多具體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組織卻缺乏認真細緻的研究和分析。當然，由於時間久遠和史料散失，這種研究和分析變得愈來愈困難了。但是，如果沒有對當時的事件、人物、組織的具體分析，那麼一切宏觀評論都會成為沙灘上的建築，經不起時間的檢驗。例如講文革中出現了奪槍事件，但如果不把在這一時期全國各個地區到底出現了多少起奪槍事件，總共奪了多少槍這些數字講清楚，那麼人們是不會對奪槍事件有甚麼深刻印象的。整個文革的歷史，就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事件、人物、組織匯集而成的歷史，如果沒有相當數量的具體事件、人物、組織，這樣的歷史就成為空洞無物的說教了。

當前國內研究文革還存在許多困難和障礙。一些人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對文革作了結論為由，阻礙對文革的深入研究。其實，〈決議〉只是從政治上對文革歷史作了原則性的結論，它可以作為目前進行政策宣傳等方面的指導思想，而決不應該成為研究文革歷史的障礙。毫無疑問，〈決議〉不能取代歷史研究，相反，〈決議〉本身就是對文革歷史研究的一種成果，而且隨着這種研究的深入發展，〈決議〉中的一些結論和表述也可能會有新的說法。有人拿鄧小平曾說過〈決議〉對歷史問題的總結「宜粗不宜細」來說事，認為進行文革歷史研究也應該「宜粗不宜細」，這當然是錯誤的。一方面，〈決議〉對歷史問題的總結受體裁和字數的限制，當然不能太細；另一方面，也受當時對文革歷史研究的不夠深入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完全準確細緻地對文革歷史進行總結。一些人以為，文革是中國共產黨的污點，搞文革研究就是要給黨抹黑。此說雖然極為幼稚可笑，但確實在一些領導人的頭腦中存在。雖然從無明文禁止對文革歷史的研究，但國內文革研究的環境確實是很嚴峻的。1986年11月，中宣部發出通知說：「對專門敘述『文化大革命』史實的專著文章，未經過嚴格審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各報紙，刊物和電台不要刊登、廣播，對已經出版的這類專著文章，不發評論和消息。」³ 1988年12月，中宣部又發出〈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問題的若干規定〉，對出版文革類圖書作出了更為嚴格的規定，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類圖書的出版發行。⁴

三

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來說，最大的困難就在於史料的缺乏。史料的缺乏，一是由於當時特殊的環境下，許多史料損毀，未能保留下

3 中央宣傳部關於慎重對待專門敘述「文革」歷史的專著和文章的通知(1986年11月18日)，載美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4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出版「文化大革命」圖書問題的若干規定(1988年12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來；二是由於國內對文革檔案大多還處於未解密的狀態，即使有也難於提供給研究者所使用。

本書的寫作，盡量利用國內現有的各種資料，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三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十三冊）、《周恩來年譜》、《劉少奇年譜》、各種傳記、回憶錄等。文革期間各級組織編印了一些資料集，如1966至1968年間，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關文件匯集》共七集，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於1968年到1969年間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匯編》共三集。只要下功夫去找，散落在民間的此類材料各地還有不少。至於各群眾組織自行編印的形形色色的首長講話集、中央文件集就更多了。儘管這些資料遠非規範、可靠，而且不系統、不全面，但在現有條件下總還算給研究者提供了進行研究的可能性。近年來，全國各地的黨史研究室、史志辦公室出版了許多有關黨史、地方史的資料，如大事記、大事年表、地方志、部門志等，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具體的材料。

另外，美國已整理出版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也有不少，如中國研究資料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出版的《新編紅衛兵資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共二十大冊。2002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了一張匯集文革資料的光盤——《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其中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文件，毛澤東、林彪等中央領導人在文革中的講話，有文革期間的重要報刊社論文章，有紅衛兵、群眾運動的重要文獻，以及文革時期異端思潮的重要文獻等。這張光盤內容豐富，總字數達三千萬。這張光盤遠非完美。因為信息量太大，而參與光盤製作的人力有限，時間也短，錯漏當然不少。我在仔細瀏覽過這張光盤後，感覺它編排還不夠理想，材料有些不實，校對方面的問題較多，有些重要的資料沒有收入，收入的資料中存在虛假或偽造的成分。例如其中有一份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中央支左部隊進駐各大軍區、省軍區的若干指示〉(1968年6月10日)，經過考證，可以斷定是一份偽造的文件——儘管偽造的技巧相當出色，幾

可亂真。《文庫》中第四部分是「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其中有一件〈戚本禹對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代表的講話〉(1966年11月12日)，明顯應該是戚對首都「二司」的講話；另外有一件〈關鋒戚本禹對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代表及師生的講話〉，標註的時間居然是「1966年9月31日」，其編輯之倉促草率可見一斑。但總的來說，還是瑕不掩瑜，其大部分內容是比較可靠、準確的。我認為，這張光盤可以成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基礎性資料，它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研究者手頭不可能保存大量文件資料的困難。

四

1966年8月18日，是文化大革命歷史上一個具有標誌性的重要時間。這一天，毛澤東等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和各地來北京串連的學生、教師，直接向他們發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號召。

在這之前，中國共產黨內已經通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十一中全會，對開展文革進行了全面的發動，兩次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毛澤東關於開展文革的思想，規定了開展文革需要遵循的方針政策。毛澤東認為，中央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原有的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有很大一部分權力已經被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毛澤東要直接發動千百萬群眾，開展一個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林彪在大會上發表的講話，可以看作是他代表毛澤東向全國人民公開發出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他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我們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權威，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句話，就是要大立毛澤東思想。

我們要讓億萬人民掌握毛澤東思想，讓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思想陣地，用毛澤東思想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讓毛澤東思想這個偉大的精神力量，變成偉大的物質力量！

毛澤東身着綠色軍裝，臂戴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上向人們揮手，寓意着他要帶領全國人民開始新的戰鬥了；同時也向世人表明，他對剛出現不久、褒貶不一的紅衛兵組織是堅決支持的。這次接見後，紅衛兵組織迅速在全國各地發展起來，並立即殺向社會，掀起了令世界震驚的「破四舊」運動。

8月18日以後，在《人民日報》上開始頻頻出現的一句口號是：「砸爛舊世界」。在8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就有如下的報道：

許多革命小將滿懷豪情地說：有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給我們掌舵、指路，我們一定能夠砸爛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毛澤東思想的光輝一定能照遍全球。

廣大指戰員們還一致表示，要進一步學習十六條，以十六條為武器，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徹底砸爛舊世界，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新世界，讓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一切思想陣地，永遠高高飄揚。

在當時紅衛兵的傳單、大字報中，這個口號用得更多。例如：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砸爛舊世界，創建新世界！我們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有堅強團結高度自覺的七億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⁵

5 北京十四中紅衛軍：〈告全國同胞書〉（1966年8月2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革命的紅衛兵戰士們，讓我們攜起手來，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以《紅衛兵戰報》為陣地，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資產階級的法權殘餘。繼續大造資產階級老爺們的反，一反到底，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把造反精神鼓得足足的，把《紅衛兵戰報》變成無產階級的炸藥包、爆破筒、匕首、金箍棒，把舊世界的一切統統炸掉，砸爛！！我們就是要在舊世界的廢墟上，用我們砸爛舊世界的雙手，重新建造起一個嶄新的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毛澤東思想化的共產主義新中國。⁶

所謂「舊世界」指的是甚麼呢？這個「舊世界」包括「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但主要是指毛澤東在他七十三歲生日那天所說的「舊機器、舊方法、舊秩序、舊制度」⁷。

我們現在看文化大革命，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一個砸爛和重建國家機器的過程。毛澤東對中央第一線不滿，對現存秩序不滿，他採取的辦法就是「砸爛」。為了「砸爛」，不惜以天下大亂為代價，不惜以千百萬人民的犧牲為代價。

這就是我為甚麼要用「砸爛舊世界」這句當時流行的口號作為書名的原因。

本書利用現有的材料，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比較具體的描述。內容包括：從1965年底批判《海瑞罷官》至1969年4月召開「九大」期間，文革從發動到形成高潮，從奪權到天下大亂，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到最後召開「九大」。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裏，文革在中國大地上大行其道，橫掃一切。

我在寫作中力求追尋歷史的軌跡，搞清楚文革中種種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其本來面目。由於史料的缺乏和本人能力的限制，我現

6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東城分隊)：《〈紅衛兵戰報〉發刊詞》(1966年9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 毛澤東認為舊機器要改成新機器，舊方法要改成新方法，舊秩序要改成新秩序，舊制度要改成新制度。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693—700。

在的研究還遠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我只能做到盡量用比較翔實、具體的史料來描述這段歷史。我只能寫我所了解的事情，對許多重要問題由於不佔有史料，只能暫付闕如，以待來日。

當寫完本書最後一章的時候，我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和愉快。很多年以前，我就對巴金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表示舉雙手擁護。現在，希望我的這本書能夠為未來的文革博物館大廈添上一片磚瓦。

卜偉華

2004年12月31日於北京自得園

大事記

1965年

11月10日 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1月18日 林彪對1966年全軍工作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

12月8日—15日 毛澤東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

12月 《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研究歷史〉，對翦伯贊的歷史觀進行批判。

1966年

2月3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永遠突出政治〉。到4月5日為止，該報又發表了六篇論述突出政治的社論。這些社論宣傳「突出政治一通百通，衝擊政治一衝百空」，要「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時時突出政治」。從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三篇論述突出政治的社論，這些社論根據鄧小平的意見，着重宣傳「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密切結合」。這種意見被視為二元論，此後不久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受到批判。

2月7日 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並轉發了這個〈提綱〉。

- 3月4日—4月8日 在北京召開了討論羅瑞卿問題的京西賓館會議。3月18日，羅瑞卿自殺未遂。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組向中央報送〈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
- 3月28日—30日 毛澤東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談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 4月10日 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 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揭發批判，並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會議通過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 5月25日 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在校內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大字報。
- 5月28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
- 5月29日 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
- 5月31日 以陳伯達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
- 6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於晚間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 6月初 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中央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北京市的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
- 6月4日 《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
- 6月7日—7月20日 中共中央華北局召開前門飯店會議，對華北局第二書記烏蘭夫、第三書記林鐵等進行了批判。
- 7月8日 毛澤東致江青信。信中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 7月28日 中共北京市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撤銷各學校工作組。
- 8月1日—12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 8月18日 毛澤東等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 8月 全國各地紅衛兵開展「破四舊」運動。
- 8月27日－9月1日 北京市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
- 9月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隨即開始了全國性的大串連運動。
- 10月2日 《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 10月5日 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根據林彪建議發出〈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中共中央將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
- 10月9日－28日 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 12月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此後，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及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
- 12月1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將文化大革命推廣到農村。

1967年

- 1月4日 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接見武漢造反派時，將陶鑄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 1月6日 上海造反派召開「打倒市委大會」，颳起「一月革命」的風暴。全國各地響應中央號召開展全面奪權。
- 1月1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又稱〈公安六條〉)。
- 1月23日 按照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 1月28日 中央軍委頒布八條命令。此後，各地駐軍開展「二月鎮反」。
- 2月11日－3月18日 譚震林、陳毅等大鬧懷仁堂，毛澤東發動批判「二月逆流」。
- 3月16日 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

- 3月30日 《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和評論員文章〈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編輯部調查員文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
- 4月6日 中央軍委發布十條命令。
- 5月13日 北京軍隊內部兩派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舉行演出問題在北京展覽館發生衝突，事後，林彪、江青等人通過觀看演出等活動支持一派，壓制另一派。
- 6月6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令，要求「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
- 6月28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
- 7月1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禁止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的通知〉。
- 7月20日 武漢發生揪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事件。
- 7月22日 江青在接見河南造反派時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
- 8月4日 毛澤東致江青信，提出「武裝左派」和「群眾專政」的問題。
- 8月7日 謝富治發表關於「砸爛公、檢、法」的講話。王力發表關於支持外交部奪權的講話。
- 8月30日 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
- 10月7日 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
-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大、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通知〉。
-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
- 10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
- 11月6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文章把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念」。

1968年

- 1月18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
- 2月4日 康生、謝富治等人支持在內蒙古自治區挖「內人黨」運動，造成重大冤案。
- 3月2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命令：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職務。此後，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
- 4月27日 《人民日報》刊登《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對派性要做階級分析〉。此後，全國各地派性更加氾濫。
- 5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要求各地「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全國許多地區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大批幹部群眾遭受迫害。
- 7月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廣西問題的布告。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支持「聯指」派鎮壓「四二二」派。廣西各地出現大規模亂殺人現象。
- 7月27日 北京六十多個工廠的三萬多人組成的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
- 9月5日 新疆、西藏同時成立革命委員會，至此，全國除台灣外的二十九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 10月5日 《人民日報》刊登〈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報道。此後，全國各地相繼辦起「五七」幹校。
- 10月13日—31日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 12月22日 《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從此，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

1969年

- 3月2日 中蘇邊境發生流血衝突的珍寶島事件。
- 4月1日—24日 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

參考文獻

一 年譜、文集、資料匯編

上海市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編著：《上海黨政機構沿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當代山西大事記》（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在上海8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中共上海市教育衛生工作委員會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共上海市教育衛生體育系統黨史大事記》（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

《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共上海黨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中共大同市委黨史研究室：《大同市解放後黨史大事記》（大同：內部出版，1987）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省檔案館：《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

《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中、下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至十三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上、下卷(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會

大辭典(1921—200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

組織史資料》，第五至六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1990.1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時

期)》(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黨史研究室：《內蒙古自治區志·共產黨志》(呼和

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大事記》(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

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組織部、中共北京市西城區黨史辦公室、北京市

西城區檔案局：《北京市西城區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1949—1987)》

(北京：內部出版，1995)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大事記》(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1)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2000)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社會主義時期吉林省黨的活動大事

記(1966—1985)》(徵求意見稿，1987)

- 中共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吉林省委活動大事記(1966—1987)》
(長春：內部出版，1990)
- 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安徽80年簡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 中共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成都地方史大事記(1949—1989)》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
-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江西歷史大事記》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 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共江蘇省
組織史資料簡本(1921—200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
- 中共西安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西安歷史大事記》(西安：內部
出版，1999)
-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河北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央
文獻出版社，1999)
- 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鄭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1986)
- 中共長沙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長沙黨史大事年表(1919—1992)》
(長沙：內部出版，1993)
- 中共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青島地方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
出版社，2000)
- 中共青海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青海省大事記》(西寧：內部出
版，1986)
- 中共南京市委辦公廳、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中共南京市委黨史工
作辦公室、南京市檔案局：《風雨同舟——南京探索前進三十年》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重慶歷史大事記》(重慶：重慶
出版社，2001)
-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
黨史出版社，1996)

-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委員會：《中國共產黨湖北歷史大事記(1949年5月—1993年12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中共焦作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焦作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貴州省歷史大事記》(南寧：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
- 中共雲南省委黨史研究室、雲南省檔案館：《雲南五十年——中共雲南省社會主義時期大事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
-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編：《中國共產黨新疆歷史大事記(1966.5—1991.12)》(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
- 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溫州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
- 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寧夏回族自治區檔案館：《中共寧夏黨史大事記》(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
-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廣東黨史大事記》(廣州：內部出版，2000)
- 中國二十世紀通鑑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二十世紀通鑑》，第四冊(北京：線裝書局，2002)
-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冊(北京：內部出版，1988)
-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七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
- 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黨史委編著，文輝抗、陳清林、李萬青主編：《湖南五十年大事記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四川省志·大事記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 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西藏黨史大事記(1949—1994)》(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美國《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委會編纂，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 高峰主編：《中共遼寧黨史大事記》(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
- 深圳市史志辦公室：《中國共產黨深圳大事記(1924—1978)》(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 陳文斌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 陳雲：《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章士釗：《章士釗全集》，第八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
-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紀實》(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雲南省志·中共雲南省委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
-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發展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 《新疆通志·共產黨志》編纂委員會：《新疆通志·共產黨志》(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 楊沫：《楊沫文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
- 《當代中國的北京》編輯部：《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198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 《當代中國的北京》編輯部：《當代北京大事記(1949—2003)》(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大事記》(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廣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卷十一(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
-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廣東黨史大事記》(內部發行，2000)
-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小組編：《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
- 謝端堯主編：《中共徐州歷史大事記》(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二 著作、論文、傳記、回憶親歷資料

-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 丁抒：〈破四舊：幾多文物付之一炬〉，《多維周刊》(www.chinesenewsweek.com) (2000年7月28日)
- 卜偉華：〈清華附中紅衛兵成立始末〉，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史·當代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孔丹：〈鎮壓「西糾」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反對周總理的險惡陰謀〉，載《人民日報》編印《情況匯報》第1107期（1979年4月3日）
- 方圓（周牧）：〈自由工人運動的先驅——紀念獨立工會「全紅總」成立三十周年〉，《北京之春》（美國），1997年3月號至5月號
-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 王凡：〈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的最後歲月〉，《新聞自由導報》，2004年，第204期
- 王凡：〈釣魚台內外的江青〉，《黨史博覽》，2002年第1期
-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
-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
- 王年一：〈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形勢的估計〉，《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4期
- 王年一：〈對上海「一月革命」的幾點看法〉，《黨史通訊》，1986年第2期
-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王年一：〈關於賀龍冤案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2年第4期
- 王年一：〈關於《紅旗》1966年第13期社論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11期
- 王年一：〈關於「軍委辦事組」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1年第7期
- 王年一：〈關於「圍困中南海」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1年第9期
- 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1期
- 王年一：〈關於「工總司」的成立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2期

- 《王尚榮將軍》編寫組：《王尚榮將軍》(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 王毅：〈「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文化基因〉，《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12月號
- 任捷：〈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對鄧拓夫人丁一嵐的訪談〉，《南方周末》，1999年6月25日
- 任榮：《戎馬征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
- 印紅標：〈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是怎樣出籠的〉，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
-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五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6)
-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 安紹杰主編：《劉賢權將軍》(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 何廷一：〈江青為何點名打倒我〉，《中華兒女》，2001年第10期
- 何洛、孟金：〈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出籠真相〉，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八十三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 何蜀：〈「文革」首例大規模武鬥不在上海在重慶〉，《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八十三)增刊第242期(2000年11月20日出版)(<http://www.hxwz.com/CR/ZK00/cr83.hz8.html>)
- 何蜀：〈「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1期(總第84期)
- 余煥椿：〈「文革」前夕的《人民日報》〉，《百年潮》，2004年第5期
- 余煥椿：〈大權旁落：「文革」中人民日報奪權紀實〉，《百年潮》，2004年第12期
- 吳冷西：〈從學術討論到「文化大革命」〉，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 吳東峰：〈開國將軍多軼事〉，《北京青年報》，2002年11月23日

- 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 吳慶彤：〈人民的中流砥柱——回憶周總理在「文革」中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在若干重大問題上的鬥爭〉，《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6期
- 呂鴻：〈我任紅衛兵接待總站站長的日子〉，《炎黃春秋》，1998年第12期
- 宋永毅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
-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 李丹林：〈非常歲月中的父親李雪峰〉，《中華兒女》，2002年第7期
- 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 李文卿：《近看許世友（1967—1985）》（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 李向前：〈我在美國查檔案〉，《百年潮》，1999年第1期
- 李志堅：〈「二月兵變」之謎——揭露康生對彭真、賀龍等同志的一大誣陷〉，《北京日報》，1980年12月10日
-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 李相：〈北京大紅羅廠南巷20號駭人一幕——五人死於紅衛兵之手〉，《南方周末》，2000年3月31日
- 李振祥：《四十七軍在湖南「三支兩軍」紀實》（長沙：內部出版，2004）
- 李莉：〈李琪在「文革」發動前後的日子裏〉，《百年潮》，2003年第8期
-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冊
- 李遜：〈「文革」中發生在上海的經濟主義風〉，新世紀新聞網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606/20060627135806.html>)
- 李德生：《李德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 杜易：《大雪壓青松——「文革」中的陳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

- 阮虹：《一個外交家的經歷：韓敘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 周孜仁：〈紅衛兵小報和我〉，《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第121期至157期連載(2002年2月12日至12月30日)
- 宗道一：〈「王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中華兒女》，2002年第1期
- 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冊
- 林蘊暉：〈毛澤東為甚麼派彭德懷去三線〉，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
-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 金春明：〈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後後〉，《黨史通訊》，1983年第18期
-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侯波、徐肖冰口述、劉明銀整理：《帶翅膀的攝影機——侯波、徐肖冰口述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俞虎：〈周恩來、鄧小平與張霖之的平反昭雪〉，《縱橫》，2002年第7期
- 南光編：《毛澤東和他的四大秘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
- 姜鋒等：《楊勇將軍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 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
- 紀念馬石江同志文集編輯組：《用火寫在天空的生命——紀念馬石江同志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 紀學：〈最後的十年——康克清談朱德同志〉，《解放軍報》，1986年11月29日
- 胡長水：〈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產生原因析〉，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
- 胡楠仁：〈「文革」中的陳雲〉，《縱橫》，1996年第11期
-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 范碩：〈葉劍英「文革」風雲錄(之一)〉，《中華兒女》，2000年第11期
- 范碩：〈沖天一怒京西賓館〉，《中華兒女》，2000年第12期

- 范碩：〈「三支兩軍」的緣起與「七二〇」事件的爆發〉，《中華兒女》，2001年第2期
- 韋純束、劉毅生等主編：《當代中國的廣西》（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 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席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上冊
-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 徐友漁：〈我親歷過的武鬥〉，載《自由的言說——徐友漁文選》（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
- 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
- 徐浩淵：〈我的反思〉，《世界日報》（美國），1997年3月31日
- 浩然：《我的人生》（北京：華藝出版社，2000）
- 秦越人：〈胡耀邦主政陝西的兩百天〉，載張黎群等編：《懷念耀邦》，第四集（香港：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
- 秦曉鷹：〈紅衛兵之旗〉，《傳記文學》，1990年第2期
- 耿耿：〈劉素媛在毛澤東身邊的一段經歷（下）〉，《黨史博覽》，2002年第7期
- 耿飆：《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載董邊、鐸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 張子申：《楊成武將軍訪談錄》（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
- 張占斌、孫建軍：《「三家村」沉冤》（湖南：三環出版社，1992）

- 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間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與思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 張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組〉，載季羨林主編：《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
- 張承志：《紅衛兵時代》（東京：岩波新書，1992）（日文版）
- 張海瀛：〈憶吳晗師〉，載北京市歷史學會編：《吳晗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 張連和：〈五進馬村勸停殺〉，載者永平主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上冊（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
-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 梁必業：《我在人民軍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 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
- 郭成偉主編：《新中國法制建設50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陳先瑞：〈廖漢生、楊勇被抓與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問題〉，《百年潮》，2000年第4期
-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
-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黨史博覽》，1999年第9期
- 陳揚勇：〈抗爭與策略：對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一封信的探析〉，《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
- 陳雲峰主編：《當代青海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 陶鐵柱：〈「聯動」與共產主義小組〉，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 章捷、鹿音：〈張海妮：我為毛遠新辯護〉，《中華兒女》，1999年第5期
- 傅洋：〈父親彭真〉，《美洲文匯周刊》，第180期

- 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 曾濤：〈正義的抗爭——所謂「二月逆流」的前前後後〉，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冊
- 程振聲：〈李先念在十年浩劫之中〉，《中華兒女》，1998年第8期
- 舒雲：《百戰將星——楊勇》（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
- 舒雲：〈楊勇和警衛員孫啓增〉，《縱橫》，2000年第7期
- 舒雲：〈中將鄭維山平反的前前後後〉，《黨史博覽》，2002年第1期
- 黃崢：《劉少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 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 楊易辰：《楊易辰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 楊勝群、田松年：〈「文革」前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批判運動真相〉，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
- 楊勝群、田松年：〈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前因後果〉，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第四卷
- 楊超等主編：《當代四川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北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 葉永烈：〈「文革」瑣記〉，《新觀察》，1988年第9期
- 葉永烈：《名人沉浮錄》（桂林：灕江出版社，1992）
- 葉永烈：《王洪文傳》（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 葉青：〈福建「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研究〉，中國國家圖書館博士論文文庫，2003\k29\20
- 葛恆軍：〈1966年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其會議紀要考析〉，載湯應武主編：《中國共產黨重大史實考證》
- 董保存：《百戰將星——楊成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

- 董保存：《政治漩渦中楊成武》，「亦凡公益圖書館」(www.shuku.net)
- 賈蘭勳：〈貼身衛士憶少奇蒙難——寫在少奇同志離開我們三十周年的日子裏〉，《百年潮》，2000年第1期
- 圖們、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冤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 趙培興主編：《中共黑龍江簡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趙學勤：〈「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文物遭浩劫〉，載北京日報社《宣傳手冊》編輯部編：《宣傳手冊(專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1985)
-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劉先琴、郭家寬：〈風風雨雨劉平平〉，《作家文摘》，1994年6月24日，第6版
- 劉再復：〈心膽俱裂的瞬間〉，《中國老年報》，1977年8月1日
-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 劉回年：《重大事件親歷：一個將軍記者眼中的政治風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
- 劉西堯：〈「文革」中我給周恩來當聯絡員〉，《中華兒女》，2002年第2期
- 劉志堅：〈《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 劉志堅：《風雨征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
- 劉志堅：〈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七十四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 劉林元：〈決戰前的憂慮和不安心態的坦露——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解讀〉，《南京社會科學：經濟哲學版》，1995年第11期
-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1994)

- 劉曉慶：《我這八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
- 歐陽毅：《歐陽毅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 鄭澆：〈「以紅衛兵取代共青團」的歷史公案〉，《青運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鄭義：《紅色紀念碑》（香港：華視文化公司，1993）
- 鄭謙：〈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兼駁《文化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黨史通訊》，1984年第6期
- 鄧禮峰：〈「三支兩軍」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6期
- 盧弘：〈《解放軍報》「1·20反革命事件」始末〉，《縱橫》，2001年第11期
-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 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
- 穆欣：〈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來龍去脈——「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場風暴〉，《黨的文獻》，1999年第6期
- 穆欣：〈關於工作組存廢問題〉，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文革」》，下冊
- 穆青、郭超人、陸拂為：〈歷史的審判〉，《人民日報》，1981年1月26日
-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 蕭思科：〈王平上將奉命兩進北京城〉，《中華兒女》，1998年第7期
- 蕭荻：〈歷史不容忘記——記南開大學清查「抓叛徒活動」的前前後後〉，《藍盾》，1985年第7期
- 遲福林、田夫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史》（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
- 錢鋼：〈「二月兵變」真相〉，《解放軍報》，1980年12月7日
- 閻長貴：〈一張反對陶鑄大字報的出籠經過〉，《黨史博覽》，2003年第1期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
- 薛明：〈向黨和人民的報告——憶賀龍同志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夜〉，

- 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記實》，第一卷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
- 韓立成主編：《當代河北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 韓素音：《再生鳳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 點點：《非凡的年代：我的父親羅瑞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
- 聶元梓：〈「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由來〉，《往事》，2004年11月
17日，第4期
- 魏敬民：〈「六十一人案件」始末〉，《百年潮》，2003年第1期
- 蘇採青：〈「文革」初期三個回合的鬥爭〉，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
「文革」》，下冊
- 鐵竹偉：《廖承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龔育之：〈幾番風雨憶周揚〉，載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呼和浩
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 龔育之：〈彭真同志與北大社教〉，《百年潮》，2002年第7期
- 龔育之：〈《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
「文革」》，上冊
- 龔育之：〈關於「繼續革命」的幾個問題〉，載張化、蘇採青主編：《回首
「文革」》，上冊

三 報紙、期刊

- 《人民日報》
- 《二十一世紀》(香港)
- 《中共黨史研究》
- 《中共黨史資料》
- 《中華兒女》
- 《世界日報》(美國)
- 《北京之春》(美國)
- 《北京日報》

《北京青年報》

《百年潮》

《炎黃春秋》

《青運史研究》

《紅旗》

《傳記文學》

《當代中國史研究》

《當代中國研究》(美國)

《解放軍報》

《縱橫》

《藍盾》

《黨史研究資料》

《黨史通訊》

《黨史博覽》

《黨的文獻》

索引

二畫

「七二〇」事件 523, 528, 533—535,
539—543, 569, 620

七三布告 653, 695—697, 701, 706,
707, 710—717, 719, 721, 722, 776

九大 119, 430, 431, 437, 609, 634,
635, 637, 638, 650, 681, 725, 730,
737—740, 745, 746, 758—763, 768,
771, 773, 777, 778, 780—782, 785,
788

九屆一中全會 771

「二月逆流」 433, 449, 451, 454, 455,
478, 479, 505, 608, 615, 627, 654,
655, 669, 670, 738, 740—745, 764,
787, 788

〈二月提綱〉 7, 51—53, 58—62, 69—
71, 80, 229

八屆十一中全會 86, 164, 176, 183,
185, 186, 187, 199, 203, 204, 218,
219, 229, 272, 281, 289, 298, 326,
474, 529, 634, 743, 764

八屆十二中全會 118, 436, 725, 730,
737, 738, 740, 750, 780, 787

〈十六條〉 187, 195—198, 215, 229,
246, 275, 278, 280, 293, 304, 307,
317, 322, 334, 343, 347, 362, 611,
674

「三支兩軍」 428, 430, 431, 456, 584,
640, 642, 729

三畫

三月京西賓館會議 36—38, 64, 123

上山下鄉 372, 687, 751—756, 774

上海會議 28—30, 36, 83, 90

大串連 255—258, 265, 267—269,
279, 309, 320, 321, 328, 332, 357,
529

大批判 143, 195, 229, 350, 440, 467—
469, 473, 475—478, 510, 512, 540,
543—545, 547, 548, 551, 552, 555,
627, 667, 679, 680, 704, 735, 739,
785

工人宣傳隊 497, 685, 697, 702, 706,
730, 754, 774

工交座談會 320, 323, 324, 326

工作組 23, 24, 94, 113—116, 137—
140, 149—172, 174—183, 185—
190, 192, 196, 204, 209, 214, 215,
220—224, 240, 241, 253, 256, 259,
272, 280—284, 287, 288, 290, 293,
304, 307, 333, 337—339, 363, 434,
440, 471, 504, 546, 547, 604, 736,
775

四畫

中央工作會議 5, 200, 201, 203, 215,
240, 249, 281, 287, 288, 294—297,
326

中央文藝小組 113, 116—119, 150,
153, 161—163, 178, 179, 186, 187,
198, 199, 201, 203, 205, 211, 215,
218, 219, 221—223, 226, 237, 264,
268, 272—274, 277, 279, 280, 291,
292, 294, 305, 311—313, 320—322,
328, 329, 335, 337—342, 344—348,
350, 362, 363, 365, 366, 368, 374,
375, 379, 381, 382, 385—389, 392,
395, 396, 398, 407, 408, 410, 418—
420, 427, 433, 435, 441, 442, 444,
447, 449—453, 455, 462, 464, 470,
478—481, 484, 486, 488, 493, 496—
499, 503, 504—507, 511, 514, 515,
517, 519, 527—530, 535, 539—541,
547, 548, 550, 551, 554—556, 564,
568—570, 588, 592, 594, 596, 598,
604, 607—609, 611, 612, 614, 615,
617, 618, 624, 628, 630—634, 637,

638, 641, 642, 657, 658, 663, 668,
692, 695, 697, 698, 700, 704, 707,
717, 734, 738, 746, 753—775, 777,
788

「五一三」事件 500—502

五一六兵團 504—510, 616

〈五一六通知〉 62, 68, 79—82, 87,
97, 103, 105, 116, 120, 132, 186,
194, 195, 197, 229, 357, 478, 505,
507, 535, 536, 611

五七幹校 751, 752

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31, 60, 62, 66,
74, 82, 83, 86, 89, 91, 93, 94, 102,
103, 106, 113, 127, 132, 185, 195,
199, 200, 281

〈六六通令〉 530, 615

「六廠二校」 766

〈公安六條〉 597—599

「文攻武衛」 577, 579, 585, 593

毛澤東 2—14, 18—24, 26—28, 30—
42, 45—49, 51—55, 57—75, 79—
84, 86, 87, 89—93, 95, 96, 98—100,
103—119, 121, 123—125, 127, 129—
131, 137, 138, 140—143, 146—148,
150, 152—155, 157, 165, 169—179,
182, 183, 185—195, 197—215, 218,
219, 222—227, 229, 232—234, 236,
240, 242, 248—251, 253—257, 259,
261, 263—265, 267, 268, 271, 272,
274—289, 292, 294—296, 298, 299,
301, 302, 306—310, 312, 313, 315,
320—325, 327—332, 334, 336, 337,
339, 341, 343, 346, 347, 349—351,
353—357, 361—363, 365, 366, 368,
372—376, 382—384, 388—391, 393,

397, 399, 401, 405, 407—410, 412, 413, 415, 417, 420—422, 424, 426, 429, 431—435, 437, 439—453, 455, 457, 462—465, 467—473, 475, 477—482, 485, 487—489, 494, 496, 499—501, 504, 506, 507—509, 511—515, 518—521, 526, 528—532, 534, 536—538, 540, 541, 544—548, 551, 555, 556, 558—561, 563—566, 571, 576, 577, 581—583, 585, 588, 590—600, 607—612, 614, 615, 617—627, 629—639, 641, 642, 650, 653, 655—657, 660, 662, 665, 669—671, 673—676, 678, 680, 682, 685, 686, 696—705, 707—710, 712, 714, 715, 718, 725, 726, 730, 731, 734, 736, 737, 739, 740, 742, 744, 746—749, 751, 752, 754, 757, 759—765, 767—773, 775, 777—780, 784

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620, 627, 633, 655, 656, 660, 662, 663, 723, 776, 778, 782, 784

王力, 13, 35, 58, 59, 69, 112, 113, 117, 118, 179, 180, 195, 201, 215, 264, 273, 274, 277, 287, 288, 320, 322, 326, 327, 331, 351, 354, 357, 379, 380, 383, 385, 388, 395, 442, 447, 448, 451, 453, 462, 463, 467, 480, 498, 504, 509, 519, 520, 523, 531, 532—536, 539, 540, 542, 554, 555, 564, 569—572, 574, 576, 579, 607—613, 615, 617, 632, 653, 654, 665

王大賓 274, 399, 454, 504, 556, 658, 698, 700, 701

六畫

伍豪事件 486, 489, 609

安亭事件 298, 309, 311, 312, 322

朱德 52, 89, 90, 91, 200, 351, 367, 564, 738, 740, 741, 743, 745, 765, 766, 770, 772

江青 10—14, 20, 21, 40—52, 58, 62, 67—69, 78, 84, 93, 112, 117—119, 172—174, 177—179, 194, 195, 205, 210, 215, 217—219, 220, 224, 240, 274, 276, 278, 279, 281, 288, 306, 315—318, 325, 327, 337, 341, 342, 344, 345, 348, 350, 351, 357, 361, 363—368, 374, 379, 383, 387, 393, 395, 396, 435, 438, 440, 442—444, 447, 448, 450, 453, 462, 467—470, 480, 485—488, 497—499, 502, 503, 505, 507, 519, 520, 529, 535, 536, 549, 550, 555, 559, 564, 568, 569, 575—577, 593, 598, 608—612, 615, 617, 632, 643, 645, 654, 655, 660, 666, 669, 670, 673, 684, 699, 700, 726, 741, 742, 746—749, 759, 760, 769, 770, 772

七畫

吳法憲 29, 121, 122, 193, 500, 502, 503, 540, 608, 609, 669, 671, 741, 743, 761, 769, 772, 773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216, 223, 228, 248, 253, 271, 279, 281, 287, 292, 294, 296, 298, 320, 328, 340, 743

李作鵬 26, 120, 121, 500, 502, 503, 531, 540, 671, 769, 772, 773

八畫

周恩來 4, 12, 13, 18, 19, 29, 30, 36, 38, 42, 48, 52, 58, 60, 65, 68—70, 77, 82, 85, 90—92, 113—116, 118, 119, 121, 124, 129, 150, 152, 153, 173, 175, 177, 181, 183, 187, 189, 190, 192, 195, 198, 200, 201, 205, 210, 212, 214, 218, 226, 231, 232, 234, 235, 243, 245, 253, 256, 257, 260, 266, 272—280, 284, 286, 287—289, 291, 294, 300—302, 311, 319, 320, 323, 324, 326, 327, 332, 344, 345, 348, 353, 354, 356, 363—367, 369, 373, 388, 393, 394, 399—401, 405, 408, 416, 420—423, 426, 428, 429, 436, 437, 439, 442, 444, 447, 449—455, 458, 462, 466, 468, 471, 478—482, 484—490, 497, 501—508, 514—518, 522, 523, 528—534, 537—540, 545, 546, 548, 549, 555, 558, 559, 567, 568, 572—574, 576, 581—583, 586, 590, 593, 594, 597, 598, 608—611, 614, 616, 618, 639, 641, 642, 650, 657, 660, 666, 667—671, 674, 698, 699, 705, 707, 714, 715, 726, 730, 739, 743, 746—749, 755, 759, 760, 764, 767, 769, 770, 772, 776—782, 784, 785, 789

林彪 21—34, 36, 38—41, 43, 45—49, 51, 52, 64, 75, 82—92, 103, 106, 107, 120—123, 125, 172—175, 185, 187, 193, 195, 198—203, 206, 222, 226, 249—251, 262, 264, 274—277, 279, 280, 284, 285, 291, 306, 324,

326—333, 338, 341, 342, 361, 362, 366, 368, 383—385, 409, 420, 434, 435, 437, 440—442, 444, 445, 447, 451, 452, 464, 468, 469, 472, 479, 480, 485, 486, 488, 501—503, 506, 534—539, 542, 559, 576, 582, 593, 594, 597, 598, 619, 651, 660, 669—672, 674, 697, 698, 705, 718, 719, 731, 740, 748, 759—764, 766—768, 770—772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39, 41—52, 59

「武裝左派」 576, 577, 593, 596, 625
邱會作 430, 445, 502, 503, 671, 769, 772, 773

青海「二二三」事件 461—463

九畫

前門飯店會議 102—105

姚文元 7, 10, 11, 13, 14, 16—21, 44, 54, 62, 64, 66, 67, 76, 78, 79, 94, 117, 119, 145, 215, 273, 276, 286, 316, 348, 351, 357, 370, 372, 375, 378—382, 448, 451, 462, 480, 508, 509, 540, 583, 608, 609, 615, 634, 636, 669, 670, 703, 759, 760, 761, 769, 772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190, 193—195, 203, 205, 242, 281, 282, 547, 556

紅衛兵 14, 140—145, 147—149, 167—172, 179, 203—218, 220, 221, 223—238, 240—246, 249—269,

272, 273, 275, 276, 281, 282, 286—
289, 294—298, 301—304, 308—
311, 313, 328, 329, 335, 337—349,
357, 363—367, 374, 376—378, 380,
388, 391, 395, 396, 398, 399, 402—
404, 407, 417, 419, 421, 422, 424—
427, 432, 434, 442, 454, 455, 457,
461, 463, 464, 480, 481, 483, 486,
487, 489—492, 494—499, 504, 505,
507, 511, 516, 521, 522, 527, 529, 545,
550, 553, 566, 567, 573, 576, 585, 587,
594, 596, 618—620, 623, 627—634,
638, 656, 658—661, 663, 664, 685,
686, 688—690, 692, 706, 721, 726,
744, 749, 752, 753, 755, 765, 774, 775

軍以上幹部會議 428, 462, 471, 514,
611, 719

〈軍委八條命令〉 423, 426, 442, 456—
458, 460, 493

〈軍委十條命令〉 463, 464, 529, 539

軍委辦事組 504, 670, 671, 702, 719,
738, 769, 773, 788

革命委員會 157, 166, 169, 176, 178,
180, 187, 190, 197, 211, 228, 233,
236, 257, 268, 269, 327, 373, 377,
382, 386—388, 390, 392, 398, 399,
401, 405, 407, 414, 416, 420—422,
426, 429, 468, 493, 494, 501, 509,
514—516, 521, 526, 528, 529, 582,
583, 595, 607, 611, 614, 615, 622,
634, 638, 642, 650, 655, 658, 663,
674, 678, 680, 681, 684, 702, 704,
712, 725—727, 730, 731, 734, 736,
737, 739, 746, 751, 753, 774, 778,
781, 785

十畫

徐向前 92, 200, 302, 326, 332, 366,
408, 436, 437—439, 442—445, 448,
450, 453, 478, 518, 538—540, 542,
543, 670, 738, 741—744, 764, 766,
770, 773

「破四舊」 228—231, 234, 236—240,
243, 245, 248—250, 252—254

「鬥私批修」 607, 617—619, 626,
628, 629, 631, 656, 664, 764

十一畫

康生 12, 20, 29, 35, 48, 53, 54, 56,
58, 60, 62, 66—69, 71, 74—77, 79,
80, 82, 87, 92, 93, 117, 119, 126—
130, 153, 161, 174, 175, 177, 178,
194, 195, 200, 201, 203, 210, 212,
215, 217—219, 224, 274, 276, 277,
279, 281, 306, 316, 325, 337, 342,
361, 364, 366, 383, 386, 387, 447,
450, 452, 453, 462, 471, 472, 480,
481, 483, 486, 487, 491, 497, 498,
503, 505, 507, 511, 530, 540, 549,
550, 555, 559, 564, 566, 568, 583,
608—612, 615, 635, 643, 645, 646,
654, 655, 666, 669, 670, 674, 699,
715, 726, 741, 742, 746—750, 759,
767—769, 772, 784, 788

張春橋 10, 11, 13, 14, 16—18, 20,
21, 42, 44—46, 48, 51, 61, 62, 67,
69, 74—77, 117, 119, 194, 195, 215,
216, 241, 273, 274, 276, 277, 279,
281, 292, 310—313, 315, 322, 325,
348—350, 357, 370, 372, 375—382,
442, 448, 450, 451, 462, 480, 489,

- 504, 540, 564, 581, 583, 596, 608, 609, 618, 619, 622, 634, 677, 743, 745, 746, 749, 759-761, 769, 770, 772, 773
- 戚本禹 19, 54, 55, 57, 61, 64, 66-69, 76, 109, 112, 117, 194, 195, 215-217, 220, 225, 273, 274, 289, 292, 327, 331, 338, 339, 341, 357, 362, 363, 367, 368, 386, 392, 396, 397, 399, 448, 453, 454, 462, 467, 470, 471, 473-475, 480, 481, 486, 489, 492, 493, 498, 503-505, 509-511, 546-550, 553-556, 564, 565, 568, 569, 571, 607-612, 632, 658-663
- 「清理階級隊伍」 509, 643, 650, 653, 671-682, 687, 689, 702, 719, 721, 739, 740, 752, 765, 766, 780
- 陳再道 529, 531, 532, 539-542, 576, 684
- 陳伯達 19, 35, 44, 45, 48, 51, 68, 69, 74, 77, 79, 82, 85, 88, 92, 112, 117-119, 130, 150, 151, 153, 157, 159, 163, 164, 174, 175, 177, 180, 187-189, 195, 200, 205, 210, 215, 218, 219, 222, 256, 274, 275, 277-279, 281, 282, 289, 291, 292, 311, 312, 316, 320, 322, 323, 325, 337, 339, 340-342, 346, 353, 354, 357, 361, 364-366, 379, 380, 387, 388, 390, 393, 395, 396, 435, 438, 442-444, 447, 448, 450, 453, 462, 471, 480, 485, 497, 498, 502, 503, 505-507, 509-511, 514, 523, 548-550, 555-559, 564, 583, 590, 594, 608-612, 630, 631, 635, 636, 660, 666, 669, 670, 674, 699, 700, 715, 726, 741, 742, 747-749, 759-762, 767-769, 772, 782, 784
- 陳雲 4, 8, 93, 187, 200, 203, 487, 564, 738, 740, 741, 766, 770
- 陳毅 1, 46, 70, 79, 88, 90, 92, 121, 175, 185, 192, 276, 329, 332, 333, 336-338, 356, 365, 433, 444, 448, 450, 451, 453, 478, 479, 564, 567-569, 571, 574, 654, 665-668, 670, 738, 741-746, 764-766, 770
- 陸定一 10, 12, 29, 53, 56, 58, 60, 64, 73, 75-77, 79, 84, 87-89, 91, 92, 136, 186, 199, 212, 474, 476, 482
- 陶鑄 64, 92, 118, 121, 138, 153, 157, 175, 178, 188, 192, 193, 195, 198, 200, 208, 213, 219, 220, 226, 272, 275, 276, 277, 279, 280, 287, 288, 294, 298, 300, 303, 306, 310, 311, 313, 320, 326, 359, 361-365, 368, 424, 448, 452, 468, 476, 505, 508, 509, 557, 615, 669
- ## 十二畫
- 彭真 11-13, 18-20, 36-38, 47, 48, 51, 53, 55-62, 64-73, 75-80, 81, 83, 84, 87, 88, 91-95, 97, 105, 109, 113, 117, 123, 126, 127, 130, 136, 161, 178, 179, 186, 195, 199, 211-213, 216, 290, 368, 398, 399, 450, 474, 476, 477, 481, 483, 520, 550, 552
- 彭德懷 2, 6-8, 19, 20, 57, 58, 60, 76, 84, 90, 186, 253, 367, 438, 476, 520, 540, 550

「揪叛徒」 468, 480—485, 488

「揪劉火線」 478, 545—547, 551—555, 557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
281

賀龍 22, 23, 30, 31, 46, 88, 121, 122, 124, 125, 332, 368, 435, 437, 439, 451, 454, 550, 744

黃永勝 485, 608, 609, 668, 669, 671, 719, 741, 767, 769, 772, 773

十三畫

「楊余傅事件」 653, 668—670

楊成武 38, 43, 88, 114, 115, 122—125, 224, 225, 276, 366, 430, 436, 444, 453, 480, 504, 509, 518, 531, 534, 540, 581, 608, 610, 619, 622, 634, 668—670, 743

楊尚昆 21, 27, 64, 73, 77, 84, 88, 91—93, 112, 114, 136, 186, 199, 200, 435, 476, 520

「群眾專政」 576, 577, 596—598, 600, 624, 625, 672, 673, 677, 678, 705, 722

葉群 22—25, 27—30, 40, 64, 88, 366, 442, 445, 452, 453, 470, 480, 501—503, 608, 609, 670, 671, 761, 769, 772

葉劍英 22, 27, 36, 38, 70, 92, 113—115, 121, 122, 124, 175, 188, 192, 200, 226, 251, 279, 290, 291, 329, 330, 332, 334—338, 365, 408, 430, 436, 437, 439, 443, 444, 447—450, 452, 459, 460, 462, 478, 480, 485,

518, 536, 538, 540, 670, 738, 741—744, 766, 770, 772, 773

十四畫

蒯大富 163, 166, 171, 223, 262, 274, 281, 288, 346, 349, 350, 351, 399, 450, 454, 476, 492, 493, 497, 504, 539, 542, 554, 556, 564, 658, 659, 692—701, 705, 726

十五畫

劉少奇 4—7, 12, 13, 24, 29, 48, 58, 59, 65, 66, 70, 74, 79, 81, 82, 84, 88, 93, 104, 121, 135, 136, 149, 150, 152, 153, 157, 159, 162—165, 170, 171, 173—175, 177, 182, 183, 186—189, 191, 192, 194, 200, 201, 205, 206, 242, 243, 272, 274, 275, 278, 281—283, 286—289, 299, 315, 316, 327, 341, 348—351, 353, 361, 368, 450, 454, 467—478, 480—482, 505, 521, 529, 545—551, 553—557, 565, 598, 610, 611, 621, 634, 635, 638, 669, 684, 700, 725, 740, 741, 743, 746—750, 764, 768, 772

劉志堅 38, 40, 41, 43—48, 51, 114, 117, 175, 195, 224, 225, 279, 290, 291, 337, 365—367, 440, 452

鄧小平 4—6, 12, 24, 29—31, 36, 38, 47, 52, 58, 63, 69, 82, 104, 115, 121, 126, 149, 150, 152, 153, 164, 170, 171, 175, 181, 183, 186, 187, 192, 194, 195, 200, 205, 243, 272, 274, 281—283, 286, 287, 289, 290, 299,

327, 337, 348, 350, 351, 365, 368, 450,
470, 471, 489, 505, 519, 520, 521,
529, 550, 598, 635, 669, 684, 743

十六畫

蕭華 31, 32, 35, 38, 43, 51, 79, 83,
123, 124, 291, 332, 335, 366, 423,
430, 435, 438, 439, 441—443, 453,
470, 480, 501—503, 509, 608, 743

十七畫

謝富治 114, 118, 192, 195, 200, 215,
216, 224, 235, 241, 246, 276, 315,
347, 348, 393, 397—399, 429, 452,
454, 470, 477, 478, 480, 483, 494—
498, 500, 509, 511, 523, 529, 531—
533, 535, 539, 540, 554—558, 572,
576, 579, 596, 597, 599, 608, 609,
614, 625, 632, 643, 655, 657, 658,
660—664, 669, 674, 675, 689, 691,
698—700, 741, 746, 755, 760, 769,
772, 773, 782

韓愛晶 367, 395, 399, 454, 476, 539,
548, 554, 556, 564, 658, 659, 698—
701, 706

十八畫

聶元梓 125—130, 148, 151, 155,

176—178, 189, 191, 194, 206, 261,
289, 313, 351, 399, 454, 476, 481,
490, 492, 493, 495, 497, 554, 556,
564, 658, 660, 663, 664, 690, 691,
698, 699, 701, 771

聶榮臻 31, 88, 121, 200, 408, 431,
444, 448, 450, 478, 518, 538, 651,
670, 738, 741—743, 745, 764, 766,
770, 773

十九畫

羅瑞卿 7, 18, 21—31, 36—40, 51,
64, 72, 73, 77—79, 83, 84, 87, 88,
90, 91, 93, 113, 120, 121, 123, 124,
136, 186, 199, 476, 540

譚厚蘭 161, 237, 262, 274, 399, 451,
476, 504, 556, 596, 613, 614, 658,
660, 698, 700, 701

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
審查報告 738, 740, 749

關鋒 19, 54—58, 60, 61, 66—69, 70,
94, 117, 215, 222, 262, 273, 274,
337, 340, 341, 345, 351, 354, 355,
366, 383, 385, 441, 442, 448, 451,
462, 480, 482, 486, 498, 504, 505,
511, 535, 536, 556, 564, 565, 566,
569, 571, 607—613, 615, 617, 631,
653, 654

